

回顧與反思

六四流亡學生 17 人

1993 年 6 月

目錄

《回顧與反思》

出版前言

與會同學

編例

關於會議的說明

一. 學運初期（從胡耀邦逝世到四二七大游行）

1.1 從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籌委會（常勁）〈參：沈彤 1.2 封從德 1.3 柴玲 1.3.6 張伯笠 1.6.2-3〉

1.1.1 北大籌委會的成立

1.1.2 四二〇北大游行〈參：1.6.3 四二〇慘案〉

1.1.3 北大籌委會人事變動〈參：封從德 1.3.4 柴玲 1.3.6〉

1.2 北大校園活動（沈彤）

1.2.1 學運前的校園活動〈參：1.6.1 學運之初〉

1.2.2 奧林匹亞科學院的參與

1.2.3 北大新聞中心的出現

1.3 民主機制與組織建制（封從德，柴玲）

1.3.1 卷入學運（封從德）〈參：常勁 1.1.1 沈彤 1.2.2〉

1.3.2 初期的恐怖

1.3.3 四二二天安門廣場〈參：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

1.3.4 北大籌委會的改組〈參：常勁 1.1.3 柴玲 1.3.6〉

1.3.5 四二七游行：出校決議是怎么做出的？〈參：1.6.8 關於四二七游行〉

1.3.6 組織建制（柴玲）

1.4 師大與高聯（梁二）

1.5 北高聯：從自發到自治（王超華）

1.5.1 四二二集會天安門〈參：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

1.5.2 清華與北高聯代表會議

1.5.3 決定四二七游行〈參：1.6.8 關於四二七游行〉

1.5.4 為什麼突然取消游行？〈參：1.6.8 關於四二七游行〉

1.6 補充與質疑

1.6.1 學運之初〈參：常勁 1.1.1，沈彤 1.2.1，封從德 1.3.1〉

1.6.2 四一七游行（張伯笠）〈參：常勁 1.1.1〉

1.6.3 四二〇慘案

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柴玲，張伯笠）〈參：封從德 1.3.3 王超華 1.5.1〉

1.6.5 關於王丹

- [1.6.6 張智勇](#)
- [1.6.7 吾爾開希是怎么選出來的？](#)
- [1.6.8 關於四二七<參：封從德 1.3.5 王超華 1.5.3>](#)
- [1.6.9 北大新聞導報（沈彤，張伯笠）](#)
 - [（1）新聞導報與三步計劃（沈彤）](#)
 - [（2）新聞導報的文章（張伯笠）](#)

[二。低潮與絕食（四二七以後——五一三絕食）](#)

- [2 . 1 組織與對話：北大與高聯（封從德）](#)
- [2 . 2 北高聯的活動（王超華）](#)
 - [2.2.1 追求北高聯的合法化<參：封從德 2.1>](#)
 - [2.2.2 與政府對話](#)
 - [2.2.3 宣佈復課<參：2.7.3 誰作的復課決議？>](#)
 - [2.2.4 學運低潮（王超華）<參：柴玲 2.4.1 學運低潮>](#)
- [2 . 3 對話團（沈彤）<參：封從德 2.1；王超華 2.2.2 與政府對話>](#)
 - [2.3.1 對話代表的產生](#)
 - [2.3.2 四二九對話與對話主題](#)
 - [2.3.3 絕食與對話](#)
 - [2.3.4 絕食後的對話<參：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柴玲 2.6.2 與閻明復對話>](#)
- [2 . 4 絕食的發起（柴玲）](#)
 - [2.4.1 學運低潮<參：王超華 2.2.4 學運低潮>](#)
 - [2.4.2 串聯絕食<參：2.7.6 誰最先發起絕食？>](#)
 - [2.4.3 寫絕食書<參：2.7.5 誰是絕食書的作者？>](#)
- [2 . 5 反對絕食：北大、高聯與統戰部](#)
 - [2.5.1 北大籌委會的反應（常勁）](#)
 - [2.5.2 北高聯反對絕食（王超華）<參：柴玲 2.4.2 串聯絕食>](#)
 - [2.5.3 請知識分子勸阻絕食](#)
 - [2.5.4 北高聯被迫接受絕食（梁二）](#)
 - [2.5.5 絕食促成對話（王超華）](#)
 -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
- [2 . 6 初到廣場（柴玲）](#)
 - [2.6.1 絕食隊伍到廣場](#)
 - [2.6.2 與閻明復對話<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 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
 - [2.6.3 十二個學者勸阻絕食<參：2.7.8 為什麼學者勸阻無效？>](#)
- [2 . 7 補充與質疑](#)
 - [2.7.1 北大五一改組（沈彤，封從德，常勁，柴玲）<參：封從德 2.1 沈彤 2.3.1 柴玲 2.4.1>](#)
 - [（1）改選（沈彤）](#)
 - [（2）辭職與改選（封從德）](#)
 - [（3）罷免常委（常勁）](#)
 - [（4）改選的原因（柴玲）](#)
 - [2.7.2 跟官方接觸：北大與鄧林（柴玲）](#)
 - [2.7.3 誰做的復課決定？<參：王超華 2.2.3 宣佈復課>](#)
 - [2.7.4 北大對高聯的態度<參：封從德 1.3.4 王超華 1.5.2, 2.2.4>](#)

[2.7.5 誰是絕食書的作者？誰吃了巧克力？](#)

[2.7.6 誰最先發起絕食？](#)

[2.7.7 歡迎戈爾巴喬夫（封從德）](#)

[2.7.8 為什麼學者勸阻無效？<參：2.6.3 十二個學者勸阻絕食>](#)

[三。廣場絕食（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

[3.1 絕食團指揮部的活動（李錄）](#)

[3.1.1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參：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

[3.1.2 絕食團指揮部人事變動<參：柴玲 3.2.3 絕食指揮部的改選>](#)

[3.1.3 絕食團指揮部的工作](#)

[3.1.4 閻明復到廣場](#)

[3.2 絕食在廣場（柴玲）](#)

[3.2.1 絕食指揮部首先自焚<參：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3.6.2 關於自焚>](#)

[3.2.2 阻止衝擊大會堂](#)

[3.2.3 絕食指揮部的改選<參：李錄 3.1.2 絕食團指揮部人事變動>](#)

[3.2.4 救護與轉移](#)

[3.3 廣場廣播站（1）：初創階段（封從德）<參：3.6.5 廣場廣播站（2）>](#)

[3.3.1 絕食團廣播站的建立（封從德）](#)

[3.3.2 廣播站初期的情況](#)

[3.3.3 兩站一車](#)

[3.4 北高聯在廣場（王超華）](#)

[3.4.1 轉移以後](#)

[3.4.2 紅十字會的黃背心](#)

[3.4.4 重組對話團](#)

[3.4.5 趙辦、中辦與十八日對話](#)

[3.5 復食（李錄）<參：3.6.8 復食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

[3.5.1 營地聯席會議<參：李錄 4.6.1 誰是廣場最高權力機關？>](#)

[3.5.2 如何結束絕食？](#)

[3.5.3 為何結束絕食？](#)

[3.5.4 復食的決議<參：3.6.8 復食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

[3.6 補充與質疑](#)

[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

[3.6.2 關於自焚<參：柴玲 3.2.1 絕食指揮部首先自焚><參：李錄 3.5.1 營地聯席會議>](#)

[3.6.3 李錄是學生嗎？](#)

[3.6.4 聲援絕食](#)

[3.6.5 廣場廣播站（2）：絕食期間（張伯笠，白夢，王超華）<參：封從德 3.3 廣場廣播站（1）><參：楊濤*，白夢 4.8.4（3）廣場廣播站（3）>](#)

[（1）廣播站與指揮車（張伯笠）](#)

[（2-1）絕食團廣播站（白夢）](#)

[（2-2）兩個廣播站并立](#)

[（3）介入"學運之聲"廣播站（王超華）](#)

[3.6.6 五月十八日](#)

[3.6.7 復食決定是怎么作出的？<參：李錄 3.5 復食>](#)

- [\(1\) 決定復食的背景（張伯笠）](#)
- [\(2\) 知識界得到的消息（老木）](#)
- [\(3\) 趙紫陽到廣場與決定復食（柴玲）](#)
- [\(4\) 在統戰部復食（劉燕）](#)
- [\(5\) 開希要做總指揮（沈彤）](#)
- [\(6\) 第二次表決：結果相反（封從德）](#)
- [\(7\) 學運之聲的反對（王超華）](#)
- [\(8\) 大家非常不滿（辛苦）](#)
- [\(9\) 嚴格的代表性（張伯笠）](#)
- [\(10\) 質疑（封從德）](#)

[四。戒嚴（五月二十日—六月三日）](#)

[4 . 1 從絕食團指揮部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張伯笠）](#)

[4.1.1 廣場臨時指揮部的產生<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4.1.2 從臨時指揮部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4 . 2 高聯整頓（王超華）](#)

[4.2.1 高聯正式討論撤退](#)

[4.2.2 吾爾開希喊撤<參：4.8.1 吾爾開希為什麼喊撤？><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4.2.3 北高聯退出廣場<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4 . 3 廣場指揮部（李錄）](#)

[4.3.1 廣場指揮部沿革<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4.3.2 廣場指揮部與北高聯、外高聯的關係](#)

[4.3.3 廣場後期工作](#)

[4 . 4 廣場總指揮（柴玲）](#)

[4.4.1 戒嚴之後](#)

[4.4.2 我參加運動的動機](#)

[4 . 5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張倫、老木）<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4.5.1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成立（張倫）](#)

[4.5.2 我為何成為廣場宣傳部長（老木）<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4.5.3 與廣場指揮部的矛盾](#)

[4.5.3 廣場是一個精神病院](#)

[4 . 6 廣場營地聯席會議李錄<參：李錄 3.5.1 營地聯席會議>](#)

[4.6.1 誰是廣場最高權力機關？](#)

[4.6.2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是一個協調組織](#)

[4 . 7 廣場財務（梁二，封從德）](#)

[4.7.1 北高聯財務部（梁二）](#)

[4.7.2 財務與後勤工作](#)

[4.7.3 五大財務問題](#)

[4.7.4 高聯的財務](#)

[4.7.5 高聯與廣場指揮部的財務交接](#)

[4.7.6 廣場後期的財務（封從德）](#)

[4.7.7 貪污嫌疑](#)

4.7.8 質詢與陳述

4 . 8 補充與質疑

4.8.1 吾爾開希為什麼喊撤？殘聯的周旋（劉燕，梁二，常勁）

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參：張伯笠 4.1.1 王超華 4.2.2><參：李錄 4.3.1 柴玲 4.4.1

>

(1) 臨時指揮部和高聯的協議

(2) 王丹是否到場？

(3) 白夢的印象

(4) 王超華為什麼退出臨時指揮部？

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參：張倫，老木 4.5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參：李錄 4.6.2 柴玲 4.4.1>

(1) 人民發言人（封從德）

(2) "我們"和"你們"

(3) 聯席會議任命了廣場指揮部嗎？

(4) 老木主要作了哪些工作？

(5) 與北高聯的關係

4.8.4 糾察與"政變"

(1) 糾察問題（張倫）

(2) 奪權與"政變"

(3) 廣場廣播站（3）：後期的變故（白夢，楊濤*）<參：廣場廣播站（1）

3.3、（2）3.6.5>

4.8.5 非廣場活動

(1) 北大後期工作（常勁）

(2) 師大、開希、劉曉波（梁二）

(3) 吾爾開希的職務

4.8.6 北京工自聯

五。六四前夕

5 . 1 民主大學（張伯笠）

5.1.1 籌辦<參：李錄 4.3.3 廣場後期工作>

5.1.2 開學典禮

5 . 2 撤與不撤（李錄）

5.2.1 撤與不撤的爭論

5.2.2 指揮部的情報與對策

5.2.3 屠殺就要到來

5.2.4 六三這一夜

5 . 3 屠城見證（李蘭菊）

5 . 4 撤離廣場（封從德）

5.4.1 口頭表決

【誰砸機槍？（辛苦）

【紀念碑上（梁二）

5.4.2 撤離之後

六。外地學運

[6 . 1 香港學聯的支持與協調 \(李蘭菊\)](#)

[6.1.1 補充與質疑：](#)

[6 . 2 武漢的學運 \(蔡崇國\)](#)

[6 . 3 湖南學運 \(劉衛\)](#)

[\(1\) 學運前的氣氛](#)

[\(2\) 湖南學運的成長和湖南特色](#)

[\(3\) 北京來的四個通知](#)

[6 . 4 西安、蘭州兩地的學運 \(辛苦\)](#)

[七。回顧與反思](#)

[7 . 1 總體補充：動機與局限<參：7.2 公開討論>](#)

[7 . 2 公開討論](#)

《回顧與反思》

《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會議記錄，巴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巴黎中國民主之家主辦、巴黎華人之聲協會協助、德國萊茵筆會、德國亞琛八九學社聯合出版：《回顧與反思》。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六月。【以上第-4頁】

出版前言

曾經參加和領導了八九學運、后流亡海外的十七位學生領袖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法國巴黎舉行了《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對這場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民主運動進行了回顧和反思。由於這場運動持續的時間長、涉及的范围廣、參加這場運動的人員廣泛，所以對於這場運動有很多傳說和猜測，為了澄清事實，給歷史留下一份真實的史料，以促進中國未來民主化進程，這批學生領袖聚集在巴黎，對八九學運的發起、發展和組織過程進行回顧。研討會對從八八年直到六四大屠殺的幾乎所有學運事件包括許多細節進行了核對、查証，有些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版本而沒有作出結論。歷史的見證——《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 研討會》記錄一書根據研討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不在內容上作更動，只是經過與會人員的校訂，刪去發言人認為可能涉及某些仍在大陸的人士安全的部分。本書記敘了從八八年直到六四大屠殺的學運過程，其內容包括：八八年的北大學社熱，北大籌委會的建立，北高聯的成立；絕食的發起，絕食團的成立，對話團的成立；戒嚴，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的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成立；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外地學運等，由於參加此次研討會的

人員大多是領導這次學運的核心人員，所以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又由於在此次研討會上談及的第一手資料許多都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所以本書內容對研究這次運動具有極大的意義。是一本研究八九學運不可缺少的史料。

萊茵筆會是以中國大陸留德學人为主体的在聯邦德國的學術團體。它通過出版雜誌，舉辦各種研討會，出版書籍等方式致力於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萊茵筆會出版的中國留德學人雜誌《萊茵通信》以客觀理性地反映留學生思想為宗旨，成為廣大海外學人的自由思想論壇和文化園地。其丰富多彩的留學生特色在全世界獲得贊譽。德國亞琛八九學社是德國亞琛地區的留學生團體。本書由這兩個組織共同出版。

《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巴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巴黎中國民主之家主辦、巴黎華人之聲協會協助、德國萊茵筆會、德國亞琛八九學社聯合出版：《回顧與反思》。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六月。【以上第-3頁】

與會同學

（按拼音順序）

白夢：北京大學作家班，詩人，絕食團廣播站總編、廣場指揮部廣播站站長。

蔡崇國：武漢大學博士生，武漢學運骨幹，參加北京學運。“六·四”後帶柴玲錄音帶到香港。

柴玲：北京大學畢業生，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秘書長，絕食團、廣場指揮部總指揮。

常勁：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副主席兼秘書長。

封從德：北京大學研究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第三任主席，絕食團、廣場指部副總指揮。

老木：北京大學畢業生，詩人，廣場宣傳部長，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員。

李蘭菊：香港樹仁學院學生，香港學聯支援北京學運代表團成員。

李錄：南京大學學生，南京學運骨幹，絕食團、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

梁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常委，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

劉衛：中南工業大學學生，湖南學自聯常委。

劉燕：中央民族學院學生，學運骨幹。

沈彤：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新聞中心負責人，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副團長。

王超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常委、副主席。

辛苦：蘭州大學學生，廣場指揮部情報部長。

楊濤*：杭州大學學生，廣場廣播站編輯。（*：不是北京大學的楊濤，後同）

張伯笠：北京大學作家班，報告文學作家，《新聞導報》總編，絕食團、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

張倫：北京大學碩士，廣場指揮部糾察總長，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員。【以上第-2頁】

編例

- (xx 插：…)：當場插話
<參：…>：指示同一事件可以參考的地方
【……】：插入與當前內容相關的內容，發言時間順序有所調整

關於會議的說明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有必要對大會形式作以下說明：

一。大會共八天

(1) 第一天：確定大會原則和回顧重點，提名引言人和引言提綱，並分配每個引言的時間。

(2) 主題會議六天半。考慮到當時國內友人的安全原因，不對外公開。

(3) 最後半天公開討論。與在法流亡人士、漢學家等一道對八九學運作回顧與反思。

本書即由(2)、(3)部分整理而成。【以上第-1頁】

二。發言形式

(1) 以引言為主，輔以補充與質疑，以便核對事實。對於不同的記憶，核對後不能達到共識處，一並錄作不同版本。

(2) 引言以重點事件為主，按時間順序貫穿而成。

三。大會確立的原則

(1) 主題會議不對外公開。

(2) 大會充分強調回顧歷史的客觀性原則，以回顧對證事實為最主要內容，發言者不對史實作評價，對史實有不同記憶而出現的不同版本一並錄出。

(3) 大會特別強調本次會議的局限性，包括：

I□這次會議討論範圍局限於八九學運，主要對北京學運的幾個主要組織的成立、建制、決策過程和重點事件進行多方位回憶和核實。

II□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僅占學運骨幹中的一小部分，無法全面的回顧、核對。

III□會議時間有限，大量細節無法詳述。

IV□出版時由於安全等原因，必須刪減小部分内容。

(4) 強調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提倡寬容與合作的態度。

(5) 整理成書時，發言人對發言內容只減不增；對各自發言部分的保密問

題，發言人責任自負。【以上第 0 頁】

一。學運初期（從胡耀邦逝世到四二七大游行）

1.1 從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籌委會（常勁）〈參：沈彤 1.2 封從德 1.3 柴玲 1.3.6 張伯笠 1.6.2-3〉

1.1.1 北大籌委會的成立

學運早期可以說從一九八八年底北大的學社熱開始。八八年底，我成立了北京大學教育研究學社，這個學社主要是探索教育方面的一些問題。另外有一個清華的學生，叫張霖，他到北大找了一些社團的負責人，說他們計劃在安徽辦一個私立大學，想在這個大學裏設立許多象西方哲學，西方民主的討論的課題，但是得不到教委的批准。我們在一起交換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意見。從這以後我就開始同我們學社的其他一些人研究學生運動的一些情況。因為我們覺得，學生運動是很多社會現象的一個集中反映。

當時整個一代人是所謂“失落的一代人”，失去追求和理想的這種情緒在社會上比較蔓延。到八九年的春季，北大校園裏出現了許多反常的現象。當時整個的學習氣氛一下子變得很稀薄了，以往經常是人滿為患的三教，出現了很多的空位，電影院也是經常場場爆滿，很多大學生都想著經商賺錢，或者是想著考托福。我感到整個的情緒就是大家都無心學習，無心向上了。〈參：1.6.1 學運之初〉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活動，主要是大家貼出一些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四月十六日早上，出現了一些抨擊鄧小平的話，比如：“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反而死了。”這樣的話就出現了，但是沒有特別激烈的文章。

到了四月十七日晚上十一點，在二十八樓、三十一樓的花園裏有十來個學生在彈吉它、唱歌，對面的女生樓也在那兒合唱，又唱又笑。但是這天晚上是一個不眠之夜，很多人都睡不著。大家睡不著，聽著就很煩，推舉一個人出去罵他們一頓。因為我的嗓子比較大，就選了我出去罵。所以我就伸出腦袋罵了一句“操你大爺。”沒想到，在我罵的時候，旁邊二十八樓又有人伸出腦袋來罵“操你大爺”，一會兒就伸了幾個腦袋出來一起罵。當我縮回腦袋，下面就有人叫：“有種的下來！”他剛說完，二十八樓全響了，宿舍燈全亮了，大家都伸出腦袋開始跟他們罵，有一批學生就要下去跟那幫人打。那幫人就走了。【以上第 1 頁】

大家在下面呆著，沒什麼事了。然後有人在無聊當中大喊一聲：“游行啦！”然後整個二十八樓就沸騰了，都叫“游行啦！”對面的女生宿舍也叫“游行了！”大家就開始往二十八樓下面那個廣場上匯集，三角地前面的地區也站了很多人。這時三角地前面的二十八樓突然有一個窗口吊下來一個橫幅，上面寫著“中國魂”，就有學生抬著這個橫幅開始匯集，向天安門廣場游行。這天晚上我沒去，因為我們這個宿舍在罵完了之後，竟然同對面的女生宿舍打著燈光調情去了。我當時覺得很喪氣，就回去睡覺去了。四月十七日晚到四月十八日，很多人陸陸續續去天安門廣場。到了四月十八日晚上，我到北大三角地，三角地已經是貼滿了悼胡和罵政府的各種各樣的大字報，也聚集了很多人。我發現有許多北大校團委的骨幹分子在裏頭對大家說，現在改革到了這種關頭，最好不要搞什麼運動，讓這個社會平穩地發展，這樣也是有利於改革派種種之類的說法。當時我看了以後很喪氣，就回去了。〈參：1.6.2 四一七游行〉

四月十九日晚上十點半鐘，我聽說民主沙龍在三角地有一個悼胡集會，我站在外面聽。當時的主持是武運學，他請大家上去講胡耀邦的功過。講的都是比較理性的，沒有太多地談到學運方面的東西，主要談一些關於胡耀邦、關於社會狀況。後來就上去了丁小平、封從德、熊焱，還有我。丁小平、封從德、熊焱他們都是八七年學運的參加者，我也是八八年柴慶豐事件的參加者。丁小平說他搞了十年民主了，所以我們就上去分析以往學運失敗的經驗。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應該成立一個學生組織來領導學運，當然這個學生組織應該是由學生選舉產生的，應該是公開的。然後丁小平就上去講，說“既然要成立這個組織，既然大家已經有了這個共識，為什麼沒有勇敢的人站出來，加入籌委會，成為籌委會的第一批成員？”他講了以後兩、三分鐘之內都沒有什麼人舉手，丁小平就說，“那就讓我們那些勇敢的講演者成為這個第一屆的團結學生會的籌委會委員吧。”底下就鼓掌，我們都在上面站著。我本來是不想參加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得已。丁小平就叫封從德記錄這些人的名字。這個時候，王丹和楊濤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回來了，王丹啞著嗓子在那裏介紹廣場上的情況，號召更多的人去廣場。談到籌委會這個事情，王丹和楊濤也加入了，並且在丁小平問下面的人報名參加的時候，又有三個人加入。這三個人【以上第2頁】是楊丹濤、孟召強和趙體國。

四月十九日晚上十點半鐘，我聽說民主沙龍在三角地有一個悼胡集會，我站在外面聽。當時的主持是武運學，他請大家上去講胡耀邦的功過。講的都是比較理性的，沒有太多地談到學運方面的東西，主要談一些關於胡耀邦、關於社會狀況。後來就上去了丁小平、封從德、熊焱，還有我。丁小平、封從德、熊焱他們都是八七年學運的參加者，我也是八八年柴慶豐事件的參加者。丁小平說他搞了十年民主了，所以我們就上去分析以往學運失敗的經驗。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應該成立一個學生組織來領導學運，當然這個學生組織應該是由學生

選舉產生的，應該是公開的。然後了小平就上去講，說“既然要成立這個組織，既然大家已經有了這個共識，為什麼沒有勇敢的人站出來，加入籌委會，成為籌委會的第一批成員？”他講了以後兩、三分鐘之內都沒有什麼人舉手，了小平就說，“那就讓我們那些勇敢的講演者成為這個第一屆的團結學生會的籌委會委員吧。”底下就鼓掌，我們都在上面站著。我本來是不想參加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得已。了小平就叫封從德記錄這些人的名字。這個時候，王丹和楊濤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回來了，王丹啞著嗓子在那裏介紹廣場上的情況，號召更多的人去廣場。談到籌委會這個事情，王丹和楊濤也加入了，並且在了小平問下面的人報名參加的時候，又有三個人加入。這三個人【以上第2頁】是楊丹濤、孟召強和趙體國。

【封從德：“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我記不清了？

常勁：是當時四月十九日晚上在大會上出了小平定的。就是因為我們要學習團結工會，當時大家看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封從德也談到過這個名稱。而且當時在討論時，大家已經對學運的未來發展提出了一個大的設想。

封從德：另外四月十九日晚上有沒有給學生會或者研究生會的幹部留出時間，說我們希望學生會先來組織，我們給你們留二十分鐘還是多少分鐘。

常勁：對，了小平說：“有種的學生會站出來領導。”然後沒有動靜。然後就說：“大家勇敢的站出來吧。”也沒有動靜。

柴玲：是這麼個過程。喊說學生會站出來，領導這場運動。我們喊三聲，就說“學生會站出來！學生會站出來！學生會站出來！”沒有聲音。“好，那麼我們要不要罷免學生會？”“好。”“同意不同意？”“同意！”“罷免學生會以後怎麼辦？要不要選一個自己的組織？”“同意！”

常勁：對，柴玲說得非常準確。】

這時三角地已經圍滿了人，有人說清華的學生來了，了小平就叫我和趙體國出去接清華的人。我們出去把清華的學生接回來以後，大家還在討論得很熱烈。了小平說這個地方太小，讓大家都拉到圖書館的東門前面去。當時情緒特別熱烈，主要的內容就是分了一下工，讓封從德和熊焱作為北大籌委會的代表當天晚上去參加清華大學的活動，然後在第二天在清華幫他們成立清華的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剩下來的人在塞萬提斯像下面開會。

我們到了塞萬提斯像下面發現只剩下四個人，我、孟召強、趙體國和了小平。後來沈彤他們奧林匹亞科學院的一些成員也跟過去了，他們有五個人。當時我們在圈裏面開會，他們在外邊說要加入那個籌委會。了小平就說五個人不能全部加入，後來沈彤就問，是不是他代表這五個人加入籌委會，了小平說，也不

行，因為委員人數不夠。還有一個細節，就是我們到了塞萬提斯像下，坐在草坪上。草坪上有一【以上第3頁】個人在那兒乘涼，這個人叫歐成威。丁小平說：同學你走，我們在這裏開個很重要的會。丁小平一直說：大家要小心啊，外邊跟滿了國家安全局的人員，所以你們一定要千萬小心。他就懷疑那個歐成威是國家安全局派來的。他趕歐成威走，但是歐成威很倔，就坐在那個草坪上硬是不走。後來沒辦法，丁小平就說，好吧，那你就坐在這兒聽我們講吧。大家就坐下來開會，首先把沈彤要加入的這個案子給否決了。丁小平自己任命是這個籌委會的主任委員，說：“我就是這個籌委會的主任委員了，你們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們說人還沒到齊嘛。他說：就这么定了。我們在那兒爭了半天，後來看這樣子也沒辦法，就暫時讓他做了。然後他給我們這幾個人分了工，丁小平、我和趙體國我們三個人去起草宣言，因為歐成威賴着不走，所以把他也加上了。孟召強就回家了。

我們到了塞萬提斯像下面發現紙剩下四個人，我、孟召強、趙體國和丁小平。後來沈彤他們奧林匹亞科學院的一些成員也跟過去了，他們有五個人。當時我們在圍裏面開會，他們在外邊說要加入那個籌委會。丁小平就說五個人不能全部加入，後來沈彤就問，是不是他代表這五個人加入籌委會，丁小平說，也不行，因為委員人數不夠。還有一個細節，就是我們到了塞萬提斯像下，坐在草坪上。

草坪上有一【以上第3頁】個人在那兒乘涼，這個人叫歐成威。丁小平說：同學你走，我們在這裏開個很重要的會。丁小平一直說：大家要小心啊，外邊跟滿了國家安全局的人員，所以你們一定要千萬小心。他就懷疑那個歐成威是國家安全局派來的。他趕歐成威走，但是歐成威很倔，就坐在那個草坪上硬是不走。後來沒辦法，丁小平就說，好吧，那你就坐在這兒聽我們講吧。大家就坐下來開會，首先把沈彤要加入的這個案子給否決了。丁小平自己任命是這個籌委會的主任委員，說：“我就是這個籌委會的主任委員了，你們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們說人還沒到齊嘛。他說：就这么定了。我們在那兒爭了半天，後來看這樣子也沒辦法，就暫時讓他做了。然後他給我們這幾個人分了工，丁小平、我和趙體國

我們三個人去起草宣言，因為歐成威賴著不走，所以把他也加上了。孟召強就回家了。

我們先回家騎上自行車，丁小平還挺熱心的，他帶著歐成威，我帶著趙體國，我們幾個騎自行車到了人民大學。他找了一間他朋友的地下室，在裏頭起草了一個北大籌委會成立宣言。當時丁小平和歐成威負責起草這個宣言，我負責起草所謂的新聞紀要。那天晚上我們幹了一晚上，把這個宣言起草出來了，把新聞紀要也起草出來了。早晨六點鐘我們騎車子回北大，在三角地把它張貼出來。落款呢，我們覺得團結籌委會太象波蘭團結工會了，我們還沒有定下名字，就在落款上把它寫成北大學生籌委會了。我們想自己發一個新聞紀要太沒有群眾性了，所以我們落款就落了一個北大學生新聞發布中心。貼出去以後我們先去吃了飯，回來以後，張志勇是第一個報名參加這個北大籌委會的人。當然沈彤是最早報名要參加的了。

過了一陣子，封從德和熊焱他們回來了。然後我們除了王丹、楊濤、楊丹濤他們這些人不在以外，其他人就坐在那兒開會，封從德、熊焱他們匯報了廣場的情況以後，決定由封從德和熊焱他們去找郭海峰，因為大家聽說郭海峰有一些組織的活動；讓我去找了李進進。我們就去分頭行動。回來以後，沈彤也加入了北大籌委會。

1.1.2 四二〇北大游行〈參：1.6.3 四二〇慘案〉

我們然後聽到了四月十九日晚上、二十日凌晨那個慘案的消息，張智勇是參加者，所以他很激動地回來要組織游行。在丁小平的促成【以上第4頁】下，

大家決定游行，由沈彤、趙體國、張智勇三個人負責，封從德和熊焱他們去發動清華的學生，就分頭開始工作，到了中午的時候，他們已經把這個不太可能的游行拉起來了。當時沈彤負責捐款，趙體國負責糾察隊，張智勇拿著喇叭在那裏做講演、鼓動。

我們然後聽到了四月十九日晚上、二十日凌晨那個慘案的消息，張智勇是參加者，所以他很激動地回來要組織游行。在丁小平的促成【以上第4頁】下，大家決定游行，由沈彤、趙體國、張智勇三個人負責，封從德和熊焱他們去發動清華的學生，就分頭開始工作，到了中午的時候，他們已經把這個不太可能的游行拉起來了。當時沈彤負責捐款，趙體國負責糾察隊，張智勇拿著喇叭在那裏做講演、鼓動。

正在這個當頭，突然丁小平說決定不游行了。當時我們就吵起來了，因為

趙體國已花了很大的力氣，買了好多紅布做成橫幅。（封從德插：什麼時候？）四月二十日中午。大家又去吵了一通，然後決定還是游行。就趕緊派人去通知熊焱和封從德，說是把清華的同學也拉上，因為清華的同學也要去游行。這個人去了以後，他們倆不信，沒有動靜。又派了我去，通知他們兩個人。等我回來的時候，趙體國他們這邊的糾察隊已經拉起來了，沈彤和張智勇他們已經拿著橫幅，開始準備出發了。封從德、熊焱回來，我們又回到北大籌委會，繼續開我們的會，討論將來這個組織怎麼發展等事情。

這時突然下大雨了。孟召強非常憤怒地回來，他也是北大籌委，他告訴我們，本來決定是讓清華同學到北大，跟北大學生一起去游行，但是張智勇當時強力地把隊伍拉到了清華衝清華的校門。正在衝的時候下大雨了，天不做美，北大當時大概三千人左右，被衝走了一大半。聽到這個情況，大家就開會決定是不是要取消這個游行。後來決定派我去看他們游行的狀況。

我騎自行車一直騎到北航那地方，找到了他們的隊伍。我看了以後，非常非常感動，我看到沈彤和張智勇在前面帶隊，趙體國在中間負責糾察。他們這支隊伍有一千多人，非常整齊，冒著大雨浩浩蕩蕩地在街上走，一路上喊口號，那麼大的雨。別的學校頂多是在宿舍樓裏伸出腦袋來看。我非常激動，就說，“我也加入你們，我們籌委會支持你們繼續往前走。”因為當時封從德給我一個條，說是如果情形不好就宣佈解散，如果情形好就繼續往前走。我就跟著他們一起走到政法大學。政法大學派了很多人來接我們，把我們接到他們學校的食堂裏，又給我們吃飯，非常溫暖。政法大學有同學勸我們不要再去了，張智勇也說，“不要再去了”。趙體國把我 和沈彤拉到一起說，“不能這麼著，我們既然走到政法大學，就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三個就分別上去鼓動大家要繼續堅持下去。政法大學勸了以後，我們沒有聽，就拉好隊伍繼續往路上走。我們派了人去找北師大的學生，這個找的也回來了，說北師大的學生也要去。我們再走就看見北師大的【以上第 5 頁】學生舉著“教師萬歲”的旗子，又有一批大約幾百人的隊伍，就一起往天安門廣場走了。

我騎自行車一直騎到北航那地方，找到了他們的隊伍。我看了以後，非常非常感動，我看到沈彤和張智勇在前面帶隊，趙體國在中間負責糾察。他們這支隊伍有一千多人，非常整齊，冒著大雨浩浩蕩蕩地在街上走，一路上喊口號，那麼大的雨。別的學校頂多是在宿舍樓裏伸出腦袋來看。我非常激動，就說，“我也加入你們，我們籌委會支持你們繼續往前走。”因為當時封從德給我一個條，說是如果情形不好就宣佈解散，如果情形好就繼續往前走。我就跟著他們一起走到政法大學。政法大學派了很多人來接我們，把我們接到他們學校的食堂裏，又給我們吃飯，非常溫暖。政法大學有同學勸我們不要再去了，張智勇也說，“

不要去了”。趙體國把我和沈彤拉到一起說，“不能這麼著，我們既然走到政法大學，就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三個就分別上去鼓動大家要繼續堅持下去。政法大學勸了以後，我們沒有聽，就拉好隊伍繼續往路上走。我們派了人去找北師大的學生，這個找的也回來了，說北師大的的學生也要去。我們再走就看見北師大的【以上第5頁】學生舉著“教師萬歲”的旗子，又有一批大約幾百人的隊伍，就一起往天安門廣場走了。

走到天安門廣場，已經是晚上大概九點多鐘，天已經黑了，而且下著雨，天氣非常的冷，所有的學生都在那兒打抖。我們走到廣場上，廣場上已是擠滿了人。我們找糾察隊，把北大的隊伍拉到這兒，廣場上整個就沸騰了，說：“北大的學生來啦！”但是我們拉了隊以後，發現我們的人已經少了一大半了，他們說是張智勇把人帶回去了。然後沈彤、我和趙體國三個人在那個地方拉出一個圈子來，開始做講演。陳明遠、吾爾開希和周勇軍，還有一些工人代表都上去講演。

晚上我們大部隊回去，沈彤他們去找車，人就回不來了。趙體國又去找車，也回不來了。之後楊濤他們跟我們又匯在了一起，我們就帶著這些人坐巴士先到了公主墳，從公主墳又坐車回學校。回學校以後，北大籌委會安排了一些人在那接我們。據說當時籌委會開了會，我宿捨的同學說，當時開會的時候，丁小平一直沒有注意到去接同學的事情，最後是封從德和這個同學到食堂去安排給我們開飯。

這基本上就是二十日的事情。二十一日大家開會決定二十二日游行的事情。

【張伯笠：我再談一下冒雨游行。

四二〇警察施暴以後，我們要冒雨游行。我跟趙體國二人參加了糾察隊。那天在圖書館集合以後就出發到清華大學，清華大門關得死死的。然後天就下雨了，我們就喊清華大學的同學出來，跟我們一起去游行。可是清華大學弄了一個吉普車，前面放了四個大喇叭，衝著我們喊：北大的同學，你們回自己學校去鬧，不要影響我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上課。我估計是他們校方的。這樣一來，我們沒有辦法，就走了。走到政法大學，政法就給我們面包，給我們吃菜。在禮堂裏開的會，當時張志勇上去說：天太冷，又下雨，我們回去吧。後來常勁上去說：大家看怎麼辦？底下反對，必須要到天安門廣場。那么好，我們就到天安門廣場。

這一天，我在糾察隊負責大家安全。我第一次看見陳明遠，陳明遠一邊走一邊喊：打倒官倒，打倒腐敗【同】。我覺得這個知識分子挺有意思，就跟他聊一會兒天，問他叫什麼，他說他叫陳明遠，他還給我留下地址。然後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圍了一條圓圈就開始演講。張志【以上第6頁】勇拿著麥克風，他聲音太小，總也講不清楚，底下很亂。這時候我就說：張志勇，把麥克風給我，我

來講。這是我第一次站出來，第一次亮相。我說：“我們今天來的目的是針對昨天的警察施暴。我們下一步應該成立一個全國高校的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領導機構。”我記得有一個同學給我打傘，我把這個人推走了，因為大家都沒有傘。我推走以後，聽到底下掌聲響起來了。我們講完之後，開始撤退。撤退的時候，大家就罵籌委會，籌委會都上哪兒去了，也不給我們找車，已經都十二點半了。（封從德插：我們正在找，好象已經派出來了。）我知道籌委會已經去联系了。後來我們就找了一個警察，警察給我們攔了一輛車。到了公主墳以後，調度又把總經理叫來了。當時學生冷得不行，凍得不行，學生都到了公主墳了，那麼怎麼辦呢？我就去跟總經理說。總經理說，你必須把學生證留下，你叫什麼名字。當時我是不太敢，後來實在沒辦法，把學生證留下了。留下以後，總經理說：我們可以送，但是我們要一百元錢。當時我口袋裏沒有錢。他說，這個錢就是為了將來我們好說話。我說：這個我理解，保證給你一百元錢，以後給。他就用車把我們，送到中關村那個口，沒有送到北大。他說：你們可以下車了。然後他把學生證給我說：看你很誠實，這個學生證就給你吧。我跟封從德說了三次要還他一百元錢，但是最後還是沒有還。就是公主墳車站的一百元錢，我跟你說了三次。（封從德插：我不記得。）回來以後，不知道是封從德還是誰來接我們，說給你們留好飯了，你們趕快吃飯。結果到了那兒，大門沒開，沒有飯，我們氣得不行。我說：不吃了，回去吧。】

這一天，我在糾察隊負責大家安全。我第一次看見陳明遠，**陳明遠一邊走一邊喊：打倒官倒，打倒腐敗【同】**。我覺得這個知識分子挺有意思，就跟他聊一會兒天，問他叫什麼，他說他叫陳明遠，他還給我留下地址。然後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圍了一條圓圈就開始演講。張志【以上第6頁】勇拿著麥克風，他聲音太

小，總也講不清楚，底下很亂。這時候我就說：張志勇，把麥克風給我，我來講。這是我第一次站出來，第一次亮相。我說：“我們今天來的目的是針對昨天的警察施暴。我們下一步應該成立一個全國高校的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領導機構。”我記得有一個同學給我打傘，我把這個人推走了，因為大家都沒有傘。我推走以後，聽到底下掌聲響起來了。我們講完之後，開始撤退。撤退的時候，大家就罵籌委會，籌委會都上哪兒去了，也不給我們找車，已經都十二點半了。（封從德插：我們正在找，好象已經派出來了。）我知道籌委會已經去聯系了。後來我們就找了一個警察，警察給我們攔了一輛車。到了公主墳以後，調度又把總經理叫來了。當時學生冷得不行，凍得不行，學生都到了公主墳了，那麼怎麼辦呢？我就去跟總經理說。總經理說，你必須把學生證留下，你叫什麼名字。當時我是不太敢，後來實在沒辦法，把學生證留下了。留下以後，總經理說：我們可以送，但是我們要一百元錢。當時我口袋裏沒有錢。他說，這個錢就是為了將來我們好說話。我說：這個我理解，保證給你一百元錢，以後給。他就用車把我們，送到中關村那個口，沒有送到北大。他說：你們可以下車了。然後他把學生證給我說：看你很誠實，這個學生證就給你吧。我跟封從德說了三次要還他一百元錢，但是最後還是沒有還。就是公主墳車站的一百元錢，我跟你說了三次。（封從德插：我不記得。）回來以後，不知道是封從德還是誰來接我們，說給你們留好飯了，你們趕快吃飯。結果到了那兒，大門沒開，沒有飯，我們氣得不行。我說：不吃了，回去吧。】

1.1.3 北大籌委會人事變動<參：封從德 1.3.4 柴玲 1.3.6>

北大籌委會初期，人事上有很大的變動。最開始是換掉丁小平。作為主任委員。他有一個特點，就是當他要做決定時，他的決定是最重要的，要是大家不通過的話，他就以主持人的名義，要求重新做決定，他要一個人一個人地跟大家去講理，講完了以後再做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到二十一日晚上的時候，他整個人已經很瘋狂了。熊焱和封從德就勸丁小平說，你回家休息去吧。他就回去了。我請李進進，李進進不願意參加。他們最後請到了郭海峰，當時就換了郭海峰。【以上第7頁】

【李錄：為什麼要去找海峰？】

常勁：主要是有人提到四月十八日晚上，是王丹、郭海鋒、李進進他們幾個人組織的那次請願活動，周勇軍當時也在場，張志勇是參加者。當時這個消息我想是張志勇提供的，而且我還調查到周勇軍當時的那些情況。但是我們不說了。】

四月二十一日，在封從德、郭海峰他們的促成下，開了一個會，決定把北大籌委會所有幹部、委員開始分定職責。但是會議上午剛剛分定職責後，到了二十一日中午，突然王丹和楊濤說他們民主沙龍全體退出北大籌委會【反】，然後王丹他們就基本上不參加活動了。具體原因我不太知道，可能沈彤知道得更多【同】。沈彤也很生氣，他感冒了，回宿舍躺在床上。我和趙體國去看他，他說情況這麼糟糕，他也退出算了。所以他也退出了。北大籌委會就這樣又算是被改組了。

但是到了二十一日，來了很多人，蔡健、王友才他們加入北大籌委會，

柴玲在二十日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也到北大籌委會去幫忙。到二十三日的時候，沈彤、周新 他們又重新加入，幫北大建廣播站和新聞導報。這樣北大籌委會開始有了一批人。北大籌委會的總部是設在 2 8 樓，地球物理系我們宿舍 4 3 3 號房間裏面。因為當時找不到宿舍，而我們的宿舍比較空，趙體國和我是隔壁宿舍，所以就設在我們宿舍了。當時有一個彭嶸，他參加進來。要求開一個誓師大會，然後就決定在二十四日搞。這個會搞得很不成功。因為張智勇在四二〇游行回來以後就被從籌委會中開除掉了，我們也不讓丁小平參加籌委會了。但是開誓師大會時，大家說為了表示籌委會的團結，就讓他們兩個露露面。但是在露面的時候，臺下有幾個人很賣力地把他們兩個推到臺上去講話。最後熊焱奪了喇叭，於是大家不歡而散。〈參：封從德 1.3.4 北大籌委會的改組〉

這樣郭海峰覺得他要負很大責任，我們籌委會其他幹部就決定集體辭職。這是二十四日下午。在二十四日中午集體辭職之前，我已經貼出大字報來宣佈辭職了。我覺得我跟他們合作不下去，因為開誓師大會這個事他們根本就沒有同我和趙體國商量，就決定了開會。而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太匆忙，就象二十日一樣的。於是我就宣佈退出了。

二十四日【異】下午六點多鐘的時候，北大籌委會在北大文史樓進行了一次改組。當時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了很多各個系的代表，下午三點半【以上第 8 頁】，封從德告訴我說，“不知道從哪裏冒了很多代表，你一定要參加這個會，因為很重要。”我們去了以後，這些人全部去了。張玉國、孔慶東還有王遲英他們在上面競選，沈彤他們也去競選。最後選出了五個人，是封從德、王丹、沈彤、王遲英、孔慶東，最後確定孔慶東是召集人。在這以後北大籌委會基本上就是這個常委班子，中間在底下設了很多的部。後來我又加入了，接替封從德在理論信息部的工作。

二十四日【異】下午六點多鐘的時候，北大籌委會在北大文史樓進行了一次改組。當時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了很多各個系的代表，下午三點半【以上第 8 頁】，封從德告訴我說，“不知道從哪裏冒了很多代表，你一定要參加這個會，因為很重要。”我們去了以後，這些人全部去了。張玉國、孔慶東還有王遲英他們在上面競選，沈彤他們也去競選。最後選出了五個人，是封從德、王丹、沈彤、王遲英、孔慶東，最後確定孔慶東是召集人。在這以後北大籌委會基本上就是這個常委班子，中間在底下設了很多的部。後來我又加入了，接替封從德在理論信息部的工作。

四月二十九日，因為北大籌委會各部部長們對籌委會常委的活動非常反感，就成立了一個部長會議，實際上是監察會，主席是趙體國。

五月三日【異】部長會議召開一個會議，是由封從德、趙體國、柴玲他們一起促動的，我記得當時沈彤和其他的常委全不在場。封從德說上次北大籌委會的選舉有法律上的代表性問題，所以要重新選舉。〈參：2.7.1 北大五一改組

>

重新選舉以後，有那么幾個人選上去，楊濤、熊焱、封從德、我、王丹和沈彤。當時王丹和沈彤的票數是一樣高的，但是王丹在場，所以大家就決定讓王丹繼續擔任委員。當時李強也參加了，和張伯笠兩個在那兒當了一陣子協調人，張伯笠就不見了。五月三日當協調人，最後說了幾句話：“王丹在以前的組織裏勞苦功高，而且名聲也大，就讓王丹當吧”。

這之後，北大籌委會一直比較亂。到了五月五日，大家又開了一個會。那次封從德、熊焱他們兩個要求辭職。因為對話代表團已經建立起來了，他們說沒有什麼事要幹了，封從德說他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了。然後大家批評王丹不幹實事，王丹說“我不是搞組織的人，我是一個煽動性的人。你們有事找我煽動行，搞組織不行。”最後他也宣佈辭職。

大家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常委制確實比較混亂，所以就設定主席負責制。當時選了楊濤為主席，我和蔡劍為副主席，這是五月五日。楊濤是最高票，李強繼續作協調人。其他人的職務都有些變動：柴玲本來是秘書長，封從德辭職後，她跟封從德回北師大了。那天我們改選的時候，柴玲不在場，大家又以為柴玲回北師大不參加北大的活動了，她的秘書長就丟了。大家選我代替她做秘書長。從此以後，北大籌委會高層就再沒有發生重大人事變動了。【以上第9

頁】

1 . 2 北大校園活動（沈彤）

1.2.1 學運前的校園活動〈參：1.6.1 學運之初〉

最早在八六、八七年學潮之後，北大曾經出現過一個周三論壇，請過美國駐京的洛德大使、方勵之夫婦去講話，周三論壇其實規模很小，七、八十人，最多到二百人。

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柴慶豐事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出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封從德參加過第一次會議，第一天游行，第二天行動委員會成立。楊通學、熊焱和我是當時核心的十個成員中的三個跟八九年學運有關的。實際上，行動委員會不是周三論壇成立的，而是行動委員會以周三論壇的群眾基礎來組織八八年的運動。封從德沒有參加行動委員會。

行動委員會解體之後，周三論壇的領導層受到比較大的衝擊。但是周三論壇的外圍組織並沒有解散，這時就由王丹、楊濤和武運學，還有另外兩個同學，把周三論壇的全體人馬接下來，以“民主沙龍”的名義又重建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不再在塞萬提斯草地上討論，但是還是在星期三下午，在四十三樓的宿舍樓裏繼續討論，請了象戴晴、嚴家其、王元化、王若水、吳組湘這些人都講過話。同時他們以正式的名義注冊為北大學海社下面的一個部，叫北大學社會問題研究部。王丹是部長，其他四個同學是副部長。

【封從德：剛才提到行動委員會，我祇是參加過它的第一次會議，因為大家都說要進行秘密會議，我不贊同這個秘密的原則，所以我退出了。後來行動委員會還有幾次會議，和他們後來的發展情況，你大概介紹一下行嗎？

沈彤：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基本上後來的會議形式上是秘密的，不是說要保密，而是說內部的十一個核心成員，在塞萬提斯像，在哲學系的38樓，就是楊通學他們那個樓，有過會，印過傳單，發過民意調查表。而且我也是第二天加入進去，作為比較核心的三個成員，我就建議全部公開。公開的形式一個是到各宿舍去發民意調查表和宣傳我們當時印出的六條綱領，包括保證基本人權、新聞自由等等，第二個辦法就是聯系新聞界。當時開始跟各個北京的主要報紙比如象《【以上第10頁】北京青年報》、《北京日報》開始聯系。到六月七日夜裏解體。

沈彤：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基本上後來的會議形式上是秘密的，不是說要保密，而是說內部的十一個核心成員，在塞萬提斯像，在哲學系的38樓，就是楊通學他們那個樓，有過會，印過傳單，發過民意調查表。而且我也是第二天加入進去，作為比較核心的三個成員，我就建議全部公開。公開的形式一個是到各宿舍去發民意調查表和宣傳我們當時印出的六條綱領，包括保證基本人權、新聞自由等等，第二個辦法就是聯系新聞界。當時開始跟各個北京的主要報紙比如象《【以上第10頁】北京青年報》、《北京日報》開始聯系。到六月七日夜裏解體。

老木：民主沙龍到底有多少成員，比較活躍的骨幹？比如說劉剛，那個時候還是不是民主沙龍的成員？

沈彤：我剛才提到民主沙龍的主要核心成員就是五個人。因為他們是一年級學生，道理很簡單。但是從“周三論壇”到“行動委員會”，所有沒有被衝擊到的那些學生都在，自然包括少江、楊通學、劉剛，還有好多名字，我覺得我確實不該提。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受到過什麼衝擊。】

為了繼承周三論壇的傳統，其他行動委員會的核心成員都有過類似的行動。熊焱曾經試圖過成立組織，因為他當時在北大受到處分，沒有能夠成功。另外相關的十一個人裏面也成立過象未名劇社的一些文化團體。我個人成立的奧林匹亞科學院，也是選在周三下午活動，後來為了避免和民主沙龍的活動衝突改到周三晚上。奧林匹亞科學院是第二個學期，就是八九年初寒假後那個學期才開始成立起來的。

當時我們幾個社團一起搞了一些活動，比如說“中國文化走入低谷”討論，“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民主沙龍因為周三論壇的傳統，有很多校外的聯系，尤其王丹本人、在行動委員會這些老的學生、三四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跟北京的前

衛知識界有很多聯系。象我剛才提到的一些名字，象嚴家其、蘇紹智、王若水、王元化等 等，一共是三十八位，加上北大的一些比較前衛的青年教師，象我剛才提到的趙玉國、陳波、範清宇等等。

其實當時這些文化討論會象“文化低谷”和“新權威主義”討論會，還有一系列討論會，實際上沒有什麼人參加的，但是我們用這個名義最後變成了各家組織的一個見面會，對當時校園的情況、全國的情況都有一定的討論。

當時我們和王丹、楊濤之間對八九年有幾個共識：第一，八九年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第二，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再有救亡運動。基於對十幾年民運的分析，覺得一個有穩定的理論基礎、有組織的、局限於學生和學者範圍內的運動是必要的，再擴大範圍是沒有意義的，就會變成救亡運動。救亡運動定義是，全國或者相當大的一個範圍支持一個模糊的理念，比如象五四運動。這類共識實際上對後來早期的北大籌委會的理念都有很大影響，比如我後面要講的八九年全國民

運的三步計劃。【以上第 11 頁】同時，大環境也比較有意思，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北京是前衛知識界比較活躍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三十六天》裏提到的都樂書屋事件、新年聯歡會的事情。還有兩個特別跟北大學生團體有關的活動：一個是蘇紹智在年初《十年改革理論探討會》的講話，後來受到批判。這個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個是方勵之給 New York Book Review 寫了一篇文章，叫《希望與失望》。他的文章英文稿寫好之後，李淑嫻在星期三下午出席民主沙龍的會議，星期三晚上出席我們的會議時，把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帶給我們兩個社團。我們兩個社團很快首先在北大，後來在各校散發，這還是八九年二月。大家都知道，在知識界和學生中間這篇文章的影響都是很大的，這也是比較大的事。相關的事比如批蘇紹智的文章，清華的那個教授攻擊方勵之的文章等等。這是一個方面，即知識界獨立的活動。再一個是一些具體的個人的活動，比如說，方勵之本人是不能進北大的，大家都知道，李淑嫻實際上是作為他的代言人。但李淑嫻本人是北大學生選區選出的海澱區人民代表，那麼她也有一定的權威，她在民主沙龍和我們社團的活動對小範圍的學生積極分子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這裏要強調一點，實際上很重要的一點：我所有談到的這些大家很積極、很有組織的活動，實際上都是在很小的範圍內。王丹的民主沙龍，

真正搞活動的，搞《新五四》的，就是他們五個人加上行動委員會後來留下來的幾個人，比如象楊通學、薛許等，筆杆子比較好，哲學系的兩個人。象我們所謂奧林匹亞科學院，核心就是八個人。其它一些組織、更弱的一些小社團一共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就是所有的積極分子，最積極的和次外圍組織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大批學生的情緒就是大家都提到的所謂五派：托派、麻派、玄派、商派和戀愛派，基本上沒有一個是關心政治和學習的。但是我們當時的分析認為，這種氣氛實際上是好的，實際上是對民運有利的，就是說，完全非政□

當時我們和王丹、楊濤之間對八九年有幾個共識：第一，八九年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第二，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再有救亡運動。基於對十幾年民運的分析，覺得一個有穩定的理論基礎、有組織的、局限於學生和學者範圍內的運動是必要的，再擴大範圍是沒有意義的，就會變成救亡運動。救亡運動定義是，全國或者相當大的一個範圍支持一個模糊的理念，比如象五四運動。這類共識實際上對後來早期的北大籌委會的理念都有很大影響，比如我後面要講的八九年全國民運的三步計劃。【以上第 11 頁】同時，大環境也比較有意思，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北京是前衛知識界比較活躍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裏提到的都樂書屋事件、新年聯歡會的事情。還有兩個特別跟北大學生團體有關的活動：一個是蘇紹智在年初《十年改革理論探討會》的講話，後來受到批判。這個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個是方勵之給 New York Book Review 寫了一篇文章，叫《希望與失望》。他的文章英文稿寫好之後，李淑嫻在星期三下午出席民主沙龍的會議，星期三晚上出席我們的會議時，把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帶給我們兩個社團。我們兩個社團很快首先在北大，後來在各校散發，這還是八九年二月。大家都知道，在知識界和學生中間這篇文章的影響都是很大的，這也是比較大的事。相關的事比如批蘇紹智的文章，清華的那個教授攻擊方勵之的文章等等。這是一個方面，即知識界獨立的活動。再一個是一些具體的個人的活動，比如說，方勵之本人是不能進北大的，大家都知道，李淑嫻實際上是作為他的代言人。但李淑嫻本人是北大學生選區選出的海澱區人民代表，那麼她也有一定的權威，她在民主沙龍和我們社團的活動對小範圍的學生積極分子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這裏要強調一點，實際上很重要的一點：我所有談到的這些大家很積極、很有組織的活動，實際上都是在很小的範圍內。王丹的民

主沙龍，真正搞活動的，搞《新五四》的，就是他們五個人加上行動委員會後來留下來的幾個人，比如象楊通學、薛許等，筆杆子比較好，哲學系的兩個人。象我們所謂奧林匹亞科學院，核心就是八個人。其它一些組織、更弱的一些小社團一共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就是所有的積極分子，最積極的和次外圍組織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大批學生的情緒就是大家都提到的所謂五派：托派、麻派、玄派、商派和戀愛派，基本上沒有一個是關心政治和學習的。但是我們當時的分析認為，這種氣氛實際上是好的，實際上是對民運有利的，就是說，完全非政□

接著我剛才的話題講，就是校園之外的大氣候。剛才我提到知識界，另外還有各地的串聯問題。常勁提到過張霖，他實際上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各地的不論是從民主牆時期，八六、八七年時期出來的這些學生跑到各地去，有很多人根本沒有放棄。因為這十年對民運分子，除了象魏京生、劉青這些人，處罰并不是太厲害的，這些人實際上還有活動空間，尤其是離開北京之後。有代表性的象安徽的民主沙【以上第 12 頁】龍。

接著我剛才的話題講，就是校園之外的大氣候。剛才我提到知識界，另外還有各地的串聯問題。常勁提到過張霖，他實際上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各地的不論是從民主牆時期，八六、八七年時期出來的這些學生跑到各地去，有很多人根本沒有放棄。因為這十年對民運分子，除了象魏京生、劉青這些人，處罰并不是太厲害的，這些人實際上還有活動空間，尤其是離開北京之後。有代表性的象安徽的民主沙【以上第 12 頁】龍。

他們來到北大，發現北大的一些學生，至少象民主沙龍和我們，對八九年的分析跟他們很接近，有許多共識，大家有一種“臭味相投”之感。覺得八九年不鬧是不行的，不鬧白不鬧。而且當時到了設計新政府的程度，就是我們要通過八九民運推出胡耀邦呢？還是推出趙紫陽？大家爭論的結果，還是覺得胡耀邦為好。我講這個意義就是從情緒上，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胡耀邦一死，在我們這個層次上出現的這種反應。

當時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活動，比如張霖帶著四個助手到北大的那天，是民主沙龍和奧林匹亞科學院本來決定合并的一天。王丹和他的助手，我和奧林匹亞科學院的另外三個人，和張霖他們有一種談判的性質。當時確定的一些共識，除了我剛才提到的，還有對八九年整個的一些認識，其中包括，大家都提到過的八九年有很多紀念日，這是對中國人的情緒很有影響力的。對具體組織，我們決定是不合并的，這對我們兩家後來的合作和衝突都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前幾年的運動都證明，運動一開始，各個社團很快地合并起來，運動很快地結束，不超過兩三個星期，一般的規律是，所有的社團骨幹全部被打下去。就象八八年柴

慶豐事件之後，十一個骨幹在一個學期之內什麼事情都幹不了，因為不斷要寫檢查，你根本不可能做事情。所以決定不合并。但是各家分散，就是這種離心的去做事情，要建立一種默契。比如說，民主沙龍是以前臺為主，奧林匹亞科學院是以後臺為主；民主沙龍是以前在校外聯系為主，奧林匹亞科學院是以校際之間和北大校內各社團之間的聯系為主。比如說，要發起一次運動的時候，由民主沙龍先出大字報，然後由奧林匹亞科學院組織其它社團跟著出大字報。這樣四、五張大字報肯定能在北大發起運動。北大一起運動，北京就有運動，全國也就有運動。當時也是比較自信了。這些活動都是二、三月份，在人大和政協兩會之前的活動。

當時整個的情緒是比較樂觀，包括跟各地來串聯的討論時也是如此。我們對軍隊對八九年可能出現的學運的威脅也有一整天的討論。但是當時的結論很可惜也是樂觀的。各地來的人對北大的這些學運積極分子幫助很大，因為他們對社會的情況、對軍內的情況都很了解，對軍內有詳細的分析。但是我們的結論是，所謂太子黨利益階層是對民運長遠發展的威脅，軍隊國有化必然是中國民主運動要解決的一個【以上第 13 頁】問題。軍隊是一個威攝力量，但是八九年不會構成直接的威脅，這是各個組織之間的一個共識。所以就覺得八九年可以放開幹，而且主要以體制內為主，推胡耀邦上臺。

當時整個的情緒是比較樂觀，包括跟各地來串聯的討論時也是如此。我們對軍隊對八九年可能出現的學運的威脅也有一整天的討論。但是當時的結論很可惜也是樂觀的。各地來的人對北大的這些學運積極分子幫助很大，因為他們對社會的情況、對軍內的情況都很了解，對軍內有詳細的分析。但是我們的結論是，所謂太子黨利益階層是對民運長遠發展的威脅，軍隊國有化必然是中國民主運動要解決的一個【以上第 13 頁】問題。軍隊是一個威攝力量，但是八九年不會構成直接的威脅，這是各個組織之間的一個共識。所以就覺得八九年可以放開幹，而且主要以體制內為主，推胡耀邦上臺。

還有兩個很具體的事，一個是我們社團覺得“兩會”期間是發起運動的最好時間。“兩會”期間曾經有過行動，我們曾經寫過一個論文，由我執筆，我們八個人共同做的一個研究，叫“關於基礎科學研究的現狀與發展的建議”。這裏面提到中國基礎科學現狀研究的七大問題和九個建議。這個論文後來在“兩會”期間變成一個提案，由北大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我們找到的江蘇省等幾個代表聯名以緊急提案的形式提到了人大，人大責成科協和科委接受這個論文進行研究，一年之內答復。我們的目標一個是通過人大作一些事情，另外一個是以這個行動促成北大校園形成一種通過兩會關心政治的一種氣氛。當時北大校刊、《光明日報》都登了這篇論文，而且對我們社團進行了報導。因為頭一年的“兩會”象丁石孫

等代表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當時對全國的影響非常大，所以我們預期八九年的“兩會”也會造成這種影響。

第二個是王丹把他的民主沙龍從屋裏又搬回塞萬提斯草坪，一下子聲勢就擴大了，由原來的三、四十人擴大到將近二百人，影響很大。而且王丹貼出了大字報要求民主沙龍合法，要求在校園集會合法。這是在“兩會”期間即三月十六日到四月四日。

但是這些活動實際上收效甚微，校園反映很小，雖然我們覺得我們作的很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外地來京的代表就很著急了，他們就決定在四月五日發起絕食，由我們兩個社團做後援，但是基本上沒有成。實際上，這對我們絕食的想法有很大影響。張霖這時候已被公安局到處追捕，曾經藏到清華，也藏到過我的宿舍裏邊。張霖跟李淑嫻也討論過關於非暴力等等問題。在我們社團活動時，王丹都有參與。但是我跟王丹都覺得為了保全我們兩個社團，不能跟安徽那個沙龍繼續有更多的關係。實際上這事我和王丹都是有責任的，我們是很怯懦的。張霖當夜就趕火車走了，當時說好的是他每個星期給我們來一封信報平安。他說如果沒有來信的話，可能就是出危險了。從他走了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接到他的信（常勁插：張霖的消息我知道。回去以後他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八九學運的時候他也在安徽那邊搞，在七月份被抓了。現在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因為他是外界比較少報導【以上第 14 頁】的。）張霖就象王軍濤、陳子明這樣的人物，但是是在外地，所以始終沒有受到重視。

但是這些活動實際上收效甚微，校園反映很小，雖然我們覺得我們作的很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外地來京的代表就很著急了，他們就決定在四月五日發起絕食，由我們兩個社團做後援，但是基本上沒有成。實際上，這對我們絕食的想法有很大影響。張霖這時候已被公安局到處追捕，曾經藏到清華，也藏到過我的宿舍裏邊。張霖跟李淑嫻也討論過關於非暴力等等問題。在我們社團活動時，王丹都有參與。但是我跟王丹都覺得為了保全我們兩個社團，不能跟安徽那個沙龍繼續有更多的關係。實際上這事我和王丹都是有責任的，我們是很怯懦的。張霖當夜就趕火車走了，當時說好的是他每個星期給我們來一封信報平安。他說如果沒有來信的話，可能就是出危險了。從他走了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接到他的信（常勁插：張霖的消息我知道。回去以後他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八九學運的時候他也在安徽那邊搞，在七月份被抓了。現在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因為他是外界比較少報導【以上第 14 頁】的。）張霖就象王軍濤、陳子明這樣的人

物，但是是在外地，所以始終沒有受到重視。

想強調一點，這些校園的活動，北大不是獨有的，各地都有。但是因為後來學潮在北京開始，有很多直接的延續性，又因為北大的民主傳統和組織建制很快地建立起來。實際上據我的了解，各地都有類似的活動，都是同等重要的活動。

1.2.2 奧林匹亞科學院的參與

我現在更具體講我們奧林匹亞科學院的參與。在胡耀邦剛剛逝世的時候，我們有過很大的爭論，就是我們奧林匹亞科學院是否介入。當時覺得應該是民主沙龍介入，其它社團都是做為外圍組織，以免運動很快結束之後受到衝擊。另外一個很具體的技術問題就是，我們在做完剛才我提到的論文之後很疲勞，而且功課已經拉下很多了，一個多星期沒有上課，所以我們覺得沒有能力繼續參與一些組織活動。這樣在四月十五日到十八日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是比較消極的，等待民主沙龍的行動。到十八日的時候，我和我們社團的一個核心成員坐不住了，要去看看。因為當時新華門前有集會，而且在十七、十八日的時候，民主沙龍已經有行動，就是在人民大會堂前提出了最早的七條，其中包括對胡耀邦重新評價的問題、官倒的問題。後來有新七條和改編的七條。王丹、郭海鋒、李進進和加什么，具我所知，是王丹和李淑嫻在電話上面談好的，但我不能肯定。所以，到十八日的時候，我和我們社團的一個核心成員坐不住了，十八日的時候，尤其是從四月十八日晚上，新華門前開始有靜坐行動。

【老木：你提到李淑嫻給王丹的電話。

沈彤：這個問題已說了，是“據說”。

老木：在學生運動初期，方勵之跟北大的學生有沒有一種直接的聯繫？

沈彤：第一，從我個人知道的廣場情況，我覺得是很確實的。但是第二，民主沙龍跟奧林匹亞科學院都決定，在運動開始之後，不跟李淑嫻和方勵之發生關係。

王超華：（刪一百二十字）【以上第 15 頁】

老木：因為劉剛在胡耀邦逝世那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晚上，去了方勵之家。方勵之提供了一些記者的名單，當然提供了我的名字，劉剛找過我。所以我想，王丹跟方勵之有聯繫，雖然沈彤說做出了一個決議，不與他們發生聯繫。封從德：四月十八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學三食堂前面貼了一張紙條，注明“天安門廣場傳來的電話”。這個據說就是李淑嫻本人寫的，是王丹打的電話給她。】

當時我們奧林匹亞科學院幾個人就決定我們也應該有一定的行動，至少是試探性的行動，當時我們決定在新華門前散發傳單。當然大家都明白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大家都不敢。當時我們想，在新華門前靜坐是要求見李鵬，但我們認為見李鵬是沒有用的。這跟我們以前的討論有關。所以我們就寫了很簡單的一句話，弄了三百張，叫“耀邦遺言：‘阿斗誤國’”，因為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嘛，我們到新華門前散發。散發之後，反應不強烈。很多人問：“阿斗是誰？”這是十八日晚上。當然這中間同時還有其它一些活動，比如我們在三角地出了一些橫幅，出了一些標語。

四月十九日民主沙龍搬到三角地，我本人和奧林匹亞科學院的另外兩個人一直是在旁聽的，直到丁小平突然提出來我們應該成立一個組織，這時我們三個人去找另外五個人，商量奧林匹亞科學院是不是要明顯地加入進來。在我們返回三角地的時候正在說，“我們成立的是籌委會，誰站出來，誰就是籌委會的成員。”我們八個人推選我為籌委會成員。我在往人群裏擠的過程中間，會散了。我到人群裏見到了封從德，因為我們八八年時就認識【異】，所以封從德和熊焱都說：“不管怎麼樣，你就加入進來吧。沒問題。”到了圖書館前面的時候，我也是以一個籌委會成員的身分去安撫清華那些人，決定第二天給清華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異】，以及當時天安門廣場回來的人講了之後，群情激憤要去天安門廣場，我去講話什么的，都是以這種身份。但是到了塞萬提斯像前面，丁小平拒絕我們參予。當然我們也無所謂，因為我們是以集體的形式在活動，加入不加入也沒關係。因為同教育學會有淵源，而且跟民主沙龍是同意不互相有組織上的關係的，所以當時我們和常勁商量好，常勁代表他本人和奧林匹亞科學院在籌委會裏邊。〈參：常勁 1. 1. 1 封從德 1. 3. 1〉

其實到四月二十日早晨的時候，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我去參加【以上第 16 頁】例會，封從德、丁小平他們也就接受了。二十日凌晨會剛完，我剛剛睡覺的時候就聽到喊聲，象要把樓翻掉似的，是說新華門前所謂的“四二〇血案”。當時一大清早的會議就決定要抗議“四二〇血案”，聲援受傷的同學，委派我、張智勇和趙體國負責這個問題。

其實到四月二十日早晨的時候，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我去參加【以上第 16 頁】例會，封從德、丁小平他們也就接受了。二十日凌晨會剛完，我剛剛睡覺的時候就聽到喊聲，象要把樓翻掉似的，是說新華門前所謂的“四二〇血案”。當時一大清早的會議就決定要抗議“四二〇血案”，聲援受傷的同學，委派我、張智勇和趙體國負責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至少從北大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是和平非暴力的理念出來的時候，也就是說和平請願。那個一直用到後來的橫幅，是當時張智勇和趙體國我們幾個人做起來的。而且在這個原則下，趙體國成立了很有效的糾察隊。我想北大是最早有組織的成立了有二百人的糾察隊。這是四月二十日上午、中午，游行是在一點鐘。

四月二十日早晨民主沙龍曾經宣佈退出過一次，楊濤在四月二十日下午我們到西單的時候加入游行隊伍，又決定加入這個運動了。我提到楊濤是因為關於這個糾察隊的問題，外界有很多質疑，為什麼不讓市民和工人加入，就是學生排外。我覺得這有很長的一個背景，一個是我前面提到過，至少我們兩個社團認為，運動應該局限在學生、知識分子和前知識分子這一階段，不應該擴大的。理由是我剛才沒有具體講的一些社會和政治危機，我們的這些看法，根據八八年的經驗，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糾察隊的話，是控制不住的，這樣運動不可能有效的放和有效的收，因為重點是在收。我們兩家都認為重點是在收，當然是同很多

在坐的各位的觀點不同。實際上四月二十五日我當選時就說，我們現在應當考慮運動怎樣收場的問題。

四月二十日，不是我們去衝清華大學，而是四月二十日中午的時候，成立了清華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我們決定要求清華的人一起加入。去了之後，清華的幾個校門被封，後來又下著大雨。我們決定繼續往前走，走到政法大學的時候，當然常勁那時候也在，政法大學給我們招待得很好，給我們吃飯，到禮堂裏邊把衣服弄幹之類。然後張智勇建議不要往前走，我們三個人決定繼續往前走。當時政法大學並沒有勸我們不去，因為我們是勸政法大學的人去。政法大學說，他們已經成立了很有組織的糾察隊，二百人，而且政法大學的研究生會、學生會完完全全變成了自治組織。但是我們決定還是堅持到廣場去，因為那時我們已接到通知，天安門廣場有五萬人在等著北大。後來我們就往廣場走，路上聽說師大有一小部分人加入進來，但是師大的主要部分一直跟我們差三、四公裏，在前面，這就是吾爾開希那些人，可能有四、五百人。我們進了天安門廣場，確實是繞廣場一圈喊口號。【以上第 17 頁】當時群情激動，然後說“北大人來了”。周

勇軍、吾爾開希這些人都說，北大不來，這邊組織不起來等等。〈參：常勁，張伯笠 1.1.2 四二〇北大游行〉

四月二十日，不是我們去衝清華大學，而是四月二十日中午的時候，成立了清華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我們決定要求清華的人一起加入。去了之後，清華的幾個校門被封，後來又下著大雨。我們決定繼續往前走，走到政法大學的時候，當然常勁那時候也在，政法大學給我們招待得很好，給我們吃飯，到禮堂裏邊把衣服弄幹之類。然後張智勇建議不要往前走，我們三個人決定繼續往前走。當時政法大學並沒有勸我們不去，因為我們是勸政法大學的人去。政法大學說，他們已經成立了很有組織的糾察隊，二百人，而且政法大學的研究生會、學生會完完全全變成了自治組織。但是我們決定還是堅持到廣場去，因為那時我們已接到通知，天安門廣場有五萬人在等著北大。後來我們就往廣場走，路上聽說師大有一小部分人加入進來，但是師大的主要部分一直跟我們差三、四公裏，在前面，這就是吾爾開希那些人，可能有四、五百人。我們進了天安門廣場，確實是繞廣場一圈喊口號。【以上第 17 頁】當時群情激動，然後說“北大人來了”。周

勇軍、吾爾開希這些人都說，北大不來，這邊組織不起來等等。〈參：常勁，張伯笠 1.1.2 四二〇北大游行〉

1.2.3 北大新聞中心的出現

新聞中心可能大家并不很熟悉，但是新聞中心的產物，象北大廣播站、《新聞導報》、演講團、當時的聯絡中心、募捐中心和北大的六臺傳單印刷，都是新聞中心負責的。

四月二十二日大游行我們沒參加，就做具體的組織工作。但是四月二十二日大游行可能是我們這些所謂的早期核心人員失去的最好的一個機會。因為從情緒上來講，我們不可能體察到參與四月二十二日大游行的一些人的情緒，當時我感覺廣場上的情緒是非常激動，在人民大會堂前面叫李鵬、叫國家領導人出來，胡耀邦的靈車偷偷地從後門走了等等一系列事情。當時有很多人嘲笑我們奧林匹亞科學院成立過程中作的一些事情，一些同學說我們幹傻事。但這些人回來之後，完完全全地變得對運動非常有承諾、非常肯定，我覺得這是從情緒上的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四月二十二日大游行，在廣場有十五萬人，所以我們後來做四二二大游行紀念章等等，都跟這有關係。這是情緒上的第一次大轉折，就是由一些核心人物，轉向校園內絕大多數人參與的運動的一個轉折點。

我們八個人開始成立新聞中心，最先開始籌備廣播站、募捐，而且當時責無旁貸地成為外高聯的一個機構。因為大家都到北大，到了北大聽到廣播站，又是有組織的幾個人，就都到了我們這裏。所以實際上成了不光是北京，而且是各地的中心。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從四月十九日，南開大學就派了代表來，一直到四月二十日，南開有二百人的代表團到了北京，一直從頭參與到運動的尾聲。所以南開也跟我們有很大的關係。當時，各校除了五大院校之外，還有比較積極的，象農大、北京經濟學院、北京外語學院等等，都有代表每天到我們聯絡站來兩次。實際上當時我們形成聯絡核心，也就是說，在常勁描述籌委會內部發生很大問題的時候，新聞中心實際上起了另外一個選擇的作用。【以上第 18 頁】

【沈彤：關於新聞中心，因為柴玲提到一些問題倒提醒了我一些。新聞中心實際上我在四月二十一日早晨退出籌委會之後就成立起來了，我們早期尤其地點比較好，又比較有組織，因為捐款比較多，這樣很現實地我們可以做得多事情。比如說你剛才提到的請陳明遠去，陳明遠是在我們廣播站講的話，而且陳明遠講話的所有磁帶是由新聞中心當時的那個宣講團送到各學校去的。

另外一個就是你們秘書處當時送給我一張條，我想這是蔡劍的筆跡，記錄了當時的一些事情。象你提到，當時宣傳部長確實是楊國忠，而且第二屆籌委會我也有其它原始資料，有林勁鬆等等，那是“外聯”。當時秘書處是柴玲和李鳴，“外聯”是郭海峰，“內聯”是趙體國等等，分籌委會是彭嶸負責，宣傳是楊國忠。楊國忠是在新聞中心工作兩天之後，知道我們新聞中心所有的人士，他覺得我們組織得很好，我們每天晚上開一次會，總結前一天，計劃後一天，他就決定參加我們的團體。所以他負責宣傳之後我們是一個系統，在這中間，工作比較多

的時候，由楊濤暫時負責廣播站，把它搬到樓中間了。

柴玲：我想問一下，楊濤、楊國忠是否就是你們新聞中心的下屬？我的印象是，其實新聞中心沒有很大，我比較有印象是新聞中心和新聞導報比較有關係。【以上第 19 頁】

1 . 3 民主機制與組織建制（封從德，柴玲）

1.3.1 卷入學運（封從德）〈參：常勁 1.1.1 沈彤 1.2.2〉

八六年底那次學運，我是三十四個被捕的學生之一，是在八七年元旦被抓到中山公園派出所。當時四個派出所總共抓了八十二個人，就是說非學生比學生多。在那個時候我就發現他們對學生和對其他階層區別對待。他們是想抓黑手。中共對學生運動事先已經準備得非常好。他們有很多策略。那時候我就意識到這個政府是非常的強大又非常的狡猾。這是八七年。然後八八年的這個行動委員會呢，我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當天晚上又退了出來，因為不能同意行動委員會的原則，就是搞秘密活動，我認為搞民主不能搞秘密活動。八九年四月十五號正好是柴玲的生日，我買了一個大蛋糕。在晚上看電視的時候，聽到胡耀邦的死訊。當時我個人是對胡耀邦沒有甚麼感情的，大概有一點欠疚，就是覺得八七年我參加了那個運動，而他下了臺，我們學生沒有做對他的任何補救工作，覺得抱歉。除此之外我對他沒有任何感覺。因為我們相信這些都是中共的政客。我個人參加這個運動的原因是，覺得活了二十四歲，長期受到人性上的這種壓抑，覺得這種環境不適合於生長，基本上歸到人權被壓迫的原因。這是大家共同的情緒上的原因。除了這個原因以外，就是我正在做論文，突然計算機壞了，就讓我有時間去讀大字報，包括十七號見到王丹他們在那裏募捐，然後第二天看到李淑嫻的大字報，是王丹打的電話，說同學們已經靜坐了二十四個小時沒有吃沒有喝，希望北大同學去增援，就是這樣一個呼呀，我就和柴玲當天晚上去了廣場。從這個時候才真正開始卷入這個學運。

四月十九日，我參加北大籌委會的成立，是因為上午看到了貼的一個通報，說晚上要集會，我非常敏感，知道正好是同學下晚自習的時間，三角地這地方至少能聚集三分之一的同學，相信會有一場很大的聚會，所以我對這個會很感興趣，上午就去圖書館查了很多書，包括美國憲法，中國的憲法，中共的黨章作為理論上的準備，想講幾句話。後來到了晚上，到了北大三角地，已經晚到了，所以我沒見到到武運學他們的演講。但是見到了熊焱在那裏演講。他是個老運動。他在八六年或八八年的北大的運動中，講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話，叫我【以上第 20 頁】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臺，再讓一批餓鬼上臺。然後就是籌委會的成立。當時為什麼叫北大籌委會呢，是因為我們考慮到我們不能讓一些投機分子卷入這個運動當中以謀取某種政治利益。我們祇是一個籌備委員會，

在運動中領導學生，在運動之後，馬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選舉北大新的學生會。當時我們在場的就建議，所有參加籌委會的人，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新的學生會的競選，雖然後來有爭議，但是在當場是這樣說的。為什麼叫團結學生會，當然是參照波蘭團結工會 這個榜樣。這是四月十九號晚上。

四月十九日，我參加北大 籌委會的成立，是因為上午看到了貼的一個通報，說晚上要集會，我非常敏感，知道正好是同學下晚自習的時間，三角地這地方至少能聚集三分之一的同學，相信會 有一場很大的聚會，所以我對這個會很感興趣，上午就去圖書館查了很多書，包括美國憲法，中國的憲法，中共的黨章作為理論上的準備，想講幾句話。後來到了晚上，到了北大三角地，已經晚到了，所以我沒見到到武運學他們的演講。但是見到了熊焱在那裏演講。他是個老運動。他在八六年或八八年的北大的運動中，講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話，叫，我

【以上第 20 頁】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臺，再讓一批餓鬼上臺。然後就是籌委會的成立。當時為什麼叫北大籌委會呢，是因為我們考慮到我們不能讓一些投機分子卷入這個運動當中以謀取某種政治利益。我們祇是一個籌備委員會，在運動中領導學生，在運動之後，馬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選舉北大新的學生會。當時我們在場的就建議，所有參加籌委會的人，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新的學生會的競選，雖然後來有爭議，但是在當場 是這樣說的。為什麼叫團結學生會，當然是參照波蘭團結工會這個榜樣。這是四月十九號晚上。

籌委會剛成立，讓我來登記委員的名單，這時清華的同學已經來了，說三千學生在門外等著北大，要我們去增援。我們當時覺得很為難。因為北大的組織剛搞起來，非常的不容易，我們不能分出時間來管清華的事情。我們結果達成了一種折中，就是說我們改到另外一個地方開會，同時歡迎清華的同學進來。就是到北大圖書館。清華的同學也跟著去。他們等著北大同學一塊到廣場去游行。北大籌委會就派我和熊焱作為與清華的聯絡人。

和熊焱到了西單就被軍警堵在外面，這時已是四月二十號凌晨三點四十。然後一個宣傳車出來說，我們還有二十分鐘就要清場了，希望所有的人離開。我們就聽到 裏面有口號，有喧嘩聲。就是新華門那個方向。這時跑出幾個人，當中一個就是張志勇，要我們趕緊回去請北大同學來增援。回到北大之後，張志勇非常激動，一定 要去號召北大同學去增援。這是凌晨五點鐘。〈參：1.6.3 四二〇慘案〉

這時，我們在北大三角地遇到了沈彤。當時夜深人靜，沈彤告訴我們說有一輛小車已經來過，有一個穿黑色風衣的人在這裏貼了張大字報。沈彤告訴我們“要小心王丹和楊濤這兩個人，楊濤實質上是幕後指揮，王丹是前臺”。<參：1.6.5 關於王丹>

張志勇沒有叫來什麼人，到了早晨六點鐘我和熊炎就到了他在北大西門外他的家。熊焱八九年剛剛結婚，他妻子還在睡覺。那晚，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如何建立民主機制。四月二十號早上八點半的會，我和熊炎準時參加，會後打著一塊牌子：“全國高校學生聯合起來！”，到清華去了。

沈彤：多少人？

封從德：就我和熊炎。到了清華，計算機系的兩個同學，神秘兮【以上第 21 頁】兮的，當時還下著小雨，帶我們去朱自清寫荷塘月色的那個地方，同我們商量一番，才把我們帶到清華食堂，相當於北大三角地的那個地方，去演講。當時熊炎拿了一個手提話筒，講了許多。清華同學說他們下午也要成立團結學生會，已經安排了在他們的一個禮堂裏開籌備會。這時來了北大籌委會的通知說下午兩點游行，抗議“四二〇暴行”，許多清華同學就自發去北大參加，更多人是留下籌備清華的籌委會。（刪一百字。）

封從德：就我和熊炎。到了清華，計算機系的兩個同學，神秘兮【以上第 21 頁】兮的，當時還下著小雨，帶我們去朱自清寫荷塘月色的那個地方，同我們商量一番，才把我們帶到清華食堂，相當於北大三角地的那個地方，去演講。當時熊炎拿了一個手提話筒，講了許多。清華同學說他們下午也要成立團結學生會，已經安排了在他們的一個禮堂裏開籌備會。這時來了北大籌委會的通知說下午兩點游行，抗議“四二〇暴行”，許多清華同學就自發去北大參加，更多人是留下籌備清華的籌委會。（刪一百字。）

1.3.2 初期的恐怖

四月二十號北大同學冒雨游行，我知道的祇是在北大籌委會裏面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是大概在四月二十號下午兩點半。這時候，沈彤，張志勇已經領著同學走了。我們就在二十八樓，常勁他們屋子，開會繼續討論北大籌委會組織建制等一些工作問題。

當時丁小平的作風非常專斷，通不過他的議案，他就要行使召集人的權威來重新表決。一直表決到最後，還通不過呢？他就堅持說：列寧同志說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我們拿他沒有辦法。這是當時開會的情況。北大初期開會的情況是非常混亂，比我們現在開會的情況，要差十萬八千里。當時甚至連

舉手發言這個原則，也是過了三次會才確立。

我們當時還有種恐怖。因為我們互不認識，每一個新參加的同學必須要有一個同學來擔保，由籌委會的同學來擔保他沒有問題才能進來。在四月二十號上午，我的一個黨員同學告訴我，校黨部已經知道我們昨晚的活動，而且用紅外攝像機攝了像，他說，“你別幹了，我看見上面有你。”下午這個同學又找到我，說你現在一定不要再幹任何事情，因為這個錄像已經送到了 國家安全部。這是當時恐怖氣氛的一個原因。

在四月二十號晚上，我非常害怕。因為我們祇有七八個同學，躲在常勁他們屋裏開會。我非常擔心這個時候突然來一隊衝鋒隊，把我們幾個人綁架走，然後這個運動一切就完蛋。這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雖然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但是如果他們綁架學生的骨幹分子的話，對這場運動的打擊非常大。所以在四月二十號晚上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當中，我有些打退堂鼓，這時柴玲正好來了，我就有一個借口說我【以上第 22 頁】們回家去吧。熊焱就說，老封你不能走，你

一走我們就完了。我想他也害怕了，所以他需要大家都在才能壯膽。那個時候誰都沒有想到運動會發展得那麼大，當時也根本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除了四月十九日我們演講的時候，二、三千同學那種氣氛以外，過後我們基本上就是躲在屋子裏開了一天的會。這是四月二十日晚上的情況。〈參：常勁 1.1.2 柴玲 1.3.6

>

在四月二十號晚上，我非常害怕。因為我們祇有七八個同學，躲在常勁他們屋裏開會。我非常擔心這個時候突然來一隊衝鋒隊，把我們幾個人綁架走，然後這個運動一切就完蛋。這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雖然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但是如果他們綁架學生的骨幹分子的話，對這場運動的打擊非常大。所以在四月二十號晚上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當中，我有些打退堂鼓，這時柴玲正好來了，我就

有一個借口說我【以上第 22 頁】們回家去吧。熊焱就說，老封你不能走，你一

走我們就完了。我想他也害怕了，所以他需要大家都在才能壯膽。那個時候誰都沒有想到運動會發展得那麼大，當時也根本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除了四月十九日我們演講的時候，二、三千同學那種氣氛以外，過後我們基本上就是躲在屋子裏開了一天的會。這是四月二十日晚上的情況。〈參：常勁 1.1.2 柴玲 1.3.6

>

1.3.3 四二二天安門廣場〈參：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

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有十五、六萬大學生參加的悼胡游行的組織過程，就我現在的了解，可能那個時候祇有北大籌委會一個學生自治組織。因為二十日的冒雨游行，已經形成了一個糾察隊，趙體國作糾察隊長，這個糾察隊後來就擔任了這個聯絡的任務，當時有一、兩百同學搞聯絡。

【沈彤：張志勇被開除的原因是什麼？

封從德：張志勇被開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四月二十日他在途中破壞游行，到廣場後又分裂北大隊伍等等。當時我跟趙體國，把張志勇拉的那個圈子給解散了，把他們都歸到北大隊伍裏之後往回走。當時跟外校的代表說定四月二十二日借胡耀邦追悼會的機會，都到天安門廣場來，大家聚會。在大游行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的時候成立了各校的臨時聯合委員會。】〈參：1.6.6 張智勇〉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學已經有了捐款。我印象中最初是生物、法律系搞的，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募捐。當時有公司說：我們可以捐四萬。這是我聽說的。北大得到的捐款當時已經可以買上兩臺油印機，甚至更多一點。要超越“五四運動”的三十萬張傳單，是我們當時的一個目標。

【沈彤：關於傳單的問題，就是我們印刷中心的工作，也是我們新聞中心的六個組成部分之一，當時確實以超越“五·四”三十萬張傳單為目標的。早期的時候，因為我們人手少，最早是八個人，但是後來整個新聞中心擴展到將近二百人，都是很有組織的，其中一部分【以上第23頁】人就是抄傳單，本來主要是抄三角地的，後來到各校去抄，把傳單的內容經過挑選，語法上修改，之後印成傳單。我們的印刷能力到五四大游行的時候是一夜可以印刷四萬張傳單，所以實際上就以北大的印刷能力來講，在運動早期就遠遠超過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印刷能力。北大和師大是北京最主要的二個印刷中心，而北大比師大早。】

【沈彤：關於傳單的問題，就是我們印刷中心的工作，也是我們新聞中心的六個組成部分之一，當時確實以超越“五·四”三十萬張傳單為目標的。早期的時候，因為我們人手少，最早是八個人，但是後來整個新聞中心擴展到將近二百人，都是很有組織的，其中一部分【以上第23頁】人就是抄傳單，本來主要是抄三角地的，後來到各校去抄，把傳單的內容經過挑選，語法上修改，之後印成傳單。我們的印刷能力到五四大游行的時候是一夜可以印刷四萬張傳單，所以實際上就以北大的印刷能力來講，在運動早期就遠遠超過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印刷能力。北大和師大是北京最主要的二個印刷中心，而北大比師大早。】

四二一大游行我們就這麼走，又發傳單。當時定的是晚上十點鐘在北師大會合，到清華隊伍過去以後，我跑到了陣列的前面，因為聽說了在晚上十二點以前要把天安門廣場戒嚴，擔心會有暴力的衝突，北大是在隊伍的中後部分，我就想跑到前面去看。結果到了前面，在長安街大概是六部口的附近，我發現清華的方陣非常有威風，是北大籌委會的孟召強走在隊首，打著紅黃綠三色小旗，在前面指揮。清華的糾察隊絕對是第一流的，他們檢查非常嚴格，那個方陣真是氣勢磅礴。因為他們是首隊，我就跟著他們進去。結果清華把廣場的中心軸線給占住，占了中線以後，還是考慮到北大向來在民主運動當中的地位，所以他們主動提出讓北大也到中間來，

但是已經發現有了技術困難。這個時候來了人大的一個代表，還有其他同學在紀念碑的北面臺階上，我們商量怎麼辦？這大概是“協調小組”的一個雛型。為了把廣場上的隊形搞得好看一點，不讓中共看笑話。人大的同學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由清華非常強大的糾察隊來做一個封閉的曲線，這個封閉的曲線往外擴張，遇到學生就放進去，遇到其他人員就請走，就這樣把它推到外面去。這個努力做了三個小時，最後失敗。

失敗以後，我就回到北大籌委會。北大的位置是在紀念碑西面，紀念碑和人大會堂之間。北大的隊形就遠遠不如清華，非常地鬆散，市民隨便就能插進來，而且外圍曲線是就象中國的海岸線一樣複雜。這時我們籌委會的成員非常擔心：因為離人大會堂比較近，那麼軍警要從那邊過來，我們就擔心，他們會首先在學生當中插入一些便衣，然後各個擊破，把北大同學先趕走。所以我們就整隊。然後我累了，就躲到紀念碑去偷偷睡了五個小時。

四月二十二日臨晨醒來的時候，郭海峰或者熊焱，已經參加了一個會議，好象就叫“十九所高校臨時協調小組”。這個協調小組是怎么組織起來的？做了什麼決議？我不太清楚。但是得到了一個消息，【以上第 24 頁】就是說他們和“治喪辦”的，就是政府那方面做了一個妥協。當時提了三個要求，得到一項答復：如果同學在警戒線以內，保障同學的安全。這個警戒線是定在廣場紀念碑西面的華燈做為警戒線。這是他們和“治喪辦”談好的。第二次和“治喪辦”打交道，我去了，大概是在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治喪辦”的人不認識我，他說：北大的代表叫郭海峰或者叫熊焱。我進去了，和周勇軍一起去的，呆了五分鐘我們就出來了，我們保證說：我們勸說同學退到警戒線以內。那麼他們能夠保證安全。這一點，我和其他同學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已經發現沒有辦法把同學給勸回去，因為就我們幾個光杆司令。

四月二十二日臨晨醒來的時候，郭海峰或者熊焱，已經參加了一個會議，好象就叫“十九所高校臨時協調小組”。這個協調小組是怎么組織起來的？做了什麼決議？我不太清楚。但是得到了一個消息，【以上第 24 頁】就是說他們和“治喪辦”的，就是政府那方面做了一個妥協。當時提了三個要求，得到一項答復：如果同學在警戒線以內，保障同學的安全。這個警戒線是定在廣場紀念碑西面的華燈做為警戒線。這是他們和“治喪辦”談好的。第二次和“治喪辦”打交道，我去了，大概是在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治喪辦”的人不認識我，他說：北大的代表叫郭海峰或者叫熊焱。我進去了，和周勇軍一起去的，呆了五分鐘我們就出來了，我們保證說：我們勸說同學退到警戒線以內。那麼他們能夠保證安全。這一點，我和其他同學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已經發現沒有辦法把同學給勸回去，因為就我們幾個光杆司令。

四月二十二日發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三人下跪。從廣場往西，往人大會堂看過去，左邊是周勇軍，他單腿下跪，中間是郭海峰，拿著請願書。這個請願書是北大籌委會新定的請願“七條”，我找同學抄出來，然後象命一樣金貴的帶到了廣場。右邊是張智勇。吾爾開希也在請願的同學當中，但是他沒有下跪。

當時我有一種印象，好象軍警認識北大，他們在北大前面增加了一倍的兵力往北大的隊形當中衝。原來是三排軍警，後來他們退到人大會堂臺階上增加了三排，變成了六排，以勢能變動能衝到北大的隊伍裏邊來。北大就組織了一個緩衝地帶來進行防禦，這個防禦是成功的。他們沒有衝到我們的女同學，祇衝到了前面身強力壯的男同學，我們當中有一個空曠緩衝地帶。但是馬上我就發現再組織第二次就很困難。這個時候，帶糾察的彭嶸問我：是不是還要擋軍警？我就說：我們撤吧。他就帶著同學撤了。回去以後就是同學無限期的罷課。

1.3.4 北大籌委會的改組<參：常勁 1.1.3 柴玲 1.3.6>

四月二十三日，香港“專上學聯”到了北大，給北大一份香港學聯的章程。我收到了章程後，就躲在沈彤的屋子裏寫了一封短信：做為北大常委，我個人反對成立學聯。因為這個時候還沒有基層組織，除了北大有籌委會以外，我還沒有聽說任何其它的學校有自治學生會，在這種情況下成立學聯的時機不成熟。我不願別人有北大老愛自居老大的感覺。<參：2.7.4 北大對高聯的態度>

四月二十四日，北大五四操場流產的大會，是彭嶸搗鼓的，他二十二日回北大後貼了一張公告，說要在這個時候開全校學生大會。搞【以上第 25 頁】得時間非常倉促，一直到最後開會前的十五分鐘我們籌委會才聚起來商量一下怎么搞這個事情。當時我的整個心思在搞組織程序，當時我建議什麼常委制，什麼什麼

的制度。在“五四”操場做了一個講臺。在那兒我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說我有一個夢。同學一聽就覺得這個不行，後來我們這批做夢的同學就在上面發了一通奇怪的演說。籌委會在這之前已經把丁小平和張志勇開除掉了，所以我們防備著這兩個同學衝上來，結果這兩個同學真的衝上來了。因為我們說所有的籌委會同學亮亮相，那麼他們也要上來亮相，這個時候就發生了衝突。這時熊焱搶過話筒說：張智勇是研究生會派來的奸細。這句話馬上就把會場的情緒攪亂了。同學們認為這是內哄，認為北大籌委會非常不成熟。這八千名同學就以離場表示失望，認為我們不能跟著這麼一個籌委會走。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籌委會後來就有什麼集體辭職之類的

四月二十四日，北大五四操場流產的大會，是彭燦搗鼓的，他二十二日回北大後貼了一張公告，說要在這個時候開全校學生大會。搞【以上第25頁】得時間非常倉促，一直到最後開會前的十五分鐘我們籌委會才聚起來商量一下怎麼搞這個事情。當時我的整個心思在搞組織程序，當時我建議什麼常委制，什麼什麼的制度。在“五四”操場做了一個講臺。在那兒我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說我有一個夢。同學一聽就覺得這個不行，後來我們這批做夢的同學就在上面發了一通奇怪的演說。籌委會在這之前已經把丁小平和張志勇開除掉了，所以我們防備著這兩個同學衝上來，結果這兩個同學真的衝上來了。因為我們說所有的籌委會同學亮亮相，那麼他們也要上來亮相，這個時候就發生了衝突。這時熊焱搶過話筒說：張智勇是研究生會派來的奸細。這句話馬上就把會場的情緒攪亂了。同學們認為這是內哄，認為北大籌委會非常不成熟。這八千名同學就以離場表示失望，認為我們不能跟著這麼一個籌委會走。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籌委會後來就有什麼集體辭職之類的

這天晚上，博士生和一些青年老師就到北大籌委會裏邊來，要來辦類似工作組之類的，他們叫“協調小組”，第二天早晨又莫名其妙地不見了。我頭晚建議熊焱作召集人。他一晚上非常威風地象一個元帥一樣發了很多命令，而且要監督，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也辭了職。

四月二十五日北大籌委會的改組，我記憶當中好象是第三屆。這個改組我個人認為它的代表性是有問題的，也許是因為我個人的局限，不了解很多情況。因為我參加文史樓下午這個會議的時候，發現入場時沒有任何代表資格的審查，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去。這當中有一個人很可疑，大家基本上相信他是中共派來的。他就比王丹差一票要選入五人常委。後來我聽到很多的反映說，就是他，在頭一天，把丁小平和張智勇給推到了臺上，造成了四月二十四日北大大會

的混亂。更具體的一個細節是，他在推他們上去的時候說：你們一定要上去，你們不上去的話，……，說完這句話，就把他的衣服敞開，當中有二把匕首。而且這個人競選中介紹身分的時候，我們要求他出示學生證，他也沒出示，卻說：我是北大唯一一個最特別的學生，學什麼亂七八糟的專業；是自費生，而且住在校外，沒有任何同學。我們要求他有任何他的同學來給他作證，他說：我沒有任何同學。所以這個人的身分非常可疑，無論他有何種使命。在競選當中，沈彤好象是周新提的名，其他的人也是互相提名。在競選當中每個人有五分鐘的發言，我記得自己講了二點，第一，要求籌委會要有緊急情況下的獨裁權；第二，籌委會的同學能夠有時間每天去讀一讀大字報，以便把握【以上第 26 頁】運動的脈搏。

四月二十五日北大籌委會的改組，我記憶當中好象是第三屆。這個改組我個人認為它的代表性是有問題的，也許是因為我個人的局限，不了解很多情況。因為我參加文史樓下午這個會議的時候，發現入場時沒有任何代表資格的審查，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去。這當中有一個人很可疑，大家基本上相信他是中共派來的。他就比王丹差一票要選入五人常委。後來我聽到很多的反映說，就是他，在頭一天，把小平和張智勇給推到了臺上，造成了四月二十四日北大大會的混亂。更具體的一個細節是，他在推他們上去的時候說：你們一定要上去，你們不上去的話，……，說完這句話，就把他的衣服敞開，當中有二把匕首。而且這個人競選中介紹身分的時候，我們要求他出示學生證，他也沒出示，卻說：我是北大唯一一個最特別的學生，學什麼亂七八糟的專業；是自費生，而且住在校外，沒有任何同學。我們要求他有任何他的同學來給他作證，他說：我沒有任何同學。所以這個人的身分非常可疑，無論他有何種使命。在競選當中，沈彤好象是周新提的名，其他的人也是互相提名。在競選當中每個人有五分鐘的發言，我記得自己講了二點，第一，要求籌委會要有緊急情況下的獨裁權；第二，籌委會的同學能夠有時間每天去讀一讀大字報，以便把握【以上第 26 頁】運動的脈搏。

1.3.5 四二七游行：出校決議是怎么做出的？〈參：1.6.8 關於四二

七游行〉

然後就是議決四二七游行的過程。這個過程呢，北高聯有反復，北大同學有反復，我個人也有反復。這個事情非常複雜，但是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決定四二七游行是在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前。北大當時非常不滿北高聯組織這樣的游行，認為北大同學已經游行游得太累了，因為北大離廣場最遠。而高聯是設在師大的，所以可能有這種本位主義的原因。北大非常反感，北大的同學也不願意再游。但是，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的新聞聯播，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四二六社論給漏了出來。這個時候北大同學的情緒馬上反了過來。開始我在籌委會裏邊是反對游行的，但我相信學生要想出去的話，我們就應該支持出去。我的一個信念是，運動應該是大家推著組織者走，而不是由組織者拉著大家走，最多快半步。北大籌委會二十六日開會，討論是否參加四二七游行，到這個時候北大還在強調自治權。到了下午分籌委會和部長聯合會議，就是北大籌委會的擴大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北大籌委會的五人常委先做了一個表決，當時的表決結果，我記得是三比二反對北大同學出校門。當時我就有點著急。因為我讀了些大字報，感覺到大家的情緒已經反了過來，同學是想出校門。如果北大籌委會去阻止的話，那么可能要被同學拋棄掉，因為這個組織在頭一天已經表現不佳。這個時候我就提醒擴大會議的分籌委會和部長會議加上秘書處，我跟他們講，根據我們章程的民主程序，可以由八處聯名提出否決案，三分之二還是二分之一通過了就可以推翻常委的決議。最後是推翻了，北大的同學才這樣出了校門。雖然我相信即使是做了決定不讓出校門，同學們也會出校門的；但是，四二七，這個中國歷來最大的一次民主示威，如果北大因籌委會決定而出不了校門的話，那將成為一次歷史的笑話。

這個反復的過程，讓我對民主的原則、民主機制，有了更多的信念。由此，我就更相信當時自認為的民主原則——現在看來有點泛民主——我一直就堅信這個信條，重大決定應該由更多的人來做。這種作風後來一直帶到廣場，包括廣場的營地聯席會議，有三百多個學校的代表參加。四月二十七日清晨七點鐘我要去游行，這個時候在北大【以上第 27 頁】二十八樓二樓廣播站外面，孔慶東和沈彤、王遲英來了，說：我們不同意你出校門。這個時候我記得是我們四個人，（沈彤：王丹也來了。）王丹不在，就說，四個人已經可以做決議了。孔慶東提議，沈彤附議，王遲英默認，決定我不能出校門，讓我留守在校園。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太過於堅決主張要往外衝。留守的這一天我就好好地吧北大廣播站的路線理好，完了寫一篇文章《我的民主宣言》，又和北大校方把食堂和車聯系好，把同學接回來，晚上開放食堂。這就是我那一天的工作。最輝煌的是，在晚上七

點還是八點同學回來的時候，我把準備好的《義勇軍進行曲》放出來，同學們以凱旋的方式回到北大。這是四二七，我就講到這裏。

這個反復的過程，讓我對民主的原則、民主機制，有了更多的信念。由此，我就更相信當時自認為的民主原則——現在看來有點泛民主——我一直就堅信這個信條，重大決定應該由更多的人來做。這種作風後來一直帶到廣場，包括廣場的營地聯席會議，有三百多個學校的代表參加。四月二十七日清晨七點鐘我要去游行，這個時候在北大【以上第27頁】二十八樓二樓廣播站外面，孔慶東和沈彤、王遲英來了，說：我們不同意你出校門。這個時候我記得是我們四個人，（沈彤：王丹也來了。）王丹不在，就說，四個人已經可以做決議了。孔慶東提議，沈彤附議，王遲英默認，決定我不能出校門，讓我留守在校園。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太過於堅決主張要往外衝。留守的這一天我就好好地把北大廣播站的路線理好，完了寫一篇文章《我的民主宣言》，又和北大校方把食堂和車聯系好，把同學接回來，晚上開放食堂。這就是我那一天的工作。最輝煌的是，在晚上七點還是八點同學回來的時候，我把準備好的《義勇軍進行曲》放出來，同學們以凱旋的方式回到北大。這是四二七，我就講到這裏。

1.3.6 組織建制（柴玲）

我就補充從開始到二十七日這段時間籌委會中的一些建制問題。

四月十九日老封去演講，一直到他跟熊焱去廣場，籌委會最初的組成，我一直作為一個旁觀者看著。（這中間插一句話，就是當北大的隊伍從三角地移到圖書館的時候，他們這些籌委們在討論，中間在黑暗的人群中有一個個子矮矮的人說：“什麼，什麼，籌委會裏面沒有我們，跟他們搗亂。”我就很記得住這個人的聲音。四月二十日的晚上的時候，我找到封從德他們在一個黑屋子裏邊，大約有七、八個人都在開會，他們第一次籌委會。丁小平說：列寧說真理在少數人手中。就在這個時候門開了，進來一個人。這個人叫郭海峰，從聲音上我辨別出來正好是那天晚上要搗亂的那個人。當時還有點奇怪。）在他們開會的同時，有一些同學要求北大增援，去營救那些冒雨回來的人。這個車一直沒有派出去，他們始終在討論組織建制問題。後來趙體國回來就說：“你們這一幫人真沒有人性。”後來趙體國當時就去睡覺了。會議一直開到清晨，我記得這些人開到七、八點鐘的時候，選掉了丁小平。然後就是老封推薦郭海峰做第二屆召集人。這時候大家拿著話筒，老封跟熊焱一塊出去宣佈，把著各個教室的門，讓大家動員罷課。我再次去的時候是四月二十一日傍晚的時候，這個時候北大四樓都是很活躍，大家在準備游行，準備旗幟，準備標語，準備那個紙殼什么的，我在那兒幫著做些敲敲邊鼓的工作。大隊開始游行的時候，我很自覺地就拿了照相機，我

想給這個留下點記錄來。【以上第 28 頁】我在師大北側的那條路上，首先看著清華過去，然後是人大過去，找了很久才找到北大這批人。我是在師大那個時候才插了進去。我記得非常清楚，在進入廣場前，新華門前那一段特別漂亮，北大前面拉成一個正方形，留出一塊空地，王丹跟楊濤拿著錄音機在放《國際歌》，後面的人再排成一長排。進去以後呢，北大的人基本上都找到地方睡覺，除了那些組織的人。

四月十九日老封去演講，一直到他跟熊焱去廣場，籌委會最初的組成，我一直作為一個旁觀者看著。（這中間插一句話，就是當北大的隊伍從三角地移到圖書館的時候，他們這些籌委們在討論，中間在黑暗的人群中有一個個子矮矮的人說：“什麼，什麼，籌委會裏面沒有我們，跟他們搗亂。”我就很記得住這個人的聲音。四月二十日的晚上的時候，我找到封從德他們在一個黑屋子裏邊，大約有七、八個人都在開會，他們第一次籌委會。了小平說：列寧說真理在少數人手中。就在這個時候門開了，進來一個人。這個人叫郭海峰，從聲音上我辨別出來正好是那天晚上搗亂的那個人。當時還有點奇怪。）在他們開會的同時，有一些同學要求北大增援，去營救那些冒雨回來的人。這個車一直沒有派出去，他們始終在討論組織建制問題。後來趙體國回來就說：“你們這一幫人真沒有人性。”後來趙體國當時就去睡覺了。會議一直開到清晨，我記得這些人開到七、八點鐘的時候，選掉了了小平。然後就是老封推薦郭海峰做第二屆召集人。這時候大家拿著話筒，老封跟熊焱一塊出去宣佈，把著各個教室的門，讓大家動員罷課。我再次去的時候是四月二十一日傍晚的時候，這個時候北大四樓都是很活躍，大家在準備游行，準備旗幟，準備標語，準備那個紙殼什麼的，我在那兒幫著做些敲鼓邊鼓的工作。大隊開始游行的時候，我很自覺地就拿了照相機，我

想給這個留下點記錄來。【以上第 28 頁】我在師大北側的那條路上，首先看著清華過去，然後是人大過去，找了很久才找到北大這批人。我是在師大那個時候才插了進去。我記得非常清楚，在進入廣場前，新華門前那一段特別漂亮，北大前面拉成一個正方形，留出一塊空地，王丹跟楊濤拿著錄音機在放《國際歌》，後面的人再排成一長排。進去以後呢，北大的人基本上都找到地方睡覺，除了那些組織的人。

清晨的時候十九個高校在開聯席會議決定怎麼辦，剩下的就是進去請願什么的。我當時雖然坐在前面，但是基本上沒有參與具體的組織活動。我們一直在等前面的跟他們交涉的情況，同學們都很急躁說：如果半小時之內得不到消息，我們就衝大會堂。當時我就前後的串聯。直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當時也是看到有個穿綠軍裝的小伙子說：十五分鐘如何，如何。但是一直沒有等到消息。最後已經衝過一回了，大家再要衝的時候，我就參與讓大家拉起手來，然後就是說撤離。撤離以後就開始罷課，無期限罷課。因為又是下跪請願啦，又是被欺騙，很多人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的情感化。當時美術學院和電影學院也在前排的那一片，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屈辱的一個活動。〈參：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封從德 1.3.2〉

完了之後我跟老封回到家。這時候我嗓子全都啞了，正要休息的時候，有人敲開了門，是一個個子不高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他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建議，他說：你們現在雖然成立了自治會，不要學生會了。但學生會是一個組織還存在，將來有可能在你把運動搞完以後，學生會就要出來摘桃子了，或者在運動中間造成一種混亂。他說：最好趕快搞直選。

第二天早上我們錄了美國之音的一個關於北京知識分子、學生，還有市民的基本情況的非常好的一篇文章以後，老封就去圖書館查資料，查什麼是民主？怎麼建制？我就去了北大籌委會。我印象中當時已經有這麼幾個人，這麼幾個機構在開始運作，有一個是蔡劍，我印象非常深，還有郭海峰，他們一方面管財務，一方面馬上就把美國之音的錄音拿過去整理，謄清為大字報然後貼出去。我就在另外一個房子裏，那些有二間房子的同學自動讓出來給大家作辦公室。自從學生罷課以後，那個辦公室很自然地吸引了大批來提建議的人，所以這個時候接待處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當天中午的時候，老封他們都來了，開什麼會等等。當天晚上，【以上第 29 頁】超華剛才提到的建議中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她給我們建議說：“民盟”什麼時候開會，有蘇昭智、嚴家其等，希望我們去參加。我說這個建議特別好，在那個時候她提得還比較有水平。當天晚上另外有一個“民盟”的人來提建議，說：你們絕對應該成立秘書處。這個建議之後，第二天通過趙體國找了一批女同學就成立了秘書處，秘書處下設三個機構：接待處，檔案處，還有一個會議記錄處及新聞發布中心等等。功能又是“內保”，又是“外保”。當時我記得宣傳部那個楊

國忠已經管理起來了吧。所以跟沈彤說的那個新聞中心負責這麼多，我有點接不上茬。

當天中午的時候，老封他們都來了，開什麼會等等。當天晚上，【以上第 29 頁】超華剛才提到的建議中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她給我們建議說：“民盟”什麼時候開會，有蘇昭智、嚴家其等，希望我們去參加。我說這個建議特別好，在那個時候她提得還比較有水平。當天晚上另外有一個“民盟”的人來提建議，說：你們絕對應該成立秘書處。這個建議之後，第二天通過趙體國找了一批女同學就成立了秘書處，秘書處下設三個機構：接待處，檔案處，還有一個會議記錄處及新聞發布中心等等。功能又是“內保”，又是“外保”。當時我記得宣傳部那個楊國忠已經管理起來了吧。所以跟沈彤說的那個新聞中心負責這麼多，我有點接不上茬。

王超華：不，我覺得當時還是沈彤。

封從德：沈彤、後來楊濤管廣播站，沈彤管新聞中心。

柴玲：我知道廣播站當時已經存在了。【以上第 30 頁】

王超華：籌委會下設的宣傳部大概還稍微往後點。

柴玲：沒有，楊國忠在師大二十三日已經出現了。

這中間出了一個小問題，有個叫林勁鬆的，把所有的意見和建議全部放在一個包裹邊帶出校園去了，同時他沒有整理出任何意見傳達給常委，而是收集了一大打名片。後來郭海峰和孟召強很生氣，就把它要過來。孟召強馬上就拿了名片復印了一迭，說：這些全部是歷史資料，我一定要收集。我想當時他咪了好多資料，因為他是歷史系的。直到秘書處建立以後，開始把重要的東西記錄下來存檔。

等到二十四日這批常委開大會的時候，那時候我們這批主要幹實事的人已經開始感覺到常委是非常地不穩定，而且開始有點脫離群眾。所以在二十四日他們去籌委會開會的時候，有一批法律系的同學自願地來說：我們系已經開始建立了分籌委，而且我們有各種的計劃，包括修改校園的法案還是什麼。就是紀軍。然後就讓他們開始動員各個系都這麼成立。

1 . 4 師大與高聯（梁二）

【師大自治會的形成主要建立在三個人的作用上，第一是吾爾開希，他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新華門示威的時候莫立了自己領袖的形象；第二是張軍，他是在四月二十日下午和我組織了一個全師大游行到人大，再聯合游行到廣場。當然那次游行因為下雨失敗了，但是建立了我們兩個人與人大的接觸和我們兩個人同各系積極分子之間聯系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之上，我和張軍就希望能聯合

吾爾開希組成一個自治會的雛形。

從四月二十日下午到四月二十一日期間就開始有師大學生自發的聯系活動，我和吾爾開希、張軍也覺得有必要組成一個自治會的籌委會。那天我們就搞了一個辦公室，是在開希的宿舍裏。我記得當時就有一個香港同學來找我們。那個時候有許多社會人員來訪都是由我們那個雛形辦公室來接待。開始設了一個廣播站，準備了一些音響器材，這就是最早的形成。到了開胡耀邦追悼會那天，開希在廣場上的表現使他獲得了更多同學的支持，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分工協作的計劃。在追悼會之後，我們就是一定要全市統一罷課，而且是聯合罷課。吾爾開希就認為有必要形成一個完整的機構，這樣各個系的自治會就開始籌建起來，各個部也開始籌建起來。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各項職務基本劃分清楚了：吾爾開希任主席，我任第二秘書長，副秘書長，張軍任秘書長。下設幾個部，自治會以秘書處為執行機構，以正、副秘書長和開希作為一個決策機構，然後再受各個系自治會的學生代表的領導。師大最早對高聯的貢獻，我想第一是一個比較健全的秘書處，曾經擔任過高聯的執行機構。超華曾經提到過，高聯曾經運用師大的秘書處作聯絡、通訊、印刷、會議準備等，這是對高聯執秘機構的貢獻。我記得早期的時候，師大還捐過錢，雖然不是特別多，可好象也是三百塊錢吧，每個學校交的校費。師大的人，比如陳長寶曾擔任過早期的高聯宣傳部部長，還有一個叫楊什么的同學，他曾擔任過財物部副部長協助陸明霞工作。

在社會聯系上主要是與外校同學的聯系。值得一提的是同天津南開和天津大學這兩個學校的聯系。師大在很早就有一批同學要到外地去進行聯絡工作，其中有派到上海和西安、成都的這麼三個小分隊。他們的成果還是比較大的。我聽一個上海的老同學說，他們的上海組織【以上第 31 頁】開始并不是特別強，北京同學到那邊以後才增強的。其實那幾個同學在北京在本校并不能起很大作用，但因為上海同學本能地對北京同學的尊重，就在革命火種傳播上起了比較大的作用。而且我們做得相當早，四月二十三就發起了這個活動。

在社會聯系上主要是與外校同學的聯系。值得一提的是同天津南開和天津大學這兩個學校的聯系。師大在很早就有一批同學要到外地去進行聯絡工作，其中有派到上海和西安、成都的這麼三個小分隊。他們的成果還是比較大的。我聽一個上海的老同學說，他們的上海組織【以上第 31 頁】開始并不是特別強，北京同學到那邊以後才增強的。其實那幾個同學在北京在本校并不能起很大作用，但因為上海同學本能地對北京同學的尊重，就在革命火種傳播上起了比較大的作用。而且我們做得相當早，四月二十三就發起了這個活動。

對社會各階層的聯系主要表現在早期師大就與一些官員、官員的參謀或各個研究機構的老師有聯系。我們秘書處最初的一些情報就是通過他們這些人得到

的，而且他們與我們也保持著一定的密切聯繫。師大對師大附近的居民宣傳點的宣傳工作是相當好的。最早是跟人大學的，把喇叭拉到外邊，最後把自由論壇也設在校門口。這樣就有一些市民來聽，了解學運，然後是對學運表示支持。後來向市民要錢要得也比較多。

師大的校際間宣傳作用是革命活動的傳播。它利用自己地理上的優勢派出聯絡隊員，他們不僅傳遞了信息，也起到了參謀、建議的作用。他們到小一點和郊區一點的學校實際上是幫助進行了組織活動。當時聯絡部派出的人參與性都特別強，比如在北京印刷學院，他們就幫助有心的人建立了自治會，這是比較重要的。後來印刷學院在四月二十六日率領五百同學到師大來，跟著師大的同學一起進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準確地說，他們就整個投靠我們了。

在師大校內，我們學生自治會沒有脫離系組織，校自治會的全委會是由系的小頭目組成的。他們在本系都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不僅能領導各系，而且有許多系主席都是以前的官方的系學生會主席，他們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一個決策程序，重大的提案需要所有十八個系的同學到齊才能進行表決。〈〈系：師大民主機制〉〉

師大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領袖方面的作用。當時東部院校沒有代表的時候，有意見就跑師大。我們收集了不少東部學校的信息并反映到高聯。對開希，我們從一開始就讓他從校內的實際事務中解脫出來，由秘書處承包一切事務，包括他從高聯帶回來的決議的執行和我們對高聯決議的建議都是由秘書處負責。開希一直也是作得不錯，充分利用他在媒介形象方面的優勢。

在高聯的組織上，比如宣傳部部長的安排，聯絡部長有一段時間就是高聯的聯絡部，直接由師大的聯絡部接管了。高聯出領導者、組織者，師大起輔助的作用。在高聯決定空校運動之前，師大早期的南下宣傳小組就演變成了空校的宣傳。

我記得是在絕食剛發起的時候，【以上第 32 頁】有些人因為一看絕食長了有可能活不了，所以就想回家。我們當時就給了他們一些經費，讓他們帶很多傳單到自己當地的一些學校進行宣傳。後來我們在北京市也利用各系自治會組織起來的宣傳小分隊，我記得那時每個系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小分隊，有些系，如數學系曾經組織了五個以上的小分隊，一方面是帶著傳單、喇叭，同時也帶著捐款箱，到街頭、到工廠。我記得地理系的同學特別好，他們到首鋼、北京印刷廠去進行宣傳，要求工人當然不是罷工，但是在工餘時間去支持學生運動。而且在工作時間也表示一種態度，比如怠工。同時與學生互通信息，提出對學運的看法、建議。這種宣傳小分隊不僅宣傳學運的目的，而且也有組織的作用，與市民建立聯繫，與工人建立聯繫，把他們湊到一塊，讓他們發表意見，并把他們的意見收

集起來，整理到師大自治會去。】

在高聯的組織上，比如宣傳部部長的安排，聯絡部長有一段時間就是高聯的聯絡部，直接由師大的聯絡部接管了。高聯出領導者、組織者，師大起輔助的作用。在高聯決定空校運動之前，師大早期的南下宣傳小組就演變成了空校的宣傳。我記得是在絕食剛發起的時候，【以上第 32 頁】有些人因為一看絕食長了有可能活不了，所以就想回家。我們當時就給了他們一些經費，讓他們帶很多傳單到自己當地的一些學校進行宣傳。後來我們在北京市也利用各系自治會組織起來的宣傳小分隊，我記得那時每個系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小分隊，有些系，如數學系曾經組織了五個以上的小分隊，一方面是帶著傳單、喇叭，同時也帶著捐款箱，到街頭、到工廠。我記得地理系的同學特別好，他們到首鋼、北京印刷廠去進行宣傳，要求工人當然不是罷工，但是在工餘時間去支持學生運動。而且在工作時間也表示一種態度，比如怠工。同時與學生互通信息，提出對學運的看法、建議。這種宣傳小分隊不僅宣傳學運的目的，而且也有組織的作用，與市民建立聯系，與工人建立聯系，把他們湊到一塊，讓他們發表意見，并把他們的意見收集起來，整理到師大自治會去。】

【封從德：你提到高聯最初的聯絡是由師大來“接管”，是指什麼？

梁二：這個接管怎麼講呢，正象超華說的，並不是高聯壓制各高校，而是各高校都想接管高聯。常勁也談到了這一點。

王超華：我、常勁和梁二得到了一個共識，當時不是高聯想控制

師大、北大，而是高聯希望有一個學校能出來帶頭。所以希望師大秘書處就能是高聯的秘書處，宣傳處就是高聯的宣傳處。這個原則我和北大講過，這是在五月四日復課之後的事。絕食之前北大已經同意接受這個原則，只要楊濤回來，楊濤是主席，楊濤就直接上高聯，在楊濤沒回來之前，暫時派別的人。我們三個在底下討論了一下，覺得當時用“控制”這個詞是不合適的，實際上是希望能夠在學生中起領導作用的高校在高聯裏起作用。

封從德：你說的這段時間是五四之後，而不是五四之前。

王超華：五四之前在師大就是這個原則。五四之後總部決定搬北大。但是北大當時還不了解我們這個原則，我就用了三天還是幾天時間給他們作說服工作，然後北大才接受了這個原則。

梁二：就這個問題我還有一個回答。當時是學生在高校都不願意幹，各高校的自治會的秘書處執行能力都沒有師大強，這是一個事實。】【以上第 33 頁】

1 . 5 北高聯：從自發到自治（王超華）

1.5.1 四二二集會天安門〈參：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

我參加學運，可以說前一個星期都沒有做什么。非常抱歉，我對胡耀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印象，而且作為一個工作了那麼些年的人，當時覺得胡耀邦在臺上時，怎麼做個報告都坐不住。他是星期五逝世的，第二個星期二的時候，我在北大旁聽。老師一開始上來就說，大家起立默哀。我還覺得哎喲，這老師還挺關心政治的。四月二十日我們學校舉辦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紀念五〇四的座談會，一個博士生原定的發言題目是：銀樣蠟槍頭，講中國知識分子的祇說不做。結果他說：“我取消我這個發言。昨天晚上響徹長安街的《國際歌》聲，使我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很敢承擔的。”其他人也說，我們應該討論學生運動對中國現代史的作用。因為當時那個會的題目就是五〇四。我當時還反對把學生運動的作用提得這麼高，我覺得沒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話，學生運動也不會起作用，頂多是一段時間內的作用。當時也沒想到自己後來會卷進去。我的丈夫是張伯笠他們班上的

當時已經知道北京市公安局發了通告，四月二十二日是胡耀邦追悼會，從早上八點到十二點天安門廣場要戒嚴。四月二十一日學生要出發占領天安門廣場，到了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清華學生出來了，清華學生是從西校門出來的，走到北大東校門，我們家就住在東操場那兒，整個的口號聲是順著這個過來的。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也到了天安門廣場，沒找到我們學校。我在那兒大約呆到第二天早上四點鐘，因為我要送小孩去上學校，我就回去了。再去的時候就發現了我們學校的隊伍，坐到我們學校隊伍中去了，這時候是四月二十二號早上八點半。

我說一下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我從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去的時候就非常想知道，拉得這麼好的一個隊伍，究竟有什麼組織。我非常想一下子扎到這個核心去，看看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這時候就有人拿著喇叭在前邊喊，“各校代表來開會”我說，“咱們學校也去個人那。”我們學校那些人都坐著不動。我說，“怎么回事？”他們說，“你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後，發現這個代表會是非常不正式的一個【以上第34頁】會。而且我出來以後才知道，當時那個召集人就是吾爾開希。他就在那兒說，“到底怎麼辦，不讓咱們參加追悼會，不讓咱們派代表進去。”這些代表，包括我的一個最集中的感覺就是，既然各校都來，既然大學校都來，你們一定有計劃，你們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聽。所以到那兒被這麼一問，就都傻了。然後他又說，回去征求各校同學的意見，然後再回來。當時這樣的會開過三次。我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秩序好，多半表現在學生都非常自覺地希望這次運動能夠有些什麼。說實在，組織是很亂的。

我說一下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我從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去的時候就非常想知道，拉得這麼好的一個隊伍，究竟有什麼組織。我非常想一下子扎到這個核心去，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時候就有人拿著喇叭在前邊喊，“各校代表來開會”我說，“咱們學校也去個人那。”我們學校那些人都坐著不動。我說，“怎麼回事？”他們說，“你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後，發現這個代表會是非常不正式的一個【以上第34頁】會。而且我出來以後才知道，當時那個召集人就是吾爾開希。他就在那兒說，“到底怎麼辦，不讓咱們參加追悼會，不讓咱們派代表進去。”這些代表，包括我的一個最集中的感覺就是，既然各校都來，既然大學校都來，你們一定有計劃，你們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聽。所以到那兒被這麼一問，就都傻了。然後他又說，回去征求各校同學的意見，然後再回來。當時這樣的會開過三次。我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秩序好，多半表現在學生都非常自覺地希望這次運動能夠有些什麼。說實在，組織是很亂的。

所以當時四月二十二日我就提出來，實際上我提了四個，我目前祇記得兩個，我說咱們這個示威請願，你們這個條件都太空了，應該提得具體一點，就象工人罷工 要求加五毛錢，要求減一小時工作時間一樣，提得非常具體。當時我提的一個是，你要是說新聞自由的話，你光說開放報禁，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你要請徐四民回來 辦報，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建議。還有一個是公布政協對教育問題的三個報告。但是吾爾開希說，“他們根本不見咱們，你說這個有什麼用啊。”所以，就沒有人理 我了。

這個之後是原地參加追悼會。追悼會以後，不停地就放哀樂，沒聲了。忽然有人說，已經走了。這就急了，大家都往前邊擠。我們學校就說，那算了，咱們游行去 吧。和電影學院繞了廣場一周，回頭一看，人家大部隊沒走。怎麼辦呢？那咱還回去吧。繞了一圈又回來了。回來以後，我們就在特別後頭了。

我就又自告奮勇說，“我到前面給你們打聽消息。”前邊那會兒已經是非常擠了，北大是在大會堂前靠北邊一點。擠到前面，吾爾開希正在那兒，他已經擠到武警 裏邊去了，說現在還缺一名代表，誰願意來。我那會兒沒蹦那麼高，想，“嘿，這不是誰願意去就去了嗎？”我就沒去。所以我就覺得當時進去的三個人，包括下跪 的代表，包括吾爾開希，實際上是四個人在裏邊。

吾爾開希在那喊來喊去的時候，北大這邊有一個同學說：“你算幹什麼的呀？”他就喊，“我叫吾爾開希，我是師大三千同學選出來的代表。你有意見的話，你可以去跟師大的同學講，或者你們北大的派代表。”我印象是，師大那個時候已經認他為代表了，不是完全他個人。〈參：1.6.7 吾爾開希是怎麼選出來的？〉

關於那個一刻鐘李鵬要出來。因為他在那兒老說“再等等，再等【以上第35頁】等”，底下問“到底等多長時間？”我也在那兒使勁喊，“到底要等多長時間？”他就說，“等一刻鐘。”當時是十二點半，我說，“那到十二點四十五啊？”旁邊

也有其他人這麼說。我就出來告訴我們學校說，“前邊學生代表說了，說再等一刻鐘”。當時還有在傳，說是有兩個代表進去了，在和裏邊談。所以我就說，“他們進去了，可能還要等一刻鐘。不什麼的話，咱們就會有其他行動。”我們學校的同學就說：“你跟別的學校的同學也說說，因為後邊的同学已經開始走了。”我這個人也挺愣的，就捂著嘴喊：“哎，再等一刻鐘！”忽然一個人就抓住我，“你造什麼謠？再等一刻鐘是怎麼回事？剛才正在這抓，誰說十二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李鵬會出來？”我說，“沒說呀。我是說，學生代表……”那人就問，“你的學生證呢？”這時候，我們學校的同學非常護著我，幸虧我沒走太遠，我們學校就把我給護了。然後跟這個人要學生證，這個人拿出一個清華的學生證來。

關於那個一刻鐘李鵬要出來。因為他在那兒老說“再等等，再等【以上第35頁】等”，底下問“到底等多長時間？”我也在那兒使勁喊，“到底要等多長時間？”他就說，“等一刻鐘。”當時是十二點半，我說，“那到十二點四十五啊？”旁邊也有其他人這麼說。我就出來告訴我們學校說，“前邊學生代表說了，說再等一刻鐘”。當時還有在傳，說是有兩個代表進去了，在和裏邊談。所以我就說，“他們進去了，可能還要等一刻鐘。不什麼的話，咱們就會有其他行動。”我們學校的同學就說：“你跟別的學校的同學也說說，因為後邊的同学已經開始走了。”我這個人也挺愣的，就捂著嘴喊：“哎，再等一刻鐘！”忽然一個人就抓住我，“你造什麼謠？再等一刻鐘是怎麼回事？剛才正在這抓，誰說十二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李鵬會出來？”我說，“沒說呀。我是說，學生代表……”那人就問，“你的學生證呢？”這時候，我們學校的同學非常護著我，幸虧我沒走太遠，我們學校就把我給護了。然後跟這個人要學生證，這個人拿出一個清華的學生證來。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後來學生並沒有拿李鵬要出來見學生這個事做文章，也印象並不深，可是政府反復地說。這是跟我有關係的一件事。

【封從德：說李鵬要出來這個消息，你是聽誰說的？

王超華：沒有任何消息說是李鵬要出來。當時我聽到，包括人家質问我，包括我傳的都祇是“一刻鐘以後，他們不給答復，我們要採取行動”。下跪是這之後。

常勁：我想對這個做一點補充。因為開希跟我談過這個事情。當時開希召集了會議，然後作為代表上去，他在下面說這個事情，當時他們跟治喪委員會談判，治喪委員會說是十點半吧，他們不是說李鵬來見面，而是說他們給學生答復。但是後來不知怎麼消息誤傳了以後，就說成李鵬去見學生。

王超華：沒有任何人說是李鵬答應了。

常勁：但是我們在後面得到的消息，當時我和柴玲都在後邊，我們在那得到的消息是，聽說李鵬、趙紫陽都出場了，要去參加那個會議。然後李鵬還願意給我們學生談談話，當時我們聽到的是這個消息。然後底下的人熱烈地問開希，開希當時覺得沒辦法，因為已經十點半了，他還沒得到消息。

王超華：那應該是十二點半，他說再等一刻鐘。【以上第 36 頁】

常勁：對，當時他沒辦法了，所以一動腦筋說，再等一刻鐘。開希他說他當時很懷疑這個消息是怎樣傳下去的。他說有可能是共產黨……】

1.5.2 清華與北大高聯代表會議

四月二十二日游行回來以後，我就覺得這個組織應該加強。四月二十三日我就到北大去，正好陳明遠在那發表演說。我一看，接待處在二十八樓四〇二八房間，我就上去，一上去就見到柴玲，我就給她提建議，象什麼中南海外邊靜坐呀，她馬上把我的名字寫下。下午她就拉著我，說他們正開會。進到他們的門裏去，剛一說，這是社科院的王超華，“誰也不許來參加我們的會！”他們這幾個凶極了。我當時以為是各校聯席會，沒有想到這是北大自己的籌委會。我就說，“我也是社科院的學生啊。”因為柴玲剛開始說我爸爸是北大的，沒有說我。我說，“我也是社科院的學生啊，我也不光是北大家屬。”“誰也不許來，誰也不許來！”我出來還挺氣的。後來她解釋，說這是北大的籌委會。這是我見到北大籌委會的情況，包括當天下午認識封從德。我還不斷地送來條子。二十三日下午，送條子給他們，說希望他們建立北京高校聯席會議，下面設各部，這是主要兩個建議。他們說，“各部我們已經設了。聯席會議呢，我們現在不準備搞，北大現在自己還忙不過來。”然後才告訴我說，“已經都熬了兩夜，七十幾個小時沒睡覺。”我說，“那你們在幹什麼？我想的第一個就是，你們是不是在做和政府你來我往的這個交手的？”“不是，就是在內部的。”我說，“你們內部怎麼會花這麼長時間？”當時這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學生組織開始的一個印象。

他們當時非常發愁的是，我們這個組織裏邊怎麼能扼制個人野心，最發愁的就是這個事。我當時跟他們說，“包括中南海西門靜坐，都是搬的文化革命的經驗。咱們一共就這麼點經驗。”我說，“據我對文化革命的了解，最好的就是各系從基層選舉。”這是我給他們提的建議。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最後起了作用，因為四月二十五日他們果然就是各系派代表了。我說一個系至少要來兩個代表，要有代表性。這是二十三、二十四日北大籌委會的印象。

四月二十四日我有一段時間沒在，因為柴玲問我“能不能找到戴晴？”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去見了戴晴。。回來以後他們就告訴我二【以上第 37 頁】十四日的那個會，當時張志勇上去以後，熊焱搶話筒，說，“張志勇是特務。”一下子那個會場就亂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去的時候，柴玲和封從德在那兒，我把那個請徐四民辦報的那個建議也跟你們提了。當時你還說，“你這個建議非常好。我

們已經發了電報了。”我說，“你發什麼電報啊？”他說，“發電報請他來啊。”我當時心想（我沒說）：你怎麼那麼笨哪，發電報請他來有什麼用呢？祇要這個建議逼得共產黨不得不承認的話，他自然就會來了。他們確實發過這個電報。（封從德插：是作家班發的。）再說社科院。我在北大老在他們接待處，老在那提建議，我就挺不甘心的，打電話跟我們學校聯繫。我們學校說，“哎呀，我們學校現在已經改選了。前邊那個研究生會領導運動不力，所以我們現在改選了。”我說，“我在這邊了解情況。”他們說：“那太好了！你在那邊做聯絡員。”我先打電話找我們的女生，然後，又找到改選以後的學生。所以二十五日我再找柴玲的時候，就說“我現在已經是我們學校的聯絡員了，不是家屬來給你提建議了。”然後我就問她有沒有各校聯席會議。柴玲告訴我，有專人知道要開各校聯席會議的事，她要幫我問時間和地點。可是同時北大在二十五日上午又收到北航和清華發來的一個召開聯席會議的一個通知，是早上八點還是九點開，收到的時候卻已經是十一點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收到通知再開也開不成了。當時不止一個學校要出面組織，柴玲提到的是政法、師大一塊準備要召開的，這個通知是北航準備要聯着清華一塊要召開的。所以當時各校都在主動地組織。這是當時我的一個印象。（常勁：祇有北大是被動的。）

四月二十四日我有一段時間沒在，因為柴玲問我“能不能找到戴晴？”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去見了戴晴。。回來以後他們就告訴我二【以上第37頁】十四日的那個會，當時張志勇上去以後，熊焱搶話筒，說，“張志勇是特務。”一下子那個會場就亂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去的時候，柴玲和封從德在那兒，我把那個請徐四民辦報的那個建議也跟你們提了。當時你還說，“你這個建議非常好。我們已經發了電報了。”我說，“你發什麼電報啊？”他說，“發電報請他來啊。”我當時心想（我沒說）：你怎麼那麼笨哪，發電報請他來有什麼用呢？祇要這個建議逼得共產黨不得不承認的話，他自然就會來了。他們確實發過這個電報。（封從德插：是作家班發的。）再說社科院。我在北大老在他們接待處，老在那提建議，我就挺不甘心的，打電話跟我們學校聯繫。我們學校說，“哎呀，我們學校

現在已經改選了。前邊那個研究生會領導運動不力，所以我們現在改選了。”我說，“我在這邊了解情況。”他們說：“那太好了！你在那邊做聯絡員。”我先打電話找我們的女生，然後，又找到的改選以後的學生。所以二十五日我再找柴玲的時候，就說“我現在已經是我們學校的聯絡員了，不是家屬來給你提建議了。”然後我就問她有沒有各校聯席會議。柴玲告訴我，有專人知道要開各校聯席會議的事，她要幫我問時間和地點。可是同時北大在二十五日上午又收到北航和清華發來的一個召開聯席會議的一個通知，是早上八點還是九點開，收到的時候卻已經是十一點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收到通知再開也開不成了。當時不止一個學校要出面組織，柴玲提到的是政法、師大一塊準備要召開的，這個通知是北航準備要聯著清華一塊要召開的。所以當時各校都在主動地組織。這是當時我的一個印象。（常勁：祇有北大是被動的。）

北大是被動。我四月二十四日就去說，“你們北大要組織各校聯席會議。”我印象特別深，北大接待處一個挺年輕的學生就說，“嗨，北大著什麼急啊，他們哪兒組織聯席會議敢不給我們留席位！”這是非常典型的。我是說一般的學生是這樣。後來我總覺得北大有這種心態。〈參：2.7.4 北大對高聯的態度〉

四月二十五日，我在那兒等柴玲幫我打聽聯席會議的情況。她一會兒就說，不行，大概要在五點鐘。又說是清華在準備和政府有一個談判，我就到清華去了。到清華，政府來第一次通知，要跟學生談判，清華沒有去。清華沒有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覺得，我們自己這麼去對話，不是等於拋棄了其他院校嗎？特別是為什麼不請北大，這不是明擺著看咱們清華好欺負嗎？當時有這個情緒，覺得我們清華軟還【以上第38頁】是怎麼著，我們清華不去。另外一個，是有人主張對話，但是又派不出代表。這樣他們當時就說，如果這樣的話，那就是當時那個籌委會領導不力，無力再領導下去了。這樣，就沒去。又說要討論，討論來，討論去，大概是從下午兩點還是到幾點。北京市那邊就說，不對話了，學生沒有對話的誠意。

四月二十五日，我在那兒等柴玲幫我打聽聯席會議的情況。她一會兒就說，不行，大概要在五點鐘。又說是清華在準備和政府有一個談判，我就到清華去了。到清華，政府來第一次通知，要跟學生談判，清華沒有去。清華沒有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覺得，我們自己這麼去對話，不是等於拋棄了其他院校嗎？特別是為什麼不請北大，這不是明擺著看咱們清華好欺負嗎？當時有這個情緒，覺得我們清華軟還【以上第38頁】是怎麼著，我們清華不去。另外一個，是有人主張對話，但是又派不出代表。這樣他們當時就說，如果這樣的話，那就是

當時那個籌委會領導不力，無力再領導下去了。這樣，就沒去。又說要討論，討論來，討論去，大概是從下午兩點還是到幾點。北京市那邊就說，不對話了，學生沒有對話的誠意。

就這樣在清華那來回好幾次，最後決定在那個禮堂旁西邊的大階梯教室裏邊開選舉會。所以二十五日那天下午，為什麼我去了兩個多小時，那個四百人班代表大會才開呢？就是他們在反復爭論之後，重新關上門，說是要重新選舉，不承認原來那個籌委會了，或是原來那個籌委會全體辭職了。

二十五日下午，我從清華那兒出來以後，到你們北大文史樓，正好你們選舉出結果來。我在那兒看幾個名字出來，然後接著就是封從德上去講話了，我在外邊聽不見。我一看選完了，就說“好，選完了趕緊叫柴玲出來。”沒想到說還沒完呢，還得接著討論呢。我看見王丹也上去了，封從德也上去了。〈參：1.3.4 北大籌委會的改組〉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同時北大在開各系代表會，是一個小教室，看著門非常嚴的。清華是開一個大的代表會，在清華禮堂旁邊一個大的階梯教室，這就是我後來到處介紹的，他們那個四百人的班代表大會。這就是清華的民主。他們那個班代表要拿著自己本班同學的簽名，本班同學認可你是班代表，簽名過半數，那就放你進來。所以，我的一個印象就是，好象清華同學非常重視你有沒有代表性，一開始這個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好象就很強。然後在那重新選舉，列出名單。我一看人家開會開得很好，而且在那一步一步進行的，我就出來了。因為著急想知道晚上那個會，我就跑出來。四月二十五日柴玲告訴了我時間、地點，我就去開北高聯第一次各校代表會。

四月二十五號北高聯第一次各校代表會是在政法大學六樓。政法大學教學樓主樓是五層樓平著，六樓當中多出這麼一小塊，祇有一個很窄的樓梯上去，一個大教室。當時還是很緊張的氣氛呢，一個一個對。一去看見我們學校另一個同學在那，他說：“你來了，太好了。”這樣，我們學校等於來了二個人，也就認可了。開會沒多一會兒，就非常緊張，說“馬上得疏散，到三樓去。因為好象政府知道咱們在這兒開會。萬一堵在這裏，這個小樓梯咱們擠不下去。”“疏散到哪兒？”“疏散到三樓，大家拿好學生證。我們有糾察報信，一報信我【以上第39頁】們就馬上疏散，就說你是政法大學的學生在這兒上自習。”當時那氣氛特緊張，覺得象地下工作一樣。

四月二十五號北高聯第一次各校代表會是在政法大學六樓。政法大學教學樓主樓是五層樓平著，六樓當中多出這麼一小塊，祇有一個很窄的樓梯上去，一個大教室。當時還是很緊張的氣氛呢，一個一個對。一去看見我們學校另一個同學在那，他說：“你來了，太好了。”這樣，我們學校等於來了二個人，也就認可了。開會沒多一會兒，就非常緊張，說“馬上得疏散，到三樓去。因為好象政府知道咱們在這兒開會。萬一堵在這裏，這個小樓梯咱們擠不下去。”“疏散到

哪兒？”疏散到三樓，大家拿好學生證。我們有糾察報信，一報信我【以上第 39 頁】們就馬上四散，就說你是政法大學的學生在這兒上自習。“當時那氣氛特緊張，覺得象地下工作一樣。

我當時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這個會宣佈了高聯常委，有北大、清華、民族學院、電影學院、政法、師大，還有一個人大，共七個。清華的好象沒去，北大是王丹去的，電影學院馬少方，民族學院是石翁。第一次全體代表會通知的院校可以說還是相當齊的，到的代表人數還是相當多的。到三樓那個教室以後坐不下，大家就坐在桌子上，而且黑板前邊也都站了一圈，當時是覺得人很多。介紹常委時，我記住常委院校，沒記住人名。記住的人名，主要就是王丹，吾爾開希和周勇軍。（刪七十 字。）

【張倫：高聯最早的七個常委的學校是怎么定的？是根據當時現場參加的那些人定下來的，還是根據學校的大小來定的？

王超華：因為我當時不是常委，據我所知是二種情況，一個是根據院校大小，一個是根據主動參加的人。根據院校大小，象清華一開始的時候就不止一個人去，就是說清華從一開始就不是確定一個人的。象人大實際上也是去過二個人。可是象師大、政法和北大，基本上一開始就是王丹、吾爾開希、周勇軍。這還不是最典型的，因為這三個學校還是大學校。象電影學院和民族學院，我的一個印象就是有點因人而設的那個意思。

張倫：就是說這七個學校，是在二十五日第一次那個北高聯會上就定了，是吧？

王超華：是的。

封從德：那么，四月二十三晚上圓明園會議的那些代表是怎么來的？

王超華：圓明園會議我沒參加，我是聽說的。

封從德：劉燕可以講一講嗎？

劉燕：那個事情你應該問開希。

張倫：這個事情我覺得要列入這次會議要查證的內容。據劉剛寫過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在最後分頭離開北京的時候我看過。在圓明園會議上，我看到的記得那個名單上有：丁小平、吾爾開希、少江，好象有郭海峰，我記不清楚了，反正是一個各校的聯席會。

劉燕：超華剛才提到“七高校”中間民族學院的石翁是挂虛名的【以上第 40 頁】，那個確實是這樣。我們學校一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晚上才成立我們學校自治聯合會。在這之前我們沒有任何組織，石翁完全是自薦，他自己就出去了。

劉燕：超華剛才提到“七高校”中間民族學院的石翁是挂虛名的【以上第 40 頁】，那個確實是這樣。我們學校一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晚上才成立我們學校自治聯合會。在這之前我們沒有任何組織，石翁完全是自薦，他自己就出去了。

張倫：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在二十三日晚上圓明園會議的時候有二十一個學

校的代表。

劉燕：可是，石翁這個人的影響很大。

王超華：再補充一下關於石翁。為什麼我說我有掛虛名那些印象呢，就是因為二十五日晚上開會，沒有選舉常委或者大家發表意見這個過程，是上來就宣佈常委院校是誰是誰。後來有的常委曾經說過：有石翁非常好，因為他是個藏族，共產黨可能不是很輕易的碰他。】

四月二十二日追悼會之後回來的游行路上，大家就已經在那喊：“通電全國，立即罷課。”回來以後好象自然就都罷課了。在我們學校基本上就是這個情況，我估計一般的非主要院校也是這樣的情況，並不是等高聯再又下了一個什麼通知才正式罷課的。所以當時我們一般的一些非主要院校都想知道罷課下一步該做什么。高聯成立後下一步做什么呢？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要組織一次游行。這是四月二十五日晚上。

1.5.3 決定四二七游行〈參：1.6.8 關於四二七游行〉

當時做的一個決定，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要游行。同時我們就已經知道，今天晚上有重要廣播。從六樓搬到三樓時，已經知道當天晚上有重要廣播。一會兒又出去，再回來就說：“上邊來電話，這次的原則是‘三不’，不打，不抓人，不什麼。所以咱們就游行，不要緊的。”一會兒說，休會，一會兒又進來說，“上邊來電話了，呆會兒有重要廣播。”所以，那些中、小院校意見紛紛。我當時一個重要印象就是：這常委行啊，有內線。（沈彤插：四月二十七日游行的決定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出來之前作的。四二六社論是四月二十五日廣播的，在這個廣播之前做的決定。）

對，是這樣。廣播之後同學們非常緊張，說“那我們還要不要游行？”“還要游行，但是還是那三條，如果堵截不是特別厲害的話，就衝出去繼續游行，堵截非常厲害，就在校內游行，要是校內控制也【以上第41頁】特別厲害，就在各校絕食，原地絕食。”後來，我們就說，“你們大學校有大操場，你們可以原地絕食。我們那小學校一共五百人，一共就倆人在那絕食的話，那……？”後來就說，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這是對付四二六社論，因為本來光說是有重要廣播，大家都覺得這是中央對學運的態度，而且剛說那“三不”，所以都覺得四二七游行沒什麼問題，一聽這殺氣騰騰的社論，都非常緊張。二十五日的代表會基本上就這樣。

對，是這樣。廣播之後同學們非常緊張，說“那我們還要不要游行？”

還要游行，但是還是那三條，如果堵截不是特別厲害的話，就衝出去繼續游行，堵截非常厲害，就在校內游行，要是校內控制也【以上第41頁】特別厲害，就在各校絕食，原地絕食。”後來，我們就說，“你們大學校有大操場，你們可以原地絕食。我們那小學校一共五百人，一共就倆人在那絕食的話，那……？”後來就說，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這是對付四〇二六社論，因為本來光說是有重要廣播，大家都覺得這是中央對學運的態度，而且剛說那“三不”，所以都覺得四〇二七游行沒什麼問題，一聽這殺氣騰騰的社論，都非常緊張。二十五日的代表會基本上就這樣。

因為那會我老發言，我老覺著他們光顧著那些大院校。所以一散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中小院校來找我了。沒兩天就把我補常委，可能有這個原因。根據四月二十五日代表會的決定，四月二十六日早晨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還是在政法大學。因為我覺得既然我是本校代表和聯絡員，完了以後，我就回到我們學校去了。回到我們學校匯報以後，另一位代表就不願意再來，說太遠了。這樣另外兩個同學陪我來，說他們想來北大看大字報。但是到了二十六日早上，祇有其中一個人跟我再到政法大學去。基本上我是堅持在那兒，給我們學校傳消息。到了六樓以後，這也是我對高聯工作不滿意的，我問當時宣佈的主席周勇軍：“你準備發言了嗎？”他說，“你看看吧。”寫的就那兩篇紙，大概一共沒有五行字，特別亂。我說，“這馬上就開記者會了，你怎么就寫這麼點？”可是他馬上就把這個要回去了。果然在下邊開記者會的時候，念得頭頭是道的，我在那拿著個小本記，一下記了兩篇，覺得好象他剛才沒有拿這麼多東西啊。

周勇軍就是這樣的。北高聯很少有文字材料，象那天張伯笠拿的那個東西。一共找半天就找到高聯一個請願書，跟這個很有關係。他其實有好多發言都沒有書面材料。（封從德插：當時機構不健全，沒有秘書處。）沒有秘書處，沒有自己的宣傳。四月二十六日早上九點鐘在政法大學主樓前開記者招待會。這個記者招待會的形式是，糾察在前邊圍成一圈，各校代表坐在樓門前邊的臺階上，七個常委，一個半圓形站在那兒，對面就是那些外國記者，圈外才是法大的那些同學。周勇軍在會上向記者宣佈，名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吾爾開希解釋就是十個字，也不是北京市，也不是聯合會，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宗旨也是十個字，但是次序我記不太清楚了，是“自由、民主、科學、法制、人權”。

這個法制的制是哪個制還爭來著，就【以上第42頁】是 要用哪個制更能代表我們的宗旨。這都是周勇軍宣佈的內容。（沈彤：反正北大最後印出來的傳單是制度的制。）我也不能肯定了，確實是爭論了一下。周勇軍在那做主席的時候還特別強調了要照憲法辦事，我們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憲法的一個總體範圍內。然後就是答記者問。學生代表坐在常委後邊。答問的時候，大家覺得最糟糕的就是

民族學院的這個石翁，最後大家都在那竊竊私語，說言多語失，快點叫他別說了，差不多就行了。要不然就叫王丹答吧，他還是比較機靈的，剩下的人都不太行。我們在這不停地嘯咕，周勇軍他們很快就停了，不答問了。（刪一百八十字）這之後，就說都趕緊上樓接着開代表會，討論四二六社論出來以後，我們這個游行怎麼辦？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說昨天晚上不是都討論過了嗎，第一步，第二步……。可是，這幾個常委還是非常緊張。還講了一下財務。然後香港的同學來了。這事我後來跟他們核實過，確實在四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全體代表會之前，香港同學已經見過開希他們了。香港同學是秘書長陶君行、李蘭菊，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共是四個人，他們說來調查這個運動。李蘭菊當時也說：“如果確實是個民主運動的話，我們就準備支持。”然後說，“我們香港學聯是本屆亞洲學聯的主席，我們支持學運是很有經驗的，臺灣的學運我們也支持過，南朝鮮的學運我們也支持過，基本上這些支持都是成功的。我們本來訂的明天的飛機票，但是我們要晚走，如果政府鎮壓你們明天的行動，我們就在北京靜坐、絕食，馬上跟香港聯系，叫香港支持。”然後就把他們的地址給了我們，說：“你們找到任何一個亞裔的留學生，都有可能幫你們聯系到我們香港學聯，我們就□

周勇軍就是這樣的。北高聯很少有文字材料，象那天張伯益拿的那個東西。一共找半天就找到高聯一個請願書，跟這個很有關係。他其實有好多發言都沒有書面材料。（封從德插：當時機構不健全，沒有秘書處。）沒有秘書處，沒有自己的宣傳。四月二十六日早上九點鐘在政法大學主樓前開記者招待會。這個記者招待會的形式是，糾察在前圍成一圈，各校代表坐在樓門前邊的臺階上，七個常委，一個半圓形站在那兒，對面就是那些外國記者，圈外才是法大的那些同學。周勇軍在會上向記者宣佈，名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吾爾開希解

釋就是十個字，也不是北京市，也不是聯合會，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宗旨也是十個字，但是次序我記不太清楚了，是“自由、民主、科學、法制、人權”。（這個法制的制是哪個制還爭來着，就【以上第 42 頁】是要用哪個制更能代表我們的宗旨。這都是周勇軍宣佈的內容。（沈彤：反正北大最後印出來的傳單是制度的制。）我也不能肯定了，確實是爭論了一下。周勇軍在那做主席的時候還特別強調了要照憲法辦事，我們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憲法的一個總體範圍內。然後就是答記者問。學生代表坐在常委後邊。答問的時候，大家覺得最糟糕的就是民族學院的這個石翁，最後大家都在那竊竊私語，說言多語失，快點叫他別說了，差不多就行了。要不然就叫王丹答吧，他還是比較機靈的，剩下的人都不太行。我們在這不停地嘀咕，周勇軍他們很快就停了，不答問了。（刪一百八十字）這之後，就說都趕緊上樓接著開代表會，討論四二六社論出來以後，我們這個游行怎麼辦？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說昨天晚上不是都討論過了嗎，第一步，第二步……。可是，這幾個常委還是非常緊張。還講了一下財務。然後香港的同學來了。這事我後來跟他們核實過，確實在四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全體代表會之前，香港同學已經見過開希他們了。香港同學是秘書長陶君行、李蘭菊，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共是四個人，他們說來調查這個運動。李蘭菊當時也說：“如果確實是個民主運動的話，我們就準備支持。”然後說，“我們香港學聯是本屆亞洲學聯的主席，我們支持學運是很有經驗的，臺灣的學運我們也支持過，南朝鮮的學運我們也支持過，基本上這些支持都是成功的。我們本來訂的明天的飛機票，但是我們要晚走，如果政府鎮壓你們明天的行動，我們就在北京靜坐、絕食，馬上跟香港聯系，叫香港支持。”然後就把他們的地址給了我們，說：“你們找到任何一個亞裔的留學生，都有可能幫你們聯系到我們香港學聯，我們就

【李蘭菊：我不知道當時香港學聯的意願對北高聯的成立有多少影響，可是我在這裏要說明一下香港學生那個時候的願望。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時候我們已經討論了，我們有一個總體的計劃，就是希望北京的同學馬上組織起來。我們覺得先有一個合法性、代表性的組織，才可以把這個運動繼續下去。哪怕它是給鎮壓了，以後也有一個聯系，還有一個比較有權威、有代表性的組織出來領導這個運動。所以那時我們特別強調北高聯有沒有這個代表性，而且我們回去香港以後要發起捐款，我們也要向市民交代，我們把錢交給這個組織，這個組【以上第 43 頁】織是可以信靠的，是有代表性的。】

【李蘭菊：我不知道當時香港學聯的意願對北高聯的成立有多少影響，可是我在這裏要說明一下香港學生那個時候的願望。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時候我們已經討論了，我們有一個總體的計劃，就是希望北京的同學馬上組織起來。我們覺

得先有一個合法性、代表性的組織，才可以把這個運動繼續下去。哪怕它是給鎮壓了，以後也有一個聯系，還有一個比較有權威、有代表性的組織出來領導這個運動。所以那時我們特別強調北高聯有沒有這個代表性，而且我們回去香港以後要發起捐款，我們也要向市民交代，我們把錢交給這個組織，這個組【以上第 43 頁】織是可以信靠的，是有代表性的。】

1.5.4 為什麼突然取消游行？〈參：1.6.8 關於四二七游行〉

我回家以後接到電話，有人參加了下午人民大會堂的會，說是殺氣騰騰，非常嚴重。這個會是二十六日下午各個大專院校支部書記以上的幹部都去參加的，千方百計要阻止學生二十七日的大游行。我想，最了不起的話，我們學校的人加入北大，到北大的五□四廣場上去絕食嘛。反正高聯說，他要是堵得厲害的話，在本校廣場絕食就是了。再怎么著，我們也是有可能出去的。但是在二十六日夜裏，周勇軍突然發布通知，宣佈取消二十七日游行，我聽到以後，非常想知道當事人是怎麼說的。所以我現在講的二十六日夜裏的事，其中一部分是其他同學告訴我，加上我的印象，主要的一部分是五月六日高聯記者招待會上周勇軍自己講的。

周勇軍講的是，北京市的領導通過他們學校去找他，因為他是高聯的第一任主席，找到他就施加壓力說，明天要出多少軍隊，要鎮壓，你要對這個負責任。他堅持說“這是高聯全體做出的決定，我一個人不能改。”開始他說，不能改。後來他說是“全體”做出的決定，我“一個人”不能改。對方好象抓住這一點，說“那不要緊，你就以你個人的名義說嘛。”說來說去，後來他們說，“你個人想不想對同學的生命安全負責任？”他繞不過這個圈子，也確實覺得壓力特別大，和項小吉煙抽得一屋子都是，他就以個人的名義寫了。然後北京市學聯給他派了一輛車，當時已經是十二點多了，到幾個主要的院校送通知，是他自己簽的名，但是還蓋了一個章。因為我看到一份通知，那是蓋著“祖國萬歲”的章的。“祖國萬歲”這個章是四月二十六號上午說的，高聯沒有自己的章，現在用師大“祖國萬歲”的章代替高聯的章。因為各校校方下午開過會，都大門緊閉，北京市給各校打了電話，說有一個什麼什麼樣的車，這個車到的時候，你們給他開門。各校學生接到這個通知，都覺得這就是高聯的通知。

因為我們學校是要和東郊的幾個院校湊在一起，從大北窯出發，既然我是聯絡員，我就先跑了一趟。我去了以後，聯絡員覺得奇怪，說：“都不游行了，你來幹什麼？”就拿出這個通知給我。我在那的時候，那個大胖子聯絡員就跑回來了：“哎呀，商學院的學生簡直【以上第 44 頁】就要打我出來呀。”他是去通

知西郊的商學院和外語學院的。他說，學生就排隊坐在馬路沿子上：“我們就不信不游行，要是北邊有學院來的話，我們就走。”然後，還不讓他走，說：“要是北邊學校來了，先揍你。”當時各校都想游行。就這樣我還是通知我們學校，說是不游行了。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我們同學見到我還說，人家都說王超華是特務呢，昨天怎麼假傳高聯指示，說取消游行。這是關於高聯四〇二七游行的。四〇二七游行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四〇二七游行回來，我曾經到北大二十八樓去找封從德，他當時是留守的。其實二十六日我還跑去清華煽動過一回，二十七日早晨，我也是先去清華看，看到清華隊伍出來了，我才接著走的。我看到清華隊伍從西校門出來，西校門沒有任何擋的。因為我原來就住在大學區，我知道八七年那會兒，根本頭一天晚上就是校門緊閉，校門外一排摩托車擋著，你根本就別想來回進出。可是在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從北大東校門進出，我就說送孩子去，就把我放進去了。我就把這件事跟封從德說，“今天這個堵，好象是又要堵，又沒有真堵。”你說，“這很重要，這很像是政府的一個陰謀，好像存心把你們放出來一樣。”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的時候，因為我回來的時候有這個顧慮，我就挨學校找，找到吾爾開希跟他說，他說“明天再說，明天到400來再說。”高聯那會兒在師大西北樓400也是一個聯絡站。可是我老覺得好象這事有點奇怪似的，放心不下。

因為我們學校是要和東郊的幾個院校湊在一起，從大北窯出發，既然我是聯絡員，我就先跑了一趟。我去了以後，聯絡員覺得奇怪，說：“都不游行了，你來幹什麼？”就拿出這個通知給我看。我在那的時候，那個大胖子聯絡員就跑回來了：“哎呀，商學院的學生簡直【以上第44頁】就要打我出來呀。”他是去通知西郊的商學院和外語學院的。他說，學生就排隊坐在馬路沿子上：“我們就

不信不游行，要是北邊有學院來的話，我們就走。”然後，還不讓他走，說：“要是北邊學校來了，先揍你。”當時各校都想游行。就這樣我還是通知我們學校，說是不游行了。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我們同學見到我還說，人家 都說王超華是特務呢，昨天怎么假傳高聯指示，說取消游行。這是關於高聯四□二七游行的。四

□二七游行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四□二七游行回來，我曾經到北大二十八樓去找封從德，他當時是留守的。其實二十六日我還跑去清華煽動過一回，二十七日早晨，我也是先去清華看，看到清華隊伍出來了，我才接著走的。我看到清華隊伍從西校門出來，西校門沒有任何擋的。因為我原來就住在大學區，我知道八七年那會兒，根本頭一天晚上就是校門緊閉，校門外一排摩托車擋著，你根本就別想來回進出。可是在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從北大東校門進出，我就說送孩子去，就把我放進去了。我就把這件事跟封從德說，“今天這個堵，好象是又要堵，又沒有真堵。”你說，“這很重要，這很像是政府的一個陰謀，好像存心把你們放出來一樣。”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的時候，因為我回來的時候有這個顧慮，我就挨學校找，找到吾爾開希跟他說，他說“明天再說，明天到400來再說。”高聯那會兒在師大西北樓400也是一個聯絡站。可是我老覺得好象這事有點奇怪似的，放心不下。

到了第二天晚上才開成常委會，我就覺得北高聯反應已經很不及時了。因為政府四□二七晚上就廣播說，我願意跟你對話，為什麼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才開成常委會。常委會上周勇軍沒有出面，北航的幾個人，還有政法的，吵，“你知道我們冒了多大的危險嗎？你來了一個取消的通知，我們帶出去了，別的學校不出去，我們學校這幾百人就是我們負責了。如果我們沒帶出去，別的學校都出去了，我們學校這個組織的威信就都沒有了。”罵得非常厲害。那回就是周勇軍和馬少方辭職了。我不知道馬少方為什麼當時也辭職，周勇軍就是因為這個事辭職。這個常委會是二十八日在政法大樓的六樓平臺上開的。外邊還在吵的時候呢，幾個常委就上樓裏面去了。一會兒，他們出來找我說，“辭職這個事不宣佈了。現在常委有空缺，你願不願意當常委？”我就當上北高聯常委了。【以上第45頁】

1 . 6 補充與質疑

1.6.1 學運之初<參：常勁 1.1.1，沈彤 1.2.1，封從德 1.3.1>

【老木：在胡耀邦剛去世的那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就出現了花圈和學生講演的活動。那么第一次活動是哪些人做的？

張倫：據我所知，四月十五日上午已經出現有花圈。第一，有個朋友他說他親自送的花圈，他說他是第一個。這個人在國內一個重要的公司裏邊的一個重要的辦公室裏邊工作。第二是北京的一些青年女工，最早送花圈。

沈彤：學生的第一次游行，大家都知道是政法。學生的捐款剛才有人提到是四月十七日民主沙龍舉辦的，不是王丹，是民主沙龍在北大開始。所以從那時開始，在北京就有捐款風潮，全北京各地都有。花圈都是從這種捐款點出來的，捐款點跟後來的自治會沒有關係。

老木：政法大學第一次游行，是先到的胡耀邦家，大約下午兩點，抬著花圈和標語。】

張伯笠：我來補充幾句，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你們講的都是組織上的，我講的就是情緒，運動的實況。因為我當時作為一個作家參與這個運動的，是要寫報告文學的，所以從頭到尾的經過，我不僅在參與，而且在記錄。

北大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海子之死。海子大概是在三月份臥軌自殺以後，北大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在那個叫民主科學銅像前，開了一個詩歌朗誦會。這個詩歌朗誦會，大概有四千人參加，這是第一次這樣大的聚會，當然我也參加了。當時有很多北大的人覺得這個孩子是北大的優秀孩子，畢業以後他在政法當老師。他留了一個遺書，這個遺書非常苦悶，就是說沒有出路。這個是北大學潮的一個起源，人們就要思考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是方勵之的一封信，方勵之給鄧小平簽名的一封信，簽名運動，就是釋放魏京生，這是第二個對北大震撼的。【以上第 46 頁】

第三個對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勵之的赴宴。二月份布什請方勵之吃飯，方勵之去了，但是被警察攔住，說是司機違章。用這個非常卑鄙的手法，沒讓方勵之去準時赴宴。方勵之第二天在北大貼出了一個沒有赴宴的經過。這個經過在北大人心中又產生了一種反感：共產黨現在什麼手段都使了。

歷史背景就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建國四十周年這幾個紀念日。

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在整個學生中產生了一種情緒，這是一種契機。第一張大字報，第一首詩，第一個對聯，都是作家班出的，這沒錯。當時，三角地是空白的。“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卻死了。”這是作家班的同學寫的，這批詩是我去貼的。還有“兩夜悼耀邦，風一程，雨一程，長歌當哭送君行。”這是我寫的。我要提幾個事件，因為是總結歷史，所以要按歷史事件去說，我親身經歷的。沒經歷的，我聽說的都不說，我就是保持這個觀點。

柴玲：據我知道是八七年，第一次抓學生的時候，給大家很大的震撼。那個時候，我們都要考研究生。但是聽說學生被捕之後，北大南門前面有一批同學游行，到中南海去營救。那個時候第一次聽說：不要怕輿論，不要怕流血。暑假每一個學生家長都收到一封信，讓家長教育孩子。《人民日報》登了一系列的關於學生的文章：學生很糟，超級消費。整個社會對學生的態度，變成一種“身在福中不知福，專門是禍頭子”。最後，在八八年的時候，學校裏出現了一系列的事件，比如“柴慶豐事件”。在柴慶豐事件的時候，達到了一個高潮。在那個時候，全社會對學生歧視，社會治安也很不穩定。柴慶豐我是認識他的，所以當時大字報中也有我寫的關於他的回憶。而且因為老封的參與，我也從頭到尾看到了特別行動委員會的計劃。還有一次是女排贏了，那時我已在師大了，大家就說找個機會騎自行車大游行，但又沒有口號，沒有綱領，大家就起哄。那整個一種情緒，就是大家都很不滿，但每一次都給壓下去。總要找一個機會發泄，但又找不到機會。“柴慶豐事件”是想往政治方面引，但是這是一個刑事事件，

沒有辦法做文章，祇好壓下來了。所以，為什麼胡耀邦死時，能夠引起一大批同學參與，因為一個是在這之前有一段形勢上的鋪墊；另外是在本身時間上的節奏性。【以上第 47 頁】

老木：補充一下張伯笠提到的那個三十三人簽名。我在簽名的時候，和陳軍、王丹的民主沙龍有過幾次接觸，這接觸是十分危險的，是在警察的跟蹤下。那時我和陳軍進北大進不了，就給王丹關於魏京生、徐文立的一些材料，這是第一次接觸。

我們跟王丹討論過民主沙龍的問題，他說學校不同意合法化。我說，我們一定要合法化，不合法化就無法做事。所以他們就貼了一張大字報。

白夢：我不做補充，我就對北大最早大字報的情況做一個回憶。我簡單地說幾句，我認為可能比較準確。

胡耀邦是四月十五日死的，四月十五日的中午，我們當時正在午休。當時同屋的一個同學正在聽收音機，突然他聽到了哀樂，就把耳機拔掉了，我們就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本人非常熱愛胡耀邦這個形象，當時就下床，在寫字臺上亂畫。後來就寫出來那麼一句話：沉痛悼念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國人民民主和自由事業的巨大損失。我當時就要貼到三角地去，我的一個年齡比較大的同學不讓去，說你在北大少惹事。後來我還是去了，大概是十五號中午二點一刻的時候。（老木插：對不起，我打斷一下。胡耀邦是四月十五日早上死的，但是消息是十五日晚上播的。）我的印象，當時在三角地有兩幅大字報，一幅是“耀邦不朽”，一幅是“耀邦同志，我們懷念你”。這是中午兩點一刻的時候，大概往後就是我們班上一個同學貼了第四幅大字報。

王超華：我一直到四月二十一日才參加運動，但我四月十五日中午就知道有大字報出來，因為我的小孩是在北大南面上學，我們那個帶小孩的阿姨接小孩下學回來就說，“胡耀邦死了，北大已經貼出大字報了。”中午在飯桌上我就說，北大學生這麼早知道消息，一定是有人通消息的，收音機裏還沒有廣播，怎麼大字報就出來了？

我基本上學運開始的時候，頭一個星期都沒有什麼，非常抱歉，我對胡耀邦沒有什麼特別的。

1.6.2 四一七游行（張伯笠）〈參：常勁 1.1.1〉

首先我想講第一次游行的全過程。第一次游行我覺得是種情緒性【以上第 48 頁】的東西。四月十五日我們班全部都投入了，貼了許多大字報和詩，因為我們班詩人很多，我也寫了詩。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又到了三角地。這之前，有幾個教師，他們寫了一個“中國魂”，那個“中國魂”字寫得非常好，“中國魂”底下署名是“北京大學教師及北京大學校友”。這個“中國魂”很大，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就是要今天搞游行。這個思想準備我們是有的，當時就看廣場的情緒。到

了“三角地”一看，人也不很多，三三兩兩地大概能有十幾個人。這個時候，常勁那個樓和南邊的女生樓打起來了，打起來就罵。我就去看，那個女生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說要游行了。這個時候王丹出來了，王丹說怎麼辦？因為那時已經聚集了大約三百多人，大家就說：游行。王丹說：游就游。我們在校園游。我就說：在校園游有什么意思，要游我們就到天安門。王丹說：這個大家怎么看。大家說：同意。我一看人很少，我就說：這樣，先在校園游一圈，人就出來了。然後就準備在校園游。剛說完這句話，在四十八樓四樓就扔下了這個“中國魂”，“刷”地下來，上面扯著。在底下我們就把它拽過來，就抬出去游。

首先我想講第一次游行的全過程。第一次游行我覺得是種情緒性【以上第48頁】的東西。四月十五日我們班全部都投入了，貼了許多大字報和詩，因為我們班詩人很多，我也寫了詩。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又到了三角地。這之前，有幾個教師，他們寫了一個“中國魂”，那個“中國魂”字寫得非常好，“中國魂”底下署名是“北京大學教師及北京大學校友”。這個“中國魂”很大，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就是要今天搞游行。這個思想準備我們是有的，當時就看廣場的情緒。到了“三角地”一看，人也不很多，三三兩兩地大概能有十幾個人。這個時候，常勁那個樓和南邊的女生樓打起來了，打起來就罵。我就去看，那個女生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說要游行了。這個時候王丹出來了，王丹說怎麼辦？因為那時已經聚集了大約三百多人，大家就說：游行。王丹說：游就游。我們在校園游。我就說：在校園游有什么意思，要游我們就到天安門。王丹說：這個大家怎么看。大家說：同意。我一看人很少，我就說：這樣，先在校園游一圈，人就出來了。然後就準備在校園游。剛說完這句話，在四十八樓四樓就扔下了這個“中國魂”，“刷”地下來，上面扯著。在底下我們就把它拽過來，就抬出去游。

【白夢：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北大當時走出校園的主要情緒可能是受到了政法大學的影響，政法大學下午已經到了廣場。當時三角地有許許多多的人，我當時也在那兒，當時有一個消息從廣場傳回來說政法大學在今天下午已經在廣場舉行了游行，說是有將近二千人，下午四點多到達廣場的。然後在三角地一下子就亂起來了，因為這之前大家主要是在看大字報，人們在互相傳抄，互相議論，有個別人在發表演講。在這個時候這個消息傳回來，北大的同學一下子就有點激動。有一個同學就站到那個櫥窗上面就喊：“人家政法大學已經到廣場了，北大人死光了嗎。”這是十七日第一次游行。就認為北大應該是第一個游行，現在政法已經游行了，到廣場送花圈了，我們北大怎麼辦？大家一下就激起來了，

剛好就在很激動的時候，從二十八樓四層樓的窗口上吊下了“中國魂”這個大挽幛，就是廣播站那個樓。我記得當時好象是郭海峰喊了一句：“掛到紀念碑上去。”這個時候人們都在喊：“到廣場上去，掛上紀念碑。”那挽幛是掛在窗口，有二個同學就去拽，我當時剛好在樓跟前，我也去拽了。上面不放，於是就給硬扯下來了。拉下來之後，就是剛才伯笠講的那一段，當時打著挽幛【以上第 49 頁】

在前面走的可能是伯笠、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王丹走在最前面中心象個領導人似的。】

【白夢：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北大當時走出校園的主要情緒可能是受到了政法大學的影響，政法大學下午已經到了廣場。當時三角地有許許多多的人，我當時也在那兒，當時有一個消息從廣場傳回來說政法大學在今天下午已經在廣場舉行了游行，說是有將近二千人，下午四點多到達廣場的。然後在三角地一下子就亂起來了，因為這之前大家主要是在看大字報，人們在互相傳抄，互相議論，有個別人在發表演講。在這個時候這個消息傳回來，北大的同學一下子就有點激動。有一個同學就站到那個橋窗上面就喊：“人家政法大學已經到廣場了，北大人死光了嗎。”這是十七日第一次游行。就認為北大應該是第一個游行，現在政法已經游行了，到廣場送花圈了，我們北大怎麼辦？大家一下就激起來了，剛好就在很激動的時候，從二十八樓四層樓的窗口上吊下了“中國魂”這個大挽幛，就是廣播站那個樓。我記得當時好象是郭海峰喊了一句：“掛到紀念碑上去。”這個時候人們都在喊：“到廣場上去，掛上紀念碑。”那挽幛是掛在窗口，有二個同學就去拽，我當時剛好在樓跟前，我也去拽了。上面不放，於是就給硬扯下來了。拉下來之後，就是剛才伯笠講的那一段，當時打著挽幛【以上第 49 頁】在前面走的可能是伯笠、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王丹走在最前面中心象個領導人似的。】

第一個經過的樓就是那個吵架的女生樓三十一樓，我們就提出“救救女同胞”。因為有一個老太太管著女生，晚上十一點以後就不許出來，怕談戀愛。這時候要救這個女生樓，怎麼辦呢，女生要出來，我們去了很多男生，就把女生樓

的大門給踹開，這是第一次革命。踹開以後，女生就出來了，隊伍就越來越大，然後就順著北邊四十八樓、四十六樓轉了一圈，然後就出來了。

出來剛要走到人大的時候，張炳九老師把我們攔住了。前面走著我和郭海峰，我們扯著“中國魂”一邊一個角，白夢當時在郭海峰這一邊，王丹和丁小平就在前面走。這時候，張炳九說：“同學們你們不要游行，你們如果游行出去以後，趙紫陽就完了”。我知道他是一個“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當時我說：“他是新權威的人，我們不要理他。”張炳九當時就要下跪，眼淚都出來了。我就把他扶起來，說：“張老師，你最好先到邊上冷靜一下。”其實我是想，他冷靜以後，我們隊伍就過了。但他不冷靜，郭海峰就踢了他二腳，把他踢出了游行隊伍。然後游行隊伍接著往前走，走到人大的時候，這個隊伍邊跑邊喊：“人大下來，人大下來。”人大的在裏面喊：“北大的同學，我們跟著你們。你們等一會兒，我們要穿衣服。”因為那時很晚了。我們說：“不能等。我們前面走，你們後面跟吧。”

這個時候，隊伍走到前面白石橋拐彎路口的地方，第一次發現警察，大概有一百多警察。我就趕緊到前面跟警察說，“我們就到天安門，你們能不能允許我們過去。你們不允許，我們就衝。”警察說，“我們沒有接到不允許過去的命令，我們祇接到我們在這裏站著。”我說：那咱們就過。

快到天安門時，我就覺得這事不好辦了。到天安門我們幹什麼，這個不清楚，所以我就把王丹叫過來，說：“王丹，我們到天安門幹什麼？”王丹說：“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們提議到天安門。”我說：“咱們得提幾個條件。”當時我就想起三條：第一條是胡耀邦，我是說一定要把住這個。為胡耀邦評價是非功過；第二條是新聞自由；第三條是增加教育經費。

到了廣場以後，這時候大概四點多鐘，郭海峰非常靈活，他就上【以上第50頁】了紀念碑。紀念碑上有一個格，他上去以後我們把“中國魂”遞給他，然後扯過來，大家在那裏照相。然後郭海峰說：“剛才有的同學提出來了三條。我想大家補充一下，看能夠補充出多少。”於是出現了七條。這七條當然有幾個改動，就是關於我提的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的問題有過改動，還有一個關於為八七年反對自由化時的公民平反。通過以後，我們基本上有一個東西了，我們知道明天應該做什麼了

到了廣場以後，這時候大概四點多鐘，郭海峰非常靈活，他就上【以上第50頁】了紀念碑。紀念碑上有一個格，他上去以後我們把“中國魂”遞給他，然後扯過來，大家在那裏照相。然後郭海峰說：“剛才有的同學提出來了三條。我想大家補充一下，看能夠補充出多少。”於是出現了七條。這七條當然有幾個改動，就是關於我提的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的問題有過改動，還有一個關於為八七年反對自由化時的公民平反。通過以後，我們基本上有一個東西了，我們知道明天應該做什麼了

第二天，十七日早晨的時候，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的門前。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前，沒想到學生已經走了好多，都去看升旗去了，有的買早點去了，坐在那兒的大概有二百人左右。坐在那兒我們就選代表，讓郭海峰和王丹代表學生去人民大會堂。這個時候我就告訴王丹，我們勢單力薄，馬上跟家裏打電話。王丹說祇知道李淑嫻的電話，我說那也可以。王丹就安排人把電話打進去了，不知道誰打的。肯定打了二次，據說第一次沒有打通。第二次說李淑嫻知道了，隊伍馬上就要來。

我們坐在這個地方很餓了，旁邊的人裏就有第一批捐款出現，往我們這兒扔面包、扔煙卷，大家就抽。這時出來一個工人，他說他是業餘教師，說你們這種行為是非常沒有理性的，現在不是很好嗎？教育經費也有所提高。當時我拿著個面包正吃著，聽了後很激動，也很憤怒，我就把手中的面包撇過去了。打得很準，打在他的鼻子上，然後他就下去了。這時候，王丹和郭海峰就進去了。進去不多久，出來一個信訪局副局長接待我們。我說不夠級，這個級別不夠。最低不低於人大代表、常委來接待我們。

1.6.3 四二〇慘案

第二個問題是四月十九日到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前的二次暴行。四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我們有準備。當時我那個宿舍有很多人，當時就把我的床單扯下來，寫了二個字“絕食”，這是鄭義臥在地下寫的。寫完以後，我就偷偷地帶到新華門，就是後來白夢和數學系的那二個人扯的那個床單。

我到後面、前面都看了，後面的工人往前拱，就是要衝擊新華門，有很多鞋扔進去了。當時進到新華門的人，我發現沒有出來。我當時就懷疑是中共特務幹的事。因為這鞋有很多絕對不是學生的，他們【以上第 51 頁】搶別人的鞋扔，不是扔自己的鞋，這是事實。扔了一會兒大家就散了，人很少了。那個時候白夢和數學系的那個學生就在那兒征集簽名，扯著床單，底下有一個條，說：絕食的來簽名。

我到後面、前面都看了，後面的工人往前拱，就是要衝擊新華門，有很多鞋扔進去了。當時進到新華門的人，我發現沒有出來。我當時就懷疑是中共特務幹的事。因為這鞋有很多絕對不是學生的，他們【以上第 51 頁】搶別人的鞋扔，不是扔自己的鞋，這是事實。扔了一會兒大家就散了，人很少了。那個時候白夢和數學系的那個學生就在那兒征集簽名，扯著床單，底下有一個條，說：絕食的來簽名。

這是十九日，那天就打了。在兩點多鐘，人大回去了，有客車送他們回去。我們沒有走，有三百多人。這個時候，警察就出來了，大約是四點鐘了，廣播車一廣播，說你們應該回去睡覺，現在要清場。這個時候警察就在廣場上開始打人了，數學系的那個同學就讓人用腿給頂了一下，床單也給甩一邊去了，這是十九日凌晨的事，被打的數學系的同學把床單一放就跑了。當時我也跑，我領著另外一個學生，跑得都是很狼狽，就跑回去了。

二十日早上也是同樣，當時警察在半夜的時候就採取了措施，切斷了新華門跟外面的聯系。當時裏面切斷了有二百多人，其中北大的最多。我當時也被切在裏面，因為我有一個鐵路記者證，我說：“我家裏老婆有病，我得回去。”他說：你可以從六部口走。那時還沒有開始打，我就從六部口出去了。出去後，我就繞到東面，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吾爾開希，吾爾開希在那兒發表了煽動性非常強的演講。

開始打的時候，我們就往廣場撤退，撤到紀念碑底下，就被打散了。到第二天早晨，我順天安門轉過來，被警察抓到了。當時我聽天安門城樓底下那個黑洞裏面被抓的正被打得直喊。我非常害怕，因為騎車又沒有別的地方可走，後來他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鐵道報的記者。我路過這裏，我是上早班，我是早班編輯。”他說：“早班編輯？”就摸我的口袋，發現了汽水和面包，他說這肯定是晚上就在。他說：“我告訴你，我知道你是記者，今晚你肯定在這兒。我告訴你，你不要參與，沒你好果子吃。”，然後踢了我一腳，就讓我走了。我當時挺高興的，趕快騎車走了。可四周都是警察，沒地方可走，到新華門前面的時候，已經全是警察了。那個交警很好，說：你往那邊走。我又繞到南邊，從六部口繞到北大。

我剛到北大，彭嶸他們就回來了，在一個大卡車上。因為在北大門口，他的車路過我，我就聽車裏面喊：警察施暴。下車以後，我問彭嶸怎麼回事，彭嶸就拿著一塊玻璃，這麼大一塊玻璃，那上面有這麼大一塊血。他說：這是血的罪證。怎麼辦？我說：那咱們就遊行吧。把全校同學都喊起來。當時我定了十六個字：警察施暴，毆打學生，然後是全國罷課，如何如何。大約是二十日凌晨五點鐘。然後我和【以上第 52 頁】彭嶸從北大大門口進去，從西邊研究生樓開始喊起，喊了一圈。

我剛到北大，彭嶸他們就回來了，在一個大卡車上。因為在北大門口，他的車路過我，我就聽車裏面喊：警察施暴。下車以後，我問彭嶸怎麼回事，彭嶸就拿著一塊玻璃，這麼大一塊玻璃，那上面有這麼大一塊血。他說：這是血的罪證。怎麼辦？我說：那咱們就遊行吧。把全校同學都喊起來。當時我定了十六個字：警察施暴，毆打學生，然後是全國罷課，如何如何。大約是二十日凌晨五點鐘。然後我和【以上第 52 頁】彭嶸從北大大門口進去，從西邊研究生樓開始喊起，喊了一圈。

張倫：十九日晚到二十日凌晨打人，我是目擊者。十八日打了第一次，我祇是聽說。四、五點鐘就開始清場。六、七百學生分離在離新華門二百多米的方
地方，有的 陸續回廣場，有的原地不動。這個時候，吾爾開希出來（張伯笠：而且非常勇敢），穿一身軍裝，跳出來，（沈彤：腦袋上打了一棒吧？張伯笠：沒有。他跑的時候 是坐三輪車，在上面還喊。）他說：“我來給同學們警告說，裏面的同學被堵在裏面，我們在外面，不能讓他們感到孤單。我們要組織起來支援裏邊。我來喊口號，大家跟我喊。”於是，就這麼開始組織起來，堅持了很長時間，他又不斷地演講。然後他要求有人出來，跟他一塊組織。在他沒有要求之前，劉剛就站了出來。然後 就應吾爾開希的要求，又有一個工人站了出來。到了凌晨時，我找了個人把劉剛找了出來，因為周圍全部是便衣，明目張膽，帶著步話機，看得很清楚。劉剛的情況 很特殊，我以後可以專門介紹，他沒有固定的住宿，他要是失蹤了的話，朋友們都不會知道下落。但是剛剛撤出來，警察就從東邊過來，就要開始打點。這時我們就 完全被打散了。打，用的是銅頭皮帶和皮鞋。（張伯笠：有一個女孩被打懵了，就喊：打倒共產黨。）這個我不清楚。這場面非常有意思，人被打散一次，往回聚一次，又打散一次，又往回聚一次。打了幾個周折，才被全部打散。一部分人堵到南池子裏去了。（張伯笠：那天警察特別多，打得直叫。）吾爾開希最早是被幾個小 伙子架在脖子上，往外跑，然後再上三輪車，警察一下子就把長安街封了起來。劉剛後來對我講，在廣場他們成立了“行動委員會”，這可能對後來開的“圓明園會議”、北高聯成立都有關係。（張伯笠：我認為當時成立不可能，因為警察追著打。）在廣場演講，重新在紀念碑下集合起來。開希後來也跟我講過這件事。

1.6.4 四二二悼胡集會（柴玲，張伯笠）<參：封從德 1.3.3 王超華

1.5.1>

【柴玲：我再補充一些。在運動中，我感到有幾次讓大家最有彼此心連心的感覺。四月二十二日的時候，就是那次大家在大會堂門外等著開追悼會，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去了。包括我以前的一個朋友，他是【以上第 53 頁】一個黨員，我們之間總是合不來，他是非常黨性化的一個人，非常反對游行。我八七年元旦時在外面等同學被釋放回來的那個時候，他都覺得你們學生好好讀書，開這些幹什麼？但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時候，我就在游行隊伍中間看到他們，而且還有當時一批非常黨性，很正規，循規蹈矩的一批人。

【柴玲：我再補充一些。在運動中，我感到有幾次讓大家最有彼此心連心的感覺。四月二十二日的時候，就是那次大家在大會堂門外等著開追悼會，很多

很多的朋友都去了。包括我以前的一個朋友，他是【以上第 53 頁】一個黨員，我們之間總是合不來，他是非常黨性化的一個人，非常反對游行。我八七年元旦時在外面等同學被釋放回來的那個時候，他都覺得你們學生好好讀書，鬧這些幹什麼？但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時候，我就在游行隊伍中間看到他們，而且還有當時一批非常黨性，很正規，循規蹈矩的一批人。

在情感上最深的一層是，當時同學們說，如果再等半個小時沒有消息的話，就衝大會堂，而一衝大會堂，跟武警很快就要造成流血衝突。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出來跟大家前後聯絡，讓同學們再等半個小時，再等幾分鐘，我進去看看。當時我拿著一個喇叭，其實根本就沒有聲音。我衝到前面，前面的同學跟士兵肉貼肉地站在一起，中間隔著一條繩子。當時，我就拿著喇叭幹喊：“能不能讓我進去和裏面的代表交流一下，把消息帶出來？”說不可以。後來他們就找那個官。那個官笑著說：“不行，不行。”我後來猜想，他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就在那個時候，同學們一浪一浪涌上來，我就不得不拿著那個喇叭再向裏面喊。我說：“大會堂裏面的政府官員們，請你們聽聽同學們的呼聲。同學們已經饑餓了，從昨天晚上至今已十八個小時。現在因為饑餓，疲勞，情緒已非常激動。我們不希望發生流血衝突，因為解放軍也是人民子弟兵，我們不要骨肉相殘。”這時我們嗓子都啞了。後來一個解放軍主動遞給我一個後面傳來的水壺，當時我特別感動。我喝完了水，馬上又把水壺趕快還給他們。我想“解放軍也是人民子弟兵，我們不要骨肉相殘。”我們一直一直都在喊，沒有任何人給我們任何回話。這時裏面也可能是在下跪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哭了。那個時候，我看有的解放軍也哭了。再回到同學中，大家都激動得很，那個情緒就是很不一樣，這時北大充滿了騷動。當時最大的擔心就是，如果一旦軍警衝過來，或出現什麼騷動，這麼幾萬人，光是人跑，也象四一九那樣人跑的那個時候，光踩就踩死一大片。這將是我們學生運動的一個巨大恥辱，是自殘。所以那個時候就讓北大學生拉起手來，最後老封一聲令下，說撤。大家一衝出警戒線以後，就和平地帶出了這個場地。我之所以提解放軍和當時的這種情緒，因為我想，後來解放軍的態度是很不一樣的。】

【張伯笠：人民大會堂前面的那個警戒線當時是怎麼個情況呢？隊伍進來，北京大學是最後來的，但是它隊伍最整齊，王丹在中間還【以上第 54 頁】拿著錄音機，錄音機放著是國歌和國際歌。當時我跟趙體國是糾察隊的負責人，所以後來北京大學整個挪動隊伍是我指揮的，前面就有一個糾察線。因為北京大學面對著紀念堂，後來中央來了二個人跟我談，他們說：我們這兒要放車，你們必須讓開，必須給我二十米的地方。北京大學是很聽話的，說為了能把這個紀念活動搞得平穩下去，我們見到胡耀邦的靈柩就撤回去，我們同意。然後一個隊伍一個隊伍地動，當時很難，從三點鐘開始動，到天亮五點鐘，基本動完了。北大

坐好以後，可是突然人民大學和其它小大學跑我們前面去了。我們跟這些學校中間有一個十米的寬闊地帶。這個地帶中間有楊濤、吾爾開希、封從德、郭海峰，還有楊丹濤、趙體國，還有那個拿大喇叭的彭嶸，還有常勁。當時要這些隊伍閃過去，讓北大面對著紀念堂。因為北大的隊伍最大，後邊是清華，北大面對著紀念堂能形成一個壓力。可是這些隊伍不幹，不閃。這時候解放軍進來了，吾爾開希就跟我說：不行，你們還要往後退，我們都要往後退。因為他們怕解放軍了。我說：不能退，你們只能閃。因為我們已經留下來了，你們到前面來了以後，你們面對解放軍，解放軍來了你們又害怕了，讓我們再往後退。我說：這不能動，這隊伍已經太大了。所以就沒有動成。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要衝擊大會堂，這個人是一個留著胡子的北大的研究生。吾爾開希贊成這個觀點，說：我看可以。然後我說：美國那樣民主的國家還不能衝國會呢。這是國會，況且今天這個時候是悼念胡耀邦，如果衝了很危險。吾爾開希說：我贊成。當時封從德手裏拿著一卷紙，這個紙就是請願書。後來我說：不行就衝進去，跪那兒請求。吾爾開希說：我不能跪，不願意給共產黨跪。這當時有爭論。這時候郭海峰說：你不跪，我跪。從他手裏就把那卷紙搶過來了，衝進去，然後就跪下了。

【張伯笠：人民大會堂前面的那個警戒線當時是怎麼個情況呢？隊伍進來，北京大學是最後來的，但是它隊伍最整齊，王丹在中間還【以上第54頁】拿著錄音機，錄音機放著是國歌和國際歌。當時我跟趙體國是糾察隊的負責人，所以後來北京大學整個挪動隊伍是我指揮的，前面就有一個糾察線。因為北京大學面對著紀念堂，後來中央來了二個人跟我談，他們說：我們這兒要放車，你們必須讓開，必須給我二十米的地方。北京大學是很聽話的，說為了能把這個紀念活動搞得平穩下去，我們見到胡耀邦的靈柩就撤回去，我們同意。然後一個隊伍一個隊伍地動，當時很難，從三點鐘開始動，到天亮五點鐘，基本動完了。北大坐好以後，可是突然人民大學和其它小大學跑我們前面去了。我們跟這些學校中間有一個十米的寬闊地帶。這個地帶中間有楊濤、吾爾開希、封從德、郭海峰，還有楊丹濤、趙體國，還有那個拿大喇叭的彭嶸，還有常勁。當時要這些隊伍閃

過去，讓北大面對著紀念堂。因為北大的隊伍最大，後邊是清華，北大面對著紀念堂能形成一個壓力。可是這些隊伍不幹，不閃。這時候解放軍進來了，吾爾開希就跟我說：不行，你們還要往後退，我們都要往後退。因為他們怕解放軍了。我說：不能退，你們祇能閃。因為我們已經留下來了，你們到前面來了以後，你們面對解放軍，解放軍來了你們又害怕了，讓我們再往後退。我說：這不能動，這隊伍已經太大了。所以就沒有動成。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要衝擊大會堂，這個人是一個留著胡子的北大的研究生。吾爾開希贊成這個觀點，說：我看可以。然後我說：美國那樣民主的國家還不能衝國會呢。這是國會，況且今天這個時候是悼念胡耀邦，如果衝了很危險。吾爾開希說：我贊成。當時封從德手裏拿著一卷紙，這個紙就是請願書。後來我說：不行就衝進去，跪那兒請求。吾爾開希說：我不能跪，不願意給共產黨跪。這當時有爭論。這時候郭海峰說：你不跪，我跪。從他手裏就把那卷紙搶過來了，衝進去，然後就跪下了。

張倫：你說那個最早的警戒線拉的時間大概是什麼時間？

張伯笠：三點鐘開始拉的。】

1.6.5 關於王丹

封從德：我還有一個問題。四月十九日北大籌委會成立。我和熊焱被籌委會派到廣場去，和清華同學接觸。我們沒有接觸上，後來就【以上第 55 頁】回來了。那是四月二十日凌晨。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血案，因為我們被堵在外面。我們回來過後，大概是在凌晨四點多，我在三角地遇見了你，你和幾個同學在那裏看大字報。當時沈彤給我們提供了兩個情況，一是你讓我“小心王丹這個人”；第二個是你說有一輛小汽車開來，幾個穿風衣的人貼了一張對王丹的大字報。請你具體解釋一下。

封從德：我還有一個問題。四月十九日北大籌委會成立。我和熊焱被籌委會派到廣場去，和清華同學接觸。我們沒有接觸上，後來就【以上第 55 頁】回來了。那是四月二十日凌晨。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血案，因為我們被堵在外面。我們回來過後，大概是在凌晨四點多，我在三角地遇見了你，你和幾個同學在那裏看大字報。當時沈彤給我們提供了兩個情況，一是你讓我“小心王丹這個人”；第二個是你說有一輛小汽車開來，幾個穿風衣的人貼了一張對王丹的大字報。請你具體解釋一下。

沈彤：關於王丹，當時有兩個問題。我剛才一直強調王丹沒有參與四月十七日那個捐款活動，就是因為我經過調查清楚，他沒有財政問題。我提醒你關於

王丹的問題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我確實知道民主沙龍捐款捐到了三百多塊錢，是送花圈的。實際上花圈沒有花那么多錢，錢到哪裏去了我不知道，但是楊濤還有幾位副部長以個人名義保證王丹一點沒有參與這個錢。這個錢到哪裏去了，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第二個原因是交“七條”時，跟宋世雄、王兆國，團中央那些人見面的時候，據見面的其他幾個代表通過張智勇對我說，王丹表現非常不好。王丹同出來接請願書的三位人大代表說：“你們就出去見見學生，糊弄糊弄他們就完了。”因為這兩個原因，我向你提到這個

關於那個小轎車，當時有一張大字報寫得很工整的，關於王丹貪污、游行時人大會堂門前他跑得比誰都快，什麼什麼的。然後有一輛車，開到學三食堂和電教樓中間，下來幾個穿風衣的，就把這貼上。這些問題我本來是懷疑的，確實是別人告訴我的。但是我一看這些人顯然不是學生，而且我們當時質疑他們是誰，他們很快就走了，而且都是很有組織的。我們看到這個，當時就有人要撕。後來我們就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動學運的機會，就是政府在裏邊破壞。所以我們就在旁邊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們看見的整個經過是怎麼一回事，就說這完全是造謠的。實際上我個人本身對這些問題本身就懷疑。

封從德：記得當時你跟我說：王丹、楊濤他們是結成一幫的，他們要來控制籌委會。是不是？還有個孟召強，他們幾個一幫進入了籌委會。

沈彤：王丹和楊濤以民主沙龍名義參與籌委會，實際上跟我們的情況有點兒相似。一個是他們社團本身，因為有建制的社團在校園裏很少，這你都清楚。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後來四月二十日的時【以上第 56 頁】候退出，也是同樣的原因，就是覺得這種其他個人情緒化的參與進來的，跟我們已經有組織建設、組織經驗很長時間的，實際上是搞不到一起去的。我在講話的時候提過，王丹和楊濤在這之前的兩個組織見面的時候就提到過，如果有這類組織的話，應該是民主沙龍去領導，其他各個有默契的社團是不參與核心層的。我們後來強烈加入了小平拒絕，是因為我看到象常勁，象熊焱這些個人也加入進來，就是說，唯一參與方式就是作為籌委會的代表。當時二十日早晨他們退出，實際上是在我預料之中，因為他們覺得沒法控制。

沈彤：王丹和楊濤以民主沙龍名義參與籌委會，實際上跟我們的情況有點兒相似。一個是他們社團本身，因為有建制的社團在校園裏很少，這你都清楚。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後來四月二十日的時【以上第 56 頁】候退出，也是同樣的原因，就是覺得這種其他個人情緒化的參與進來的，跟我們已經有組織建設、組織經驗很長時間的，實際上是搞不到一起去的。我在講話的時候提過，王丹和楊濤在這之前的兩個組織見面的時候就提到過，如果有這類組織的話，應

該是民主沙龍去領導，其他各個有默契的社團是不參與核心層的。我們後來強烈加入，丁小平拒絕，是因為我看到象常勁，象熊焱這些個人也加入進來，就是說，唯一參與方式就是作為籌委會的代表。當時二十日早晨他們退出，實際上是在我預料之中，因為他們覺得沒法控制。

封從德：是不是說奧林匹亞研究院和民主沙龍是在學運之前就有矛盾？在四月十九日成立北大籌委會的時候，兩個組織暗中就已經有衝突？

沈彤：奧林匹亞科學院和民主沙龍一向合作比較好，我要強調不僅是我們兩個組織，還有另外三個，未名劇社、五四文學社等等，衝突是在我跟王丹之間。兩邊的例會都是我這邊的助手去他們的，然後，楊濤、孟召強和高什么，他們來我們這邊。所以是我跟王丹之間的問題，不是兩個組織的問題。

封從德：四月十九日籌委會成立的時候，你們兩個組織是不是在暗中互相有矛盾？

沈彤：沒有，沒有。當時矛盾是出現在哪？是因為王丹拒絕我個人加入，本來丁小平說了後，大家都沒有附議，大家都覺得我加入沒問題。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候，王丹個人說：“不要加入了。”所以衝突就開始了。

沈彤：四月十八日晚上，我跟我們奧林匹克科學院的一個人去新華門的時候，已經有五位同學在新華門前開始絕食，而且當時打出旗幟絕食。

白夢：這件事我可以證實，不是五位，是兩位，一個是北大數學系的，我現在把名字忘了，和我兩人，旁邊是圍觀的。【以上第 57 頁】

沈彤：當時王丹和楊濤都在新華門前，也就是說民主沙龍并不是以領導者的形象出現的。楊濤當時跟我說，他們民主沙龍對當時的運動是採取觀望的態度。我知道四月十七日他們提出了“七條”，所以，這也是我後來四月十九日晚上跟你說懷疑王丹的一個原因。

封從德：第二個問題，四月十七日是不是發動過一次捐款？我記得有一個桌子和一個臉盆。

常勁：是王丹他們。但不是王丹做的。

封從德：還有一個問題，王丹退出北大籌委會，他是正式退出還是沒有？因為我記得大概在初期的一個晚上，我曾經勸過他：“如果你經常不來開會，我們就要開除掉你。”這個肯定是真的。勸了之後，第二天他又來了。這是什麼時間我忘了。

常勁：我都不知道王丹是怎么進去的。因為當時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他們在外面，王丹他們中午從廣場上回來，他很泰然地和楊濤親自跑到我們那個宿舍裏頭，告訴丁小平說：“我們現在宣佈我們民主沙龍退出。”

沈彤：四月二十日早上的會他沒參加。所以丁小平覺得有點勢單力孤的，我去了是自然而然的，後來張志勇去了，就加入了。

1.6.6 張智勇

沈彤：剛剛常勁提到，就是另一部分北大隊伍去了哪兒了？張志勇一路上一直反對到廣場，可是到了廣場以後，張智勇把一半的游行隊伍帶到了廣場的

西北角，和周勇軍等一些人在大雨之下就要成立北京市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的游行我沒有參加，常勁提到了。

劉衛：另外一個問題，常勁講到張智勇被開除，為什麼？【以上第 58 頁】

常勁：一個是因為我們聽說他是叛徒，當時很早就有人告訴我們這個消息了。第二個就是張智勇當天晚上，沈彤說他在廣場另外一側和周勇軍他們商量成立全北京高聯的事。他根本沒有跟我們這兒打招呼，所以造成趙體國、沈彤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回去以後我們向大家報告這個事情，大家都覺得挺生氣的。第二天一開始就把他換掉了。

封從德：張志勇是什麼時間吸納進入籌委會的？誰擔保的？

常勁：張志勇是由熊焱擔保的。他是在第二天早上自己把名字簽在我們籌委會簽名的名單的下面了。

沈彤：這裏有另外一段。張志勇是在新華門前面跟熊焱一起回來。當時我們會正散呢，你們還在開。我們到三角地，就是政府貼的攻擊王丹的大字報都出來的時候，那是另外一段了。張志勇、熊焱和我們商量，我跟熊焱說這樣根本沒有意義，因為我最早是跟你和熊焱說過我們準備集體加入，但是被丁小平後來也包括王丹拒絕了。熊焱就建議我跟張志勇都加入進來。第二天早晨我們兩個都去了。但是我根本就沒有問題，大家自然而然地都接受了。後來熊焱才擔保張志勇進來。

封從德：張志勇被開除是什麼時候？

常勁：張志勇被開除是四月二十三日早上。

封從德：為什麼？

常勁：“四二〇游行”是一個事，四月二十二日他做糾察，把整個隊伍帶亂了。

封從德：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他在學生會競選過秘書長。我們整個懷疑他是研究生會或是團委派來的。【以上第 59 頁】

常勁：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他又把隊伍給帶亂了。北大進去以後不是亂一陣子嗎？當時是張志勇在那兒帶著糾察隊走的。所以大家都懷疑他來在裏頭搗亂，第二天早上就把他開除了。

1.6.7 吾爾開希是怎麼選出來的？

封從德：吾爾開希是怎麼選出來的？

常勁：這個吾爾開希他自己談過，開始他並沒有被選出來，他是完全是自己貼出大字報說是北師大自治會。

劉燕：吾爾開希，那是他自己掛名的。

沈彤：因為這樣，師大開始集會之後，北大不是有三角地嗎，師大也開始集會。然後集會之後沒有人講話，後來旁邊的一個宿舍樓，在喊，師大都陽萎了。這時候吾爾開希站出來講話。

王超華：西北樓，318 就在西北樓前面。

封從德：當時是二十幾號？

沈彤：那是二十一，二號吧。之後，他自己貼出一個大字報，他說，現在師大成立自治會籌委會，象北大一樣，吾爾開希是主席。

劉燕：那是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在師大。

常勁：就是說他的威信建立得比較早了。在四月十八號他參加了那些活動以後，四月二十號學生去游行。二十號那天下大雨，他自己站在 3.18 紀念碑那裏，他自己站在那裏，一個人也沒有。他自己在雨裏開始做講演。然後找了一大幫人，然後拉到廣場區。然後四月二十二號，他到了廣場以後，他就以他的這個所謂的代表的身分召集所有的會議。【以上第 60 頁】

【封從德：梁二，你提到在學運初期的時候，開希、張軍曾經成立一個籌委會這樣的組織，還提到一個雛形辦公室。你能確切講一下是什麼時間，為什麼要成立一個籌委會？

梁二：籌委會成立的時間是在二十一日。我是二十日早晨挨的打，二十日下午，我和張軍帶著隊伍到人大去游行。二十一日我們就正式開始成立一個臨時辦公室，早上九點就開始正式辦公了。

封從德：你提到開希作主席，你作副秘書長。這是什麼時候？是怎么形成的？

梁二：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們召開了一個全校各系自治會的代表大會，當時還沒有主席職稱。開始選舉了吾爾開希和張軍，我祇是作為系自治會的代表去的，我並沒打算繼續參加學運。在那天，我聽到一些師大青年教師的勸說，我就決定加入并取得了一定的作用。我利用最初三個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的權力和開希和張軍說，我願意自薦當副秘書長，希望征得大會代表的同意。然後他們同意了。主席的選出我不知道是怎樣選舉的。我遲到一點時間，他已經成為主席了。張軍說，“我希望當秘書長。”也同意了。後來的構架就是，我是副秘書長，開希是主席，張軍是秘書長。然後就由我們三個人開始建立各部。

封從德：你提到開希見記者，是由師大內部決定的。為什麼？怎樣決定的？

梁二：四月二十三日從廣場回來之後，我們正式建立了一個構架，開始有了一個分工協作，開希代表師大進行對內和對外聯絡。對內主要是指各高校，對外主要是對新聞媒介。在那個時候，我和張軍就決定團結一致，避免分歧。因為二十四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我們要保持單一的領袖形象，那就是開希。為什麼選開希呢？因為他的感性魅力比我們強，而且他的演說能力也比我們強。開希這人有時候有點兒華而不實。而且他跟師大研究生的聯繫還是通過我和張軍進行的，他以前在師大的活動是相當少的，他跟教育系還有【以上第 61 頁】點關係，我覺得我們兩人跟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可能比開希好

一點。還有，當時開希確實在廣場上，在新華門示威的時候已經奠定了他在整個北京市市民和學生中的影響，他的感性形象和勇氣已經感化了許多人。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無法與他比擬的。】

梁二：四月二十三日從廣場回來之後，我們正式建立了一個構架，開始有了一個分工協作，開希代表師大進行對內和對外聯絡。對內主要是指各高校，對外主要是對新聞媒介。在那個時候，我和張軍就決定團結一致，避免分歧。因

為二十四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我們要保持單一的領袖形象，那就是開希。為什麼選開希呢？因為他的感性魅力比我們強，而且他的演說能力也比我們強。開希這人有時候有點兒華而不實。而且他跟師大研究生的聯繫還是通過我和張軍進行的，他以前在師大的活動是相當少的，他跟教育系還有【以上第 61 頁】點關係，我覺得我們兩人跟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可能比開希好一點。還有，當時開希確實在廣場上，在新華門示威的時候已經奠定了他在整個北京市市民和學生中的影響，他的感性形象和勇氣已經感化了許多人。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無法與他比擬的。】

1.6.8 關於四二七<參：封從德 1.3.5 王超華 1.5.3>

封從德：北高聯決定四二七游行是在知道四二六社論之前，就是說，并不知道四二六，就已經決定了游行。

王超華：對。

沈彤：我們北大是有兩個新聞中心派了一個代表。他在高聯決定四二七游行之後，打電話通知北大，通知之後，才知道有社論。

王超華：我為什麼這麼說，就是因為先決定了游行以後，社論一發，大家說，這麼橫，對，這個社論這麼橫，大家就楞了。然後趕緊提補救措施。才提出那三條。這就是我補的那個，就是說是罷課了。那麼，我們要組織一個各校聯合組織，以後做什麼呢？第一件就是組織大游行。

沈彤：新聞中心在哪段時間，四月二十五號正式選出籌委會，北大籌委會下設 12 個部長。包括柴玲，蔡堅，等等。四二五，我們選出之後，高聯開的那個會決定四二七游行，北大是積極準備的。後來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後，北大的五個人籌委會，是在四月二六號上午決定是否北大參加。這個時候就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北大自治會是否服從高聯的領導。最後的結論是，北大自治會有自治權。那時候建議高聯作為協調性組織，而不是領導組織，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因為後來聽說了，聽到了四二六社論之後高聯的反應，所以就覺得高聯的領導如果是這樣沒有延續性的話，所以才提到北大是不是自己自治，也就是說，自己有一定獨立權的問題。

王超華：你怎麼理解沒有延續性？【以上第 62 頁】

沈彤：就是說，你本來說是要游行，北大就開始組織，我們傳單印刷都開始了，機器都動起來了。之後，又說這些補救措施。當時因為我們的新聞中心已經來了很多知識分子，還有很多青年教師，就開始建議，各種建議都有。我們也不清楚是高聯的建議，還是這些人的建議。有很多人自稱是高聯的。尤其是到廣播站那地方，我房間是廣播站，很多人為了進廣播站，他們什麼都說。這個我們記得很清楚，就是四月二十六號上午，北大決定北大應該有自主權的。北大

自己決定了組織游行就游行，不組織就不組織。那時對游行不游行有一定的爭論，所以，四月二十六號下午，在三教召開了一個各系分籌委代表大會，投票決定北大是否游行。當時我和封從德，孔慶東，王尺英都是主張不游行的。當時最擔心的就是王丹了。就是覺得王丹肯定是要游行。但是在投票的時候，我是盡量建議，建議各系分籌委不要游行。孔慶東，王尺英基本上沒說話。但是在最後投票的時候，封從德投了游行的票，就是說是和王丹投在一起。但是大會的投票結果還是不游行。

這時候，我就聽說四月二十六號晚上，高聯在清華有個會，而且清華有代表來，跟著王丹到了北大三角，說，高聯決定游行。這時候，各系分籌委，包括各部，他們都在，又選了一次，通過游行。這個決定之後，我們就是按照游行準備了。再這同時還有另外一步，就是上面與學生接觸的問題。在四月二十五號我們被選舉出來以後，當時的籌委會就決定過，開始與校方接觸，通過校方建立對話渠道。當時是我和孔慶東，就是籌委會的召集人，和校方接觸。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團系統的人開始加入進來。大家都知道張乃武，這是各校團書記裏面很重要的一個人，他明顯是同情學生。但是他們建議，就是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建議北大籌委會不要游行。這是一個條件，如果北大不游行，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將以正式的方式幫助學生和政府之間搭橋。所以這也就是後來北大籌委會下面的各部，甚至有人提出來我們是叛徒。再這之後，基本是兩方面，一個是大會，系大會決定游行，另外一個是我和孔慶東等於是代表學生和校方做了一個協議，所以這才出現了四月二十七號早晨，我們又開緊急會議。

我就說，鑒於現在的情況，我們游行到雙榆樹，回北大。原因呢，就是我們祇要是出了校門，就把鄧小平的高壓政策打破了。但是我【以上第 63 頁】們為了給校方留下今後對話的餘地，我們不影響市區內的一切活動。所以出了校門，到了雙榆樹的意義也就是說，到了人大。而且當時我們幾個人都說要釘住王丹，說王丹，你到時候一定不要反悔。王丹說，我不會的。所以四二七，北大的領導層包括王丹在內，都沒有主張再往前走的。四二七最後形成全市大游行是其他學校的功勞，不是北大的。

我就說，鑒於現在的情況，我們游行到雙榆樹，回北大。原因呢，就是我們祇要是出了校門，就把鄧小平的高壓政策打破了。但是我【以上第 63 頁】們為了給校方留下今後對話的餘地，我們不影響市區內的一切活動。所以出了校門，到了雙榆樹的意義也就是說，到了人大。而且當時我們幾個人都說要釘住王丹，說王丹，你到時候一定不要反悔。王丹說，我不會的。所以四二七，北大的領導層包括王丹在內，都沒有主張再往前走的。四二七最後形成全市大游行是其他學校的功勞，不是北大的。

【封從德：四二七游行的之前，你們決定不讓我出去的原因是什麼？

沈彤：是這樣，因為當時幾次籌委會會議，包括四月二十六日晚上那個擴大會議，也就是各系分籌委加上十二部部長和秘書處的會，王丹都沒有到會。後來王丹到會唯一說的就是高聯在清華開會了，他帶了高聯的幾個代表過來。我們當時都有同樣的感覺，就是王丹一直是在校外活動的，常勁剛才已經講了，根本不管內部的運作。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又開會的時候，王丹又沒有到，但是王丹游行是肯定去的。而且我們三個人覺得封從德本來是同意不游行的，於是在我們籌委會五個人表決之後，封從德表示服從籌委會的決定，王丹沒有表示。那么在四二六晚上的那個會上，封從德又完全支持游行，他自己已經講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知道出了校門之後都是情緒化的。如果祇有一個王丹，那么我們籌委會以集體形式否決王丹的決定，還是有可能在雙榆樹走回來的。但如果再要封從德幫閑的話，那就不可能了

封從德：但是這裏邊有一個原則問題，就是北大籌委會的常委是否要服從擴大會議的決議。

沈彤：這事我們下面可以討論。但是有一點，我、王遲英跟孔慶東在事前是沒有商量過的。據柴玲補充的那一部分來看，我現在記起來了，我接到周勇軍的那個條子之後，找不到你，先給孔慶東看了，孔慶東到當時臨時由楊濤主持的那個廣播電臺，就是從我宿舍搬到中間的那一部分，準備宣佈不游行，沒有廣播成。然後孔慶東說為了保持我們當時的決議，就是游行到雙榆樹，臨時就在我們開會中間提出來的，我跟王遲英基本上是附議的。【以上第 64 頁】

柴玲：一，我不記得中間大家已同意不游行。二，二十七日晨，孔慶東去楊濤廣播站，想以個人名義下令北大不許游行，楊濤不同意。孔慶東就說：我撤你的職。這時老封過來，大家表決，還是決定游行。三，鄧林的朋友傳達鄧林的消息：問學生對鄧小平的看法，具體是什麼要求，還說“老頭子身體不太好，會氣昏過去”，希望不要敵對起來。四，那天北大原官方學生會不服罷免，打著北大校旗在隊伍前頭亂帶。

沈彤：補充四二七周勇軍的決定。擴大會通過（游行）之後，當晚我與孔慶東作了許多準備。同時，那天晚上我與孔慶東第三次與校方及團委接觸，商量時，提出搞校園靜坐。之後回 28 樓：印刷、籌委會、廣播站（當時暫由楊濤負責），都在燒文件。三、四點鐘或四、五點鐘，我從校長哪兒回來，吾爾開希到了北大：校方跟我說了，如果你們不出校門，什麼都好辦。我是第一來北大的，希望我說服北大不上街，若你同意的話，下面聯系清華。五大院校不出去，游行就不成了。開希就走了。可是第二天，北師大第一個，開希又寫了遺書什麼的，衝了出去。

王超華：關於清華。

知道四二六市委開會之後，我去過北大。當時聽說北大決議不游行，我每天仍去北大，仍每天見到你們，然後去清華。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北高聯已分好路線，大學校不出校就麻煩了。去清華一看，說組織又癱瘓了，貼標語說：“到北大去！”“清華祇有懦弱的領導，沒有懦弱的學生。”好象自己沒有辦法了。當我聽他們辯論說：清華哪怕出去十分之三，……結果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清華一拉出校門，隊伍是相當長的。】

【劉燕：四二六晚上那個社論出來之後，我不知道別的學校怎麼樣，我們學校但時是出去了，我們學校當時至少有六百人的隊伍，在九點鐘以後出去了。

我們到了人大，人大歡迎我們歡迎得好厲害，人大很多學生跟我們加到一起，可能有兩千人。四月二十七日早晨的時候，我們學校出來很早，到了我們校門口那個足球場，當時祇有三百人要出去。王正雲就過來，我記得很清楚，他跟我說：北高聯有人說【以上第 65 頁】不拉出校園，要在學校靜坐。王正雲說他到了人大去看，人大也是在靜坐，也沒有出來。我們兩個學校出去完全是因為有人報信說：北師大已經從北太平莊那邊出來了，我們二個院校才出來。我是說，周勇軍那個蓋著“祖國萬歲”的通知，肯定發到很多中小院校。所以四二七游行我是覺得當時北高聯起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東西都是學生自發和市民自發的。這個因素太大了。】

【劉燕：四二六晚上那個社論出來之後，我不知道別的學校怎麼樣，我們學校但時是出去了，我們學校當時至少有六百人的隊伍，在九點鐘以後出去了。我們到了人大，人大歡迎我們歡迎得好厲害，人大很多學生跟我們加到一起，可能有兩千人。四月二十七日早晨的時候，我們學校出來很早，到了我們校門口那個足球場，當時祇有三百人要出去。王正雲就過來，我記得很清楚，他跟我說：北高聯有人說【以上第 65 頁】不拉出校園，要在學校靜坐。王正雲說他到了人大去看，人大也是在靜坐，也沒有出來。我們兩個學校出去完全是因為有人報信說：北師大已經從北太平莊那邊出來了，我們二個院校才出來。我是說，周勇軍那個蓋著“祖國萬歲”的通知，肯定發到很多中小院校。所以四二七游行我是覺得當時北高聯起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東西都是學生自發和市民自發的。這個因素太大了。】

1.6.9 北大新聞導報（沈彤，張伯笠）

（1）新聞導報與三步計劃（沈彤）

當時我是反對《新聞導報》出版的，因為當時有籌委會請徐四民來的那個建議，而且“奧林匹亞科學院”八個人，加上楊國忠，在當時的廣播站抄寫各校大字報，和各校聯絡，還有我們也跟楊丹濤一起負責講演團等等一系列工作，

人手已經很緊。但是“奧林匹亞科學院”另外兩個人堅持要在四月開始辦《新聞導報》，而且是一份獨立的報紙，絕對不能是籌委會的報紙。可以是新聞中心的報紙，但不能是籌委會的，不能是北高聯的。目的是第一要把運動引向一個比較理性的方向，另外，這跟我下面要講的八九年整個運動的“三步”計劃有關係的，就是要在運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校園民主建設階段，出現獨立的輿論制衡力量。基於這兩點，在我們新聞中心內部的每天晚上例會的時候通過北大新聞導報創刊。當時直接捐給我的捐款比較多，籌委會五個成員都有比較多的捐款，但是因為廣播站在我們那邊，我得到的捐款比較多些。

《新聞導報》第一期祇印了五百，不到六百份。但是第一期剛剛從印刷機出來的時候，正好是我主持第一個記者招待會，周培勝是新聞發言人。我就把《新聞導報》在四月二十六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面發給了當時在場的五十多家新聞單位，所以《新聞導報》真正在北京各高校學生讀到之前，已經通過外電、內電和報紙報導出去了。這就是《新聞導報》一開始就名氣很大的原因。實際上各地都有類似的刊物，北京也有一些小刊物，雖然組織上沒有這麼嚴密，但是我覺得外面對《新聞導報》的評價是過高了。

我一直提到的這個“三步計劃”，是在第二次我們組織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來的。當時楊濤接替了周培勝作為北大籌委會的新聞發言人，這次也是比較大的，是在北大的一個教學樓裏面召開的這個記者招待會。我跟楊濤在這之前已經商量好的，在回答問題過程中間提出了“八九民運”的三大步，第一步是形式化運動，包括罷課、遊行、請願、示威、要求與政府對話，甚至到絕食；第二步有兩個內容，第一是校園民主建設，當時我們的用詞是把以北京為中心的各大校園建設成民主堡壘。當時我們有自治會，有宣傳工具，有廣播電臺等一系列的建制，當時封從德也在準備學生憲章，開始普選。不光是北大，各校也都有，北大是帶頭的。封從德昨天提到過。第二步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派出三人一組的宣傳隊。當時劉衛在長沙也接待過，我們派到過西安等很多城市去。希望各個城市的各校，更廣泛的是各個社會階層開始他們自己的政治覺醒意識，以他們自己的政治訴求走上街頭。這是我們避免救亡運動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各界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第三步是在第二步北京的學運程序化，民主化的鞏固和各地、各階層民運興起的基礎之上，利用建國四十周年，也就是秋天“十一”這個機會，重新走上街頭，真正開始一個全國的大的民主運動，推進中國的民

主化進程。這是當時我們所說的。

我一直提到的這個“三步計劃”，是在第二次我們組織的記者招待【以上第 66 頁】會上提出來的。當時楊濤接替了周培勝作為北大籌委會的新聞發言人，這次也是比較大的，是在北大的一個教學樓裏面召開的這個記者招待會。我跟楊濤在這之前已經商量好的，在回答問題過程中間提出了“八九民運”的三大步，第一步是形式化運動，包括罷課、游行、請願、示威、要求與政府對話，甚至到絕食；第二步有兩個內容，第一是校園民主建設，當時我們的用詞是把以北京為中心的各大校園建設成民主堡壘。當時我們有自治會，有宣傳工具，有廣播電臺等一系列的建制，當時封從德也在準備學生憲章，開始普選。不光是在北大，各校也都有，北大是帶頭的。封從德昨天提到過。第二步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派出三人一組的宣傳隊。當時劉衛在長沙也接待過，我們派到過西安等很多城市去。希望各個城市的各校，更廣泛的是各個社會階層開始他們自己的政治覺醒意識，以他們自己的政治訴求走上街頭。這是我們避免救亡運動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各界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第三步是在第二步北京的學運程序化，民主化的鞏固和各地、各階層民運興起的基礎之上，利用建國四十周年，也就是秋天“十一”這個機會，重新走上街頭，真正開始一個全國的大的民主運動，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是當時我們所說的。

(2) 新聞導報的文章（張伯笠）

北大新聞導報第一期當時是沈彤辦的。我當時對北大籌委會很有意見。第一次參加北大籌委會的時候，郭海峰當時提議，說“你們兩個參不參加籌委會？”我說我不參加，“那麼你當調解員。”那天我監的票，那是第一次。但是後來我看那個組織很亂，我就覺得這個籌委會作用不大。我就想搞點宣傳，於是沈彤就說：“你去搞新聞導報”。結果我到新聞導報，新聞導報才開始不經籌委會領導。

這個新聞導報我從第二期開始辦起，一直辦到絕食。新聞導報當時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組織了很多很有份量的文章，比如說：《人民日報》的歷史功績》，列了《人民日報》幹了哪些混蛋事，“反右”期間發表的社論等等。這是針對“四二六”社論的。還有《軍隊勤王的後果》，歷史上從唐朝開始，軍隊進京產生政變的後果。後來我參加了絕食團，新聞導報就交給了一位姓王的負責。當時新聞導報有八十人，每期發行六千份。我到新聞導報，新聞導報才開始不經籌委會領導。【以上 第 67 頁】

二。低潮與絕食（四二七以後——五一三絕食）

2 . 1 組織與對話：北大與高聯（封從德）

從“四二七”到“五四”我對北大和北高聯的活動作一個提綱。主要講一下對話團與“五四”游行的組織過程。北大向學生會奪權，奪廣播站，辦公室及籌備北大直選的失敗等從略。四月二十九日北大中午的例會上，超華推薦我去北高聯接替王丹。晚上七點，我就跟超華去了。當時有四、五十所學校的一百多名代表。大會上，開希解釋了他下午拒絕參加對話的原因。他主持大會，就象做論文答辯，一有人發言，他就在臺上解釋一通，完全不象個主持人。然後，九點鐘，他就與王丹去香格裏拉開個人記者會，這我們後來才知道。這是違背當時紀律的。那天對話，北大郭海峰去了，引起非議，他還寫了一張大字報解釋。三十日北高聯常委會上，王丹提出做北大的挂名常委；開希沒來，躲了起來。因為他們在記者會後被便衣跟蹤，安全有問題。這樣我就被推選為第三任主席。會上提出各校合法化的問題，超華介紹了清華的班級會議，另外還有北京農工大以宿舍為單位的學生聯席會議，我就介紹了北大研究生會的成功改選，使北大籌委會中的研究生有了合法身分。會上還分析了國內和國際形勢，對學生有利的和不利的。當時，還確定了五月三日正式籌組對話團，各校先選拔對話代表，原則上北高聯與對話團在組織上獨立，以便政府承認對話團是合法代表。〈參：王超華 2.2.1 沈彤 2.3.1〉

五月一日北大籌委會改選，以便五四的需要。當時我對四月二十五日那個改選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有懷疑，而且五人常委班子的效率不太高。於是就由部長會議提出改選，結果是王丹、楊濤、熊焱、常勁與我組成新的五人常委。〈參：2.7.1 北大五一改組〉

會完了，沈彤才來，很生氣，說每次改選怎么沒有我？會下協調，我就建議沈彤與熊焱合作，作為北大代表去籌組對話團。政法大學還有項小吉，他口才很好，是國際談判方面的研究生。五月二日柴玲與趙體國跑了一天，去聯絡鄧琳，結果失敗。（當時想讓老鄧知道，學生是支持改革的，運動并非對他。）〈參：2.7.2 跟官方接觸：北大與鄧琳〉

五月三日上午，我代表北大籌委會見了校長丁石孫，【以上第 68 頁】與校方協調五四活動，因為北大歷來是以五四為校慶日的。結果丁校長說，原定的許多活動取消，包括歷來的新生運動會。他有同情學生的傾向。

五月三日上午，我代表北大籌委會見了校長丁石孫，【以上第 68 頁】與校方協調五四活動，因為北大歷來是以五四為校慶日的。結果丁校長說，原定的許多活動取消，包括歷來的新生運動會。他有同情學生的傾向。

五月三日下午，我主持北高聯特別大會，確定五四游行方案。下午兩點半開始，有四十七校代表，當時非常嚴格地審定了代表資格。當時有四套方案。“北大荒地方案”（北大西門外荒地集會）與二環路“手拉手方案”沒通過，結果大家還是通過了傳統的游行方式。當時，我安排周勇軍作游行組織聯絡人，安排會場等；超華負責起草“新五四宣言”。對話團成立大會就在北高聯特別會之後開，

來了二十三個對話代表，熊焱、沈彤、項小吉都在。會前，我代表北高聯祇講了幾句話：這是你們自己的會，北高聯祇是協助選了代表，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獨立的組織。作了一點建議之後，我就離開了會場。所以對話團和北高聯基本上是獨立的。然後，就是五月三日晚上超華負責起草“新五四宣言”，當時爭論很激烈。

五月四日的游行，我是北大駐高聯的常委，王丹是駐高聯的挂名常委，我們兩個到了廣場後，沒有得到周勇軍派來代表的聯絡，我和王丹找遍了廣場，沒有找到開會的場地。在返回學校的途中，我聽說周勇軍已經宣佈了復課。所以我對復課的過程不是很清楚，雖然在這之前，北高聯是討論過是否要復課，但從來沒有形成決議。所以我認為這個宣佈復課是非法的。回去過後我的心情很糟糕，三次拒絕了CBS的衛星直播的電視採訪。五月六日辭去北大籌委會與北高聯的職務，想回去做論文。〈參：2.7.3 誰做的復課決定？〉

【常勁：另外還有一個細節，就是關於那個對話十二條的問題，北高聯最早關於對話團成立的提案，我記得是由北大理論信息部提出來的。當時我交給封從德，上面寫著《北大理論信息部致高聯提案》。當時對話代表團關於對話的提案已經在大字報上貼出來了，但是高聯在袁木對話以後一直沒有對對話表示任何態度。當時北大就很著急，理論信息部由高新奇和我把那個大字報的理論，對話條例整理了一遍，整理出十二條來交到北高聯。王丹和王超華他們在五月二日送到信訪局的那個對話十二條就是北大提出來的那個十二條，祇不過把後面關於對話團成立的部分做了一點改動。】【以上第69頁】

2 . 2 北高聯的活動（王超華）

2.2.1 追求北高聯的合法化〈參：封從德 2.1〉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我被補上北高聯常委。補上以後自己比較誠惶誠恐。當時是每天中午高聯開例會，二十九日是在師大開常委例會。我事先把我認為有可能討論和應該的討論問題列了個提綱，到了那兒才發現這些人沒有議程，就坐在那兒說：怎麼樣，咱們晚上什麼吧，再開一次會吧。就這麼著，非常散漫。王丹坐在一張床的欄杆後面，基本上沒有話。我覺得非常失望，因為我想他們把我補上來的原因，是很多中、小院校代表願意找我，我好象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較有群眾基礎，我提一個什麼東西的話，就能得到很多的票數。那麼王丹就應該能帶來北大的聲音。但是據我每天去北大了解的情況就是他根本不去北大開會。我去問過柴玲，柴玲說：“他在高聯忙著呢。”我心想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了。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當時說二十九日晚上還要接著開各校代表會。實際上二十九日中午的北高聯常委會開了一會兒就變成照著我那個單子走了。我覺得非常可笑，第一次來參加會，這些人已經忽然覺得你這單子挺好，就照著你這走了。另外一個愛列單子的是人大的常委。所以我認為實際上真正做工作的，在後來封從德去了以後，就是我們三個。我們確實是一去就很負責任，生怕開一次會白浪費時間或者是沒有做什麼事。其他那幾個人包括吾爾開希和王丹都不作實事。我在高聯期間是

搞過一些類似陰謀詭計的活動，我一直把這幾個人當成目標，想把他們弄下去，我覺得他們是個人英雄主義，但是不做實事。

然後我就到北大，這天沒有參加北大的籌委會，我是直接找到封從德，因為我那會兒和其他人還不是太熟。我先找柴玲核實了王丹不在北大開會這個事，然後找封從德說：王丹這樣是不行的。我希望你們北大籌委會考慮一下。因為肯定所有的外地學生、所有知識分子有事都會直接找到北大來，各校也會找到北大來，可是現在一聽說有高聯的話就都去問高聯。這樣北大和高聯就變成兩個中心。我說：你們北大應該把北大的活動和高聯合起來，你們應該另派一個人。

他說：派誰呢？我說：我覺得你就比他好。【以上第 70 頁】這幾天每天中午開

高聯常委會，每天晚上開高聯代表會。我二十九日中午到北大去說，二十九日晚上封從德就去了高聯，二十九日晚上王丹沒去出席各校代表大會。吾爾開希主持到九點多走以後，他指定我主持會議。吾爾開希和王丹去香格里拉飯店開記者招待會，當時我們不知道他是去幹什麼。他說：我有私人事情要做，超華你來幫我主持一下。為什麼當時不請周勇軍，我記得是因為四二八把周勇軍的主席撤了。我就請封從德介紹北大的組織建設情況，這是我加上的一個議題。實際上這幾天的會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四二七以後各校同學普遍反映，我們有了一個很大的勝利，下一步做什麼？北高聯幾次會，好幾十所學校大家集中關心的就是合法化問題。當時我說我們學校研究生會整個就是合法化改組了，封從德講他們研究生會也是合法化改組了，他們本科生會為什麼一直是籌委會，是想把原來的那個學生會給占領過來，可是一定要有什麼三分之二的多數這個程序才有可能。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來不能都照著這程序，這個是不是真正的合法化意義？如果法律允許自己成立組織的話，象我們這種小學校，我們只能掌握一半群眾，那我們要不要爭取合法化？當時北京各高校實際上已經普遍有見好就收的情緒了。所以在這幾天會裏，第一是討論合法化，第二討論復課條件。這是兩個最關鍵的內容。

然後我就到北大，這天沒有參加北大的籌委會，我是直接找到封從德，

因為我那會兒和其他人還不是太熟。我先找柴玲核實了王丹不在北大開會這個事，然後找封從德說：王丹這樣是不行的。我希望你們北大籌委會考慮一下。

因為肯定所有的外地學生、所有知識分子有事都會直接找到北大來，各校也會找到北大來，可是現在一聽說有高聯的話就都去問高聯。這樣北大和高聯就變成兩個中心。我說：你們北大應該把北大的活動和高聯合起來，你們應該另派一個

人。他說：派誰呢？我說：我覺得你就比他好。【以上第 70 頁】這幾天每天中午開高聯常委會，每天晚上開高聯代表會。我二十九日中午到北大去說，二十九日晚上封從德就去了高聯，二十九日晚上王丹沒去出席各校代表大會。吾爾開希主持到九點多走以後，他指定我主持會議。吾爾開希和王丹去香格裏拉飯店開記者招待會，當時我們不知道他是去幹什麼。他說：我有私人事情要做，超華你來幫我主持一下。為什麼當時不請周勇軍，我記得是因為四二八把周勇軍的主席撤了。我就請封從德介紹北大的組織建設情況，這是我加上的一個議題。實際上這幾天的會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四二七以後各校同學普遍反映，我們有了一個很大的勝利，下一步做什麼？北高聯幾次會，好幾十所學校大家集中關心的就是合法化問題。當時我說我們學校研究生會整個就是合法化改組了，封從德講他們研究生會也是合法化改組了，他們本科生會為什麼一直是籌委會，是想把原來的那個學生會給占領過來，可是一定要有什麼三分之二的多數這個程序才有可能。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來不能都照著這程序，這個是不是真正的合法化意義？如果法律允許自己成立組織的話，象我們這種小學校，我們祇能掌握一半群眾，那我們要不要爭取合法化？當時北京各高校實際上已經普遍有見好就收的情緒了。所以在這幾天會裏，第一是討論合法化，第二討論復課條件。這是兩個最關鍵的內容。

當時這幾天高聯每天的會還有一個內容，是組織完善。封從德介紹北大經驗之後，高聯就開始討論規章制度，其中包括一校提議，八校附議，還有幾分之幾才能否決，還有七個常委意見內部不統一，如果是三個常委的意見被四個常委的意見否掉的話，這三個常委可以再提交全體代表大會，不能在常委內部以簡單少數，多數這麼決定。總而言之做了很多章程的制定。

這幾天高聯每天的會，除了一個是合法化，一個是復課，還有一個內容，是組織完善。封從德介紹北大經驗之後，高聯就開始討論規章制度，其中包括一校提議，八校附議，還有幾分之幾才能否決，還有七個常委意見內部不統一，如果是三個常委的意見被四個常委的意見否掉的話，這三個常委可以再提交全體代表大會，不能在常委內部以簡單少數，多數這麼決定。總而言之做了很多章程的制定。【以上第 71 頁】

2.2.2 與政府對話

因為合法化，大家就認識到，即使在我這個學校裏不能取代原有的學生會，原有學生會和這個新起的自治會應該有權利并存。這是和大院校不一樣的。大約是從這個認識點出發，然後考慮到，二十九日吾爾開希去了和袁木、何東昌、袁立本的對話現場而不對話，這個恐怕不好。所以校園民主化的建議這時候就開始在高聯討論。就是說任何級別的來對話，我們都應該去對話，但是對話的內容是要求我們本校自治組織合法化和保存本校的這個民主園地。這個實際上是五·四之前就已經討論過，我忽然想出這個，因為那會兒基本上是我在操作。當時已經有過幾次對話，比如農業部的找農業大專院校，北京市也來找，大家就說：我們去不去？是我們去了丟分，還是我們不去丟分？因為政府在袁木對話之後已經發起各種各樣的攻勢，從各方面都來找你們對話，看你們學生來不來。所以當時有這個討論。

關於對話團的建立也是在這幾次會上就提出來了。對話北高聯不一定出面。吾爾開希四月二十九日去對話，他說：你不承認我是高聯代表，我就不參加對話。四月二十九日我回到北大，周勇軍說：不承認你高聯代表，你怎么還進去了？咱們沒有原則啦。不能進去，他們不承認咱們就不進去。但是回來聽了郭海峰在北大放那個完整錄音以後，開始還反感，這時發現這是更好的辦法。所以在三十日的高聯全體代表會上就討論這個，說他現在沒有說非得取締你這個組織，我們不非得要他跟我這個組織對話。我們討論了一句話，在黑板上寫了半天加哪個詞減哪個詞，什麼是我們的復課條件？祇要政府是真誠的、平等的、公開的和學生中直接選出來的學生代表對話，我們就復課。這條件已經壓得非常低了。所以就說完全不必高聯出面去對話，我們各校就可以去。所以北大開始選對話代表的同時，各校都開始選對話代表，高聯發通知，讓各校都選。我們學校那些人不願意出去搞組織工作，都是些博士生、碩士生，你簡直支不動他們，一說選對話代表，都公開站出來了，“我要去對話”，都覺得自己口才挺好的。

（封從德：當時在五月一日北高聯的例會上還是做了這樣的決定，就是五月三日我們正式籌備對話團，但是原則上是和北高聯獨立）

四月二十八日北高聯罷免周勇軍主席，要求法大另外派人，法大【以上第72頁】沒有另外派，就是王志新和周勇軍一塊兒來了。然後馬少方辭職，所以實際上是少一個人，就把我補上，還是七個。

四月二十八日北高聯罷免周勇軍主席，要求法大另外派人，法大【以上第72頁】沒有另外派，就是王志新和周勇軍一塊兒來了。然後馬少方辭職，所以實際上是少一個人，就把我補上，還是七個。

四月二十九日鄭旭光他們拿了北航弄的對話的條件，對話內容來了。實際上當時各校都在做這事，但是北航是做得比較好的，列得非常具體，是我所看到的幾個對話條件當中最好的一個。祇不過它是四條，而且沒有列上胡耀邦。我們討論認為這是不行的，這個運動要有前後承繼性的話，一定要把為胡耀邦恢復名譽這個事放在第一條。這樣到四月三十日，高聯開例會就覺得要是能設法把北航這個常委補上就好了。我說這個沒問題，包在我身上。當時四月三十日中午

祇有四個常委在開會。為什麼我覺得有把握呢？是因為有一個計算機學院的學生，特別活躍，老在總部泡著，非常想當常委。他老說：我都轉了多少個學校了，北大也不行啊，清華的弱點是什麼，祇有北航最好。當時已經通過了“八校附議”那個規定。散了會我就去找他，我說：“實際上工科院校缺人啊，應該再補一個。咱們把北航補上怎麼樣？”他說：“行啊。”我說：“你提好不好？我主持人提不合適。”

這天四月三十日，同時確定了封從德是新任主席，不是五月一日確定的。頭一天晚上頭一天晚上回去我就跟你說，別人對你的那個大校作風有意見，我就接著跟你說：你收斂一點。我不知道你有這個印象。（封從德插：你告訴我你很失望。）所以呢，封從德說他不主持。三十日晚上是周勇軍主持，王志新做記錄，但周勇軍主持一下，大家意見非常大，說：北大同學主持，北大同學主持。最後非常名正言順地，封從德以主席身分上去主持。就開始提出增補北航的常委，非常痛快地就通過了。因為鄭旭光在會上好幾次發言都很理性的，就被接受了，增加了一個。這一下開了頭大家都要補常委，東郊院校補了翟偉民，藝術院校要求補一個，因為馬少方辭職了。但是我們說夠九個人了就不增補了。民院是王正雲，這是後來五月六日來的，清華和師大始終是以院校常委的身分參加的，師大是梁二和開希都曾經以師大代表身分來開會，清華是三個人包括後來當那個對話代表的，在這初期也以清華常委的身分來開會，就是他們是院校席位。四月三十日晚上的時候，最後確定的是九個常委。九個常委是北大封從德，清華是院校代表，幾個人輪流，本校願意誰來，誰有空來誰就來，最主要的是張銘，在通緝名單上；通緝名單上師大最主要的兩個，梁二和吾爾開希，吾爾開希經常不來，具體工作也是梁二做的，高聯的會也是【以上第 73 頁】梁二參加得多；

人大是有的時候是一個來不了另一個來：北航是鄭旭光，經濟學院是翟偉民，民族學院這會兒空缺，那個石翁一會來，一會不來，而且有人來告訴我們說：石翁在民院校方組織的廣播裏說學生運動是反政府的，我堅決擁護共產黨政府。還有我自己，王超華，政法仍然是周勇軍，藝術院校最後增加的是美術學院，美術學院的都穿著白褂，這兒一個圖案，我始終沒有記住他的名字，我記得他是列席常委，因為當時已經九個了。所以還應該有一個人，好象是保留民族學院的名額，民族學院沒有去掉，因為五月六日王正雲來了以後就名正言順的就是第九個，王志新是秘書長，政法大學的。周峰鎖是後期的，五月二十三日以後。

這天四月三十日，同時確定了封從德是新任主席，不是五月一日確定的。頭一天晚上頭一天晚上回去我就跟你說，別人對你的那個大校作風有意見，我就接著跟你說：你收斂一點。我不知道你有這個印象。（封從德插：你告訴我

你很失望。)所以呢，封從德說他不主持。三十日晚上是周勇軍主持，王志新做記錄，但周勇軍主持一下，大家意見非常大，說：北大同學主持，北大同學主持。最後非常名正言順地，封從德以主席身分上去主持。就開始提出增補北航的常委，非常痛快就通過了。因為鄭旭光在會上好幾次發言都很理性的，就被接受了，增加了一個。這一下開了頭大家都要補常委，東郊院校補了翟偉民，藝術院校要求補一個，因為馬少方辭職了。但是我們說夠九個人了就不增補了。民院是王正雲，這是後來五月六日來的，清華和師大始終是以院校常委的身分參加的，師大是梁二和開希都曾經以師大代表身分來開會，清華是三個人包括後來當那個對話代表的，在這初期也以清華常委的身分來開會，就是他們是院校席位。四月三十日晚上的時候，最後確定的是九個常委。九個常委是北大封從德，清華是院校代表，幾個人輪流，本校願意誰來，誰有空來誰就來，最主要的是張銘，在通緝名單上；通緝名單上師大最主要的兩個，梁二和吾爾開希，吾爾開希經常不來，具體工作也是梁二做的，高聯的會也是【以上第73頁】梁二參加得多；人大是有的時候是一個來不了另一個來；北航是鄭旭光，經濟學院是翟偉民，民族學院這會兒空缺，那個石翁一會來，一會不來，而且有人來告訴我們說：石翁在民院校方組織的廣播裏說學生運動是反政府的，我堅決擁護共產黨政府。還有我自己，王超華，政法仍然是周勇軍，藝術院校最後增加的是美術學院，美術學院的都穿著白褂，這兒一個圖案，我始終沒有記住他的名字，我記得他是列席常委，因為當時已經九個了。所以還應該有一個人，好象是保留民族學院的名額，民族學院沒有去掉，因為五月六日王正雲來了以後就名正言順的就是第九個，王志新是秘書長，政法大學的。周峰鎖是後期的，五月二十三日以後。

2.2.3 宣佈復課〈參：2.7.3 誰作的復課決議？〉

然後是復課的事。我們復課的條件和對話條件是連在一起的，在我印象當中就是當時大家討論的一句話，不是對話條件，而提的是復課條件，就是祇要政府是真誠的、平等的、公開的和學生中直接選出來的學生代表對話，我們就復課。為什麼談論復課條件，是因為當時很多工科院校已經提出：這個罷課究

竟要罷到什麼時候？而且當時已經有人提出：要不要研究生給本科生補課？如果不停地罷課下去的話，必須向群眾交代，為什麼我們仍然要繼續罷課？所以復課這個事，實際是在四月底就已經開始反復地討論。到了五月三日晚上那次的準備會，到沈彤宿舍去不僅僅是為了“新五四”宣言，也是為了第二天的活動。就在那個會上提出誰帶廣播器材，吾爾開希說他帶，但是實際上最後用的是人大的。（封從德插：我在五月三日北高聯的會上非常明確地說：讓周勇軍來安排會場，包括廣播器材。）

因為吾爾開希說他可以帶這個廣播。另外一個就是“新五四”宣言由誰宣讀，定的是開希宣讀。封從德說過由周勇軍來主持會場，所以周勇軍說：“那我主持會場幹什麼呢，我主持會場就是叫吾爾開希宣讀“新五四”宣言，然後我就沒事了嗎？”（封從德：當初非常明確的就是第一，他安排這個會場；第二，每個常委在各自學校的隊伍裏游行到廣場去，那麼他有個任務就是要聯絡這些常委，帶到會場。他要派聯絡員到每個學校裏邊去找。）就【以上第 74 頁】是說他關心

的是這個會有他發言沒有，這是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因為我的印象是當時大家已經在這兒說有關復課的事了，我就安慰他，完全是安慰性的，說如果要復課的話，應該出一個復課的決議。為什麼我有這個印象？是因為人大的常委說，有人提出當時宣佈復課，五月六日就復課，人大說：我們五月六日不復課，我們要復課要在五月八日復課，游行回來很累。如果封從德記得這個的話，就應該承認高聯常委確實討論過復課決議。

因為吾爾開希說他可以帶這個廣播。另外一個就是“新五四”宣言由誰宣讀，定的是開希宣讀。封從德說過由周勇軍來主持會場，所以周勇軍說：“那我主持會場幹什麼呢，我主持會場就是叫吾爾開希宣讀“新五四”宣言，然後我就沒事了嗎？”（封從德：當初非常明確的就是第一，他安排這個會場；第二，每個常委在各自學校的隊伍裏游行到廣場去，那麼他有個任務就是要聯絡這些常委，帶到會場。他要派聯絡員到每個學校裏邊去找。）就【以上第 74 頁】是說他關心

的是這個會有他發言沒有，這是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因為我的印象是當時大家已經在這兒說有關復課的事了，我就安慰他，完全是安慰性的，說如果要復課的話，應該出一個復課的決議。為什麼我有這個印象？是因為人大的常委說，有人提出當時宣佈復課，五月六日就復課，人大說：我們五月六日不復課，我們要復課要在五月八日復課，游行回來很累。如果封從德記得這個的話，就應該承認高聯常委確實討論過復課決議。

然後到了五·四游行。當時確實說過個人跟自己學校隊伍走，你們北大作家班讓我到你們那兒去，張伯笠還特別說：我們作家班都是歲數大的，你不會顯眼。因為考慮到我們學校太遠，我不可能再回學校，王丹也說是。到了五·四廣場，我先到孫中山像那兒去，這時北京大學隊伍已經在廣場了，然後我又到你們隊伍裏，見到了封從德和王丹。我叫你們兩個到孫中山像那兒去，你們不去。（封從德插：我們去了。）當時給我的回答是：不要老說，我們就在這兒。你拿著一個喇叭在那兒引著隊伍走。我說到那兒去，到那兒以後，就沒有你們倆的事了。在那兒至少有吾爾開希，是師大的，清華是張銘，有我，有周勇軍。有五個常委，因為我最關心的是湊夠五個人沒有，湊夠五個人我們就可以做決議。我又問周勇軍要復課決議，他還是在那兒不說什麼。我當時也是比較累了，沒有特別盯這個事。但是周勇軍開始要宣佈復課決議時，在場的常委沒有一個表示異議或者奇怪。祇是在他一句話把這事說完之後，大家才炸了窩，當時在孫中山像前頭就跟他炸窩了。所以一回來，我和開希就說罷免他。罷免是我們兩個說的

2.2.4 學運低潮（王超華）〈參：柴玲 2.4.1 學運低潮〉

【五月四日之後，五月五日中午又去開高聯常委會的時候，我和吾爾開希一見面就說，今天開會要提議罷免周勇軍。但是周勇軍已經到400了，我們見了另外幾個人就趕緊叫到旁邊的一個房間，躲過他。因為他正在和一個記者談話，所以最後周勇軍沒有找到我們。師大的一個聯絡員留在那，說是別的常委來了就叫他到這個房間。沒想到等來等去，等來人大一個常委的辭職書，再等等來我們北高聯主席的辭職書。這樣連罷免帶辭職，我們的人數就不夠了，因為民院的那個當時也沒有來。這是非常氣憤的，高聯當時一下就面臨一個非常困難【以上第75頁】的情況。

【五月四日之後，五月五日中午又去開高聯常委會的時候，我和吾爾開希一見面就說，今天開會要提議罷免周勇軍。但是周勇軍已經到400了，我們見了另外幾個人就趕緊叫到旁邊的一個房間，躲過他。因為他正在和一個記者談話，所以最後周勇軍沒有找到我們。師大的一個聯絡員留在那，說是別的常委來了就叫他到這個房間。沒想到等來等去，等來人大一個常委的辭職書，再等等來我們北高聯主席的辭職書。這樣連罷免帶辭職，我們的人數就不夠了，因為民院的那個當時也沒有來。這是非常氣憤的，高聯當時一下就面臨一個非常困難【以上第75頁】的情況。

然後五月六日在師大物理樓北面草地上重新開會。吾爾開希說他決定不躲了，這事我剛才沒講。在香格裏拉飯店之後，他連續幾天躲，所以我們才有重新指定封從德做主席這個問題。實際上罷免周勇軍以後，吾爾開希已經是第二屆主席，但是他躲了。他回來後，重新又指定吾爾開希是正主席，我是副主席。實際上封從德正主席時我也是副主席。同時決定師大當時是復課的，這是吾爾開希說的，“高聯決定的話，我們師大就服從。”師大要復課，因而就沒有辦法再承擔高聯這些事情，所以高聯轉移到北大。五月六日的會是北大另一個同學來的，在決定轉移到北大的時候他在場，說沒問題。但是我對這個是很有懷疑的，因為我看過北大開會，他在那會上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可是在吾爾開希要求下和他的接受下，也就做了這個決定。同時要求師大的聯絡部馬上通知各校代表。

五月六日晚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因為我們認為五四以後，高聯沒有聲音，這時已經很來不及了。趙紫陽當時在亞行會有講話，五月五日接見外國客人的時候也有講話，我們應該有什麼表示，所以有這個記者招待會。

當時十大藝術院校有一個女生，受警察衝擊受傷，我們派了程真去探望她。但是這個女生接著就被校方隔離了，見不到。

因為一看封從德這個主席沒有了，我就趕緊起草“校園民主化”那個通知，大概是在七、八日已經發到各校了。可是這天下午聯絡員回來說：“我們一塊是租了一個車去的，可是很多小學校已經找不到人了。原來來開會的是聯絡員，來看大院校有什麼活動，回去在校園裏貼了一個通知，大家自然就出來了。你現在叫大家都復課，叫我出來當這個組織的頭，我不想站出來幹這個事。”這給我們帶來非常大的困難。

在這個時候我就四處打探消息，想判斷究竟只是學運低潮還是形勢嚴峻，是我們內部低潮了，還是外面形勢嚴峻。

關於對話團活動，我和沈彤當時就有一個基本完全不同的判斷。他認為當時校園裏已經覺得重點是在對話團了。我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就是因為大多數院校已經找不到人了，學生基本不了解對話團的活動。可是我不知道對話團做出過一個決定，說是盡量不參與各校的活動。所以我到對話團幾次都說，“請你們回到學校，通知你們本【以上第 76 頁】校自治會的代表，來開高聯會議。

”他們都沒理我。我還對着我的名單一個一個地問，你是哪個學校的，你們學校誰、誰沒有來。這是我了解的，因為我跑的學校比較多。

關於對話團活動，我和沈彤當時就有一個基本完全不同的判斷。他認為當時校園裏已經覺得重點是在對話團了。我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就是因為大多數院校已經找不到人了，學生基本不了解對話團的活動。可是我不知道對話團做出過一個決定，說是盡量不參與各校的活動。所以我到對話團幾次都說，“請你們回到學校，通知你們本【以上第 76 頁】校自治會的代表，來開高聯會議。

“他們都沒理我。我還對著我的名單一個一個地問，你是哪個學校的，你們學校誰、誰沒有來。這是我了解的，因為我跑的學校比較多。

另外一個我和沈彤說的不一樣的，他說是五月十二日廣播站從上面搬下來，柴玲說的和我的記憶比較符合，在這之前已經是每天晚上在那兒就有自由論壇了。因為我曾經到那去解釋復課的事，還受人家噓。解釋復課那天是在高聯總算開成一次代表會之後，為了和北大這些積極分子求得諒解，我還特別講了我們高聯這個全體代表會上反映出來的情況，一個是外語學院的兩個畢業生，積極分子的分配方案被變了，還有就是農業大學好象是受到迫害和壓制的情況。

大概是七、八日，回來以後我在北大 29 號樓那兒和王有才吵架，封從德把我叫過來，很想安慰我的樣子，說“非常對不起”，然後說“我們的一個主要看法就是高聯應是協調組織，不應該發號施令。”我心想，你在高聯當主席，你不知道是協調組織還是發號施令嗎？所以我也沒再跟他說什麼，我當時對他有一定的意見。因為北大對於高聯是有一個基本的削弱高聯的想法，這個常勁知道，可是它又接受高聯轉到北大來。所以我說“你們北大到底準備怎麼支持，或者高聯就解散算了。”他們又都異口同聲說“不行，不行，這面旗幟不能倒。”這是我跟北大好幾個學生爭執的一個最根本點。我說：“如果你覺得高聯這面旗幟不能倒的話，你就應該集中精力幫助它做好這個工作。否則的話，就是歷史時機不成熟，好象柴慶豐事件的時候，北大成立自己的自治組織時機不成熟一樣。”】
<參：2.7.4：北大對高聯的態度>【以上第 77 頁】

2.3 對話團（沈彤）<參：封從德 2.1；王超華

2.2.2 與政府對話>

2.3.1 對話代表的產生

我先提一下北大選對話代表的問題。北大最先的對話代表選出來是王丹和楊濤，王丹、楊濤個人拒絕參加對話代表團，因為他們看了四二九對話這個陣勢之後覺得他們不適合對話。但是正式代表選出來是他們兩個。熊焱在五月一日的會上當選了主席，而且熊焱一向以善辯著稱，雖然不太講道理。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對話代表。我從來沒有正式被選上過對話代表，因為五月一日之後我對王丹當選很不滿意，封從德在五月一日當選北高聯主席之後，帶我去了那天晚上北高聯在師大的例會。我的印象是一群烏合之眾。五月一日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五月二日由王超華和王丹去交請願書。當時也提到過，就是對話代表團原則上應該是獨立於高聯。後來五月三日的《人民日報》對五月二日的請願書指責得很厲害。這時候原來的一個提法，就是獨立的代表團、直選出來的對話代表就占主流了。這也就是對話團從高聯方面產生的背景。這時候高聯通知各校選出自己的對話代表，北大是提前一些選出代表，在這時候各校開始選，而且定在五月三日下午各校代表組織“五四”游行的籌備大會的同時開對話代表的第

一次大會。當時我跟熊焱雖然都不是選出來的，但是很自然就變成了對話代表。我們兩個人都去了。其它學校的情況跟北大有點相似，師大是吾爾開希和另外幾個，還有其他幾個比較活躍的，都是各校自治會的同學被選出來了。所以到那兒以後我覺得有點失望。

這裏邊還有一個原因，雖然是我個人的，但是可以讓大家知道當時的情況，在五月一日我被罷免了，而且重新選沒選上。同時因為我父親是在市政府工作的，在我去高聯會議之前，他來到北大。因為市政府的組織部，就是何東昌、袁立本他們通過我父親找我談話，我想其他很多早期的學生領袖都遇到過同樣的事情，給我提出二個條件，一個是我退出高聯盡快出國，當時因為我已經被美國幾個學校接受了，第二是我在高聯、北大籌委會內部向市政府匯報情況。所以一個是我對北大籌委會的失望，一個是市政府來的壓力，我當時比較矛盾。【以上

第 78 頁】參加高聯大會之後就更失望，因為高聯大會作為整個運動的領導階層

是非常混亂的。後來有了對話代表團這個事，我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對話代表團上

面，覺得這是一個理性的解決辦法，而且是長期的，把剛才我介紹的那個“三步

計劃”進行下去的主要途徑。五月三日下午在師大的對話代表團第一次會議上，

各校代表都是學運情緒很重的自治會積極分子，這便我很失望。因為這樣不可

能做到很理性地去討論，而且當時來的學校很少，實際上祇有十幾個學校。在這

時候大家也說不出所以然，都想著“五四”大游行。所以我當時提出一個建議就

是各校對話代表一定不要去參加“五四”游行，因為對話代表團的第一要務就是把

情緒轉過來。正在大家爭執不休的時候，項小吉進來了。我在四月二十九日聽

到他說話，印象很深。他一進來，很多人就說：他就是那個代表。項小吉也很有

準備，他拿出一張紙來，當時就提出來對話代表團的三個大方向，這就是對話

代表團後來一直準備的三大方向。第一是關於此次學運；第二關於深化改革；第

三關於憲法第三十五條。這三大方向一提出來，本身內容沒有經過討論，但項

小吉的準備和這種理性的方式很快被大家接受。所以當時就有人提議選項小吉為

對話代表團的團長，推選我為對話代表團的秘書長。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拒絕了，

我們兩個人都認為在對話代表團有各校正式代表參加之前，我們兩個人祇擔任召

集人。實際上直到對話失敗之後，我們兩個人都是作為召集人。對這個海外有

很多爭議。在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在一個藝術院校才有過正式的選舉，選出了五人常委。那么又增加了三個對話代表團的真正的領導層。這是對話代表團的建制問題。這是五月十七日，我下面要提到正式撤離廣場的時候，在一個學校選的。

這裏還有一個原因，雖然是我個人的，但是可以讓大家知道當時的情況，在五月一日我被罷免了，而且重新選沒選上。同時因為我父親是在市政府工作的，在我去高聯會議之前，他來到北大。因為市政府的組織部，就是何東昌、袁立本他們通過我父親找我談話，我想其他很多早期的學生領袖都遇到過同樣的事情，給我提出二個條件，一個是我退出高聯盡快出國，當時因為我已經被美國幾個學校接受了，第二是我在高聯、北大籌委會內部向市政府匯報情況。所以一個是我對北大籌委會的失望，一個是市政府來的壓力，我當時比較矛盾。【以

上第 78 頁】參加高聯大會之後就更失望，因為高聯大會作為整個運動的領導階層是非常混亂的。後來有了對話代表團 這個事，我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對話代表團上面，覺得這是一個理性的解決辦法，而且是長期的，把剛才我介紹的那個“三步計劃”進行下去的主要途徑。五月三日下午在師大的對話代表團第一次會議上，各校代表都是學運情緒很重的自治會積極分子，這使我很失望。因為這樣不可能做到很理性地去討論，而且當時來的學校很少，實際上祇有十幾個學校。在這時候大家也說不出所以然，都想著“五四”大游行。所以我當時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各校對話代表一定不要去參加“五四”游行，因為對話代表團的第一要務就是把情緒轉過來。正在大家爭執不休的時候，項小吉進來了。我在四月二十九日聽到他說話，印象很深。他一進來，很多人就說：他就是 那個代表。項小吉也很有準備，他拿出一張紙來，當時就提出來對話代表團的三個大方向，這就是對話代表團後來一直準備的三大方向。第一是關於此次學運；第二 關於深化改革；第三關於憲法第三十五條。這三大方向一提出來，本身內容沒有經過討論，但項小吉的準備和這種理性的方式很快被大家接受。所以當時就有人提議 選項小吉為對話代表團的團長，推選我為對話代表團的秘書長。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拒絕了，我們兩個人都認為在對話代表團有各校正式代表參加之前，我們兩個人祇 擔任召集人。實際上直到對話失敗之後，我們兩個人都是作為召集人。對這個海外有很多爭議。在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在一個藝術院校才有過正式的選舉，選出了 五人常委。那么又增加了三個對話代表團的真正的領導層。這是對話代表團的建制問題。這是五月十七日，我下面要提到正式撤離廣場的時候，在一個學校選的。

我們是建議不要參與“五四”大遊行，但實際上五月三日會議的各校代表都是各校的積極分子，所以實際上沒有執行。這實際上就是與高聯合作的問題。封從德曾經提到過高聯有個聯絡處，我們想通過高聯的聯絡系統，敦促各校選出自己理性的對話代表，而且要直選。原則上對話代表團和高聯一定要分開，一定是要獨立的。這樣才能避免五月二日的這種類似情況。我跟項小吉出席過在吾爾開希房間的一次高聯會議，曾經談過這個問題。

【常勁：補充一點，沈彤提到選舉對話代表。當時我們也知道，他【以上第79頁】們五個人是籌委會推舉出來的代表，不是由全體同學選舉的。因為當時正在搞基層普選，所以我們想搞一個最民主的普選，再普選代表】

【常勁：補充一點，沈彤提到選舉對話代表。當時我們也知道，他【以上第79頁】們五個人是籌委會推舉出來的代表，不是由全體同學選舉的。因為當時正在搞基層普選，所以我們想搞一個最民主的普選，再普選代表】

2.3.2 四二九對話與對話主題

對話代表團組建之後，五月五日第一次確定：政法大學作為會議地點，全部的對話代表都應該全力以赴準備對話，不要參與各校的任何跟學運其它方面有關的活動，以集中精力，保持理性、冷靜的頭腦。會議是在政法大學主樓中心樓的頂樓召開的。五月五日下午開始，當時到場的有二十九個學校的代表，社科院這樣的院校來的代表很多。在社科院這三名代表裏面，有比較重要的，王超華已經提到過幾個人，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那個搞宗教的，姓何，他在以後對話代表過程中非常重要。他是《光明日報》或《人民日報》評選出來當時國內的中青年知名學者之一。五月五日，他和另外一個起草了五月六日的《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要求與對話代表團進行公開的、平等的、真誠的對話。就跟高聯那個實際各校已經流傳開來的對話原則差不多。同時確定對話代表團的一個策略，就是任何級別、任何系統的對話都要主動參與，而且以任何身分，以原來的學生會和學聯的身分去參加也可以。我不知道為什麼王超華說這個策略是從高聯開始提出的。這牽扯到郭海峰參加四二九對話的問題。至少在北大校園對郭海峰實際上意見是很大的，而高聯，剛才王超華講了，對郭海峰的這種行為覺得有很正面的意義。郭海峰和當時北大的校學生會主席，還有其他一些代表去參加了四月二十九日的對話之後，校園開始貼大字報，譴責郭海峰的這種行為。郭海峰就找常委，因為沒有找到別人，就找到我。我對他說，我覺得既然參加了是可以理解的，就算了，不要再提這個事情了。郭海峰就用這句話，寫了二篇大字報，說這種行為是之前就受到籌委會支持的。提到了我的名字，實際上這個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我到運動後期不太相信郭海峰，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封從德：郭海峰去對話，你說他後來跟你講過一些事情，能詳細說明一下

嗎？【以上第 80 頁】

沈彤：四月三十日下午，我正在房間裏睡覺，我那兩天特別累，因為頭一天開希他們在會議上鬧出很多麻煩，然後郭海峰進來跟我說，“沈彤，我參加了這個對話，我想找常委說一下這個事情。”據他說，和據我後來了解，當時北大四個代表，學生會主席和另外三個代表說找籌委會的人，但是籌委會的人找不到，而且我覺得當時我們幾個常委會的人要決議的話，是不會去參加的。郭海峰自己就大包大攬說“那我去”。去了之後呢，他的談話內容後來也都有錄音，大家也不太滿意，他就強調“為什麼我跪交請願書政府不接？”根本沒談到實質性的東西，跟項小吉相比素質相差很遠。他說“我就去了，參與比不參與要好。”我說“那好，去了就算了。我也理解。”結果他就把這當作籌委會對他參加對話的首肯，寫了大字報。】

五月三日確定了對話的三大方向，實際上三大方向是很草的。在五月五日第一次大會的時候開始具體定三大方向的內容。由我負責方向一和方向二，項小吉負責方向三。基本上三個方向的視角是這樣：第一方面，關於此次學運不得不談。這是運動的延續性，以這個為起點。我們的想法是，這是我們的手中武器，是可以迫使政府坐到談判桌上的一個著手點。以擺事實，分析一些重要事件為主。重點第一是在駁斥政府的觀點，第二是在自我定性上面。這個我們當時經過很長討論，就是運動需要不需要讓政府去定性，讓政府去承認？我們覺得不需要。運動要自我定性，真正作為我是談判的一方這種方式去出現。所以這是對話代表團後來對絕食比較消極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絕食是讓政府去定性，我不是否定絕食，我是說對話代表團的方式。第二個方面是關於深化改革。這是就社會現實去談的，就是由現象入手引出體制問題，加以深化分析，導出建設性的意見。第三方面是項小吉負責的，是真正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就是從憲法第三十五條入手分三個方面：言論出版自由，這關係到新聞自由，關係到《新聞導報》的問題；第二個是結社集會自由，是自治聯合會的合法性，這也就是對話代表團提出的：自治會應該去注冊；第三個是游行示威自由，當時主要是集中在北京的那個游行十條上。這是三大方向的原則確定。在三大方向原則確定之後，擬定了二十九個分主題。當時出席的代表組成了各個分主題的預備班子。從五月五日、五月六日開始，定好五月六日以三大方向分成三組去準備。五月六日請願書出來以後，【以上第 81 頁】當天項小吉、我和另外二個代表四個人去三個

信訪局交請願書。當時是三個信訪局的副局長接待了，當時我們希望五月八日有答復。我們提出，我們的要求跟五月二日的條件不一樣，我們是以真誠的態度希望政府盡快地去準備，而不是給政府一個時限。五月八日實際上沒有答復，大家都知道。

五月三日確定了對話的三大方向，實際上三大方向是很草的。在五月五日第一次大會的時候開始具體定三大方向的內容。由我負責方向一和方向二，項小吉負責方向三。基本上三個方向的視角是這樣：第一方面，關於此次學運不

得不談。這是運動的延續性，以這個為起點。我們的想法是，這是我們的手中武器，是可以迫使政府坐到談判桌上的一個著手點。以擺事實，分析一些重要事件為主。重點第一是在駁斥政府的觀點，第二是在自我定性上面。這個我們當時經過很長討論，就是運動需要不需要讓政府去定性，讓政府去承認？我們覺得不需要。運動要自我定性，真正作為我是談判的一方這種方式去出現。所以這是對話代表團後來對絕食比較消極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絕食是讓政府去定性，我不是否定絕食，我是說對話代表團的方式。第二個方面是關於深化改革。這是就社會現實去談的，就是由現象入手引出體制問題，加以深化分析，導出建設性的意見。第三方面是項小吉負責的，是真正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就是從憲法第三十五條入手分三個方面：言論出版自由，這關係到新聞自由，關係到《新聞導報》的問題；第二個是結社集會自由，是自治聯合會的合法性，這也就是對話代表團提出的：自治會應該去注冊；第三個是游行示威自由，當時主要是集中在北京的那個游行十條上。這是三大方向的原則確定。在三大方向原則確定之後，擬定了二十九個分主題。當時出席的代表組成了各個分主題的預備班子。從五月五日、五月六日開始，定好五月六日以三大方向分成三組去準備。五月六日請願書出來以後，【以上第 81 頁】當天項小吉、我和另外二個代表四個人去三個信訪局交請願書。當時是三個信訪局的副局長接待了，當時我們希望五月八日有答復。我們提出，我們的要求跟五月二日的條件不一樣，我們是以真誠的態度希望政府盡快地去準備，而不是給政府一個時限。五月八日實際上沒有答復，大家都知道。

五月六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一日對話代表團都有公告，《一、二、三號公告》。五月八日我們去了沒有答復，又拖到五月十一日，這時候發生了很有意思的變化，接待我們的不再是三個信訪局，而是變成二個信訪局，就是國辦和中辦，沒有人大常委會了，到五月十一日再見面的時候，只剩下中辦了。實際上我們從對話籌備一開始就是一直和中辦在交手，國辦不知道是自動退出還是被中辦擠出這個過程。所以從五月十一日開始一直是中辦信訪局局長鄭右梅和我跟項小吉接觸。當時各校的反應，我覺得總的來講因為當時高聯提出了民主化建設，

實際上我認為運動是處於低潮的，同時因為對話代表團成立，各校的注意力都轉到對話代表團上面，而且實際上各校當時的一些活動和其它各界的活動，都對整個運動集中到對話上有一定的影響。比如五月十日的那個自行車游行，都是針對四二九那個對話的。還有五月十二日那些作家坐三輪車挂牌上街，而且十二日同時有胡啟立與新聞記者的對話，喬石、胡啟立與工人的對話。這時候就傳言首鋼準備總罷工。我要說的是，在學生方面籌備對話的同時，實際上運動的力量是從其它各界來的，而不是學生為主導的。因為對話代表團並不領導運動，實際上是要想把自己從運動中獨立出來的。首鋼總罷工的這個傳言，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提出，如果政府不與學生對話的話，首鋼準備總罷工，而且號召全國總罷工。在五月五日、五月六日連續幾天裏面，各校代表出現的都是比較理性的代表，而且口才比較好，所以這個發展的情況比較好。我的自我感覺，對話代表團的會議和高聯比要有秩序得多，而且從來沒出現過領導層的問題，一直是我跟項小吉召集會議。因為我覺得北大的代表很弱，我自己也覺得我不能勝任對話代表這個職責，我祇是對組織工作感興趣，所以才到對話代表團的核心中間去，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要求北大直選對話代表。但組織了二次都沒成功。同時因為我在籌委會的時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觸，就是接觸到北大團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師，其中包括幾方面的人，趙紫陽的這批人，還有象吳稼祥、張炳九這些人，就是新權威的這批人。在【以上第 82 頁】

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團委系統的一些人，北大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智囊團，以九個在北大校園比較有名的青年教師組成的智囊團，一直在二十九樓，每天一到二次給我提一些建議。這個所謂智囊團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跟所謂體制內的改革派接觸，希望在正式的公開對話之前有私下的預先接觸。當時的目標主要是閻明復，閻明復因為身體的關係，幾次

五月六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一日對話代表團都有公告，《一、二、三號公告》。五月八日我們去了沒有答復，又拖到五月十一日，這時候發生了很有意思的變化，接待我們的不再是三個信訪局，而是變成二個信訪局，就是國辦和中辦，沒有人大常委會了，到五月十一日再見面的時候，祇剩下中辦了。實際上我們從對話籌備一開始就是一直和中辦在交手，國辦不知道是自動退出還是被中辦擠出這個過程。所以從五月十一日開始一直是中辦信訪局局長鄭右梅和我跟項小吉接觸。當時各校的反應，我覺得總的來講因為當時高聯提出了民主化建設，實際上我認為運動是處於低潮的，同時因為對話代表團成立，各校的注意力都轉到對話代表團上面，而且實際上各校當時的一些活動和其它各界的活

動，都對整個運動集中到對話上有一定的影響。比如五月十日的那個自行車游行，都是針對四二九那個對話的。還有五月十二日那些作家坐三輪車挂牌上街，而且十二日同時有胡啟立與新聞記者的對話，喬石、胡啟立與工人的對話。這時候就傳言首鋼準備總罷工。我要說的是，在學生方面籌備對話的同時，實際上運動的力量是從其它各界來的，而不是學生為主導的。因為對話代表團並不領導運動，實際上是要想把自己從運動中獨立出來的。首鋼總罷工的這個傳言，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提出，如果政府不與學生對話的話，首鋼準備總罷工，而且號召全國總罷工。在五月五日、五月六日連續幾天裏面，各校代表出現的都是比較理性的代表，而且口才比較好，所以這個發展的情況比較好。我的自我感覺，對話代表團的會議和高聯比要有秩序得多，而且從來沒出現過領導層的問題，一直是我跟項小吉召集會議。因為我覺得北大的代表很弱，我自己也覺得我不能勝任對話代表這個職責，我祇是對組織工作感興趣，所以才到對話代表團的核心中間去，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要求北大直選對話代表。但組織了二次都沒成功。同時因為我在籌委會的時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觸，就是接觸到北大團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師，其中包括幾方面的人，趙紫陽的這批人，還有象吳稼祥、張炳九這些人，就是新權威的這批人。在【以上第82頁】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團委系統的一些人，北大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智囊團，以九個在北大校園比較有名的青年教師組成的智囊團，一直在二十九樓，每天一到二次給我提一些建議。這個所謂智囊團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跟所謂體制內的改革派接觸，希望在正式的公開對話之前有私下的預先接觸。當時的目標主要是閻明復，閻明復因為身體的關係，幾次

【封從德：你提到北大直接選舉對話代表，兩次沒有成功，是怎么一回事？

沈彤：廣播站，就是“自由論壇”，我記得是五月十二日那天才搬下去的。在“自由論壇”開始之前，除了楊濤主持的三、四天在中間以外，廣播站不是在我房間，就是在樓道口。我們是在廣播站號召全校學生來參加自由競選，想建立一個監察系統。當時有兩個系的學生，據說口才都很好，但是都是團委的幹部，都要出來。但是一個是時間沒有安排好，監委弄不起來，因為我自己沒有具體

參加組織工作。我覺得如果我要是去組織的話，不就沒什麼意義了么？不就等於自己組織選接班人了嗎？還有實際上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其他人出來競選了。所以兩次都沒有成功。

封從德：北大籌委會的智囊團，你知道有幾個？我的印象是其中有一個是在理論信息部裏面，他們不願公開名字，這個智囊團是否和你曾經提到的有九個青年教師每天晚上在你們宿舍給你們提供建議的那個智囊團是同一個。

沈彤：我提到的不是北大智囊團，是北大的給對話代表團的智囊團。但是當時熊焱在十二日晚上對我說他參加絕食了，要退出對話代表團，所以主要是我在張乃武和其他幾個人的安排之下跟這九個青年教師每天見面，這個情況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實際上這九個人說穿了是直接給我提建議的。他們因為這個活動有兩個人被捕了。】【以上第 83 頁】

2.3.3 絕食與對話

寫《人民日報》歷史功過》的這位和他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早在四月二十四日就提出過具體的、有計劃的運動形式，最激烈的就是絕食，而且提出一系列的具體方案。在新聞中心主持人的記者招待會上，楊濤作為新聞發言人提出八九運動整個三步規劃的時候，提到了絕食的原因。我不是發言人，我是組織記者招待會的。另外一個關於絕食的，就是四月二十九日開希和王丹個人在香格裏拉的記者招待會之後，幾家大的新聞社，主要是英國、加拿大一些新聞社的一些記者和我直接提出來，應該要利用五月十五日戈爾巴喬夫的來訪，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因為當時將會有將近三千的外國大記者在北京。當然這同絕食具體的發起毫無關係。我是為了解釋對話代表團對絕食的一些反映。在這個背景之下，五月十一日我們聽說絕食這個消息之後，當時的直接反應實際上是反對的，因為我們覺得對話現在在有程序地進行，前臺、後臺都在進行。前臺的請願書交進去了，上面沒有象對五月二號的請願書那樣拒絕，而是說盡快有答復。在後臺，至少跟改革派有聯系的各個系統都在建立各種各樣的渠道，而且出現很多中間人物，象團系統，還有趙系統裏的人，都在參與。所以我們覺得絕食過於匆忙了。而且絕食按照我們原來設想的一些東西，一些絕食的必要準備，包括輿論的準備，陳波等都提出過，寫這個文章的這個知識分子也提出過，都沒有做到，我們當時覺得絕食是應該局限在二百人以下。

在五月十二日晚上，對於絕食問題有個辯論，這就是柴玲的著名講演《我為什麼參加絕食》。當時，我把我的房間的廣播站放到了三角地去，柴玲出來講話。五月十二日晚上，當時我記得我第一次在運動中間哭了。聽了柴玲的講演，我個人對絕食的態度根本發生了一個轉變。但是在這之前，我同柴玲有過爭論，就是為什麼現在要絕食？高聯的反應是覺得絕食太匆忙了，而且是個人的決定。但後來因為個人的決定已經成為了既成事實，高聯就負責組織和後援工作。實際上從對話代表團和高聯來講，對絕食的態度都是很消極的，而且高聯的秘書長王志新對絕食也有很情緒化的反應。他用了一個詞是：絕食是早泄。】【以上第 84 頁】

2.3.4 絕食後的對話<參：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柴玲 2.6.2

與閻明復對話>

但是絕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中辦在拖了六天之後突然通知，對話安排好了。我現在認為很重要，這是對絕食的決定的一個直接反應。當時因為找不到項小吉和我，就找到了社科院的徐國棟，徐國棟連夜通知了主要的對話代表。十三日我們就到了政法大學，籌備預期在五月十五日中午的對話會議。為了避免四月二十九日這種袁木一個人對著全屋五、六十個人的這種形式，對話代表團主動提出了派二十名代表，希望政府方面至少十幾個部長出席，對我們提出的改革第二大方向的各方面有具體的回答。各校突然帶來消息，除了代表團的二十位代表之外，各校校學生會還要有三十名代表，也就是政府要摻砂子。我不替政府解釋，實際上我是覺得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大家就炸窩了。在我們聽了各個學校匯總的消息正在爭論的時候，五月十三日下午三、四點鐘時，突然有通知說統戰部要見面，而且說汽車在下面等。後來到了統戰部知道，在五月十二日晚，我剛才提到的幾個系統的人一直在同閻明復聯繫。閻明復預先跟中間層次有接觸，五月十二日，在中間層次的極力建議下，決定跟學生非正式的接觸。選了當時所謂三大組織的代表，即絕食團、高聯和對話代表團，三家都選了。所以十三日這次很重要的對話，不是和對話代表團，而是在多方的建議之下的一個非正式的跟各個學生組織的見面。那我提到的中間層次，實際上各個方面都有參與，包括王軍濤、陳子明他們，包括團系統，各校團委的那些代表都在五月十二日跟閻明復見過面。後來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這些人也都有參與。實際上，他們不是代表反對派運動，而是起到中間調解作用。在接我們這批人裏就有王軍濤、鄭也夫他們這批人。到統戰部對話之後，至少到場幾人最後的結論就是說，五月十五日的高層互訪非常重要，大家各方面的人都不希望出現八七年初的情況，即因為一個民主運動把改革派拉下臺，象胡耀邦這樣的人做替罪羊，不希望這樣的事在趙紫陽身上重演。所以，五月十五號要撤離廣場。可惜的是，絕食團的一些重要人物在當時交談的過程中心離場了，當時王超華和柴玲在會議七點開始之後半【以上第85頁】小時就離場了。所以我們對話團當

時的看法很消極。因為我們覺得雖然大家的共識是應該撤離的，但在場的王丹和吾爾開希怎麼有可能決定是否撤離呢？也就是說，在場的所謂學生領袖跟學生主體實際上是脫節的，學生運動的重心已經轉移到天安門廣場。<參：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

但是絕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中辦在拖了六天之後突然通知，對話安排好了。我現在認為很重要，這是對絕食的決定的一個直接反應。當時因為找不到項小吉和我，就找到了社科院的徐國棟，徐國棟連夜通知了主

要的對話代表。十三日我們就到了政法大學，籌備預期在五月十五日中午的對話會議。為了避免四月二十九日這種袁木一個人對著全屋五、六十個人的這種形式，對話代表團主動提出了派二十名代表，希望政府方面至少十幾個部長出席，對我們提出的改革第二大方向的各方面有具體的回答。各校突然帶來消息，除了代表團的二十位代表之外，各校校學生會還要有三十名代表，也就是政府要搵砂子。我不替政府解釋，實際上我是覺得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大家就炸窩了。在我們聽了各個學校匯總的消息正在爭論的時候，五月十三日下午三、四點鐘時，突然有通知說統戰部要見面，而且說汽車在下面等。後來到了統戰部知道，在五月十二日晚，我剛才提到的幾個系統的人一直在同閻明復聯繫。閻明復預先跟中間層次有接觸，五月十二日，在中間層次的極力建議下，決定跟學生非正式的接觸。選了當時所謂三大組織的代表，即絕食團、高聯和對話代表團，三家都選了。所以十三日這次很重要的對話，不是和對話代表團，而是在多方的建議之下的一個非正式的跟各個學生組織的見面。那麼我提到的中間層次，實際上各個方面都有參與，包括王軍濤、陳子明他們，包括團系統，各校團委的那些代表都在五月十二日跟閻明復見過面。後來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這些人也都有參與。實際上，他們不是代表反對派運動，而是起到中間調解作用。在接我們這批人裏就有王軍濤、鄭也夫他們這批人。到統戰部對話之後，至少在場幾人最後的結論就是說，五月十五日的高層互訪非常重要，大家各方面的人都不希望出現八七年初的情況，即因為一個民主運動把改革派拉下臺，象胡耀邦這樣的人做替罪羊，不希望這樣的事在趙紫陽身上重演。所以，五月十五號要撤離廣場。可惜的是，絕食團的一些重要人物在當時交談的過程中心離場了，當時王超華和柴玲在會議七點開始之後半【以上第85頁】小時就離場了。所以我們對話團當時的

看法很消極。因為我們覺得雖然大家的共識是應該撤離的，但在場的王丹和吾爾開希怎么有可能決定是否撤離呢？也就是說，在場的所謂學生領袖跟學生主體實際上是脫節的，學生運動的重心已經轉移到天安門廣場。〈參：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

五月十四日又有對話，其實這中間過程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來國務院系統和中共中央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胡啟立和李鵬之間的矛盾。就是在五月十四日的對話是否直播的問題上。五月十四日的對話，大家都知道是失敗了。在對話中間，絕食團五位代表列席會議本身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在對話按步就班進行的時候，突然，我記不清是誰，決定在會議上播放絕食宣言，那么一下變成情緒化。當場的十三位正式主談代表和後面的列席代表的絕大部分，包括政府方面的閻明復和李鐵映本人都哭了，所以對話實際上不可能進行。在十幾分鐘之後，廣場的學生和很多聲援的學生包圍了統戰部，準備衝進去，這是使對話不可能進行的一個背景。之後，王超華進來大鬧會場。項小吉當時在外面調解，我當時拍著桌子站起來，指著閻明復說，“為什麼答應了直播不直播？”閻明復，李鐵映、當時的其他十二個部的副部長和鄭友梅是政府方面的對話代表，他們都覺得應該是在直播的。所以，實際上說明政府內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後來超華進來之後，就使得對話代表不得不跟閻明復針鋒相對地說：“你為什麼不直播？”從我們當時看到的，閻明復自己并不知道這些內情。所以對話就中斷了，我們本來以為對話在中斷兩個小時之後，解決了直播技術問題之後，可以繼續進行。結果沒有進行。〈參：柴玲 2.6.2 與閻明復對話〉

五月十五日、五月十六日對話代表團都做了很多努力。在中南海的西北門也有一個靜坐。五月十六日對話代表團的大部分主談代表宣佈在新華門前靜坐，直到政府同意對話。當時宣誓坐在新華門前，已經比較激動了。因為那時候開始已經有絕水的同學，十二位絕水的同學，躺在人民大會堂北面，我當時給他們跪下讓他們停止絕水。就是因為這種情緒，對話團已變成非理性的了。至少我跟對話團裏的其他幾個主談代表，已經變得很情緒化了。五月十六日晚上，我們在新華門前靜坐的時候，新華門前已經變成另外一個重點了。這時，統戰部方面八次過來，叫我一定要去統戰部，統戰部的副部長，給我們匯報【以上第 86 頁】政治局常委會六人會議的內幕。當然不是直接給我們講，就是講大概的情況。所謂六個人，當然是加上鄧小平了，在這個會議上，出現了一些決定，就是說以五比一通過否定學運的意義，不是愛國運動了等等。所以才有五月十七日凌晨趙紫陽在電視上的講話，大家都記得。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聽了趙紫陽的電視上的講話，也就是五月十六日夜裏的那個政治局會議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決定撤離廣場，本來我們在廣場設有聯絡處。五月十九日知道了戒嚴的消息之後，大家都去了統戰部。我想劉燕是在場的唯一見證人吧。大家吃了一頓面條，又回到廣場。大家都決定撤離廣場，停止絕食是折

中的方案。後來在絕食指揮車前面 爭論很多，我當時的印象是，停止絕食都是有共識的，爭論在於柴玲還是吾爾開希、王丹可以宣佈停止絕食。對話失敗之後，對話代表團還做過一些努力，五月十九日夜裏戒嚴之後對話代表團曾經有過一個會議。當時總部從藝術院校又撤回政法大學，由政法大學當時對話代表團秘書處和社科院的一位主談代表主持這個會議，做了大量對廣場的支持工作，包括楊尚昆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內容的披露，都是從這一系統出來，由北大印的。項小吉在五月二十號離開北京，同時對話代表團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基本上解體了。

五月十五日、五月十六日 對話代表團都做了很多努力。在中南海的西北門也有一個靜坐。五月十六日對話代表團的大部分主談代表宣佈在新華門前靜坐，直到政府同意對話。當時宣誓坐在新華門前，已經比較激動了。因為那時候開始已經有絕水的同學，十二位絕水的同學，躺在人民大會堂北面，我當時給他們跪下讓他們停止絕水。就是因為這種情緒，對話團已變成非理性的了。至少我跟對話團裏的其他幾個主談代表，已經變得很情緒化了。五月十六日晚上，我們在新華門前靜坐的時候，新華門前已經變成另外一個重點了。這時，統戰部方面八次過來，叫我一定要去統戰部，統戰部的副部長，給我們匯報【以上第

86頁】政治局常委會六人會議的內幕。當然 不是直接給我們講，就是講大概的情況。所謂六個人，當然是加上鄧小平了，在這個會議上，出現了一些決定，就是說以五比一通過否定學運的意義，不是愛國運動 了等等。所以才有五月十七日凌晨趙紫陽在電視上的講話，大家都記得。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聽了趙紫陽的電視上的講話，也就是五月十六日夜裏的那個政治局 會議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五月十七日對話代表團決定撤離廣場，本來我們在廣場設有聯絡處。五月十九日知道了戒嚴的消息之後，大家都去了統戰部。我想劉燕 是在場的唯一見證人吧。大家吃了一頓面條，又回到廣場。大家都決定撤離廣場，停止絕食是折中的方案。後來在絕食指揮車前面爭論很多，我當時的印象是，停止 絕食都是有共識的，爭論在於柴玲還是吾爾開希、王丹可以宣佈停止絕食。對話失敗之後，對話代表團還做過一些努力，五月十九日夜裏戒嚴之後對話代表團曾經 有

過一個會議。當時總部從藝術院校又撤回政法大學，由政法大學當時對話代表團秘書處和社科院的一位主談代表主持這個會議，做了大量對廣場的支持工作，包括 楊尚昆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內容的披露，都是從這一系統出來，由北大印的。項小吉在五月二十號離開北京，同時對話代表團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基本上解體了。

【封從德：你提到五月十三日在統戰部有一個對話，五月十四日還有一個對話，就是有兩次對話，是嗎？

沈彤：是的。五月十三日不是一個對話，其他人都描述了很多細節，是學生三方和閻明復以及統戰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六局的局長陶斯亮和下面幾個處長，包括 幾方面的人物，我認為起到中間層次作用的人，一個方面是所謂自由派的，象劉小波、周舵、鳴琪這些人，另外一個是軍濤他們，就是體制外的，後來又跟體制內有 聯系的這些人，還有各校團系統的這一批人，第四批最有意思，就是團中央的人，象劉延東那些人。實際上所有在前臺的人都到一起來了。

張倫：據我了解的情況，鳴琪一直是北京社會經濟學院研究所的重要成員，他不是自由知識分子。周舵兩年以來雖然身在四通，但基本的重要社會活動，包括八九民運的一些活動，都是跟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跟王軍濤在一起。

封從德：你說項小吉五月二十日離京，他到哪裏去了？

沈彤：南昌。】【以上第 87 頁】

2 . 4 絕食的發起（柴玲）

2.4.1 學運低潮〈參：王超華 2.2.4 學運低潮〉

學運低潮時的格局：第一個就是自治組織漸漸與學生主體脫節，包括北高聯和北大籌委會，這是基本的感覺。自治組織尤其是北大籌委會開始運作得比較秩序化的時候，有很多專業化的發展，這時跟同學基本的情緒感受聯系不是很緊密，尤其是宣傳部和秘書處的工作，祇是不斷通過大字報、廣播站把會議記錄和會議決定往外 播。同學的各種建議提上來之後，沒有得到及時的反應或採納。第二個是北京學生罷課與不罷課之爭，這包括高校的復課。從五月四日宣佈復課以後，基本的高校都 復課了，祇有北大還在堅持罷課，清華、師大，還有人大全部都復課了，但是第二天他們又聲援北大，又開始罷課。雖然在五月四日做民意調查的時候，有百分之六 十多還是百分之八十多的同學同意罷課，但實際上還是有很多同學去上課的。而且罷課呢，基本上都是罷自己不愛上的課，比如中共黨史。第三是對話團進展非常遲 緩。剛才沈彤已經講過，事實上給大家一個感覺，對話代表團象一個球那樣被踢來踢去，始終沒有明確的進展。第四個是小學校“秋後算帳”的動向。象五月十日左 右，大家知道的北京工藝美術學院，開始開除學運中比較活躍的學生領袖。

從五四以後，我跟老封基本上都退下來了，希望能有新鮮血液進來。這個時候，常勁接替了秘書長的工作，楊濤做主席。那個時候，我記得常勁馬上搞出

一套大會制度，還有例會制度等等，貼在牆上。我跟封從德撤下來以後，基本的注意力是盯著廣播站的常規運作，還有校園民主化，基層工作方面。廣播站以前比較職業化一點，希望在二樓念稿子。後來，五月九日晚上，老封把它搬到樓下去，這樣直接搞成一個“自由論壇”，大家可以自由地講。從此很快地密切了組織跟同學之間的關係，三角地每天晚上七點到十一點之間成為一個很常規的熱點。這個時候，大家都希望逐漸地建立校園民主，包括辦報、直選等等。我那時的基本想法就是因為看到這個脫節的傾向，希望特別地加強基層建設，我會一個班、一個班，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去走，去動員，而且我也開始在這樣做。

這時候，謝劍給我提出過一個建【以上第 88 頁】議。他說：“柴玲，你還是回

來吧。宣傳部搞得非常不好，秘書處也需要你來做。你看你要做什么？”我跟他說：“你這樣搞上層建築是沒有用處的。我基本認為運動還是應該始終跟著主體一起走。”

從五四以後，我跟老封基本上都退下來了，希望能有新鮮血液進來。這個時候，常勁接替了秘書長的工作，楊濤做主席。那個時候，我記得常勁馬上搞出一套大會制度，還有例會制度等等，貼在牆上。我跟封從德撤下來以後，基本的注意力是盯著廣播站的常規運作，還有校園民主化，基層工作方面。廣播站以前比較職業化一點，希望在二樓念稿子。後來，五月九日晚上，老封把它搬到樓下去，這樣直接搞成一個“自由論壇”，大家可以自由地講。從此很快地密切了組織跟同學之間的關係，三角地每天晚上七點到十一點之間成為一個很常規的熱點。這個時候，大家都希望逐漸地建立校園民主，包括辦報、直選等等。我那時的基本想法就是因為看到這個脫節的傾向，希望特別地加強基層建設，我會一個班、一個班，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去走，去動員，而且我也開始在這樣做。這時候，謝劍給我提出過一個建【以上第 88 頁】議。他說：“柴玲，你還是回來吧。

宣傳部搞得非常不好，秘書處也需要你來做。你看你要做什么？”我跟他說：“你這樣搞上層建築是沒有用處的。我基本認為運動還是應該始終跟著主體一起走。”

2.4.2 串聯絕食〈參：2.7.6 誰最先發起絕食？〉

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有絕食的主意，同張伯笠聊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我們歷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個殺手剪，就是絕食，連古代皇帝也受不了這一套，別說外國了。你們要絕食，我們在校園裏也絕食，拉起一個棚子來，網些白布，都圍起來。當然我們回來，可以到宿舍裏，廁所裏偷偷吃一點，然後再出去。大學校長一看見你們絕食，你們這些祖國的寵兒寶貝，一看見你們絕食，還不得趕緊抱著你們，把你們送回來。”當時我們覺得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那是四月二十六日在作家班的事。在這同時，我想絕食這個主意是一個社會現象，當時很多很多人有這個想法。但是具體實現是在五月十二日上午大概九點的時候，我在北大籌委會，然後王丹、王文、楊朝暉來到北大籌委會，就說“上，我們準備明天絕食，趕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兩天，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反應。”王丹說是他們在師大已經商量好了，還有吾爾開希、馬少方這些所謂的幾個發起人，來了以後就說：“我們要絕食。”我說：“那好，我們同意。”當時北大籌委會有一些人，大家一表決，很快就同意了。後來我就問：“絕食的條件是什麼？”絕食條件他們寫了很多，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什麼新聞自由。後來我一看，我說，“如果你這個條件，我們就不參加。”然後，我就提了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求對話”，一個是“平反動亂”。我說：“就這麼兩個條件，回去征求意见。”王文拿著東西就回去了。我們籌委會有幾個人員，各個部委，有宣傳部的、財物部的，還有糾察隊，我們幾個人就開始分工合作，怎麼樣把絕食之前之後都籌備起來。當時這個分工基本上都是我來做的。當我們分工基本上都下去的時候，是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楊朝暉去了北高聯，他回來很急急忙忙的說：“不行了。北高聯通知不絕食了。”我覺得很奇怪，說：“為什麼不絕食了？所有的事情都布置下去了。”他說：“高聯通知，不絕。”我覺得很奇怪，就跟楊朝暉一起去北高聯，問怎麼一回事。進了屋子裏面以後，當時大家都在談建立財政制度【以上第89頁】的問題，我去了以後就聽到一個尾巴。

當時好象是鄭旭光在說：“通知各個學校，不允許絕食。”每個學校的同學接到命令以後，馬上就走了。完了就談財務問題。楊朝暉本來開始是很積極，他是絕食傳達者，後來馬上動搖說不絕。我們說，“如果我們能說服高自聯，還絕不絕？”他說，“那我當然同意。”一去之後，他馬上坐在座位的中間，儼然就是高自聯的一員。到最後的時候他說，別的學校來問為什麼不絕食？鄭旭光一揮手說：“這個問題早就已經討論過了。接下一個財務問題。”當時就沒有聲音了。到最後的時候，財務問題都討論清楚以後，我就問了一句，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允許絕食？”我記得王超華就說：“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祇要

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能理解。”當時我就問了一句，“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只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構，為什麼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占著領導的位置，沒有領導的能力。”當時沒有什麼聲音。我就說：“不管你們怎麼說，北大已經同意絕食，而且我們也會進行。”就此就分開了。〈參：王超華 2.5.2 北高聯反對絕食〉

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有絕食的主意，同張伯苓聊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我們歷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個殺手翦，就是絕食，連古代皇帝也受不了這一套，別說外國了。你們要絕食，我們在校園裏也絕食，拉起一個棚子來，網些白布，都圍起來。當然我們回來，可以到宿舍裏，廁所裏偷偷吃一點，然後再出去。大學校長一看見你們絕食，你們這些祖國的寵兒寶貝，一看見你們絕食，還不得趕緊抱著你們，把你們送回來。”當時我們覺得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那是四月二十六日在作家班的事。在這同時，我想絕食這個主意是一個社會現象，當時很多很多的人有這個想法。但是具體實現是在五月十二日上午大概九點的時候，我在北大籌委會，然後王丹、王文、楊朝暉來到北大籌委會，就說“上，我們準備明天絕食，趕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兩天，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反應。”王丹說是他們在師大已經商量好了，還有吾爾開希、馬少方這些所謂的幾個發起人，來了以後就說：“我們要絕食。”我說：“那好，我們同意。”當時北大籌委會有一些人，大家一表決，很快就同意了。後來我就問：“絕食的条件是什麼？”絕食条件他們寫了很多，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什麼新聞自由。後來我一看，我說，“如果你這個条件，我們就不參加。”然後，我就提了兩個条件，

一個是“要求對話”，一個是“平反動亂”。我說：“就這麼兩個條件，回去征求意見。”王文拿著東西就回去了。我們籌委會的幾個人員，各個部處，有宣傳部的、財務部的，還有糾察隊，我們幾個人就開始分工合作，怎麼樣把絕食之前之後都籌備起來。當時這個分工基本上都是我來做的。當我們分工基本上都下去的時候，是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楊朝暉去了北高聯，他回來很急急忙忙的說：“不行了。北高聯通知不絕食了。”我覺得很奇怪，說：“為什麼不絕食了？所有的事情都布置下去了。”他說：“高聯通知，不絕。”我覺得很奇怪，就跟楊朝暉一起去北高聯，問怎麼一回事。進了屋子裏面以後，當時大家都在談建立財政制度【以上第89頁】的問題，我去了以後就聽到一個尾巴。當時好象是鄭旭光在說：“通知各個學校，不允許絕食。”每個學校的同學接到命令以後，馬上就走了。完了就談財務問題。楊朝暉本來開始是很積極，他是絕食傳達者，後來馬上動搖說不絕。我們說，“如果我們能說服高自聯，還絕不絕？”他說，“那我當然同意。”一去之後，他馬上坐在座位的中間，儼然就是高自聯的一員。到最後的時候他說，別的學校來問為什麼不絕食？鄭旭光一揮手說：“這個問題早就已經討論過了。接下一個財務問題。”當時就沒有聲音了。到最後的時候，財務問題都討論清楚以後，我就問了一句，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允許絕食？”我記得王超華就說：“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祇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能理解。”當時我就問了一句，“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祇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構，為什麼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占著領導的位置，沒有領導的能力。”當時沒有什麼聲音。我就說：“不管你們怎麼說，北大已經同意絕食，而且我們也會進行。”就此就分開了。〈參：王超華 2.5.2 北高聯反對絕食〉

這之前，有一個老師來過。這個老師是跟老封有緣分的。八八年老封在柴慶豐事件的時候，不斷地在做演講，到了最後比較激動。後來老師說“我有話要同你講，你到我宿舍來。”他是北大青年教師，到宿舍後他說：“你喝點水，我看你非常激動。我怕你出事情，就是讓你緩一緩。”後來從宿舍出來，老封又去看那個特別行動委員會。從此，我就知道那個老師。他來了以後就給我講了一下黨內文件的傳達。他說：“因為我是黨員，我還知道外地的一些朋友的來信。這些事情很擔憂，不要被表面現象，就是趙紫陽講話所迷惑。實際上還是怕他們把你們哄下去，然後再來個一網打盡。”

晚上大約七點左右，自由論壇已經開始。還是跟往常一樣，各個人在講演。在這之前，我看了一下北大絕食報名的名單，上面祇有四十幾個左右，還有一個人附了一首小詩，說“壯士一去要復還”。我跟王丹的基本默契就是，兩個人配合演講，因為兩人的風格不一樣。王丹就在中間講了一句，說要絕食等。大家都很鼓掌。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動員的講話。我說，“我為什麼絕食？看著大家為復課不復課【以上第 90 頁】分成幾派，我們在自耗。如果大家不願意學習，誰都不會到北大、清華來。但是，即使你搞校園民主也好，搞新聞解放也好，祇要動亂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這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而且現在已逐漸有‘秋後算帳’的形勢，我們該怎麼辦？幾年來，我們一次一次運動，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為什麼？我們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為什麼總是要不來。而且，我們不斷喊‘人民萬歲！’可是為什麼警察來了，人民都撒鷹子跑。而且為什麼我們喊‘警察萬歲’的時候，警察總是來打我們。為什麼要絕食？就是我們想用這種方式，我們唯一的自由，來看看我們國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這個國家還值不值得我們去獻身，去貢獻。”這跟我個人當時的思想情緒有關，因為我當時正在聯系出國留學。老封當時思想上很衝突，他覺得出國好象就有棄國這樣一種感覺，而且大家在顧慮要做第二等公民等等，就是想看看這個國家到底還值不值得為它奉獻。完了之後，當時就很多人熱烈鼓掌。

晚上大約七點左右，自由論壇已經開始。還是跟往常一樣，各個人在講演。在這之前，我看了一下北大絕食報名的名單，上面祇有四十幾個左右，還有一個人附了一首小詩，說“壯士一去要復還”。我跟王丹的基本默契就是，兩個人配合演講，因為兩人的風格不一樣。王丹就在中間講了一句，說要絕食等。大家都很鼓掌。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動員的講話。我說，“我為什麼絕食？看著大家為復課不復課【以上第 90 頁】分成幾派，我們在自耗。如果大家不願意學習，誰都不會到北大、清華來。但是，即使你搞校園民主也好，搞新聞解放也好，祇要動亂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這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而

且現在已逐漸有‘秋後算帳’的形勢，我們該怎麼辦？幾年來，我們一次一次運動，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為什麼？我們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為什麼總是要不來。而且，我們不斷喊‘人民萬歲！’可是為什麼警察來了，人民都撒鷹子跑。而且為什麼我們喊‘警察萬歲’的時候，警察總是來打我們。為什麼要絕食？就是我們想用這種方式，我們唯一的自由，來看看我們國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這個國家還值不值得我們去獻身，去貢獻。”這跟我個人當時的思想情緒有關，因為我當時正在聯系出國留學。老封當時思想上很衝突，他覺得出國好象就有棄國這樣一種感覺，而且大家在顧慮要做第二等公民等等，就是想看看這個國家到底還值不值得為它奉獻。完了之後，當時就很多人熱烈鼓掌。

完了之後我又講了一下基本的絕食籌備原則，還有後面幾個部的配合。比如絕食同學的要求、服裝，還有後勤人員、醫務人員、善後工作、聯絡工作等等。完了之後，一個同學衝上來，一下搶過話筒：“我，我要絕食。”大家都嘩嘩鼓掌。然後，“我，我”大家就說“下去吧！”就笑他，結果他就更結巴了，是一個小男孩。就在這個時候，我記得我跟大家揮揮手，不要這樣子。突然這個掌聲又熱烈地開始響起起來，帶著一種懺悔、內疚，一種正氣開始壓倒邪氣的感覺。這掌聲給這小男孩很大的鼓勵。他又拿著話筒開始說：“我愛我的母親，但是，我更愛我的祖國啊！”他說：“其實，我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到北大來，是想當一個中國的毛澤東。這麼多學運，我從來都沒有游行過，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今天，我正好從圖書館自習完了以後，我聽了這個講演，我覺得我很愛我的媽媽，但是我要為祖國做一點事情。”他的演講當時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也讓我非常感動。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這麼久了，一直說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但是直到那個小孩喊出那一嗓子，我們才真正感覺到，有一種什麼東西，不是這個政府在教育，也不是幾十年來紅色文化的影響，而是一個什麼東西在我們心中，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根。完了之後，是北大籌委會的表態，他們堅決支持學生，準備承擔各種善後，各種後援的工作。然後，我記得王超華來念北高聯的決議，對同學們絕食的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當時我是非常有看法的。我想你們是什麼東西啊，表示【以上第91頁】支持，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不過當時沒有說。

等我再回到籌委會時，排了很長的隊在報名，有人告訴我說，已經有一百八十個人報名絕食。我很相信，那中間加上去的一百四十個同學一直到最後的二百二十個同學，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很象那個男孩子，就是很用功，很上進，也不關心政治，但是憑著一腔從生命中生長出來的愛國心，才參加到這個絕食運動中的。

完了之後我又講了一下基本的絕食籌備原則，還有後面幾個部的配合。比如絕食同學的要求、服裝，還有後勤人員、醫務人員、善後工作、聯絡工作等等。完了之後，一個同學衝上來，一下搶過話筒：“我，我要絕食。

“大家都嘩嘩鼓掌。然後，”我，我“大家就說”下去吧！”就笑他，結果他就更結巴了，是一個小男孩。就在這個時候，我記得我跟大家揮揮手，不要這樣子。突然這個掌聲又熱烈地開始響起起來，帶著一種懺悔、內疚，一種正氣開始壓倒邪氣的感覺。這掌聲給這小男孩很大的鼓勵。他又拿著話筒開始說：“我愛我的母親，但是，我更愛我的祖國啊！”他說：“其實，我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到北大來，是想當一個中國的毛澤東。這麼多學運，我從來都沒有游行過，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今天，我正好從圖書館自習完了以後，我聽了這個講演，我覺得我很愛我的媽媽，但是我要為祖國做一點事情。”他的演講當時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也讓我非常感動。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這麼久了，一直說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但是直到那個小孩喊出那一嗓子，我們才真正感覺到，有一種什麼東西，不是這個政府在教育，也不是幾十年來紅色文化的影響，而是一個什麼東西在我們心中，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根。完了之後，是北大籌委會的表態，他們堅決支持學生，準備承擔各種善後，各種後援的工作。然後，我記得王超華來念北高聯的決議，對同學們絕食的蓋來表示理解和支持。當時我是非常有看法的。我想你們是什麼東西啊，表示【以上第 91 頁】支持，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不過當時沒有說。等我再回到籌委會時，排了很長的隊在報名，有人告訴我，已經有一百八十個人報名絕食。我很相信，那中間加上去的一百四十個同學一直到最後的二百二十個同學，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很象那個男孩子，就是很用功，很上進，也不關心政治，但是憑著一腔從生命中生長出來的愛國心，才參加到這個絕食運動中的。

2.4.3 寫絕食書〈參：2.7.5 誰是絕食書的作者？〉

我順便提一下絕食書的事情。有個女生對我說：“你們有沒有這種絕食書，好象是你們的遺言？”我說：“我們有絕食宣言了。”是王丹寫的，就是絕食要求一、二、三。她說：“你這太幹巴巴了。你不知道絕食完了會有什麼結局，也可能就是你們生命的一段重要歷程，也可能就是最後的歷程。你要不要給你的

母親，給這個人民，還給那些不了解的老百姓留下些什麼東西，讓他們理解你們。你們不就想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政府的面孔？象這樣的話，你把它寫上去。”我說這個主意很好。一個叫何桂芳的人，他在旁邊一個勁的說：“我最佩服的就是秋瑾，‘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真希望柴玲說出這句話來。”我當時氣得要命，我心想，我們是為了生而戰，我們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這個當時演講的時候也說過了。我氣得要命，整個思路就全都給攪得亂七八糟。後來張伯笠來找到我，“啊呀，柴玲、老封快去我們那兒。白夢聽了你們的演講以後就哭啊，結果一口氣跑到北大外面買了一大鍋餛飩，等了你和老封趕快去吃，還熱著呢。”說那個餛飩當時沒有盆裝，還跟那個個體戶租了一個盆，交了五塊錢押金，趕快去吃，好趕快還盆把押金要回來。去了以後，白夢也在。

第二天早上，用了一個早晨，寫了一些絕食書，寫得很痛苦。那個時候真的不是鬧著玩的時候了，你真的覺得要跟生命中成長以來一塊伴隨成長的東西告別。白夢在那看了，抽著煙很嚴肅地說：“把東西交給我吧，十二點鐘你來拿。”然後，我就再去籌委會，回來時，把東西拿了。一批人在燕園錢行的時候就念。念完了以後，大家在二十九樓門前的花壇集合，彭嶸、趙體國帶大家宣誓。大家扎著白帶，【以上第 92 頁】穿著白衣服就出發了。我記得門口是：“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我記得就是這個心情。幾個小男孩站在三輪車上，打著北京大學的旗幟，就出發了。

第二天早上，用了一個早晨，寫了一些絕食書，寫得很痛苦。那個時候真的不是鬧著玩的時候了，你真的覺得要跟生命中成長以來一塊伴隨成長的東西告別。白夢在那看了，抽著煙很嚴肅地說：“把東西交給我吧，十二點鐘你來拿。”然後，我就再去籌委會，回來時，把東西拿了。一批人在燕園錢行的時候就念。念完了以後，大家在二十九樓門前的花壇集合，彭嶸、趙體國帶大家宣誓。大家扎著白帶，【以上第 92 頁】穿著白衣服就出發了。我記得門口是：“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我記得就是這個心情。幾個小男孩站在三輪車上，打著北京大學的旗幟，就出發了。

2 . 5 反對絕食：北大、高聯與統戰部

（常勁，王超華，梁二）

2.5.1 北大籌委會的反應（常勁）

第一，我對柴玲說的北大籌委會支持絕食做一個細節的補充，因為這對北大籌委會的決議很重要。王丹在十二日早晨拿著絕食簽名信到北大的時候，柴玲看了以後，柴玲支持。然後北大兩個主要的幹部當時就在上面簽了名。但是北大籌委會大概在四、五天以前已經做過決定，對絕食不加考慮，因為絕食是我們最後一招。當時柴玲也在場，所以**北大籌委會是兩個主要幹部支持絕食，我們不支持絕食**。當時柴玲他們說，以學生名義發起這個絕食，不借助籌委會。所以十二日早晨北大籌委會做了一個決定：北大籌委會支持這些學生以個人的名義去發這個通知。然後借給了他們廣播站。這個我做一個澄清。

他們的這個絕食，我們並不是希望他們成功的。早晨祇有四十個人簽名，就是因為北大在內部已經對此已經有一個小的共識了。至於後來的影響，北大的轉變，我想柴玲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第二個，關於北大籌委會五月四號到五月十二號那一階段的工作，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個跟絕食是有關係的，而且跟剛才王超華提到的高聯和北大籌委會的關係是非常有關係的。

當時北大籌委會工作已經進入了正規化、程序化，而且建立了日常輪流換班的制度。柴玲他們當時認為自治會和基層缺乏溝通，所以北大籌委會成立了兩個重要的部，一個是分籌委的組織工作，另外一個是負責班代表民選的一個機構。北大所做的這些工作，就是為了加強自治會和基層的聯系，為了順應當時超華他們發的那個校園民主化的決議。而且當時北大在罷課與復課的問題上還做了一次民意調查，這個是有據可查的。【以上第 93 頁】

2.5.2 北高聯反對絕食（王超華）〈參：柴玲 2.4.2 串聯絕食〉

我當時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各校繼續罷課都是有困難的。我們做了一些調查，發現一般的受到壓力的是北京市屬院校。可是北京市委沒有向市屬院校的黨委宣傳部或者類似機構發過什麼正式的通知，說是要處理學生運動。我們的一個基本評價是，在我們宣佈復課，學運暫時不活躍階段，學校裏面的積極分子受到壓制，多半是那些中層領導怕將來要負這個責任，主動對學生採取壓制，主動給學生算帳的。凡是校方領導比較開放的，就沒有這種現象，象北大、師大等幾個大院校。

在做這些調查之後，五月十一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梁二拿著一個傳單，他在五月七日星期天的時候就給我看過，叫做“除了中華富強，我們別無所求。”他的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哪怕學運暫時失敗，哪怕我們學生領袖暫時受到壓制，學生領袖個人都受到迫害，根據現在情況，我們不應該再做什么了。馬少方說，“誰不是為了中華富強”。我非常不滿意，但是我沒有象梁二那樣馬上拍桌子起來跟他喊。我說，“你要是有一點基本常識的話，象西方國家那些的中國問題專家，根據一般的消息，哪怕是報紙的報導都能分析出動向。你不要專靠小道消息，而且你如果這樣光靠著這個，完全迷信這個，不對報導加以佐證的話，會有問題的。”（刪一百字【異】。）我們當時就已經提出，并在各個學校

傳達過，反對四〇二六社論，擁護趙紫陽五〇四講話。這是高聯提出來的，是我們那時所謂的“要務虛，要務實”，務虛以後提出的一個口號。

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祇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聯絕食呢？”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包括劉燕說的民族學院、師範學院，馬少方自己的電影

【以上第 94 頁】學院，還有很多院校。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我們隨時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麼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麼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衝我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祇放出一個風聲，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祇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聯絕食呢？”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

自己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包括劉燕說的民族學院、師範學院，馬少方自己的電影【以上第 94 頁】學院，還有很多院校。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我們隨時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么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么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衝我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祇放出一個風聲，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所以我們通過決議是勸阻絕食。有人說，“哎呀，已經跟北大說了，北大的柴玲他們非常堅決。”在這之前我在北大 1 2 3 那兒已經聽過說要絕食，我當時根本沒重視。我覺得好象我和柴玲他們一直關係還不錯，我說“北大我包了，我負責勸阻。”接下來就討論財務制度和其它的事。

那天香港的同學在那兒，他們帶去幾樣東西，第一是一二〇九的資料，建議我們跟一二〇九的歷史經驗學習；第二個是章程，建議我們盡快地完善章程。他們帶來三本不同時期的章程，鄭旭光一本，王志新一本，我說我最近可能沒時間看，不要在我手裏耽誤了別人的研究，第三本我忘了是誰拿了；第三個是一個計劃，香港已經跟臺灣聯系了，臺大和香港中文大學每家出十個人，北大出十個人，辦一個夏令營，準備在六月一號開始正式申請，六月中進行。他們說，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申請到了以後，我們就說我們不是跟官方的學校聯歡，是跟你們辦這個夏令營。所以柴玲他們來時，我們還在這兒高興，做這個長遠計劃。當時對話的很重要的一點內容就是保存高自聯這個組織。因為高自聯組織是撕開一個口子，不管哪方面失敗了，祇要有個組織存在，就是自治組織在中國撕開了一個口子。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我們哪怕被壓，壓到最後，如果在香港、臺灣同學的支持下這個計劃做成的話，那怕不做其他的活動，都是一個【以上第 95 頁】很大的壓力，他們沒有什麼辦法一下子來否定這個事的。

那天香港的同學在那兒，他們帶去幾樣東西，第一是一二〇九的資料，建議我們跟一二〇九的歷史經驗學習；第二個是章程，建議我們盡快地完善章程。他們帶來三本不同時期的章程，鄭旭光一本，王志新一本，我說我最近可能沒時間

看，不要在我手裏耽誤了別人的研究，第三本我忘了是誰拿了；第三個是一個計劃，香港已經跟臺灣联系了，臺大和香港中文大學每家出十個人，北大出十個人，辦一個夏令營，準備在六月一號開始正式申請，六月中進行。他們說，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申請到了以後，我們就說我們不是跟官方的學校聯歡，是跟你們辦這個夏令營。所以柴玲他們來時，我們還在這兒高興，做這個長遠計劃。當時對話的很重要的一點內容就是保存高自聯這個組織。因為高自聯組織是撕開一個口子，不管哪方面失敗了，祇要有個組織存在，就是自治組織在中國撕開了一個口子。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我們哪怕被壓，壓到最後，如果在香港、臺灣同學的支持下這個計劃做成的話，哪怕不做其他的活動，都是一個【以上第 95 頁】很大的壓力，他們沒有什麼辦法一下子來否定這個事的。

但是這個時候，柴玲他們來了。她開始問為什麼不支持絕食，我主要分析，絕食主要不是因為形勢嚴峻，而是激進同學的一種無力感，他們沒有辦法動員更多的人跟他們在一塊兒了。柴玲說，“我就是學心理學的，我不用你來分析我的心理。”這之後，柴玲和其他幾個北大的同學在那兒說，她幾乎是把《絕食宣言》裏的那點話都說出來了。我已經沒有辦法說服她了。最後，他們走的時候說“呵，連我們都勸阻不了，你還想勸阻誰啊。”他們就走了。我已經是趴在桌子上了，我覺得真是沒有辦法了。（柴玲插：我就說，“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就是絕食絕定了，就是這麼回事。”）<參：2.7.5：誰是絕食書的作者？><參：柴玲：2.4.2：串聯絕食>

這之後我就想，當時柴玲和其他幾個男生，最重要的就是不怕犧牲。我心想，我也不怕，我又不是因為怕犧牲才反對絕食。我知道封從德他們每天晚上七點多，在那兒有一個“自由論壇”。我就想，應該到那兒去，利用這個機會勸大家。我那會兒想得非常可笑，不就是犧牲嗎，拿個菜刀把手剁下來，你看，我也敢犧牲，完全不在於這個。不過想來想去沒有這個決心，就想起戴晴來了。

【柴玲：超華提到過一句就是說“我們不怕犧牲”，其實是這麼一回事。當時你們下令不許絕食，有一個理由是“高聯沒有辦法負責同學的安全”。後來我就說了一句“我們有權力決定自己的生命”，不是說犧牲的問題。】

2.5.3 請知識分子勸阻絕食

我就到戴晴那兒去。戴晴她也很著急這事，她說：“我早就說過，四〇二七游行已經是你們能取得的最大勝利。再要鬧的話，一定會倒退二十年。”這是她反復說的。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間，我們曾經鼓勵各校盡可能地請各個學者到本校去開講座。人大在八百人的大教室，遠志明、戴晴他們都去講過。戴晴上去就講“大學生是最偉大的。”所以我想請她去勸阻絕食。她當時就到處打電話，找人找不到，李佗他們當天晚上在起草五〇一六聲明。最後祇找到一個

嚴家【以上第 96 頁】其，嚴家其不來。我非常驚訝。她說，“我在那兒等著，明明就是快跟嚴家其來了，可嚴家其不肯來，不肯來勸學生。”然後她問我找湯一介可以不可以？湯一介當時正在發心臟病。我不太了解，湯一介在學生當中究竟有多少影響。因為我們家和他們家完全是私人朋友，我都沒有想過他可能有影響，所以我很懷疑。我說：“他行嗎？”就沒接受她這個。我說，“我就希望你去。”我坐在那兒老抹眼淚。她說，“你別老在這兒。你在这兒，給我壓力太大。你走吧！你走，我一定設法。”我不能肯定她是否馬上就跟上面有聯系了，因為她和上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天晚上有一個常委會，要求匯報勸阻情況。原來我是最堅決勸阻的，等回來匯報時，師大已經說沒什麼問題了，可是我已經泄氣了，我說：“別勸阻了。看看北大的人數越來越多，咱們祇能支持。但是一定要設法把高聯和這個絕食運動劃開，這樣才有可能將來保存高聯。”所以寫了一個“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這個是我自己起草的，但是打印出來已經是半夜一點了，我們在籌委會的房間裏一直等到下半夜印出來才走的。

我就到戴晴那兒去。戴晴她也很著急這事，她說：“我早就說過，四〇二七游行已經是你們能取得的最大勝利。再要鬧的話，一定會倒退二十年。”這是她反復說的。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間，我們曾經鼓勵各校盡可能地請各個學者到本校去開講座。人大在八百人的大教室，遠志明、戴晴他們都去講過。戴晴上去就講“大學生是最偉大的。”所以我想請她去勸阻絕食。她當時就到處打電

話，找人找不到，李佗他們當天晚上在起草五〇一六聲明。最後祇找到一個嚴家

【以上第 96 頁】其，嚴家其不來。我非常驚訝。她說，“我在那兒等著，明明就是快跟嚴家其來了，可嚴家其不肯來，不肯來勸學生。”然後她問我找湯一介可以不可以？湯一介當時正在發心臟病。我不太了解，湯一介在學生當中究竟有多少影響。因為我們家和他們家完全是私人朋友，我都沒有想過他可能有影響，所以我很懷疑。我說：“他行嗎？”就沒接受她這個。我說，“我就希望你去。”我坐在那兒老抹眼淚。她說，“你別老在這兒。你在这兒，給我壓力太大。你走吧！你走，我一定設法。”我不能肯定她是否馬上就跟上面有聯系了，因為她和上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天晚上有一個常委會，要求匯報勸阻情況。原來我是最堅決勸阻的，等回來匯報時，師大已經說沒什麼問題了，可是我已經泄氣了，我說：“別勸阻了。看著北大的人數越來越多，咱們祇能支持。但是一定要設法把高聯和這個絕食運動劃開，這樣才有可能將來保存高聯。”所以寫了一個“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這個是我自己起草的，但是打印出來已經是半夜一點了，我們在籌委會的房間裏一直等到下半夜印出來才走的。

2.5.4 北高聯被迫接受絕食（梁二）

【五月十二日晚上開高聯會議。當時我們統一了一下意見，認為絕食是勢在必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作的一件事就是表示同情和理解。我剛才看到老封的那篇文章當中提到，我們在北大同學的這種規模相當浩大的絕食運動前面迫不得已表示同情和理解。這句話我覺得可能是記憶上的出入。在十二日晚上我們已經發表了這種聲明，提出表示同情和理解。當時我記得我為了等高聯印出來這個報告，等到十三日早上。而絕食隊伍正式出發是在十三日下午。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們商量、討論了好久。我提出了幾點，其中一個是當時的絕食的口號中，很多同學很明顯地傾向以高聯為領導的絕食，我擔心這樣的情況會受到中共的攻擊，給中共留下把柄，以學生的生命作為要脅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我不願意讓中共有這種發覺。我當時的意見是這樣的。還有一個觀點我自己也認為這樣絕食下去的話，會使矛盾激化，走下去出不來。我當時抱著一種很悲觀的態度，這種悲觀表現在第一對激進同學的擔心，這種激進的情緒有可能和政府產生比較大的衝突。這種衝突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流血，一個是【以上第 97 頁】十年開放受到阻攔，方針、政策倒退；第二個擔心是如果不進入激進化的程度，無聲地收尾的話，共產黨秋後算帳的作風也使我擔憂。很多同學會關在監獄裏，還有那種擱淺的狀態，既不能在學校中生活下去，又不能到社會上

發揮任何作用。我就擔心這兩點，所以我對絕食比較反對。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們商量、討論了好久。我提出了幾點，其中一個是當時的絕食的口號中，很多同學很明顯地傾向以高聯為領導的絕食，我擔心這樣的情況會受到中共的攻擊，給中共留下把柄，以學生的生命作為要脅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我不願意讓中共有這種發覺。我當時的意見是這樣的。還有一個觀點我自己也認為這樣絕食下去的話，會使矛盾激化，走下去出不來。我當時抱著一種很悲觀的態度，這種悲觀表現在第一對激進同學的擔心，這種激進的情緒有可能和政府產生比較大的衝突。這種衝突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流血，一個是【以上第 97 頁】十年開放受到阻攔，方針、政策倒退；第二個擔心是如果不進入激進化的程度，無聲地收尾的話，共產黨秋後算帳的作風也使我擔憂。很多同學會關在監獄裏，還有那種擱淺的狀態，既不能在學校中生活下去，又不能到社會上發揮任何作用。我就擔心這兩點，所以我對絕食比較反對。

當時我雖然提出反對，但我還是表示理解。我記得在十二日作出的決議中也有號召各校組織人力、物力到廣場去幫絕食同學。組成糾察隊保護他們，避免警察利用武力把學生驅散、拉走。高聯在這個時候已經作出決議。

我當時與開希達成一個協議，就是開希、程真、彭濤、王丹，我們分工協作。開希他們以前就在北高聯擔任過重要職務，他們對北高聯的常委有比較深的感情，至少是能相互理解、相互接受的情意；第二，如果他們加入絕食，利用比較高的威望可能成為絕食團的領導。後來有一些預想不到事出現了，就希望他們利用自己在絕食團的影響達到控制絕食團的作用，避免情緒的進一步激化，同時又完成與北高聯的協作的的作用。

在五月十三日的對話之前曾有一個協議，就是我們把我們的立場擺好，把我們自己的角色擺正。北高聯的常委於是就以一種中性的、緩和的、寬容的精神參加會議；吾爾開希、王丹和程真他們以一種比較激進的、代表絕食同學激進情緒的方式參加會議，向政府很明顯地提出交鋒和對壘的建議、要求。當然，北高聯就可以從中漁利。】

2.5.5 絕食促成對話（王超華）

因為我家裏對我的壓力比較大，所以我很早就說要從高聯辭職。五月十三日上午是我第一次辭職，我同我們學校聯系，早上八點多打了一個電話過去，學校告訴說半夜二點鐘的時候，對話代表接到中辦電話，說是中辦同意跟你們

對話了。明明頭一天十一日還答復“不”的，所以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這是絕食激起的，而且我懷疑是和戴晴或者其他什么人有關系的。我們當時就說要討論，而且你要限定我們的人數，我們就不幹。這邊沒有馬上答應同意這個對話，然後才去找對話團。大約是早上十點，對話團在一起開會。

我在高聯的會上說：“既然是絕食，既然昨天晚上我起草了高聯【以上第 98 頁】的聲明，又起草了高聯的通知，我們就要保證同學安全。”我當時還說，“假定不讓軍警把絕食同學架走的話，每天晚上廣場至少要有一萬五千人。”當時還挨個學校布置任務，強迫清華每天至少要出三千人。給很多學校下的是死命令，你要保證你大概出多少人，我們才有可能保證廣場安全。我在高聯把我的辭職書遞過去之後就離開了。

我在高聯的會上說：“既然是絕食，既然昨天晚上我起草了高聯【以上第 98 頁】的聲明，又起草了高聯的通知，我們就要保證同學安全。”我當時還說，“假定不讓軍警把絕食同學架走的話，每天晚上廣場至少要有一萬五千人。”當時還挨個學校布置任務，強迫清華每天至少要出三千人。給很多學校下的是死命令，你要保證你大概出多少人，我們才有可能保證廣場安全。我在高聯把我的辭職書遞過去之後就離開了。

這時我在北大發現，北大已經是相當有秩序了。我不知道他們有一個錢別的宴會，祇看見他們一組一組的來報名，大概是十一點的時候，我以為他們要出去了。然後我就騎車出去，先到師大。到師大的時候，發現冷冷清清。走到他們那個廣播站，看見梁二，我說：“你們怎麼還在這兒呀？北大同學呆會兒就要過來了。”他說：“哦，不是說不去了嗎？”我說：“怎麼不去啊，還去呀。”梁二因為沒有參加常委會，所以他就趕緊廣播。師大倒是一廣播就出來了。

我和梁二還在這兒說話，他們廣播站開始廣播時，劉曉波來了。劉曉波來了一看，“你們在這兒，太好了！馬上跟我走，有人要見你們。”就去了他的宿舍。但是等了很久也沒有人，打電話也沒找到。我都非常著急了，我覺得梁二他們至少應該組織師大這邊的隊伍吧。這時來了人了，原來閻明復要跟主要的學生領袖見見面。這是十三日中午。我認為，閻明復他們這會兒絕對不知道有一個絕食團。當時我清楚知道，我沒有辦法控制絕食學生，對話團也做不到。所以我就和梁二共同提出來，“請你們跟閻明復說，我們現在有三個學生組織，三個學生組織都要派代表。對話團在政法學院，絕食團一會兒會來，我們祇能代表北高聯。你不要以為北高聯還能控制什麼。”

下來的時候，下面是兩個小汽車，一個小汽車是戴晴。戴晴一看我說：“唉，這就是那個學生領袖。”我說：“別說這個了，我現在管不了，正頭疼呢。”我懷疑，這個也跟戴晴有關係，因為戴晴那意思就是，我找她，她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結果了。我認識戴晴，是因為我在《光明日報》工作時和戴晴的辦公室是斜對門。這時，戴晴講上午開了兩個會，一個是胡啟立和新聞工作者

的會，一個是閻明復和青年知識分子的會。她馬上直接對我說“閻明復請你們和我沒有關係，我參加的是胡啟立的會。”我根本不知道有兩個會，她沒必要解釋，所以這也是我覺得她有關係的原因之一。

戴晴跟我說話，把我給耽誤了一會兒，梁二就先走了。等我到師大廣場時，見到開希他們在那整隊，我說晚上要到統戰部去，開希他【以上第 99 頁】們說，已經知道了。我估計是梁二告訴他們的。我就覺得好象我有責任幫助，所以我說，“你們不要叫我當常委了，我也沒辦法來回跑我們學校的事。”

戴晴跟我說話，把我給耽誤了一會兒，梁二就先走了。等我到師大廣場時，見到開希他們在那整隊，我說晚上要到統戰部去，開希他【以上第 99 頁】們說，已經知道了。我估計是梁二告訴他們的。我就覺得好象我有責任幫助，所以我說，“你們不要叫我當常委了，我也沒辦法來回跑我們學校的事。”

另外一個細節需要補充，我跟王丹他們說，師大這兒安排記者招待會肯定不行了，恐怕祇有到廣場再開了。到了廣場要念絕食宣言，我就說，“北大那個絕食宣言好，師大那個實在是不行，幹巴巴的。”“那行，找一個北大的。”一問北大，說傳單發完了，找不到。我在師大外的電線杆子上抄了一份給王丹，王丹念的就是這份，他在前面領的時候，還把最後四句話又重復念了。派給我的任務是叫我念那個聲明。完了以後，要在歷史博物館前頭開記者招待會。這時開希他們已經很著急了，說要去統戰部。本來我也要去統戰部他們一定拉著我去記者招待會，說你高聯的得跟著走。我當時有一些抵觸情緒，心想，我成了陪綁的了。但是我還是跟著到了歷史博物館前頭。（刪一百六十字。）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

然後就去了統戰部，這是十三日晚上。我確實是先離開了，因為我通知的那些聲援部隊說，早來有困難，但是至少九、十點鐘會來，我有必要去布置這個去，所以我就跑回廣場去了。

在統戰部的談話不是對話，當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在，王軍濤、劉曉波、陳小平他們都在。我的印象是當天晚上柴玲基本上沒發言，結果變成我和劉曉波的發言最硬。出來以後，梁二還埋怨我。因為我們在頭一天十二日半夜那次會上發現對絕食祇能支持之後，就自我解嘲的給高聯定了個任務，說這樣也好，絕食團是表示我們的決心，是拳頭，對話團表示我們的容忍、我們的真誠，高聯是長遠計劃。所以一出來梁二他們就埋怨我說，“怎么今天在閻明復那兒就你就最硬啊，你整個把高聯的角色弄混了。”我說，“我也奇怪，怎么開希他們都不硬呀？他們都不硬，那咱們這個要求平反動亂不就沒人說了嗎？”關鍵是動亂，是劉曉波先說，然後我給補充，基本上是我們倆說的。關鍵是我定的這個角色，沒有得到另外兩個組織的認可，也沒有來得及、沒有機會跟他們溝通。

完了以後，我們曾經想再去統戰部。還沒去之前廣場就傳開了，【以上第 100 頁】說有人出賣，有人跟閻明復做交易了，是說開希他們。我到處去查證，誰最後離開統戰部的。我現在想不起這個交易的詳細內容了，但是當時已經傳得很多。我急跑統戰部，想見閻明復，沒有成功，中間我們跑了六次。最後十四日上午終於進去，閻明復又找我們說，“現在就看你們自己了，中央已經決定，明天迎接戈爾巴喬夫儀式不在天安門舉行。現在完全就看你們學生自己了，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這完全是你們自己表態的事了。”這就都急了，王丹和我都在那。我說，“趕快找知識分子來。”王丹說，“你叫得來他們嗎？他們願意來嗎？”我說，“我知道有一個會，是當天下午戴晴組織的一個會，那十幾個知識分子會在那兒，我去請。”開希和王丹很緊張地商量，要設法把同學帶出來。閻明復說，“可以，我們今天下午可以跟你們對話。”我們說，對話代表團在政法學院。他說，他負責去接對話代表團。同時和閻明復對現場是否直播有激烈的爭論。閻明復一定說有技術困難，一定說廣播車都為迎接戈爾巴喬夫做準備了，當天晚上沒有辦法利用。最後他說，“我們把錄像帶當場錄好，你們的代表看著給封，封了跟著我們送到中央電視臺，一盤一盤放，可不可以？你們同學自己也可以錄音，錄音磁帶可以拿到廣場上去放，這個錄象是對全國廣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很有信心把同學們帶出廣場，沒有及時對同學做工作，直接就在這邊答應了。

完了以後，我們曾經想再去統戰部。還沒去之前廣場就傳開了，【以上第 100 頁】說有人出賣，有人跟閻明復做交易了，是說開希他們。我到處去查證，誰最後離開統戰部的。我現在想不起這個交易的詳細內容了，但是當時已經傳得很多。我急跑統戰部，想見閻明復，沒有成功，中間我們跑了六次。最後十四日上午終於進去，閻明復又找我們說，“現在就看你們自己了，中央已經決定，明天迎接戈爾巴喬夫儀式不在天安門舉行。現在完全就看你們學生自己了，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這完全是你們自己表態的事了。”這就都急了，王丹和我都在那。我說，“趕快找知識分子來。”王丹說，“你叫得來他們嗎？他們願意來嗎？”我說，“我知道有一個會，是當天下午戴晴組織的一個會，那十幾

個知識分子會在那兒，我去請。”開希和王丹很緊張地商量，要設法把同學帶出來。閻明復說，“可以，我們今天下午可以跟你們對話。”我們說，對話代表團在政法學院。他說，他負責去接對話代表團。同時和閻明復對現場是否直播有激烈的爭論。閻明復一定說有技術困難，一定說廣播車都為迎接戈爾巴喬夫做準備了，當天晚上沒有辦法利用。最後他說，“我們把錄像帶當場錄好，你們的代表看著給封，封了跟著我們送到中央電視臺，一盤一盤放，可不可以？你們同學自己也可以錄音，錄音磁帶可以拿到廣場上去放，這個錄象是對全國廣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很有信心把同學們帶出廣場，沒有及時對同學做工作，直接就在這邊答應了。

開希覺得這個協議是我們做的，為什麼祇有對話團參加對話。下午我們坐在一塊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聯講話。”所以十三日晚上連坐都沒有跟他坐在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所以十四日他整個的情緒是，我不是北高聯，我就是絕食團，而且他是以絕食團的名義要求參加沈彤他們對話團的對話。

知識分子到廣場是我去請的。至少一半當時在場的知識分子都出到海外了，包括嚴家其、蘇煒他們都出來了，他們應該知道當時是什麼情況。但是我很奇怪，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寫詳細的情況。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觸就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的體會相距太遠，他們覺得我們能夠爭取到第二天報紙的一個版面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天大的成功了。但是學生完全體會不到這樣一點進步對於中國的意義。學生這個情緒、【以上第 101 頁】這個要求，說實在我都體會不到，我都急得要死。

我去他們那個會，我說，“情況非常急。閻明復已經講了，現在球已經到了學生手裏，完全是看學生怎麼表態了”。接著這些人就都一個個眼淚汪汪的，有人說“曉康，你馬上起車。”嚴家其一直在那不說話。最後戴晴說：“家其，你也說話啊。”“我不明白，現在咱們為什麼要勸學生，現在要勸應該勸政府。”我說：“好，你要勸得動政府那好啊。”因為所有的人一個本能的感覺是覺得對這共產黨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主要重點應該是勸學生。這嚴家其是第一個說要勸政府的。我對嚴家其的印象太深了。

知識分子到廣場是我去請的。至少一半當時在場的知識分子都出到海外了，包括嚴家其、蘇煒他們都出來了，他們應該知道當時是什麼情況。但是我很奇怪，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寫詳細的情況。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觸就是知識分子和

學生的體會相距太遠，他們覺得我們能夠爭取到第二天報紙的一個版面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天大的成功了。但是學生完全體會不到這樣一點進步對於中國的意義。學生這個情緒、【以上第 101 頁】這個要求，說實在我都體會不到，我都急得要死。我去他們那個會，我說，“情況非常急。閻明復已經講了，現在球已經到了學生手裏，完全是看學生怎麼表態了”。接著這些人就都一個個眼淚汪汪的，有人說“曉康，你馬上起草。”嚴家其一直在那不說話。最後戴晴說：“家其，你也說話啊。”“我不明白，現在咱們為什麼要勸學生，現在要勸應該勸政府。”我說：“好，你要勸得動政府那好啊。”因為所有的人一個本能的感覺是覺得對這共產黨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主要重點應該是勸學生。這嚴家其是第一個說要勸政府的。我對嚴家其的印象太深了。

因為我頭一天沒勸動柴玲，我就強調說，你們一定要設法先找到絕食最堅決的這些學生，和他們取得共識之後，再到廣場上去對廣大學生講話。這是我希望他們先安排見這幾個學生的原因之一，具體究竟怎麼安排的，我記不太清了。總之，在那個會場馬上就打電話跟人民大會堂聯繫，都是戴晴打電話。但是我想到頭一天晚上，柴玲她們出來要去統戰部時就有人跟著。我說，他們一跟到大會堂肯定那個門就會堵。後來就說到永定河那個信訪局，最後究竟在哪兒，我不知道。我說，你們這邊安排吧。我就走了。我有一個印象是，戴晴還和閻明復通了電話。我不能肯定對方是不是閻明復，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我一直有這個印象。

然後他們開車送我回統戰部，這時六部口往北已經都是人了。車開進去就看見北大一個代表，好象是我告訴他，馬上找柴玲他們這些絕食團的骨幹去見知識分子。當時沈彤和項小吉他們已經下來一回又上去，又下來一回，這些絕食學生就是堅決不幹。“停止對話，立即現場直播”，有人在那喊。我就在那兒說，“大家不要衝，統戰部那兒沒有軍警，就是一個大客車擋在門那兒。”後面項小吉他們在那兒說著，又上去了。我說：“這樣吧，如果都進去的話，是說不清楚的。我進去替你們轉達這個好不好？至少咱們不是都宣誓服從絕食團紀律嗎？這樣也顯得咱們有紀律。”幾個北大的早就看出我象妥協派，“我們不信任你。”我說：“那你怎麼辦？”“我們要有兩個人押你進去。”是兩個人押著我進去的。所以我進去就大喊：“不要對話了。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絕食團同學沒有接受的時候，你們這種對話是不能接受的。馬上停止。”閻明復當時一驚，馬上接著我這個話說了一句“那怎麼樣？咱們還要不要進行？”。我的一個最基本的

【以上第 102 頁】觀點就是從十二日一直到這會兒，假如我們不能控制絕食學生的話，這個對話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而且我從十二日和戴晴接觸，到十三日早上所有這些接觸，我當時已經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就是，這個對話之所以成，就是因為有絕食。所以我才進去衝的。〈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柴玲 2.6.2 與閻明復對話〉

然後他們開車送我回統戰部，這時六部口往北已經都是人了。車開進去就看見北大一個代表，好象是我告訴他，馬上找柴玲他們這些絕食團的骨幹去見知識分子。當時沈彤和項小吉他們已經下來一回又上去，又下來一回，這些絕食學生就是堅決不幹。“停止對話，立即現場直播”，有人在那喊。我就在那兒說，“大家不要衝，統戰部那兒沒有軍警，就是一個大客車擋在門那兒。”後面項小吉他們在那兒說著，又上去了。我說：“這樣吧，如果都進去的話，是說不清楚的。我進去替你們轉達這個好不好？至少咱們不是都宣誓服從絕食團紀律嗎？這樣也顯得咱們有紀律。”幾個北大的早就看出我象妥協派，“我們不信任你。”我說：“那你怎麼辦？”“我們要有兩個人押你進去。”是兩個人押着我進去的。所以我進去就大喊：“不要對話了。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絕食團同學沒有接受的時候，你們這種對話是不能接受的。馬上停止。”閻明復當時一驚，馬上接著我這個話說了一句“那怎麼樣？咱們還要不要進行？”。我的一個最基本的

【以上第 102 頁】觀點就是從十二日一直到這會兒，假如我們不能控制絕食學生的話，這個對話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而且我從十二日和戴晴接觸，到十三日早上所有這些接觸，我當時已經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就是，這個對話之所以成，就是因為有絕食。所以我就進去衝的。〈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柴玲 2.6.2 與閻明復對話〉

【王超華：特別是五月十四日，我昨天想了一下，我和少江雖然去了統戰部幾次，但是最後一次見到閻明復和他談的這個事情，究竟是誰先去的，現在不能具體地想起來。並不是我先去的，而是王丹和吾爾開希，應該還有其他人先到那的。而且我比他們先走，閻明復說有車可以送你到知識分子開會的地方去。這之後他們又和他講了什麼，包括對話團是怎樣到的，對話團在中辦十三日早上通知之後，又有些什麼活動，我都不了解。】

【梁二：在五月十三日對話之後，確實有一部分高聯常委提出了撤退的問題。我記得當時王丹和吾爾開希在一個密室裏接受閻明復的請求的時候，閻明復是跪著哭的。這是吾爾開希的自述。當時我就知道這個事。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是覺得閻明復這個人在當時有誠心。第二個我覺得如果有必要撤退或者找得到一個撤退與絕食之間的中間方案，為了歡迎戈巴喬夫，比如說把人群退離到廣場的東部，所以在當時開希作出這點之後，我自己作為高聯常委我也是對他這點表示支持的。所以開希當晚就宣佈了撤退。但是師大這時有部分同學已經開

始分化了，其中明顯的表現是超華勸不動師大中文系的同學。

五月十四日的知識分子的勸說，實際上包含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能夠在戈巴喬夫來之前把學生挪一下或是轉移一下；第二個目的是還有一個考慮，就是軍隊和 政府會在當天晚上實行一種強行的鎮壓，把部分同學綁架出廣場的那種清場的行動。所以我當時曾經很明顯地提到，以後跟超華也提到，就是那天晚上請知識分子來 實際上帶有一種對不起知識分子的險惡用心，就是讓知識分子留下跟咱們同甘共苦，一塊送命的態度。】【以上第 103 頁】

2 . 6 初到廣場（柴玲）

2.6.1 絕食隊伍到廣場

我們出發到中關村的時候，老遠就看到李錄推著自行車過來，我說：“你快過來。怎么回事呀，你們上面是什麼動靜？”李錄說：“算了，算了，算了。”我說“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說，“我們上面聽那個所謂鄧小平的五人智囊團說，基本上是這麼回事，本來如果沒有絕食的事，這事基本上交給趙紫陽來和平解決，給大家稀裏糊塗過去了。”我說：“唉，你怎麼不早說？”他說“昨天我們聽你演講時，我擠不進去。完了以後，又找不著你。不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生 與死的界限的這麼一場運動，看看怎麼個結局吧。反正他要是真想和平解決的話，他也是絕對有機會的。”所以實際上，我們在絕食中大部分人還是希望趙紫陽能夠 做點什麼表示。】順便補充一下那天晚上的絕食動員。因為那麼多人，我很激動，我說，“我自薦做為絕食召集人。”到了廣場以後，是開希、王丹等等，他們就一直很自覺地把自己作為一個領袖。我當時也幫著作一些組織工作。

王丹宣佈絕食以後，糾察隊就拉起圈子，王丹、開希、少方過來說：“柴玲，我們去開記者招待會。”這個時候王文從後面拄著小旗子過來了：“你們站住，你們 幹什麼去？”王丹說：“我們去開記者招待會。”“你們都去？萬一廣場出了什麼事情怎麼辦？”我就說：“那我留下吧。”王丹、開希看了他一眼，扭頭就走。我就就地坐下，王文很慚愧地一笑，對我說：“嗨，其實我並不想把你留下。我是覺得，我也挺會說的，我也想見記者。”我一下就笑了，“這有什麼了不起，下一次 我推薦你去不就完了！”當時我覺得他小孩子嘛，有點個人小野心，反而覺得他挺真摯、可愛的。

在六、七點鐘的時候，是王丹還是誰找過來說：“走走走，我們去跟他們對話。”我說：“怎麼會對話呢？”“我們是跟上面談談。”然後，王文和我都去了。

的確是象王超華講的，扎白布條的人都在一起。到了統戰部，我記得當時挨著桌子閻明復坐在桌頭，依次是王丹、開希、少方，然後好象是我吧。通緝名單也是第四個，有意思。然後是王文。開始談時【以上第 104 頁】大家都比較沉默，

我跟王文基本上就沒有怎麼說話。閻明復問：“能不能勸勸學生撤離？”劉曉波就

說了一句：“你知道嗎？他們在這兒是可以答應你把學生勸退的。但他們一旦答應以後，一出去馬上就成了學賊。你要為他們著想。”後來，好象是超華提：“現在主要是平反動亂”。

的確是象王超華講的，扎白布條的人都在一起。到了統戰部，我記得當時挨著桌子閻明復坐在桌頭，依次是王丹、開希、少方，然後好象是我吧。通緝名單也是第四個，有意思。然後是王文。開始談時【以上第104頁】大家都比較沉默，我跟王文基本上就沒有怎麼說話。閻明復問：“能不能勸學生撤離？”劉曉波就說了一句：“你知道嗎？他們在這兒是可以答應你把學生勸退的。但他們一旦答應以後，一出去馬上就成了學賊。你要為他們著想。”後來，好象是超華提：“現在主要是平反動亂”。

在這時候，天色開始暗下來了。我跟王文就特別擔心，我說：“萬一把我們這些頭兒都弄在這兒，調虎離山，那邊出了事情怎麼辦？”後來我們就提出了這個意見。閻明復說：“要不你們就先回去吧。”因為他們是晚上開會，沒有吃晚飯，所以裏面在煮面條，非常香。

我和王文回到廣場以後，一起把整個邊界都檢查了一下，看看同學大致的情況。一直到凌晨四點多鐘的時候，都是我跟王文在一起。他拄著個小旗子，我們就披件大衣在那，總是在巡視。

這中間十點到十一點左右，他們回來了。我問：“談話結果怎麼樣？”談話結果是他們希望在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候，我們學生能夠撤離廣場，或者說至少暫時撤離。當時提出幾個方案：一個是全部撤回各個學校，然後再來；再一個是撤回離廣場比較近的學校；第三是撤到長安街上那個通道下面。他說：“你看，第一天晚上紅旗招展，第二天早上一看全部都沒有人了，廣場上一片空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效果。”當時，我沒有特別地說同意還是反對，祇是說：“最好還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見。”

2.6.2 與閻明復對話<參：沈彤 2.3.4 絕食後的對話 王超華 2.5.6 在統戰部的談話>

第二天十四日上午就開始討論要再繼續對話。這個時候學生就很積極，條件是一定要現場直播。學生這邊知道的消息是，現場直播因為廣場沒有電視，沒辦法看到。但是廣場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於技術性的問題，把對話的記錄直接送到廣播電臺需要一個小時。在晚一個小時的情況下，同學還是答應，祇要能夠聽到現場直播。

開希他們已經早就去了統戰部。我跟王文收集了一些當時同學的基本感受，

我們當時收集了一個橫幅是：“媽媽我餓”。我們考慮到是全國現場電視直播，我想我們不用說話，把這牌子一打，廣場的情【以上第 105 頁】況即使你不播，至少也就能夠有一些感受了。

開希他們已經早就去了統戰部。我跟王文收集了一些當時同學的基本感受，我們當時收集了一個橫幅是：“媽媽我餓”。我們考慮到是全國現場電視直播，我想我們不用說話，把這牌子一打，廣場的情【以上第 105 頁】況即使你不播，至少也就能夠有一些感受了。

進去以後，對話已經開始在進行。當時我們還被阻了十幾分鐘，說你們已經有代表了。最後申請才允許我們進去。進去的時候，開希他們已經坐在那兒了。第一排是沈彤和熊焱等對話團的人。後來說既然這個對話的機會是絕食團同學爭取來的，要不要聽聽絕食團同學怎麼講。開希說了幾句話後，說“我這邊有一個絕食同學寫的一封信。”程真馬上就站起來念《給媽媽的一封信》。我當時一聽那個慘呀！我覺得寫得是挺好的，非常感人，但是沒有把更深的、思想上的東西寫出來。而且開希根本就沒有跟我們商量，這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很好溝通的機會。當時在場的很多人也哭了。唉，我就痛苦得要命。

他們繼續對話時，我就要求能不能再給一個機會，把那個絕食書播一下。因為當時我們絕食的基本要求一個是對話，再一個就是平反。當時基本的認知是，一定要把這個帽子摘掉。或者試圖迫使官員自動認錯，摘掉這個帽子；或者通過現場直播，讓老百姓在這個辯論中，了解北京發生了什麼情況，事實是怎麼樣的，造成一個他沒有辦法，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既成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把絕食書向全國人民直播的話，那也基本上達到效果了。即使最後你還是不認錯的話，大家也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至少不能發生象八七年那樣，學潮一完，人也抓了，他一控制《人民日報》，馬上就是學生好象是禍頭子這樣一種形象，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孤立學生的基本勢態。

我記得當時問閻明復，“你究竟認為學生運動是怎麼樣的？”閻明復說：“我個人非常願意說你們是愛國的。但是我不能說。”就在這個時候，外面開始有騷動。然後超華就進來了，說“外面同學希望現場直播”等等情況。就在這個時候，中間空斷了一段時間。王文就說：“快，按錄音！”結果我那個手指就沒有按下去。挺遺憾的。快按錄音就是在這個中斷的過程中，趕快把絕食書播了。

因為我們是絕食團的，馬上就出去了。外面在六部口有一大批同學，他們是聽說一個小時以後一直沒有消息，怕再受騙，所以全部都來了。等我去了以後，同學還在那兒。這個時候，我們就在外面等，看還有沒有希望兩邊協調。

【常勁：我補充一點跟對話有關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個，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廣場上斷水的事實。十三日、十四日我沒有去廣場，【以上第 106 頁】

早上有同學到北大找到我們，說廣場上同學沒水。我到學校去求他們送水。然後

我送水去廣場，一看大家情緒非常激烈，因為沒水喝，很多同學很渴。我送了一罐水去，大家歡呼雷動。

【常勁：我補充一點跟對話有關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個，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廣場上斷水的事實。十三日、十四日我沒有去廣場，【以上第106頁】四日早上有同學到北大找到我們，說廣場上同學沒水。我到學校去求他們送水。然後我送水去廣場，一看大家情緒非常激烈，因為沒水喝，很多同學很渴。我送了一罐水去，大家歡呼雷動。

第二個，五月十四日我到了廣場以後，北大廣播站建立起來了。當時廣播站播送了兩個消息，一是讓各校學生到廣播站附近集合，然後一起到六部口統戰部參加對話。在招集學生代表的時候，我看到有一百多個學生上去做與政府對話談判的代表。第二個是過了一陣子以後，有人在上面說：“請同學們到六部口去增援對話的學生，有人要出賣學生。”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一大批的學生集中在六部口，開始時六部口沒有多少人。那一陣，人一直哄哄鬧鬧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

2.6.3 十二個學者勸阻絕食 < 參：2.7.3 為什麼學者勸阻無效？ >

過了一會，十二個學者從小院子裏面出來了。戴晴說：“既然現在跟學生之間成為這樣一個僵局，我們願意成為政府跟學生之間的第三方力量，做一個橋梁，好不好？”我們說：“好！”“我們要去跟廣場學生談一談。”“太歡迎了。”當時對知識分子都很崇拜。

然後那一批絕食的老師，包括參加對話的老師，拉著手開始護送這十二個學者向廣場走。從六部口到長安街，再擠進廣場。走在長安街的時候，已經是人山人海了。那個時候一個人想從新華門向西擠到廣場中心，真是比登天還難。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到廣場外圍二、三十個同學這樣手拉著手，一邊含著眼淚一邊說：“這是我們最尊敬的十二個學者，知名人士。請大家給他們讓開，讓開。”一點點給他們擠出一條路來。走到廣場邊緣的時候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那時我們絕食已快四十八小時了，尤其是我，從十二日早上就沒怎麼吃東西。嚴家其，還有這裏邊一些人，他們都邁著四方步在裏邊走，不時地有周圍的人說：“啊，嚴家其來了。”大家都擁過來握手，他們也不斷地向外握手。後來我們說：“你們能不能不握手？讓我們很難維持。”當時我特別失望，我就想，不管怎麼說，你們也是吃過飯的，我們都是絕食這麼久，在這幫你們維持秩序，而你們這麼多學者真能理解我們嗎？後來我擠了一會兒，擠不動了。我就說：“你們拉著手吧，我下去了。”下去後，有幾個學生幫我找到中間的廣播站。當時廣【以上第107頁】播站已經建起來了。

然後那一批絕食的同學，包括參加對話的同學，拉着手開始護送這十二個學者向廣場走。從六部口到長安街，再擠進廣場。走在長安街的時候，已經是人山人海了。那個時候一個人想從新華門向西擠到廣場中心，真是比登天還難。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到廣場外圍二、三十個同學這樣手拉着手，一邊含著眼淚一邊說：“這是我們最尊敬的十二個學者，知名人士。請大家給他們讓開，讓開。”一點點給他們擠出一條路來。走到廣場邊緣的時候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那時我們絕食已快四十八小時了，尤其是我，從十二日早上就沒怎麼吃東西。嚴家其，還有這裏邊一些人，他們都邁著四方步在裏邊走，不時地有周圍的人說：“啊，嚴家其來了。”大家都擁過來握手，他們也不斷地向外握手。後來我們說：“你們能不能不握手？讓我們很難維持。”當時我特別失望，我就想，不管怎麼說，你們也是吃過飯的，我們都是絕食這麼久，在這幫你們維持秩序，而你們這麼多學者真能理解我們嗎？後來我擠了一會兒，擠不動了。我就說：“你們拉着手吧，我下去了。”下去後，有幾個學生幫我找到中間的廣播站。當時廣

【以上第 107 頁】播站已經建起來了。

很快這十二個學者向同學開始動員了。我記得非常清楚，說：“哎，戴晴來了，給大家講話。”“啊，戴晴來了。”特別鼓掌。然後戴晴說：“首先，學生是了不起的學生，”大家就鼓掌，“政府是無能的政府。”大家又鼓掌。她說，“《光明日報》要登出一個版面，說學生怎麼怎麼樣的。”然後說，“這樣吧，既然政府是無能的政府，領導也是很落伍的領導，可不可以讓趙紫陽或者是李鵬出來，跟大家見見面。因為他們既然很無能，所以你不能指望他們答應、承諾你什麼。指望他給你說一個‘你好’，或者哪怕他出來跟大家見見面，不要說什麼，大家就撤，怎麼樣？”當時，空氣一片寂靜。然後，馬上就騷擾起來了。不知道是不是封從德，拿著話筒說，“既然絕食是同學們的意見，那麼表態還是要同學們來表示。行不行？”戴晴當時就沒話說了。曉康、溫元凱，還有其他人都很激烈，就在下面說：“你們不能激動，你們不能這麼幼稚”。【以上第 108

頁】

2 . 7 補充與質疑

2.7.1 北大五一改組（沈彤，封從德，常勁，柴玲）〈參：封從德 2.1

沈彤 2.3.1 柴玲 2.4.1〉

（1）改選（沈彤）

然後是五月一日或者四月三十日的那個改選，就是封從德說的政變事件。在我這兒的情況是當時五個人合作很困難。覺得沒法跟另外四個人合作。我覺得孔慶東和王遲英工作能力并不很強，封從德工作能力很強，但是他很容易激動。從八八年到八九年開始的時候，幾次他都特別願意跟別人辯論，而不是跟別人做一些內部的組織工作。這是他後來的一個很大的轉變。所以，尤其在新聞中心不斷擴展而且進入程序化之後，我就一直想辭職。這裏邊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就是我跟王丹個人合作很不順利。我覺得他不做北大的工作，而總是在北高聯。本來憑著這一點，我也就算了。但是從北高聯來的消息說，王丹在北高聯也不做工作。所以我就很有意見。

（封從德插：關鍵他是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的橋梁，他這個責任太重了。）

（王超華：這是你的判斷，咱們沒有任何事實。）

封從德提的正是我要講的，在原來奧林匹亞科學院和民主沙龍合作過程中間，民主沙龍裏面的工作，包括“新五四”，包括民主沙龍組織活動，都是王丹的四個副部長在做，包括楊濤和另外幾個人，還有武運學。他們跟我說的是：王丹是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的橋梁。可是四月十八日知識分子的第一份簽名信，就不是王丹做的。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學運早期很快就已經參與進來了，至少以一個支持者、觀察者的角度參與進來了。那麼還需要這麼一個橋梁做什麼呢？所以我對他意見就比較大。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小的原因，就是奧林匹亞科學院和新聞中心裏面，對我在新聞中心做的工作越來越少，而參與籌委會工作越來越多的情況非常不滿，要成立一個監委會，罷免我的“新【以上第 109 頁】聞中心”

負責人的職務。當然後來沒有成，但是這是一個情緒化的東西。這倒提醒我了，

就是在籌委會裏邊應該有罷免機制。所以我跟趙體國，還有常勁，還有另外幾個

部長成立了籌委會的監察委員會，包括十二個部的部長。新聞中心去了三個部

長，《新聞導報》、電臺和印刷中心，加上其他的十二個部部長，還有柴玲也在內。

當時我就提出來，希望把這一屆籌委全部罷免。因為研究生會已經被我們占領

了，所以實際上孔慶東、王遲英可以繼續在研究會裏工作，而且孔慶東在跟校方

的聯系上面，是和我一起做的。我是在新聞中心，封從德當時要去高聯。當然王丹起他的獨特的作用。所以我一直建議把這一屆罷免。罷免之後呢，這些人的工作還會做，因為這些人的工作不是因為當了籌委會的常委才做的。那麼重新選舉一些從分籌委選出來的人，這樣保持組織不斷有新鮮血液進來，當時是我的建議。我一直堅持如果不罷免這一屆籌委的話，我要辭職。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所謂政變的時候，雖然我跟王丹的票數一樣，最後選了王丹也有一定的這種因素，因為我是一直要求辭職的。

封從德提的正是我要講的，在原來奧林匹亞科學院和民主沙龍合作過程中間，民主沙龍裏面的工作，包括“新五四”，包括民主沙龍組織活動，都是王丹的四個副部長在做，包括楊濤和另外幾個人，還有武運學。他們跟我說的是：王丹是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的橋梁。可是四月十八日知識分子的第一份簽名信，就不是王丹做的。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學運早期很快就已經參與進來了，至少以一個支持者、觀察者的角度參與進來了。那麼還需要這麼一個橋梁做什麼呢？所以我對他意見就比較大。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小的原因，就是奧林匹亞科學院和新聞中心裏面，對我在新聞中心做的工作越來越少，而參與籌委會工作越來越多的情況非常不滿，要成立一個監委會，罷免我的“新【以上第109頁】聞中心”負責

人的職務。當然後來沒有成，但是這是一個情緒化的東西。這倒提醒我了，就是在籌委會裏面應該有罷免機制。所以我跟趙體國，還有常勁，還有另外幾個部長成立了籌委會的監察委員會，包括十二個部的部長。新聞中心去了三個部長，《新聞導報》、電臺和印刷中心，加上其他的十二個部部長，還有柴玲也在內。當時我就提出來，希望把這一屆籌委全部罷免。因為研究生會已經被我們占領了，所以實際上孔慶東、王遲英可以繼續在研究會裏工作，而且孔慶東在跟校方的聯系上面，是和我一起做的。我是在新聞中心，封從德當時要去高聯。當然王丹起他的獨特的作用。所以我一直建議把這一屆罷免。罷免之後呢，這些人的工作還會做，因為這些人的工作不是因為當了籌委會的常委才做的。那麼重新選舉一些從分籌委選出來的人，這樣保持組織不斷有新鮮血液進來，當時是我的建議。我一直堅持如果不罷免這一屆籌委的話，我要辭職。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所謂

政變的時候，雖然我跟王丹的票數一樣，最後選了王丹也有一定的這種因素，因為我是一直要求辭職的。

(2) 辭職與改選（封從德）

關於“五·四”前北大的改選或者叫一次準政變，是這樣：那天趙體國突然說部委要變成一個監委會，要行使監督權利，就是說，有對常委的否決權和罷免權。這和當時我們逐步完善的民主機制有關係。關於這個改選，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孔慶東和王遲英的能力有限，必須找一種辦法，那就要換人。（刪一百字。）但是在這之前，在北大籌委會這個改選的會上，我自己首先提出過要辭職，這個時候大家好象覺得有點緊張。王丹也提出要辭職。之前選對話代表時提了三個人，熊焱、沈彤和我，我說我這個對話代表也可以讓出來。這個時候孔慶東他自己非常願意做對話代表，但是他的口才大家知道，他說話都是結巴的，所以大家覺得他這是無理的要求，對他的感覺就更不好。在這種情況下，最後趙體國就一下子提出來了，要行使部長會議的監督權。這個部長會議就重新選出來王丹、楊濤、我、常勁和熊焱新的五人常委。【以上第 110 頁】

(3) 罷免常委（常勁）

關於那個部長會議，我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成立了。當時為什麼要罷免常委呢？第一個是常委做事情跟各部沒有什麼聯繫，象沈彤是負責新聞中心的，但是跟各部沒有什麼聯繫，所以造成互相溝通很不便。另外一個是各部當時的活動已經非常正常化、程序化了，尤其是象柴玲的秘書處，我們這個理論信息部、宣傳部之類的，都比較程序化了，這就造成各部跟常委的決定有很大的差距。常委們經常發一些令各部摸不到頭腦的決定，沒辦法去做。這造成了各部對常委的意見非常大。所以這種罷免的氣氛早已經是形成了。另外我要補充的是，我記得這個會是一個早上九點鐘的例會。本來八點鐘的例會是由秘書處通知的，秘書處已經通知了各個常委，而且最後又派人去找，才找到了四個人。沈彤因為騎自行車去接打字機去了，沒到。所以就在沈彤缺席，四個常委到齊，全部部長到齊的情況下開了這個會。沈彤當時缺一票沒選上。開這會以後決定對話代表團的時候，因為沈彤沒選上，所以給他補成了對話代表團的代表，我記得是這麼一個過程。

(4) 改選的原因（柴玲）

我講一下關於那次改選會的原因。四月二十九日以後，各個執委就是各部已經運作得非常常規化和秩序化，有一天大家在接待處的那個大房子裏面開會，各部部長都在。有兩個提案：一個是成立監委制度；另外一個，就是重新選派參加高自聯的代表。結果是選了老封去作另外一個補充代表。成立監委的原因是因為各個執委運作得已經非常制度化和常規化以後，籌委在最開始起的那

個重要作用顯得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第一個就是籌委沒有把他們議政的責任負起來，比如說那么久以後始終沒有拿出一個關於運動的近期、中期和長期的計劃，這個讓各個執委非常非常的失望。另外一個就是籌委們在作執委們的一些具體執行的功能，實際上造成一種瞎指揮或者撞車的現象。第三個是一種普遍的氣氛，就是籌委很自然地發展出一些官僚氣息，比如說孔慶東在四月二十七日早上表現出的那種大官僚主義，因為楊濤不允許他隨使用廣播站來發他個人的命令，他就說：我撤你的職。第四個是籌委【以上第 111 頁】開始發展出一些個人野心，比如趙體國在五月三日左右

的辭職信中說：我看到人的兩副面孔，一個是在虛榮面前，一個是在危險面前。在虛榮面前他指的是這樣一次，就是記者招待會那次，基本上是秘書處安排發言提綱，指定發言人，當時指定發言人是楊濤還有另外一個男生，沈彤好象沒有，但是最後不知道為什麼加上了，而且沈彤講得也挺多的。在危險面前的面孔指的是沈彤、孔慶東跟了石孫談了一次，傳回來的消息說他們是個人去跟了石孫談的，是要求校長表示“理解”。當然這是當時的一種感覺。

第一個就是籌委沒有把他們議政的責任負起來，比如說那么久以後始終沒有拿出一個關於運動的近期、中期和長期的計劃，這個讓各個執委非常非常的失望。另外一個就是籌委們在作執委們的一些具體執行的功能，實際上造成一種瞎指揮或者撞車的現象。第三個是一種普遍的氣氛，就是籌委很自然地發展出一些官僚氣息，比如說孔慶東在四月二十七日早上表現出的那種大官僚主義，因為楊濤不允許他隨使用廣播站來發他個人的命令，他就說：我撤你的職。第四個是籌委【以上第 111 頁】開始發展出一些個人野心，比如趙體國在五月三日左右的辭職信中說：我看到人的兩副面孔，一個是在虛榮面前，一個是在危險面前。在虛榮面前他指的是這樣一次，就是記者招待會那次，基本上是秘書處安排發言提綱，指定發言人，當時指定發言人是楊濤還有另外一個男生，沈彤好象沒有，但是最後不知道為什麼加上了，而且沈彤講得也挺多的。在危險面前的面孔指的是沈彤、孔慶東跟了石孫談了一次，傳回來的消息說他們是個人去跟了石孫談的，是要求校長表示“理解”。當然這是當時的一種感覺。

而且執委還有大部分的秘書等，每一個人都是很忍辱負重的，比如從四月二十三日一直到二十七日之間，籌委們經常在二十八樓那個屋子裏關起門來開

會，需要一個人把門，有一個小女孩，就始終如一地一把就是七、八個小時這麼站下來。另外那些抄大字報的人都是自己憑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在拼命地幹。有個男生幾乎全手都是黑的，就是因為整天在抄啊，寫啊，刻蠟板。執委之間由於這種埋頭苦幹和忍辱負重建立起的一種很強的信任，跟籌委之間很不一樣。

所以在那天開會的時候，大家提出這樣一個建議，首先是老封要辭職，後來好象孔慶東也要辭職，反正大家辭了半天以後，說那幹脆要不要罷免。結果大家都同意罷免，罷免以後重新改選，就這麼一個決議。（封從德插：這是趙體國提的？）可能是他吧。我記得在中午的時候，我跟老封出來以後碰到沈彤，他很著急，他說：為什麼每次開這種會都是我不在？為什麼每次都是把王丹選上？後來為了避免象丁小平被罷職以後造成一種分裂的局勢，我就建議說：老封，你最好推薦沈彤去高自聯，這樣的話，實際上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最合適的位置。他進了高自聯以後，很快地發展出一個對話代表團。

2.7.2 跟官方接觸：北大與鄧琳（柴玲）

跟官方接觸得從很早談起。一個是跟所謂鄧琳的聯繫人的接觸過程。第一次見面是四月二十七日早上，那個人來的時候，學生已開始游行。他說，鄧琳非常擔心老頭子的身體健康問題，希望問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不要造成更大的誤會。當時我們把學生的基本的條件也傳達上去了，就是說我們不是動亂，而且對鄧小平個人並沒有惡意。因為他改革中的功績，大家非常感激他。希望他這個時候比較開明【以上第112頁】一點，不要再象八七年那樣：“不惜流血，不要怕輿論”，這樣把矛盾激化。

跟官方接觸得從很早談起。一個是跟所謂鄧琳的聯繫人的接觸過程。第一次見面是四月二十七日早上，那個人來的時候，學生已開始游行。他說，鄧琳非常擔心老頭子的身體健康問題，希望問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不要造成更大的誤會。當時我們把學生的基本的條件也傳達上去了，就是說我們不是動亂，而且對鄧小平個人並沒有惡意。因為他改革中的功績，大家非常感激他。希望他這個時候比較開明【以上第112頁】一點，不要再象八七年那樣：“不惜流血，不要怕輿論”，這樣把矛盾激化。

五月三日的時候，因為知道五月四大游行，所以很想找到那人把這個消息及時傳達上去。中間拖了很久，因為四月二十七日那個聯絡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證，還寫了一封長信，都給郭海峰收起來了，一直要不出來，直到五月三日

上午才從郭海峰那兒要回來。後來我們輾轉通過他的身分證，還有他開始留的地址，找了好多地 方，最後終於在傍晚的時候通過他的親戚，還有公安局找到這個人。

這個人是四五運動中的一個受害者。他當時因為替鄧小平講話，四五後跑到東北去，還是給抓起來被關到監獄裏邊。快要奄奄一息的時候，老鄧上臺了。老鄧因為是為了他的案子，就把他救出來。從此他跟鄧這一家人就成了朋友。

他說他以為學生沒有什麼更大的願望，就沒再來，這中間有學生找過他。我就問是誰，他說：“我不能告訴名字。”我就覺得這個機會一下給喪失了。但是他答應說，馬上再找渠道傳達。中間他提到過陶鑄的一個女兒，還有別人，我不便再講。傍晚的時候，他妻子一個勁地在旁邊說：“你們要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啊！”勸我們 要注意，要小心。然後他馬上找了兩個人來，送我們回去。說那邊有個車，可以搭便車回去。

車上那兩個人是非常高高的兩個人。一坐上車，我一下就感覺不對。當時祇有我跟趙體國兩個人，我就，這次如果這個車把我們拉到什麼地方去，失蹤了，也得做好這種準備，因為我直感這兩個人是安全部的，事後證明他們也確實是。他們一看趙體國就說：“哈，你還在折騰哪。”趙體國說：“什麼意思？”他說：“我們都錄下來了，你是不是老拿著大旗？”趙體國說“是”。他說：“其實，你們的情況我們什麼都掌握。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呀？”我們就一本正經地打官腔說：“要民主，要自由。”他說：“咳！你們鬧什麼呀鬧，還不如我給你們出點主意呢。”後來想了想，“我還是不說吧。”我說：“你們有什麼主意？”他說：“還是不說吧。”過一會兒，兩個人又說：“四月十九日的時候，你們一個學生弄了一個大白布單上寫了‘絕食’，警察一來怎麼著，撒鷹似就跑，還說絕食到死。”他說：“你們還查證件。查什麼證件，我手裏就有好幾個證件，北大職工、北大教師、北大學生的證件。”所以為什麼後來憑證件來判斷李錄是【以上第 113 頁】

不是便衣，我就始終不相信。我想，便衣要找個證件那還不容易。

車上那兩個人是非常高高的兩個人。一坐上車，我一下就感覺不對。當時祇有我跟趙體國兩個人，我就，這次如果這個車把我們拉到什麼地方去，失蹤了，也得做好這種準備，因為我直感這兩個人是安全部的，事後證明他們也確實是。他們一看趙體國就說：“哈，你還在折騰哪。”趙體國說：“什麼意思？”他說：“我們都錄下來了，你是不是老拿著大旗？”趙體國說“是”。他說：“其實，你們的情況我們什麼都掌握。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呀？”我們就一本正經地打官腔說：“要民主，要自由。”他說：“咳！你們鬧什麼呀鬧，還不如我給你們出點主意呢。”後來想了想，“我還是不說吧。”我說：“你們有什麼主意？”他說：“還是不說吧。”過一會兒，兩個人又說：“四月十九日的時候，你們一個學生弄了一

個大白布單上寫了'絕食'，警察一來怎麼著，撒鷹似就跑，還說絕食到死。”他說；“你們還查證件。查什麼證件，我手裏就有好幾個證件，北大職工、北大教師、北大學生的證件。”所以為什麼後來憑證件來判斷李錄是【以上第 113 頁】不是便衣，我就始終不相信。我想，便衣要找個證件那還不容易。

跟戴晴第一次見面時，她沒有提任何建議，祇說：“嗨，我現在不能和你們扯到一快兒。還是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實際上沒有任何價值，但是至少見過一回。

另外一個是李錄這條線。中間還有一個人，不便說了。他的情報是，鄧小平有一個五人智囊團，他們跟老鄧比較親近，而且給他提供一些內幕。

再就是跟閻明復兩次接觸。

2.7.3 誰做的復課決定？<參：王超華 2.2.3 宣佈復課>

張伯笠：你們要弄清一個問題：周勇軍當時宣佈五四以後復課，是不是高聯常委通過的？還是周勇軍自己決定的？

封從德：我的印象是沒有任何決議，討論過。而且我曾經代表北大提出過這樣一種妥協方案，就是分批復課。小學校和工科院校可以先行復課。但是罷課的旗幟應該一直舉下去，我認為北大、師大、清華是有條件堅持下去的，所以說我建議分期復課。但是這都沒有形成決議。

張伯笠：好，就是說當時在四月三十日那天你們開會沒有決定，然後周勇軍擅自宣佈的？

王超華：我不是這麼記得的。這天晚上在會上就提出來說是周勇軍宣佈復課決議。但是我提的是，你要把你的復課決議寫出來，不能再象以前那樣，根本不寫。因為我想到的是，要說復課的話，肯定會有一連串的政治反應，包括政府方面的反應，你不把政治訴求說清楚的話，就會失很多的分。我是這麼一個想法。但是那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困，包括後來“新五四”宣言，我記得很清楚封從德在那兒：啊，你們看吧，你們看吧！這是五月三日夜裏一點，在沈彤的房間裏，二十八樓的房間。

封從德：那我就明白了，那個時候我正在睡覺。【以上第 114 頁】

王超華：你困得叫不醒。最後也祇是我和周勇軍看。我反復地說：周勇軍，你那個寫好沒有？他倒是精神著，說：我騎車帶著這個起草好的“新五四”宣言回師大。我說：你一定要寫好。我還反復叮他。但是他沒有。然後到了五·四游行。當時確實說過個人跟自己學校隊伍走，你們北大作家班讓我到你們那兒去，張伯笠還特別說：我們作家班都是歲數大的，你不會顯眼。因為考慮到我們學校太遠，我不可能再回學校，王丹也說是。到了五·四廣場，我先到孫中山像那兒去，這時北京大學隊伍已經在廣場了，然後我又到你們隊伍裏，見到了封從德和王丹。我叫你們兩個到孫中山像那兒去，你們不去。（封從德插：我們去了。）

當時給我的回答是：不要老說，我們就在這兒。你拿著一個喇叭倒著在那兒引著隊伍走。我說到那兒去，到那兒以後，就沒有你們倆的事了。在那兒至少有吾爾開希，是師大的，清華是張鳴，有我，有周勇軍。有五個常委，因為我最關心的是湊夠五個人沒有，湊夠五個人我們就可以做決議。我又問周勇軍要復課決議，他還是在那兒不說什麼。我當時也是比較累了，沒有特別盯這個事。但是周勇軍開始要宣佈復課決議時，在場的常委沒有一個表示異議或者奇怪。祇是在他一句話把這事說完之後，大家才炸了窩，當時在孫中山像前頭就跟他炸窩了。所以一回來，我和開希就說罷免他。罷免是我們兩個說的。

封從德：現在我明白了問題，我想這基本上是我的責任：那個時候我正在睡覺。五月三日下午確定了周勇軍來安排會場和第二天派聯絡員去找各個常委，把大家召集到會場來，給他這麼二個任務。超華是起草“新五四宣言”的任務。這個會完了之後，又是籌組對話團的事情。然後我想要找吾爾開希，這個時候有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你要找吾爾開希跟我來。我找到開希，他躲在一個地方。當時見到超華正在和那兒的一個博士生起草“新五四宣言”，開希也在那兒。我看你們在起草，就想，反正你們慢慢起草吧！因為北大晚上還有例會，我得趕回北大去，還得安排一些事情。因為我看超華和這個博士生的觀點很多地方不太一致，我就擔心起草不出來，就建議拿到北大去起草。我說我可以去通知作家班的人一塊兒來起草。晚上在北大，何桂芳起草的一個口氣比較強硬一些，我認為文采非常好，感覺很深，鼓動性比較大。當時超華不太同意，要另外重新起草一份。當時還有作家【以上第 115 頁】班的人來。後來爭執非常厲害，我腦袋

就暈了，就說要去休息。所以，剛才超華說周勇軍來什麼的，我根本就沒有印象他來過。你和周勇軍討論過要復課這些事情我也沒有一點印象。記得最後到了凌晨二、三點鐘，超華把我從床上扒了一下說：我們終於弄完了。還要跟我商量。我說：我太累了，我還睡覺。我就什麼事情也不知道。第二天五四到廣場上，超華來叫我們，我跟王丹說：我們是在等聯絡員。所以沒有跟你去。我不知道你已經知道這個會場了。後來，我跟王丹在廣場上很著急地到處找。記得當時還有個大旗，不知道誰莫名其妙地搞了一個星條旗。我們以為這個旗幟肯定會把我們帶到會場去，就跟著這個旗幟跑，結果也沒有找到。

封從德：現在我明白了問題，我想這基本上是我的責任：那個時候我正在睡覺。五月三日下午確定了周勇軍來安排會場和第二天派聯絡員去找各個常委，把大家召集到會場來，給他這麼二個任務。超華是起草“新五四宣言”的任務。這個會完了之後，又是籌組對話團的事情。然後我想要找吾爾開希，這個時候有

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你要找吾爾開希跟我來。我找到開希，他躲在一個地方。當時見到超華正在和那兒的一個博士生起草“新五四宣言”，開希也在那兒。我看你們在起草，就想，反正你們慢慢起草吧！因為北大晚上還有例會，我得趕回北大去，還得安排一些事情。因為我看超華和這個博士生的觀點很多地方不太一致，我就擔心起草不出來，就建議拿到北大去起草。我說我可以去通知作家班的人一塊兒來起草。晚上在北大，何桂芳起草的一個口氣比較強硬一些，我認為文采非常好，感覺很深，鼓動性比較大。當時超華不太同意，要另外重新起草一份。當時還有作家【以上第115頁】班的人來。後來爭執非常厲害，我腦袋就暈了，就說要去休息。所以，剛才超華說周勇軍來什么的，我根本就沒有印象他來過。你和周勇軍討論過要復課這些事情我也沒有一點印象。記得最後到了凌晨二、三點鐘，超華把我在床上扒了一下說：我們終於弄完了。還要跟我商量。我說：我太累了，我要睡覺。我就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第二天五四到廣場上，超華來叫我們，我跟王丹說：我們是在等聯絡員。所以沒有跟你去。我不知道你已經知道這個會場了。後來，我跟王丹在廣場上很著急地到處找。記得當時還有個大旗，不知道誰莫名其妙地搞了一個星條旗。我們以為這個旗幟肯定會把我們帶到會場去，就跟著這個旗幟跑，結果也沒有找到。

張伯笠：就是說關於復課的問題當時你不知道。

王超華：所以當時我對封從德辭職意見非常大。你作為主席對這個沒有表示，結果回來再開會的時候，辭職了，不管了，還對我們所有人有意見。

2.7.4 北大對高聯的態度〈參：封從德 1.3.4 王超華 1.5.2, 2.2.4〉

常勁：我想再說明一下五四以後北大的情況，因為當時北大介入市高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對後來絕食的發展很有關係。當時北大的組織已經比較健全了，特別是基層，各個部發展得比較好，對局勢的反應比較快。北大對北高聯產生一種心理，認為北高聯沒有能力去接受絕食這個事情。我承認，當時北大內心裏頭有那種自我中心的意識。

另外一個，封從德對北高聯的看法，對北大籌委會也有一定的影響。北大籌委會在封從德辭職以後，派王有才作為聯絡員去參加北高聯的活動，當時祇碰到王志新。王超華也到過北大去說明這個事情，說北高聯垮了。當時北大籌委會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扶持北高聯，當時就決定讓北高聯遷到北大去，騰給他們兩個辦公室。這個消息是由安寧帶過去的。五月七日下午北高聯在北大開了個會，謝劍、蔡劍、王有才和我都參加了這個會。當時正式在北高聯的會議上提出，

北高【以上第 116 頁】聯是協調性的會議，不能是領導性的機構。這樣北大和北高聯之間出現了比較深的矛盾。但是北大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在校園民主化時期幫助北高聯發展它的組織機構，這點我希望說明一下。而且，我在這裏對北高聯道一個歉。

另外一個，封從德對北高聯的看法，對北大籌委會也有一定的影響。北大籌委會在封從德辭職以後，派王有才作為聯絡員去參加北高聯的活動，當時祇碰到王志新。王超華也到過北大去說明這個事情，說北高聯倦了。當時北大籌委會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扶持北高聯，當時就決定讓北高聯遷到北大去，騰給他們兩個辦公室。這個消息是由安寧帶過去的。五月七日下午北高聯在北大開了一個會，謝劍、蔡劍、王有才和我都參加了這個會。當時正式在北高聯的會議上提出，北高【以上第 116 頁】聯是協調性的會議，不能是領導性的機構。這樣北大和北高聯之間出現了比較深的矛盾。但是北大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在校園民主化時期幫助北高聯發展它的組織機構，這點我希望說明一下。而且，我在這裏對北高聯道一個歉。

【封從德：其實，另一方面，北大籌委會裏也有讓賢的情緒，不願事事做老大，這樣好調動其他學校的積極性。】

【常勁：關於北大籌委會五月四號到五月十二號那一階段的工作，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個跟絕食是有關係的，而且跟剛才王超華提到的高聯和北大籌委會的關係是非常有關係的。當時北大籌委會工作已經進入了正規化、程序化，而且建立了日常輪流換班的制度。柴玲他們當時認為自治會和基層缺乏溝通，所以北大籌委會成立了兩個重要的部，一個是分籌委的組織工作，當時是王有才負責的，另外一個是負責班代表民選的一個機構，當時是由列真和她的丈夫負責的。北大所做的這些工作，就是為了加強自治會和基層的聯繫，為了順應當時超華他們發的那個校園民主化的決議。而且當時北大在罷課與復課的問題上還做了一次民意調查，這個是有據可查的。】

【梁二：誰能告訴我，楊濤在五月四日之前當過北大主席？

常勁：五月一日的改選上楊濤就變成了北大的召集人。五月七日封從德、熊焱、王丹退離，北大就改組，變成楊濤主席。市高聯遷入北大以後，北大推薦楊濤作常委，並且建議他作高聯主席。楊濤不在，就是安寧替代他。

梁二：我記得北大派出的常委是很不負責任的。為什麼北大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少江不能在北大本身起到一點領導作用，而派安寧出來？

常勁：北高聯轉入北大後，北大為了避免與北師大、清華的矛盾，就故意這樣安排，不想在北高聯裏加入太強的人，而是想幫北高聯【以上第 117 頁】把組織建立起來。北高聯就用了北大的聯絡部。當時北大已經強調北高聯是協調性組織，祇是負責把大家的意見搜集起來然後作表決，所以安寧就在我們這裏起了聯絡信息的作用。後來北大認為安寧在那兒還是不夠起作用，所以就加入少江。少江是北大的副秘書長。他在高聯裏作副秘書長，就是加強北大在高聯裏的影響，但是又不引起其它各校的矛盾和反對。但是少江有另一個身份，他是知識界和學生的聯系人。他在北大的副秘書長也是挂名的，他的主要作用就是聯絡。

常勁：北高聯轉入北大後，北大為了避免與北師大、清華的矛盾，就故意這樣安排，不想在北高聯裏加入太強的人，而是想幫北高聯【以上第 117 頁】把組織建立起來。北高聯就用了北大的聯絡部。當時北大已經強調北高聯是協調性組織，祇是負責把大家的意見搜集起來然後作表決，所以安寧就在我們這裏起了聯絡信息的作用。後來北大認為安寧在那兒還是不夠起作用，所以就加入少江。少江是北大的副秘書長。他在高聯裏作副秘書長，就是加強北大在高聯裏的影響，但是又不引起其它各校的矛盾和反對。但是少江有另一個身份，他是知識界和學生的聯系人。他在北大的副秘書長也是挂名的，他的主要作用就是聯絡。

封從德：就北大和北高聯的關係，四月二十九日我由超華推薦從北大去北高聯，第二天當選主席。直到五月六日，北大和北高聯之間的聯絡自然而然就落到我身上。所以，我想，當時我對北高聯的態度對於北大籌委會對北高聯的態度，可能影響比較大。在北高聯成立之初，我是反對它成立的。但是因為四二七，它的名聲已經出去了，北高聯已經鞏固。因此，我們的態度也就轉到支持北高聯建立組織。我加入進去主要也是為了這個。後來我進一步感覺到北高聯的組織內部比較空虛。五月六日我辭職，我當時從感情和理智上都想要削弱北高聯的影響，這我沒有說出來，也沒有向北大籌委會講明我的意圖。我之所以有這種態度，是因為，第一我認為北高聯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有問題，第二是對當時形勢的估計的失誤，我認為五四之後學運就差不多該結束了。這可能和我六月份論文答辯有關。

王超華：常勁說後期北大常委是北高聯副秘書長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開會征集簽名需要五個常委簽名的時候，他就說，“我就是北大常委了。”梁二：我對北大這點很不滿意，因此工作很不力。】

2.7.5 誰是絕食書的作者？誰吃了巧克力？

沈彤：我有幾個問題，因為柴玲有幾點沒有講清楚。一個是你提到了關於絕食書有很多同學建議，但是後來絕食書是誰寫的，具體的能不能再多講一下。第二個，你一開始就講到你對形勢的分析，其實從你的角度看就是絕食的動機。但是北高聯、對話團也有一些反對意見。你能不能再仔細地講一下，不管是你個人還是從你了解的其他的絕食同學，絕食團裏的主要領導人，到底你們當時的想法和動機是什【以上第 118 頁】么。第三個是絕食同學在最開始的時候是否有承諾。剛才我聽你說，有一種告別生命的一種感覺。實際上我和其他北大同學的接觸，沒有這種感覺，實際上很多人到了廣場兩三天還吃巧克力什么的。當然我不是誣蔑他們，都是我們同班同學，還有一些生物系的高年級學生。

沈彤：我有幾個問題，因為柴玲有幾點沒有講清楚。一個是你提到了關於絕食書有很多同學建議，但是後來絕食書是誰寫的，具體的能不能再多講一下。第二個，你一開始就講到你對形勢的分析，其實從你的角度看就是絕食的動機。但是北高聯、對話團也有一些反對意見。你能不能再仔細地講一下，不管是你個人還是從你了解的其他的絕食同學，絕食團裏的主要領導人，到底你們當時的想法和動機是什【以上第 118 頁】么。第三個是絕食同學在最開始的時候是否有承諾。剛才我聽你說，有一種告別生命的一種感覺。實際上我和其他北大同學的接觸，沒有這種感覺，實際上很多人到了廣場兩三天還吃巧克力什么的。當然我不是誣蔑他們，都是我們同班同學，還有一些生物系的高年級學生。

柴玲：第一個問題，絕食書是我起草的，白夢拿去修改。在文采上加了很多，可並沒有增添新的精神內容。當時甚至有點遺憾。出來以後，當別人說絕食書是我作的時候，我總是說還有另外一個作者白夢。並且因為這個原因，我還寫了推薦信把他從香港辦過來。在辦的過程中，白夢把他寫的書的草稿給我看，他中間提到這一段時說，柴玲祇寫了幾行字。我看了以後從此對白夢有一點失望。後來老封寫了一篇文章談絕食書的修訂。我想既然白夢在場，這個問題最好還是問他。我覺得這個事情本來不成為一個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高自聯和對話團都反對學生絕食。我覺得學生絕食的基本原因已經說的很清楚了，現在我倒很想了解，為什麼對話團、高自聯反對。究竟是不是因為不同信息的原因。第三個是北大學生的絕食有多少承諾。從那天晚上動員會一直到第二天宣誓

出發的時候，我絕對相信大家是非常真誠的。而且在那天動員和第二天（十三日）中午宣誓之前，都再三強調絕食紀律。而且我在動員時說過，有的同學建議我們可以吃點巧克力，或者吃點面包什么的。我說如果你有這種想法來絕食的話，請你不要參加。我們不要因為一粒屎帶壞了一鍋粥。所以我絕對抗議你說的這種巧克力的方式。最後，同學在廣場上以至於絕水、絕食，大家把嘴上貼上膠布。我想說，當時是那麼樣一種情緒。當時離開北大的二百二十個人，每一個人都在紅紙上寫下了他們的名字。後來加到三千人，這中間有多少糾察隊員都變成了絕食者，又有多少自發的沒有通過登記也參加進來。他們之間有沒有宣誓，知不知道絕食紀律，這個我不能保證，但是最初絕食的二百二十個人，我是可以保證的

沈彤：不管柴玲有多麼情緒化，我還是要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有許多人感興趣。

柴玲：希望你指出是誰吃了巧克力，他們的名字。【以上第 119 頁】

【沈彤：雖然柴玲和我都比較激動，但是我還是想提剛才那個問題。有一個在美國，就是偷吃東西的，名字我都寫在那。剛才柴玲問我要具體的人和姓名，我已經給了她。我也可以給柴玲電話號碼，她可以打。

我個人對絕食的看法、我十二日聽柴玲講演之後的轉變和十六日的絕水場面，這些我都知道，但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的問題是，絕食早期的時候，象我知道這個同學和其他幾個現在還在國內的同學的這種現象有多普遍？因為你是北大部分絕食發起人，精神領袖。

柴玲：這個看是一個什麼標準，如果從動員宣誓以及當時大家集中在那兒的表現，當時在廣場大家前面空出一塊地來，所有送來飲料、面包都要堆在那兒，而且希望堆成山的樣子，從這些大家的基本行為，一直到最後絕水、貼膠布等，要以這個為標準的話，那基本的主流和精神是絕對不允許吃東西的。】

【封從德：北大絕食隊伍出發之前，在博士生樓前面的一個花壇邊，D. & S.（民主與科學）金屬塑像前面，北大同學做了絕食誓言。由趙體國和彭嶸帶領宣的誓。為什麼要宣誓？就是因為很多同學擔心絕食會變成一個非常不嚴肅的事情，所以當時趙體國十分嚴肅地提醒大家：你們知道絕食是什麼含義嗎？這之前，柴玲的在廣播站念的絕食書，也渲染了同樣的氣氛。絕食誓言與絕食書都是我做的錄音。】

白夢：我出來以後，關於絕食書的事情有許許多多的說法。包括前不久封從德寫了兩篇文章，一口咬定柴玲是絕食書的作者，我是潤色。我出來得比較晚，出來之後在我的簡歷中寫過，我是絕食書的作者。（刪三十個字。）我想把當時的過程非常真實地復述一遍。五月十二日晚上，在柴玲做過絕食動員之後，我上街買了三斤水餃。那天晚上我讓柴玲跟封從德在我屋裏住的，第二天早晨起來，他們倆就不見了，我跑到北高聯找過一次沒有找到。我買好了三份早餐，又找，發現柴玲在我的窗外，那是北大的西圍牆，她拿著一支筆在那站著呢，這大概是早上八點多。我就跑出去叫她，我說：“柴玲，你進來吃點飯。”因為他們當天就要絕食，我心裏很難過。她說“我不想吃。”我說：“你必須吃一些飯。”後來她說：“不行，我要替全體同學寫【以上第 120 頁】一個絕食書。但我現在心裏

很亂，我不知道該怎樣寫。”我當時說：“你吃完飯再寫吧。先吃點東西，還來得

及。”她說“不行。”後來我說：“你來吃飯，絕食書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你什麼

時候要？”她說：“大概一個小時之後。”我說“沒問題，包在我身上。”我當時就把柴玲拉進去，她也沒有吃什麼，簡單地喝了幾口粥就匆匆忙忙地跑了。我就接過了這張紙，我當時的印象，這張紙上橫的豎的都有，可能記了她的一些感覺，寫了一些字。我就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頭，可能是九點多開始寫絕食書。我的確是一邊哭著一邊寫，一邊還捂著眼鏡，怕被別人看見大男人在那兒哭。柴玲這張紙上的有些話我記得很清楚：“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這句話肯定是柴玲這張紙上有的，我後來用了。（刪二十字。）我的原稿在國內，原稿共兩頁半稿紙。當然在柴玲讀的時候有變動。我出來之後，就一些印刷錯誤我可能糾正過十六個地方，但因為考慮到許多情況吧，我一直沒有做公開的糾正。這黑體字打出來的原語是這樣的：“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在生與死之間，我們要拍拍民族的良心。”原語是三個排比句，但是柴玲念的時候不一樣，可能封從德是按錄音整理出來的。

白夢：我出來以後，關於絕食書的事情有許許多多的說法。包括前不久封從德寫了兩篇文章，一口咬定柴玲是絕食書的作者，我是潤色。我出來得比較晚，出來之後在我的簡歷中寫過，我是絕食書的作者。（刪三十字。）我想把當時的過程非常真實地復述一遍。五月十二日晚上，在柴玲做過絕食動員之後，我上街買了三斤水餃。那天晚上我讓柴玲跟封從德在我屋裏住的，第二天早晨起來，他們倆就不見了，我跑到北高聯找過一次沒有找到。我買好了三份早餐，又找，發現柴玲在我的窗外，那是北大的西圍牆，她拿著一支筆在那站著呢，這大概是早上八點多。我就跑出去叫她，我說：“柴玲，你進來吃點飯。”因為他們當天就要絕食，我心裏很難過。她說“我不想吃。”我說：“你必須吃一些飯。

“後來她說：“不行，我要替全體同學寫【以上第 120 頁】一個絕食書。但我現在心裏很亂，我不知道該怎樣寫。”我當時說：“你吃完飯再寫吧。先吃點東西，還來得及。”她說“不行。”後來我說：“你來吃飯，絕食書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你什麼時候要？”她說：“大概一個小時之後。”我說“沒問題，包在我身上。”我當時就把柴玲拉進去，她也沒有吃什麼，簡單地喝了幾口粥就匆匆忙忙地跑了。我就接過了她這張紙，我當時的印象，這張紙上橫的豎的都有，可能記了她的一些感覺，寫了一些字。我就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頭，可能是九點多開始寫絕食書。我的確是一邊哭著一邊寫，一邊還捂著眼鏡，怕被別人看見大男人在那兒哭。柴玲這張紙上的有些話我記得很清楚：“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這句話肯定是柴玲這張紙上有的，我後來用了。（刪二十字。）我的原稿在國內，原稿共兩頁半稿紙。當然在柴玲讀的時候有變動。我出來之後，就一些印刷錯誤我可能糾正過十六個地方，但因為考慮到許多情況吧，我一直沒有做公開的糾正。這黑體字打出來的原話是這樣的：“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在生與死之間，我們要拍拍民族的良心。”原話是三個排比句，但是柴玲念的時候不一樣，可能封從德是按錄音整理出來的。

柴玲：白夢，你在書中寫，第一次我給你的稿子中有幾行字。後來在普林斯頓，我們談過一次，我說，我記得是一頁零兩行。你也同意，是吧？

白夢：不。

柴玲：你現在不同意了。

白夢：我不想爭論。

柴玲：把話說清楚嘛。

張伯笠：關於絕食書的問題，剛才別人談到，外邊也有一些議論，在今天的會議上，白夢，你是不是同意“柴玲的草稿，是你潤色”？柴玲你是不是同意這樣？把這個問題確定就完了。【以上第 121 頁】

柴玲：我同意。

白夢：我不同意這個提法。（刪五十字。）

【張伯笠：關於絕食書的兩個版本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有必要把它澄清，否則今後這個帳就沒有完。究竟是柴玲寫的第一稿，你整理的，還是一直是你寫的。我在美國聽了很多傳聞，這對你們倆本人都不好，對學生領袖的形象也不好。

白夢：關於絕食書具體的細節我已經在那天作了詳細的陳述，關於結論我個人不想作判斷，我祇想提供事實。這是一個原則。（刪一百字。）

張倫：就張伯笠的問題，你最後的判斷是什麼？

白夢：我沒有拒絕回答，我是說，我祇陳述事實，我不想提出判斷。（刪二十字。）

主席提議：在沒有定論之前，本會議祇負責存檔本人的各自描述。以後你們找到更多的證人再說。白夢：你們要我說出結論，我願意說出結論的前提。如果是象封從德的文章說的是潤色，潤色必須有一個成文的東西。但是我當時接到柴玲的那張紙，紙上是不多的一些寫得零散的字。我現在敢肯定，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這句話是原紙上的。（刪十五字。）

封從德：那麼你同不同意，柴玲是起草人，你是加工者？

白夢：我不同意。

沈彤：我覺得這樣對白夢有點不太好。別人不要幫閑，既然這個事情兩個人有爭議，以後就讓這兩個人說，兩個人愛說什麼說什麼。【以上第 122 頁】

張伯笠：我在新聞導報發表號外的時候，白夢交給我的絕食書確實是白夢的手跡。但是在此之前白夢究竟接沒接過柴玲的底稿，這個我不清楚。

封從德：柴玲是把這個成文的絕食書拿來念了，我現在有錄音帶。時間是十三日上午十一點在廣播站，我錄的。我沒看筆跡，一直認為是她寫的，因為是她的感覺。

白夢：原稿還在國內，這個原始資料還有。】

2.7.6 誰最先發起絕食？

王超華：柴玲講絕食發起是從十二日王丹他們來開始。但是這個絕食發起實際上在十二日之前吾爾開希和王丹他們做了這個決定。這個事情目前在場的祇有劉燕知道。絕食各校都有過提議，但實際上變成一個計劃是五月十一日晚上。

（封從德插：而且，我基本上相信是上帝決定的。）

張倫：剛才王超華已經講了。王丹親口給我講的。他們談到絕食時是在一個小飯店裏，當時有六個人在場。

劉燕：王文、開希、程真、朝暉、王丹、馬少方。第一次決定可能是在五月十一日晚上，在一個小飯店。當時決定提出絕食，是馬少方和王文提出來的。

封從德：柴玲在五月十一日晚上給我講過她的一批哥們兒的事情，她在那發起絕食，一批哥們兒支持她。她還對我講，就是張伯笠所說的那些話。所以，我相信這個絕食的發起是上帝決定的，同時安排了許多地方在發起。【張伯笠：絕食之前，我跟柴玲、封從德在我們作家班討論過一次這個問題，當時我說，“所有的民主運動，最後的殺手 jian 就是絕食。”跟柴玲說的基本是一樣的。我也曾經給她開過玩笑，我說在需要絕食的話，大家可以偷著吃點東西，確實我是這樣說【以上第 123 頁】的，但是我說必須絕食，而且各個大學要在校園絕食，

然後造成社會輿論的壓力。不要到廣場，（柴玲插：當時擔心他們來包圍校園。）

對，當時我就準備堅守校園。因為《新聞導報》就在校園，他要封《新聞導報》，

要封絕食，那麼學生就會起來抗議，運動又起來一個高潮。當時我是這樣設計，

跟他們談的。當時封從德封了我一個諮詢部的領導職務。當時我不想參加這個運

動。】

封從德：柴玲在五月十一日晚上給我講過她的一批哥們兒的事情，她在那發起絕食，一批哥們兒支持她。她還對我講，就是張伯笠所說的那些話。所以，

我相信這個絕食的發起是上帝決定的，同時安排了許多地方在發起。【張伯笠：絕食之前，我跟柴玲、封從德在我們作家班討論過一次這個問題，當時我說，“所有的民主運動，最後的殺手jian就是絕食。”跟柴玲說的基本是一樣的。我也曾經給她開過玩笑，我說在需要絕食的話，大家可以偷著吃點東西，確實我是這樣說【以上第123頁】的，但是我說必須絕食，而且各個大學要在校園絕食，然後造成社會輿論的壓力。不要到廣場，（柴玲插：當時擔心他們來包圍校園。）對，當時我就準備堅守校園。因為《新聞導報》就在校園，他要封《新聞導報》，要封絕食，那麼學生就會起來抗議，運動又起來一個高潮。當時我是這樣設計，跟他們談的。當時封從德封了我一個諮詢部的領導職務。當時我不想參加這個運動。】

【封從德：關於絕食發起。我想關於絕食的想法是運動一開始，甚至運動以前就有了。就我所知道的，五月九日北大四十六樓的研究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們現在應該絕食了。大概在十一日的時候，博士生又貼了一張大字報。在五月十日的時候，我就在籌備在北大校園內部搞一個絕食活動。當時我暗中告訴北大籌委會裏面管錢的同學，讓他們偷偷準備下一筆錢來買墨、筆和白布，準備在校園之內發起哀兵之勢，到時候把白布條幅突然掛起來，同學在宿舍裏邊絕食。所以說，北大籌備絕食的這種想法和行動是非常的早。】

劉燕：王超華剛才提出來讓我補充說絕食的發起，我到現在一直沒有說話。我一開始是作為一個普通個人參加學運，真正開始介入北高聯以及各種各樣和高層的聯系，直到最後的工作是從五月十三日正式開始，所以五月十三日以後開希的所有活動，我可以全部幫他補充，因為那時候我全部和他在一起，沒有離開過。在這之前的事，我不以我個人的名義幫開希說什麼。那天絕食的發起，我可以肯定是在五月十一日，開希、少方、王丹、楊朝暉、程真、王文他們六個人，在一個小餐館，當時已經做出了絕食的決定，而且他們已經準備開始在各校發起絕食，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張伯笠：關於學運低潮和絕食的發起，我想就補充到這裏。我可以總結其中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關於絕食的發起，劉燕已經提了，就是吾爾開希他們六個人，柴玲在北大那邊也有發起，王文在農工院可能也有。封從德也說了，這可能是大家的共識，上帝的決定。

劉燕：你不能做這個總結。這是一個歷史事實。【以上第124頁】

王超華：你覺不覺得我還有你們不知道的事沒說。哪怕就是絕食，也還有別人不知道的事我還沒有說出來。

劉燕：對於絕食的發起以及初到廣場的一段我要求搞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段非常重要。絕食的發起，可能大家走了不一樣的路也可能大家是在不同的學校。我想問一下柴玲，因為我確實知道，王文、少方、開希，還有楊朝暉、王丹、程真，他們於五月十一日在一個餐館就已經做出決定，要去各校發展絕食運動。我記得隊伍是從北大到了師大，完了跟師大一起到了廣場，當時我是走在最前面的。北大說絕食是北大發起的，我不否認在北大有發起，可是他們說是他們發

起的。這中間是怎樣 溝通和協調的，我想知道。

柴玲：我基本的觀點是，我非常不看重是哪幾個人，因為當初這個主意在很多不同的範圍內都探討過，關鍵是怎么實現這個過程。這六個人提議以後，十二日上午 傳到北大，北大開始進一步的組織動員活動。的確象常勁說的，五月九日大字報出來以後北大籌委會討論過，覺得絕食這個殺手 jian 要在最合適的時候拿出來。十二日的時候大家基本有一個共識，覺得這個時候最合適，所以就很快同意并且發動起來了。十三日中午的時候北大同學出發，由自行車帶到師大，本來說在師大門 口和師大的同學會合。後來我先進去跟師大的同學聯絡，見到了馬少方，在這之前已經見到了王文和楊朝暉。後來是打開大門，讓北大同學進到師大裏面，大家在操 場上整隊以後一起向廣場走。當時是開希、少方、王文、王丹、楊朝暉，還有程真這幾個人，我覺得他們幾個自我把自己認做發起人，我對這種名利始終沒有特別的 關心和介意。我記得非常清楚，王文、楊朝暉、馬少方、王丹，還有開希，走在最前面排成一排，一到有人的時候，他們就握起拳頭來。前面有一個大旗，旁邊有兩 個護旗的。我曾經舉過那個大旗走過一會兒，後來我累了，程真就接替我。在我們後面第一排還有很多人，比如當時其他一些籌委會參加絕食的同學。在這個運動開 始一直到最後不得不接見記者，我一直不覺得爭名分有什么特別了不起的。

【王超華：我替柴玲補充一點。就我在五月十三日絕食團出發時的觀察所見，柴玲發起、做宣傳、做講演，但是她沒有做出發時的實際【以上第 125 頁】組織

工作。她成為總指揮，應該是後來的事。在北大的時候我就問她，“你是不是要跟師大聯系？”她好象没有什么特別的反應。我當時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當時王丹和開希更主動地要當整個絕食的指揮。】

【王超華：我替柴玲補充一點。就我在五月十三日絕食團出發時的觀察所見，柴玲發起、做宣傳、做講演，但是她沒有做出發時的實際【以上第 125 頁】組織工作。她成為總指揮，應該是後來的事。在北大的時候我就問她，“你是不是要跟師大聯系？”她好象没有什么特別的反應。我當時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當時王丹和開希更主動地要當整個絕食的指揮。】

劉燕：在北大做出第二天絕食的決定之後，你們和師大，和少方、開希之間有沒有協調？柴玲：當時朝暉、王文通知過來以後，北大馬上做了協議，王文把我提的 兩點建議帶回去。傍晚的時候王文又回來，說師大已經準備好了，定於幾點在什么地方集合，然後到什麼地點集中。并且說，這兩點建議通過了。當時絕食的祇有北 大和師大，楊朝暉雖然是農機學院的，但是他祇有一個人，並沒有代表性。到了廣場以後開始清點人數，當時大概是三百多人。王丹在五點十幾分的時候宣佈宣誓， 絕食正式開始。在這之後又加了一批，我忘了是什麼學校。在路中，有醫學院的同學自動的來參加援助、救助活動。

劉燕：還有民族學院的。你忘了，有其他小學校。

柴玲：那是後來的事。開始絕食以後，他們去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有一

批民院的，或者其它的小學校，我記不清了，究竟哪個學校，大約來了一個大旗和幾個人。劉燕：我補充一些。當時柴玲還有你們在廣場看到的都是一些大學校，那我就說我們民族學院。五月十二日下午在我們學校的飯堂那邊，我們每次都在那邊集會，開始說第二天要絕食，征集簽名，第二天早晨集合。當天晚上沒有什麼人報名，這是王正雲做的。到第二天早晨的時候，我們學校就開始有人去報名，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有四十七個人報名。到下午三點鐘就離開學校往廣場走，至少有六十人。到了廣場人民大會堂的西面，我記得當時差不多的學校都到了，北大和師大是兩個大學校，可是小學校特別多。我記得我們學校旁邊是體院，那次我第一次見到張建。左邊，右邊，全部是小學校，雖然是小學校，但人數并不少。我就補充這個事實。

【梁二補充：師大與絕食發起

師大在廣場上的作用首先是在絕食發起這一點上。絕食發起時間【以上第126頁】是五月四日，游行一回學校，周勇軍宣佈復課。五月六日星期一師大上了一天課之後就覺得不耐煩，還是罷課舒服，舉行在校內的游行。我們就作了一個民意調查，在門上貼一張紙，“本宿舍同意罷課”。這樣收集起來，祇有九個宿舍棄權。這樣就是罷課，無限期的罷課，但是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那時有一幫激進的同學當晚找到我們說，“你們這樣不行。這樣搞下去，自治會本身就會散，在同學中失去合法性的基礎。”他們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絕食。在五·四之前就有一些歷史系的同學說，“要來就來狠的，絕食的”。五月六日晚上，他們提得更詳細。當時我一聽到這點就反對。我說，“絕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一旦絕食就會把整個矛盾激化”。

師大在廣場上的作用首先是在絕食發起這一點上。絕食發起時間【以上第126頁】是五月四日，游行一回學校，周勇軍宣佈復課。五月六日星期一師大上了一天課之後就覺得不耐煩，還是罷課舒服，舉行在校內的游行。我們就作了一個民意調查，在門上貼一張紙，“本宿舍同意罷課”。這樣收集起來，祇有九個宿舍棄權。這樣就是罷課，無限期的罷課，但是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那時有一幫激進的同學當晚找到我們說，“你們這樣不行。這樣搞下去，自治會本身就會散，在同學中失去合法性的基礎。”他們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絕食。在五·四之前就有一些歷史系的同學說，“要來就來狠的，絕食的”。五月六日晚上，他們提得更詳細。當時我一聽到這點就反對。我說，“絕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一旦絕食就會把整個矛盾激化”。

當時根據一些情況分析，趙紫陽的講話對我們學生運動的支持，以後戈爾

巴喬夫的來訪在國際上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影響和一些內部傳來的消息，說趙在八八年以後 就有可能下臺，但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轉機。所以我就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絕食為好。我和開希談過這些問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在演講時故意激 起一種情緒來還是其它什么目的，五月八日我們到師大的化學系演講的時候，他第一次提出來五月中旬是民主運動的高潮這個題目。而且他說他要絕食。他說，“我 要第一個去絕食”，他沒說要提倡絕食，但他說，“我要去絕食”。我就上去給他擦屁股。我說，開希是個政治煽動家。這是第一次給他擦屁股。

後來到北工去演講的時候，他再一次提到這一點，我就再一次給他擦屁股。我一直想，他這個話一旦說得過於激烈，而自己行動上沒做到，就會造成對他的誤解或 對整個學運的誤解。我盡力把話說得溫和些。沒執行的計劃最好先不要說，這樣有可能把學運一步一步導向激進。在這個時候，開希就有絕食這種打算了。

王文這人有一點對師大的靠近，他就整個沒在北京農學院進行過一點活動。他和我們師大秘書處一個叫彭濤的和程真幾個經常在一塊聊。彭濤他們當時跟歷史系那 幾個哥們混得不錯。歷史系有一個姓宋的同學，他父母也是北京市一個比較有名的學校的老師。他當時就說“這不絕食是不行的。因絕食造成一點流血才好呢。”王文呢，他的動機是想混入高聯。自稱為是高聯的監察委員，是獨立於常委之外的一個監察部長，北高聯的監察官，當然後來被否決了。後來又自稱是王志新的副秘書 長兼助手。他是找不著事幹想鬧一鬧。他當時就打著【以上

第 127 頁】師 大的旗號到各校游說了一下準備絕食，這已經是到五月九日的時候了。這個時候開希的心態越來越明顯了，好象很煩躁。有一些同學已經表示出來不耐煩要復課，而且有很多同學作出很明確的表示，就是要復課。當時我們在前門搞了一個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六十的市民認為我們現在學運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問我們到底要幹什 么，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民認為我們應該復課了。總而言之，有必要搞一個大規模的行動，而大家都對反復的游行的舊把戲不感興趣了。因此開希就覺得很有必要 掀起一次五月中旬的民主運動高潮。大家就同意了王文的建議，對王文和程真他們表示支持。開希也利用他的名聲在各校進行了一些游說。

王文這人有一點對師大 的靠近，他就整個沒在北京農學院進行過一點活動。他和我們師大秘書處一個叫彭濤的和程真幾個經常在一塊聊。彭濤他們當時跟歷史系那幾個哥們混得不錯。歷史 系有一個姓宋的同學，他父母也是北京

市一個比較有名的學校的老師。他當時就說“這不絕食是不行的。因絕食造成一點流血才好呢。”王文呢，他的動機是想混入高聯。自稱為是高聯的監察委員，是獨立於常委之外的一個監察部長，比高聯的監察官，當然後來被否決了。後來又自稱是王志新的副秘書長兼助手。他是找不著事 幹想鬧一鬧。他當時就打著

【以上第 127 頁】師大的旗號到各校游說了一下準備絕食，這已經是到五月九日的時候了。這個時候開希的心態越來越 明顯了，好象很煩躁。有一些同學已經表示出來不耐煩要復課，而且有很多同學作出很明確的表示，就是要復課。當時我們在前門搞了一個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六十 的市民認為我們現在學運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問我們到底要幹什麼，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民認為我們應該復課了。總而言之，有必要搞一個大規模的行動，而大家 都對反復的游行的舊把戲不感興趣了。因此開希就覺得很有必要掀起一次五月中旬的民主運動高潮。大家就同意了王文的建議，對王文和程真他們表示支持。開希也 利用他的名聲在各校進行了一些游說。

五月十日晚上，我就覺得同學們從心理上出現了一種疲憊的感覺。師大學生比較明顯地表現出對什麼都不信任，對師大自治會不信任，對共產黨建立的學生會也不 信任，一種很散漫的情緒就出來了。我當時為了整頓這種情緒，就搜集了一些情報，寫了一封給高聯的建議信，是“關於學生的自我教育”的問題，我提出要整風。我是在師大研究生這邊提出整風運動的口號，先對學生進行民主的自我教育，然後擴大到社會上的宣傳教育。

第二天我分析了一下形勢，得出了一個結論：運動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就應該向緩和，找機會復課，但我們還保存自治會的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方向發展。我不提倡開希那種絕食。

但是開希在五月十日晚曾經到田紀雲的辦公室，與田紀雲和趙紫陽的秘書商量問題。他說，秘書一直站在後面沒說話，而田紀雲不時回過頭低聲地與他商量一些問 題。開希自己就認為中央有緩和的態度了，如果我們再加壓的話，就很可能答應我們早期提出的要求。他是與彭濤一塊去的。他很堅定地告訴我，絕食是勢在必行 的。這是五月十日晚上深夜兩點鐘左右。

十一日我就把我的工作報告拿給開希看，因為我參加了高聯的會，他沒參加，其中有一些是分析當前形勢的問題。開希當時看了說“你怎么不早說呀！”他就有一種後悔的表現，覺得絕食這事不應該提出得過早。在王文和程真的鼓動之下，他又覺得是勢在必行的。各校的聲勢都打出來了，而且他自己說的“五月中旬民主運動 的高潮”這樣的話已經收不回來了。他就有一種騎虎難下的感覺，有點矛盾。】【以上第 128 頁】

【封從德：梁二提到五月六日師大開始發起絕食。是開始絕食，還是重新罷課？你說你和開希作了討論和商議。你認為這就是發起絕食，是嗎？

梁二：第一，五月四日宣佈復課之後，五月八日星期一師大同學上了一天課，覺得不如罷課好，因此就在校內進行大示威游行。五月八日晚上十點半的時

候，一幫同學下了晚自習回來就開始在校內嚷，所有的學生都跑出來了。我們進行了一個民意調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同學都同意罷課，其餘的棄權。有些同學認為這樣繼續罷課下去也是無所事事，必須改變鬥爭策略。因此歷史系的同學首先打出了絕食的口號。實際上在五月四日就有同學告訴我說，這種大游行的形式已經不起作用了。因為五月四日的游行準確的說是丟臉的。

第二，我認為我們的討論商議對絕食有很大的作用，但這不能算是發起，因為確實還沒形成一個議案。】

【封從德：開希曾經同意王文的絕食建議，是什麼時候？

梁二：確切的時間應該是五月十一日晚上，十二日凌晨。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當時王文一直呆在師大西北樓第三層的樓梯口上，也就是當時我們的辦公室的外面。

封從德：你又提到開希進一步採納王文、程真他們的絕食建議，這是在什麼時候？

梁二：我剛才把這個問題混淆了，實際上我剛才提的是同意。開希第一次聽到王文的這個發起意見的時候應該是在師大一個同學提出來的第二天，大概是五月十日。】

2.7.7 歡迎戈爾巴喬夫（封從德）

邀請戈爾巴喬夫這個事情，講起來比較早。五月八日晚上，北大同學到教師家屬區去游行，有大約一、兩千人。結果同學非常失望，得到老師的支持比較少。十日，有自行車大游行。這些我不多說了。【以上第 129 頁】那個時候同學們情緒非常低。所以有那麼多的同學想絕食。這當中，有一個知識分子，五七年後被關了十幾年，對我們影響很大。我現在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他讓我們去找方勵之，找其他一些人。後來，方勵之我也沒有去找，找了另外幾個北大的教授。結果，有個教授捐了四百塊錢說：“我們拖家帶口的，就給你們四百塊錢吧。”反正不管怎麼，這些我都長話短說。

邀請戈爾巴喬夫這個事情，講起來比較早。五月八日晚上，北大同學到教師家屬區去游行，有大約一、兩千人。結果同學非常失望，得到老師的支持比較少。十日，有自行車大游行。這些我不多說了。【以上第 129 頁】那個時候同學們情緒非常低。所以有那麼多的同學想絕食。這當中，有一個知識分子，五七年後被關了十幾年，對我們影響很大。我現在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他讓我們去

找方勵之，找其他一些人。後來，方勵之我也沒有去找，找了另外幾個北大的教授。結果，有個教授捐了四百塊錢說：“我們拖家帶口的，就給你們四百塊錢吧。”反正不管怎麼，這些我都長話短說。

然後，就有邀請戈爾巴喬夫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北大有些青年教師，建議北大授予戈爾巴喬夫一個名譽博士，歡迎他來北大講演。所以我們就準備這個。我記得，大概是五月十一日下午，我到北大的電教中心裏面去，因為我以前在裏邊弄計算機，打了一個征集簽字那樣一個格式的東西。結果，就在北大征集簽字。五月十三日，和張志勇送到蘇聯大使館的時候，祇有三千多北大同學，就在我們之前十分鐘，開希他們送去師大的六千人的簽字。當時，張志勇失望得不得了。開希他們已經走了，剩下的記者就比較少。我們又送了一個副本到中國外交部，張志勇還寫了一封信給錢其琛。

然後，我們就說到廣場去看一看。下午大概五點鐘我們到廣場，這個時候廣場人很少，天氣好象也比較陰暗。我記得當時絕食的同学加上周圍的同学，也就不超過兩千，核心那圈的大概就八百人。我們在那兒也有一些標語，也有那種“歡迎戈爾巴喬夫”的那種標語還有其他的標語。

過了一會兒，就看見王丹宣佈說，絕食開始。我看了表，是五點二十。他們在那兒念了絕食宣言。接著，大家宣誓。因為比較遠，我沒有聽得太清楚。因為我沒有絕食，在廣場我覺得自己沒有太多作用。心想，我還是作個後備，搞點組織，就騎自行車回校，看見廣場旗杆上的挂了許多旗幟，從長安街上看不清楚。我心裏就有了個主意：搞一個大旗，然後寫上“絕食”兩個字，讓北京市民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這個時候，是晚上六點鐘，我趕到一個百貨商店買了二十米長的黑布，回去縫了一個大旗。有個叫高新奇的同學，幫助我縫這個大旗。四米高，五米寬，兩桶黃漆還不夠寫那兩個字。第二天一早，我帶著“絕食”黑旗和柴玲《絕食書》磁帶到了廣場。】【以上第 130 頁】

2.7.8 為什麼學者勸阻無效？〈參：2.6.3 十二個學者勸阻絕食〉

蔡崇國：我到巴黎後，蘇曉康給我講過，就是接著柴玲剛才講的，當時他們在廣場說了以後，作用挺大。很多學生激動地準備接受撤的建議，但是這個時候，封從德臉漲得通紅和柴玲一起念絕食宣言，大家情緒一下子回來。然後王超華就說：“封從德，你要對你的行動負責。”

老木：我提一個問題，絕食團有沒有領導機構？行動是不是要由領導機構作決定，還是個人做決定？還是全體做決定？〈參：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麼成立的？〉

柴玲：第一個問題，蘇曉康說那天晚上是封從德和我主持，這個是不真實的。當時我一直在旁邊，一直沒說話。我當時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很失望。第二個就是絕食團有沒有指揮？當時我們基本的認知是：可能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政府會有一個基本的表態，沒有想到絕食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所以當時基本上還是絕食團各學校召集人協調這麼一個關係，主要的糾察、供應都是由後勤來負責。所以在十五日上午絕食團指揮部成立之前，一直是一個協調性的機構。十二個學者談完話以後，然後是超華講話，接著老封又講。完了之後，廣場很混亂。我們說怎麼辦呢？還是組織解決。六十四個代表集中在一起，討論是撤還是

不撤的問題。這個時候的表決，我記得是四十六票決定不撤，就在廣場原地不動。直到晚上，我跟王丹，還有什麼人，把這個決議宣佈下去的時候，當時開希拿起話筒說：“我要講幾句話。同學們，我求求你們了。我們是要民主的，但我們要愛國啊！我們在這占據廣場，阻礙高峰會談，是國家的恥辱。所以我請求大家移到紀念碑東側。”我們一看，就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了。等到清晨移到東側的時候，很多人體質很弱了，都互相攙扶著，我想絕食最難過的時候就是絕食後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時之間那段時間。本來當時廣場前前後後有兩三萬人吧，包括市民，還有圍觀的人，結果到十五日清晨四、五點鐘的時候，祇有幾千學生，冷冷清清在那。【以上第 131 頁】

王超華：剛才講到我的活動是到攪會為止。回廣場以後，我問過柴玲“戴晴見了你們沒有？”她說“見了。就是教訓人那樣，沒說什麼。”這是我印象當中她給我的回答。我當時一個感覺就是：糟了，這個戴晴根本沒有理解學生，和學生沒有共識。

另外一個就是當時非常擠，這些知識分子進去是一個一個從人縫裏往裏送。我想跟過去都非常困難。因為當時已經有幾個人開始講話了，我就使勁地往前擠過去，很困難地擠到那兒時，包遵信已經講完了，“這個無能的政府”什麼的。我就在那非常著急，我說，“不要講這個，馬上講你們下午的發言。”因為下午的發言是給這個運動非常深刻的定性，講這個，學生們會有一種滿足感。我就喊：“講下午的發言！”他們隔著幾個人給我講：“來不及呀，來不及。這個場合不合適。”

然後戴晴在那，我的印象是開始念什麼。她那個信裏有一段說：“我們和你們在一起。如果這個政府不怎麼樣，我們就加入你們的隊伍。”底下歡聲雷動。然後她就將這個放一邊，“那麼同學們咱們現在來商量一下吧。請他們現在到這來，趙紫陽，也包括李鵬。”這兩個人學生是都不接受的，“來這說：‘同學們，你們好！’咱們就回校去好不好？”確實是楞了一下，但是沒等封從德說話，大家就喊：“不好！”這幾個知識分子當時就楞了，發現沒有辦法了。然後封從德才說話的。我也拿過話筒來說，我現在祇能說，我這個人是相當怯懦的，我看著群眾這樣，我非常想說大家還是撤吧，可是我在那兒說了半天，說這些知識分子危險比咱們大啊，他們將來會被抓黑手啊，他們很勇敢啊，就是不敢說出：“咱們撤吧”。這幾個字，我卻不敢說，哪怕撤到東面，我都不敢說。所以後來有人跟我說：“合著那天羅羅嗦嗦的那個人就是你啊？”後來封從德把那個線掐了，不讓我說了。我自己分析，我當時有一種僥倖心理，總算有別人替我下臺階了。可是當時的事實是，我就衝著他大喊起來：“你得對歷史負責！”

【封從德：廣播站建好後，突然傳出消息：開始對話了。這時，絕食的同學都非常不清楚，到底是誰，是哪些同學在對話，就擔心又出現四月二十九日那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在五月十四日，為什麼沒有對成話呢？非常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同學之間缺乏溝通。大家對那些去對話的同學，還不知道是誰，所以不信任。我想，背後的更深的原因【以上第 132 頁】，大概是由於組織結構的混亂，沒有統一領導。

【封從德：廣播站建好後，突然傳出消息：開始對話了。這時，絕食的同學都非常不清楚，到底是誰，是哪些同學在對話，就擔心又出現四月二十九

日那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在五月十四日，為什麼沒有對成話呢？非常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同學之間缺乏溝通。大家對那些去對話的同學，還不知道是誰，所以不信任。我想，背後的更深的的原因【以上第 132 頁】，大概是由於組織結構的混亂，沒有統一領導。

然後，傳來說那邊已經答應可以對話，而且可以轉播，但是因為技術問題，現場直播沒有辦法。這個時候，我就提出來，如果電視不能現場直播的話，可不可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先有一個廣播的直播。然後，我們再檢察電視的直播。這是我們的最低要求。這個也能算直播。我們就祇能讓到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話傳回去了沒有。所以，大概有三、四次，我們就派了同學去招回對話的同學，說“在絕食同學允許之前，我們不同意對話。”因為我們認為，對話主要是絕食同學的要求。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在廣場上了。十二個學者也進來了。這時已經黃昏了。戴晴就跟同學建議了兩點：一個是《光明日報》的版面，一個是趙紫陽、李鵬來問同學們好。剛才超華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然後，就是高聯的同學也來了，開希、超華都來了。這個時候，廣播站一直是我在控制。因為我前期對高聯的不信任，所以我就控制得非常嚴格。超華很生氣，說：“封從德，你不能夠把持廣播站，你要講民主，你這樣做是獨裁。”這麼一說，我就沒辦法了，祇好把話筒交給了開希。當時，柴玲、李錄已經在那附近。柴玲在邊上好象很累，在邊上半閉著眼睛。開希拿起話筒就開始講了，說：“我們同學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愛國，我們應該往東移，為了歡迎戈爾巴喬夫，我們應當留出半邊廣場來，讓他能獻花。”結果我就很傷心，眼看著紅旗一面一面地往東移，很傷心地回家睡覺去了。等到第二天，開希不是說要歡迎戈爾巴喬夫來嗎？是下午兩點還是三點。跑回廣場上來一看，發現也沒有戈爾巴喬夫。我發現廣場非常亂。這一下，就更加強了我對開希、對超華，對北高聯的反感。我認為，廣場從此就開始亂了。這是我當時的感覺。

柴玲：我要求補充。十二個學者談完話以後，然後是超華講話，接著老封又講。這個完了之後，廣場很混亂。我們說怎麼辦呢？還是組織解決。六十四個代表集中在一起，討論是撤還是不撤的問題。最後決議，四十六票同意不撤，有幾票棄權，祇有七、八票同意要撤。把這個決議告訴大家時，已經是凌晨兩三點鐘的時候了。我們都很放心地回到隊伍中去休息。四點鐘的時候，這中間當然有老封和超華之間的爭議。開希講，求求大家，既要民主，也要愛國。然後，這個向東撤的行動就是這麼做出來的。【以上第 133 頁】

王超華：我補充兩個事實。一個是下午的時候，程真曾經拿著錄音帶回到廣場，要求廣播。當時，好象是封從德，在廣播站不讓廣播

第二個是晚上開希講話的時候，我不記得四十幾個學校的決議，但我記得，高聯常委有過一次表決，說是轉移。但是，好象大家都不認我們這個表決。最後，開希講：“我以我個人的名義求求大家，咱們把這個地方讓出來吧。”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是在這種情況下感動了，也許我們應該考慮這個。】

【王超華：沈彤的書出了之後我和他對過，有個時間上的差別，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覺得現在有必要調整。

沈彤：我講的有許多是太不相同了，比如所有跟廣場方面的聯系，尤其是

五月十四日這些聯系，都是程真做的。關於時間上的差別，在廣場上廣播不是送到廣播電臺，是送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系統，是人民大會堂在廣播，而且時間是半小時以後。柴玲提到一小時以後廣播，同學們同意了。這我都不知道，我是後來聽到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廣場同學沒有同意。

柴玲：我想補充一點，在對話的時候，老封補充一句：“同學們開始有意見。”說祇有在知道絕食團派代表參加對話的情況下，廣場同學同意復食。同意復食就要求一定保證現場直播，不要讓他們隨便刪減提問的這種事情再發生。達成的協議是，一個小時以後可以在廣場的廣播系統裏面，我說的是中共的廣播系統裏面廣播出來，不是說其他的什麼廣播站的廣播，那是全國直播。再一個是晚上電視新聞聯播之後可以看到電視直播。是這麼一個條件。】【以上第 134 頁】

三。廣場絕食（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

3.1 絕食團指揮部的活動（李錄）

大家知道，絕食團後來成為廣場指揮部的核心，這個線索基本上也維持下來，直到六四。基本上我的介紹按照三個線索，首先它的成立，包括它中間的人事變動，民主原則的建立；二、它的基本活動和重大政策的決定，包括它的中層幹部的選拔和同學的聯系，制度的牢固性，以及以廣場聯席會議為基礎對學運政策的決定及和政府的談判；三、還有從頭到尾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絕食的時候保障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在戒嚴之後這個任務就更重了，反對戒嚴，保障民主運動勝利果實等等。

3.1.1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 參：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

? >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是在五月十五日早晨，我在半夜的時候去拿了一趟生理鹽水，幾個小時之間廣場變得非常凋敝，人員很懶散，神情很沮喪。因為原來認為絕食在十五日前應該有結果，但是由於十四日對話的失敗，運動突然變得方向模糊不清，絕食到底要進行多久也不清楚。與此同時沒有人願意走，大家很疲憊，支持的人也不多。從絕食一開始我就有一個很大的感覺，我很擔心政府會採取強硬立場，在無人保護的情況下絕食人員被拖走。所以昨天柴玲也談到，十三日我和她再見面談到我個人對運動的考慮時，我說到我對絕食行動的感覺是一個混合的感覺，不太平衡。一方面我覺得這個時候絕食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另一方面我也同意柴玲的說法，覺得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對

當時運動的判斷和王超華是一致的，我覺得運動徹底進入低潮，政府沒有任何誠意，而且就我了解的情況我覺得改革派正 插手於這場運動，但毫無疑問，他們沒有多少誠意和同學們進行真正的交談。一旦沒有一個民主組織在運動之後被留下來，被承認下來，那么秋後算帳還是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我也堅決支持絕食。在【以上第 135 頁】這兩種心情下 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覺到運動中需要這樣一批人，他們希望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去為維護運動到此為止的勝利果實，去維護這些方向已經變得 模糊了，但又異常堅決的絕食同學的生命權力。所以當時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說我們需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更有效地保護同學的生命，同時在學生中建立共識，我們到底要什麼、怎樣要，因為時間倉促，情況緊急，我們沒辦法再去開會去商量如何去成立組織，我想我們定一個條件，把那些願意自薦，願意最終為絕食運動，為 民主運動獻身的那些同學召集起來。當時柴玲就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周圍有十幾人吧，後來這十幾個人大多成了絕食指揮部秘書處的骨幹。當然這中間人事換了很多，我後面會談到。當時柴玲作了一個演講，絕食團指揮部就正式成立了。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是在五月十五日早晨，我在半夜的時候去拿了一趟生理鹽水，幾個小時之間廣場變得非常凋敝，人員很懶散，神情很沮喪。因為原來認為絕食在十五日以前應該有結果，但是由於十四日對話的失敗，運動突然變得方向模糊不清，絕食到底要進行多久也不清楚。與此同時沒有人願意走，大家很疲憊，支持的人也不多。從絕食一開始我就 有一個很大的感覺，我很擔心政府會採取強硬立場，在無人保護的情況下絕食人員被拖走。所以昨天柴玲也談到，十三日我和她再見面談到我個人對運動的考慮時，我說到我對絕食行動的感覺是一個混合的感覺，不太平衡。一方面我覺得這個時候絕食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另一方面我也同意柴玲的說法，覺得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對當時運動的判斷和王超華是一致的，我覺得運動徹底進入低潮，政府沒有任何誠意，

而且就我了解的情況我覺得改革派正插手於這場運動，但毫無疑問，他們沒有多少誠意和同學們進行真正的交談。一旦沒有一個民主組織在運動之後被留下來，被承認下來，那麼秋後算帳還是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我也堅決支持絕食。在【以上第 135 頁】這兩種心情下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覺到運動中需要這樣一批人，他們希望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去為維護運動到此為止的勝利果實，去維護這些方向已經變得模糊了，但又異常堅決的絕食同學的生命權力。所以當時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說我們需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更有效地保護同學的生命，同時在學生中建立共識，我們到底要什麼、怎樣要，因為時間倉促，情況緊急，我們沒辦法再去開會去商量如何去成立組織，我想我們定一個條件，把那些願意自薦，願意最終為絕食運動，為民主運動獻身的那些同學召集起來。當時柴玲就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周圍有十幾人吧，後來這十幾個人大多成了絕食指揮部秘書處的骨幹。當然這中間人事換了很多，我後面會談到。當時柴玲作了一個演講，絕食團指揮部就正式成立了。

因為當時祇是宣佈成立，沒有其合法性，沒有確定基本的運行規則、下屬的部門、人員的選擇等等，所以我建議首先召開各校的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絕食團的一些最基本的重大問題，包括組織問題和政策問題。大概在七月十五日早晨七點多鐘吧，剛宣佈完之後就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由我主持。很顯然當時我沒有多少權威，因為對大多數絕食同學來說我是一個生面孔，我也自己介紹我不是北京同學，當時在場的還有少方等等，這些都是絕食發起人，所以我的權威自然就受到一些挑戰，當時柴玲作了一下介紹。我想我這個權威後來很快就受到穩固，主要因為會議主持進行得不錯。因為大家剛來的時候七嘴八舌，感情激動，其他人包括少方都試圖過主持這次會議，但後來沒有成功，我把會議主持成功下來，算是第一次的合法性的承認吧。

會議我主要講了幾條：第一，絕食指揮部成立了，第二，指揮部祇是代表同學的意願，保障同學的生命。指揮部並不想強加於任何絕食同學所不希望的決定，沒有想站在領袖的地位。這是我的一個根本想法，這個想法後來也一直貫徹到底。第三個是各校代表並不是當然的用民主選舉產生的，所以祇是一個聯絡人，希望代表和同學之間，代表和指揮部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繫。這是一些原則性的確定，其它方面上的確定主要是在工作範圍之內。第一個考慮到當時已經有人暈倒，因為在十四日晚上移動時已有人暈倒，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由廣場到醫院的一條，當時還不叫生命線，我對這些還不太在行，後來有人把它稱為生命線了。建立糾察，這些都是當務之急，也安排了人去作【以上第 136 頁】，還有確定了北醫作為絕食團的醫療隊，這些屬於保護生命安全的範圍。另外確定了在政策方面如何結束絕食，何時停止絕食等等。我說這個問題比較重大、複雜，既然同學把生命交出來願意參加絕食，我們就沒有多少權力去要求他們按照我

們的想法做，這個決定應由他們自己作出。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則被大家通過認可的。但是我說我們在這裏通過任何事情，除了保障生命不算，組織原則不算，其他關於政策的原則都希望得到每位同學的認可之後才能夠認定。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再開第二次會議。同時當時討論了一種方案，在我們無法確定如何停止絕食，何時停止絕食的情況下，我們希望絕食人數第一不要再增加，第二一旦身體不適立刻就送往醫院，送往醫院後不準再回來，這樣絕食會有一個自然的結束。這個想法在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天之中一直是開始結束絕食的一個辦法。當然後來我會談到，這個想法沒有實現，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會議我主要講了幾條：第一，絕食指揮部成立了，第二，指揮部只是代表同學的意願，保障同學的生命。指揮部並不想強加於任何絕食同學所不希望的決定，沒有想站在領袖的地位。這是我的一個根本想法，這個想法後來也一直貫徹到底。第三個是各校代表並不是當然的用民主選舉產生的，所以祇是一個聯絡人，希望代表和同學之間，代表和指揮部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繫。這是一些原則性的確定，其它方面的確定主要是在工作範圍之內。第一個考慮到當時已經有人暈倒，因為在十四日晚上移動時已有人暈倒，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由廣場到醫院的一條，當時還不叫生命線，我對這些還不太在行，後來有人把它稱為生命線了。建立糾察，這些都是當務之急，也安排了人去作【以上第136頁】，還有確定了北醫作為絕食團的醫療隊，這些屬於保護生命安全的範圍。另外確定了在政策方面如何結束絕食，何時停止絕食等等。我說這個問題比較重大、複雜，既然同學把生命交出來願意參加絕食，我們就沒有多少權力去要求他們按照我們的想法做，這個決定應由他們自己作出。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則被大家通過認可的。但是我說我們在這裏通過任何事情，除了保障生命不算，組織原則不算，其他關於政策的原則都希望得到每位同學的認可之後才能夠認定。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再開第二次會議。同時當時討論了一種方案，在我們無法確定如何停止絕食，何時停止絕食的情況下，我們希望絕食人數第一不要再增加，第二一旦身體不適立刻就送往醫院，送往醫院後不準再回來，這樣絕食會

有一個自然的結束。這個想法在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天之中一直是 開始結束絕食的一個辦法。當然後來我會談到，這個想法沒有實現，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後來在博物館前召開了一次新聞記者會議，柴玲、梁二、王丹、少方、楊朝暉五個人作了主持，還有一些人參加，同時選了北醫兩位同學作代表，介紹同學健康情況，發了幾個呼吁書。回來後又開了一次會議，進一步認可了第一次會上的確定的原則。同時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絕食同學已經開始大規模暈厥，建立生命線成了當務之急。建立生命線之前首先把四周糾察弄好，走到每處告訴大家不準有人進來，同時開始集合各校在兩邊。生命線大家都已知道，就不必具體細敘了。當然這些事情指揮部並沒有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祇是提出來去做，實際上完全靠同學的自覺來建立維護這條生命線。這條生命線一直到絕食結束，一直有效地保障了同學的生命安全。五月十五日下午最主要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是支持開始有所變化，十五日為轉折點，開始上百萬人支持。第二件事情是對話團突然傳來消息，有情況，有可能對話。這件事主要是我負責，主要負責收集意見。最後的投票確實到了個人，很困難，但確實做到了。一共一千一百三十幾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確定了一個條件，其實和十四日的條件相差不了多少。項小吉來了一下，然後走了，他們派了兩個人在這邊等候條件。條件出來以後就送走了。十五日晚上的一件大事情，幾乎發生了一場暴力事件。當時有四、五萬人聚在天安門廣場前，要衝破人民大會堂，其中傳聞有不少勞改釋放犯。無論如何，當時的情況有可能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四、五萬人在擁擠，而且人們的憤怒已經到了【以上第 137 頁】頂峰。最後是由柴玲、我還有其他

一些同學帶了一百多位絕食已經三天的同學趕到大會堂前。其實絕食同學也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因為當時已累死了，餓也餓得差不多了。但是由於他們的到來消息很快傳開，從前到後有人喊，絕食同學到了，絕食同學到了。開希也在前面，大家拼命喊。就因為絕食同學到來，情緒後來才平定下來，中間大概有將近兩個小時，當時很危急，柴玲差點暈倒在裏面。這裏還有很多故事，沒法再講了。〈參：3.2.2.阻止衝擊大會堂〉

我們後來在博物館前召開了一次新聞記者會議，柴玲、梁二、王丹、少方、楊朝暉五個人作了主持，還有一些人參加，同時選了北醫兩位同學作代表，介紹同學健康情況，發了幾個呼吁書。回來後又開了一次會議，進一步認可了第一次會上的確定的原則。同時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絕食同學已經開始大規模暈厥，建立生命線成了當務之急。建立生命線之前首先把四周糾察弄好，走到每處告

訴大家不準有人進來，同時開始集合各校在兩邊。生命線大家都已知道，就不必具體細敘了。當然這些事情指揮部並沒有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祇是提出來去做，實際上完全靠同學的自覺來建立維護這條生命線。這條生命線一直到絕食結束，一直有效地保障了同學的生命安全。五月十五日下午最主要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是支持開始有所變化，十五日是轉折點，開始上百萬人支持。第二件事情是對話團突然傳來消息，有情況，有可能對話。這件事主要是我負責，主要負責收集意見。最後的投票確實到了個人，很困難，但確實做到了。一共一千一百三十幾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確定了一個條件，其實和十四日的條件相差不多少。項小吉來了一下，然後走了，他們派了兩個人在這邊等候條件。條件出來以後就送走了。十五日晚上的一件大事，幾乎發生了一場暴力事件。當時有四、五萬人聚在天安門廣場前，要衝破人民大會堂，其中傳聞有不少勞改釋放犯。無論如何，當時的情況有可能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四、五萬人在擁擠，而且人們的憤怒已經到了【以上第137頁】頂峰。最後是由柴玲、我還有其他一些同學帶了一百多位絕食已經三天的同學趕到大會堂前。其實絕食同學也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因為當時已累死了，餓也餓得差不多了。但是由於他們的到來消息很快傳開，從前到後有人喊，絕食同學到了，絕食同學到了。開希也在前面，大家拚命喊。就因為絕食同學到來，情緒後來才平定下來，中間大概有將近兩個小時，當時很危急，柴玲差點暈倒在裏面。這裏還有很多故事，沒法再講了。
<參：3.2.2. 阻止衝擊大會堂>

3.1.2 絕食團指揮部人事變動<參：柴玲 3.2.3 絕食指揮部的改選>

十五日晚十點多絕食團指揮部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變動祇持續了一、兩個小時。當時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幾個人覺得絕食團指揮部這個東西不合法，他們自己確定了一份名單，來告訴我們絕食團指揮部被取消了。新的人選，王文是總指揮，他們不叫團長，柴玲作宣傳部長，如此等等有份詳細名單。後來這個事情比較順利地解決主要是我召集了一次代表會議，在會上我的主要觀點是，不能這樣搞，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他們幾位很不幸都被選掉了，所以這次政變持續兩個小時結束。我再列出幾個比較重要的事

情，從那個時候開始，指揮部之所以得以存在，主要是因為封從德的廣播站。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祇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後來封從德很自然地被吸收到成員中間，郭海峰也做了秘書長。宣傳在那時變得異常重要，實際上柴玲當時主要的任務就是作演講。我要特別講到一條，關於精神領導和實際領導的差別很大。實際上我就作了一些實際事，真正的對廣場同學的精神影響，人數很少，柴玲算一個，前期可能還有幾個，象王丹、開希等等，起了這些作用。後來伯笠由老封介紹過來當廣播站站長。因為伯笠這個人實在太能幹，他不僅組稿子，總編當站長，而且什麼都幹，最擅長當糾察。所以後來大家一致選舉，這個人如果不當副總指揮沒人能勝任，所以伯笠也進了指揮部。這樣基本上絕食團指揮部從人事上它的領導階層從開始到後來成立指揮部，一直到最後六四都比較穩定。總指揮一直是柴玲，副總指揮現在在場的已經有三位，老封、伯笠和我，秘書長是郭海峰，當了很久，後來他作了常委，再加上王丹，這六個人一直是最穩定的六個常委，在歷屆中都沒有變化。這中間有些增減，超華曾作過，還有其他人，以後會談到。【以上第 138 頁】

3.1.3 絕食團指揮部的工作

關於保護同學生命有很多事情，在初期時主要是北醫和北中醫的同學。但到了十六日早晨，我們建立了首都醫院防疫聯合小組。這事情是由協和的一個負責人來找我，商量這件事，很快認為這事再好不過了。後來跟他們去開了兩次會議，最後他們一共二十幾家醫院聯合形成。主要工作當然是他們做的，我們祇是幫助建立與廣場同學的聯繫，建立糾察制度，給他們特別通行證等等。後來對穿白大褂的人完全有種尊敬。另外一件事情是保證廣場秩序，這實際上最重要。當時因為空氣污濁，人群多，五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每天有上百萬人聲援，氣氛異常激動，所以使得整個廣場秩序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尤其是絕食同學的情緒變得非常焦躁。激動、希望、失望交織在一起，使他們身體更虛弱。當時白天酷熱，晚上很冷，由於準備工作的不全面，開始一、二天晚上什麼設備都沒有，晚上就睡在地上，靠著一些同學的棉大衣，所以昏厥人數迅速提高。針對這個情況，我們作的主要措施是嚴格廣場秩序，糾察證制度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建立。但後來遭受很多批評，我想在座各位包括我們自己都受到過糾察的無理糾纏。但當時在建立時候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另一方面就是糾察線在開始一直起了很大作用，但後來也受到很多批評。開始建立生命線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因為五月十五日稀稀拉拉剩了幾千人，而且這些人都分割開來了，擔心他們來了把大家拖走。但後來從十五日開始大批人暈倒，生命線變得很重要了。開始的時候是請金鬆玉來負責糾察的，王文去協助他。所以王文出去轉了一圈以後才有了後來所謂的聯絡圖。他把各個學校的地點寫下來，成為他最大的財產，後來一直不願意交。我跟他有一個衝突也是由於這個原因。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把這個建立起來。後來我想沒有辦法，祇有直接去。直接去的時候我就把兩部分，北面 and 東面分割了一下，在中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空道。而這個空道後來派人把它拉起來，這個道後來就叫成了生命線。當時就把這條線確定起來了。這條線後來延長到長安街上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沒管，不大清楚是誰作的這方面的工作。廣播站已經講了。關於物資和財物，恐怕海峰來了可能才會確切。他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對廣場的物資，

主要是【以上第 139 頁】建立帳篷，建立資料等等，恐怕要由他們才能講得清楚了。】

【另一方面就是糾察線在開始一直起了很大作用，但後來也受到很多批評。開始建立生命線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因為五月十五日稀稀拉拉剩了幾千人，而且這些人都分割開來了，擔心他們來了把大家拖走。但後來從十五日開始大批人暈倒，生命線變得很重要了。開始的時候是請金鬆玉來負責糾察的，王文去協助他。所以王文出去轉了一圈以後才有了後來所謂的聯絡圖。他把各個學校的地點寫下來，成為他最大的財產，後來一直不願意交。我跟他有一個衝突也是由於這個原因。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把這個建立起來。後來我想想沒有辦法，祇有直接去。直接去的時候我就把兩部分，北面和東面分割了一下，在中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空道。而這個空道後來派人把包拉起來，這個道後來就叫成了生命線。當時就把這條線確定起來了。這條線後來延長到長安街上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沒管，不大清楚是誰作的這方面的工作。廣播站已經講了。關於物資和財物，恐怕海峰來了可能才會確切。他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對廣場的物資，主要是【以上第 139 頁】建立帳篷，建立資料等等，恐怕要由他們才能講得清楚了。】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開始和一些機關單位、醫院、廠礦聯系，為絕食同學提供各式各樣必要的物質來源，包括帳篷、床、棉大衣、木板。這些工作主要是張伯笠、郭海峰和其他秘書處的人去作的。保障同學生命最重要的一個事件是發生在十七日晚上。當時傳說要下雨，而且十七日晚上情況突然變得非常危急，十七日一天有將近一千人暈倒。這前面還有一些細節，在十六日開始出現要絕水、自焚等，主要是兩個學校，一個是電影學院，一個是南開大學，兩個學校將近有三十幾個人要絕水，加上外地學生提出自焚。南開的絕水被制止。電影學院的沒有被制止。法大在新華門前開始從跪請到絕食，另辟另外一塊戰場。而且那一塊到我們十九日絕食結束之後都沒有停止，之後好幾天才停止。當時我們的能力實在有限，而且支持實在過熱，所以不僅內部的各種更激進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無法制止。我記得很清楚的幾件事，象西安、洛陽的學生一上火車就開始絕食。還有外地學生獻血隊，一邊走一邊獻血，然後到北京來絕食，說到

北京來就是要參加絕食。所以實在控制不住。廣場上人數劇增，我最後一次點名是三千一百四十四人，這麼多人，這麼複雜。當時廣場已被占領了四天，垃圾成堆，沒有地方上廁所，很多地方隨地大小便，加上生命力抵抗很有限，所以瘟疫就成為最主要的話題，至少在我們這些人中間，我從十五，十六，十七日聽到協和的那個人不斷地提。我們和他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們在後面有一個指揮帳篷，我們去每次都提。到十七日情況突然變得非常緊急，因為預報晚上有大雨。按照醫生的說法，一場大雨使瘟疫傳播的速度比沒有暴雨時的速度增加十到二十倍，水打到塵土上浮起來瘟疫就會迅速地傳播開來。他說一場暴雨後百分之百一定是一場大瘟疫。如果這時廣場一場瘟疫，全北京就會立刻流傳開來，這樣民主運動根本不用政府來鎮壓，一場瘟疫就會使民主運動永遠背上這麼一個黑鍋，自然而然的民主運動就下去了。這是當時最大的一個考慮。當晚整整一個晚上所有的人在忙碌，當時主要的事情是盡可能的整隊。當時要整隊是難上加難，我在十五日時試圖整了一次隊，化了三個小時。到十七日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平均暈倒了一、兩次，身體極端地虛弱，指揮部的這些人也絕食，很難保證真正頭腦清楚，精力充沛。所以整隊幾乎作不到，完全靠意志，靠理念。【以上第 140

頁】有人不相信這些東西，我是極端相信的。後來這個隊還真整成了。整成之後，我開始的計劃是向南遷移出十米，然後不斷地一隊一隊的移十米，清□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開始和一些機關單位、醫院、廠礦聯系，為絕食同學提供各式各樣必要的物質來源，包括帳篷、床、棉大衣、木板。這些工作主要是張伯笠、郭海峰和其他秘書處的人去作的。保障同學生命最重要的一個事件是發生在十七日晚上。當時傳說要下雨，而且十七日晚上情況突然變得非常危急，十七日一天有將近一千人暈倒。這前面還有一些細節，在十六日開始出現要絕水、自焚等，主要是兩個學校，一個是電影學院，一個是南開大學，兩個學校將近有三十幾個人要絕水，加上外地學生提出自焚。南開的絕水被制止。電影學院的沒有被制止。法大在新華門前開始從跪請到絕食，另辟另外一塊戰場。而且那一塊到我們十九日絕食結束之後都沒有停止，之後好幾天才停止。當時我們的能力實在有限，而且支持實在過熱，所以不僅內部的各種更激進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無法制止。我記得很清楚的幾件事，象西安、洛陽的學生一上火車就開始絕食。還有外地學生獻血隊，一邊走一邊獻血，然後到北京來絕食，說到

北京來就是要參加絕食。所以實在控制不住。廣場上人數劇增，我最後一次點名是三千一百四十四人，這麼多人，這麼複雜。當時廣場已被占領了四天，垃圾成堆，沒有地方上廁所，很多地方隨地大小便，加上生命力抵抗很有限，所以瘟疫就成為最主要的話題，至少在我們這些人中間，我從十五，十六，十七日聽到協和的那個人不斷地提。我們和他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們在後面有一個指揮帳篷，我們去每次都提。到十七日情況突然變得非常緊急，因為預報晚上有大雨。按照醫生的說法，一場大雨使瘟疫傳播的速度比沒有暴雨時的速率增加十到二十倍，水打到塵土上浮起來瘟疫就會迅速地傳播開來。他說一場暴雨後百分之百一定是一場大瘟疫。如果這時廣場一場瘟疫，全北京就會立刻流傳開來，這樣民主運動根本不用政府來鎮壓，一場瘟疫就會使民主運動永遠背上這麼一個黑鍋，自然而然的民主運動就下去了。這是當時最大的一個考慮。當晚整整一個晚上所有的人在忙碌，當時主要的事情是盡可能的整隊。當時要整隊是難上加難，我在十五日時試圖整了一次隊，化了三個小時。到十七日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平均暈倒了一、兩次，身體極端地虛弱，指揮部的這些人也絕食，很難保證真正頭腦清楚，精力充沛。所以整隊幾乎作不到，完全靠意志，靠理念。【以上第 140 頁】有人不相信這些東西，我是極端相信的。後來這個隊還真整成了。整成之後，我開始的計劃是向南邊移出十米，然後不斷地一隊一隊的移十米，清□

3. 1. 4 闔明復到廣場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五月十六日闔明復到廣場。當時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束絕食的機會。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見得一定象某些理論家一廂情願地那樣，一定會走到某個地方去。實際上凡是參加過這場運動的人都理解當時情況的複雜性，不會輕易相信這種說法。但確實當時如果停止絕食的話，結

果可能會不一樣，情況可能會好些。閻明復那次去講得很真誠，人也非常真誠。當時開希、王丹也陪著他講了很多好話。同學有些被打動，這裏我談到的同學是當時已經絕食了四、五天，生命垂危，到那天有八百多人暈倒，而且受到來自一、二百萬群眾支持刺激的這麼一群同學。在這種情況下，閻明復本人也已經不是很正常，很理性，他本人發著高燒，以非常真摯的感情，帶著哭腔，求大家離開，而且講得也比較露骨，直接談到了黨內鬥爭等等，當時稍微有些分析能力的人可以聽出來他講話的意思。當時【以上第 141 頁】這個情況很亂，我主持把他們接進來，這已經很不容易了。當時放這麼一大堆人進來，對於秩序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當然還是做到了。後來由於開希暈倒，等於自然而然的一個臺階，他們就離開了。要是開希不暈倒，可能又是另外一個事情，我沒辦法預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當然他暈倒了，這就是歷史。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五月十六日閻明復到廣場。當時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束絕食的機會。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見得一定要象某些理論家一廂情願地那樣，一定會走到某個地方去。實際上凡是參加過這場運動的人都理解當時情況的複雜性，不會輕易相信這種說法。但確實當時如果停止絕食的話，結果可能會不一樣，情況可能會好些。閻明復那次去講得很真誠，人也非常真誠。當時開希、王丹也陪著他講了很多好話。同學有些被打動，這裏我談到的同學是當時已經絕食了四、五天，生命垂危，到那天有八百多人暈倒，而且受到來自一、二百萬群眾支持刺激的這麼一群同學。在這種情況下，閻明復本人也已經不是很正常，很理性，他本人發著高燒，以非常真摯的感情，帶著哭腔，求大家離開，而且講得也比較露骨，直接談到了黨內鬥爭等等，當時稍微有些分析能力的人可以聽出來他講話的意思。當時【以上第 141 頁】這個情況很亂，我主持把他們接進來，這已經很不容易了。當時放這麼一大堆人進來，對於秩序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當然還是做到了。後來由於開希暈倒，等於自然而然的一個臺階，他們就離開了。要是開希不暈倒，可能又是另外一個事情，我沒辦法預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當然他暈倒了，這就是歷史。

他們走了以後我馬上召開了一次緊急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值得大書特

書，開得異常激烈。其實每一次都很激烈，這也是營地聯席會議，下午我會再講到。這個會議真是非常非常地激烈，據我所記憶是當時聯席會議開到那天為止最激烈的一次。而且因為我們在廣播站，廣播站後面是一道草牆，草牆外邊聚集有上千名群眾，所有人都伸長脖子在喊，喊什麼的都有，有喊我們走的，大部分的人是喊我們千萬別上政府的當。那時北京市民剛發動起來，情緒是可以理解的，這跟各個學校先發動，後發動，跟北京，外地同學的區別差不多。而且那時開始已經有成萬的大筆捐款，都是由國家單位做的，實際上這時候北京已徹底解放，徹底自由了。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對共產黨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派了一隊糾察把他們擋開，派了兩隊糾察將近五十多人勉強劃出一個地盤，讓大家坐下來有一個稍稍安靜的環境。開始讓大家先安靜了一、二分鐘，情緒開始平靜下來，然後開始發言。印象較深的是周勇軍，他堅決主張立刻離去，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他是一個少數派，是極端堅定的少數派，每次我開會他都是做這個。但是後來他的代表資格逐漸受到挑戰，而且法大來了不止他一個，一共來了四個人，沒有一個人承認他的代表性。當然他的發言資格沒有被剝奪，因為當時我是主持，從開始到後來大部分營地聯席會議都是我主持的。但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說這完全不夠級別，跟我們的要求不一樣。我們寫出了要求了，就按照我們的要求做，紙上怎麼寫的我們就怎麼要求，等等，而且很激烈。當時我的一個建議是我們先看一看，同時繼續保持聯繫，看一看是否有更大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說這還不是最後的結論，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後再開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仍然是同樣的決定。

【張伯笠：關於閻明復到廣場那天的場景，五月十五日上午我和其他兩個人領導了知識界的大遊行，主要是我們領隊。晚上聽到柴玲要自焚的消息，我跟北大七個教授到廣場去勸說柴玲，從此沒離開過廣【以上第 142 頁】場。因為當時郭海峰、柴玲、封從德、李錄都在，當時我不認識李錄，但是這三個人在北京一直是我的朋友。封從德說你來好了，不要走了，替我管廣播站。就是這樣任命的。第二天下午閻明復來到廣場，閻明復講話時麥克風是我遞給他的，我就站在他身後，所以我看得最清楚。閻明復當時流著淚說：同學們，你們應該給改革派以時間。我願意作為人質跟你們回到北大。這時王丹就出來說：我以我個人的人格擔保閻部長講的都是事實。我是王丹，希望同學們考慮。吾爾開希也是這個觀點，他說：我是吾爾開希，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閻部長絕對不會騙我們。底下的人情緒很激動，他就暈倒了，他帶著氧氣袋。然後底下有五十多個代表參加了會議，這個會議是李錄主持的。李錄當時拿著麥克風，說：“我們撤與不撤，大家發言。”馬少方、郭海峰和我們都在，大家搶麥克風說話。王丹拿著一束花，

沒有參加這次討論，有人獻花給他。他在一邊，沒有在你們那個圈。然後大家沒有通過。閻明復去廣場的那天，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閻明復剛到的時候，第一個接他的是我和開希，我們在靠長安街那邊的一個救護篷裏，開希在吸氧氣。聽到外面很鬧，我出去看，正巧那輛救護車就停在我面前，閻明復和他所有的人就躲在救護車裏。他們一進廣場就被同學們發現了，就要打他，閻明復就躲在救護車裏，一群同學在外面。開希說我馬上過去，過去後閻明復說要給同學們談，開希說好。當時同學的情緒特別特別強，一定要打閻明復。閻明復身邊還帶著警衛，都沒有用了。閻明復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走。開希說你既然來了就一定要到前面去。他說“我在前面開路，你拉穩我的手。”開希就說“我是吾爾開希，閻部長要與同學談話，請大家讓出一條路來。”

【張伯笠：關於閻明復到廣場那天的場景，五月十五日上午我和其他兩個人領導了知識界的大遊行，主要是我們領隊。晚上聽到柴玲要自焚的消息，我跟北大七個教授到廣場去勸說柴玲，從此沒離開過廣【以上第 142 頁】場。因為當時郭海峰、柴玲、封從德、李錄都在，當時我不認識李錄，但是這三個人在北大一直是我的朋友。封從德說你來好了，不要走了，替我管廣播站。就是這樣任命的。第二天下午閻明復來到廣場，閻明復講話時麥克風是我遞給他的，我就站在他身後，所以我看得最清楚。閻明復當時流著淚說：同學們，你們應該給改革派以時間。我願意作為人質跟你們回到北大。這時王丹就出來說：我以我個人的人格擔保閻部長講的都是事實。我是王丹，希望同學們考慮。吾爾開希也是這個觀點，他說：我是吾爾開希，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閻部長絕對不會騙我們。底下的人情緒很激動，他就暈倒了，他帶著氧氣袋。然後底下有五十多個代表參加了會議，這個會議是李錄主持的。李錄當時拿著麥克風，說：“我們撤與不撤，大家發言。”馬少方、郭海峰和我們都在，大家搶麥克風說話。王丹拿著一束花，沒有參加這次討論，有人獻花給他。他在一邊，沒有在你們那個圈。然後大家沒有通過。閻明復去廣場的那天，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閻明復剛到的時候，第一個接他的是我和開希，我們在靠長安街那邊的一個救護篷裏，開希在吸氧氣。聽到外面很鬧，我出去看，正巧那輛救護車就停在我面前，閻明復和他所有的人就躲在救護車裏。他們一進廣場就被同學們發現了，就要打他，閻明復就躲在救護車裏，一群同學在外面。開希說我馬上過去，過去後閻明復說要給同學們談，開希說好。當時同學的情緒特別特別強，一定要打閻明復。閻明復身邊還帶著警衛，都沒有用了。閻明復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走。開希說你既然

來了就一定要到前面去。他說“我在前面開路，你拉住我的手。”開希就說“我是吾爾開希，閻部長要與同學談話，請大家讓出一條路來。”

李錄：後來我帶了幾十個人去把口子打開。

劉燕：然後從北大把王丹找來，王丹當時不在指揮部。】

【封從德：我補充一點，當時我在廣播站，記得是五點過一點，王丹先到廣播站說有個重大行動，要我們安排糾察，注意保安。然後開希、王丹一大群人接了個人來。】【以上第 143 頁】

3 . 2 絕食在廣場（柴玲）

3. 2. 1 絕食指揮部首先自焚 < 參：3. 6. 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

? 3. 6. 2 關於自焚 >

我現在講的是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後的一些事情，十四日下午是對話，然後是十二位學者來又是不行。十四日凌晨四點左右開希宣佈轉移，十五日凌晨轉移到紀念碑東側，這時候廣場已非常凋敝。就在這個時候，大概是五、六點鐘李錄回來了，他說：“怎么回事，我就走了幾個小時，怎么一下子變成這樣？這怎么行。這個運動不知道要持續多久，而且對話也沒希望，也不知什麼時候進行。這樣一折騰二折騰整個絕食運動不打自垮了。這不行。咱們一定該成立一個機構。這樣吧，基於兩點：一點是不知對話要拖多久，完全有可能政府不管你，一直拖直到學生不打自垮，或者同學出現生命危險。”第二個我記不起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如果這樣的話，幹脆成立一個指揮部。如果在政府給答復之前，同學出現生命危險，我們採取更激烈的措施，絕食指揮部的這批人首先自焚。”當時我一聽眼淚就下來了。我一知道自焚這個事情，我沒有想到別人，就想到老封、我父母，他們肯定特別受不了。李錄說別哭別哭。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我就說“那你當總指揮。”李錄說“不行不行，別人對我還不太了解，還是你來當吧。”後來我們幾個人的基本條件是在同學犧牲生命前首先犧牲，迫使政府給大家答復，通過這唯一方式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成立以後馬上就宣佈，在八、九點時我跟大家作了個演講，很多人流了淚，在掌聲和眼淚中，絕食團指揮部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報名的同學一下子增加到十幾個，有了十幾個絕食指揮部的成員。之後李錄對我說，我們還要搞另外一個方式。既然這個對話沒有搞成，我們要不要再增加壓力，把同學們全部拉到長安街上臥路，阻礙長安街的交通，這樣迫使政府趕快跟我們對話。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馬上就來了，他們是非常藝術性的人，“一個是臥路，一個是自焚。”他馬上就去買汽油去了。

因為這個問題，討論下一步怎麼辦？然後召開各學校代表會議，大概四十多個代表，討論我們下一步是採取更激烈的還是維持現狀等等，讓同學們下去征求意见。李錄這時候顯示出他非常驚人的主持會【以上第 144 頁】議的能力。這

個是我從運動開始一直到最後目睹籌委會的，目睹高聯的，還有目睹整個廣場這些人，我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鎮住局勢的人，從此，更建立我對他能力的欽佩。同學下去一個是征求大家的意見，第二統計絕食人數的名單，以及絕食人員的布局。第三件事就是馬上開新聞記者招待會，在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我們在一個大車前面，當時的成員有絕食指揮部的成員，普通絕食同學的成員，還有北醫的二位同學。他們匯報了絕食同學絕食後的身體健康狀況。我要補充一下，這個對後來的事情有點關係。就在十點左右的時候，王文拄著個小旗又來了，說：“咱們成立臨時指揮部啊，我也加一個。”我一看他就笑了，因為那天正是我們兩個在維持秩序，說：“好吧，那就加上去。”這時王丹跟開希都不在場，其實指揮部最初成員是沒有王丹和開希的。然後幾天王丹、開希要加入指揮部，因為他們老的資歷，也就很自然的加了，雖然他們沒有通過那個先決條件，就是說要自焚，因為我們要承認一些既成的事實。後來是上頭要跟學生聯絡還是怎麼回事，我說：“王文你去吧。”等王文回來的時候，記者招待會已經完了。他就衝我一笑：“嗨，怎麼又沒我？”我說：“啊呀，對不起，忘了。下回，下回。”他就很滿意。

因為這個問題，討論下一步怎麼辦？然後召開各學校代表會議，大概四十多個代表，討論我們下一步是採取更激烈的還是維持現狀等等，讓同學們下去征求意見。李錄這時候顯示出他非常驚人的主持會【以上第 144 頁】議的能力。

這個是我從運動開始一直到最後目睹籌委會的，目睹高聯的，還有目睹整個廣場這些人，我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鎮住局勢的人，從此，更建立我對他能力的欽佩。同學下去一個是征求大家的意見，第二統計絕食人數的名單，以及絕食人員的布局。第三件事就是馬上開新聞記者招待會，在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我們在一個大車前面，當時的成員有絕食指揮部的成員，普通絕食同學的成員，還有北醫的二位同學。他們匯報了絕食同學絕食後的身體健康狀況。我要補充一下，這個對後來的事情有點關係。就在十點左右的時候，王文拄著個小旗又來了，說：“咱們成立臨時指揮部啊，我也加一個。”我一看他就笑了，因為那天正是我

們兩個在維持秩序，說：“好吧，那就加上去。”這時王丹跟開希都不在場，其實指揮部最初成員是沒有王丹和開希的。然後幾天王丹、開希要加入指揮部，因為他們老的資歷，也就很自然的加了，雖然他們沒有通過那個先決條件，就是說要自焚，因為我們要承認一些既成的事實。後來是上頭要跟學生聯絡還是怎么回事，我說：“王文 你去吧。”等王文回來的時候，記者招待會已經完了。他就衝我一笑：“嗨，怎么又沒我？”我說：“啊呀，對不起，忘了。下回，下回。”他就很滿意。

我們發起招待會的時候，一個就是宣佈絕食指揮團的成立，第二個是說當時基本的策略，第三個就是說同學健康狀況，有五十四人次暈倒。在這之間一個小插曲我要說一下，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當時的氣氛。有個記者問，他說：“你們說你們絕食的原則是不吃東西。但是我發現剛才在這個記者招待會之前，有些同學在吃花生米。這是這麼一回事嗎？”當時我們都楞了，不知道花生米指的是什麼事情。後來那個北醫同學馬上解釋，說：“我解釋一下。我們剛才吃的那小粒的東西不是花生米，是因為這些人的嗓子都啞了，吃的是咽喉片。”記者招待會在這邊絕食圈裏邊的一個大車子前面，就是救生車前開過一次，後來又開到歷史博物館前面又開了一次，這是十五日。

【柴玲：補充一點，五月十四日臨晨兩點，陳希同、李錫鳴來到廣場，但是他們不敢進入廣場。當時絕食同學在紀念碑北側，再北側金水橋、長安街和絕食同學之間還有另外一個圈子，那個圈子是市民，還有糾察。陳希同、李錫鳴來了以後，說他們關心同學，但不敢進入絕食圈裏。我和王文得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帶了一批糾察隊去，發現這批人他【以上第145頁】們走得很蒼惶，走得非常快，怕人家打他。我們說我們是絕食團的，請保護首長，不要傷害他們。這時有人主動跟我們聯絡，是周圍的一隊便衣警察。後來他們就匆匆忙忙鑽進一輛汽車飛快地跑了。】

【柴玲：補充一點，五月十四日臨晨兩點，陳希同、李錫鳴來到廣場，但是他們不敢進入廣場。當時絕食同學在紀念碑北側，再北側金水橋、長安街和絕食同學之間還有另外一個圈子，那個圈子是市民，還有糾察。陳希同、李錫鳴來了以後，說他們關心同學，但不敢進入絕食圈裏。我和王文得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帶了一批糾察隊去，發現這批人他【以上第145頁】們走得很蒼惶，走得非常快，怕人家打他。我們說我們是絕食團的，請保護首長，不要傷害他們。這時有人主動跟我們聯絡，是周圍的一隊便衣警察。後來他們就匆匆忙忙鑽進一輛汽車飛快地跑了。】

3.2.2 阻止衝擊大會堂

十五日晚上發生了衝擊大會堂事件。我們知道消息的時候，當時糾察已經在調出人來了，很薄弱。這時候李錄就在廣播站說：“如果絕食同學你們身體還能夠動的話，請你們去增援大會堂。”（李錄插：不，對你喊了一聲，後來你說的。我那時候基本上不願意在喇叭上講。我跟你說，你有號召力，我沒有號召力。）然後我們這批人，我記得當時因為拿著個小旗幟，很容易在人群中形成一個目標，就老看見一個旗幟在人頭上動。很快這些人找到我們的絕食同學，很快地從人大會堂的兩邊開始插進去。我們插到軍隊跟老百姓之間，最上層了。我記得人擁得很厲害，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我們不斷地在喊，但是根本沒有辦法。

非常奇怪當時就是祇有薄薄的一層軍人，而且非常稀疏，祇有一排，後來又增援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就是後來擠到中間的時候，我突然開始不行了。我說：啊，我好難受。這時候李錄就求那個軍人說：“你看她身體不行，她又是總指揮，幾天幾夜了。能不能就到裏邊，或者你們找一點水來，或者到人大會堂裏邊，讓她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都行。”我記得軍人態度跟二十二日很不一樣，當時給我很深的印象，這個軍人木無表情地看著我們。後來我就說：“請你們理解我們同學的絕食吧。我們已經絕食大概六十四個小時了。”他看著我，後來他就說：“回去吃飯去吧。”當時我問：“什麼意思？”“那你們回去吃飯去吧。”

我當時不太明白。後來我又稍微緩過勁來，我就接著再要喊，拿著一個喇叭說：“我們是絕食同學，請大家理解，不要衝進大會堂。如果你們要衝進去的話，就從我們身體上踩過去。”後來李錄一下子把喇叭按下去，說：“你不要說。”這時他罵了一聲：他媽的。他說一抬頭看那個國徽的時候，凸在外面的是一個狼舌頭。我被按下去以後，我們就在那一邊拉著手。人不斷地衝過來，我記得當時簡直就是一個人腦袋的海洋。那個時候你突然就會感覺到一個人的力量在這個【以上第 146 頁】地方，無論你是總指揮還是別的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微弱，就象大海裏一滴水一樣。

我當時不太明白。後來我又稍微緩過勁來，我就接著再要喊，拿著一個喇叭說：“我們是絕食同學，請大家理解，不要衝進大會堂。如果你們要衝進去的話，就從我們身體上踩過去。”後來李錄一下子把喇叭按下去，說：“你不要說。”這時他罵了一聲：他媽的。他說一抬頭看那個國徽的時候，凸在外面的是一個狼舌頭。我被按下去以後，我們就在那一邊拉著手。人不斷地衝過來，我記得當時簡直就是一個人腦袋的海洋。那個時候你突然就會感覺到一個人的力量在這個【以上第 146 頁】地方，無論你是總指揮還是別的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微弱，

就象大海裏一滴水一樣。

這個時候在前面大概二、三排的地方站起一個人來：“下去，下去。”就這樣喊。那時候是開希，可能還有劉燕在旁邊。開始沒有動靜，連著喊了十幾個嗓子以後，人群開始一點一點地向後退。那個時候就覺得真是個特別壯觀的一種景象，終於在這種“下去，下去。”的喊聲中，數萬人一點一點地往下退。後來我們得到的消息，一個是中間有很多禿頭的剛被放出來的勞改犯在中間興風作浪地說：“衝啊。”第二是說當時有一部分市民，還有工人，他們說：“學生已經絕食了，政府還不對話。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到大會堂裏邊去靜坐，施加壓力。”當然很難說當時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就造成這麼一個局勢。

【劉燕：我補充衝擊人民大會堂的事。我記得的情景是五月十五日晚上，我和開希最早到了大會堂的最上面，最上面有兩排軍警，一開始是坐著的。當時群眾衝得很厲害，我們一個人拿一個喇叭，勸說群眾退下。但底下人太多，根本就聽不到，還是一直往上推。程真後來帶著師大的同學上來了，不知梁二在不在，當時是程真、梁二、開希還有我，還有師大體育系的同學，開始把隊伍往下趕。但是從上面往下趕，不如從下面來的力量大。後來絕食團同學來了，來了一百多個，拉起一條線，一點一點把人往下壓。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手裏一直有個話筒。最後沒有衝擊成人民大會堂。】

3.2.3 絕食指揮部的改選〈參：李錄 3.1.2 絕食團指揮部人事變動〉

我們回來以後，十五日的時候，王文跟我說：“柴玲，來，我們要重新開個會，重新改選。”我看見有馬少方，有程真，還有誰我就記不清了。我說：“李錄呢？”“李錄不在”。我說：“你們人數不全，我不參加你們改選。”我就拒絕了。過了有半個小時以後，王文過來說：“這是改選的新名單。”他衝我一笑，說：“我是總指揮。”我一看李錄的名字已經被去掉了，好象王文是總指揮，馬少方是副總指揮，程真是什麼我記不得了。我一看就笑了，我說：“你這個我不承認。”他說：“不承認也不行，我們是改選了。”過一會兒，陳【以上第 147 頁】

明遠來了，他看了說：“不行，不行，你們要重選，怎麼能夠把柴玲選掉了。咱們重新討論一下。”

我們回來以後，十五日的時候，王文跟我說：“柴玲，來，我們要重新開個會，重新改選。”我看見有馬少方，有程真，還有誰我就記不清了。我說：“李錄呢？”“李錄不在”。我說：“你們人數不全，我不參加你們改選。”我就拒絕了。過了有半個小時以後，王文過來說：“這是改選的新名單。”他衝我一笑，說：“我是總指揮。”我一看李錄的名字已經被去掉了，好象王文是總指揮，馬少

方是副總指揮，程真是什麼我記不得了。我一看就笑了，我說：“你這個我不承認。”他說：“不承認也不行，我們是改選了。”過一會兒，陳【以上第 147 頁】明遠來了，他看了說：“不行，不行，你們要重選，怎麼能夠把柴玲選掉了。咱們重新討論一下。”

這個時候李錄來了，陳明遠就很權威地跟他說：“李錄，你跟我談一下。”李錄當時非常誠懇。我見他們倆蹲在廣播站背後那個小叢林邊那塊空地上，底下是土。李錄非常誠懇地說：“別人都懷疑我是特務。我想跟你們解釋一下。我有一個爺爺，我爺爺是朱致賢的好朋友。”朱致賢是師大兒童心理所的老所長。我一聽說這個名字就全部知道。對不起，我現在可要說一點你的隱秘了，不是揭老底，是為了證明當時的情況。他說：“我爺爺有四個奶奶。”我一聽他這句話，突然間覺得特別恥辱。我就覺得誰有這個權力去這麼樣，把自己做為一個權威去屈辱、審查別人。所以我當時想，如果我在旁邊的話，我真的不能原諒我自己，我就走開了。李錄再跟陳明遠說什麼，我都沒有聽。從那時候我對陳明遠就開始有一點不好的印象了，或者我不同意他這種做法。然後完了之後，無論是李錄他再跟陳明遠怎麼講，我都沒有聽見。然後呢打那之後呢，從那時候我對陳明遠開始有一點不好的印象了，或者我不同意他這種做法。

之後大家重新選，選出我跟程真是總指揮，兩個總指揮。當時反正李錄不在。我跟程真的分工是，程真負責跟上面的聯絡、對話什麼的，我就負責廣場的情況。之後我見到李錄，李錄非常頹喪。他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就回南京去了，因為南京也非常需要我。”我一聽，這眼淚就下來了。我說：“如果你走的話，那我也沒辦法再搞下去了。我一個人也應付不了這麼多事情。”因為馬少方在十四日之後非常主張讓大家撤離，從此我就很不信任他，而程真她也是個女孩子，又管著那邊一些事情，她並沒有對廣場實際的組織起那麼大的作用，王文就是個小孩子，有時哄哄他，我還挺喜歡他的，覺得他象個小孩子一樣很天真，但實際上他沒有這個把廣場局勢鎮住的能力，讓我怎麼搞。李錄就很痛苦地在那兒閉著眼睛，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勸他。直到凌晨的時候，李錄跟我說：“我決定留下。”我就說：“是嗎？”我很高興。我沒有問他是怎麼一個轉機。十六日凌晨就馬上召開一個班代表會議，大家重新改選的結果，我的印象中是馬少方跟王文都沒有列到重要位置上，重新認可了李錄的主席的位置。我們大家經過了一場衝擊以後都比較輕鬆。我記得凌晨的時候，我們去洗了個臉，上了廁所以後，我跟李錄在歷史博物館門前開始談下一步怎麼做【以上第 148 頁】。那時候我發

現我身體已經開始很虛弱，經過一晚上的折騰，我開始腦子不太行了。李錄躺在那裏就說：唉，我還有一個老婆在南京。當時我都說不出什麼話來。

之後大家重新選，選出我跟程真是總指揮，兩個總指揮。當時反正李錄不在。我跟程真的分工是，程真負責跟上面的聯絡、對話什麼的，我就負責廣場的情況。之後我見到李錄，李錄非常頹喪，他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就回南京

去了，因為南京也非常需要我。”我一聽，這眼淚就下來了。我說：“如果你走的話，那我也沒辦法再搞下去了。我一個人也應付不了這麼多事情。”因為馬少方在十四日之後非常主張讓大家撤離，從此我就很不信任他，而程真她也是個女孩子，又管著那邊一些事情，她並沒有對廣場實際的組織起那麼大的作用，王文就是個小孩子，有時哄哄他，我還挺喜歡他的，覺得他象個小孩子一樣很天真，但實際上他沒有這個把廣場局勢鎮住的能力，讓我怎麼搞。李錄就很痛苦地在那兒閉著眼睛，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勸他。直到凌晨的時候，李錄跟我說：“我決定留下。”我就說：“是嗎？”我很高興。我沒有問他是怎麼一個轉機。十六日凌晨就馬上召開一個班代表會議，大家重新改選的結果，我的印象中是馬少方跟王文都沒有列到重要位置上，重新認可了李錄的主席的位置。我們大家經過了一場衝擊以後都比較輕鬆。我記得凌晨的時候，我們去洗了個臉，上了廁所以後，我跟李錄在歷史博物館門前開始談下一步怎麼做【以上第 148 頁】。那時候我發現我身體已經開始很虛弱，經過一晚上的折騰，我開始腦子不太行了。李錄躺在那裏就說：唉，我還有一個老婆在南京。當時我都說不出什麼話來。

九點鐘的時候就是記者招待會。這次記者招待會不同以前，就是邀了更多的絕食同學的代表。當時我記得有楊朝暉，他注射了液以後，整個胳膊都腫起來了，還有王丹，還有“北醫”的同學。當時還有一些對北大，對絕食同學的質問什麼的，我記得王丹講過以後，李錄主持記者招待會。然後我講了一段以後，一下子就開始不行了，暈倒了。這是十六日，暈倒以後我就被送到醫院去了。後來我就一直在醫院裏面，當天晚上才回到廣場。老封被指定接替我的暫時領導權，所以十六日中午閻明復來的這段過程，我就都不知道。

3.2.4 救護與轉移

十六日晚上，就是接著李錄說的那個他們成立什麼“紅十字會”，還有成立“醫療協調小組”。“紅十字會”當時說：我們來開始接替“北京市紅十字會”。就開始接替以前的醫療協調小組的檢查狀況。當時我們並沒以為有很大的問題。但是等到午夜的時候，大概十一點鐘，有同學，還有醫生就開始抗議說：他們在隨便的往車上拉同學。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已經很嚴重了，大家就趕緊地制止。

後來我們接到內部消息說：這批紅十字會的人全部都是便衣，穿了白大褂。這個時候大家要制止他們拉同學，重新讓大家醒來，繼續宣誓一下。等到第二天的時候，北醫那兩個同學他們就特別激動，說：我們醫生一直為你們操勞，還有北醫的同學，你們怎麼會說不要相信我們醫生什么的。後來我記得李錄跟那個北醫的代表解釋了半天。

等到中午的時候，李錄開始全半身癱瘓，那個男孩子就開始暈倒，我也開始暈倒，我們就分別被送到醫院。這是五月十七日我第二次進醫院。我記得當時老封已經開始組織廣場的指揮活動。十七日下午的時候，李錄到醫院來看我，我們在病床上繼續討論下一步，主要想把大家拉出廣場的那個環境，換一換腦筋再看看。

我在醫院的時候，有些同學拒絕服從醫療，拒絕輸液，拒絕吃東西，不是飯，而是一些基本的藥物。後來他們說我是總指揮，說同學已經到了這種情緒，讓我去做工作。我就隨口說：我是總指揮，命令【以上第 149 頁】你必須恢復健康。

我在醫院的時候，有些同學拒絕服從醫療，拒絕輸液，拒絕吃東西，不是飯，而是一些基本的藥物。後來他們說我是總指揮，說同學已經到了這種情緒，讓我去做工作。我就隨口說：我是總指揮，命令【以上第 149 頁】你必須恢復健康。

十八日凌晨的時候，我跟一批同學乘了一輛卡車回到廣場。這個時候我發現整個北京市已經被撤消了，沒有警察，沒有交通警。現在路口的交通路燈上，都是我們的同學在指揮。

十八日我一回到廣場的情況，就是整個都變了，廣場是風雨飄搖。我回到指揮篷時，伯笠一個人也是歪倒在那兒，你有沒有在輸液？（張伯笠插：在輸液。）他在負責指揮廣場同學整個轉移到大公共汽車裏邊的調度。伯笠說：“唉，你來可好了，你給我任命吧。”我就任命他為當時廣場統一調度總指揮。

這時候有一個重要情況就是王丹和開希他們已經在跟李鵬對話，我們因為負責廣場調度工作就沒有參加。中途調度工作指揮差不多的時候，王丹跟另外一個人匆匆回來說：“壞了，出事情了。李鵬口氣非常凶，說：你們要為歷史負責任。談話已經徹底崩了。”<參：3.6.6 五月十八日>

大家全部都轉移到公共汽車以後，我們有了指揮車。當天晚上就是討論絕食的指揮人員要不要復食，等等。這時候王文被選出了指揮部。十八日夜裏十九日臨晨的時候，趙紫陽和李鵬來看望同學。十九日早晨組織講稿，然後指揮車開始在巡回宣傳。【以上第 150 頁】

3 . 3 廣場廣播站（1）：初創階段（封從德）<

參：3.6.5 廣場廣播站（2）>

3.3.1 絕食團廣播站的建立（封從德）

【五月十四日一早，帶著“絕食”黑旗和《絕食書》錄音帶，八點鐘到了廣場，就看見柴玲，王丹，還有熊焱，他跑來就說，“老封，你終於來了，我們這兒缺一 個廣播站。”我問他們有沒有錢。沒有。這個時候，我兜裏正好還揣著那個教授給我的四百塊錢，又認識了王文，他介紹了一個香港記者，叫蔡詠梅，當時她借給我 一千多塊錢，帶我去買廣播器材。我們考慮到廣場上交流電不敢用，因為政府隨時可能掐斷，就去買電瓶。跑了一天，到下午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回到廣場。好象找到了伯笠，還是何桂方來搬這些東西，把這個廣播站建立了。後來，我就一直在這個廣播站。】

五月十五日凌晨開希喊了學生要東移，我就很失望，離開了廣場回家睡覺去了。下午再回到廣場，就聽人跟我說：柴玲要自焚。那時我的感覺很復雜，當時的心境，認為這個時候犧牲是最高的原則，但這個時候我又不願意是她，所以很復雜。我什麼都沒有說，祇是後來找到了柴玲，我問她是否真要準備這麼作，我就問了這么一句。她說後來有所轉變。這個時候，我心就放下來了。然後就去找頭一天建的這個廣播站，但是廣播站早已經沒影了。頭一天程林在那個廣播站還加了個小喇叭 在旗杆上，也發現沒了。後來我又聽到了廣播的聲音，就去找，在東面。因為還有些喇叭還沒有搬過來，就找了幾個同學搬到那個華燈下面，所以後來絕食團廣播站 一直就在一個華燈下面，在那種柏樹的籬笆前面。那個時候還沒有搭帳篷，一直到閏明復十六日下午來都還沒有帳篷。

3.3.2 廣播站初期的情況

廣播站初期，有一個張伯笠。在北大的時候，我佩服他的文筆很快。在這之前，北大籌委會的文件都是他來起草。所以請他到廣播站【以上第 151 頁】。還有白夢，也去了廣播站，記不清楚確切是什麼時間。但最重要的是王童，還有何桂芳也在哪兒。然後還有一個師大的女播音員，還有幾個臨時播音員。當時有一個 中央臺的廣播員有句非常有名的話：“白天我在政府的廣播站做喉舌，晚上我做同學的喉舌。”他起先是我們的喉舌，但隨著後期運動的逐漸發展，隨著民主原則的 逐漸增強，廣播站逐漸逐漸地獨立。當時有兩個廣播站，後來都宣佈獨立於任何派別之爭，包括共產黨的派別，包括學生的派別。

廣播站初期，有一個張伯笠。在北大的時候，我佩服他的文筆很快。在這之前，北大籌委會的文件都是他來起草。所以請他到廣播站【以上第 151 頁】。還

有白夢，也去了廣播站，記不清楚確切是什麼時間。但最重要的是王童，還有何桂芳也在哪兒。然後還有一個師大的女播音員，還有幾個臨時播音員。當時有一個中央臺的廣播員有句非常有名的話：“白天我在政府的廣播站做喉舌，晚上我做同學的喉舌。”他起先是我們的喉舌，但隨著後期運動的逐漸發展，隨著民主原則的逐漸增強，廣播站逐漸逐漸地獨立。當時有兩個廣播站，後來都宣佈獨立於任何派別之爭，包括共產黨的派別，包括學生的派別。

五月十五日下午，北大的校醫來了，是由北大的副校長陳嘉爾帶著來的。他告訴同學們說：“絕食的同學你們可以喝牛奶，喝飲料。當時甘地就是這樣堅持了四十 九天。”這個信息對絕食的同學們非常重要。實際上在這之前，北大籌委會就發出過這種信息，但是沒有當時那麼影響大，因為是非常直接地通過廣播講的。

我因為沒有絕食，就曾經想拿起面包來吃，但是不敢。在廣場上馬上有同學就制止：你絕食了怎麼還吃東西。後來我祇好跑到外面去。基本上當時就以冰棍來頂了。五月十五日晚上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廣播裏邊播出一個鏡頭，絕食隊伍裏邊有個同學拿著面包吃。這也是為什麼同學非常警惕不能在廣場上吃東西的原因。

五月十六日，我到前門一個電器店去買一些廣播器材，買電瓶之類的東西。那些售貨員熱情得不可想象。她先給我倒了茶，然後又要倒咖啡，一直給我弄了半個小時才讓走，就是要我跟她講一講學生的活動，他們非常關心學運。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討論得有限，不過我想傳播媒介已經講了很多了。關於“首鋼罷工”的謠傳，我們當時抓到了一個造這個謠的人。十六日晚上，記得是王童念的。我馬上問王童是誰傳來的。他說忘了是誰，那個人已經走了。這個時候我就警惕起來，暗中布置，讓糾察隊隊長隨時準備抓再來傳這種謠傳的人。結果那天晚上真抓到一個。我們並沒有怎麼揍他，祇是把他審訊了一通。他也沒有證件，什麼都沒有。後來教訓他一通，還是放了他或者是他溜了，我忘了。反正當時我們並沒有心力去搞這種處罰。“首鋼罷工”是中共自己造的一個謠。當時的廣播站，我記得各方面的支持非常多。甚至包括軍人，什麼少將啊，還有市政府機關的，包括國務院辦公室。他們都是以個人身份或者是以部分職工的這種名義來講的。

【白夢：十七日，香港學聯的林耀強來廣播站作了個支持的聲明。】

十六日下午五點四十分，閻明復來了。大家剛才也講得非常詳細，我就不再補充。【以上第 152 頁】

3.3.3 兩站一車

當時有這麼個印象，就是鏡頭面前出領袖，廣播裏邊出指揮。掌握廣播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聲明一點，這是我後來逐漸意識到的，並不是建立廣播站的初衷。當時祇是因為需要而建立了廣播，後來發現它非常重要。而且我也有在北大搞廣播、搞自由論壇的經歷，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承擔了這項任務。

五月十六日左右，我忘了誰跟我說的，王超華在絕食團的財務部借了大概五千塊錢。第二天就發現在紀念碑的東南角有了另外一個廣播站，叫“學運之聲”。這個廣播站的功率比我們大概要大三倍到四倍。我當時還不知道具體情況，知

道有另外一個廣播站，很高興，就把那盤非常珍貴的磁帶拿去向他們推薦，說，“這盤磁帶的內容不錯，肯定能夠感動很多的市民。”因為絕食團的廣播站是在廣場裏邊，而這個“學運之聲”，就是第二個廣播站，在廣場東南角的外層，吸引了很多市民，我就把這個絕食書推薦給他們去播放。這時我發現周峰鎖是個非常固執，非常嚴謹的一個同學。他堅持要審查，我在那兒等了半個小時，他們還沒有審查完。我非常失望，因為我在這一邊廣播站還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我有點生氣，就回來了。那盤磁帶也不再給他，因為我祇有那麼一盤磁帶。大概是五月十七日還是十八日，我又去了一次學運之聲廣播站。因為聽到學生的反應說，現在有兩個廣播，互相有點幹擾，需要協調。有糾察線不讓我進去。我看見王超華在

裏邊，馬上意識到超華在裏邊肯定在起非常關鍵的作用。最後我對一個糾察說：“你們去找一找這個女同學。”這才讓我進去了。從此我就疑心是北高聯指使清華的同學搞的第二個廣播站，目的就是要奪權，這是我當時的真實感覺。由此我對王超華的疑心也就更重。

對超華疑心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科學院另外一個研究生，就是我們多次提到的何桂芳，他當時對我和柴玲影響都非常大，他說：王超華在社科院並沒有代表性，大家並沒有選她做代表。由於“新五·四宣言”起草的工作，何桂芳已經和王超華有了矛盾。對“新五四宣言”，我當時是傾向於何桂芳的建議、意見和對運動的理解。何桂芳當時指責超華，對我們的影響很大。開始我是非常信任

超華，超華也【以上第 153 頁】是非常信任我的。後來因為缺乏溝通，缺乏了

解，根本就沒有時間坐下來談一下，所以就逐漸變成這樣一種非常深的矛盾。我

可以引用李錄的一句話嗎？（李錄插：可以。）每次你都看見超華都說：馬列主義

老大大來了。這是當時的矛盾，這個矛盾就變成了絕食團和“北高聯”的矛盾，

以後還會講到。這種矛盾，我認為對於當時廣場權力的分散，外界和學生的聯

絡、指揮不能統一部有影響。再講一講五月十八日建立指揮部的指揮車的事情。

這個指揮車是一輛公共汽車，正好它莫名其妙地開進了紀念碑的東面，當時就

有同學建議說，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指揮車。因為要下雨，而且當時我發現北高聯

他們沒有這種準備，那麼如果有了一個指揮車，上面有很多喇叭，我們可以機

動地去開到任何其它地方去指揮的話，我們的指揮效果就會比北高聯的效果要

高。

對超華疑心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科學院另外一個研究生，就是我們多次提到的何桂芳，他當時對我和柴玲影響都非常大，他說：王超華在社科院並沒有代

表性，大家並沒有選她做代表。由於“新五、四宣言”起草的工作，何桂芳已經和王超華有了矛盾。對“新五四宣言”，我當時是傾向於何桂芳的建議、意見和對運動的理解。何桂芳當時指責超華，對我們的影響很大。開始我是非常信任超華，超華也【以上第 153 頁】是非常信任我的。後來因為缺乏溝通，缺乏了解，根本就沒有時間坐下 來談一下，所以就逐漸變成這樣一種非常深的矛盾。我可以引用李錄的一句話嗎？（李錄插：可以。）每次你都看見超華都說：馬列主義老太太來了。這是當時的矛盾，這個矛盾就變成了絕食團和“北高聯”的矛盾，以後還會講到。這種矛盾，我認為對於當時廣場權力的分散，外界和學生的聯絡、指揮不能統一都有影響。再講 一講五月十八日建立指揮部的指揮車的事情。這個指揮車是一輛公共汽車，正好它莫名其妙地開進了紀念碑的東面，當時就有同學建議說，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指揮車。因為要下雨，而且當時我發現北高聯他們沒有這種準備，那麼如果有了一個指揮車，上面有很多喇叭，我們可以機動地去開到任何其它地方去指揮的話，我們的指揮效果就會比北高聯的效果要高。

3 . 4 北高聯在廣場（王超華）

昨天我的內容比較多，集中地講了我個人的經歷。一直到五□四那天已經說了三件事，雖然我了解的還有，但是我沒有說。昨天講的那部分，低潮時期和絕食的發起，我也祇能講我在北大的情況。我覺得王文、吾爾開希有可能對那一段時間有更多的了解，因為王丹和北大的接觸反倒不如他們的接觸更多。我之所以要說這個，是因為我必須強調我不可能完全了解高聯的情況。

今天我也祇能很簡單的講一些，因為我參與的事情太多，可分到的發言時間不夠。特別是我自己當時的活動基本上可以說相對地脫離了高聯的有組織、有計劃、有討論的活動，經常是比較個人式的行動。所以不要把我說的就認為是高聯的情況。

3.4.1 轉移以後

廣場的情況。十五日早上轉移以後，我沒有跟著轉移到紀念碑的東面，仍然留在紀念碑北面的人大、師大的同學那兒做勸說工作，一直到十點鐘，人大同學說，我們不能隨便轉移。【以上第 154 頁】人大的組織，在我的印象中，自始至終都是比較有群眾基礎，而且組織得比較嚴格。他們自己在那開常委會，說

要重新投票決定，重新討論做決定轉移或者不轉移。師大一部分人說：“我們就是不走，我們就在這兒。”所以師大實際上是一部分轉移了，另一部分中文系的人堅持不走。一直到最後他們編“絕食快訊”，他們的帳篷始終是搭在紀念碑北面的。所以他們相對來說是脫離絕食團了。他們的一個說法是，“既然絕食是一部分同學不滿政府，自己報名、自發組織、自發進行的，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怎么做。”所以，我勸他們都沒話可說。他們說，“你走吧，你不用勸，你的意思我們都明白了。可是我們現在可以自己……。”我想，這個運動沒辦法搞。當時政府那邊也不理我們了，所以我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

廣場的情況。十五日早上轉移以後，我沒有跟着轉移到紀念碑的東面，仍然留在紀念碑北面的人大、師大的同學那兒做勸說工作，一直到十點鐘，人大同學說，我們不能隨便轉移。【以上第154頁】人大的組織，在我的印象中，始至終都是比較有群眾基礎，而且組織得比較嚴格。他們自己在那開常委會，說要重新投票決定，重新討論做決定轉移或者不轉移。師大一部分人說：“我們就是不走，我們就在這兒。”所以師大實際上是一部分轉移了，另一部分中文系的人堅持不走。一直到最後他們編“絕食快訊”，他們的帳篷始終是搭在紀念碑北面的。所以他們相對來說是脫離絕食團了。他們的一個說法是，“既然絕食是一部分同學不滿政府，自己報名、自發組織、自發進行的，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怎么做。”所以，我勸他們都沒話可說。他們說，“你走吧，你不用勸，你的意思我們都明白了。可是我們現在可以自己……。”我想，這個運動沒辦法搞。當時政府那邊也不理我們了，所以我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

同時，我看到群眾情緒是這樣的時候，我就覺得知識分子勸說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包括後來我跟鄭旭光覺得絕食團廣播站建立起來後的廣播內容最糟糕的一個問題在於沒有肯定這次運動取得了多大的成績，“我們已經顯示了我們多好的力量這樣的廣播內容”，而總是“我們仍然在做犧牲”，“我們仍然需要做更多的犧牲”，“我們的悲壯”，“我們沒有達到目的”。這樣我就跑到頭一天知識分子開會做記錄的那個地方，設法要這個磁帶。那個人我找到了，但是他們左推右推，一定說這個磁帶就是不在。明明頭一天我記得很清楚，他們卻說，發言的人比如李洪林這樣的人，不願意把自己的發言交出去。但是我托人直接問了，李洪林他們說，我們不在乎，我們在那兒敢發言，我們就敢在廣場上發言。可是再回去找，仍然找不到。我覺得他們在那個會上，對學生群眾的一種佩服，一種深刻

的肯定，象和英國憲章對比啊這些，把這些給學生播了的話，學生會有一種滿足情緒。既然心理上已經滿足的話，就可以回頭想一想，我們不非得一定覺得我們沒達到目的。但是這個我沒辦到，我不能確定究竟是政府方面不願意給，還是他們為了保護這些知識分子不願意給。總之，我托了人都還沒有弄到。

我走的時候是凌晨，天津自行車隊騎車從長安街那邊繞過來了，我是跟天津同學借的自行車，我的自行車丟了。回廣場的時候，我繞了一下急救中心。因為這一天，開希已經暈了，已經送急救中心去了。我去的時候，門口一堆醫生、護士、市民在那兒。我就說：“我想查一下，是不是有一個叫吾爾開希的進了這個醫院。”“哎呀，剛送【以上第 155 頁】走啊。”那些人都依依不捨。這是我的印象，十五日，開希非常早就暈倒了。

我走的時候是凌晨，天津自行車隊騎車從長安街那邊繞過來了，我是跟天津同學借的自行車，我的自行車丟了。回廣場的時候，我繞了一下急救中心。因為這一天，開希已經暈了，已經送急救中心去了。我去的時候，門口一堆醫生、護士、市民在那兒。我就說：“我想查一下，是不是有一個叫吾爾開希的進了這個醫院。”“哎呀，剛送【以上第 155 頁】走啊。”那些人都依依不捨。這是我的印象，十五日，開希非常早就暈倒了。

然後，我回到廣場上。我見到跟柴玲剛才介紹的情況相關的是，有兩個人架著程真從南邊往北，就是絕食團前面那個空的地方一路走過來，程真挨個地跟大家說：“大家千萬要冷靜啊。”我就問王丹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隊伍中坐。他說，有人說，要到長安街上去滾馬路，去擋路。“我們不要做那種事啊。”程真從那頭一直到這頭。我印象當中，之所以那些絕食同學對程真有印象，而且覺得她是一個主要的領袖，就是因為這個。她很虛弱的，穿著黃長袍的裙子，兩個人架著她走的，到處走，說是有人要滾長安街。

開始的時候，我就在設在小樹叢旁邊的絕食團廣播站那兒。在那經常有人問問題，找什麼事。絕食團同學，我不能確認是哪位了，說“我們只能管絕食團，你們高聯要負責外面那些事。你應該樹個牌子。”我忘了誰就幫我寫了一個高聯的牌子往那兒一戳，其實就我一個人堅守在那兒。

這段期間，我印象中郭海峰已經在那兒（不是說別人沒有）負責一些具體事。因為崔健來聯系演唱會，一定說有個人已經答應了。一問，就說郭海峰已經答應了。我說，“我沒辦法管這個。絕食團已經嫌很亂，很吵，嫌我們沒有辦法能把那些人都擋在外面。你那個大電子音樂……”。那個人說“崔健你都不知道，能給學生多大鼓舞啊。”非常抱歉，我將近四十歲，還真對搖滾樂從來沒有聽過。所以那兩個代理人非常驚訝，說我在學生堆兒裏，怎麼居然會不知道崔健。因此我對郭海峰有一個比較深的印象。當時我聽說過馬少方是副總指揮，但是在那個棚子裏邊我沒有很深的印象。至於高聯的活動，我覺得很遺憾的是鄭旭光不在。

好在他判兩年，現在 應該快出來了。我估計我說也不會給他增加什麼。

市民經常來找我們，最後我很煩，說：“你們市民自己應該提自己的要求，不要老來向學生提建議，或者只是聲援學生。”另外我還找了我原來的單位，《光明日報》那兒，跟他們也提這個，“新聞界應該提新聞界的要求，工人應該提工人的要求。你們應該提自己的要求。”學生的絕食要求只是一個：要求對話。可是對話究竟什麼內容，幾乎沒有人能說得上來。這也是對話團當初準備的時候，我對他們經常提的一個有些失望的意見。我說，“你們對話內容太煩瑣，我們沒辦法向群眾宣傳。最好就是一條一條的。”但是他們，包括項小吉、徐國棟、沈彤他們講，“我們分了三大塊啊”，那意思是好象已經很有秩序了。我也就沒有辦法，我覺得我也 不便多干涉。總之，這會【以上第 156 頁】

兒這個問題就出來了，沒有辦法很有效地宣傳我們的對話，一兩個口號就把對話內容宣傳出來。

報社的朋友告訴我們，“我們五月十五日下午要遊行，要集中提新聞方面我們自己的要求。”市民是在鄭旭光的幫助下，成立的市民聯合會。這當中我還去廣場轉了一圈，發現那幾個最經常來找我們的，其中有一個吐的，果然在那圍了一圈在開會。後來他們打出了旗號：市民聯合會。這是十五日。文藝界和知識分子，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兒的，他們也是來找我。那會兒我就說：“學生不可能包辦任何什麼。你們成立了，你們自己就在那做。有什麼事咱們就聯合行動。我們不可能指揮你們任何事。”我的總的一個印象是，之所以到處都來找我們，是認為學生是有比較可靠的群眾基礎的。任何其它組織都有這個名、這個牌，但是不敢保證自己有實際的群眾基礎。

市民經常來找我們，最後 我很煩，說：“你們市民自己應該提自己的要求，不要老來向學生提建議，或者只是聲援學生。”另外我還找了我原來的單位，《光明日報》那兒，跟他們也提這個，“新聞界應該提新聞界的要求，工人應該提工人的要求。你們應該提自己的要求。”學生的絕食要求只是一個：要求對話。可是對話究竟什麼內容，幾乎沒有人能說得上來。這也是對話團當初準備的時候，我對他們經常提的一個有些失望的意見。我說，“你們對話內容太煩瑣，我們沒

辦法向群眾宣傳。最好就是一條一條的。”但是他們，包括項小吉、徐國棟、沈彤他們講，“我們分了三大塊啊”，那意思是好象已經很有秩序了。我也就沒有辦法，我覺得我也不便多干涉。總之，這會【以上第 156 頁】兒這個問題就出來了，沒有辦法很有效地宣傳我們的對話，一兩個口號就把對話內容宣傳出來。報社的朋友告訴我們，“我們五月十五日下午要游行，要集中提新聞方面我們自己的要求。”市民是在鄭旭光的幫助下，成立的市民聯合會。這當中我還去廣場轉了一圈，發現那幾個最經常來找我們的，其中有一個女的，果然在那圍了一圈在開會。後來他們打出了旗號：市民聯合會。這是十五日。文藝界和知識分子，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兒的，他們也是來找我。那會兒我就說：“學生不可能包辦任何什麼。你們成立了，你們自己就在那做。有什麼事咱們就聯合行動。我們不可能指揮你們任何事。”我的總的一個印象是，之所以到處都來找我們，是認為學生是有比較可靠的群眾基礎的。任何其它組織都有這個名、這個牌，但是不敢保證自己有實際的群眾基礎。

外地學生進京是在十八日之後。我曾經在絕食車附近接受過中央廣播電臺的採訪，當時主要說的就是希望外地進京的同學回到本地去，跟本地的各級領導對話，要求本地的自治權。不要都到北京來，都來騷擾北京。我當時一個感覺是，你們都不知道北京的對話到底要對話什麼內容，你們來北京幹什麼？而且非常頭疼，沒有辦法管理。

3.4.2 紅十字會的黃背心

關於紅十字會，我經歷的就是有一天早上，不能確切記得哪天，我估計是十六日的早上，突然來了一群穿紅背心的醫護人員。北大校醫院的一個大夫說“快快快，他們要把學生拉走。”當時紅十字會已經廣播過，每天早晨要挨個拍一拍，看看哪個同學怎麼樣了。因為早晨是睡了，還是暈了，是最不明確的。他說，“他們把那些沒量的同學也拉走了。這是陰謀，這是要破壞絕食。”就說要警惕穿紅背心。這時紅十字會這邊說，“那好了，我們把紅背心脫了也行啊。我們也是想服務同學嘛。誰能看著同學出生命危險不管啊。”（插話：黃背心。）杏黃色的。最後紅十字會來人，說是咱們可以協商。熊煒是清華的學生，當時找清華的常委來開會時，張銘他們沒有來，是他來的。他去跟紅十字會談判的，在《人民日報》上也有報導。談判回來，他給過我一個簽字的東西，表示絕沒有什麼。十六日的清晨，我帶著幾個中醫學院的人，到各個醫院去象征性地看了幾個醫院，表示高聯【以上第 157 頁】對送醫院的絕食學生的關心，而且買了一些巧克力送到各醫院。當時醫院跟我們反映的是他們基本上都是自發來的，包括腫瘤醫院，很遠的醫院都擠出救護車來派到廣場。熊煒做的這個事，和這個是有

關係的，他和那邊協商好了。我估計和你們說的那個協調中心也是有關係的。

關於紅十字會，我經歷的就是有一天早上，不能確切記得哪天，我估計是十六日的早上，突然來了一群穿紅背心的醫護人員。北大校醫院的一個大夫說“快快快，他們要把學生拉走。”當時紅十字會已經廣播過，每天早晨要挨個拍一拍，看看哪個同學怎麼樣了。因為早晨是睡了，還是暈了，是最不明確的。他說，“他們把那些沒暈的同學也拉走了。這是陰謀，這是要破壞絕食。”就說要警惕穿紅背心。這時紅十字會這邊說，“那好了，我們把紅背心脫了也行啊。我們也是想服務同學嘛。誰能看著同學出生命危險 不管啊。”（插話：黃背心。）杏黃色的。最後紅十字會來人，說是咱們可以協商。熊煒是清華的學生，當時找清華的常委來開會時，張銘他們沒有來，是他來的。他去跟紅十字會談判的，在《人民日報》上也有報導。談判回來，他給過我一個簽字的東西，表示絕沒有什麼。十六日的清晨，我帶著幾個中醫學院的人，到各個醫院去象征性地看了幾個醫院，表示高聯【以上第 157 頁】對送醫院的絕食學生的關心，而且買了一些巧克力送到各醫院。當時醫院跟我們反映的是他們基本上都是自發來的，包括腫瘤醫院，很遠的醫院都擠出救護車來派到廣場。熊煒做的這個事，和這個是有關係的，他和那邊協商好了。我估計和你們說的那個協調中心也是有關係的。

【梁二：還有第二點證明我在場的是剛才超華談的那個紅十字會的問題。在紅十字會的問題上我當時好象還跟柴玲打了一次交道，準確地說，是我唯一一次受到溫和對待的交道。當時我跟柴玲說有些同學和老師告訴我紅十字會想抬走學生，請你廣播一下。柴玲就廣播了，說警方、紅十字會員要把學生抬走。我不知道柴玲是否記得這件事。這是十六日晚上。我當時也前往紅十字會與他們交涉。這時我聽說有一個學生已經和他們談定了，這之後我才真正認識熊煒。】

【封從德：紅十字會的事情，我參與了十六日晚上和他們的談判，當時記不得是不是熊煒，和他一起去見了紅十字會的一男一女，是副會長，作了一個協定。】

【封從德：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暈過一次，是在廣場接受的治療。我講這個的原因是因為剛才李錄提到的廣場上的醫療護理協調小組。“協和”那篷子離絕食團不太遠，在那個篷子裏邊，我認識了兩個比較年輕的醫生。他們正在籌劃這

個協調小組，言語間，很不信任紅十字會。】

3.4.3 北高聯與絕食團、廣播站的關係〈參：3.6.5 廣場廣播站（2）〉

我們對絕食團廣播不滿意的是，廣播內容基本祇針對絕食同學。絕食發起是星期六、星期天，沒有能夠及時調來各校同學。在各校同學來了以後，在糾察隊都拉起來以後，我們感覺對我們非常急迫的壓力是我們沒有宣傳工具來鼓勵這些做糾察的同學。據我們的了解，絕食的幾天當中暈倒的糾察同學，不比絕食的同學少多少。因為常常就沒有人替換，就這麼拉著站多少個小時。而且一開始時，飯送不進去【以上第 158 頁】，糾察的同學也沒有吃。送的面包，即使允許他們吃，大概是三個人能有一個面包。所以我們非常頭疼這個事。可是絕食團的廣播，不給我們廣播稿子。那會兒，我反對絕食，好像他們都知道的，盯著廣播站的又祇是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廣播的內容，應該是能夠照顧到所有的面的。

我們對絕食團廣播不滿意的是，廣播內容基本祇針對絕食同學。絕食發起是星期六、星期天，沒有能夠及時調來各校同學。在各校同學來了以後，在糾察隊都拉起來以後，我們感覺對我們非常急迫的壓力是我們沒有宣傳工具來鼓勵這些做糾察的同學。據我們的了解，絕食的幾天當中暈倒的糾察同學，不比絕食的同學少多少。因為常常就沒有人替換，就這麼拉著站多少個小時。而且一開始時，飯送不進去【以上第 158 頁】，糾察的同學也沒有吃。送的面包，即使允許他們吃，大概是三個人能有一個面包。所以我們非常頭疼這個事。可是絕食團的廣播，不給我們廣播稿子。那會兒，我反對絕食，好像他們都知道的，盯著廣播站的又祇是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廣播的內容，應該是能夠照顧到所有的面的。

【白夢：當時是因為廣播站主要為絕食同學服務，誰昏倒了，每天早上統計人數。】

再一個，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因為它形式是代表會，但實際上各校參加絕食的都是各校的少數人。即使是代表會，它也祇代表少數參加絕食的這一部分同學的意見，我們不能把這個就取代了我們原來在各校的自治會。象人大，就有它的絕食部分、後勤部分和學校留守部分，三部分的分工相當好的。它的絕食同學基本上還聽從它本校自治會的調動。象這種情況，我們沒有辦法在各校都做到，就是因為這當中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我自己做的就是抓住師大的聯絡站，因為北大的外聯部本來對我也不是很聽從的。

師大的外聯部也是非常辛苦的，城南城北，就是這幾個同學騎自行車跑，而且沒跟高聯要過錢。反倒我跟他們要過錢。我坐車沒錢，我們學校也捐不來款，包括梁二都說，“我們都比你闊。我們都拿本校的錢，也不用象拿高聯的錢似的，還得五個人簽字。”所以，我都沒有從高聯拿錢，就是跟他們拿。支援過我十塊、二十塊這樣子。

【李錄：從五月十五日一直到高聯在戒嚴之後回北大整頓之前，高聯主要參與決策的有那幾個人？有沒有過高聯會議？高聯和各校代表的聯繫怎樣？

王超華：我的印象是沒有過很有效的各校代表會議，基本上是各校來找。高聯的常委是在一起開過會的。當時常委最大的問題是，包括鄭旭光、我，我們都發生了不能回本校的問題，祇有人大、經濟學院和民族學院的常委可以保證回本校。李錄：當時在廣場上你們還能不時地碰頭的還有那幾個人？王超華：我、梁二、人大的志遠，當初是陸明霞，後來她參加絕食了，清華的是張銘、熊煒，北大另一位代表一直在那兒，那會兒我們不認王丹，王志新是秘書長，但是他是後來才來的，翟偉民、王正雲，工藝美術學院的，鄭旭光。差不多所有的高聯常委都在了。【以上第 159 頁】

李錄：你們開過幾次常委會？

梁二：五月十三日從統戰部回來以後，我和超華、少江、翟偉民碰過幾次頭，好象是已經超過半數了。開希不在，當時有個提議是廢除開希這個職務，我成為正式 替補代表，這是五月十三日。在這之前一直是我在參加高聯會議，開希主持絕食團的工作。第二次的碰面會有我，超華、少江，是五月十五日或十六日。王超華：我 補一句。高聯這段時間的工作，我記得，第一，要求原師大聯絡部的成員不要參加絕食。第二，十七日派人占了三層後，我們還是請他往各校發通知，當時聯絡部回來的信息是，各校還都能找到人。】

【李錄：我想再講一些高聯的情況。可能從第二次還是第三次開始超華就列席廣場聯席會議了，在此之前我見到過她，當時她已經一點聲音都沒有了。當時我的印象最深的還有北航的鄭旭光。我不知道王超華和何桂芳之間有什麼關係。後來何桂芳受到我們很大的信任。但他一直認為王超華不僅沒有代表性，而且是一個特務。後來社科院在廣場的絕食代表是一個博士生，他組織了四、五個人作為我們重要文件的起草班子，他們也不認識王超華。他倒沒說王超華什麼壞話，就是說王超華不是代表等等。後來又傳出來說王超華想要綁架柴玲等等，後來就使得和王超華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和北高聯的活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後來出現了清華學運之聲，而且那邊廣播站與這邊不能合作，幾次談判都沒有成功。還有是關於財務上，所有的支持絕食的錢他們都收下來了，沒有轉過來，上百萬塊錢都在那邊，而這邊又急需，尤其是給糾察隊的伙食供應不上。所以就有很多矛盾。】

李錄：我記得好象還有北航的鄭旭光，實際上主要是你和鄭旭光兩人。

3.4.4 重組對話團

關於高聯進駐廣場，我估計沈彤比我了解清楚。因為他跟我說過，三層整個是他幫著開辟出來的。高聯沒做決定進駐還是不進駐。就是昨天講過的那些，支持絕食學生，自然地就到了廣場。而且，官方要找你，你自然也就去了。

沒有一個明確的決議進駐還是不進駐。另外一個是重組對話團，這是我想了解的事，因為這個跟我 有關係，但是一直沒有聽到剛才絕食團幾個同學談。我認為這件事發生在五月十五日下午，絕食團表示仍然有對話的可能，但是我們不信任這個對話團了。這個對話 團隨時準備出賣同學的要求和利益，所以我們準備絕食團自己組對話團。但是我看絕食團這些同學的情緒和這些同學的精神準備，雖然我對對話團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知道對話團的這些人【以上第 160 頁】不管學識水平、還是準備都要充分得多。我趕緊跑到統戰部，要求對話團的同學回到廣場，爭取絕食團認同咱們這個對話團，萬一有機會再重開對話的話，還會把你們派回來。當時跟我回來的就是沈彤幾個人，項小吉堅決不回來，我們學校的一個同學也不回來。我最奇怪的就是為什麼他不回來，因為他腦子非常清醒、非常冷靜。我跑回去，悄悄地把他拽出來。在屏風後面有兩個桌子，一定要拉我吃飯。我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基本的原則，雖然我沒有宣佈參加絕食，但為了爭取柴玲他們的信任，我盡一切可能不吃東西。所以我當時祇喝了湯，還有好幾個人說“你吃點，你吃點。”我把老何叫了出來，他說，“我不能走，我走了，你不知道項小吉他們在這裏會說什麼。”他說，“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要以為我沒明白。”其實，我們學校這幾個人態度是非常堅定的，辯論的時候腦子是非常冷靜的。沒有辦法，我回到廣場，等於我也沒有辦法再爭取絕食團同學對對話團的信任，絕食團同學也不能對我更信任。

關於高聯進駐廣場，我估計沈彤比我了解清楚。因為他跟我說過，三層整個是他幫著開辟出來的。高聯沒做決定進駐還是不進駐。就是昨天講過的那些，支持絕食學生，自然地就到了廣場。而且，官方要找你，你自然也就去了。沒有一個明確的決議進駐還是不進駐。另外一個是重組對話團，這是我想了解的事，因為這個跟我 有關係，但是一直沒有 聽到剛才絕食團幾個同學談。我認為這件事發生在五月十五日下午，絕食團表示仍然有對話的可能，但是我們不信任這個對話團了。這個對話團隨時準備出賣同學的要求和利益，所以我們準備絕食團

自己組對話團。但是我看絕食團這些同學的情緒和這些同學的精神準備，雖然我對對話團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知道對話團的這些人【以上第 160 頁】不管學識水平、還是準備都要充分得多。我趕緊跑到統戰部，要求對話團的同學回到廣場，爭取絕食團認同咱們這個對話團，萬一有機會再重開對話的話，還會把你們派回來。當時跟我回來的就是沈彤幾個人，項小吉堅決不回來，我們學校的一個同學也不回來。我最奇怪的就是為什麼他不回來，因為他腦子非常清醒、非常冷靜。我跑回去，悄悄地把她拽出來。在屏風後面有兩個桌子，一定要拉我吃飯。我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基本的原則，雖然我沒有宣佈參加絕食，但為了爭取柴玲他們的信任，我盡一切可能不吃東西。所以我當時祇喝了湯，還有好幾個人說“你吃點，你吃點。”我把老何叫了出來，他說，“我不能走，我走了，你不知道項小吉他們在這裏會說什麼。”他說，“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要以為我沒明白。”其實，我們學校這幾個人態度是非常堅定的，辯論的時候腦子是非常冷靜的。沒有辦法，我回到廣場，等於我也沒有辦法再爭取絕食團同學對對話團的信任，絕食團同學也不能對我更信任。

閻明復到廣場。可惜現在王丹不在，程真也不在。我去統戰部，我不能確認我去是做什么。這已經是十六日了，十五日夜裏的時候，對話團的同學好象已經都出來說是不能對話了。在統戰部我正好看到一輛救護車在那。程真說，“啊，超華來了。太好了。”我在門房的時候，不讓我進去，說是已經有同學進去了，你不要再進了。我說，我知道他們進去。王丹領著閻明復出來以後說，“好了，好了，閻部長要到廣場去。”我說，“沒有用，你叫他去有什麼用。”閻明復馬上站住了，“你看，你看，她說沒有用啊。那你說，我還要去不要去？”王丹和程真都馬上衝我喊起來，“多不容易爭取到一個機會，你……”最後上車了。我想你們知道的祇是到廣場以後的事。

3.4.5 趙辦、中辦與十八日對話

與官方接觸。五月十五日，有社科院的人來找我們，我和鄭旭光，應該還有另外一個人，我們到了前三門附近某人家裏，但是沒有什麼實際效果。

趙辦中辦的事。十六日晚上，有人來找我。這個人被抓了，後來又被放了，因為抓他就和找我這個事有關係的。把他放出來後，他就說，“嗨，抓我有什麼用，我不光認識趙辦的，我還認識李辦的呢。”就是他，哪邊的都認識。他來找我，我覺得，我一個人沒有辦法，【以上第 161 頁】我就去絕食團找人。當時柴玲住院了，這是十六日夜裏。

趙辦中辦的事。十六日晚上，有人來找我。這個人被抓了，後來又被放了，因為抓他就和找我這個事有關係的。把他放出來後，他就說，“嗨，抓我有

什麼用，我不光認識趙辦的，我還認識李辦的呢。”就是他，哪邊的都認識。他來找我，我覺得，我一個人沒有辦法，【以上第 161 頁】我就去絕食團找人。當時柴玲住院了，這是十六日夜裏。

然後我就叫程真一塊兒去的。在那等，來回的等，說是來人總沒來。我們也不太清楚，究竟要來什麼人呢。後來這個中間人就問我們情況。中間人之後，又來了第二個中間人，跟我們又了解。當時就是在和他們討論怎樣把學生撤出來。我反復說，“第一，知識分子去了，沒有能夠勸出來；閻明復去了，沒有能夠勸出來，我認為要給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機會，廣播要讓我們利用，讓我們宣傳。做到哪幾條，我們有可能把學生帶出來。”他說，“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我覺得，我最沒有辦法說服的就是柴玲和封從德。柴玲現在在醫院，我不能肯定封從德是不是在，如果你們能把他們控制起來的話，我想事情好辦得多。”這人馬上撥電話，查柴玲這個人在哪個醫院，至少要把她控制到明天早晨以前不要回來。

這是我自己寫的那個東西。因為在臨出來之前，我認為我隨時可能被抓起來，所以我特別把這條寫上給大家看。最後就來了一個趙辦的秘書，一個中辦的秘書。他們的原則是絕不說話，就記。這時，我就說：“要讓絕食同學滿足的話，我覺得必須做到兩點：一個是現場直播；一個是‘不是動亂’。”我認為“不是動亂”，可通過若干種辦法來達到。第一，同樣發一個社論，否定四、二六社論，然後開始對話。我覺得開始對話，也不困難，因為祇要說和對話團開始對話，廣場上是沒有辦法馬上聽到的。你把第一次對話的內容限制一下，然後確定一個禮拜對兩次，或者對三次。那麼同學就已經可以答應回去了。祇要有了第一次有限制的對話內容，同學就可以答應回去了。第二，如果再發一個社論有困難的話，發一個評論員文章，肯定這個運動。一個是評論員文章，再一個可能是首長的講話。反正我說的是三種辦法，這三種辦法不難查。我說，“這三種你們做到哪一種，我們都有可能對同學做工作，把同學帶出來。你要是一點不做的話，要帶出同學，不是說我們不願意，而是群眾情緒不答應。”十八日的時候，我把這三條又重新寫在紙上，吾爾開希在同李鵬對話時，三個都念下來了。所以《人民日報》上有，我也不在這裏講了。

與李鵬對話，雖然《人民日報》都登了，我講一下我知道的情況。我知道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有人到廣場說“趕快走，趕快走，到統戰部去，有緊急的事。”到那以後，開希說：“哎呀，你可來了。”當時程真在打點滴。然後馬上有人說“給你檢查身體。”我說：“【以上第 162 頁】不用，我挺好的。”一定叫我躺到對面的房間。一躺下，他就說“這都是北京醫院跟著我來的大夫。”接著就給我量血壓，一定要給我打點滴，“待會兒，你是重要人物啊。”什麼什麼的。我在那打著，和程真並排坐在沙發上。他們兩個，王丹和開希出去了，忽然回來。他們到另一個房間的時候，我有一個印象，不知我是不是確切看見了，就是閻

明復和他們一塊過去的，因為回來時開希和閻明復是一塊進來的。開希說，今天這個對話，就是我和王丹做主要發言，大家都不要說話。（梁二插：他說是閻部長說的。）哦，對了，那就確切了。因為我還一直懷疑，究竟是共產黨指定的他們兩個發言呢，還是他們兩個自作主張。我當時就想，你發言，你準備講什麼？看你們兩個也沒有準備啊。我就把我想到的，除了這三條還寫了一些別的，寫了兩張小紙片。打完點滴，慌慌張張就被塞到車裏走了。走的時候，並不知道要見的是李鵬。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要見誰，不知道規格和究竟要做什么。

與李鵬對話，雖然《人民日報》都登了，我講一下我知道的情況。我知道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有人到廣場說“趕快走，趕快走，到統戰部去，有緊急的事。”到那以後，開希說：“哎呀，你可來了。”當時程真在打點滴。然後馬上有人說“給你檢查身體。”我說：“【以上第 162 頁】不用，我挺好的。”一定叫我躺到對面的房間。一躺下，他就說“這都是北京醫院跟著我來的大夫。”接著就給我量血壓，一定要給我打點滴，“待會兒，你是重要人物啊。”什麼什麼的。我在那打著，和程真並排坐在沙發上。他們兩個，王丹和開希出去了，忽然回來。他們到另一個房間的時候，我有一個印象，不知我是不是確切看見了，就是閻明復和他們一塊過去的，因為回來時開希和閻明復是一塊進來的。開希說，今天這個對話，就是我和王丹做主要發言，大家都不要說話。（梁二插：他說是閻部長說的。）哦，對了，那就確切了。因為我還一直懷疑，究竟是共產黨指定的他們兩個發言呢，還是他們兩個自作主張。我當時就想，你發言，你準備講什麼？看你們兩個也沒有準備啊。我就把我想到的，除了這三條還寫了一些別的，寫了兩張小紙片。打完點滴，慌慌張張就被塞到車裏走了。走的時候，並不知道要見的是李鵬。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要見誰，不知道規格和究竟要做什么。

（插問：是什麼時候？）是十八日和李鵬對話之前。對話一共是一個小時，是十一點到十二點。時間非常緊，就在十一點之前。我去得晚，我比你們都去得晚。反正在李鵬進來之前，我把小紙片交給開希的，已經沒有時間給他講我的設想了，所以他念的時候把三條呼嚕呼嚕地就這樣念下來。我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啊。你祇能說，我要求的祇是一種，我那是三種方案，你要的是一種。你一個一個念下來，莫名其妙呢，你究竟讓人家做哪條呢，都不明白。

之後我還傻乎乎地想，有可能跟廣場上的同學商量，既然王丹、開希都在這兒了，感覺似乎他們還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把同學帶出廣場。

所以完了以後，我就叫：“閻部長，閻部長，你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回去，可能的話，我在那邊工作能做好的話，我告訴你，你們再發《人民日報》相關的消息。”閻明復已經根本沒有耐心聽了。就在這個時候，那邊一個記者說：“閻部長，今天這個新聞怎麼發啊？”閻明復說：“問鐵映同志。”“那我們可就全都照發了啊。”那會兒，李鐵映已經擁著李鵬往裏走了。他們這些記者都收拾著沒走呢，不管是電視臺記者，還是文字記者。所以等於全部照發，但是誰批的照發，沒有人承擔責任。這是我了解的事實。不管是閻明復，還是李鐵映，都沒有辦法對這件事承擔事實。【以上第 163 頁】

3 . 5 復食（李錄）＜參：3.6.8 復食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

3.5.1 營地聯席會議＜參：李錄 4.6.1 誰是廣場最高權力機關？＞

絕食團有幾個重大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同學的生命的問題。絕食本身就是以生命相搏，按照柴玲的話，就是“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所以，死亡一直成為一個最大的威脅。反對死亡也成為絕食團成立前後，以及一直到最後戒嚴，到六四的一個最大問題，很多活動都以此為中心展開。第二個問題就是絕食的目的。絕食的目的是要求和政府對話，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的合法性，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以保證不再秋後算帳。其實背後的原因是秋後算帳的問題，所以從絕食團成立到最後，政策問題的討論、與政府談判的條件、談判的渠道、談判的可能性以及實質的進展也占了中心的線索。第三個問題就是內部的組織建設。這個組織建設包括成立、中間的人事變動、各個機構的設立，還有就是建設廣場，包括物資、飲食、財政。

剛才超華談了一句，也提醒了我當時的一個想法。這個絕食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同學自發的。同學既然把生命拿出來要做一件事情，當然他就具有了對自己行為後果的全部責任。所以我想，任何一個領袖依靠自己的天才或個人魅力去強加一些意志，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事情。這個意旨也被絕食團大部分同學所認可，成為一條原則承認下來。最重要的決策都在所謂營地聯席會議中做出的。這個營地會議就成為後來的廣場議會，這是到了絕食結束以後了。開始的時候就叫聯席會議。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第一次，

其他人談話也談到了軋長安街馬路，這是當時十五日早晨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前面已經說了，開始的時候我對於絕食在這個時候搞有意見分歧。我對絕食本身又非常感動，沈彤在前一天提到了，他說在聽柴玲演講的時候哭了，我呢，確實也哭了，這不僅是我運動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哭，恐怕也是我在十歲唐山地震以後，第一次哭，這個確實是真心的。在北大的最後晚餐我也去參加了，我對於每一位絕食的同學，有著由衷的敬意。當然，我個人也是絕食的成員，所以對於絕食“是不是開始”以及“如何結束”的問題一直也是我最大的一個關【以上第

164 頁】心，我把這個問題始終作為營地聯席會議的一個中心議題。採取激烈

手段，是為了盡早結束，以避免真正的出現生命威脅。十五日，我建議可能的話，是不是把隊伍干脆拉到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上。原來是認為十五日可能有回答，既然十五日沒有回答，那最多十六日就有結果。要有結果的話，恐怕祇能施加壓力，因為當時在場的祇有幾千人了。但是這個決議在第一次聯席會議上被當場否決掉了。從那時起，我也是一直比較相信民主原則，這一點上我跟老封一致。後來老封跟我們結成了很好的關係，與這點有關。這個建議一開始就被否定掉了，所以儘管有那些傳言，但是一直是指揮部作為集體決議反對的。

其他人談話也談到了乾長安街馬路，這是當時十五日早晨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前面已經說了，開始的時候我對於絕食在這個時候搞有意見分歧。我對絕食本身又非常感動，沈彤在前一天提到了，他說在聽柴玲演講的時候哭了，我呢，確實也哭了，這不僅是我運動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哭，恐怕也是我在十歲唐山地震以後，第一次哭，這個確實是真心的。在北大的最後晚餐我也去參加了，我對於每一位絕食的同学，有著由衷的敬意。當然，我個人也是絕食的成員，所以對於絕食“是不是開始”以及“如何結束”的問題一直也是我最大的一個關【以上第164頁】心，我把這個問題始終作為營地聯席會議的一個中心議題。採取激烈手段，是為了盡早結束，以避免真正的出現生命威脅。十五日，我建議可能的話，是不是把隊伍干脆拉到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上。原來是認為十五日可能有回答，既然十五日沒有回答，那最多十六日就有結果。要有結果的話，恐怕祇能施加壓力，因為當時在場的祇有幾千人了。但是這個決議在第一次聯席會議上被當場否決掉了。從那時起，我也是一直比較相信民主原則，這一點上我跟老封一致。後來老封跟我們結成了很好的關係，與這點有關。這個建議一開始就被否定掉了，所以儘管有那些傳言，但是一直是指揮部作為集體決議反對的。

自焚呢，當然更是被限制了。勸說絕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揮部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有這麼一些人，為了避免其他人的犧牲，他們願意首先犧牲，他們願意站出來，為大家做這份貢獻，做這個犧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話，你也先讓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話，不如你先到指揮部來工作吧。也

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勸動了南開二十幾位想絕水的人。後來也是以同樣的理由，他們全部參加了指揮部的工作，使得指揮部的人員擴展到上百人。〈參：3.2.1：絕食指揮部 首先自焚〉

【梁二：我先補充高聯是否參加了聯席會議。五月十五日我記得絕食團曾經發出了一個各院校代表會議的通知。這時絕食同學已經轉移到東邊去了。我曾經試圖參加這個會議，但是我發現我參加沒有什麼作用。我記得各校院的代表都去了，其中有我在高聯全會上認識的同學。我曾經跟他們說，有必要加強高聯外圍的同學。至少那時我跟一部分全委碰過頭。】

【梁二：十五日的聯席會議為什麼沒有要求到場的高聯常委參加？

李錄：我記得當時是召集所有的絕食團的各個學校的代表開會，是要確立絕食團的中層領導。這個我已經講過。】

3.5.2 如何結束絕食？

在和政府的談判方面，我們也比較矛盾。在每一次討論上，分歧【以上第165頁】也是比較大。在十五日和十六日的時候，對於談判的信心是很大的，這主要是由於十四日談判的鼓勵，十六日閻明復的到來，使得對於結束絕食方式的問題，談判占了一個很大的地位，尤其是在十五日晚上，因為當時的對話團還在繼續和政府的談判。但是我想說明一點，指揮部沒有在任何時候做出決議，認為對話團已經不能夠代表，我們應重組對話團。當時的具體建議是，由於現在絕食同學結束絕食必須應徵求絕食同學本人的意見，那麼他們的意見應該成為與政府談判的最重要的根據。所以那天晚上做的一個最主要的工作是徵求廣大絕食同學的意見，看他們對結束絕食究竟有什麼樣的看法。首先開了第一次會，請大家把各種意見收集起來，按照收集的意見，總結了四種方案，每一種大方案下面又有小方案，請大家帶回去，徵求每一個人的意見，把意見寫在紙上。後來，大家回來反映說，解釋不太清楚，不如在廣播裏自己講吧。我就自己講了。後來在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之後，晚上十二點絕食團派了一個人帶走了一共八、九幾盤錄音磁帶。其中錄音的東西很重要的是指揮部做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決定，大部分是我的發言，還有做出的一些指示。我想如果那部分資料能夠找到的話，

對研究指揮部在這一時間做出來的一些最基本的反應，做出的重大決策，都很有價值。那天晚上講過之後，大家都聽清楚了。一個小時之後再召開會議的時候，每個人都把票數帶回來了。最後的統計是，全體投票人員大概是一千一百三十多人，這大概就是當時的絕食人數，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傾向結束絕食。當時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對話團的同學確實有派人和我們聯繫，希望得到我們停止絕食的具體要求，他們好和政府談判。這是第一次討論。

在和政府的談判方面，我們也比較矛盾。在每一次討論上，分歧【以上第165頁】也是比較大。在十五日 and 十六日的時候，對於談判的信心是很大的，這主要是由於十四日談判的鼓勵，十六日閻明復的到來，使得對於結束絕食方式的問題，談判占了一個很大的地位，尤其是在十五日晚上，因為當時的對話團還在繼續和政府的談判。但是我想說明一點，指揮部沒有在任何時候做出決議，認為對話團已經不能夠代表，我們要重組對話團。當時的具體建議是，由於現在絕食同學結束絕食必須要征求絕食同學本人的意見，那麼他們的意見應該成為與政府談判的最重要的根據。所以那天晚上做的一個最主要的工作是征求廣大絕食同學的意見，看他們對結束絕食究竟有什麼樣的看法。首先開了第一次會，請大家把各種意見收集起來，按照收集的意見，總結了四種方案，每一種大方案下面又有小方案，請大家帶回去，征求每一個人的意見，把意見寫在紙上。後來，大家回來反映說，解釋不太清楚，不如在廣播裏自己講吧。我就自己講了。後來在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之後，晚上十二點絕食團派了一個人帶走了一共八十幾盤錄音磁帶。其中錄音的東西很重要的的是指揮部做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決定，大部分是我的發言，還有做出的一些指示。我想如果那部分資料能夠找到的話，對研究指揮部在這一時間做出來的一些最基本的反應，做出的重大決策，都很有價值。那天晚上講過之後，大家都聽清楚了。一個小時之後再召開會議的時候，每個人都把票數帶回來了。最後的統計是，全體投票人員大概是一千一百三十多人，這大概就是當時的絕食人數，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傾向結束絕食。當時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對話團的同學確實有派人和我們聯繫，希望得到我們停止絕食的具體要求，他們好和政府談判。這是第一次討論。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閻明復這一次了。剛才我已經談到了，中間還進行了很多次。到了十六日結束之後，通過和政府談判這種方式來結束絕食，就已經不是主流了。開始的時候有另一個相對主流的觀點，這個觀點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後來又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就是通過自然結束絕食的方式，我們也不需要政府支持。因為受到十五日游行的鼓舞，在十五日下午我已經基本上有了這種想法，就是這個絕食的原始目的達到了，它充分動員了北京市的各個層面，我想他們本身也可能繼續支持學生的訴求，那麼祇要我們體面地結束絕食，以師出有理的

方式來結束，也就可以了。所以當時的方法，就是同學暈倒，直到最後一位暈倒為止，我們就勝利地宣告 絕食的結束，而且非常地【以上第 166 頁】悲壯。這樣的結果也不錯。這是另外一種想法。基於這種想法，才開始特別強調了警衛的重要性。當然警衛的重要性還有其它的原因，就是關於怎么來確定生命線，和糾察當時為什麼這麼嚴格，為什麼要發行通行證等等，這個我待會兒涉及到糾察隊的時候再談。這是第二種方案。這第二種方案，到十六日之後，也基本上破產了。由於外地學生的加入，由於十五日、十六日的大游行，由於各界的人士，白夢講了，叫“名人博覽會”，因為種種原因，這個方案又破產了。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闡明復這一次了。剛才我已經談到了，中間還進行了很多次。到了十六日結束之後，通過和政府談判這種方式來結束絕食，就已經不是主流了。開始的時候有另一個相對主流的觀點，這個觀點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後來又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就是通過自然結束絕食的方式，我們也不需要政府支持。因為受到十五日游行的鼓舞，在十五日下午我已經基本上有了這種想法，就是這個絕食的原始目的達到了，它充分動員了北京市的各個層面，我想他們本身也可能繼續支持學生的訴求，那麼只要我們體面地結束絕食，以師出有理的方式來結束，也就可以了。所以當時的方法，就是同學暈倒，直到最後一位暈倒為止，我們就勝利地宣告絕食的結束，而且非常地【以上第 166 頁】悲壯。這樣的結果也不錯。這是另外一種想法。基於這種想法，才開始特別強調了警衛的重要性。當然警衛的重要性還有其它的原因，就是關於怎么來確定生命線，和糾察當時為什麼這麼嚴格，為什麼要發行通行證等等，這個我待會兒涉及到糾察隊的時候再談。這是第二種方案。這第二種方案，到十六日之後，也基本上破產了。由於外地學生的加入，由於十五日、十六日的大游行，由於各界的人士，白夢講了，叫“名人博覽會”，因為種種原因，這個方案又破產了。

十六日再次表決時，突然發覺絕食人數已經到了三千一百四十四人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希望已經徹底破產了。到了十七日、十八日的時候，我的一個很大的想法，就是通過哪種方式能夠結束。因為當時非常擔心，在這中間會出現

生命的問題。同時也在考慮，運動以什麼樣的方式把它推向下一步。這個方法到了十七日，基本上沒有形成太多的進展，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受到了天氣預報的打擾。所以，實際上我整個的心思就放在了不要當歷史罪人。不僅是歷史罪人的問題，也牽涉到人的生命問題。因為當時如果就在上午下雨的話，那真可能就是這些絕食同學幾千人都生病。通過這幾千人，這個瘟疫就會傳到整個北京市。所以從下午開始，就全力以赴地去搞了那樣一件事情，當然到最後第二天也成功了。其實到了四、五點鐘，大卡車就開過來了。當時是想晚上把車開進來的，後來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才開進來。（封從德插：凌晨七點鐘。）所以才有中間用幾個小時擴大十米的事情，那個事情也占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精疲力盡了，那天我暈倒跟這個也有關係。

3.5.3 為何結束絕食？

然後進入到結束絕食。我從醫院回來之後，情況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已經有跡象表明政府不僅不跟我們對話，而且政府的壓力在升高，已經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開始採取極端手段。最初的表現是在十六日紅十字會的問題。剛才柴玲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就不再繼續了。到了十八日的時候，又升溫了，那天晚上，那個工人，我們都熟悉的那個大眼睛，這裏就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已經來報紅十字會已經進入各個絕食車。因為當時我們確實接受了他們的主張，每一節車派一名醫生。但是那些醫生都是男的，而且都懂得開車，他們【以上第 167 頁】準備那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熟的時候把車開走。後來才有了“緊急會議”，“緊急會議”作出的結論，就是所謂“放開”，“扎車胎”，反正各個車所作的方法不一樣。最後馬少方對我進行激烈地攻擊，讓我對國家的財產負責。那次他有些歇斯底裏。（常勁插：扎車胎是張伯笠帶頭幹的。）

然後進入到結束絕食。我從醫院回來之後，情況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已經有跡象表明政府不僅不跟我們對話，而且政府的壓力在升高，已經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開始採取極端手段。最初的表現是在十六日紅十字會的問題。剛才柴玲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就不再繼續了。到了十八日的時候，又升溫了，那天晚上，那個工人，我們都熟悉的那個大眼睛，這裏就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已經來報紅十字會已經進入各個絕食車。因為當時我們確實接受了他們的主張，每一節車派一名醫生。但是那些醫生都是男的，而且都懂得開車，他們

【以上第 167 頁】準備那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熟的時候把車開走。後來才有了“緊急會議”，“緊急會議”作出的結論，就是所謂“放閘”，“扎車胎”，反正各個車所作的方法不一樣。最後馬少方對我進行激烈地攻擊，讓我要對國家的財產負責。那次他有些歇斯底裏。（常勁插：扎車胎是張伯笠帶頭幹的。）

這個時候，另外更具體的建議出來了。從十六日開始已經有各個重要的人，當然是自稱重要的，來自趙紫陽辦公室，李鵬辦公室。我想這有可能跟超華說到的對話失敗有關係，在那兒得不到成果的話，就派人直接到廣場來與我們商量。我所接待的人已不計其數了，辨不清真假，得到的總體印象是政府有可能採取激烈的立場，同時他們內部有重大的分歧。所以得到的結論是非常矛盾。有些人堅決主張要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有些人主張立刻退出。值得提一下的是十八日晚上一個什麼代表，總之按陳一咨的說法是他們派出總代表送來了所謂的“六點聲明”。這“六點聲明”說得極其露骨，而且這些機構大家都有所聞，至少我是很清楚的。情況已經變得 很危急了，而正在這個時候，很危急但又沒形成很一致的辦法。當時已經很晚了，我們希望得到他們具體的建議，那個人就回去了，說回去帶更重要的人來，後來一直也沒有來。一個小時後，突然聽到消息，趙紫陽來了。當時嚇了我一大跳，我說怎麼趙紫陽到了？那時大概兩、三點的樣子，少方他們剛走，我正在閉目想下一步 該怎麼辦？突然宣佈趙紫陽到了。我說這怎麼回事？是不是真的？我派了人去問了一下，說是真的，一共派了三撥人去。我問他在什麼地方？他說在西北角上。我說 馬上帶我們去！我們剛出去，第二撥人回來說已經走了。我說馬上把現場的所有東西馬上寫過來。又過了半小時，他就把當時情況寫了個報導回來了，告訴我們大概 見了十分鐘，講了什麼話。當時我們立即開會，柴玲、海峰、伯笠都在，研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趙紫陽的講話和李鵬的講話截然不同，這是第一個強烈的印象。第二個強烈的印象就是覺得趙紫陽無能為力。和那天晚上剛剛收到的“六點聲明”聯合在一起，使得我們對黨內鬥爭開始有了比較深切 的體驗，至少是對我個人來說。我開始尋找第三種結束絕食方法時已經開始涉及到對黨內鬥爭的考慮，當時我也沒有想出什麼辦法來。所以第二天早晨就決定至少把 這件事廣播出去，讓同學們自己來決定，至少讓所有的同學都知道這件事。記得第二天早上我們開著車繞場【以上第 168 頁】走 了一圈到二圈，反正廣播了十幾次關於前

一天晚上這一次見面的全部內容，詳細的報道。我記不得是哪個同學寫的了，反正寫得很不錯。回來之後，到了十九日中午 的時候情況就有變，剛才伯笠已經談到了，那幾位知識分子已經陸續送到消息。伯笠走了之後中間又來了一些人，是軍區的軍人，還有一個是昨天送聲明的人。他們 談到軍人已經開始在北京四

這個時候，另外更具體的 建議出來了。從十六日開始已經有各個重要的人，當然是自稱重要的，來自趙紫陽辦公室，李鵬辦公室。我想這有可能跟超華說到

的對話失敗有關係，在那兒得不到成果的話，就派人直接到廣場來與我們商量。

我所接待的人已不計其數了，辨不清真假，得到的總體印象是政府有可能採取激烈的立場，同時他們內部有重大的分歧。所以得到的結論是非常矛盾。有些人堅決主張要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有些人主張立刻退出。值得提一下的是十八日晚上一個什麼代表，總之按陳一咨的說法是他們派出總代表送來了所謂的“六點聲明”。這“六點聲明”說得極其露骨，而且這些機構大家都有所聞，至少我是很清楚的。情況已經變得很危急了，而正在這個時候，很危急但又沒形成很一致的辦法。當時已經很晚了，我們希望得到他們具體的建議，那個人就回去了，說回去帶更重要的人來，後來一直也沒有來。一個小時後，突然聽到消息，趙紫陽來了。當時嚇了我一大跳，我說怎麼趙紫陽到了？那時大概兩、三點的樣子，少方他們剛走，我正在閉目想下一步該怎麼辦？突然宣佈趙紫陽到了。我說這怎麼回事？是不是真的？我派了人去問了一下，說是真的，一共派了三撥人去。我問他在什麼地方？他說在西北角上。我說馬上帶我們去！我們剛出去，第二撥人回來說已經走了。我說馬上把現場的所有東西馬上寫過來。又過了半小時，他就把當時情況寫了個報導回來了，告訴我們大概見了十分鐘，講了些什麼話。

當時我們立即開會，柴玲、海峰、伯奎都在，研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趙紫陽的講話和李鵬的講話截然不同，這是第一個強烈的印象。第二個強烈的印象就是覺得趙紫陽無能為力。和那天晚上剛剛收到的“六點聲明”聯合在一起，使得我們對黨內鬥爭開始有了比較深切的體驗，至少是對我個人來說。我開始尋找第三種結束絕食方法時已經開始涉及到對黨內鬥爭的考慮，當時我也沒有想出什麼辦法來。所以第二天早晨就決定至少把這件事廣播出去，讓同學們自己來決定，至少讓所有的同學都知道這件事。記得第二天早上

我們開著車繞場【以上第 168 頁】走了一圈到二圈，反正廣播了十幾次關於前一天晚上這一次見面的全部內容，詳細的報道。我記不得是哪個同學寫的了，反正寫得很不錯。回來之後，到了十九日中午的時候情況就有變，剛才伯笠已經談到了，那幾位知識分子已經陸續送到消息。伯笠走了之後中間又來了一些人，是軍區的軍人，還有一個是昨天送聲明的人。他們談到軍人已經開始在北京四

聯系到趙紫陽的講話，聯系到“六點聲明”，我腦子裏已經對結束絕食形成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我當時想法很簡單，學生運動決不能成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和工具，學生這個時候必須要立刻停止絕食，同時設法把學生撤出這場鬥爭中，這場鬥爭無疑已被作為一定的籌碼了。未來命運怎麼樣呢？我當然不反對自己在裏面，因為本身你是作政治嘛，但問題是我當時最主要的責任是對絕食的二、三千同學的生命負責，這是我當時認為最大的動力，最大的責任感。

3.5.4 復食的決議〈參：3.6.8 復食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

當時基於這樣一種考慮，我設想全面停止絕食。這時候伯笠已經回來了，所以伯笠跟我一講，我當然是同意的。然後我們就開始開會，記得我們先在這個車上，當時陳明遠也在，先把這些想法和這些骨幹講得很清楚，大家都立刻同意了。然後又準備開一個會，又覺得這個事情太秘密，沒有辦法，所以先調一隊糾察隊把一個車包圍起來，還想了好幾種辦法如何開這個會。總之，最後一個方法是糾察隊把車包圍起來，然後讓人進去。所有的人都到了，大家神色非常緊張。對於開希我們沒有特別關心，傳說開希要進場參加會議，當時在場的所有的人都說不讓他進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要來勸我們撤的，實際上和我們的想法一樣。結果當時就作出了決定，是伯笠、柴玲和我主持會議的。在這下面之後更大的一件事是如何完成這個決議。當時這個消息已經在全場傳遍了，而當時在場的人至少有二十多萬，而且在指揮車形成之後，糾察線已經被打亂，生命線已經被打亂。把這些人放置在什麼地方，怎麼來保護這些人的安全，成為最大一個問題。【以上第 169 頁】

因為軍隊一旦進來，首先受到襲擊的是這些人，怎麼樣來保證這些人的安全？如果讓他們帶走的話，是否會直接帶到監獄去？所以我們的想法是希望讓這些絕食的老師聚集在一個中心空地，然後讓二十萬人把這些人包圍起來。所以第一個面對軍人的將是外面的二十幾萬人，那麼絕食老師就會在他們的保護下緩緩撤退。這是當時的一個主要想

法。但是如何把這些八十多輛車的絕食同學調到一個固定地點？尤其在當時絕食已經七天，暈倒的同學已經有三千五百人次的情況下，這已經變得幾乎不可能了。所以當時沒人願意做這個事。我說那我來做吧。當時我作了調度總指揮。這次調度也成為我一生難忘的一個事件。當時反對的人如雲，最後我沒有辦法了，只好把所有的人趕到車外去。然後把車窗簾都放下來，我祇能閉門造車了。我一個人坐在指揮車中間，拿著個喇叭，四周把窗戶都關掉了，用紙、布都擋好了，我就在車中間指揮人調動，完全憑自己的腦子，感覺外面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憑記憶來調動哪些學校在什麼部位，讓哪些學校先走，哪些學校後走，糾察隊如何配合，進廣場後怎麼把人從周圍弄起來。反正總之這是一次我永生難忘的經歷。最後幾乎是奇跡，所有的人居然都調出來了，而且在整個過程中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調出來以後迅速在周圍形成其它隊伍。後來反對復食的人實際上是圍繞絕食圈的那些支持的人，將近二十人，聲音最大的是他們，其實絕食的同學幾乎沒有聲音，喊都喊不出聲音了。而且後來參加那個代表會的也大都是這些人，那時候圍著我們的指揮車擠得人山人海。無論如何，復食的決議終於作出，而且作得很漂亮。因為張伯笠那篇復食宣言寫得好極了。完了以後，老封一走我立刻就跟柴玲，海峰（我不知有沒有張伯笠，我記不得了）到了北面接受十幾個記者的採訪，包括中央電視臺。對著記者再次宣佈絕食結束，還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講，柴玲講得很好。所以中央電視臺在報道絕食結束的時候整整比宣佈戒嚴早了兩個小時。總之算我們一場勝利吧。到後來伯笠一激動，又喊了二十萬人大絕食又是另一回事了。當時

我們的決議我記得很清楚：由絕食改靜坐，靜觀當天晚上的發展。首先當天晚上這些人不必進監獄，這是當時最大的考慮。而且一旦發生混亂，如何保證這些人回到學校去，然後如何開始吃飯，怎么在發生衝擊時不至於被踩死等等，考慮的都是這些問題。那是驚心動魄的一晚，不再細講。【以上第 170 頁】

3 . 6 補充與質疑

3.6.1 絕食團指揮部是怎么成立的？

【白夢：剛才柴玲說，在北大出發之前，柴玲作為北大絕食團的召集人，彭嶸做的具體工作。一直到絕食團指揮部成立以前，王文是不是當過絕食團的團長？

柴玲：那天晚上我跟他一塊巡視當時的現場，他說，“我要當絕食團的團長。”當時我就哄他說：“你要當什么都行。”哄小孩一樣哄著他。

張伯笠：不是大家研究的？

柴玲：沒有那事。他就自己自封為團長的。】<參：2.7.6 梁二補充：師大與絕食發起>

封從德：絕食團指揮部成立的確切時間是什麼時候？怎樣宣佈的？

李錄：十五日早晨五點多鐘我去找柴玲，當時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見，當時在場的大概有十幾個人。柴玲講話時大概是七、八點鐘。柴玲：早上八點開始正式宣佈。

封從德：有多少人聽到你們的宣佈？

李錄：當時通過喇叭宣佈的。宣佈後馬上開代表會議，當時已經幾乎所有代表都到了，將近四十人，代表四十個學校，當時一個一個的查學生證，就我沒有。第一次置疑就是那個時候，當時柴玲替我說了許多好話。這個事情一開始柴玲我們兩個，她是總指揮，我是副總指揮，就這麼宣佈的。然後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公布了一條紀律，包括組織原則。第一凡是願意為其他同學的生命而獻身的人都有資格參加指揮部，第二條是指揮部沒有能力現在進行選舉，但所有人都有罷【以上第 171 頁】免權。你祇要聽說這個人不合適，馬上就可以開會，

凡是罷免的會自己都可以召開，祇要通過大家的決議也就罷免了。所以後來王文他們的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法的，唯一不合法的是他沒有召集會，自己訂

了個名單，而且然後跟我商量商量就別當了吧。當然這主要是對柴玲，不是針對我，開了會以後就把它否決掉了。因為當時的氣氛並沒有一個人想去爭官去，因為那是最危險的，所以哪個人能幹哪個人可以幹自然就形成了。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認識老封，也不認識伯笠，不認識郭海峰，但在中間我們形成了非常緊密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一直到最後。

李錄：當時通過喇叭宣佈的。宣佈後馬上開代表會議，當時已經幾乎所有代表都到了，將近四十人，代表四十個學校，當時一個一個的查學生證，就我沒有。第一次置疑就是那個時候，當時柴玲替我說了許多好話。這個事情一開始柴玲我們兩個，她是總指揮，我是副總指揮，就这么宣佈的。然後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公布了一條紀律，包括組織原則。第一凡是願意為其他同學的生命而獻身的人都有資格參加指揮部，第二條是指揮部沒有能力現在進行選舉，但所有人都有罷【以上第171頁】免權。你祇要聽說這個人不合適，馬上就可以開會，凡是罷免的會自己都可以召開，祇要通過大家的決議也就罷免了。所以後來王文他們的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合法的，唯一不合法的是他沒有召集會，自己訂了個名單，而且然後跟我商量商量就別當了吧。當然這主要是對柴玲，不是針對我，開了會以後就把它否決掉了。因為當時的氣氛並沒有一個人想去爭官去，因為那是最危險的，所以哪個人能幹哪個人可以幹自然就形成了。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認識老封，也不認識伯笠，不認識郭海峰，但在中間我們形成了非常緊密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一直到最後。

【梁二：我對絕食團和以後的廣場指揮部議會代表的合法性進行一點不同的意見。我當時認為他們自己選出來的、這個自薦的代表本身就不具備合法性質，所作的一件事祇是把寡頭專制變成少數專制。我當時還對廣場上的同學有一個看法是認為他們都是執政狂，包括我在廣場上的時候都是這樣看。】

【梁二：第二個質疑：在廣場指揮部成立的時候，它的合法性基礎來源？

封從德：我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問過柴玲這個來源，我問她是不是選出來的，她的回答基本上和現在大家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它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聯席會議任命的，這是當時柴玲給我的印象。另一個，實際上，以後我發現，它實質上還是從營地聯席會議，三百多個高校的代表這個來源。所以這有個實際來源，有個形式來源。

王超華：形式來源指的是什麼？

封從德：就是聯席會議公布過一個名單，是那個形式。但是，我還是認為指

揮部是對這個營地聯席會議負責的，不是對知識分子的那個聯席會議。

梁二：廣場指揮部當時的開放性有多大？它對外聯系和對信息的收集有多大的開放性？【以上第 172 頁】

李錄：收集信息和接待主要是從秘書處來。秘書處是設在指揮部的二層，那個大帳篷有幾個大字，上寫秘書處。這裏面分了三個部分，一個叫接待處，一個叫情報收集處，一個叫秘書處，但都叫秘書部了。負責接待主要叫作接待處，他們這個處就有二十多人，總共是八十多個人。】

3.6.2 關於自焚<參：柴玲 3.2.1 絕食指揮部首先自焚><參：李錄

3.5.1 營地聯席會議>

常勁：關於廣場自焚事件，這在北大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對北大、對於廣場的決策都有很多影響。因為我聽說李錄是當事人，我希望他對廣場自焚事件做一明確解釋。

李錄：這個事情最先提出來是在五月十五日五點到六點，我跟柴玲還有其他十幾個同學，提出來說成立指揮部要有個條件，那些需要願意獻身的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到後來我提出真的到了政府監獄車來把大家都送到監獄去的話，我就當著他們的面先自焚給他們看。但是這個並沒有作為標準。後來這個想法喊起來實際上是在十五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個從河南來的小孩，個子很小，決心特別大，他一定要我給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十分鐘讓他講他要自焚，而且他要有記者在。當時我把他壓著，他當然很氣憤。最後我強行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時，他終於喊出來了，有些記者聽到了，就追著去問他了。但是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後來這個人一直沒停，一直在絕食圈裏轉來轉去，喊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後，出現絕水後自焚就變成一個很強烈的呼聲了。學校代表一般來說都比較理性一些，我希望他們每次都向會議匯報一下情況，我就不斷聽到匯報了。

【王超華：接著王丹的事問，有個不知從哪兒來的傳說，有人要自焚，王丹也要自焚。你們知不知道？【以上第 173 頁】

李錄：這我倒不知道。】

【封從德：我注意到你提師大歷史系在講自焚時也比較早。確切時間是什麼時候？五月十五日深夜十六日凌晨在廣場師大有十一個同學準備自焚。你知道確切情況嗎？

梁二：你說的十一個同學我估計是師大歷史系的，但我確實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估計呢？因為五月八日那天晚上他們就說過，如果絕食不起作用，就自焚。是一個歷史系的同學，他的腦袋是光的，他的父母是北航教授。最早提出自焚的時間是五月八日晚上。】

【王超華：我想明確知道絕食團指揮部成立之後，關於自焚，除了在你們指揮部這幾個人，是不是在記者會上明確宣佈了？

李錄：在舉行記者招待會之前，我們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那個會上否定了兩個議案，第一個議案就是當時關於自焚的問題。“你們想自焚，你們到底想不想工作？”第一個就否決了。第二個否決的是躺在長安街馬路上，這個也否

決了。所以才有了在博物館的那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我拼命按住那個河南來的一個小學生。後來他是在我們已經宣佈新聞記者招待會結束後，他才有機會把這個喊出來的。

王超華：我這個問題本來是對柴玲的。我聽見柴玲的回憶裏說，大家可以查錄音，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我們至少有十一個同學說，如果自焚的話，我們首先自焚。在記者會上我們也表示了一下。”因為這個事牽扯到後來對北大的老師和對我的影響都很大。再有一個事就是你剛才回答的我就不多說了，我主要是想聽柴玲的。還有一個是關於絕食同學當中後來傳的有兩個人是植物人還是死了。

李錄：這個事情應該問辛苦，這是責成辛苦去調查的。後來他給了我一份調查報告，就是說這個人失蹤了，沒法證實這個人死了。

王超華：我籌集了一些錢給絕食同學，說你們有絕食同學的名單，你們不同意。我不能確指，因為不是你們幾個人，是我到原來的學【以上第 174 頁】運之聲廣播站的地方去，一個人攔路說，“這個名單絕不能給高聯，我們已經給他們錢了。”

王超華：我籌集了一些錢給絕食同學，說你們有絕食同學的名單，你們不同意。我不能確指，因為不是你們幾個人，是我到原來的學【以上第 174 頁】運之聲廣播站的地方去，一個人攔路說，“這個名單絕不能給高聯，我們已經給他們錢了。”

李錄：這個不清楚。】

3.6.3 李錄是學生嗎？

老木：因為李錄是外地唯一一個在天安門指揮部和北京學運起到重要作用的學生領袖。我想問李錄什麼時候到的北京？什麼時候參加北京學生運動？因為柴玲昨天說十三日絕食隊伍出發走到中關村口上遇到李錄，好象那時你們已經很熟了。我想問一下這個情況。第二，關於李錄，不光是我，還有其他很多同學問過他，就是李錄的學生證，他的真實身份。到海外後，我不知是否別人知道，你是南京大學哪個系的學生，我希望得到證實。

李錄：老木這個問題讓我回想到當時的情景，因為當時大家都是這樣問我的，口氣比你強硬些，速度比你快點，問題都一樣。其實我剛才已經講過，我是南京大學八五級物理系的學生，後來同時讀物理系和經濟系，這在本科裏比較少，但我算一個。我是四月二十六日由於在南京被公安局跟蹤，我認為我在南京個人已經沒有什麼發展餘地了，同時我認為，我這個人不到黃河不死心，我深信其它地方還有機會。全國望北京，我也祇有往北京跑了。因為我也沒有錢，在此之前我跑了很多地方，大概大半個中國，都是沒錢旅行，我旅行從來不買票，

作為副結果也從來不帶學生證。因為這個原因，我那次也沒買票，也沒帶學生證。我是四月二十七日到的，到後我跟柴玲在二十九日見的，基本上到一、兩天就認識她了。而且我到北京之後，所有有自治會的學校我都去了，幾十個學校，所有當時的著名學生領袖我都看了一遍。

【張倫：替李錄澄清一點特務的問題。我認識他的老師張仁則，現在芝加哥依裏大學教書，是他在南京大學經濟系的老師。】【以上第 175 頁】

3.6.4 聲援絕食

(1) 北大常勁

我就講一下聲援絕食的情況。當然，因為我在北大工作，所以我就講一下北大的工作。其他各校，我就講一下我眼見的事實。北大籌委會決定支持絕食以後，在十三日下午絕食人員出發後，馬上成立了北大聲援絕食指揮部，全力支持絕食。指揮部設定幾個在校的總指揮，楊濤是挂名的總指揮，因為楊濤當時不在，我和謝劍是副總指揮。當時有一個同學叫羅凱雄，他是作為廣場的總指揮，是他帶著隊伍去護送北大的絕食學生。從此以後我們就開始了對廣場的聲援。

絕食團成立以後，當時並沒有考慮到它的後勤問題。當天晚上，天氣特別冷，絕食同學在那裏沒有衣服被子。我們當天晚上就組織了送衣服被子的事情，大概兩次在全校征集了有幾百件，當天晚上就送到了廣場。第二天發生缺水的事情。因為第二天天氣非常炎熱，大家情緒都很差。有的同學就回來說，廣場同學都要渴死了，你們還在這裏坐著。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老師就拉著我，到學校的後勤部去找水、借茶桶。我去了後勤部以後，他們不理我。後來通過這個老師，找到了校黨委和校領導。校領導就開始支持，給後勤部打了一個電話，同意借給我們水桶。我們就借到了水桶。

這天上午借到了水桶以後，我們就抬著水桶，把水送到了廣場。我當時很累，記憶有點混亂，但是我記得當時絕食同學出發以後，一個北大青年老師幫助北大在紀念碑的西兩角上建了一個北大的聯絡站，主要起北大與校內溝通的作用。十四日，我們就沒有再去廣場。第二天十五日，就一直在學校裏面活動。我當時找了校領導、校辦和校黨委。談了以後，十五日突然有一個轉機，就是十五日北大的校方開始支持學運。下午派車送陳佳爾教授去看望學生。當時我也跟著車，帶著水，借了北大的幾十把太陽傘，還有其他一些物資到了廣場。

在這個時候，北大籌委會派了一部分學生，支持廣場絕食學生，帶著一批同學搜集的物資，在廣場上組建了幾個物資供應站。一個是紀念碑上面聯絡站旁邊的一個供應站和旁邊的一個供水站，另外在北大絕食團前面建了一個小的物資供應站。另外十五日的時候，北大團委去聲援絕食的時候，在歷史博物館前面建了一個帳篷的另外一個物資站，在那裏定了電話。一個北大的物資供應系統就逐步形成了。

在這個時候，北大籌委會派了一部分學生，支持廣場絕食學生，帶著一

批同學搜集的物資，在廣場上組建了幾個物資供應站。一個是紀念碑上面聯絡站旁邊的一個供應站和旁邊的一個供水站，另外在北大絕食團前面建了一個小的物資供應站。另外十五日的時候，北大團委去聲援絕食的時候，在歷史博物館前面建了一個帳篷的另外一個物【以上第 176 頁】資站，在那裏安了電話。一個北大的物資供應系統就逐步形成了。

另外說說北大的糾察。北大糾察隊從絕食開始後，每天往廣場上派出糾察。十六日，當時我在廣場上接北大聲援絕食總指揮的時候，北大在廣場上的糾察已經達到兩千多人，占據了廣場上絕大多數的位置。我去了以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這些物資站開始順理化。因為當時各個物資站的建立都是比較獨立的，而且同學都是自願去工作的。當時就在各個物資站之間建立了聯系，規定了最主要的總部，指揮總部是設在紀念碑上邊的聯絡站。聯絡站、供水站，下面的物資站主要是針對絕食學生，給絕食同學送水、送藥品之類的東西。外面廣場博物館下面的物資站是為了糾察的吃飯問題。因為糾察在絕食同學面前吃飯不是太好，所以把他們都拉到那兒去吃。另外，廣場上紀念碑上的聯絡站也負責一部分糾察同學的吃飯。

到了十七日，北大的糾察系統又做了一個重大改動。校內一個青年老師，發現廣場上秩序特別混亂，就在北大的糾察隊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糾察制度。在北大拉出糾察隊，分大隊長、中隊長和小隊長，小隊長是帶隊的，大隊長是在廣場上負責安排的，中隊長是負責區域的。每個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都有代號，大隊長有三個，是 0 0 1 號，0 0 2 號和 0 0 3 號，其他的按照順序排。我們的制度是換人不換號，大隊長可以換，但號還是 0 0 1 號，保證領導的完整性。這麼組建以後，北大對廣場上的控制基本比較嚴格了。而且物資系統在整理後也是比較完善的。

十七日高聯進入廣場。當時的情況，我是在廣場看到的。高聯的人馬在大遊行後，由少江帶著，在清華糾察隊的輔助下，當時就上了紀念碑的頂層。然後又由糾察隊拉出了大的圈子，並在紀念碑下面開始建立廣播站。當時我們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道高聯為什麼又拉上來了。他們主要是用北師大的同學作為高聯的組織機構，我看見他們設立了有聯絡站和財務站，王志新在那裏負責，我還看到了鄭旭光。他們都帶著紅領巾在那負責這個活動。我看到糾察中比較負責的，還有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他們和北師大的學生負責紀念碑南側一線的隊伍。到十七日下午，組調車輛。當時絕食團總指揮部有大概幾百個絕食的學生，他們在外面找不到能夠住的車子。北外負責的同學就很著急。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了歷史博物館的前面，那個地方停了很多大客車，都是各個學校派的，還有紅十字會的救援中心。我去調【以上第 177 頁】車調不動。他們說，除非絕食學生搬回去，我們這個車可以動用。我就找了紅十字會的領導，他們給我們派了幾輛大客車，把這些學生都裝進去了。

十七日高聯進入廣場。當時的情況，我是在廣場看到的。高聯的人馬在大遊行後，由少徑帶著，在清華糾察隊的輔助下，當時就上了紀念碑的頂層。然後又由糾察隊拉出了大的圈子，並在紀念碑下面開始建立廣播站。當時我們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道高聯為什麼又拉上來了。他們主要是用北師大的同學作為高聯的組織機構，我看見他們設立了有聯絡站和財務站，王志新在那裏負責，我還看到了鄭旭光。他們都帶著紅領巾在那負責這個活動。我看到糾察中比較負責的，還有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他們和北師大的學生負責紀念碑南側一線的隊伍。到十七日下午，組調車輛。當時絕食團總指揮部有大概幾百個絕食的學生，他們在外面找不到能夠住的車子。北外負責的同學就很著急。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了歷史博物館的前面，那個地方停了很多大客車，都是各個學校派的，還有紅十字會的救援中心。我去調【以上第177頁】車調不動。他們說，除非絕食學生撤回去，我們這個車可以動用。我就找了紅十字會的領導，他們給我們派了幾輛大客車，把這些學生都裝進去了。

比較重要的，就是北大的這幾個物資系統。北大後來在糾察系統上逐步薄弱下來，一個是領導成員，另外一個是開始有大量的外地學生進駐北京，他們開始負擔很多的糾察工作。再往後就是北大歷史博物館那個物資站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個是糾察的物資供應作用，另一個就是廣場上的聯絡作用。我就不再多說了，因為這個是明顯的事實。

到了十九日的時候，北大給我來了一個通知，叫我回去準備調整工作重心。因為當時北大自己還有很多的事情要辦，但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拉到聲援上面，很多工作就沒有做，我們幾乎完全成了一個聲援指揮部了。當天晚上因為戒嚴，我帶著絕食團財務部的兩萬塊錢和北大在廣場上集資的兩萬塊錢回到北大。在這以後就沒有去廣場了，主要在學校裏。我們學校的工作重心調整以後，主要是接待同學回校以後的各種調整活動。〈參：封從德 5.7.6 廣場後期的財務〉

另外，我談一下北大教師聲援團的成立。北大教師聲援團是在五月十五左右成立的，五月十七日開始上廣場。由原北大所謂智囊的老、青年教師走到臺前，成立了聲援團。他們也是主要擔當了糾察工作。青年老師、博士生也到廣場上擔當了糾察工作，也負擔了一些我們和校方的接觸。北大校方對絕食的支持，我覺得非常重要。當時北大的物資、糾察力量在廣場上一直是領先的、重要的，物資很多是北大在校園裏搜集的。很多在北大附近的公司給北大送了很多器材，包括給絕食團送去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器材和物資。另外就是北大在廣場上接收

的物資，因為祇有北大在廣場上設了一個聯絡部，還有歷史博物館前面的物資站，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半的物資大概送到了北大了，還有一半物資大概去了市高聯的三層。但我看過市高聯三層，他們上面的物資很少，大概祇有對著天安門那一側有幾堆物資。這是我看到的。市高聯在“學運之聲”廣播站多次廣播，說到歷史博物館前市高聯物資站去領取物資。但是我去找了以後，沒有發現這個物資站。我看到的祇有北大的這個物資站。

關於絕食團對物資的設置。物資的供應主要是王樹東他們財務部負責的。我在五月十七日以後跟王樹東接觸，但當時他的腦子已經不太清楚了，財務管得很緊，但已經出現混亂。王樹東負責財務，他負【以上第 178 頁】責批錢給那些管物資的同學。管物資的同學，有好幾個是從外地來的。一個重要的物資點也是在歷史博物館前面，由一個外地學生和北京經濟學院的在那裏負責。他們拿了一萬塊錢還是兩萬塊錢去買物資，然後送進廣場，另外就是收集運去的物資。這是我了解的。我查過財務部的帳目，發現已經非常混亂。他們帳目雖然控制很嚴，但是因為數錢都數得很累，數錢的出入都很大。這是另外一個事實。

關於絕食團對物資的設置。物資的供應主要是王樹東他們財務部負責的。我在五月十七日以後跟王樹東接觸，但當時他的腦子已經不太清楚了，財務管得很緊，但已經出現混亂。王樹東負責財務，他負【以上第 178 頁】責批錢給那些管物資的同學。管物資的同學，有好幾個是從外地來的。一個重要的物資點也是在歷史博物館前面，由一個外地學生和北京經濟學院的在那裏負責。他們拿了一萬塊錢還是兩萬塊錢去買物資，然後送進廣場，另外就是收集運去的物資。這是我了解的。我查過財務部的帳目，發現已經非常混亂。他們帳目雖然控制很嚴，但是因為數錢都數得很累，數錢的出入都很大。這是另外一個事實。

我想提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北京市民對後援的聲援。當時北京市民已經開始有組織地進行聲援了。而且我記得，飛虎隊當時已經成立了。每天清晨很早的時候，很多市民有的騎著摩托，有的騎著自行車，有的蹬著三輪，給廣場送東西，然後繞廣場轉一周，高喊“學生萬歲”。這是我非常感動的幾個情節。我記得從十七日就開始了。

然後是醫療部門。我記得最早進廣場的醫療部門，是北京中醫學院、北醫大。他們先找到北大聯系，然後北大糾察隊幫助他們搞東西。另外，生命線的組織，我不太清楚內情，因為北大沒有負責生命線的建立。但我希望能知道一些生命線建立的細節，因為生命線當時對廣場很重要。我有點忘了。

北大指揮部建立的原因。指揮部建立並不是在廣場上另樹一個權力中心，而

是因為當時廣場上物資、糾察這些系統沒人管，北大為了理清這個系統，在這個上面建了一個廣場指揮部，負責統籌糾察、物資的供應，還有一些聯絡工作。

我剛才談到了校方的工作。北大有很強的實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大校方的支持。我們和校方談判了以後，從五月十五日一直到二十日，北大校方一直給北大籌委會派車，北大籌委會祇要一個電話打過去，車馬上就派來。所以北大籌委會在交通、運輸各方面沒有問題，而且還得到了校方一些物質援助。

另外就是教師聲援團。我再加上一個北大黨員教師絕食的事情。大概是在五月十五日晚上，為了聲援絕食的學生，北大黨員教師在觀禮臺上絕食。

另外就是北大絕食服務隊的事情，當時北大物資系統建立起來後，有一批學生自願地為絕食學生服務。他們給絕食同學每天早晨送去洗臉水，當時這種服務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他們不但照顧北大的同學，還附帶地照顧其它學校的同學。

還有一件小事，就是北大的老師在【以上第 179 頁】五月十六日晚上曾經借給北大籌委會二百多張床，由北大籌委會運到了廣場上，交給了北大和其他學校絕食的學生。這個床一直到六四屠殺以後一直沒有還給他們，成為我們自己遺下來的一筆帳。

另外就是北大絕食服務隊的事情，當時北大物資系統建立起來後，有一批學生自願地為絕食學生服務。他們給絕食同學每天早晨送去洗臉水，當時這種服務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他們不但照顧北大的同學，還附帶地照顧其它學校的同學。

還有一件小事，就是北大的老師在【以上第 179 頁】五月十六日晚上曾經借給北大籌委會二百多張床，由北大籌委會運到了廣場上，交給了北大和其他學校絕食的學生。這個床一直到六四屠殺以後一直沒有還給他們，成為我們自己遺下來的一筆帳。

再就是宣傳工作。絕食開始以後，大家主要的工作是在聲援絕食上面。五月十六日北大開始決定工作重心開始有轉移，繼續印刷各方面的傳單。當時印了很多這方面的傳單，有資料可查，我就不再多說了。好，我的發言完了。

另外，我希望梁二對高聯與師大後援的工作做一個補充，因為我看的這方面不太多。

【劉衛：五月十九日的復食那天晚上，我在湖南得到了二份電報，一封電報打到湖南省政府，是中共中央發的，當然是北京同學停止絕食。另一封是所謂的北京…

常勁：北大當時有三個電話：北大籌委會一個，廣播站一個，歷史博物館一個。歷史博物館與外界有單獨的聯系。

王超華：外地來電話有時我來接，給外地派電報估計是王志新做的。】

(2) 師大梁二

我要談的是常勁要我補充的問題，就是高聯和北師大在整個聲援中的作用問題。準確點說吧，絕食運動的發起，最初的一股前潮是在北師大首先發起的，是師大歷史系一個同學提出的。然後開希在各個地方大肆演講宣傳，說五月中旬民主運動的高潮尚未到來。我每次接在他後面給他擦屁股，說開希是個政治煽動犯，你們不要過分聽信他的言論，希望同學們保持冷靜一點。這就是說在師大一直有支持絕食和參與絕食的積極性。

第一個，同學的支持表現在當天的絕食活動是在師大集合，要求先在師大會師。然後師大沒參加絕食的同學制造了很多標志，打了很多口號，自發地組織起糾察隊員，護送絕食同學去天安門廣場，而且到了廣場後糾察線就布置在絕食團的外邊。後來我從閻明復的統戰部【以上第 180 頁】出來要進去的時候已經進不去了。

第一個，同學的支持表現在當天的絕食活動是在師大集合，要求先在師大會師。然後師大沒參加絕食的同學制造了很多標志，打了很多口號，自發地組織起糾察隊員，護送絕食同學去天安門廣場，而且到了廣場後糾察線就布置在絕食團的外邊。後來我從閻明復的統戰部【以上第 180 頁】出來要進去的時候已經進不去了。

第二個是青年教師的支持。絕食以後師大很多青年教師一下子冒了出來。我在師大主要和高新接觸了一下，當時實際上是在另一個老師（我不便說他的名字）的介紹下跟他接觸的。我跟高新接觸後感到很多老師都願意參與而且支持我們，有很多老師同時要求我們與校方進行談判。這個就引伸到下一步我與校長的談判。

我跟校長的談判從開希到廣場絕食之後一直在進行。我跟方物康、劉有餘，當時師大校長辦公室秘書長，交涉過多次，要求校方提供物質和精神的支持。物質上的資助包括車和糧食的問題，糧食主要是解決當時有很多外地進京的同學的食宿問題。師大安排了很多這樣的力量，因此外地來支援的同學有很多也是以師大為核心進行聯絡的。精神上的支持是在方物康校長妥協之後有一些老師就自發組織了一些教師自治會的組織，發表一些聲明，向學校提出一些建議啦，他們自己就開了一些會議。我大約在五月十六日晚上回了一次師大，正好遇到師大老師在開會。我就跟他們介紹一下廣場上學生的情況，也希望他們表示支持。

這個地方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超華剛才談的絕食團廣播站旁邊祇有她一個人堅持在辦公是不確切的。實際上我和少江在那也是比較堅持的，我跟少江一直在那。這裏面有兩個事實可以證實：一個是十七日的大游行。五月十七日大游行的發起人應該是北大的一些青年老師，還有法大的，總之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首先提出建議，就是既然絕食已到這個地步，我們應該掀起一個大規模的聲援活動，使絕食同學們在心裏感到一種支撐力，不至於有孤獨無援的感覺，也使政府在心裏感到害怕。還有一個是涉及到剛開始絕食不久擔心軍隊可能利用組

織性的力量進入廣場，悄悄地把絕食同學拖出廣場。當時超華到十二個知識分子那裏去也是有兩個作用：第一個要求他們勸勸學生；第二個也是防止警察可能在當晚鎮壓。在那時我們也考慮到這些情況，特別是少江，他也很積極支持五一七大游行。在北大教師提出這一決議時，我自己也贊同，而且當時就派了師大的聯絡員回校去通知，我自己也當晚回校去跟老師談了。第二天就有師大老師到廣場打出聲援的口號。到那個時候廣場人數陡然增加到近百萬人。

我覺得五月十七日大游行是相當值得一提的。當時有一個緊急情況是游行規模之大，廣場擠滿了人，擔心絕食同學受到衝擊，而且人【以上第 181 頁】群一直延伸到王府井外大街去了。這時北大一些老師提出有一部分學生已經排到王府井大街的街口了，擔心隊伍通過大街時造成混亂。因為王府井是商業街，怕暴徒和用心不良者打砸搶造成損失引起政府借口。所以我和少江派了天津大學的學生到王府井一帶去守住路口，不要讓游行隊伍從那裏走過。

我覺得五月十七日大游行是相當值得一提的。當時有一個緊急情況是游行規模之大，廣場擠滿了人，擔心絕食同學受到衝擊，而且人【以上第 181 頁】群一直延伸到王府井外大街去了。這時北大一些老師提出有一部分學生已經排到王府井大街的街口了，擔心隊伍通過大街時造成混亂。因為王府井是商業街，怕暴徒和用心不良者打砸搶造成損失引起政府借口。所以我和少江派了天津大學的學生到王府井一帶去守住路口，不要讓游行隊伍從那裏走過。

【第三個是關於五一七大游行時有一個“全市示威大游行總指揮部”，我想這祇是北大、師大學生散發的傳單上故意寫的，實際上並沒有實質性的指揮部。】

然後我要談到一點，在學生組織都前往廣場後，高自聯的成員基本上都到了廣場。五月十三日晚上從閻明復對話會場回來時我記得翟偉民、少江，我和超華也碰了一下頭。王正雲也在場，開希不在。開希已經成為絕食團代表，我就正式成為高聯代表。以前我祇是頂替身分，超華可以作證，就是開希不在我才能頂替。高聯常委自發地到了廣場，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比如外邊缺水、缺糧等問題往往找到我們。我自己則派師大的兩個部，一個是宣傳部，一個是聯絡部解決這個問題。

在廣場上堅持的那段時間一個香港同學找來聯繫時絕食團沒人理睬。當時我記得耀強是可憐巴巴地找到我，大概在十五日晚上，當時他進不了糾察圈，我去把他拖進來了。我自己都很难進糾察圈。我跟耀強談了一下，奠定了我成為外聯部長的基礎。

【封從德：還有後來南開等外地同學來了，有一次非常生氣，說我們這裏沒有被子，也沒有吃的。我們對外地同學照顧非常不好。】梁二：

【關於南開和天大的問題。剛才李錄談到遠遠不止一千多人絕食的時候，南開和天大在五月十四日已經開始絕食了。我曾經派人去，我自己也去勸說過南

開和天大，他們在廣場東北面布置下了絕食的陣營，要求絕食，我當時勸阻了，他們說反正沒飯吃，就絕食吧。這樣就提到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我當時在師大的權力已受到削弱，我聽程真說她在師大已經安排了許多學生宿舍，包括我自己的床位已經被兩個同學占領了。師大把到廣場去的那些學生的宿舍讓給外地學生住【以上第 182 頁】，而且師大直接跟校方聯系供給免費的飯食，這是比較重要的。其他有一些學校也做了同類事。】

【關於南開和天大的問題。剛才李錄談到遠遠不止一千多人絕食的時候，南開和天大在五月十四日已經開始絕食了。我曾經派人去，我自己也去勸說過南開和天大，他們在廣場東北面布置下了絕食的陣營，要求絕食，我當時勸阻了，他們說反正沒飯吃，就絕食吧。這樣就提到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我當時在師大的權力已受到削弱，我聽程真說她在師大已經安排了許多學生宿舍，包括我自己的床位已經被兩個同學占領了。師大把到廣場去的那些學生的宿舍讓給外地學生住【以上第 182 頁】，而且師大直接跟校方聯系供給免費的飯食，這是比較重要的。其他有一些學校也做了同類事。】

【梁二：師大在廣場上設立了五個帳篷。第一個帳棚我記得是陳長實和於軍兩人搭起來的，他們在廣場設立了師大宣傳部分部。後來這個宣傳部就獨立出來成了北師大宣傳部了，不受校自治會和北高聯的領導，也不受絕食團的領導。北師大中文系的同學一直找我們要錢，我們當然也給了。他們堅守陣地，超華去勸中文系轉移的時候就碰了釘子。六月四日清晨我去勸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堅持在帳棚裏不出來。後來我聽說坦克壓來的時候，他們在一秒之內一下就逃出來了，沒有一個同學因為還在帳棚內而被坦克壓翻在地。

糾察隊的作用。糾察隊長是張迎新，他曾經是師大學生會比較活躍的同學，他帶來一幫教育系的哥們在廣場上首先建立了一個糾察隊。後來擔任糾察隊第一屆還是第二屆的總指揮，戴著一個帽子。我們剛建立財物部的時候買了幾頂帽子，說祇有戴這這個帽子的人才能進入廣場的紀念碑第三層。他就在帽子上寫了“〇一”，也就是說一號。總之他比梁二還大一號。以後誰戴了這個帽子，誰就有權指揮整個糾察隊。所以以後每次糾察隊員找到梁二就問：“梁二，你是不是〇一？”我說：“我是梁二，不是〇一。”他在糾察隊中起到了幾個作用，處理了幾件具體的事。一個是絕食同學的安全保障問題；第二是在外圍組織市民。比如當時有些市民衝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東門，他就帶領糾察隊員做到了很好的調節作用，這個作用還是比較可貴的。

北大在絕食之後參加閻明復的對話，當時就提到，實際上是高新或是周舵當時給我講北高聯與官方的渠道的保持是相當重要的。後來閻明復在對話當中也提到這點。高聯在這個過程中就有一個廣泛保持與官方聯系的作用。當時比較

具體的幾件事是：與社會各界的聯系，主要是超華、邵江、梁二、鄭旭光在廣場上整夜整夜不停地與人辯論，沒有睡覺的機會的結果。這些人一見面就說是找高聯常委，找到高聯常委就發表政見。雖然我們沒有真正地把他們的意見收集起來執行，但至少滿足了他們的情緒上的願望。一些市民就覺得學生是可貴的，能夠聽進意見的，高聯常委還不錯。所以就繼續找，就越來越讓我【以上第 183 頁】們少睡一些。與官方的溝通方面第一是與統戰部的溝通，第二是和殘協的溝通，第三是與外交部一些官員的溝通。當時有一個外交官員曾經找到師大自治會，我跟他建立了一種很好的友誼。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四二六衝軍營的時候，他就頂著我的背。我也不知道他是躲在我後邊還是真是要給我一點力量。他還買了一百多個雞蛋捐獻給師大前邊衝軍營的幾個同學】

北大在絕食之後參加閻明復的對話，當時就提到，實際上是高新或是周航當時給我講北高聯與官方的渠道的保持是相當重要的。後來閻明復在對話當中也提到這點。高聯在這個過程中就有一個廣泛保持與官方聯系的作用。當時比較具體的幾件事是：與社會各界的聯系，主要是超華、邵江、梁二、鄭旭光在廣場上整夜整夜不停地與人辯論，沒有睡覺的機會的結果。這些人一見面就說是找高聯常委，找到高聯常委就發表政見。雖然我們沒有真正地把他們的意見收集起來執行，但至少滿足了他們的情緒上的願望。一些市民就覺得學生是可貴的，能夠聽進意見的，高聯常委還不錯。所以就繼續找，就越來越讓我【以上第 183 頁】們少睡一些。與官方的溝通方面第一是與統戰部的溝通，第二是和殘協的溝通，第三是與外交部一些官員的溝通。當時有一個外交官員曾經找到師大自治會，我跟他建立了一種很好的友誼。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四二六衝軍營的時候，他就頂著我的背。我也不知道他是躲在我後邊還是真是要給我一點力量。他還買了一百多個雞蛋捐獻給師大前邊衝軍營的幾個同學】

(3) 對話團沈彤

幾個事情，第一：大家知道軍隊進城的消息到底有多早？這裏好象有幾個版本：一個是十四日，一個是十六日，十七日和十九日。我發現大家看到的都自認為是全面的，但是實際上都是自己看到的，說明場面實際上是很大的。我在書裏面談到的在十九日對李錄的一些指責，現在看來也是我當時看到的一些情況，但是正是李錄沒有看到的情況。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這上面有一定矛

盾。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那次對話失敗後我們在第五會議室等著解決中央電視臺技術問題，重新再開始對話的時候，六局的一些人就對我們說，當晚十二點軍隊就開始進場清場，而且說開始從外面調軍隊。這是真是假我不知道。這事五月十四日晚上。超華曾經提到過的在五月十四日上午統戰部曾提到，你們也不用擔心了，肯定不會在廣場歡迎戈爾巴喬夫，也是屬實。我現在想起來了，我是中午和下午二、三點鐘時，和項小吉到統戰部安排對話現場，那時已經聽說。

另外一個是對話團在十六日的活動。超華剛才已經提到她曾經反映過廣場同學對對話團的反映，就是沒有參與感，絕食同學要求與對話團對話。超華提出這個問題後，還有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出來，我們與絕食同學沒有聯繫。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對話團主談代表及其他的一些代表基本上整天在統戰部，十六日的時候我們嚴重地分為兩派，一個是項小吉和另外四個主談代表，他們從五月十四日後對廣場非常失望。另一派主要是我、後來參加高聯的政法的張志清，還有“李鵬”熊焱等等，情緒已經變得很激動。這和我剛參加對話代表團時覺得應該是理性的組織完全不一樣。到那個時候，雖然對話機會在十五日、十六日時還可能存在，更重要的是我被絕食同學的行動，十六日有同學開始絕水了，感動了。所以覺得更應把自己 IDENTIFY，作為廣場主流【以上第 184 頁】運動的

一部分，而不是超脫的獨立的一部分。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從統戰部挽著手到新華門前靜坐。這是十六日，當時還傳我們發了死誓，廣場還傳了我們的宣言什麼，李錄收到的就是那個。正是那個時候，政治局加上鄧小平那六個人的會一直在開，對我們非常敏感。尤其是對對話代表團的代表，從上面來看好象是對話代表團的兩手：一手留在統戰部；一手是到新華門前放一個炸彈。我們在新華門前八個人我記得很清楚。我昨天已經講了，統戰部的人八次叫我回去，最後我不得不回到統戰部去。我知道有這麼重要的一個會，而且統戰部宋副部長一直在跟我們通消息。所以實際上十六日新華門前就散了，等於不了了之了。

另外一個是對話團在十六日的活動。超華剛才已經提到她曾經反映過廣場同學對對話團的反映，就是沒有參與感，絕食同學要求與對話團對話。超華提出這個問題後，還有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出來，我們與絕食同學沒有聯繫。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對話團主談代表及其他的一些代表基本上整天在統戰部，十六日的時候我們嚴重地分為兩派，一個是項小吉和另外四個主談代表，他們從

五月十四日後對廣場非常失望。另一派主要是我、後來參加高聯的政法的張志清，還有“李鵬”熊焱等等，情緒已經變得很激動。這和我剛參加對話代表團時覺得應該是理性的組織完全不一樣。到那個時候，雖然對話機會在十五日、十六日時還可能存在，更重要的是我被絕食同學的行動，十六日有同學開始絕水了，感動了。所以覺得更應把自己 IDENTIFY，作為廣場主流【以上第 184 頁】運動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脫的獨立的一部分。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從統戰部挽著手到新華門前靜坐。這是十六日，當時還傳我們發了死誓，廣場還傳了我們的宣言什麼，李錄收到的就是那個。正是那個時候，政治局加上鄧小平那六個人的會一直在開，對我們非常敏感。尤其是對對話代表團的代表，從上面來看好象是對話代表團的兩手：一手留在統戰部；一手是到新華門前放一個炸彈。我們在新華門前八個人我記得很清楚。我昨天已經講了，統戰部的人八次叫我回去，最後我不得不回到統戰部去。我知道有這麼重要的一個會，而且統戰部副部長一直在跟我們通消息。所以實際上十六日新華門前就散了，等於不了了之了。

十六日之後我就回家了，睡了兩個小時之後我知道了趙紫陽電視講話，講了很蒼白的一些話，其實就是那個政治局會議的結果。我就趕緊趕到廣場，在新華門口碰到王文和姓張的那個小護士，就是給你拿生理鹽水的。他們兩人哭著去衝中南海，結果被人家中南海門口的警衛弄到一邊去了。頭一天我跟社科院的老何和另外幾個主談代表曾經衝過中南海，跟他們打過一些交道，覺得他們無非是個紙老虎，所以我就帶著王文和那個姓張的衝進去了。所以十七日早晨新華門前又圍起了人而且一直沒散。後來政法的青年教師來了，在那裏絕食。

因為前一天超華的那些反映，還有前一天的會議情況，對話團所謂兩派的態度都轉變了。對話代表團從十七日上午開始列隊打了橫幅，帶上紅布條，轉到天安門廣場。

這時就是超華提到的清理紀念碑問題。當時高聯，我要說的你們現在有兩個高聯，高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是鄭旭光，他也認為自己是高聯最高領導。鄭旭光召開了高聯會議，就他一個人，還有另外一個我想不起來了，要求對話團派出五個人來參加高聯決策層，而且當時說可以給一個常委。第一件事情我說有什麼可以做的，因為當時所有聲援的人都站到紀念碑上面，我就說那我帶一批人把紀念碑清了，高聯把總部搬在紀念碑三層。這就是高聯後來的物資站什麼，超華他們後來搬著錢箱子過去什麼都是在那。鄭旭光上去了，沒人跟著他，又下來了。

當時我們積極參加到高聯裏面去，這對對話代表團來說已是很重要的決定了，就是放棄我們原來整個立場，加入到高聯裏面去。但高聯無非是鄭旭光，當然我現在知道有超華及其他一些人。所以我們就【以上第 185 頁】比較失望，

後來對話代表團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搬到離天安門廣場比較近的一個藝術院

校。這時候全市大游行已經開始了，就是五一七，我印象中這是整個運動中最大的一次游行。我記得有幅橫幅，從歷史博物館門口走過去，和整個天安門廣場一樣長了。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游行，包括小學生，幼兒園的也都游行。我們到那兒後對話代表團在我和項小吉作召集人之後第一次進行正式選舉，由各校代表團選出五人常委。

當時我們積極參加到高聯裏面去，這對對話代表團來說已是很重要的決定了，就是放棄我們原來整個立場，加入到高聯裏面去。但高聯無非是鄭旭光，當然我現在知道有超華及其他一些人。所以我們就【以上第 185 頁】比較失望，後來對話代表團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撤到離天安門廣場比較近的一個藝術院校。這時候全市大游行已經開始了，就是五一七，我印象中這是整個運動中最大的一次游行。我記得有幅橫幅，從歷史博物館門口走過去，和整個天安門廣場一樣長了。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游行，包括小學生，幼兒園的也都游行。我們到那兒後對話代表團在我和項小吉作召集人之後第一次進行正式選舉，由各校代表團選出五人常委。

其實從十七日離開廣場後我本人與決策層已沒有什麼關係了，但我不知道對話團外部形象到底怎麼樣，到後來聯席會議，在廣場上的三方“聯合會議”，都有我和項小吉的席位，又因為我本人在廣場實際上知道一些事情，就李錄和柴玲講的脈絡我補充一些我知道的不同情況。

(4) 知識界張伯笠

這前面有一個五一五大游行，當時趙瑜是總指揮，我是總糾察隊長，領導知識分子游行，到那後我和王魯湘宣讀的五一六聲明，然後大家講演。每個人講演說一句就重複一句，比方柯雲路講“沒有青年的國家尤其是沒希望的”，底下就重複“沒有青年的國家是尤其沒希望的。”然後就派了嚴家其、鄭義他們三位代表去看絕食團同學，這是一個事實。

還有一個遺漏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我們絕食影響非常大，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在十六日晚上到了廣播站，當時就我和郭海峰在，我們兩人接待的。當時嚴家其說“鄧小平辭職了，學生們你們非常偉大！”（封從德插：是他親口說的嗎？）親口說的。我們就感到非常振奮。說鄧小平他媽辭啦，這趙紫陽就勝了。當時是我和郭海峰在，郭海峰從監獄裏出來我們可以核實這個問題。當時我就說：“嚴先生，您這個消息準確不準確？”，他說絕對準確。這在當時帶來了判斷性的失誤，對我以後在絕食團的所做所為影響很大。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五一七宣言的問題。五一六聲明發表完了後，五一七嚴家其把宣言送到廣場，當時我、趙瑜、鄭義都在，讓我們簽字。趙瑜跟韓志紅

他們就簽了字，但是我說我要看原件。為什麼？五一六聲明完了，又出來五一七宣言，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原件拿來【以上第 186 頁】後我一看，說我不能簽名。為什麼呢？上面提到了打倒獨裁者。當時我就拒絕簽字，我說這個五一七宣言不代表全體知識分子的觀點。我們剛發表五一六聲明，那是代表知識分子觀點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五一七宣言的問題。五一六聲明發表完了後，五一七嚴家其把宣言送到廣場，當時我、趙瑜、鄭義都在，讓我們簽字。趙瑜跟韓志紅他們就簽了字，但是我說我要看原件。為什麼？五一六聲明完了，又出來五一七宣言，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原件拿來【以上第 186 頁】後我一看，說我不能簽名。為什麼呢？上面提到了打倒獨裁者。當時我就拒絕簽字，我說這個五一七宣言不代表全體知識分子的觀點。我們剛發表五一六聲明，那是代表知識分子觀點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趙紫陽到廣場那天的事情。我跟李錄，還有鄭旭光當時在。我們趕緊跑到車子那邊，可是他已經走了。很失望。走了以後，一個學生送給我們一個稿子，然後被搶丟了，以後通過回憶，然後寫的。我和鄭義就趕緊開始起草。起草的時候寫出了一個口號“鄧，李，楊反革命集團，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推翻了趙紫陽總書記。”是五月二十日的上午。“這個在廣播車上絕對有，這個原稿現在還在。我就補充這個重要事實。〈參：張伯笠 3.6.8 (1) 決定復食的背景〉

3.6.5 廣場廣播站（2）：絕食期間（張伯笠，白夢，王超華）〈參：封從德 3.3 廣場廣播站（1）〉〈參：楊濤*，白夢 4.8.4（3）廣場廣播站（3）〉

（1）廣播站與指揮車（張伯笠）

……當時我不想參加這個運動，第一次去了以後我就說，我不作為籌委會的，但是我作為監委，就是作調解人。後來因為我辦新聞導報，封從德就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名單貼到了三角地。張伯笠的名字就第一次出了三角地。所以，我就去找封從德，非常惱火，我說封從德，你幹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我說我不

想出來，他說你必須出來，因為在我後面，在我們班有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象蘇曉康、鄭義，他就在後邊給我們出主意，就是我跟他們聯系，然後把我們的觀點傳達給他們。

那天晚上，我去開五卅一六聲明的會議，起草那個文件。當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決定到廣場絕食。這時我們班趕緊寫了一個：壯士一去盼回還。我們還錄了一首詩，白夢還寫了、起草了《絕食書》。我們那首詩叫作“五月，警察最忙碌的季節，他們象蜘蛛一樣充斥在街衢上，煽動著羽翼，黑色的羽翼。”那首詩寫的非常好，是我朗誦的【以上第 187 頁】送走了以後，我們就舉行游行。游行以後，我就到了廣場，以後就是在廣播站，這個廣播站是封從德搞的。封從德說，“你來了，正好。王童就亂讀東西，逮著就讀。正好你來了，你可以審稿子。”這樣我就忙著審稿子，他任命我為廣播站的站長。

那天晚上，我去開五卅一六聲明的會議，起草那個文件。當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決定到廣場絕食。這時我們班趕緊寫了一個：壯士一去盼回還。我們還錄了一首詩，白夢還寫了、起草了《絕食書》。我們那首詩叫作“五月，警察最忙碌的季節，他們象蜘蛛一樣充斥在街衢上，煽動著羽翼，黑色的羽翼。”那首詩寫的非常好，是我朗誦的【以上第 187 頁】送走了以後，我們就舉行游行。游行以後，我就到了廣場，以後就是在廣播站，這個廣播站是封從德搞的。封從德說，“你來了，正好。王童就亂讀東西，逮著就讀。正好你來了，你可以審稿子。”這樣我就忙著審稿子，他任命我為廣播站的站長。

廣播站在那個時候是最感動人的。因為在第二天十七日早晨，北師大的廣播員播送了這樣一段話，這是我給他寫的，我記得非常清楚“今天是五月十七號，同學們早晨起來宣誓，“就是那種《讓世界充滿愛》的那個音樂，後來這個女播音員用一個非常委婉、柔和的聲音說：“這裏是絕食團廣播站，今天開始十七日的播音。現在我們已經有多少同學暈倒，被送進醫院？”這個聲音打破了清晨的寧靜，然後她說：“這是世界上，中國大地上第一個說真話的廣播站。”底下就掌聲雷動，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認為這個絕食團廣播站在絕食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不僅僅喚起了大家的凝聚力，使大家凝聚到一起，而且它在鼓動方面，在它的宣傳上，一步一步走的是非常穩健的。在絕食期間，很多激進的稿子，很多激進的文件，當時都不準播的。所以，有些人對我們也是非常有意見的，要衝廣播站，經常要奪廣播站的權。

我再講第二個問題，就是指揮車的問題。當時突然來了一輛車，我就說，這個車是否能作指揮車。那個司機，也不知道是誰派他來的。他說可以，你要用我就給你開過去。（柴玲插：不是，是我去調過來的。）開到紀念碑左側的時候，

封從德來了。我說，“咱們坐指揮車。”可是我們倆剛要往上搬東西的時候，清華大學廣播站周鋒鎖他們就把那些東西搬上去了。我說：“這是絕食團的指揮車，他們怎麼把那些東西搬上去？”他說：“我們這個做廣播站。”我說：“廣播站這個地方已經很好了。”然後那天封從德和他們打起來了，打得挺激烈，後來我就跟他們講道理。結果他們還是把車讓給了我們。這個指揮車在這裏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五月十八日大游行的時候，這個指揮車曾經開出了廣場。當時我們四個是抱著頭在指揮車裏邊商量下一步的情況。四個人在上邊站著，抱著。指揮車上的兩個廣播員一男一女，非常漂亮的兩個廣播員說“這是絕食團的指揮車。”底下就非常激動。這個指揮車從東轉到西，從西轉到東。那天我就看到了五月十八日大游行的場景，是非常激動人心的。然後我們就研究下一步怎麼辦。指揮車就是這樣的情況。〈參：封從德 3.3.3 兩站一車〉【以上第 188 頁】

(2-1) 絕食團廣播站（白夢）

我首先就廣場廣播站的情況從頭到尾做一個專題。

我個人是在五月十三日，絕食的當日跟張伯笠一起到了天安門廣場。五月十四日晚上，我又從北大趕到了廣場。但是緊接著又被兩位作家叫回北大，說要組織第二天的五月十五日北京知識界的大游行，我又回到了北大去搞這個游行。五月十五日下午游行完了以後，五月十五日下午我就留在廣場。

當時廣場廣播站是由張伯笠負責，我剛好去得也非常及時，因為張伯笠很忙，跑來跑去的，說“白夢，你就來當編輯吧。”我說，“好，我就當編輯。”我就在那負責審稿，從五月十五日下午、晚上，一直到五月十六日，我一直在負責審稿。當時的情況的確是非常亂。因為廣播站建立不久，各種制度也沒有。封從德永遠都是本性難改的老毛病。本來讓張伯笠負責了，他又回來，搶過話筒就講，“誰都得聽我的。”就是處於這種情況。我當時感覺非常亂，誰也來講話，任何人都可以講。王童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敬業的一位。但是這個人沒有紀律性，他是什么稿子都念。從來都不放下話筒，誰跟他奪話筒，他就跟誰翻臉。（封從德插：但他聲音最好。）對，他的聲音最好，他播得最有感情。但是他一來稿子就搶，根本就不管，任何稿子都播

我當了一天多的審稿，因為當時張伯笠有點野心，想往上爬，他就四處跑，老不在那，一會兒找這個，一會兒找那個的。封從德也四處亂跑。所以從五月十六日開始，張伯笠在離開的時候，說“在我離開這段，由白夢全權負責。”這樣就給廣播站人一個印象，好象我在那負責。實際上我並不是負責，他沒有正式任命我，我是臨時在那裏審稿。因為你們都不在，而我個人認為這個部位非常重要，因為許多重要的命令，許多情況都在這裏發布，發布錯了，後果非常嚴重。所以五月十六日中午，我就對廣播站的整個機構定了一套制度，審稿制度。因為當時的廣播站是二十四小時通宵播音，（插話：不是。）不，不，我跟你講，中間有很少的停頓，晚上停頓的時間最多可能有三個小時。本來規定好的晚上不播音，讓絕食的同學們休息。但這個規定沒有辦法執行，往往被臨時來的一些情況打斷，還是開機。晚上斷斷續續的幾乎沒有一段整個的時間停機讓大家休息。

【以上第 189 頁】

在這個時候，我就制定了一套制度，也把廣播站的人員編制初步做了一個規定，我希望能夠穩定。因為人員流動性非常大，一會兒他來了，一會兒你來了，工作起來非常不方便，所以當時我搞了一個名單，我這次把原件帶來了，這

是一個手刻的印刷的名單。當時的名單是，總負責人封從德，張伯笠；總編是我；還有王童、鄭義和北明等。我當時把整個人馬分成兩班，一班是從凌晨五點鐘到下午三點鐘；另一班從下午三點鐘接班到晚上兩點鐘。晚上有三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基本上做二十一小時的播音工作。這個文件原件我這次帶來了。這個文件是五月十七日早上，我委托旁邊的宣傳處，油印的那地方印了二十份。我給工作人員每人發了一份，這中間有播音員是誰，編輯是誰，審稿是誰，聯絡是誰，規定得清清楚楚。各自遵守自己的職責，輪流換班，人也基本上穩定下來了。這是五月十七日的一個基本情況。在這幾天廣播站整個秩序穩定下來，我唯一沒法制止的就是封從德和張伯笠。

在廣播站這段時間，也許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我記得從全國各地收到的電報可能平均每天三百份。我請資料整理員每天把電報整個收集起來，讓他選十份最好的，最重要的在廣播上播出。當時廣播稿子主要來源是各界的聲援信，各界對絕食同學的關懷，還有各界名流紛紛來廣播站發表他們個人的一些感想。實際上，感想千篇一律，就是祖國到了最危難的時候，同學們在這裏絕食已經這麼久了，我們也不得不站出來了。我記得有一天上午，我光安排這個就安排了十個人左右，都是各界名流，包括民盟的一些領導，我記得非常清楚，中央美術學院院長靳尚誼，都是這一級別的人。

後來我就接到很多同學非常反感的意見，說“我們在絕食以前希望有知識界的支持，但知識界沒有人說話。現在運動變成全國性，他們就都來了。白夢你把廣播站變成名人展覽館了。”非常尖銳的意見。所以從這個時候，我就盡可能地削減名人表態這一方面的東西。

【封從德：白夢說“名人展覽館”，我認為當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讓那麼多“名人”來演講的話，怕影響絕食同學的情緒。情緒激動，健康就有影響。這是醫生提的建議。】【以上第 190 頁】

(2-2) 兩個廣播站并立

我剛才講的這個廣播站，是絕食團廣播站，是在籬笆邊，華燈下。五月十七日又產生了另一個廣播站，是清華廣播站，就是“學運之聲”廣播站，在紀念碑的南側，就是紀念碑下面的那個廣播站。（封從德：是五月十六日。）這個廣播站產生以後，兩邊對著廣播。我當時請封從德去交涉，封從德去過，但後來沒有給我講情況。後來，我也去過兩次，都不讓我進。有一次我進去了，碰到了張銳。我跟張銳在廣場上的矛盾也就從這時開始。張銳非常蠻橫無理地說，你們應該停播。我當時希望我們各自播一段時間。因為說實在的，他們那裏作為北高聯的基地，我們這裏作為絕食團的基地，雙方在意見上是有不同的，在許多問題上可能也有一些爭論。這樣兩個廣播站代表兩個組織，如果單方面地要求對方停，這是不太可能的。我當時要求張銳，我們可以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播音，在那段時間你們播音，這樣就不發生太大的衝突。同學們的意見也很大，在很近的範圍內，兩個廣播站同時廣播，他們哪方面也聽不清，而且吵得頭昏腦脹。但是我們的建議被他們嚴厲拒絕，他們甚至連我的意見都不願意聽。我就非常失望地回來了。

我去過兩次，到第二次去時，清華這個廣播好象還是周鋒鎖負責，但是的確有張銳，還有清華大學一個女同學，她說她是臺長，張銳說“我是總負責人，你有什么跟我講。”我知道的清華廣播站，就是學運之聲廣播站的負責人就是這

三位。〈參：4.8.4 (3) 廣場廣播站 (3)：後期的變故〉

五月十九日，王丹在“學運之聲”突然發表講話，他用大功率喇叭對著我們這邊說，“我是王丹”，他認為這邊是北大的廣播站，“我希望北大的同學能夠停止廣播。否則，我們將採取行動。”他在底下曾經給我打過一次招呼，但是，我不太同意。當時我沒法準確認定，王丹是屬於絕食團的，還是屬於北高聯的，我沒法確認他的定位問題，所以他跟我打招呼，我沒有同意。我就不明白這個行動是什麼意思？對，他還講了要採取行動。我想找王丹商量，跑過去，沒有找到王丹。後來，我還是讓這邊的停下來了。停了大概六、七個小時。但是下面的人不願意，說“他們能廣播，我們也能廣播。”所以，又打【以上第 191 頁】開播

了。這兩個廣播站對著廣播還是持續下去了。王丹也就沒有太多的幹預。

五月十九日，王丹在“學運之聲”突然發表講話，他用大功率喇叭對著我們這邊說，“我是王丹”，他認為這邊是北大的廣播站，“我希望北大的同學能夠停止廣播。否則，我們將採取行動。”他在底下曾經給我打過一次招呼，但是，我不太同意。當時我沒法準確認定，王丹是屬於絕食團的，還是屬於北高聯的，我沒法確認他的定位問題，所以他跟我打招呼，我沒有同意。我就不明白這個行動是什麼意思？對，他還講了要採取行動。我想找王丹商量，跑過去，沒有找到王丹。後來，我還是讓這邊的停下來了。停了大概六、七個小時。但是下面的人不願意，說“他們能廣播，我們也能廣播。”所以，又打【以上第 191 頁】開播了。這兩個廣播站對著廣播還是持續下去了。王丹也就沒有太多的幹預。

【封從德：兩個廣播站之間有協調聯絡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一直互通消息。發電機是“學運之聲”請市民捐的，還捐了很多被子、大衣。說好了請市民在大衣裏寫上紙條，以後可以還回去。後來我們搞得很糟糕，一個沒還。】

(3) 介入“學運之聲”廣播站 (王超華)

【封從德：超華你多次提到對絕食團廣播站的宣傳內容有想法。具體的想法是什麼？

王超華：最開始的想法是，覺得它不能反映整個廣場。我和白夢曾經談過，他說我們就是對絕食團同學的。結果高聯想對廣場上大多數人作宣傳的時候沒有工具。還有內容上，我和鄭旭光曾經討論過，早晨是人最少的時候，廣播的內

容是悲憤的，近乎絕望，下午支援的人都來了就是高亢。老這麼忽高忽低的發高燒的話，沒有辦法搞。】

關於“學運之聲”廣播站的事情，很遺憾，劉祥和張銳都沒有來。當時高聯最苦惱的是任何一個廣播站都插不進去。我坐守這個，又坐守那個，主要目的是與廣播員直接協調關係，他們信任我，我交什麼他們能幫我廣播。事實上後來我在“學運之聲”那邊關係比較好，鄭旭光他們幾個也坐在那裏休息了。祇有二十日以後，因為廣播站他們沒有辦法組織力量對付戒嚴，才把廣播權交給高聯。但是在吾爾開希說撤到使館區去以後馬上就奪回去了，他們說：就知道廣播站交給高聯沒有好事。所以又變成祇有我個人簽條才給廣播的這種情況了，他們對其他人又不信任了。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情況。非常遺憾，當時竟然有這麼大矛盾。

再有一個是關於當時鄭旭光主持召開高聯會議，就我印象而言，在十四日對話失敗之後，我、梁二、邵江，還有鄭旭光，加上翟偉民，我們幾個是經常見面的，但是很難說有正式的高聯常委會。在這之後我就變成我個人碰到什麼事就做什么事，因為那會兒不斷地各界都【以上第 192 頁】來找人。這也是“學運之聲”接受我的一個原因，同絕食團接受我的原因非常類似，就是一有人來找，問有常委在嗎，有緊急消息，他們就說不要讓那個人進廣播站，王超華出去應付這個事去。我在那基本上做後來指揮部秘書處所做的那些事情。

再有一個是關於當時鄭旭光主持召開高聯會議，就我印象而言，在十四日對話失敗之後，我、梁二、邵江，還有鄭旭光，加上翟偉民，我們幾個是經常見面的，但是很難說有正式的高聯常委會。在這之後我就變成我個人碰到什麼事就做什么事，因為那會兒不斷地各界都【以上第 192 頁】來找人。這也是“學運之聲”接受我的一個原因，同絕食團接受我的原因非常類似，就是一有人來找，問有常委在嗎，有緊急消息，他們就說不要讓那個人進廣播站，王超華出去應付這個事去。我在那基本上做後來指揮部秘書處所做的那些事情。

李錄：“學運之聲”廣播站是怎麼建起來的？

王超華：清華同學建的。我判斷是五月十五日早上建立的，陸明

霞說絕食團廣播站幹擾絕食同學休息。因為十五日夜裏，北高聯已經從絕食團廣播站外牽到外邊去了，而“學運之聲”廣播站這件事，是我還在裏邊的時候。

封從德：為什麼又建了一個廣播站？

王超華：沒有什麼為什麼，就好象為什麼北大就建了個廣播站一樣。

柴玲：北大是為絕食團。

王超華：當時也沒有說是絕食團的廣播站呀。

柴玲：不對，不對。

王超華：因為，它最頭疼的是，每天一開廣播，就宣稱是獨立於任何政治團

體，包括學生的。

李錄：北高聯與“學運之聲”廣播站是什麼關係？

王超華：開始的關係還不如跟你們好，跟你們還認識呢。後來，我送了幾篇稿子之後，他們就認得我了。

梁二：“學運之聲”廣播站最初叫“清華之聲”，最早出現是在十五日上午，是清華張銘組織的。他在籌建過程當中，實際還拉上了高聯的成員。後來，在十七日買線和買喇叭，擴大廣播，為嚴明復來廣場做準備，她也參與了：超華從絕食團借了五千元，就是為了做準備。另外，鄭緒光曾經帶糾察統治了“學運之聲”廣播站達兩天之久。【梁二：關於“學運之聲”廣播站我想起一個事，在閻明復到廣場之前我們剛好在買線、買喇叭建廣播站。我覺得有必要補充一下。】【以上第 193 頁】

3.6.6 五月十八日

【封從德：五月十八日在廣場上，好象是程真，來問要不要去對話。我說廣場上要轉移，事情很重，去不了。對程真的印象我開始以為她是開希的秘書。】

【梁二：程真主要是在四月二十六日大遊行時跟我和開希走在一塊兒，後來她覺得自己願意投身到學運中去，而且願意為學運辦一些事。當時秘書處正好缺人，所以我們就吸收她到秘書處給開希當筆錄員。後來她自己起的作用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這個作用。她在後來主要與王文一起發起絕食，這個她起了很大的作用。實際上在那個時候她與開希地位相當，已經成為絕食同學代表。】

【張伯笠：撤向客車那天，李錄說的情況我就不再補充。後來我們，封從德、柴玲、李錄、郭海峰，聯系大客車。當時我們要一百二十輛，後來到了八十輛。那天李錄暈倒了，柴玲身體很不支，說話聲音已經嘶啞了，我是臨危受命，因為我說話聲音比較大，作為臨時總指揮，所以那天是我指揮撤離的。那時廣場上人山人海，怎麼撤出去是個危險，衝擊到絕食同學怎麼辦？絕食同學被衝倒了就可能出問題。所以一再要求同學們拉成警戒線，同學們非常自覺地拉成了警戒線，我就帶著隊伍一個客車一個客車的按排。我記得當時所有的同學進入客車的時候都流著淚。

關於王文被選出絕食團。王文在我參加以後一直是絕食團的常委，直到十八日我們在大客車開了一個會議，我們選舉大家投票把王文選出常委。王文被選出後，一直不交權，他所謂的權就是一個聯絡圖。其實這聯絡圖我也有，他一看就沒辦法了，就說“沒有王文就沒有絕食，你們把我選出來是沒道理的。”】

【封從德：五月十八日避雨車的事情，我做一點補充。剛才大家已經講的很多，當時是柴玲在廣播上好象不是在絕食團廣播站，而是在“學運之聲”廣播站，封了張伯笠。做這個調度臨時總指揮。記得當時他畫了這麼大一張紙牌挂在胸前就去赴任了。上午赴任，到了大概中午將近十一點的時候伯笠就倒下了。倒下的還有郭海峰，他也做了【以上第 194 頁】很多具體的事情。當時好象都倒下

了，這個牌子就接到了我這裏，我也挂到胸前面。我跑到北面去就看見了這些車，郭海峰已經調了過來。當時正好有一個天津來的小汽車，我就用這個小汽車

作為我的指揮車到處轉，到處去調用很多其它學校，其它單位來的車。“北航”的公共汽車也調進了廣場。當時做了這麼一些事情，但是效果不太大。

【封從德：五月十八日避雨車的事情，我做一點補充。剛才大家已經講的很多，當時是柴玲在廣播上好象不是在絕食團廣播站，而是在“學運之聲”廣播站，封了張伯笠。做這個調度臨時總指揮。記得當時他畫了這麼大一張紙牌挂在胸前就去赴任了。上午赴任，到了大概中午將近十一點的時候伯笠就倒下了。倒下的還有郭海峰，他也做了【以上第 194 頁】很多具體的事情。當時好象都倒下了，這個牌子就接到了我這裏，我也挂到胸前面。我跑到北面去就看見了這些車，郭海峰已經調了過來。當時正好有一個天津來的小汽車，我就用這個小汽車作為我的指揮車到處轉，到處去調用很多其它學校，其它單位來的車。“北航”的公共汽車也調進了廣場。當時做了這麼一些事情，但是效果不太大。

然後，記得就在當天晚上在指揮車上，我們常委還開了個會。當時王文也在，柴玲說他是個小孩子，王文非常不高興。會上大家提議是不是絕食領袖復食。王丹說他不能。然後就是十八日晚上在指揮車上，我因為痙攣被送到了北大醫院，不是北京大學的醫院，而是叫北大醫院。在醫院也發現一些同學拒絕進食。】

【張倫：據楊朝暉說是他去汽車幾場聯繫大客車的，你剛才講是郭海峰。】

3.6.7 復食決定是怎么作出的？<參：李錄 3.5 復食>

(1) 決定復食的背景（張伯笠）

我重點講關於復食的決定。復食是怎么回事呢？當時絕食已進行到了第七天。這天下午大概四點鐘，我不知道柴玲去哪兒了。封從德也不在，他那天住院。李錄我們倆正在那坐著，商量事呢，就來了一個人。（柴玲插：這是十幾日？）十九日下午。有兩個知識分子找我，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到民族文化宮。你必須去，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我就被他們攙到那兒，拽著，跑得非常快，我已經跑不動了。到那以後我發現幾乎有五十多個知識分子。他們就說：“張伯笠，你來了，非常好。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今天晚上十二點就要宣佈戒嚴了。我們的意見，同學們絕食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生命已經有危險。而且我們應該主動地復食，使政府沒有進京的機會。”確實當時是這樣說的。當時我考慮以後，說：“我同意，但是我要回去做工作。首先我要把指揮部這幾個人的工作做通，然後我才能開會。你們馬上起草復食宣言。你們要

起草得有理有據。我們復食並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改換一種鬥爭方式。”（王超華插：【以上第 195 頁】幾點鐘？）大概已經下午六點了。我回到指揮車的時候就跟李錄首先把這個問題談了，李錄當時同意我的觀點。然後我又跟柴玲把這問題談了，柴玲也同意我的觀點。我當時非常奇怪，他們是非常快地同意了我的觀點。然後主持會議的這個責任就放在我的身上了。就是一個大客車，調糾察隊把大客車包圍起來。當時我告訴糾察隊：別讓吾爾開希進來。當時確實是這麼告訴的。為什麼不讓吾爾開希進來？因為我覺得吾爾開希愛激動，他的影響力還特別大。他一講話這個事能不能做成很難說。圍上以後，我就講了這情況，沒有講戒嚴，沒有暴露這個戒嚴，就講，我們同學已經絕食七天七夜了……（柴玲插：六天了。）已經六天了，生命已經到了極限。如果再絕食下去，要死人。我們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希望大家能夠冷靜下來。我希望復食。然後我又指了幾個人，這幾個人都是事先串聯好了的，有清華大學的代表，有北大的楊濤。說完大家投票。通知了二百多人，一百七十三票贊成，二十八票反對，七票棄權。

我重點講關於復食的決定。復食是怎么回事呢？當時絕食已進行到了第七天。這天下午大概四點鐘，我不知道柴玲去哪兒了。封從德也不在，他那天住院。李錄我們倆正在那坐著，商量事呢，就來了一個人。（柴玲插：這是十幾日？）十九日下午。有兩個知識分子找我，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到民族文化宮。你必須去，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我就被他們攙到那兒，拽著，跑得很快，我已經跑不動了。到那以後我發現幾乎有五十多個知識分子。他們就說：“張伯笠，你來了，非常好。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今天晚上十二點就要宣佈戒嚴了。我們的意見，同學們絕食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生命已經有危險。而且我們應該主動地復食，使政府沒有進京的機會。”確實當時是這樣

說的。當時我考慮以後，說：“我同意，但是我要回去做工作。首先我要把指揮部這幾個人的工作做通，然後我才能開會。你們馬上起草復食宣言。你們要起草得有理有據。我們復食並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改換一種鬥爭方式。”（王超華插：【以上第 195 頁】幾點鐘？）大概已經下午六點了。我回到指揮車的時候就跟李錄首先把這個問題談了，李錄當時同意我的觀點。然後我又跟柴玲把這問題談了，柴玲也同意我的觀點。我當時非常奇怪，他們是非常快地同意了我的觀點。然後主持會議的這個責任就放在我的身上了。就是一個大客車，調糾察隊把大客車包圍起來。當時我告訴糾察隊：別讓吾爾開希進來。當時確實是這麼告訴的。為什麼不讓吾爾開希進來？因為我覺得吾爾開希愛激動，他的影響力還特別大。他一講話這個事能不能做成很難說。圍上以後，我就講了這情況，沒有講戒嚴，沒有暴露這個戒嚴，就講，我們同學已經絕食七天七夜了……（柴玲插：六天了。）已經六天了，生命已經到了極限。如果再絕食下去，要死人。我們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希望大家能夠冷靜下來。我希望復食。然後我又指了幾個人，這幾個人都是事先串聯好了的，有清華大學的代表，有北大的楊濤。說完大家投票。通知了二百多人，一百七十三票贊成，二十八票反對，七票棄權。

這個決定作出來以後，吾爾開希就闖進來了。帶著三個醫生，四個護士，衝破了三道糾察隊封鎖線，闖進了大客車。衝進來以後說：“這麼重要的會議為什麼不讓我參加？”這時候我們已經做出決定。我說：“好，吾爾開希來了。你不是絕食團的領導，你祇能代表一票。”我說你可以投。他問是什麼事？我說我們現在已經做出決定，就是準備復食。吾爾開希當時就舉手說：“我同意。”我說：“那好。散會，趕快散會。”

下了客車以後，鄭義就把復食宣言交給了我。這次起草得非常好，非常完整，而且有條理。我就交給了柴玲。我說你來主持今天的復食。在復食之前，李錄負責安排，把絕食隊伍安排得井井有條。在指揮車四外邊，做得非常好。李錄主持，說你們都坐好。這時候，柴玲就宣佈，復食。宣佈完復食，底下就炸了。當時那種情況非常可怕。說你們出賣了我們絕食的同學。（柴玲插：祇有一部分人這麼講。）但是聲音很大。我非常清楚。李錄站到車上邊去了，拿著麥克風說：“大家靜下來！”可是這個車已經被推得晃了，就要推翻了。（柴玲插：他怎麼會站到上邊呢？有這回事嗎？李錄插：他這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真實的。（大家笑）這個時候封從德闖了進來，說：“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決定？你們是出賣學生運動，出賣絕食。”他非常激動，然後就搶麥克風，說：“同學們，剛才那個決定是無效的。【以上第 196 頁】”（柴玲插：他沒有搶成。）

下了客車以後，鄭義就把復食宣言交給了我。這次起草得非常好，非常完整，而且有條理。我就交給了柴玲。我說你來主持今天的復食。在復食之前，

李錄負責安排，把絕食隊伍安排得井井有條。在指揮車四外邊，做得非常好。

李錄主持，說你們都坐好。這時候，柴玲就宣佈，復食。宣佈完復食，底下就炸了。當時那種情況非常可怕。說你們出賣了我們絕食的同學。（柴玲插：祇有一部分人這麼講。）但是聲音很大。我非常清楚。李錄站到車上邊去了，拿著麥克風說：“大家靜下來！”可是這個車已經被推得晃了，就要推翻了。（柴玲插：他怎麼會站到上邊呢？有這回事嗎？李錄插：他這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真實的。（大家笑）這個時候封從德闖了進來，說：“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決定？你們是出賣學生運動，出賣絕食。”他非常激動，然後就搶麥克風，說：“同學們，剛才那個決定是無效的。【以上第196頁】”（柴玲插：他沒有搶成。）

他說“我現在建議重新開會。各個高校代表請到高校指揮車下邊集合。”柴玲就跟他吵起來了，柴玲就哭了，我記得柴玲嚎陶大哭。（柴玲插：沒有。）然後李錄在那也不吭氣。我到車上以後，因為當時開新聞發布會，我就告訴北大那個管麥克風的人說：“你掐斷”。他就把它掐斷了，聲音就出不去了。然後我就說：“封從德，你是副總指揮，是常委。我們剛才做的那個決定，你說我們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那麼你符不符合民主程序呢？因為我們，柴玲，包括郭海峰，這是常委多數，我們開會研究過。那麼你今天沒有經過我們這些常委開會就自己在這兒決定，你首先違反了民主程序。那現在我就提議罷免你副總指揮的職務。”我說大家都在，可以投票。我記得柴玲、李錄、郭海峰當時都舉了手。封從德就把麥克風一摔說，我不用你們罷免，我辭職。他走了。

然後馬上又趕快到紀念碑底下宣佈一次。就是紀念碑底下那個廣播電臺。當時紀念碑那兒不讓我進去。後來也不知誰給我講了情，說很重要，就進去了。然後是邵江，那個挺黑的大個兒，他說很重要，趕快到歷史博物館前面去。那兒有一個熱線電話，立刻傳給中央。

他們三個人架著我到那去。我看見當時有新華社兩個記者和人民日報一個記者。我把電話拿起來就接到了國務院值班辦公室，就是值班，每天接我們的消息。我說：“現在我們宣佈復食。”“為什麼復食？”我就把整個復食書、復食宣言向他們讀了一遍。我說你可以記錄。他說，“我不用記錄，我有錄音。”他問：“你叫什麼名字？是什麼職務？”我說“我叫張伯笠，是絕食團副總指揮。”報告完了以後，回到紀念碑底下，就開始籌備那天晚上的新聞發布會。到十二點鐘，天安門的全部廣播就響起來了，開始宣佈國務院第一號戒嚴令，全場就沸騰了。然後廣播車開出去唱國際歌了。這時候我們開到了南邊，就是紀念碑北側生命線那個地方，當時因為別的沒有任何地方了，就開到生命線。由李錄、陳明遠我們三個主持這新聞發布會。

當時新聞發布會是我先講，我非常激動，流著眼淚，已經哭了。我受不了戒嚴這個東西。當它突如其來的時候，我看大家都憤怒了，失去了所有的理智了，就要跟他們幹了，拼了。那時候我也受不了，那是我主持的，我的手是顫抖的。因為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可能要說錯，所以我就讀了這個復食宣言，是讀的。讀了以後，記者就提問【以上第 197 頁】題，說“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張伯笠。然後我說，現在絕食團指揮部號召廣場上二十萬大學生，其實我想說集體靜坐，但是我說錯了，我說了集體絕食。這個責任是我的，因為這造成了許多外電的報道。後來，李錄就在後邊捅我。我就明白了，我說：我更正，我剛才說錯了。我們是集體靜坐，不是集體絕食。然後，陳明遠接著講。別人就問他：你是幹什麼的？他說我是絕食團的顧問，我叫陳明遠。然後他就講，李錄又做了補充。這個新聞發布會就算結束了。

當時新聞發布會是我先講，我非常激動，流著眼淚，已經哭了。我受不了戒嚴這個東西。當它突如其來的時候，我看大家都憤怒了，失去了所有的理智了，就要跟他們幹了，拼了。那時候我也受不了，那是我主持的，我的手是顫抖的。因為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可能要說錯，所以我就讀了這個復食宣言，是讀的。讀了以後，記者就提問【以上第 197 頁】題，說“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張伯笠。然後我說，現在絕食團指揮部號召廣場上二十萬大學生，其實我想說集體靜坐，但是我說錯了，我說了集體絕食。這個責任是我的，因為這造成了許多外電的報道。後來，李錄就在後邊捅我。我就明白了，我說：我更正，我剛才說錯了。我們是集體靜坐，不是集體絕食。然後，陳明遠接著講。別人就問他：你是幹什麼的？他說我是絕食團的顧問，我叫陳明遠。然後他就講，李錄又做了補充。這個新聞發布會就算結束了。

我在大陸的時候，聽到他們說了。他們說，他們極早地得到了中央的通知，趙紫陽的通知……（柴玲插：對，這是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當時有一個重要人物，一直在廣播車。他也告訴我關於戒嚴的問題。當時的復食就針對戒嚴，讓你沒有借口戒嚴。當時有幾個知識分子在身邊就給我們充當秘書，反正你要起草什麼，立刻就給你拿出來。我覺得這些知識分子始終是不圖名不圖利，一直在那兒，連一個通告都要由他們來寫。當時我們的復食宣言中有重要的一條是說：十九日凌晨趙紫陽總書記到廣場看望了同學。我們的復食表面上沒有針對戒嚴，因為我們假裝不知道戒嚴，但是我們復食是跟趙紫陽到廣場上來有關係。

【白夢：五月十七日上午，有個人來廣播站，自稱是趙紫陽的秘書，非常明白地暗示：趙紫陽將下臺，希望學生支持。十七日下午，趙瑜突然來告訴我：局勢已定，趙已下臺。我當時就暈了。我在醫院裏呆了幾個小時，回來就寫了一篇社論，說我們支持趙紫陽。

李錄：那你把這事都告訴誰了？

白夢：我自己處理了。】

(2) 知識界得到的消息（老木）

我講一下當時絕食之後我們知識界的一些活動，比如五一六宣言的事情。當時我們就是想如何盡快結束絕食的問題，因為我們覺得已經是不正常的情緒了。當時就是進不去，也找不到辦法來結束絕食，我們在勞動文化宮門口已經徘徊大概有兩、三天。那天下午，大概是五月十九日下午兩點多鐘，來了一個朋友，帶來一個消息，這個消息【以上第 198 頁】是最機密的一個消息。當時我們進去要找學生領袖，就去找了北高聯，北高聯派出兩個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誰。最後密談半天他們說作不了決定，我們說你們真正的領袖是誰？他們說真正的領袖不在，都在統戰部對話。我們說這不行，就想進去，這個警戒線是完全進不去的。我當時帶了工作證和記者證，以採訪的名義進去。進到了絕食團的廣播車裏，我當時的印象就是柴玲坐在裏面，張伯笠坐在裏面。就是五月十九日下午，我進去了就直搗說這消息。我說今天晚上軍隊可能進城，而且是戒嚴。當時我記得柴玲是非常慌張，（柴玲：不對吧。）然後就喊，趕快叫人來開會，李錄當時又不在了。然後當然沒有我的事了，開會與我無關，我就走了。但我後來又進去了一次。你們當時正在開會，把這個車圍住了。我找到張伯笠，在後面坐了一會兒，與陳後哲、鄭義他們聊聊天，然後就離開了。那天下午大概就是這個情況。我當時的印象覺得你們完全沒有準備，就這麼一個狀態，對軍隊要進城全無心理準備，非常慌張。

我講一下當時絕食之後我們知識界的一些活動，比如五一六宣言的事情。當時我們就是想如何盡快結束絕食的問題，因為我們覺得已經是不正常的情緒了。當時就

是進不去，也找不到辦法來結束絕食，我們在勞動文化宮門口已經徘徊大概有兩、三天。那天下午，大概是五月十九日下午兩點多鐘，來了一個朋友，帶來一個消息，這個消息【以上第 198 頁】是最機密的一個消息。當時我們進去要找學生領袖，就去找了北高聯，北高聯派出兩個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誰。最後密談半天他們說作不了決定，我們說你們真正的領袖是誰？他們說真正的領袖不在，都在統戰部對話。我們說這不行，就想進去，這個警戒線是完全進不去的。我當時帶了工作證和記者證，以採訪的名義進去。進到了絕食團的廣播車裏，我當時的印象就是柴玲坐在裏面，張伯笠坐在裏面。就是五月十九日下午，我進去了就直接說這消息。我說今天晚上軍隊可能進城，而且是戒嚴。當時我記得柴玲是非常慌張，（柴玲：不對吧。）然後就喊，趕快叫人來開會，李錄當時又不在。然後當然沒有我的事了，開會與我無關，我就走了。但我後來又進去了一次。你們當時正在開會，把這個車圍住了。我找到張伯笠，在後面坐了一會兒，與陳俊哲、鄭義他們聊聊天，然後就離開了。那天下午大概就是這個情況。我當時的印象覺得你們完全沒有準備，就這麼一個狀態，對軍隊要進城全無心理準備，非常慌張。

（3）趙紫陽到廣場與決定復食（柴玲）

我自從在四月二十八日見到李錄以後，他經常帶來一些非常好的消息。然後我們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其間大家都保持密切聯絡，包括五四游行等等。五月十三日見到他以後，他基本上屬於外圍的。我們絕食中一些後勤的事由籌委會管，外聯、內部消息及整個上層動向由李錄在負責。我記得五月十四日傍晚的時候李錄來到廣場，說他看了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談判的錄像，趙紫陽滿面春風，並且提了趙紫陽把老鄧揭出來的事，說沒有問題，基本上局勢就這麼穩定下去。所以一直到五月十五日早晨的時候，他一看整個大勢有點問題的時候，才很著急。我們一起形成了一個指揮部。中間基本上對話團的對話一直都在進行，這個事情指揮部沒有特別多的參與。

當時廣場隨時都有很多很激動的情況，直到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和李鵬來廣場。趙紫陽和李鵬談話的口氣完全不一樣。李鵬就說你們是哪個學校的？到這裏來幹嗎？趕快回去吧。而趙紫陽就很動感情，說：“我已經年紀大了，不中用了，將來祖國還要靠你們的，你們要保持健康。”等等。當時指揮部沒有參加，並不想參加，

而且覺【以上第 199 頁】得他們應該到指揮部來談。在指揮部的同學到達時他們已經走掉了。有個同學說有一個感覺：趙紫陽失勢了。然後我們組織了一批稿子，播趙紫陽和李鵬對同學們的探望。李鵬、趙紫陽的稿子都是車上的同學寫。因為當時有兩個廣播站之間的問題，趙紫陽的稿子中途被另一個廣播站截走了，所以我們一直沒

有。我們只好重新去調查，然後再重新寫，同時也知道了一些其他的情況。第一個就是趙紫陽已經失勢，第二個就是包括體改委一大批人都要受牽聯，第三個就是部隊就要進城，關於絕食的問題怎麼辦？

【目錄】

當時廣場隨時都有很多很激動的情況，直到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和李鵬來廣場。趙紫陽和李鵬談話的口氣完全不一樣。李鵬就說你們是哪個學校的？到這裏來幹嗎？趕快回去吧。而趙紫陽就很動感情，說：“我已經年紀大了，不中用了，將來祖國還要靠你們的，你們要保持健康。”等等。當時指揮部沒有參加，並不想參加，而且覺【以上第 199 頁】得他們應該到指揮部來談。在指揮部的同學到達時他們已經走掉了。有個同學說有一個感覺：趙紫陽失勢了。然後我們組織了一批稿子，播趙紫陽和李鵬對同學們的探望。李鵬、趙紫陽的稿子都是車上的同學寫。因為當時有兩個廣播站之間的問題，趙紫陽的稿子中途被另一個廣播站截走了，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我們只好重新去調查，然後再重新寫，同時也知道了一些其他的情況。第一個就是趙紫陽已經失勢，第二個就是包括體改委一大批人都要受牽聯，第三個就是部隊就要進城，關於絕食的問題怎麼辦？

直到中午情況就十分清楚了，是陳明遠來找到我和李錄說有這樣一個情況，很緊張地把我們拉到兩車之間。那時候李錄又跟他解釋是不是特務的問題。完了之後陳明遠說既然不是特務，那么就一起工作。其實他根本沒有調查。那個時候我們馬上召集會議。開完會之後李錄命令我們把所有的窗簾放下，開始指揮調度。調度完之後再開了一次會，開希闖了進來，反正最後決議還是復食並且留在廣場。因為當時有好幾個決議，可以復食，也可以回到學校。開希基本上贊成復食並且撤，最後他又不得不同意復食以後留在廣場。然後我和李錄馬上被拉到長安街金水橋對面跟當時北京的一些記者，還有電視臺的記者。祇有我們倆，消息很快被傳回去了。

後來老封來了。這中間我插一句，他十八日晚上因痙攣被抱上車以後，第二天上午得到消息說他因為疲勞過度，極度脫水，大腦皮層萎縮。當時醫生忠告我還有其他的人說：你們要注意你們的心臟，你們的心臟狀況跟他的一樣，可以猝死。老封回來的時候很激動，就要搶話筒。王文也在嚷嚷柴玲要撤你的總指揮等等。後來他們就要來搶話筒，當時話筒在播音員那裏，我就一下把話筒拿來。我搶了話筒說：“祇要我在，你們就別想控制話筒，別想控制廣播站。”王文過來搶的時候我沒有辦法，祇好咬他一口。後來老封再來搶的時候我和他打在

一起了。當時我還不斷地說：“老封你剛從醫院出來，有些情況你還不知道。”老封說你們這是怎麼回事？又是違反民主等等。後來我傷心的原因是我真的認為他大腦皮層萎縮了，整個人都變了。在混亂之後，指揮車被推得搖搖欲墜。

我被醫生架出去後，真正叫嚷的就是圍繞指揮車的一小片人，絕大多數絕食的老同學和外地增援的老同學都非常有秩序。那是在十一點左右，當時廣場上播了李鵬的講話。後來指揮車裏宣佈二十萬人大絕食【以上第 200 頁】，抗議李鵬政府的暴行。當天晚上我被架到歷史博物館前，暫時隱避起來。第二天清晨回到指揮車的時候看到趙瑜，還有科技日報的那個女記者。我們找了一輛車，開始巡視全城堵截軍車的情況。當時我看了胡家樓，就是那個被截的催淚瓦斯。

我被醫生架出去後，真正叫嚷的就是圍繞指揮車的一小片人，絕大多數絕食的老同學和外地增援的老同學都非常有秩序。那是在十一點左右，當時廣場上播了李鵬的講話。後來指揮車裏宣佈二十萬人大絕食【以上第 200 頁】，抗議李鵬政府的暴行。當天晚上我被架到歷史博物館前，暫時隱避起來。第二天清晨回到指揮車的時候看到趙瑜，還有科技日報的那個女記者。我們找了一輛車，開始巡視全城堵截軍車的情況。當時我看了胡家樓，就是那個被截的催淚瓦斯。

為什麼說這仗打得特別漂亮？就是北京的記者在九點鐘的時候在中央電視臺打了一個字幕，說廣場絕食的老同學同意復食。然後十一點的時候，不知有人故意不給李鵬消息，還是他的節目安排了無法動，十一點的時候李鵬還在播為了廣場老同學健康起見，決定部隊進城進行戒嚴。這樣，所有市民馬上從家裏走到街上，一部分老頭、老太太發現瓦斯車，當時馬上就跪在瓦斯車前面，說你們不能進廣場傷害學生。後來另外幾個老頭馬上就回去叫人，一批年輕人把車胎扎了。

(4) 在統戰部復食（劉燕）

我想講復食的一些情況。這裏我想要梁二、沈彤兩個人幫我一起想一下，因為有些東西我記不全，他們兩個人當時在統戰部。五月十九日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開希說要見閻明復，也沒說為什麼，就是想見見閻明復。當時又怕給閻明復帶麻煩，就找了一輛救護車，偷偷地跑去了。進去的時候沒人看到，直接開到大院，開到他那個大樓門口。我們倆進去之後，反正我這裏不提名字，是閻明復下面一個局的局長，見了我們。當時我們說要見閻明復，他說部長不在。他就跟我們談，說你們應該馬上讓同學們停止絕食，立即復食。因為部長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你們應該給部長一個機會，給改革派一個機會。當時開希說你

一定要讓我們見閻明復，我一定要見部長，如果你們不讓我見閻明復，那我今天就坐在這裏不走。當時沒有人知道我和開希在裏面，在這種情況下閻明復出來了。他出來之後就跟我們談。所以當天下午三點鐘以前的時候我和開希就已經知道當晚要戒嚴的消息，是從統戰部閻明復那裏知道的。當時開希就說那該怎麼辦？最後決定開希留在統戰部，由我回去，把所有能叫到的所謂學生領袖都叫到統戰部來。

我坐救護車回去。我記得很清楚，用絕食團的廣播站，那個女孩還讓我廣播了。我就說找王丹、程真、梁二、王超華等等。好象王丹在北大，王超華不在，就找到程真和馬少方，兩人就跟我回去了。我記得特別清楚，程真和馬少方兩個人情緒特別激動。他們到統戰部一坐就開始哭，後來程真和馬少方說他倆當天要絕水，要到新華門跟前【以上第 201 頁】去絕水。程真特別激動，說如果絕

水不行的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那我就要自焚。這是程真當天說的話。

當時閻明復和開希都過來勸程真和馬少方。開希好象很激動，還跪下了。反正閻明復說得非常誠懇，這裏不再詳細說了。他主要說給改革派一個機會，今天晚上有這麼一個行動，你們到底是想把主動權抓在自己手裏，還是你們想失掉這次主動權？這時程真和馬少方他們已經宣佈停止絕食，開始復食。當時開始喝水了。

我坐救護車回去。我記得很清楚，用絕食團的廣播站，那個女孩還讓我廣播了。我就說找王丹、程真、梁二、王超華等等。好象王丹在北大，王超華不在，就找到程真和馬少方，兩人就跟我回去了。我記得特別清楚，程真和馬少方兩個人情緒特別激動。他們到統戰部一坐就開始哭，後來程真和馬少方說他倆當天要絕水，要到新華門跟前【以上第 201 頁】去絕水。程真特別激動，說如果絕水不行的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那我就要自焚。這是程真當天說的話。當時閻明復和開希都過來勸程真和馬少方。開希好象很激動，還跪下了。反正閻明復說得非常誠懇，這裏不再詳細說了。他主要說給改革派一個機會，今天晚上有這麼一個行動，你們到底是想把主動權抓在自己手裏，還是你們想失掉這次主動權？這時程真和馬少方他們已經宣佈停止絕食，開始復食。當時開始喝水了。

之後開始陸續來人，我已記不清當時所有的人，梁二和沈彤可幫我想一想。我想起來的有王丹、程真、梁二、鄭旭光、馬少方、沈彤、少江、王志新、金鬆玉、王正雲、趙剛、開希和我、項小吉、陳偉、徐兆良，還有誰我現在沒想起

來，這份名單肯定不全，還缺好多人。到那兒之後大家一起跟閻明復談。大家情緒特別高，好象就覺得我們既然作了這個決定之後，回去應該能夠說服柴玲、李錄，還有封從德，讓大家一起復食。這是下午可能五點多的時候，當時在這裏屬於絕食團的人全部同意停止絕食，開始復食。閻明復就讓他們食堂做了一大鍋面條，我們所有的人在統戰部吃了第一頓。那一頓面條特別香，大家記得特別清楚。

【梁二：剛才劉燕要求我補充一點。在閻明復的統戰部裏有幾個人湊在一塊，馬少方當時即興創作了一篇復食書，寫得慷慨激昂。讀給閻首長聽，閻首長好象感動得嗚咽不語。】

到了七點鐘的時候，我們所有人乘三輛面包車加那一輛救護車回到廣場。回到廣場在紀念碑的正北面旗杆下面馬上劃出一圈，當時把那個圈封起來了。我記得特別清楚，剛封圈的時候們我跟王丹在一起，別人跟他說“王丹，你媽來了”，王丹媽就在邊上站著。王丹特生氣，就跟他媽發脾氣。我很生氣，說王丹你怎么這樣對你媽說話。王丹就失蹤了一會兒，他就去勸他媽了。他媽特別好，一句話也沒說，就這樣看著王丹。

下面有些事情記不清楚，就是柴玲他們怎么來的。好象突然之間我們所有從統戰部去的這批人給衝散了，那圈也沒了。完了說要上指揮車去表決，說柴玲、李錄、封從德已同意停止絕食，開始復食，但是要表決是由柴玲來宣佈這個消息，還是開希來宣佈這個消息。所有從統戰部去的人祇有三個擠上車去：我、王丹和開希。當時車上還有【以上第 202 頁】

封從德他們都在。他們在裏面，我們三個擠在車門。那是七點鐘。王丹沒有說話。

張伯笠：不是指揮車，是開會的會議車，有好幾節。

劉燕：是那大客車。我、開希還有王丹擠上去，就在車門。

張伯笠：已經表決完了。

劉燕：那好象是我們鬧著又表決一次。

柴玲：開希進去時說：李錄，你同意我來為什麼我進不來？李錄說，要不要給開希同學一個機會？讓開希講幾句話？大家都同意，開希就講了他的消息。最後還是開始表決。

劉燕：反正這一段要梁二和沈彤幫我一起補充，我記得不是特別全。我祇記得表決的最後結果是由柴玲宣佈當天晚上開始復食。完了王丹到哪兒去了就不知道了。我和開希出來之後就回了北大。當天晚上柴玲宣佈復食。

(5) 開希要做總指揮（沈彤）

十九日的時候，就有人叫我去統戰部。我去得很晚，我去的時候面條已經作好了，我記得特清楚。大家都在房間裏，劉燕剛才講了我才知道，開希他們已經到了二、三小時了，那是差不多四、五點鐘的時候。因為第一次聚得比較全，而且少方和程真宣佈復食，大家都開始宣佈復食了，氣氛開始比較活躍。那時知道戒嚴的事情反而感到輕鬆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釋這個事情，大家很高興，互相簽字，又有一種訣別的情緒，在每個人領襟上都簽了字，我想梁二、劉燕都記得的，照相啊什麼，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

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

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在路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實際上我要說雙方擔心的是一個問題。當時共識同時就產生了。【以上第 203 頁】

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在路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實際上我要說雙方擔心的是一個問題。當時共識同時就產生了。【以上第 203 頁】

(6) 第二次表決：結果相反（封從德）

關於復食，有兩方面需要補充，一是復食好象在五月十八日絕食團指揮部就有商議。我記得應該在五月十八日下午或傍晚，在我們的指揮車上，當時還有王文，我們常委開了個會，當時提議指揮部所有常委因為要化精力去指揮，所以首先內部復食。當時王丹就提出他不能這樣做，後來作了個表決，好象沒有通過內部復食。這個事情和馬拉鬆絕食幾個方案有關係。所謂馬拉鬆計劃，有兩個方案：一半倒了就新上一批，這樣無限期持續下去；或是全體倒下後再換。當時，我持前一觀點。

二，關於十九日復食表決。十八日晚，我被送到醫院，十九日晚返回廣場。因為頭天商議過復食，於是就去絕食同學中聽了聽意見，結果絕大多數說堅持絕食，特別記得是到人大帳篷裏，他們都說要堅持絕食。等到了指揮車，發現已經宣佈了復食。當時就在指揮車上衝突起來。最後李錄說：“那好，你可以再去作個表決。”於是，我下車召集了第二次表決，做了約一個小時，嚴格審查過代表性。這時，沒有時間讓代表們回校征求意见，只好讓大家估計各自學校要堅持絕食的有多少，過後再審查。來了八十多個學校的代表，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代表說他們學校至少百分之八十甚至已統計過百分之一百同學要堅持絕食。於是我回到絕食團廣播站，宣佈了這個結果。並聲明，如果有學校認為自己學校代表沒反映實情，可以來申述。結果可能是技術原因，沒有一個學校來申報。所以我得到的結論，應該說廣場上多數絕食同學還是在堅持絕食的。然後，就是李鵬、楊尚昆的講話，他們沒明確提出要戒嚴。然後就聽到說二十萬大絕食。

(7) 學運之聲的反對（王超華）

剛才有人講到十九日學運之聲廣播站的情況了，就是關於復食之前的事。按說我是應該在的。

十八日和李鵬對話後，下了一場雨我再被叫到歷史博物館門前去開會，我說開會坐那兒多沒勁。不知道怎麼稀裏糊塗地讓人送到醫院去了。大概是半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的。回來之後我馬上趕到“學運之聲”廣播站，被各種各樣

的事又牽制在那。我根本沒有聽到劉燕在絕食團廣播車上叫人去統戰部這回事，而且在那根本就聽不到絕食團的廣播。但是就有人拿了條來要求廣播復食這個東西，在我不知【以上第 204 頁】道的情況下就已經廣播了。我非常急，就跑過去說我有非常緊急的事要說。然後我就在廣播裏說：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後來封從德衝進來了，和周鋒鎖瘋急了，打得不可開交，周鋒鎖不讓他進來。他一回頭看見我了，說“王超華，為什麼不讓我進來？”我就說“你要說什麼？你告訴我。”“我們還在絕食。”我說：“那你就不要說了，我們剛才已經廣播了還有人在絕食。”但他絕對不信任我。（封從德插：什麼時候？）十九日，你從那邊跑回來

十八日和李鵬對話後，下了一場雨我再被叫到歷史博物館門前去開會，我說開會坐那兒多沒勁。不知道怎麼稀裏糊塗地讓人送到醫院去了。大概是半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的。回來之後我馬上趕到“學運之聲”廣播站，被各種各樣的事又牽制在那。我根本沒有聽到劉燕在絕食團廣播車上叫人去統戰部這回事，而且在那根本就聽不到絕食團的廣播。但是就有人拿了條來要求廣播復食這個東西，在我不知【以上第 204 頁】道的情況下就已經廣播了。我非常急，就跑過去說我有非常緊急的事要說。然後我就在廣播裏說：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後來封從德衝進來了，和周鋒鎖瘋急了，打得不可開交，周鋒鎖不讓他進來。他一回頭看見我了，說“王超華，為什麼不讓我進來？”我就說“你要說什麼？你告訴我。”“我們還在絕食。”我說：“那你就不要說了，我們剛才已經廣播了還有人在絕食。”但他絕對不信任我。（封從德插：什麼時候？）十九日，你從那邊跑回來

(8) 大家非常不滿（辛苦）

我講一點十九日晚上宣佈復食引起的反響。當時在廣場上絕食的已經非常多，沒有統計的就更多了。後來絕食團指揮部宣佈復食大家都非常不滿，因為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和沒有充分地同同學交換意見，作說服解釋工作，也沒有很好地作討論，所以大家都非常不滿。李錄說實際上是大部份沒有絕食的同學反對停止絕食，這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在那非常多絕食的人大家對這個決定感到非常失望。反正他們指揮部糾察線根本不讓進，誰也不知道，就他們一個人說了算。後來說把絕食改成靜坐，還是在廣場上堅持，大家的情緒才比較緩和。但是後來在“學運之聲”廣播電臺的爭吵在下面引起的反響壞得不得了。我不想講這個，我祇講對復食引起的反響，因為他說征求過二百多同學的意見才宣佈復食的。

(9) 嚴格的代表性 (張伯笠)

關於復食這個問題我還要作一個重點的補充。當時在指揮圈裏二百零幾個高校的代表是經過嚴格程序進來的，包括吾爾開希。剛才柴玲說的有一個錯誤。當時吾爾開希進來，我們所有的人沒有向同學們說要戒嚴，我們在當時絕對是隱蔽了這個觀點。

第二個是關於超華說的廣播站的事。當時是我進去播的，我打著超華的旗號，如果我不打著超華的旗號他不給進去。我說超華讓我進去的，拿著個紙條，上面簽著超華的名字，其實是我寫的字。我進去【以上第 205 頁】後宣讀的是柴玲在絕食團指揮車宣讀的復食宣言。這個宣言是鄭義、趙瑜和我三人起草的。宣讀完了之後我就打熱線電話去了。這時他們發生了一個衝突，我回去趕上了這個衝突，就撤他職務。這個是整個經過。

第二個是關於超華說的廣播站的事。當時是我進去播的，我打著超華的旗號，如果我不打著超華的旗號他不給進去。我說超華讓我進去的，拿著個紙條，上面簽著超華的名字，其實是我寫的字。我進去【以上第 205 頁】後宣讀的是柴玲在絕食團指揮車宣讀的復食宣言。這個宣言是鄭義、趙瑜和我三人起草的。宣讀完了之後我就打熱線電話去了。這時他們發生了一個衝突，我回去趕上了這個衝突，就撤他職務。這個是整個經過。

(10) 質疑 (封從德)

五月十九日宣佈復食是否參與了黨派之爭？

四。戒嚴（五月二十日——六月三日）

【以上第 206 頁】

【梁二：直升飛機出現在廣場上的時間告訴我一下。

張倫：二十日上午。

王超華：我在從醫院回廣場的路上就有直升飛機聲了。

張倫：夜裏已有傳聞，但最後是上午十點多出現的。】

4 . 1 從絕食團指揮部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張伯笠）

4.1.1 廣場臨時指揮部的產生 <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絕食團指揮部就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高聯這時在廣場的介入是非常強的，王超華、鄭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廣場。相對來講，絕食團指揮部在廣場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過去絕食團指揮部是廣場上的主要核心。在二十日我得到了一個情報，這個情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告訴我的，就是這一天要屠城。他告訴我，那天的總指揮姓周，是一個集團軍的司令員。當時他的部隊在地鐵、勞動人民文化宮準備了三個空降師，這個情報我們是得到了。他跟我談這個情況，說“你們這個時候應該撤回去，不撤的話，就是要死人的。而且你們撤回去後，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李鵬，讓李鵬負責任，這樣也許能爭取一下主動。”這個時候我就感到非常可怕。這時已經喊出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什麼“獨裁者”，什麼“罷免李鵬”的都出來了。這是二十日開始在宣傳部定的統一口徑。過去還沒有，過去祇是個別人，而不是指揮部定的。這個時候，我覺得很嚴重。解放軍當時定的是非常詳細的。他告訴我，他們印了一萬張進城地圖。我根據這一萬張地圖就分析出了有多少部隊。因為大概是一個班或一個排是一個地圖，那麼這就是一萬個班或排。我們就感到非常可怕。可我們也沒有號召學生、市民去堵軍車，指揮部絕對沒有這個決定。所以這樣第二天大家就都嚇跑了。說我們保命費的問題，就是那天發的緊急行動費。這是二十一日。那天我離開了廣場，到了徐剛家。給我們錢後大家就趕快散，絕食團的使命【以上第 207 頁】命已經結束。趕快疏散，那天晚上

要鎮壓。但是第二天沒有鎮壓，沒有打，天下太平。有人就打電話告訴我，說“很好很好，沒打，看來沒問題。”我們就研究怎麼辦。後來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就是：堅持下去。既然他這次沒敢打，以後他很可能就是還打不下去。所以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重又回到了廣場。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絕食團指揮部就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高聯這時在廣場的介入是非常強的，王超華、鄭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廣場。相對來講，絕食團指揮部在廣場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過去絕食團指揮部是廣場上的主要核心。在二十日我得到了一個情報，這個情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告訴我的，就是這一天要屠城。他告訴我，那天的總指揮姓周，是一個集團軍的司令員。當時他的部隊在地鐵、勞動人民文化宮準備了三個空降師，這個情報我們是得到了。他跟我談這個情況，說“你們這個時候應該撤回去，不撤的話，就是要死人的。而且你們撤回去後，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李鵬，讓李鵬負責任，這樣也許能爭取一下主動。”這個時候我就感到非常可怕。這時已經喊出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什麼“獨裁者”，什麼“罷免李鵬”的都出來了。這是二十日開始在宣傳部定的統一口徑。過去還沒有，過去祇是個別人，而不是指揮部定的。這個時候，我覺得很嚴重。解放軍當時定的是非常詳細的。他告訴我，他們印了一萬張進城地圖。我根據這一萬張地圖就分析出了有多少部隊。因為大概是一個班或一個排是一個地圖，那麼這就是一萬個班或排。我們就感到非常可怕。可我們也沒有號召學生、市民去堵軍車，指揮部絕對沒有這個決定。所以這樣第二天大家就都嚇跑了。說我們保命費的問題，就是那天發的緊急行動費。這是二十一日。那天我離開了廣場，到了徐剛家。給我們錢後大家就趕快散，絕食團的使命【以上第 207 頁】命已經結束。趕快疏散，那天晚上要鎮壓。但

是第二天沒有鎮壓，沒有打，天下太平。有人就打電話告訴我，說“很好很好，沒打，看來沒問題。”我們就研究怎麼辦。後來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就是：堅持下去。既然他這次沒敢打，以後他很可能就是還打不下去。所以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重又回到了廣場。

二十二日回到廣場後，看到廣場上的組織特別多，我是外高聯，我是北師大，我是北大，我是絕食團指揮部，我是高聯王超華，我是高聯吾爾開希，都是個人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組織。我見到王超華，王超華當時拿了一個撤退統計數字名單，統計了大概是二百多個學校同意撤退的名單。我看了這個名單以後，她就交給我了。然後我們幾個人就研究怎麼辦。我說，咱們都定不了，還得開代表會，就是營地會議。開會時外地的學生很多，他們的情緒就很強烈。當時在我的主導思想上產生一個錯誤的判斷，我就覺得我們應該堅定。如果我們馬上撤退，就顯得懦弱，而且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成果。當時我是很激進，我在大陸反思時覺得我是幹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因為是為了歷史的真實嘛，咱們就真實說。當時就是這種情況。

王超華給了我名單，我就把名單藏起來了。她跟我要的時候，我就說丟了，就沒給他。因為這個名單是挨個人談的，它不是開會的。談好了，代表同意了實際上就要宣佈撤出去。但這個名單我是沒給他。我就說要重新開會，因為你這是個人商量的，是小團體會。誰參加了？高聯就你一個人，絕食團指揮部沒來，高聯還有誰，沒別人來。所以這是你個人的想法。這不行，開會看看大家是什麼意見。開了一個五百人的大會，有的是代表，有的也不是代表，人很多。我說，現在我們面臨的就是戒嚴，我們的態度就是要反對戒嚴，我們表現的態度就是堅守廣場。現在我來提議，廣場上現在这么多的指揮部，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大概有一百多個組織（誇張地說）。我們應該形成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就是管廣場，不管全北京也不管全國。

我想，應該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如果大家同意，這個指揮部可以執政四十八小時，然後交給高自聯。當時我是批評高自聯的，高自聯現在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這種運轉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希望高自聯能拉回去整頓。整頓好了，形成一個領導機構，就是對廣場、對全北京的領導機構。這個機構下設什麼宣傳部、什麼財務，弄清了以後來。四十八小時以後我們把班子交給你，把領導權交給你們。說這些話以前，我和超華私下已經統一了【以上第 208 頁】意見，

她同意。後來大家就全部舉手通過了我的方案。因為這個組織要運轉，馬上選的一些新人不可能運轉得非常靈。我就說，能不能以絕食團指揮部代替這個臨時指揮部，暫時運轉四十八小時。當時大家投票就通過了。王超華就跟我說“我還是要征求其它人的意見”。我說：“已經通過了，你征求意見也沒用，咱們這就是民主嘛”。下去以後我就去找絕食團的人，定臨時指揮部的常委。當時有王丹、柴玲、我、李錄、封從德、郭海峰、王超華，七人常委。這七人在廣場上，在整個

北京學運中是有代表性的，大家一看，這些人可以信任、沒問題，所以就順利地通過。那麼我就讓王超華首先交財務。結果她轉了一圈不知道是聽誰說了，又不準備交財物了，“我不能交，你們就是臨時執政，你們還是用過去絕食團的東西”。當時我就說：“超華，你最好是交。”後來交了沒交，她和誰洽談了這個問題，我就不清楚了。

我想，應該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如果大家同意，這個指揮部可以執政四十八小時，然後交給高自聯。當時我是批評高自聯的，高自聯現在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這種運轉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希望高自聯能拉回去整頓。整頓好了，形成一個領導機構，就是對廣場、對全北京的領導機構。這個機構下設什麼宣傳部、什麼財務，弄清了以後來。四十八小時以後我們把班子交給你，把領導權交給你們。說這些話以前，我和超華私下已經統一了【以上第208頁】意見，她同意。後來大家就全部舉手通過了我的方案。因為這個組織要運轉，馬上選的一些新人不可能運轉得非常靈。我就說，能不能以絕食團指揮部代替這個臨時指揮部，暫時運轉四十八小時。當時大家投票就通過了。王超華就跟我說“我還是要征求其它人的意見”。我說：“已經通過了，你征求意见也沒用，咱們這就是民主嘛”。下去以後我就去找絕食團的人，定臨時指揮部的常委。當時有王丹、柴玲、我、李錄、封從德、郭海峰、王超華，七人常委。這七人在廣場上，在整個北京學運中是有代表性的，大家一看，這些人可以信任、沒問題，所以就順利地通過。那麼我就讓王超華首先交財務。結果她轉了一圈不知道是聽誰說了，又不準備交財物了，“我不能交，你們就是臨時執政，你們還是用過去絕食團的東西”。當時我就說：“超華，你最好是交。”後來交了沒交，她和誰洽談了這個問題，我就不清楚了。

這個臨時指揮部算基本上成立了。成立了之後，就宣佈開始執政。執政的所有的方式、方法、工作方法和一些觀點、主導思想基本上還是絕食團的。我當時是臨時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部長，因為絕食團的時候我就是。這個宣傳部起草了一個文件，是一個宣言一樣的東西，這裏面主要有四點：一，取消戒嚴；二，保障絕食同學的正常醫療，統計出多少來，如果有一些人身體損害很大，希望能夠幫他們治療，聽說有一些成了植物人；三，要求罷免李鵬；就是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不是打倒李鵬；四，支持趙紫陽亞行上的講話；就是平反動亂。

這個臨時指揮部就開始在廣場統計。各個學校在那裏呀，有多少人，後勤怎么回事呀，這時的捐款也往臨時指揮部送了一些。我跟超華的協議當時指揮部

大多數的人也是知道的，因為超華是常委。當時我跟他們說為什麼要超華作常委，我說超華不作常委的話，她就不交權，她就不會把高自聯的人帶回去。我就和他們這樣公開說，我當時也就是這種思想。超華和王丹第一有代表性，第二如果不讓他們作常委的話，他們就在這裏沒有任何影響了。高自聯如果沒有影響，它會不同意的。這樣臨時指揮部工作開始運轉。那天直升飛機來了，在天上轉，撒傳單。那天接到了一個消息，說李鵬已經作了幾點指示，第一，把監獄全部清好，關我們學生；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要清場；第三，通知北京的衛生隊作好清理廣場的準備，等等，共四條。這四條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知道他們還要動手。這個時候我們跟知識

【以上第 209 頁】分子取得了聯繫。其實知識分子每天在文化宮的辦公地點還在，而且挪到了我們指揮部跟前，就在紀念碑的東北角三角的這個地方拉上了一個北京知識界的牌子。他們在那每天給我們提供信息，給我們買步話機，我們就開始變成大富翁了，有步話機就有了通訊設備。香港也介入了。大家就覺得應該堅持下去，整個形勢看來是很好，我們能夠粉碎戒嚴。我們說，我們已經粉碎了兩天的戒嚴，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如果宣佈戒嚴當時就得幹下去，我們已經粉碎解放軍兩天的戒嚴，所以我們的成果要繼續擴大，當時的指導思想是繼續擴大。

這個臨時指揮部就開始在廣場統計。各個學校在那裏呀，有多少人，後勤怎麼回事呀，這時的捐款也往臨時指揮部送了一些。我跟超華的協議當時指揮部大多數的人也是知道的，因為超華是常委。當時我跟他們說為什麼要超華作常委，我說超華不作常委的話，她就不交權，她就不會把高自聯的人帶回去。我就和他們這樣公開說，我當時也就是這種思想。超華和王丹第一有代表性，第二如果不讓他們作常委的話，他們就在這裏沒有任何影響了。高自聯如果沒有影響，它會不同意的。這樣臨時指揮部工作開始運轉。那天直升飛機來了，在天上轉，撒傳單。那天接到了一個消息，說李鵬已經作了幾點指示，第一，把監獄全部清好，關我們學生；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要清場；第三，通知北京的衛生隊作好清理廣場的準備，等等，共四條。這四條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

知道他們還要動手。這個時候我們跟知識【以上第 209 頁】分子取得了聯繫。

其實知識分子每天在文化宮的辦公地點還在，而且挪到了我們指揮部跟前，就在紀念碑的東北角三角的這個地方拉上了一個北京知識界的牌子。他們在那每天給我們提供信息，給我們買步話機，我們就開始變成大富翁了，有步話機就有了通訊設備。香港也介入了。大家就覺得應該堅持下去，整個形勢看來是很好，我們能夠粉碎戒嚴。我們說，我們已經粉碎了兩天的戒嚴，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如果宣佈戒嚴當時就得幹下去，我們已經粉碎解放軍兩天的戒嚴，所以我們的成果要繼續擴大，當時的指導思想是繼續擴大。

4.1.2 從臨時指揮部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五月二十四日，我沒有參加首都聯席會議。但是鄭義他們幾個開完會就來了，給了我一個名單要我印刷。我一看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我記得名單上有總指揮，有副總指揮，底下設糾察總部。這個名單還有，當時印了很多，是鉛字打字的，我印象印了二百多。總指揮是柴玲，副總指揮是我、封從德、李錄，秘書長是郭海峰，參謀部是劉剛，糾察總部是張倫。老木的宣傳部長是沒有的，那是我改的，因為宣傳部長是我派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後來因為我不可能負責這麼多工作，所以我就推薦了老木，而且他們也同意，所以就改過來了。還有幾個部，有新聞聯絡部，後勤部。這樣我們臨時指揮部就不能運轉了。其實還是這些人。然後大家就都來了，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宣佈成立，柴玲宣誓。那天外國記者是非常多的，就採訪。我記得那天參加採訪的有柴玲、李錄、老封，還有劉蘇裏，他那天是主持人，還有王丹、老木。詩人老木就任宣傳部長，這是肯定的，但這之前定名單的時候肯定不是他。宣佈以後，這個指揮部就成立了。可這時超華回來了，我們兩個就發生了衝突。超華回來以後就找我，我就躲。我不跟她正面衝突，我說“你找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去吧。”超華說“你們食言了。我們北高聯已經整頓好了，我們這個班子已經準備了九個人。”這個時候她又拿了一套方案。我現在認為他這套方案是很完整的。可我負不起這個責任來。後來我跟她說，“我和你是有一個協議，四十八小時後把權力交給你。可我不是總指揮，柴玲是總指揮。我沒有總的決定權，我祇有建議權。這是一；【以上第 210 頁】

第二，我不知道這個首都各界聯席會是怎么回事，主持人是王丹，是很有權力的。王丹當時是最風流、風雲的人物，第一號。他來作主持人，而且召集知識分子，也有學生；那麼我想，這個決定是有權威性的。而且，我聽說這個聯席會議和我們指揮部的關係是指導、參謀關係，就是它有權指導我們。那麼我們就祇好聽聯席會議的。”我說，“你去找聯席會議吧，或者你去找王丹去。我們這個指揮部沒有任何責任，因為我們是準備卸任交給你們的。可又重新搞了一個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這時候我和超華我們兩個都火了。北高聯的其它人對我很有想法，認為我在裏面搞了什麼。我其實從來沒參加過聯席會，絕沒參加。在保

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我主要負責的是宣傳，廣播站和宣傳部。這個組織是非常強大的。我起草了一個東西，就是關於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下一步工作的東西。後來一段就基本上沒有改變它的軌跡。【以上第 211 頁】

4 . 2 高聯整頓（王超華）

4.2.1 高聯正式討論撤退

五月二十日我是上午大約十點鐘才離開醫院。回去以後有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忽然我這兒成了中心了。我一回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大家就說，“你可回來了，你到那去了？”諸如此類的。還有就是各處送來的條子非常多，這發生了這樣的事，那發生了那樣的事，都是有關軍隊的。（柴玲插：當時傳說你也被軟禁了或被捕了，後來又逃出來了。），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因為十九日晚上我突然被一個大夫硬拉著幾個人把我給拉去醫院的，而且第二天早晨不讓我回來。（封插：是有人要控制你嗎？）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我自己跑回來的。實際上我六點鐘就想往回跑，可是被他們發現。後來給我轉了一個醫院，最後才跑出來的。從六裏橋到大北窯到處都有條子來，說那已經主動在堵軍車了。我就不斷地向人大等幾個骨幹院校派小分隊到這幾個主要的點。高聯後來畫了堵軍車的一個圖，從昌平一直到南郊，高聯聯絡部派給各校任務，哪個學校至少要派出幾個小分隊去哪個點、哪個點。本來我們負責後援絕食團，負責廣場，這是一個共識，這時不管是廣場，還是外圍都是我們管了。五月二十日有過一個各校代表會，是王丹主持的，在紀念碑三層的東面，有外地同學，也有北京同學。各校代表也都願意到我們這來了。當時討論了萬一軍隊進來怎麼辦。當時地鐵站停了，我們不能準確判斷是工人主動關的還是政府關的。還斷過兩天水。絕食一開始那兩天的斷水我覺得不是真正意義的斷水。因為當時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廣場附近有沒有供水。後來廁所也開了，廁所裏也能找到水。可這兩天的斷水，連衝廁所的水都沒了。我們開會定了一個方案，包括部隊來了怎麼聚攏，臉朝那兒怎麼坐著，手挽手。如果衝散的話，討論是回大學區還是怎麼辦。最後的一個結論，就近找老百姓家，過了危險時期之後再往西郊大學區集結。主要問題是要安置外地學生。當時最發愁的就是外地學生，一般認為北京學生還是有辦法回去的。最後任命了一個青島來的學生當總指揮。我們覺得最危險的時候是二十一日凌晨四點到五點，而且在會上特別提出這個時間。居然沒出事。【以上第 212 頁】

【辛苦：二十日中午在紀念碑三層有一個在廣場上的各校學生代表大會，在這個大會上選出王丹作廣場總指揮。你知道不知道這回事？

王超華：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王丹主持的那個會。開始說王丹是總指揮，底下意見特別多。後來就變成王丹是名義總指揮，執行總指揮是一個青島來的學生。

辛苦：當時我是蘭州大學代表。王丹是總指揮，這個是大家公認的。】

開希曾到過廣場，我與他有過爭論。當時我們到各個學校去轉，調查學生情緒。大家普遍的情緒是，絕食也停了，靜坐也不行的話我們不如撤。當時人大已經有了一個方針，就是在十九日絕食宣佈停止以後，自治會、後援團和絕食團的同學重新又回到原來的自治會。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方針是各校自治會馬上吸收原有的絕食同學回到各校，各校自治會要整頓。同時調查的結果是廣場上同學的基本傾向是要撤退。二十一日，到處都調查了以後，常委和幾個主要代表開了一個會。這應該是一個各校代表會，但是我沒有辦法控制外地學生。我當時拿著黑名單，就是你必須是北京的學生代表，而且你要說得出你們學校以前自治會到高聯開會的是誰，這樣我可以知道是不是代表。這樣大概放進來四十多個。把那些外地學生氣得要死，就是不放他們進。開會的同學基本上都同意撤退。我們就說，馬上回本校征求意见，半個小時以後再回來。我還沒說這是高聯的決議。可半個小時以後再回來的時候呢，不行了。上午都是來反映高聯應該討論撤退的問題，都是底下同學說的。但是回頭再說高聯正式討論撤退問題的時候，馬上就炸了，“誰讓高聯討論撤退的？”我說，“這可是你們剛才反映的情況。雖然是我主持，可大家都在這討論這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些自治會的頭頭基本上是絕食以前我見過的人，大家也是比較冷靜的，希望能夠冷下去的一些人。就在發愁的時候，清華學運之聲的人在那念鄧小平的話，說是什麼騰空監獄、打掃衛生抓二十萬等三條。底下就“嘩”地亂了，一亂就聽見那裏有人領著念絕食宣言。北大當時是從籌委會來的一個同學在配合我工作，他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他一把抓住我說：“超華，還不快跑。”我們馬上就想到一塊去了。我們趕快跑到下邊廣播站。當時根本擠不到廣播站那個地方，就在邊上【以上第 213 頁】喊

高聯支持堅持廣場”，目的就是讓大家跟高聯認同。可我們明明剛才正討論撤退的問題。所以當時就廣播，“高聯王超華已經來這表示，高聯支持大家堅守廣場”。

開希曾到過廣場，我與他有過爭論。當時我們到各個學校去轉，調查學生情緒。大家普遍的情緒是，絕食也停了，靜坐也不行的話我們不如撤。當時人大已經有了一個方針，就是在十九日絕食宣佈停止以後，自治會、後援團和絕食團的同學重新又回到原來的自治會。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方針是各校自治會馬上吸收原有的絕食同學回到各校，各校自治會要整頓。同時調查的結果是廣場上同學的基本傾向是要撤退。二十一日，到處都調查了以後，常委和幾個主要代表開了一個會。這應該是一個各校代表會，但是我沒有辦法控制外地學生。我當時拿著黑名單，就是你必須是北京的學生代表，而且你要說得出你們學校以前自治會到高聯開會的是誰，這樣我可以知道是不是代表。這樣大概放進來四

十多個。把那些外地學生氣得要死，就是不放他們進。開會同學基本上都同意撤退。我們就說，馬上回本校征求意见，半個小時以後再回來。我還沒說這是高聯的決議。可半個小時以後再回來的時候呢，不行了。上午都是來反映高聯應該討論撤退的問題，都是底下同學說的。但是回頭再說高聯正式討論撤退問題的時候，馬上就炸了，“誰讓高聯討論撤退的？”我說，“這可是你們剛才反映的情況。雖然是我主持，可大家都在這討論這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些自治會的頭頭基本上是絕食以前我見過的人，大家也是比較冷靜的，希望能夠冷下去的一些人。就在發愁的時候，清華學運之聲的人在那念鄧小平的話，說是什麼騰空監獄、打掃衛生抓二十萬等三條。底下就“嘩”地亂了，一亂就聽見那裏有人領著念絕食宣言。北大當時是從籌委會來的一個同學在配合我工作，他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他一把抓住我說：“超華，還不快跑。”我們馬上就想到一塊去了。我們趕快跑到下邊廣播站。當時根本擠不到廣播站那個地方，就在邊上【以上第 213 頁】喊“高聯支持堅持廣場”，目的就是讓大家跟高聯認同。可我們明明剛才正討論撤退的問題。所以當時就廣播，“高聯王超華已經來這表示，高聯支持大家堅守廣場”。

【封從德：王超華多次提到一個黑名單，指的是什麼？

王超華：就是各校代表名單。我要求各校代表不僅寫下他的名字，拿出他的學生證，而且要記下他的宿舍號碼。】

4.2.2 吾爾開希喊撤 <參：4.8.1 吾爾開希為什麼喊撤？> <參：

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

開希早上來找我的時候，我說“昨天不應該撤。不能他一公布戒嚴，咱就乖乖地撤了。但是今天是個機會。”但我下午有過這個經驗。晚上開希來找我，說“有事，你跟我們一塊去。”但是來找的這兩個穿中山裝還是西裝的人說是還要聯系一下。還是我把他們帶到歷史博物館前面那個棚裏打的電話。打完電話以後，開希忽然覺得不對了，說怎麼不是直接見鄧樸方，咱們不能都去，“超華，你留下，你熟悉廣播站。”他們這些人回來時，我還正在廣播站，這是二十一日夜裏。

他說，“不行，情況非常緊急。”我當時覺得既然情況非常緊急，而且見的是官方，那時都覺得官方找不到了，就把話筒給他了。他就說“馬上撤退。”底下有人就問：“撤到哪？”他就說：“撤到使館區。”哇！哄成一片。開希一下暈過去了。我戒嚴以後從醫院跑回去時廣播站的人說，可以把廣播站完全交給高聯。這時，就有一個管器材的人騰地跑過來說：“我就知道這個廣播交給高聯沒好事。”這個時候我們就意識到不能撤了，可是覺得非常惱火。我們剛把高聯恢復的一點權威讓開希這麼一弄，就全完了。所以二十二日上午我就找到鄭旭光說把他撤了。反正我已經和別人合伙撤過好多的人了。這時高聯在廣場急於應付，已經沒有時間討論了。二十二日 下午就有人來說是後方幾個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這我是有預感的。很多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我說：“我怎么走得開呀！”因為十九日之前王有才等人已經停止絕食，回北大去了。王有才還說，“怎么你這個反對絕食的整天泡在廣場。”而且楊濤，還有謝劍都跟我們說過，不要再盯在【以上第 214

頁】廣場上。這時我還不信這個傳言呢！後來廣播叫開會，點了一串名。首先點我，外高聯的葛剛、楊濤和我，人數很少。我和楊濤交換了意見，他說確實是有這個東西，很多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我說：“我怎么走得開呀！”

開希早上來找我的時候，我說“昨天不應該撤。不能他一公布戒嚴，咱就乖乖地撤了。但是今天是個機會。”但我下午有過這個經驗。晚上開希來找我，說“有事，你跟我們一塊去。”但是來找的這兩個穿中山裝還是西裝的人說是還要聯系一下。還是我把他們帶到歷史博物館前面那個棚裏打的電話。打完電話以後，開希忽然覺得不對了，說怎么不是直接見鄧樸方，咱們不能都去，“超華，你留下，你熟悉廣播站。”他們這些人回來時，我還正在廣播站，這是二十一日夜裏。他說，“不行，情況非常緊急。”我當時覺得既然情況非常緊急，而且見的是官方，那時都覺得官方找不到了，就把話筒給他了。他就說“馬上撤退。”底下有人就問：“撤到哪？”他就說：“撤到使館區。”哇！哄成一片。開希一下暈過去了。我戒嚴以後從醫院跑回去時廣播站的人說，可以把廣播站完全交給高聯。這時，就有一個管器材的人騰地跑過來說：“我就知道這個廣播交給高聯沒好事。”這個時候我們就意識到不能撤了，可是覺得非常惱火。我們剛把高聯恢復的一點權威讓開希這麼一弄，就全完了。所以二十二日上午我就找到鄭旭光

說把他撤了。反正我已經和別人合伙撤過好多人了。這時高聯在廣場急於應付，已經沒有時間討論了。二十二日下午就有人來說是後方 幾個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這我是有預感的。很多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我說：“我怎麼走得開呀！”因為十九日之前王有才等人已經停止絕食，回北大去了。王有才還說，“怎麼你這個反對絕食的整天泡在廣場。”而且楊濤，還有謝劍都跟我們說過，不要再盯在【以上第 214 頁】廣場上。這時我還不信這個傳言呢！後來廣播叫開會，點了一串名。首先點我，外高聯的葛剛、楊濤和我，人數很少。我和楊濤交換了意見，他說確實是有這個東西，很多大院校要求高聯回去。我說：“我怎麼走得開呀！”

所以我們從那天就開始討論怎麼撤退。我根據我的體會講了撤退的困難。我說撤退形式一定要勝利大撤退，祇有這樣，群眾才有可能跟著你走。所以要發動一個全市大遊行，還設計了路線。楊濤感到比較滿意，就沒再堅持要我回去，說是一定要把高聯各校統一到這上面來。外高聯由葛剛負責配合。

4.2.3 北高聯退出廣場<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後來到廣播站，要我去開張伯笠剛才說的那個代表會，大約有一百多個院校。六十多個院校表決要求高聯交出權力。實際上廣播裏常委的名都點到了，可祇有我和 王志新去了。那次我才知道柴玲對我們那麼大的意見。最後張伯笠說的方案是李錄總結的。常委居然保留我一個，我心裏很窩囊。（李錄插：王志新走了以後祇剩你一個了。）

當時沒有馬上辦移交，就散會了。回去後，那天晚上我就不斷地聽到開會通知，點我的名。都到兩點了，張伯笠又廣播點我的名，到那兒辦移交。既然我代替高聯表態了，我就在那兒挨個找高聯常委，通知這個事。當時正和經濟學院翟偉民在一起談，所以翟偉民差點和張伯笠打起來。他覺得是他們欺負我。我說既然六十四個學校的代表都同意了，那我就必須交。咱們就別吵了。把翟偉民勸住。

廣播站也是第二天我寫了條說交。後來臨時指揮部就開始廣播了，而且要開記者招待會了。這時我聽見廣播一篇稿，什麼什麼的。我的窩囊氣就上來了，就非得要辭職。包括廣播站原來的廣播員使勁勸我，“你千萬別辭職，千萬別辭職。”後來我估計，我堅持要辭職對他們後來的離職也有影響。柴玲當時就說，我去查查這個稿都說了什麼。我在他們這個記者招待會上把我的政治觀點說了說。其中有人問“你打算幹什麼？”我就說，“我希望回北大參加新聞導報的工作。”這是後來 香港傳出我去過新聞導報的重要原因。其實我從來沒去過新聞導報。【以上第 215 頁】五月二十三日我正準備回去的時候，開希來了。他們說要

回師大，他們的車帶著我。就是這天下午發生了潑毛主席像的事，那三個人馬上就被人揪到紀念碑上面去了。（張伯笠插：是郭海峰他們抓的）學生馬上就說把這個人交到公安局。我在那兒心想，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了，我就旁觀。我回到北大以後，看到常委會的人還在緊張地工作呢，我心裏就挺內疚的，心想這四十八小時我不來整頓，誰來整頓。

廣播站也是第二天我寫了條說交。後來臨時指揮部就開始廣播了，而且要開記者招待會了。這時我聽見廣播一篇稿，什麼什麼的。我的窩囊氣就上來了，就非得要辭職。包括廣播站原來的女廣播員使勁勸我，“你不萬別辭職，千萬別辭職。”後來我估計，我堅持要辭職對他們後來的離職也有影響。柴玲當時就說，我去查查這個稿都說了什麼。我在他們這個記者招待會上把我的政治觀點說了說。其中有人問“你打算幹什麼？”我就說，“我希望回北大參加新聞導報的工作。”這是後來香港傳出我去過新聞導報的重要原因。其實我從來沒去過新聞導報。【以上第 215 頁】五月二十二日我正準備回去的時候，開希來了。

他們說要回師大，他們的車帶著我。就是這天下午發生了潑毛主席像的事，那三個人馬上就被人揪到紀念碑上面去了。（張伯笠插：是郭海峰他們抓的）學生馬上就說把這個人交到公安局。我在那兒心想，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了，我就旁觀。我回到北大以後，看到常委會的人還在緊張地工作呢，我心裏就挺內疚的，心想這四十八小時我不來整頓，誰來整頓。

高聯回去整頓的兩個原則，第一就是各個自治會一定要有一個選舉過程，各校來代表必須是至少三個代表，我們才能認可你們院校的常委位置；第二是你要把你們學校自治會的組織架構和各部名單拿來。這個會是開得非常成功的。而且這之後我們馬上又完善了章程，財務部交張伯笠。到了絕食結束以後，我好象又重新找回自己在高聯的位置。高聯又開始從基層組織做起。當時不管是代表會，還是常委會都是開得非常有序。其中有一個原則，鑒於過去經常發生撤其它院校代表的問題，我也檢討我自己，我也參加過好幾次撤，以後決定任何院校代表沒有權力撤其它院校代表。你祇能向他的學校自治會發通告，就是我們和你們院校代表合作不愉快，請你們學校改派代表。鄭旭光他們學校換了一個常委，我們學校到了二十六日新產生的研究生會的幾個主要領導已經開始離開北京，所以我們學校無論如何不願換我。就這樣，鄭旭光還特別提出來，你不應該老在這兒，你至少應該換一下。全國學聯這個問題，在開始整頓時我們就討

論過。廣場上有這麼多外地學生，而且有人說，你們不能祇注意北京的學生運動，但是我們堅決給否決掉了。我們的理由是，沒有辦法確認他們在當地有基礎，而且我們認為來北京的這些學生不能成為當地的學生代表，他最多是外地學生駐京聯絡站的這種性質。所以第二天他們帶著外地學生來的時候，雖然人都來了，我們還是給否定掉了。五二八撤退也是那會兒提出來的。因為已經得知五二八有一個全球華人大遊行，所以和楊濤他們北大同學一塊具體地策劃了準備撤退的計劃。為此我還回我們學校作過一次匯報和宣傳。我認為五二八要成功撤退的話，五二七星期六要作一天的宣傳，充分講足成績，讓大家有滿足感。後來我和鄭旭光幾個人不斷地回廣場，可能我們有廣場情結。這就造成我們和王有才楊濤他們不斷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高聯的重點究竟是應該在後方還是在廣場。高聯開會時政法有一個博士生等三人來提出，【以上第 216 頁】現在你們祇顧核心，

沒有注意到北京市究竟有多少人參加運動。在目前情況下，實際上人民已經證明了學生運動的正確性，你們學生也應該證明人民，這也是一個互證關係的問題。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我們決定，工人被捕的時候我們要聲援。我和梁二、邵江最後發罷工、罷市通知都是基於這個認識。關於這個互證的問題在一次全體代表會上也討論過。

高聯回去整頓的兩個原則，第一就是各個自治會一定要有一個選舉過程，各校來代表必須是至少三個代表，我們才能認可你們院校的常委位置；第二是你要把你們學校自治會的組織架構和各部名單拿來。這個會是開得非常成功的。而且這之後我們馬上又完善了章程，財務部交張伯益。到了絕食結束以後，我好象又重新找回自己在高聯的位置。高聯又開始從基層組織做起。當時不管是代表會，還是常委會都是開得非常有序的。其中有一個原則，鑒於過去經常發生撤其它院校代表的問題，我也檢討我自己，我也參加過好幾次撤，以後決定任何院校代表沒有權力撤其它院校代表。你祇能向他的學校自治會發通告，就是我們和你們院校代表合作不愉快，請你們學校改派代表。鄭旭光他們學校換了一個常委，我們學校到了二十六日新產生的研究生會的幾個主要領導已經開始離開北京，所以我們學校無論如何不願換我。就這樣，鄭旭光還特別提出來，

你不應該老在這兒，你至少應該換一下。全國學聯這個問題，在開始整頓時我們就討論過。廣場上有這麼多外地學生，而且有人說，你們不能祇注意北京的學生運動，但是我們堅決給否決掉了。我們的理由是，沒有辦法確認他們在當地有基礎，而且我們認為來北京的這些學生不能成為當地的學生代表，他最多是外地學生駐京聯絡站的這種性質。所以第二天他們帶著外地學生來的時候，雖然人都來了，我們還是給否定掉了。五二八撤退也是那會兒提出來的。因為已經得知五二八有一個全球華人大遊行，所以和楊濤他們北大同學一塊具體地策劃了準備撤退的計劃。為此我還回我們學校作過一次匯報和宣傳。我認為五二八要成功撤退的話，五二七星期六要作一天的宣傳，充分講足成績，讓大家有滿足感。後來我和鄭旭光幾個人不斷地回廣場，可能我們有廣場偏結。這就造成我們和王有才楊濤他們不斷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高聯的重點究竟是應該在後方還是在廣場。高聯開會時政法有一個博士生等三人來提出，【以上第 216 頁】現在你們祇顧核心，沒有注意到北京市究竟有多少人參加運動。在目前情況下，實際上人民已經證明了學生運動的正確性，你們學生也應該證明人民，這也是一個互證關係的問題。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我們決定，工人被捕的時候我們要聲援。我和梁二、邵江最後發罷工、罷市通知都是基於這個認識。關於這個互證的問題在一次全體代表會上也討論過。

【王超華：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六日我有三個內容。我祇講了第一、第二，第三個具體整頓的過程沒有講。

高聯的整頓是楊濤他們拿著北大的一個名單去的。重選秘書長也是重新提名，特別提的王有才，高聯常委投票確定了。四十一樓的那個房間成了器材室，有一個同學在那看復印機，凡是我們這邊作了決議，那邊都能馬上給復印出來。這樣實際上等於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設想，就是北大成了高聯的中心。北大本來就是運動的一個中心，現在理所當然地終於成了高聯的中心，主席和秘書長就是北大的主席和秘書長。實際上因為不能兩邊兼顧，王有才辭了北大的秘書長。北大換了另外一個人作秘書長之後，配合得也是很好的。不過那時我在高聯已經不是很主要的了，楊濤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梁二：高聯整頓時成立了幾個執行機構。第一是秘書處，高聯與秘書處的關係是決策與行政的關係，但是實際上當時高聯常委當中祇有我一個人擔任了行政上的職務，而且是兩個，其中一個是秘書處委托高聯常委組成的一個財務部督察常委會，就是常委小組，我、少江、徐兆良三人組成，因為我們主要參與

了許多財務事務。我自己擔任的第二個職務是外聯部部長，這與王丹相應，他擔任對內聯絡，與各階層知識分子、學生的聯絡。我擔任外聯的原因主要是我與香港同學有一定的感情基礎，我已經有接觸的事實這樣的一個歷史。也許高聯當時是被迫接受的，我就成為了高聯的外聯部部長和高聯常委會財物督察小組三常委的常委組長。當時是我為首，少江和徐兆良是受我領導。這可能是在後來中共通緝的名單上比較高一點的、排在前邊一點的、特別是發表第二次通緝的原因之一。】【以上第 217 頁】

4 . 3 廣場指揮部（李錄）

4.3.1 廣場指揮部沿革〈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從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期間，廣場指揮部在不同的時間裏曾經取過不同的名字，但由於人員的一貫性，其活動帶有一貫性。這期間廣場指揮部主要的任務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最重要的是政策的決定，包括和政府的談判、學生內部的討論、對下一步對學運的看法、撤與不撤，等等，這都屬於在這一期間，學運所面臨的最基本的政策問題。第二主要是廣場中的組織、人事、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領導層的建立、下屬執行部門的執行情況等等，這是屬於組織線索。這裏包括的組織有絕食團、臨時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北高聯、外高聯、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議和它聯繫的其它七個組織。第三個是廣場整頓。最初的原因是幾十萬大學生、工人、市民在最初戒嚴幾天集聚廣場所造成的食物、醫藥、健康、物資等等各方面的問題，後來由於組織領導層的不力使得這些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同時又加上了垃圾和瘟疫的問題，所以就使得這個問題從二十二日成立臨時指揮部以來一直成為一個我們所面臨的核心的問題。裏面也包括了學生組織內部在後期的分化、腐敗，香港組織的物質介入以及民主大學的成立。民主大學的成立事實上是我們對廣場整頓的最有效的措施，或說是針鋒相對的措施。第四，因為所有這一時期的活動都是在戒嚴令的陰影之下進行的，所以反對戒嚴、保障同學基本的生命權力成為這一時期廣場指揮部行動的大的特色。這裏包括阻擋軍車的組織、各種各樣的緊急措施、與軍隊的聯系、醫藥、四君子的絕食，一直持續到屠殺和反屠殺。

臨時指揮部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由一百多位高校代表參加的會議決定的。在這之前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已經進行了至少是兩次到三次嘗試。第一次是我和伯笠，第二次是伯笠、我和柴玲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甚至達成了一個協議成立一個“保護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當時任命柴玲作總指揮，張明、周鋒鎖、鄭旭光作副總指揮，我作為軍事總指揮、總調度。當時是想弄糾察隊，這件事情沒成功。我們意識到，必須要重新建立一個基層組織，在基層組織授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在廣場上有號召力的組織。

五月二十日的時候，我【以上第 218 頁】們和鄭義作出了一個決議，我們

認為這次戒嚴是一場有策劃、有預謀的反革命政變。給它定性之後，我就對老封、柴玲、伯笠講過我的一個根本的看法，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但是廣場面臨一個更大的困難，各個組織林立，當時成立的有代表性的組織至少已經有七個包括市民工人外地學生高聯等等，已經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統一的指揮，與此同時，號召同學撤離廣場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在廣場上，繼續靜坐，如何進行下一步的鬥爭成為有責任感的學生領袖的最大的議題。當時的想法包括五月二十、二十一日作的兩次嘗試都是想重新恢復一個中心的領導階層，統一調動。後來指揮部之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繼續維持中心的領導位置是與我們這些人對權力來源的基本認識有關的。我們認為權力來源一定要有授權。老封在這點上有他的特色的、帶有固執色彩的認識，幾乎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其他人在這點上是有共識的。所以二十二日當王志新、超華告訴我們北高聯召開這樣一個會議的時候，我個人的想法是，我正想找辦法召開這麼一次會議。我們就形成了一個臨時的總指揮部，被授權四十八小時管理廣場。我們希望從此廣場能夠形成一個團結統一的局面。但是這個局面在第二天由於王超華的離開帶上了一定的陰影。但是當時我沒感覺到這中間會有多大的傷害。

五月二十日的時候，我【以上第 218 頁】們和鄭義作出了一個決議，我們認為這次戒嚴是一場有策劃、有預謀的反革命政變。給它定性之後，我就對老封、柴玲、伯笠講過我的一個根本的看法，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但是廣場面臨一個更大的困難，各個組織林立，當時成立的有代表性的組織至少已經有七個包括市民工人外地學生高聯等等，已經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統一的指揮，與此同時，號召同學撤離廣場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在廣場上，繼續靜坐，如何進行下一步的鬥爭成為有責任感的學生領袖的最大的議題。當時的想法包括五月二十、二十一日作的兩次嘗試都是想重新恢復一個中心的領導階層，統一調動。後來指揮部之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繼續維持中心的領導位置是與我們這些人對權力來源的基本認識有關的。我們認為權力來源一定要有授權。老封在這點上有他的特色的、帶有固執色彩的認識，幾乎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其他人在這點上是有共識的。所以二十二日當王志新、超華告訴我們北高聯召開這樣一個會議的時候，我個人的想法是，我正想找辦法

召開這麼一次會議。我們就形成了一個臨時的總指揮部，被授權四十八小時管理廣場。我們希望從此廣場能夠形成一個團結統一的局面。但是這個局面在第二天由於王超華的離開帶上了一定的陰影。但是當時我沒感覺到這中間會有多大的傷害。

這個指揮部形成了一定的權威性，在這個基礎上開展各種各樣的活動。第一件事是統一糾察，第二是統一各個學校的調度。我的主要任務是繼續組建營地聯席會議。營地聯席會議在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中間主要是工作聯絡會議，基本的成員是中層的骨幹，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得指揮部和每一個絕食同學都建立了比較緊密的聯繫。但是到了廣場指揮部期間，由於我們負責的人員已經從三、四千人到了三、四萬人甚至是二十幾萬人，使得這樣的設想基本上不能實現了。所以從廣場指揮部成立以後到開第一次正式的工作會議，我在觀念上有一個變化，營地聯席會議已經變成了學生議會，這些代表已經不再是聯絡層裏的骨幹，他們是作為各個學校代表的一員。當然這中間的合理、合法性可以考慮，由於當時的緊急情況，我祇能做到這樣了。後來所有的重大決策都在這裏進行，權力來源是各校的授權，當然它的保障監督基本上沒有辦法了<參：李錄 4.6.1 誰是廣場最高權力機關？>

到了二十三日，柴玲興衝衝地來找我，說我們用不著擔心四十八【以上第 219 頁】小時的問題。因為我的主要想法是在這四十八小時內使廣場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以便在下一階段繼續得到同學們的信任。她告訴我有一個更大的組織叫“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由組織的形式形成授權。這也是我當時一直試圖進行的一個工作，我們很自然地參加了這個會議。在會議中作出決定，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委派了張倫作為糾察總長，老木作為宣傳部長，劉剛作為聯絡部長，二十四日形成實施。從此以後，廣場指揮部的正式權力基礎確定，當然這個基礎很不穩。下屬有十個部門，其中物質就包括帳篷食物、供水，中間與決策有關係的主要是它的秘書處，秘書處最多的時候有八、九十人，在紀念碑二層。常委在這個時期柴玲是總指揮，封從德、張伯笠、我繼續作副總指揮，還加上王超華、連勝德擔任過一天的常委。這期間基本上人員還是以原來的絕食團和後來參與的外地學生為基礎。關於新聞發布會。在戒嚴最初的危險期之後，已經逐漸地出現了內部的分歧、腐化的傾向和爭名奪利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意識到了新聞的重要性，很多人工作的熱情開始下降，而接見記者的熱情開始升高。

所以指揮部不得不作出一項決定，沒有指揮部的批准不得見任何記者。但這個決定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執行，我作為當時的負責人祇能作一半的保證。我們確實是以身作則，直到後來決定，由柴玲出來作指揮部的新聞形象。這期間每天都安排新聞記者招待會，由我作主持人，發言代表指揮部，而不是個人。中間張伯笠也主持過，也作過發言人。

到了二十三日，柴玲興衝衝地來找我，說我們用不著擔心四十八【以上第 219 頁】小時的問題。因為我的主要想法是在這四十八小時內使廣場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以便在下一階段繼續得到同學們的信任。她告訴我有一個更大的組織叫“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由組織的形式形成授權。這也是我當時一直試圖進行的一個工作，我們很自然地參加了這個會議。在會議中作出決定，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委派了張倫作為糾察總長，老木作為宣傳部長，劉剛作為聯絡部長，二十四日形成實施。從此以後，廣場指揮部的正式權力基礎確定，當然這個基礎很不穩。下屬有十個部門，其中物質就包括帳篷食物、供水，中間與決策有關係的主要是它的秘書處，秘書處最多的時候有八、九十人，在紀念碑二層。常委在這個時期柴玲是總指揮，封從德、張伯笠、我繼續作副總指揮，還加上王超華、連勝德擔任過一天的常委。這期間基本上人員還是以原來的絕食團和後來參與的外地學生為基礎。關於新聞發布會。在戒嚴最初的危險期之後，已經逐漸地出現了內部的分歧、腐化的傾向和爭名奪利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意識到了新聞的重要性，很多人工作的熱情開始下降，而接見記者的熱情開始升高。所以指揮部不得不作出一項決定，沒有指揮部的批准不得見任何記者。但這個決定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執行，我作為當時的負責人祇能作一半的保證。我們確實是以身作則，直到後來決定，由柴玲出來作指揮部的新聞形象。這期間每天都安排新聞記者招待會，由我作主持人，發言代表指揮部，而不是個人。中間張伯笠也主持過，也作過發言人。

4.3.2 廣場指揮部與北高聯、外高聯的關係

這一時期人事變動的一大特色是和其它組織的關係。和高聯的合作基本上是失敗的，一度甚至出現了敵對的情況。主要原因是高聯在廣場上的活動特色是以個人為基礎的，而這些個人在絕食過程中我們從合作到中間出現一些分歧，到最後在戒嚴這樣的壓力下產生了猜疑。尤其是在五月二十三日這次合作失敗之後使得合作越來越不可能。應該負責任最大的不是超華，而是鄭旭光。我和他個人接觸不多，但是每一次聽說政變都和他有關係。我是證實梁二剛才的說法。對於他的代表性問題，開始傳說很多，說他是個體戶，不是學生，我也沒辦法證實。對超華代表性的懷疑來源於他們學校在廣場上的何桂芳，還有陶永怡

等。非常遺憾，我不想去作進一步的道德評價，但我個人在【以上第 220 頁】後來對這個問題一直是耿耿於懷。從我們這方面我要作很多檢討了。高聯回北大進行整頓之後形成了比較強有力的組織，有了一整套的設想以後，矛盾就變得日益突出出來。在政策上也形成了分歧。最後發展到王有才以高聯的名義命令北大的特糾去廣場綁架我。由於高聯代表沒有參加廣場議會，所以高聯的聲音在廣場沒有起到強有力的影響力，使高聯和廣場議會形成的決議逐漸形成分歧，尤其是在撤與不撤的核心問題上，所以影響了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合作。外高聯成立的原因，最初是由於外地學生到京之後，食物物資供應不能保障，在決策上又一再受到各種組織的歧視，象超華提到的在開會的時候不準外地學生進場等等，所以他們決定自己要成立組織。他們有大概四十幾個學校的基礎，這個聯盟是最早形成的。後來由於連勝德有點象半瘋一樣站出來，在那個時期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小核心圈子。在這個圈子底下，外地學生的基本情緒是不一致的。外地學生對於所謂的外高聯是不承認的。由於外高聯這些人的權力心思比較重，所以他們不斷地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政變。按照我後來的調查，都是這些人中某一個人突然覺得他要接管了，就去找某一個學校，某一個學校正好來了這麼長時間都磨拳擦掌地沒找到事幹，於是就聽他的。可到了廣播站聽在場的人一解釋，張倫在場的時候，他一介紹，再加上柴玲、封從德、我、張伯笠，我們都是每天撲滅多少次這樣的政變了，也都有經驗了，所以這個政變就象兒戲一樣，沒有一次政變真正地成功過，真正地形成過氣候。但是在指揮部的上層、領導層上，尤其在紀念碑上一度形成了很混亂的局面。實際上下面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很堅決。但在指揮部上邊烏煙瘴氣的。這是對政

政□

這一時期人事變動的一大特色是和它組織的關係。和高聯的合作基本上是失敗的，一度甚至出現了敵對的情況。主要原因是高聯在廣場上的活動特色是以個人為基礎的，而這些個人在絕食過程中我們從合作到中間出現一些分歧，到最後在戒嚴這樣的壓力下產生了猜疑。尤其是在五月二十三日這次合作失敗之後使得合作越來越不可能。應該負責任最大的不是超華，而是鄭旭光。我和他個人接觸不多，但是每一次聽說政變都和他有關係。我是證實梁二剛才的說法。對於他的代表性問題，開始傳說很多，說他是個體戶，不是學生，我也沒辦法證實。對超華代表性的懷疑來源於他們學校在廣場上的何桂芳，還有陶永怡等。非常遺憾，我不想去作進一步的道德評價，但我個人在【以上第 220 頁】後來對這個問題一直是耿耿於懷。從我們這方面我要作很多檢討了。高聯回北大進行整頓之後形成了比較強有力的組織，有了一整套的設想以後，矛盾就變得日益突出出來。在政策上也形成了分歧。最後發展到王有才以高聯的名義命令北大的特糾去廣場綁架我。由於高聯代表沒有參加廣場議會，所以高聯的聲音在廣場沒有起到強有力的影響力，使高聯和廣場議會形成的決議逐漸形成分歧，尤其是在撤與不撤的核心問題上，所以影響了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合作。外高聯成立的原因，最初是由於外地學生到京之後，食物物資供應不能保障，在決策上又一再受到各種組織的歧視，象超華提到的在開會的時候不準外地學生進場等等，所以他們決定自己要成立組織。他們有大概四十幾個學校的基礎，這個聯盟是最早形成的。後來由於連勝德有點象半瘋一樣站出來，在那個時期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小核心圈子。在這個圈子底下，外地學生的基本情緒是不一致的。外地學生對於所謂的外高聯是不承認的。由於外高聯這些人的權力心思比較重，所以他們不斷地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政變。按照我後來的調查，都是這些人中某一個人突然覺得他要接管了，就去找某一個學校，某一個學校正好來了這麼長時間都磨拳擦掌地沒找到事幹，於是就聽他的。可到了廣播站聽在場的人一解釋，張倫在場的時候，他一介紹，再加上柴玲、封從德、我、張伯笠，我們都是每天撲滅多少次這樣的政變了，也都有經驗了，所以這個政變就象兒戲一樣，沒有一次政變真正地成功過，真正地形成過氣候。但是在指揮部的上層、領導層上，尤其在紀念碑上一度形成了很混亂的局面。實際上下面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很堅決。但在指揮部上邊烏煙瘴氣的。這是對政

□

4.3.3 廣場後期工作

廣場整頓最初是來源於財政和物資的匱乏，後來這成了我們最頭疼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封從德的能幹，看來實在是沒有辦法解決。在最初的幾天，一度幾乎進入混亂，尤其是外地同學。後來他們成立外高聯也跟這有關係。找不到東西就要跟你打架，吃不到東西就引起混亂，還有很多其它反面的現象。後來封從德自己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沒想到兩三天之內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而且解決得相當【以上第 221 頁】好。物資和醫藥的基礎是在五月十三日到十九日中間形成的，後來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由於香港物資站的介入，形成了另一個大角。〈參：封從德 4.7.6 廣場後期的財務〉

廣場整頓最初是來源於 財政和物資的匱乏，後來這成了我們最頭疼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封從德的能幹，看來實在是沒有辦法解決。在最初的幾天，一度幾乎進入混亂，尤其是外地同學。後來他們成立外高聯也跟這有關係。找不到東西就要跟你打架，吃不到東西就引起混亂，還有很多其它反面的現象。後來封從德自己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沒想到兩三天之內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而且解決得相當【以上第 221 頁】好。物資和醫藥的基礎是在五月十三日到十九日中間形成的，後來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由於香港物資站的介入，形成了另一個大角。〈參：封從德 4.7.6 廣場後期的財務〉

對於運動的下一個階段，北京學生和外地學生也形成了一些分歧。當時的情緒占了很大的成分：一個是大家都比較疲勞，第二是對以後方向不明確，第三對於阻擋軍車有了一些盲目樂觀的勝利感，當然還是覺得對前途沒有任何辦法。在這個情況下廣場人數劇減，組織相對地混亂，秩序并不很好。二十六日的時候，我和柴玲、老封，伯笠都商量過，我希望對廣場進行全面的整頓。而這個整頓剛開始不久，柴玲要求辭職，伯笠因為要寫東西離開了廣場，老封主要是負責財政部。後來我就想倚重外面的人了，首先是派了一個外地學生，但不是很得力。我當時個人的任務比較重，每天要舉行營地聯席會議，最長的一次是四五個小時，而且每天定的都是十二點，人數多，情緒激動。所以那個時候耗神比較多。後來北大的楊濤主動提出來的時候，就請他作了一天的整頓廣場臨時總指揮。但他在三個小時之後就意識到了困難，沒有辦法進行下去，後來他就離開了。這個時候香港學聯開始起了最積極的作用，重新搭帳篷。

這個想法來源於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我、伯笠、老封、柴玲都在，我右邊坐的就是香港的邱延亮。當時他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說，“我們幹嘛那麼正式？我們要搞聯歡，要辦學校，辦營地，我們跟他來徹底的和平，對抗徹底的暴力。”這個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關於廣場整個秩序的規劃。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就和潘義畫了廣場整個的聯絡圖，就是未來的設計圖。這個設計圖分了十大方陣，十大部門還有民主大學都在這個設計圖之

內。這個圖劃得非常巧妙，是潘毅和他的助手一起作出來的，他是方方正正劃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後來就由他們幾位組織了幾百個外地學生成立了一個搭帳篷小分隊。這個帳篷搭得很有成效，一天之內在南面就全起來了，第二天北面又上來上百個，把香港送來的全部的材料都用完了。那個時候大概解決了一半的人，在北邊和南邊都形成了很好的陣式。這個陣式到鎮壓的時候就完蛋了。就是民主大學沒有人去落實，其它的祇要是那個圖上的都落實了。這個時候張伯笠回來了，他就去落實民主大學的事。伯笠也確實能幹，在一兩天之內辦起了世【以上第 222 頁】界上第一所這種類型的大學，這個實在是佩服。

這個想法來源於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我、伯笠、老封、柴玲都在，我右邊坐的就是香港的邱延亮。當時他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說，“我們幹嘛那麼正式？我們要搞聯歡，要辦學校，辦營地，我們跟他來徹底的和平，對抗徹底的暴力。”這個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關於廣場整個秩序的規劃。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就和潘義畫了廣場整個的聯絡圖，就是未來的設計圖。這個設計圖分了十大方陣，十大部門還有民主大學都在這個設計圖之內。這個圖劃得非常巧妙，是潘毅和他的助手一起作出來的，他是方方正正劃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後來就由他們幾位組織了幾百個外地學生成立了一個搭帳篷小分隊。這個帳篷搭得很有成效，一天之內在南面就全起來了，第二天北面又上來上百個，把香港送來的全部的材料都用完了。那個時候大概解決了一半的人，在北邊和南邊都形成了很好的陣式。這個陣式到鎮壓的時候就完蛋了。就是民主大學沒有人去落實，其它的祇要是那個圖上的都落實了。這個時候張伯笠回來了，他就去落實民主大學的事。伯笠也確實能幹，在一兩天之內辦起了世【以上第 222 頁】界上第一所這種類型的大學，這個實在是佩服。

按照原來的設想，按照在廣場議會上得到的決議，如果運動堅持到六月三十日，剩下來的組織形式就不叫指揮部，而叫民主大學了。因為我們也在考慮，運動結束之後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長期進行。我最初對北高聯這種形式是有非常欣賞的感覺的。我這個感覺是和香港支聯會還有李蘭菊這些人的想法是一樣

的，但在具體的操 作上我又同意老封的分析，設想是很好，但確實很難在當時形成這麼一個組織。我們知道廣場指揮部這種東西畢竟是暫時的，所以就希望有一個長期的。而當時決定 在六月二十日退出的時候附議了廣場上的民主大學將繼續存留下來，并一直保留下去。〈參：柴玲 4. 4. 1 戒嚴之後張伯笠 5. 1 民主大學〉

關於保障最基本的生命權是和糾察、阻擋軍車、以及當時半軍事性的各種行為是有關係的。我想要講起來全部都是細節，我就不再談了。四君子絕食、三千人知識 分子大絕食最先的聯絡、在廣場上辦音樂會、情報處、我二十一日的婚禮、二十一日常委會作出決議要轉入地下，二十日的軍事訓練等細節如果大家感興趣，我會對 這些細節進行詳盡地回憶。

如何把運動維持下去？如何對付政府的冷酷？如何對付二十萬的軍隊？這個時期學生運動已經很明顯地轉入到全民的民主運動，學生在中間到底起什麼樣的作用？這些都有過非常激烈的討論。而這個時期的討論 也使得整個廣場的情緒推到了最感情化的一個階段，甚至比絕食時期的感情化程度還要嚴重。矛盾已經徹底的白熱化，已經變成了最後一戰的樣子，大家都好象在作 最後決死的決戰。一方面對前途完全失望，一方面又抱著更大的希望，打倒李鵬等等都是在這一期間提出來的，但指揮部從來沒有明確地提倡過這些，也沒作出過任 何決議。這一期間廣場的情緒很厲害，使得和廣場上同學的聯系變得非常重要。廣場的議會每天開一次政策討論會，當然工作會議另加。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是在五月 二十五日的晚上一直到五月二十六日的凌晨，開了將近五個小時。三百多個學校的代表，二百八十八張有效票得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在以後的歷次會議中對它祇 有修改，沒有增訂。我想強調的是，所有重大的政策、決議都是在這個會中作出的，它叫“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它的性質是議會的性質。它已經和五月十三日到五 月十九日的營地聯席會議有所不同了。六月二日開始在廣場【以上第 223

頁】上的反對屠殺，并不是廣場指揮部從始到終貫穿的線索。我們從始至終貫穿的是非暴力的原則。在那個期間發生的所有事件我都是知道的，從六月一日到六月三日我整整三天沒睡覺。這一期間發生的事情和指揮部作出的重要決議在六月二日有一百盒磁盤帶出去了。第一次帶出去是在五月十九日是將近八十盤磁盤，這一百八十盤磁 盤如果能找到，對了解這一期間廣場的活動是有所幫助的。

如何把運動維持下去？如何對付政府的冷酷？如何對付二十萬的軍隊？這個時期學生運動已經很明顯地轉入到全民的民主運動，學生在中間到底起什麼樣的作用？這些都有過非常激烈的討論。而這個時期的討論也使得整個廣場的情緒推到了最感情化的一個階段，甚至比絕食時期的感情化程度還要嚴重。矛盾已經徹底的白熱化，已經變成了最後一戰的 樣子，大家都好象在作最後決死的決

戰。一方面對前途完全失望，一方面又抱著更大的希望，打倒李鵬等等都是在這一期間提出來的，但指揮部從來沒有明確地提倡過這些，也沒作出過任何決議。這一期間廣場的情緒很厲害，使得和廣場上同學的聯繫變得非常重要。廣場的議會每天開一次政策討論會，當然工作會議另加。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是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一直到五月二十六日的凌晨，開了將近五個小時。三百多個學校的代表，二百八十八張有效票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結論，在以後的歷次會議中對它祇有修改，沒有增訂。我想強調的是，所有重大的政策、決議都是在這個會中作出的，它叫“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它的性質是議會的性質。它已經和五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的營地聯席會議有所不同了。六月二日開始在廣場【以上第223頁】上的反對屠殺，並不是廣場指揮部從始到終貫穿的線索。我們從始至終貫穿的是非暴力的原則。在那個期間發生的所有事件我都是知道的，從六月一日到六月三日我整整三天沒睡覺。這一期間發生的事情和指揮部作出的重要決議在六月二日有一百盒磁盤帶出去了。第一次帶出去是在五月十九日是將近八十盤磁盤，這一百八十盤磁盤如果能找到，對了解這一期間廣場的活動是有所幫助的。

4.4 廣場總指揮（柴玲）

4.4.1 戒嚴之後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鐘，飛機來了。當時北京市民一片罵聲，下午軍人就開始進來提供各種各樣的建議。大家已經知道，北京市地下通道已經了布滿軍隊，尤其是在人大會堂地下。針對如何堵截軍隊，一些軍人來提供了很多建議，包括怎麼樣穿插、切割，學生應該作什麼樣的策略。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校和醫院裏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軍隊進來是想衝散廣場的同學，抓住這些指揮部的成員，達到擒賊先擒王的策略，所以要求指揮部第一批成員轉入地下。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又回到廣場，發現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晚上我們開會，廣場當時成立了許多組織，我們的基本共識就是盡可能地統一廣場的基本管理。我和王超華有一些分歧，

在會上我說過，“高聯自成立以來沒幹過一件好事。尤其是你們占據領導位置，但是不具備領導能力。對絕食你們根本就反對，當絕食在你們反對的情況下發起了之後，你們又進駐廣場對絕食同學表示理解和支持。我對這個事情表示非常不理解。”我當時說完這話，由高聯繼續管理的決議就被否決。既然絕食團指揮部從開始到現在始終都是一個核心，高聯當時又是指揮混亂，而且不斷地政變，兩天之內已經換過二百多位主席，所以就由我們絕食團指揮部暫時接替四十八小時廣場臨時指揮權，大多數人都同意了。我們吸收了王超華、連勝德、王丹進入廣場指揮的管理。五月二十三日凌晨，我和伯笠就去接管學運之聲廣播站，

接了以後我和伯笠就一直在那沒【以上第 224 頁】敢動身，怕再有政變或其它意外事件發生。〈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鐘，飛機來了。當時北京市民一片罵聲，下午軍人就開始進來提供各種各樣的建議。大家已經知道，北京市地下通道已經布滿軍隊，尤其是在人大會堂地下。針對如何堵截軍隊，一些軍人來提供了很多建議，包括怎麼樣穿插、切割，學生應該作什麼樣的策略。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校和醫院裏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軍隊進來是想衝散廣場的同學，抓住這些指揮部的成員，達到擒賊先擒王的策略，所以要求指揮部第一批成員轉入地下。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又回到廣場，發現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晚上我們開會，廣場當時成立了許多組織，我們的基本共識就是盡可能地統一廣場的基本管理。我和王超華有一些分歧，在會上我說過，“高聯自成立以來沒幹過一件好事。尤其是你們占據領導位置，但是不具備領導能力。對絕食你們根本就反對，當絕食在你們反對的情況下發起了之後，你們又進駐廣場對絕食同學表示理解和支持。我對這個事情表示非常不理解。”我當時說完這話，由高聯繼續管理的決議就被否決。既然絕食團指揮部從開始到現在始終都是一個核心，高聯當時又是指揮混亂，而且不斷地政變，兩天之內已經換過二百多位主席，所以就由我們絕食團指揮部暫時接替四十八小時廣場臨時指揮權，大多數人都同意了。我們吸收了王超華、連勝德、王丹進

入廣場指揮的管理。五月二十三日凌晨，我和伯笠就去接管學運之聲廣播站，接了以後我和伯笠就一直在那沒【以上第 224 頁】敢動身，怕再有政變或其它意外事件發生。〈參：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

中午十點左右有人來叫我，說要開一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這是我出席的第一次聯席會議。當時王丹被推舉為主持人，我作為廣場指揮占學生的一個席位，另外還有王軍濤、陳子明、邱延亮和其他的知識分子。當時的基本議題就是廣場整頓和短中長期的策略。我的印象是，他們可以負責廣場學生各組織之間的整合狀況。第二個事情是邱延亮先生提出，我們可以在這搞聯歡。我當時就意識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沒有帳篷就沒有廣場。在聯席會議上祇有邱先生和王軍濤讓我非常尊敬。他們說過，既然運動的衝鋒和主力骨幹都是學生，那麼我們知識分子希望能夠尊重學生的意見。我們不要搞成操縱，或者臨駕他們之上，而是作為一個服務、整合和協調。所以我對邱先生印象很深。我就跟邱先生說：“沒有帳篷就沒有廣場，希望香港務必幫助我們解決帳篷問題。”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回來的時候，我就跟李錄說了，不要擔心四十八小時臨時指揮權問題。接著就是大雨瓢潑，我看到所有的帳篷裏都收到了棉衣、棉被。所有學生的穿戴都比我溫暖舒服。〈參：李錄 4.3.3 廣場後期工作〉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成立。任命我是總指揮，下設各部人員。王丹在廣播裏宣佈，我帶領宣誓，宣佈指揮部成立。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想法，廣場有幾個大系統，一旦把這幾個大系統掌握起來，我們就完全可以全盤控制廣場。一個是廣播系統，在一個大的群體環境中，廣播形成凝聚，形成權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糾察、通行系統。第三是指揮部的建立以及它的固定的地方。第四是物資和錢的系統。第五是執行系統，包括秘書處。第六是新聞發布系統。第七是外聯系統，包括跟知識界、跟上層、跟籌委會、外地學生的關係。所以當時我就找到香港學聯，我和潘義在北京市買了幾頂帳篷，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搭起來了，在紀念碑二層建立了廣場指揮部。民主女神基本上是美術學院等藝術院校聯合自發建立的事情。我祇知道他們到指揮部來申請錢。當時我覺得這個主意非常好，盡可能給他們錢，具體落實由老封負責。

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三日，記者傳出貪污、爭權奪利的事情，以【以上第 225 頁】及山頭林立等事情。我的基本思想是對外還是絕對保持統一形象，第二在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以帳篷為單位。開始成立一個政策推行部，在六月二日的時候已經完全建成了。六月三日政策推行部這一批小孩子配合了晚上堅守和撤離的情況。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參加了第三次的聯席會。第二次聯席會議的時候，李錄、張伯笠都在，劉剛被任命為參謀部部長。他被排在通緝令的第三名也有這個原因。第三次聯席會議我和老封都參加了，當時還有我的助手馬兵同學。第三次聯席會上討論了一個議題，就是決定在五月三十日凱旋大撤退。當時大

家考慮了運動已經達到高潮，取得了相應的成績，需要撤退。細節是包括怎樣把這些所謂的領袖當作英雄抬回去和環市大遊行等。第二個議案是劉曉波提出來的。他說，知識分子和這些名人需要作一些犧牲，我們要幫助年輕的學生們。然後他推舉吾爾開希為中國的民主運動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遭到我跟封從德的激烈反對。因為我們知道每次開希以個人的名義來發布組織的命令，在廣場都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和損失。這一點不知道知識分子是不是知道。而且我們對知識分子這種被名利熏染過的基本判斷有一定距離，尤其是對他們這種造勢、造英雄的行為有一種強烈的不同意見。老封就說，領袖應該是在運動中自發產生的，你這樣推薦領袖造成的勢態，領袖個人素質的不具備和政治方面的訓練的不具備的話，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負面的影響。〈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三日，記者傳出貪污、爭權奪利的事情，以【以上第225頁】及山頭林立等事情。我的基本思想是對外還是絕對保持統一形象，第二在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以帳篷為單位。開始成立一個政策推行部，在六月二日的時候已經完全建成了。六月三日政策推行部這一批小孩子配合了晚上堅守和撤離的情況。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參加了第三次的聯席會。第二次聯席會議的時候，李錄、張伯笠都在，劉剛被任命為參謀部部長。他被排在通緝令的第三名也有這個原因。第三次聯席會議我和老封都參加了，當時還有我的助手馬兵同學。第三次聯席會上討論了一個議題，就是決定在五月三十日凱旋大撤退。當時大家考慮了運動已經達到高潮，取得了相應的成績，需要撤退。細節是包括怎樣把這些所謂的領袖當作英雄抬回去和環市大遊行等。第二個議案是劉曉波提出來的。他說，知識分子和這些名人需要作一些犧牲，我們要幫助年輕的學生們。然後他推舉吾爾開希為中國的民主運動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遭到我跟封從德的激烈反對。因為我們知道每次開希以個人的名義來發布組織的命令，在廣場都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和損失。這一點不知道知識分子是不是知道。而且我們對知識分子這種被名利熏染過的基本判斷有一定距離，尤其是對他們這種造勢、造英雄的行為有一種強烈的不同意見。老封就說，領袖應該是在運動中自發產生的，你這樣推薦領袖造成的勢態，領袖個人素質的不具備和政治方面的訓練的不具備的話，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負面的影響。〈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他當時我問了一下王丹，我認為王丹是在運動中最理性的一個同學，而這種理性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定義的靠邏輯、靠基本假設來表達個人觀念的所謂假

理性，我問王丹，“他們為什麼會這麼作？”王丹說：“你知道嗎，現在到這個會上來的人已經不僅僅是為民運考慮了，他們每個人都有個人的訴求動機在裏面。如果我是你，在這種情況下，或者退，或者利用這種情況幹一點事情。”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在這兒？”他說：“我有一點虛榮心吧。”第二次他給我理性的印象是在五月二十四日左右，老木和劉蘇裏開始再一次問李錄特務情況的時候，我就很受不了，因為已經解釋了上百遍了。我就說李錄你自己來回答吧。我當時就退在一邊問王丹，“明明大家都知道便衣搞一個學生證太不成問題，為什麼老把他沒有學生證說成是特務？”王丹就跟我說：“你知道嗎，作為一個運動發起人看到這個運動要被帶向一個所不能控制的方向，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並且要找出借口制【以上第 226 頁】止這種趨勢的發生。所以在根本上可以解釋為

大家同仇敵愾地認為他是特務。”我當時就非常傷心，我覺得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開始把運動向他們個人有好處的方向引導，而那些在感情上真正有共鳴的同學他們的願望開始被扭曲、被誤導。所以我當時非常難過。後來我回到廣場，另外的一個是總部糾察隊的人，他跟我說，“柴玲，你看，梁二，還有高自聯的人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一部步話機。我爭了半天，才祇拿了一個玩具的望遠鏡。我是總部糾察隊呀！”馬兵當時就說：“你們來是為 了什麼？是為了爭一個步話機呢？還是我們大家都希望國家向好的方向發展？”後來那個男孩子非常慚愧，他還是繼續留下來。我後來還去了海運學院的一部分同學那兒，他們當時的幾句話給我深刻的印象。他們說：“我們海運的同學因為穿制服就都被拉到廣場指揮部的周圍作糾察。我們看你們一批一批來，一批一批走。我們覺得你們什麼都沒有作，對你們特別失望。所以很多同學都回去了，我們是幾百人進京，現在祇剩下幾十個人。我為什麼要留下呢？”他流著眼淚跟我說，“我就是想看看，廣場究竟能亂到什麼程度，這個國家還有沒有希望？”我當時覺得很難過，我覺得我沒有力量給他們作出任何滿意的承諾和答復。

他當時我問了一下王丹，我認為王丹是在運動中最理性的一個同學，而這種理性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定義的靠邏輯、靠基本假設來表達個人觀念的所謂假理性，我問王丹，“他們為什麼會這麼作？”王丹說：“你知道嗎，現在到這個會

上來的人已經不僅僅是為民運考慮了，他們每個人都有個人的訴求動機在裏面。如果我是你，在這種情況下，或者退，或者利用這種情況幹一點事情。”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在這兒？”他說：“我有一點虛榮心吧。”第二次他給我理性的印象是在五月二十四日左右，老木和劉蘇裏開始再一次問李錄特務情況的時候，我就很受不了，因為已經解釋了上百遍了。我就說李錄你自己來回答吧。我當時就退在一邊問王丹，“明明大家都知道便衣搞一個學生證太不成問題，為什麼老把他沒有學生證說成是特務？”王丹就跟我說：“你知道嗎，作為一個運動發起人看到這個運動要被帶向一個所不能控制的方向，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並且要找出借口制【以上第 226 頁】止這種趨勢的發生。所以在根本上可以解釋為大家同仇敵愾地認為他是特務。”我當時就非常傷心，我覺得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開始把運動向他們個人有好處的方向引導，而那些在感情上真正有共鳴的同學他們的願望開始被扭曲、被誤導。所以我當時非常難過。後來我回到廣場，另外的一個是總部糾察隊的人，他跟我說，“柴玲，你看，梁二，還有高自聯的人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一部步話機。我爭了半天，才祇拿了一個玩具的望遠鏡。我是總部糾察隊呀！”馬兵當時就說：“你們來是為了什麼？是為了爭一個步話機呢？還是我們大家都希望國家向好的方向發展？”後來那個男孩子非常慚愧，他還是繼續留下來。我後來還去了海運學院的一部分同學那兒，他們當時的幾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們說：“我們海運的同學因為穿制服就都被拉到廣場指揮部的周圍作糾察。我們看你們一批一批來，一批一批走。我們覺得你們什麼都沒有作，對你們特別失望。所以很多同學都回去了，我們是幾百人進京，現在祇剩下幾十個人。我為什麼要留下呢？”他流著眼淚跟我說，“我就是想看看，廣場究竟能亂到什麼程度，這個國家還有沒有希望？”我當時覺得很難過，我覺得我沒有力量給他們作出任何滿意的承諾和答復。

當天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我從李錄那裏聽說，政府跟學生之間的變節分子勾結，對當時要堅持廣場的骨幹人物可以不擇手段地拉出去，所以五月三十日的凱旋大撤退的議案就被否決了。當天晚上白夢辭職，伯笠和趙瑜談要繼續寫書的問題。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

同記者作了一個採訪，說我最後的話：“我被推為廣場總指揮，祇能以組織名義講一些事情，我個人的情感祇能壓抑住。現在我要以個人的身份說一些我對這個運動的感觸。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運動已經沒有任何實質上取得勝利的可能性。中國人的民主素質太低，我要逃亡，我要繼續把民主的教育、啟蒙作下去，培養新一代的具有良好民主素質的人。廣場的旗幟是絕對不能倒，但是如果真正取得實質性勝利的話，除非有一個條件，發動各省自治。”

4.4.2 我參加運動的動機

我現在談我個人參加運動的動機，祇有這樣才能解釋我後來一系列決策的原因，以及我跟各組織間不同意見的原因。我參加運動是因【以上第 227 頁】為老封先參加，並且沒有征求我的任何同意。他八七年被抓之後，心靈裏留下一大塊空間的不正常，他對運動有一種近乎是神經質的執著，每次運動他都是必參加，每次參加他都是必發言，每次發言就是必激動。這在我們兩人的感情生活中和婚姻生活中造成了巨大的潛在的隱患。我想唯一能幫助他平復這個創傷的辦法是讓他參加，而且我也參加進去，因為我知道他的力量、長處和弱點。祇有讓運動整個的成功，才有可能有我們個人的幸福和安寧。在運動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幫助每個人發揮他們最大的力量，幹完了也就完了。李錄同我們建立信任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任何功利的考慮，幹完了也就幹完了，我們的生活再走入下一步。

我現在談我個人參加運動的動機，祇有這樣才能解釋我後來一系列決策的原因，以及我跟各組織間不同意見的原因。我參加運動是因【以上第 227 頁】為老封先參加，並且沒有征求我的任何同意。他八七年被抓之後，心靈裏留下一大塊空間的不正常，他對運動有一種近乎是神經質的執著，每次運動他都是必參加，每次參加他都是必發言，每次發言就是必激動。這在我們兩人的感情生活中和婚姻生活中造成了巨大的潛在的隱患。我想唯一能幫助他平復這個創傷的辦法是讓他參加，而且我也參加進去，因為我知道他的力量、長處和弱點。祇有讓運動整個的成功，才有可能有我們個人的幸福和安寧。在運動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幫助每個人發揮他們最大的力量，幹完了也就完了。李錄同我們建立信任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任何功利的考慮，幹完了也就幹完了，我們的生活再走入下一步。

當時我作總指揮和秘書處長時候的基本原則是你要名我就給你名，你要利我就給你利，我盡可能地根據每個人的內在需要去發揮他最大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在運動中我盡可能發現一大批既有才華又有能力的人，象李錄、伯笠、張倫，還有後來的辛苦同學、常勁等等。我的想法是幫助他們建立權威，讓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去發揮。這是我對人的基本信任和我基本的人生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特別能夠理解個人的心理需要和人的心理成長的障礙。但是有一個原則不能逾越，就是不允許個人的野心、雄心來傷害到整個組織的利益和整個

大眾訴求的方向，我不能夠允許靠大眾意志來壓迫個人，比如陳明遠來問李錄是不是特務。我同樣不能允許靠個人的力量來操縱大眾的意志和意願。尤其我對絕食的同學們有很強的感情，我覺得他們那麼無辜，無助。因為我發現在運動的後期一個個人是多麼可以操縱整個運動的方向，所以我覺得我象他們的母親，我不能夠看到他們付出代價之後，又因為一些個人的願望和要求，把他們整個的犧牲全部都葬送掉。後來對撤不撤這個問題為什麼有那樣不同的想法？八七年被抓的三十六個同學中北大有幾個人，他們後來有不同方向的發展。有一個同學整天擔心給他穿小鞋，他就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再也成長不起來。還有象老封這樣，他雖然超越了恐懼，由於他父親同他的討論，他永遠有當時被抓的精神刺激和事後要反抗的衝擊，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衡。所以為什麼當大軍壓境的時候，雖然理性的撤退可以造成最小的犧牲，但是每次統計的時候都有更多的人要留下來？我想大家有這樣的心理需要，我們就要這樣手牽著手、肩並著肩，我們共同面對這種恐怖。否則我們運動之後好象是活下來了，但我們是殘【

以上第 228 頁】廢的人，我們永遠有一種東西超越不了，那就是四十年來一直都是

在這種恐懼中生活，永遠沒有安全感，你不知道完了之後，平靜下去，你個人的未來個人的生活有沒有保障，他們可以無聲無息地把你失蹤掉，把你廢掉，

你哪怕活著也永遠是個殘廢人。六月四日我們撤下來以後，我見到一個博士生，

他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有一個小女孩又著手站在坦克面前說，你要是來就從

我身上壓過去。後來坦克就是從她身上壓過去了。你還有什麼好怕的？你看我現

在的口號就是，死都不怕，還怕什麼？"這就是大家當時的境界。我不否認當時

有大批湊熱鬧的，有大批聽見槍聲就跑的，但是有這樣一大批人，前面倒下去，

後面接著撿上來。這么一大批人，他們是中堅。完了以後他說"我上午擋完軍

當時我作總指揮和秘書處長時候的基本原則是你要名我就

給你名，你要利我就給你利，我盡可能地根據每個人的內在需要去發揮他最大的

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在運動中我盡可能發現一大批既有才華又有能力的人，象

李錄、伯笙、張倫，還有後來的辛若同學、常勁等等。我的想法是幫助他們建立

權威，讓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去發揮。這是我對人的基本信任和我基本的人

生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特別能夠理解個人的心理需要和人的心理成長的

障礙。但是有一個原則不能逾越，就是不允許個人的野心、雄心來傷害到整個

組織的利益和整個大眾訴求的方向，我不能夠允許靠大眾意志來壓迫個人，比如陳明遠來問李錄是不是特務。我同樣不能允許靠個人的力量來操縱大眾的意志和意願。尤其我對絕食的同學們有很強的感情，我覺得他們那麼無辜，無助。因為我發現在運動的後期一個人是多麼可以操縱整個運動的方向，所以我覺得我象他們的母親，我不能夠看到他們付出代價之後，又因為一些個人的願望和要求，把他們整個的犧牲全部都葬送掉。後來對撤不撤這個問題為什麼有那樣不同的想法？八七年被抓的三十六個同學中北大有幾個人，他們後來有不同方向的發展。有一個同學整天擔心給他穿小鞋，他就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再也成長不起來。還有象老封這樣，他雖然超越了恐懼，由於他父親同他的討論，他永遠有當時被抓的精神刺激和事後要反抗的衝擊，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衡。所以為什麼當大軍壓境的時候，雖然理性的撤退可以造成最小的犧牲，但是每次統計的時候都有更多的人要留下來？我想大家有這樣的心理需要，我們就要這樣手牽著手、肩並著肩，我們共同面對這種恐怖。否則我們運動之後好象是活下來了，但我們是殘【以上第 228 頁】廢的人，我們永遠有一種東西超越不了，那就是四十年來一直都是在這種恐懼中生活，永遠沒有安定感，你不知道完了之後，平靜下去，你個人的未來個人的生活有沒有保障，他們可以無聲無息地把你失蹤掉，把你廢掉，你哪怕活著也永遠是個殘廢人。六月四日我們撤下來以後，我見到一個博士生，他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有一個小女孩又著手站在坦克面前說，你要是來就從我身上壓過去。後來坦克就是從她身上壓過去了。你還有什麼好怕的？你看我現在的口號就是，死都不怕，還怕什麼？”這就是大家當時的境界。我不否認當時有大批湊熱鬧的，有大批聽見槍聲就跑的，但是有這樣一大批人，前面倒下去，後面接著擁上來。這麼一大批人，他們是中堅。完了以後他說“我上午擋完軍

我最近在巴黎見到庫德族的領袖，他們說，當時庫德族被侯塞因趕出來以後，全世界一片同情的力量和支持，後來就形成了侯塞因要和庫德族談判的局面。但是談判的時候他們的領袖按他們的文化規矩上來就吻了侯塞因的臉，行吻禮，從這以後全世界的支持全都沒了。這是一個人的尊嚴的問題，你要不要屈膝。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我再提供幾個細節。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時候，我在接待處接到一個人的信息，他說，鄧樸方在體育館的時候，記者看到他就說：“哎，

樸方，現在學生又鬧事了，你怎么看？”他在輪椅上說了一句話，“天還是天，地還是地。”記者一下子圍了上來。他的保鏢馬上就把他弄走了。他就是這個意思，天還是天，地還是地，我就是把大軍調進來，你給我退不退，不退你就得負責任。而我們同學包括開希都是非常有情感的孩子，他當然很願意勸大家撤。但是這就是我說的尊嚴的原則問題，我們要不要通過某種屈膝的方式來接受共產統治的壓迫？【以上第 229 頁】

關於和王超華的分歧，我不能允許個人通過他在組織中的位置來凌架或操縱、誤導這次運動，我當時基本是這樣判斷。絕食那天，我們的政見不同，事後他們又進入廣場，控制廣場的財務，再後又控制廣場跟上層聯系的信息和渠道，我是非常不贊成這種小人政治。我希望大家象人一樣堂堂正正地作事情，堂堂正正地合作，堂堂正正地對立，但是不要搞小動作。我這樣解釋是不願意傷害個人的尊嚴和自尊心。對王文的處理是這樣，王文我對他一開始也是要名給名，要利給利，比較尊重他個人的願望，給他一些機會讓他作事。直到有一天王文跟我說，“現在一個老師的部下來找我。”後來我就問，“是誰？”他說，“是個元帥。”我問，“是不是徐向前。”他就笑了，不吭聲。我說，“希望你能把這個聯系直接向核心部匯報。”他笑著說，“這是很機密的事，我不能告訴你。”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我給他的這個位置有可能給將來的運動造成多大的損害。我想，由於大家個人的願望和功利心割斷了很多這種指揮部核心和上層的直接聯系渠道，包括郭海峰後來說他和軍方有什麼聯系。為什麼撤掉王文也是這個想法。但是我要檢討，我的領導藝術不夠純熟，我應該在撤掉他之後給他一個位置，盡可能地減少他對運動的傷害。他後來的綁架事件也確實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當時非常地震驚，我沒想到我們并肩戰鬥的戰友會和我搞生死搏鬥。最後老封就說了一句，“王文，我們一直是非常喜愛和信任你，你今天搞出這樣的事情實在讓我很失望。”

六月三日早晨已經出現四個人被撞死的事件。這之前六月二日那一夜，李錄和超華、鄭旭光，還有外高聯的同學談了一夜，結論是各增加兩個常委的名額。六月三日的時候屠城已經開始了，這正是我們所有的帳篷快要搭起來的時候了。正在這時，他們的屠殺就開始了，非常及時。【以上第 230 頁】

4 . 5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張倫、老木）<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張倫：我這個人進入運動純粹是良心所迫。所有在座的祇有我和老木不是學生身份。前期參加運動，從四月十六日開始我就天天在天安門廣場，或是在北大、清華，就是這麼個過程。我過去在北大作過演講，關於民主問題和發展理論的討論，在復旦也作過演講。我的基本信念要知行合一，要事必躬親，民主運動不光是學生的事。所以我就進入運動。所有前期在廣場發生的重要事件我都在場，都是當事人

和同學的接觸我最早見的是柴玲，是四月二十三日的下午。他們當時是負責接待。我還和他們談了一會。第二次見面就是北大五四廣場的會開砸了以後，我很著急，我晚上吃飯的時候碰到柴玲和老封，老封還以為我是特務呢。我們秘密地談了一個多小時，鑒於高自聯這種情況，我建議老封趕快辭職。我和你們

談了北大幾年 前叱吒風雲的人物，當時你們并不很了解，這是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六點鐘。我建議上面不行的話，趕快抓基層。從各系推代表，進行基層選舉，確立北大的合法性。這是前期比較重要的事情。

4.5.1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成立（張倫）

我現在講聯席會議。聯席會議主要發起和組織的人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這批人。這批人在運動最初期，我的看法，還是抱著謹慎的看法。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 的當天下午在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開了一個重要的會，這個會的重要成員有王潤生、遠志明、吳稼祥、王軍濤、陳子明、陳小平、陳一咨的秘書楊曉等這麼一大批 人。這實際上是學術討論性質的會，但不能不牽涉到當時的一些具體問題。在王軍濤的判決書上牽扯到一些當時說話的內容，這是定罪的一個證據。知識分子最早的 簽名信，就是張伯笠在廣場念的那封簽名信，背後就是這些朋友。

絕食之後跟統戰部的一些聯系，以及最早的薊門會議。薊門會議最早的一、兩次我沒參加。項小吉寫了一個東西談到薊門會議，說是在海外現在祇有他參加過薊門會議。我想最早可能是這樣。但是十八【以上第 231 頁】日我從廣場回來，我已經參加了那個會。在會上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最後的一兩句話還是我加上去的，是周舵起的草。會議當中王丹、楊濤、王志新、項小吉都曾經參加過，各界的人都有。後來受到警察的嚴密注視，會議就全部轉移。

絕食之後跟統戰部的一些聯系，以及最早的薊門會議。薊門會議最早的一、兩次我沒參加。項小吉寫了一個東西談到薊門會議，說是在海外現在祇有他參加過薊門會議。我想最早可能是這樣。但是十八【以上第 231 頁】日我從廣場回來，我已經參加了那個會。在會上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最後的一兩句話還是我加上去的，是周舵起的草。會議當中王丹、楊濤、王志新、項小吉都曾經參加過，各界的人都有。後來受到警察的嚴密注視，會議就全部轉移。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廣場上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是我主持的，當時去了三十多人。因為晚上十點鐘要開這個會，所以我就把廣場上的全部清光。柴玲他們在那個角 上，差點被糾察隊員給揪出去，我當時過去給柴玲解的圍。我跟柴玲講一會兒有個會希望你參加。過一會兒我沒見著柴玲，柴玲是沒參加這個會，有梁二，少江是肯定參加了，還有王丹。當時所有重要組織的人都來了，名單我一下子說不過來，如果有時間我再補充。香港方面來的人是邱延亮和幾個人，包遵信、老木、劉曉波都 在，在紀念碑上邊二層開的。會中討論的一些問題，本來

是想形成一個東西，但是沒有形成。當時說第二天繼續開會。為了給歷史作證，我說明一點，北知聯的幾個人象陳學良、王潤生、遠志明，由於周舵派車去接他們來得晚了，會結束時才到。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所有的人都拉到社科院，在那兒的政治學術所開的會。這個會上關於怎么形成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我并不完全清楚。我第一是疲倦，第二我當時被推薦為糾察總長的時候，就立刻帶著工自聯和市民敢死隊的幾個人到另外的一個屋開會，進行糾察工作的部署，這邊怎么討論的我不清楚。在軍濤的審判書上有一段提到這個問題，說糾察總部張文在逃，“在充任糾察總長之後立刻召集了工人糾察隊、市民糾察隊、市民敢死隊的頭目開會，進行分工，編了聯絡代號，并在北京市地圖上標出了戒嚴部隊的所在位置，會後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聯合糾察總部，配備了對講機、望遠鏡，謀劃堵截部隊的活動。”這裏有些人下落不明，我現在不再講。工自聯最早的常委之一劉煥文當時是副糾察總長，現在已經被捕。後期在中國文化書院，在人大附中的裏邊開了會。當時已經是進入半秘密狀態，也許軍濤已經有了消息。經常參加會的有王丹、開希少江。具體問題我先不講。

老木：聯席會議我印象是在晚上在自己報名的時候，來了一些非常復雜的人，包括香港、美國。大家都非常害怕。第二天就是正式在社科院開會了。關於張倫為什麼離開，我的印象是張倫開會的時候在打瞌睡，最後幾天開會都是躺在地上開會。【以上第 232 頁】補充一點。就是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廣場的第一次會議，全美留學生第一批聲援團丁建他們在場。

老木：聯席會議我印象是在晚上在自己報名的時候，來了一些非常復雜的人，包括香港、美國。大家都非常害怕。第二天就是正式在社科院開會了。關於張倫為什麼離開，我的印象是張倫開會的時候在打瞌睡，最後幾天開會都是躺在地上開會。【以上第 232 頁】補充一點。就是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廣場的第一次會議，全美留學生第一批聲援團丁建他們在場。

梁二：請告訴我第一次聯席會議的準確日期。

張倫：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在政治所。首都各界聯席會正式名稱的會議應該是五月二十三日。以前的會比如在薊門飯店的，還有其它的我就知道了。

4.5.2 我為何成為廣場宣傳部長（老木）<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我的題目是廣場宣傳部，牽扯的面非常大，尤其是聽到剛才柴玲的一些發言，我不得不說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是由一批獨立於體制的知識分子，在不

同方向，在戒嚴前後，自動匯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軍濤、陳子明為主。這個聯席會議，我認為非常重要，它包括了戒嚴之後的全民運動主要自治組織的一些領導人，或者是代表。北高聯有代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包括廣場指揮部各個方面都有代表。為什麼聯席會議會和廣場指揮部發生一些矛盾呢？因為在絕食同學已經撤回北大後，廣場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力已經遭到置疑。他們為了確立權力，也向聯席會議申請，并由聯席會議任命。保衛廣場臨時指揮部是聯席會議任命的，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再一個事實是，我的宣傳部、張倫的糾察總部，還有參謀部、聯絡部，並不是廣場臨時指揮部的下屬機構，祇是平行機構。就是保衛廣場臨時指揮部必須聽從聯席會議的決定。在廣場紀念碑東北角的側面拉了一個橫布條“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聯絡部”。我為什麼會成為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呢？我實際上被張伯笠委任接管原有的宣傳部的機構。所以我就去接管廣場原有的所有機構，包括廣播站印刷處和編輯處。我設立了一個記者站，設立了一個演講團，這是我這個宣傳部的一些機構。結果我發現除了廣播站不聽指揮，連我都進不去，基本上所有的機構我都能指揮。有一個叫易水的，我估計是柴玲任命他為宣傳部長，被我的部下轟出去了。這是一個真實的事實。廣場指揮部是在五月二十四日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成立的。我的印象是包遵信不同意我到廣場去當宣傳【以上第 233 頁】部長，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新聞快訊》。

當時我除了負責廣場宣傳部以外，還負責《新聞快訊》。這是聯席會議接管的一個地下報紙。我還負責搜集情報，不是秘密情報，是搜集海外臺港各通信社的消息、報道。記者招待會是我、李錄，劉蘇裏、王丹四個人在裏面。開始建議我主持，後來因為我個子比較矮，人又非常多，劉蘇裏就拿過去了，他主持會議。王丹作主要發言，李錄基本上沒說話。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有新華社記者問，我是誰的時候，我本來不想回答，因為當時我們並沒有決定立刻暴露。下面有一個香港朋友，他立刻就說，“詩人老木”。

我的題目是廣場宣傳部，牽扯的面非常大，尤其是聽到剛才柴玲的一些發言，我不得不說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是由一批獨立於體制的知識分子，在不同方向，在戒嚴前後，自動匯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軍濤、陳子明為主。這個聯席會議，我認為非常重要，它包括了戒嚴之後的全民運動主要自治組織的一些領導人，或者是代表。北高聯有代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包括廣場指揮部各個方面都有代表。為什麼聯席會議會和廣場指揮部發生一些矛盾呢？因為

在絕食同學已經撤回北大後，廣場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力已經遭到置疑。他們為了確立權力，也向聯席會議申請，并由聯席會議任命。保衛廣場臨時指揮部是聯席會議任命的，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再一個事實是，我的宣傳部、張倫的糾察總部，還有參謀部、聯絡部，並不是廣場臨時指揮部的下屬機構，祇是平行機構。就是保衛廣場臨時指揮部必須聽從聯席會議的決定。在廣場紀念碑東北角的側面拉了一個橫布條“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聯絡部”。我為什麼會成為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呢？我實際上被張伯笠委任接管原有的宣傳部的機構。所以我就去接管廣場原有的所有機構，包括廣播站印刷處和編輯處。我設立了一個記者站，設立了一個演講團，這是我這個宣傳部的一些機構。結果我發現除了廣播站不聽指揮，連我都進不去，基本上所有的機構我都能指揮。有一個叫易水的，我估計是柴玲任命他為宣傳部長，被我的部下轟出去了。這是一個真實的事實。廣場指揮部是在五月二十四日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成立的。我的印象是包遵信不同意我到廣場去當宣傳【以上第 233 頁】部長，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新聞快訊》。

當時我除了負責廣場宣傳部以外，還負責《新聞快訊》。這是聯席會議接管的一個地下報紙。我還負責搜集情報，不是秘密情報，是搜集海外臺港各通信社的消息、報道。記者招待會是我、李錄，劉蘇裏、王丹四個人在裏面。開始建議我主持，後來因為我個子比較矮，人又非常多，劉蘇裏就拿過去了，他主持會議。王丹作主要發言，李錄基本上沒說話。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有新華社記者問，我是誰的時候，我本來不想回答，因為當時我們並沒有決定立刻暴露。下面有一個香港朋友，他立刻就說，“詩人老木”。

【封從德：你說的新聞快訊是在哪？

老木：新聞快訊是最初由知識界聯合會辦的。知識界聯合會要比聯席會議早成立，開始我負責這個東西，所以我是作為知識界聯合會的一個代表參加聯席會議的。知識界聯合會因為沒有活動，祇開了一次成立會，後來新聞快訊就很快交給了聯席會議領導。所有的編輯方針、文章都得經過討論然後才能夠簽發，發到北大去印刷。】

【王超華：我想問一下師大中文系編的《絕食快訊》的事。

梁二：是由師大在廣場上那個獨立的宣傳部搞的。它既不是高聯的，也不是師大本身的。就是一部分當初留在廣場上超華勸不動的那部分人。

王超華：他們是不是一直在紀念碑的北面沒移走？

梁二：沒錯。

李錄：我補充一下，當時的《絕食快訊》在不同的地方印了好幾種，都叫《絕食快訊》。

王超華：我主要想核實一下師大中文系的快訊是不是確實在那一直沒走，因為第一批絕食的並沒有全部都移到那邊去。】

4.5.3 與廣場指揮部的矛盾

我們聯席會的基本想法是，戒嚴之後，這個運動基本上是失敗了【以上第 234 頁】。失敗之後，一方面群眾的情緒非常高漲，“打倒李鵬！”“反對戒嚴！”等口號以及堵軍車等，另一方面是非常混亂。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北高聯在整頓，但是我們不知道有個臨時協議，四十八小時指揮部。在聯席會議上，我想是不知道，否則我們不會匆忙地作出決定，任命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當時參加聯席會議的有邵江、梁二，這些常委都在，就是北高聯的人。所以我想，他們當時可能不是很清楚臨時協議的事情。當時基本的想法就是，我們派人進去，就是我們知識分子進去到第一線。這就是為什麼劉蘇裏進到廣場，我為什麼接管了廣場宣傳部。我們不想超過你們，但我們要影響學生。我們為了使矛盾不至於公開化，所以大家還是都比較平靜，我們對柴玲沒有任何意見。我第一次和柴玲見面，她不認識我。第二次見面，她說：“啊，你就是老木。真高興。”我對她沒有任何意見。對李錄的想法是因為，他和我說過，他有學生證還是介紹信在別人手上。但當時他是拿不出來，等了他兩天拿不出來，我們才火了。為什麼形成這些矛盾呢？是我們希望進去，我們去影響。但是我們這些部長和柴玲無法討論事情，根本見不着面，不知你們在忙什麼。聯席會議的一個想法就是每天上午在社科院有例會。我發現柴玲祇來過三次。李錄呢，聽說是不願意來。這個說法不知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們希望進去的想法遇到了阻礙。我們當然就有另外的想法，有人提出來改變。改變的方式是讓北大把你們光榮地抬走。絕食期

問我們的判斷是你們就是低血糖癥，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絕食，已經不能正常地思考了。這個方案有人提出來，但沒有被接受。後來我們就採用了絕食的方法。絕食的方法討論了很多天，當時廣場指揮部不接受我們的意見，主要是五月二十七日的關於撤退的決議在廣場上遭到否決，我們覺得我們祇有上去絕食，才能讓你們知道我們象學生一樣，才有發言權。本來是六一絕食，推遲了一天。本來我們不想絕食，這是最下策的辦法。

我們聯席會的基本想法是，戒嚴之後，這個運動基本上是失敗了【以上第 234 頁】。失敗之後，一方面群眾的情緒非常高漲，“打倒李鵬！”“反對戒嚴！”等口號以及堵軍車等，另一方面是非常混亂。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北高聯在整頓，但是我們不知道有個臨時協議，四十八小時指揮部。在聯席會議上，我想是不知道，否則我們不會匆忙地作出決定，任命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當時參加聯席會議的有邵江、梁二，這些常委都在，就是北高聯的人。所以我想，他們當時可能不是很清楚臨時協議的事情。當時基本的想法就是，我們派人進去，就是我們知識分子進去到第一線。這就是為什麼劉蘇裏進到廣場，我為什麼接管了廣場宣傳部。我們不想超過你們，但我們要影響學生。我們為了使矛盾不至於公開化，所以大家還是都比較平靜，我們對柴玲沒有任何意見。我第一次和柴玲見面，她不認識我。第二次見面，她說：“啊，你就是老木。真高興。”我對她沒有任何意見。對李錄的想法是因為，他和我說過，他有學生證還是介紹信在別人手上。但當時他是拿不出來，等了他兩天拿不出來，我們才火了。為什麼形成這些矛盾呢？是我們希望進去，我們去影響。但是我們這些部長和柴玲沒法討論事情，根本見不著面，不知你們在忙什麼。聯席會議的一個想法就是每天上午在社科院有例會。我發現柴玲祇來過三次。李錄呢，聽說是不願意來。這個說法不知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們希望進去的想法遇到了阻礙。我們當然就有另外的想法，有人提出來政變。政變的方式是讓北大把你們光榮地抬走。絕食期間我們的判斷是你們就是低血糖癥，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絕食，已經不能正常地思考了。這個方案有人提出來，但沒有被接受。後來我們就採用了絕食的方法。絕食的方法討論了很多天，當時廣場指揮部不接受我們的意見，主要是五月二十七日的關於撤退的決議在廣場上遭到否決，我們覺得我們祇有上去絕食，才能讓你們知道我們象學生一樣，才有發言權。本來是六一絕食，推遲了一天。本來我們不想絕食，這是最下策的辦法。

聯席會議的召集人是王丹，不是主持人。實際的主持人是王軍濤和包遵信，劉剛擔任秘書長的工作，後期我接替劉剛的工作。聯席會議一共開過三個地方，一個是社科院，一個是人民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最後幾天是北大。廣播站的問題。當時任命我是宣傳部長。但任命名單上沒有廣播站的任命名單，我當然以為廣播站受宣傳部管，就任命白夢當宣傳部付部長，他沒有接受。宣傳部作了一

個《廣場之聲》的小報，大概出了三、四期，後來就發生了六四事件。《新聞快訊》【以上第 235 頁】是印了八期，開始是在社科院印的，整個過程基本上是由我負責。我的日程是，上午開聯席會議，下午和傍晚是在廣場，夜裏印《新聞快訊》。每天就是這樣連軸轉，轉了十幾天。關於撤不撤的問題，這是最大的矛盾。五月二十六日的聯席會議是封從德和柴玲兩人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聯席會議。他們當時神情非常疲憊，也非常激動，要求撤退。聯席會議是絕對尊重你們的意見的，那麼我們就做所有的後勤準備工作，通知了北大。到了廣場，我和甘陽兩個人炮制了一個關於撤退的《十點聲明》。這個《十點聲明》在海外出現了兩個版本：一種是關於三十日撤退，一種是關於堅持到六月二十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混亂呢？我的印象就是到了廣場表決的時候李錄反對，多少人參加表決我不知道，至少張伯笠當時是不在。我只聽說是李錄反對，我沒有參加表決。我當時是趕快去印這個《十點聲明》去了。回來之後他們要求我改，我當時就火了，我說，剛剛印好，都作出決議了，怎麼又要改呢？我聽說，王軍濤也同意你們這個反對撤退的意見。因為你們學生作什麼決定，我們都支持。但是你們反反覆復的做法，我非常反感。這個事情是最大的矛盾。後來你們就再不參加聯席會議了。〈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聯席會議的召集人是王丹，不是主持人。實際的主持人是王軍濤和包遵信，劉剛擔任秘書長的工作，後期我接替劉剛的工作。聯席會議一共開過三個地方，一個是社科院，一個是人民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最後幾天是北大。廣播站的問題。當時任命我是宣傳部長。但任命名單上沒有廣播站的任命名單，我當然以為廣播站受宣傳部管，就任命白夢當宣傳部付部長，他沒有接受。宣傳部作了一個《廣場之聲》的小報，大概出了三、四期，後來就發生了六四事件。《新聞快訊》【以上第 235 頁】是印了八期，開始是在社科院印的，整個過程基本上是由

我負責。我的日程是，上午開聯席會議，下午和傍晚是在廣場，夜裏印《新聞快訊》。每天就是這樣連軸轉，轉了十幾天。關於撤不撤的問題，這是最大的矛盾。五月二十六日的聯席會議是封從德和柴玲兩人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聯席會議。他們當時神情非常疲憊，也非常激動，要求撤退。聯席會議是絕對尊重你們的意見的，那麼我們就做所有的後勤準備工作，通知了北大。到了廣場，我和甘陽兩個人炮制了一個關於撤退的《十點聲明》。這個《十點聲明》在海外出現了兩個版本：一種是關於三十日撤退，一種是關於堅持到六月二十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混亂呢？我的印象就是到了廣場表決的時候李錄反對，多少人參加表決我不知道，至少張伯笠當時是不在。我祇聽說是李錄反對，我沒有參加表決。我當時是趕快去印這個《十點聲明》去了。回來之後他們要求我改，我當時就火了，我說，剛剛印好，都作出決議了，怎麼又要改呢？我聽說，王軍濤也同意你們這個反對撤退的意見。因為你們學生作什麼決定，我們都支持。但是你們反反覆復的做法，我非常反感。這個事情是最大的矛盾。後來你們就再不參加聯席會議了。〈參：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

4.5.3 廣場是一個精神病院

我是比較晚進入廣場的。絕食的時候我是跟知識界一起活動，到戒嚴之後我才正式進入廣場。我的印象是，說不好聽話，廣場是一個精神病院，最典型的是王朝暉這樣的人，老封當時也是，跑來跑去不知道忙什麼，說兩句話就走掉了。柴玲呢，我就見柴玲哭過兩次。有一天晚上我有事情找你，你結果是一句話都不對我說，神情完全就是非常疲憊。所以我認為對理性的考慮不是很準確。關於撤不撤，這不是追究責任的問題，關鍵是當時的那種狀態的問題。後來我們聯席會議對廣場已經喪失希望，才派出四君子去絕食，然後再把廣場的指揮拿過來，這是我們的基本想法。關於聯席會議跟指揮部的關係。我發現我們的決議指揮部根本不能遵守，我們聯席會議就很失望，對你們包括對吾爾開希、對王丹都有一些看法。我在會上所感受到的王丹和吾爾開希的言論是當時最有理性的兩個人。【以上第236頁】

4.6 廣場營地聯席會議李錄〈參：李錄3.5.1 營地聯席會議〉

4.6.1 誰是廣場最高權力機關？

廣場指揮部成立以後，它的權力來源，政策的推行和後來權力的分布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基础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這個時候每一位代表已經不作為聯絡人、或者是中層骨幹，而是作為代表各校意見的議員了。所以所有重大

的決策都在聯席會議上討論、表決通過、推行等等。後來發現，這些人祇作議員，沒有很好地作為一個中層的骨幹去積極地推動下面學校的同學，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政策推行部，完全是柴玲一手弄起來的。當時有三十幾個人，他們的工作熱情高。每次形成討論之後，這些人就到各個學校去傳達一番，看看有什麼意見、想法再繼續去幹。這個部是非常有效的，彌補了營地聯席會議與學生之間聯系的不足。營地聯席會議參加的人員首先是包括各校的議員，然後是廣場指揮部的全體同學、各部的領導。我強調一點，老木幾乎沒去開過會，這個我意見很大，任命了這麼一個宣傳部長，根本找不著人影。〈參：4.8.3（4）老木主要作了哪些工作？〉

會議前期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主要核心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阻擋軍車？如何應付意外事件？因為在最初的幾天一直在討論軍隊肯定要進來，戒嚴以後沒有想到阻擋軍車還能有效。所以當時討論的是要撤離，怎樣撤離？在什麼時間撤離？撤離的方式怎樣？形成了一系列的決議，這是第一次、第二次討論的重心。二十一日晚上是最危險的，通過中央電視臺宣佈軍隊介入。我也是那天決定的要結婚，覺得活也活不了了，覺得活著沒娶個老婆當鬼都不滿意，所以結了一次婚，請柴玲、封從德夫婦做我的伴郎伴娘，伯笠簽發的證明書，是證婚人柴玲蓋的章。到了二十二、三日的時候，幾位主要領導絡繹都回來了。二十五日的時候基本確定軍人可以被控制住。

在這個時候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下一步怎麼辦？這就是二十五日晚上營地聯席會議最核心的議題，這個議題引起了最激烈的討論。老封、伯笠都試圖過主持，因為情緒過於激動主持不下去。後來會議是我主持。那個會開了將近【以上第 237 頁】五個小時。參加會議的代表有將近三百多人。討論的議案首先是會議記錄、會議紀律，要討論的幾個重要的內容確定下來了，有些東西剔除了。然後就對每一個議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在討論之前不要表決，這是我個人主持會議一個最基本的觀念。我相信在那次會議上，對於運動的方向、對於如何應付戒嚴令、對於是否撤離、撤離以後怎麼辦？等等一些最細節的政策性問題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討論。當時形成了四種方案，內容不再講。總之四種方案投諸表決，其中以壓倒多數，二百八十八個有效票裏有一百六十二票通過決議不撤，辦法是，一要發動群眾繼續展開反對戒嚴、阻擋軍車的運動；二是發動北京工人的罷工；三積極爭取和官方的接觸，要和人大的人民代表取得聯系，有可能召開緊急代表大會。這個議案提出來，而且通過了。基本想法是堅持廣場，發動進一步的鬥爭。因為運動已經到了一個決戰的時候，撤與不撤和成功與失敗都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當時祇有堅守廣場，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才可能保證最少的犧牲。

這是我總結大部分人的意見提出的議案中的一號，得到了大多數的承認。那個時候每天晚上都開，將近開了十幾次，議案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內容增加，每一次議案的時候我都重新把它提出來。而且提醒大家他們在這兒不僅是代表他們自己，而且代表他們所代表的本校的學生在發表意見，希望他們多爭取和其他同學的交流，等等。

在這個時候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下一步怎麼辦？這就是二十五日晚上營地聯席會議最核心的議題，這個議題引起了最激烈的討論。老封、伯益都試圖過主持，因為情緒過於激動主持不下去。後來會議是我主持。那個會開了將近【以上第 237 頁】五個小時。參加會議的代表有將近三百多人。討論的議案首先是會議記錄、會議紀律，要討論的幾個重要的內容確定下來了，有些東西剔除掉了。然後就對每一個議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在討論之前不要表決，這是我個人主持會議一個最基本的觀念。我相信在那次會議上，對於運動的方向、對於如何應付戒嚴令、對於是否撤離、撤離以後怎麼辦？等等一些最細節的政策性問題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討論。當時形成了四種方案，內容不再講。總之四種方案投諸表決，其中以壓倒多數，二百八十八個有效票裏有一百六十二票通過決議不撤，辦法是，一要發動群眾繼續展開反對戒嚴、阻擋軍車的運動；二是發動北京工人的罷工；三積極爭取和官方的接觸，要和人大的人民代表取得聯繫，有可能召開緊急代表大會。這個議案提出來，而且通過了。基本想法是堅持廣場，發動進一步的鬥爭。因為運動已經到了一個決戰的時候，撤與不撤和成功與失敗都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當時祇有堅守廣場，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才可能保證最少的犧牲。這是我總結大部分人的意見提出的議案中的一號，得到了大多數的承認。那個時候每天晚上都開，將近開了十幾次，議案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內容增加，每一次議案的時候我都重新把它提出來。而且提醒大家他們在這兒不僅是代表他們自己，而且代表他們所代表的本校的學生在發表意見，希望他們多爭取和其他同學的交流，等等。

4.6.2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是一個協調組織

我由於事情太多，所以去聯席會議的主要是柴玲和老封，可能主要是柴玲去和他們聯繫。當時據我得到的印象，聯席會議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而且我也不記得當時廣場指揮部和各界聯席會議有任何形式的矛盾。

到了二十七日的時候老封和柴玲回來告訴我們說形成了一個議案，三十日撤離。我說，這個議案是從哪裏來的？他說，這是從各界聯席會議來的。我問，聯席會議怎么作出的這個決議？是不是和廣場上的同學商量了？廣場上權力基礎從哪裏來？我提了這個以後，他們倆的看法就改變了，我問怎么會作出這個決議來？我說，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作出的決定如果不符合他們的意願的話很難【以上第 238 頁】行得通。而且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是違背民主原則的。最後協商的結果，首都各界聯席會是一個協調組織，主要是幫助後勤和協調，那么作為一個建議提出來，再討論，如果通過了的話，可以，不通過也無所謂。我印象是軍濤直接談的。那么就決定了把議案修改，修改成堅持到六月二十日。這個六月二十日也是他們提出來的。當時在聯席會議上還沒有形成這個決議，在記者會上宣佈有這麼個建議。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就宣佈了這麼個建議。在當天晚上的營地聯席會議中，三十日的建議被否決，但是六月二十日的建議被接受。當時是兩個建議，都是從各界聯席會議上來的。那天晚上討論的問題主要是整頓廣場，大家推選出楊濤作為整頓廣場臨時總指揮也是在那天晚上形成的。

到了二十七日的時候老封和柴玲回來告訴我們說形成了一個議案，三十日撤離。我說，這個議案是從哪裏來的？他說，這是從各界聯席會議來的。我問，聯席會議怎么作出的這個決議？是不是和廣場上的同學商量了？廣場上權力基礎從哪裏來？我提了這個以後，他們倆的看法就改變了，我問怎么會作出這個決議來？我說，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作出的決定如果不符合他們的意願的話很難【以上第 238 頁】行得通。而且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是違背民主原則的。最後協商的結果，首都各界聯席會是一個協調組織，主要是幫助後勤和協調，那么作為一個建議提出來，再討論，如果通過了的話，可以，不通過也無所謂。我印象是軍濤直接談的。那么就決定了把議案修改，修改成堅持到六月二十日。這個六月二十日也是他們提出來的。當時在聯席會議上還沒有形成這個決議，在記者會上宣佈有這麼個建議。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就宣佈了這麼個建議。在當天晚上的營地聯席會議中，三十日的建議被否決，但是六月二十日的建議被接受。當時是兩個建議，都是從各界聯席會議上來的。那天晚上討

論的問題主要是整頓廣場，大家推選出楊濤作為整頓廣場臨時總指揮也是在那天晚上形成的。

這個建議形成之後，政策的討論一直持續到六月一日，就是綁架之後的第一天。六月二日和三日由於屠城的開始已經沒有辦法再開會議了，所以關於政策的討論營地會議持續到六月一日。在六月一日之前，每一次作決議也祇是對從五月二十五到二十六日凌晨這個基本建議修改、補充，並無實質性的變化。我祇是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所以我祇是如實地報道當時的情況。到了最後的時候，由於這個會議形成了這麼一系列的習慣、決議，使得當時在廣場的權力的來源完全是由這個營地聯席會議所賦予的，任何建議如果不通過這個議會完全沒有辦法推行。政策推行部那三十幾個人主要負責和這上百位代表聯系。這樣一套自然的權力來源，才使得指揮部從頭到尾領導階層比較穩定，指揮部系統內部的領導階層也比較穩定，最後的政策也能貫穿到六月三日。最後一次表決是在六月四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左右，這個表決是由封從德主持的。當時是用的口頭表決的方式，我建議的用口頭，形成了撤離的決議。

營地聯席會議的另一個職能是形成對廣場各個部門的職權、新部門的設立，以及整頓廣場等技術性的問題作出決議，因為它確實有議會的性質。我對幾位主要的部長不去參加會議深感惱火，尤其是老木，老木一次都沒去過。開始的時候易水來找我，我還說，這是瞎胡鬧，沒經過正式任命的不可行。後來在營地聯席會議上對於幾個部提出了嚴重的批評，其中可能因為老木不在，對宣傳部的做法尤其提出批評。宣傳部當時的下屬機構太多，廣播站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機構，這個機構甚至比指揮部的秘書處還要重要，但是設於宣傳部之下，其實跟老木一點關係也沒有。它的印刷部也是完全獨立的，它的幾攤也跟他沒什麼關係。所以後來大家一致推舉還【以上第 239 頁】是由張伯笠回來再主抓。張伯笠後來再去找誰我就不知道了，總之到張伯笠重新把《廣場論壇》開出來，這個時候已經找不到老木的影子了。總之是議會授權伯笠重新主抓宣傳不讓老木再瞎搞了。但是也對其他幾個部門提出了嚴重批評。物資部從此就改成了三個部，包括食品部、供水部和物資部，由議會選出了外地的三個同學重新部署。這是在二十六、二十七左右。

營地聯席會議的另一個職能是形成對廣場各個部門的職權、新部門的設立，以及整頓廣場等技術性的問題作出決議，因為它確實有議會的性質。我對幾位主要的部長不去參加會議深感惱火，尤其是老木，老木一次都沒去過。開始的時候易水來找我，我還說，這是瞎胡鬧，沒經過正式任命的不可行。後來在營地聯席會議上對於幾個部提出了嚴重的批評，其中可能因為老木不在，對宣傳

部的做法尤其提出批評。宣傳部當時的下屬機構太多，廣播站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機構，這個機構甚至比指揮部的秘書處還要重要，但是設於宣傳部之下，其實跟老木一點關係也沒有。它的印刷部也是完全獨立的，它的幾攤也跟他沒什麼關係。所以後來大家一致推舉還【以上第 239 頁】是由張伯笠回來再主抓。

張伯笠後來再去找誰我就知道了，總之到張伯笠重新把《廣場論壇》開出來，這個時候已經找不到老木的影子了。總之是議會授權伯笠重新主抓宣傳不讓老木再瞎搞了。但是也對其它幾個部門提出了嚴重批評。物資部從此就改成了三個部，包括食品部、供水部和物資部，由議會選出了外地的三個同學重新部署。這是在二十六、二十七左右。

另一個討論內容就是如何整頓廣場。第三個討論的範圍就是指揮部領導階層的權限和人員的產生，不斷地得到合法性。因為在這之前我一直有這麼一個理想，真要搞民主。我們既然不是直接選出的，至少可以直接罷免，可以直接辭職。所以在這中間出過一些人事變動，任命過一些人，同意過一些人的辭職。比如說柴玲的辭職，就是在營地聯席會議上被通過的，柴玲的復職也是在營地聯席會議上被通過的。確確實實從頭到尾每一項重大的任命都有它的合法性基礎。包括二十四日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它的所有的名單都是在這個會議上講過，大家一鼓掌就過去了。我印象裏就沒有再投票，鼓掌聲挺響，也沒有什麼人反對，可能重要的原因是對這些人都不太熟，祇認識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當時是我們四個，後來一直沒有變。除了柴玲的辭職和復職，還有二十八日通過的楊濤為整頓廣場臨時總指揮。

另外一個在人事方面通過的重大議題就是趙世民的事。當時這個事情引起了最激烈的憤怒，這是僅次於絕食之外的。因為這是第一次這些議員聽到這種事情。當時是匯報到我、伯笠、老封，當時是責成老封把這件事查清，但是對他的處罰一定要在會議上作出。我的印象是沒有爭論出怎麼來處罰他。後來有人建議我們自己設一個法庭判一下，也有人說，這太影響形象。但是在撤銷他的全部職務，對他進行審查，逼他交出所有錢這方面形成了非常一致的意見。另一個處罰是對王文和他所代表的一些現象，包括指揮部秘書處報告來的，拿出喝水的瓶子，居然發現是一瓶硫酸的事情，包括萬朝暉和公安部的聯系等等都有人來作證。我記得有二、三次作關於情報部當天收集情報的報告等等。我把它放在第一類，關於反對戒嚴。這個事情到了五月二十九、三十日之後變得日益突出起來，所以這個題目又回到廣場聯席會議的主要議題。〈參：封從德 4.7.7 貪污嫌疑〉【以上第 240 頁】

4 . 7 廣場財務（梁二，封從德）

4.7.1 北高聯財務部（梁二）

【梁二：有什么人宣佈過梁二任財務部長？

王超華：我。

梁二：哪裏的財務部長？

王超華：我祇能宣佈高聯的。】

我當時最反感的是，無論是在高聯的常委會，還是廣場上的指揮部或絕食團成員當中那種對權力追求的執著狂。所以我當時基本上拒絕接見記者和任何一種新聞媒介。因為這是分工協作上的考慮，同時在接見記者當中必然產生對名利的追求和欲望，這就會影響我們在這個運動中真正的公正客觀的組織作用，所以我當時是拒絕接見記者的

這與絕食團本身的封閉和對責任的推卸是有關係的。我記得我當時要到絕食團財務部去，首先要過絕食團外圍糾察隊的關卡，這個關卡需要指揮部的直接簽名才能通過。到財務部之前還有一個關卡，我見到的最多是個接待員而已。與指揮部裏的指揮人員，比如柴玲、封從德、李錄等見面很困難，這種封閉造成我和一些要求捐款的市民或外地來的人員對絕食團的一種抵觸。所以所有的事情找高聯，要交錢的話也找高聯。

對絕食團的財務問題也有一個疑問。我記得王述東跟我說過，他們已經收到多少錢。後來王述東住醫院的時候有六萬塊錢在身邊被發現。所以我當時在成立財務部的時候，希望同學、市民把他們募到的捐交到我們這個地方來，避免交到絕食團那兒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財務很不健全，包括財務部長自身都帶了一筆錢到醫院去。

【常勁：王述東當時腦子已經糊塗了，那筆錢他準備去買武器，被制止了。】

我對超華和邵江都有一點不滿的地方，他們當時有一點推卸的感覺。超華在五月十七日財務部初建立起來以後就走了，而邵江一直祇是覺得有必要抓住財權，又不願意親身參與，對這我是很不滿的。邵江的參與就是幫我數了鈔票，所以我對這個很不滿。這樣我就自告奮【以上第 241 頁】勇做實事，我認為與其

作這種做秀的事不如幹一些實事，抓住財權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對超華和邵江都有一點不滿的地方，他們當時有一點推卸的感覺。超華在五月十七日財務部初建立起來以後就走了，而邵江一直祇是覺得有必要抓住財權，又不願意親身參與，對這我是很不滿的。邵江的參與就是幫我數了鈔票，所以我對這個很不滿。這樣我就自告奮【以上第 241 頁】勇做實事，我認為與其作這種做秀的事不如幹一些實事，抓住財權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當時考慮，財權和信息聯絡是兩個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在整個學運當中對聯絡部、宣傳部和財務部的關心是超出其它東西的。廣場上的實際情況給我造成的壓力感也使我感到我對這種現象必須負責。我記得第一個找我要錢的是一個天津大學的同學，那時我還沒有一點錢。他告訴我，與其說沒有吃的還不如開始絕食。我當時就覺得很難受，大家都因為沒有吃喝而絕食，那么就沒有人來維持這個生命線，這個問題很嚴重。絕食團把這個責任推卸之後就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承擔責任，組織在廣場上物資和飲食的供應。

被迫收錢這個問題我和超華是不謀而合。五月十七日有一部分人找上我們說，“這是我們捐獻給學生的錢。但是我們知道絕食團本身不能代表學生，絕食團的圈子我們也進不了，所以我希望把這些錢捐給所有的學生。希望你們拿著這些錢給所有的學生買飯。”這時不光是絕食學生的護理問題，還有學生在外面叫餓的問題，所以我們就被迫收錢。我記得在絕食團當中有一部分師大的同學，有一個教育系的姓鄭的同學帶著一部分人出去募捐。我就覺得，如果師大有這種情況發生，其它各校也同樣會有這種情況發生。而這些錢根本無法上帳，節制路口是很分散混亂的，我覺得有責任把這些入口統一起來。但實際上我根本沒做到，這與我設立財務部時的缺陷有關。因為人手有限，信息無法溝通，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廣播宣佈我們財務部的地點。實際上錢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那種力量把所有路口都完全統一起來。

財務部的設立是由於王超華和我到絕食團借錢很困難。我自己當時就咽不下這口氣，審批了半天時間得到了三千塊錢，很可憐。我們是以在廣場上開始基本活動如宣傳部的建立、廣播站的建立等等的名義申請的，沈彤把紀念碑的三層清理出來了，我們就坐在那片空地。我們上去本來是要建立廣播站，而不是財務部。因為後來被迫收錢，不得不讓超華作為收錢的，我是記帳的。後來變成我是收錢的，另一個人是記帳的，我稱之為超華和梁二結構，這是五月十七日傍晚。超華退下以後，晚上陸明霞進入紀念碑的第三層。這個時候紀念碑的第三層已經被逐漸的封鎖起來，形成一個封閉的、比較安全的地方。陸明霞進入之後，我就開始和她這個實際的高聯財務部長進行合作。但【以上第 242 頁】她自稱是高聯常委，不願對這些實際的事物進行管理。我當時很氣憤，曾經跟她發生過爭執。我逼她參與高聯財務部的組建，她記帳，我收錢，我就數鈔票，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象點鈔票的能力要比她強一點兒。在深夜的時候我接到天津一個市民的捐款，當時邵江也在我身邊，我就感覺到人手相當少。這時紀念碑三層人數逐漸增多，產生混亂。我心裏有一種潛隱的害怕，我雖然要求承擔了財務的責任，但我實際上很怕財務上出一點毛病，給我名譽上造成很大的損失。這種自私的觀點完全是自衛的方式、反應。

財務部的設立是由於王超華和我到絕食團借錢很困難。我自己當時就咽不下這口氣，審批了半天時間得到了三千塊錢，很可憐。我們是以在廣場上開始基本活動如宣傳部的建立、廣播站的建立等等的名義申請的，沈彤把紀念碑的三層清理出來了，我們就坐在那片空地。我們上去本來是要建立廣播站，而不是財務部。因為後來被迫收錢，不得不讓超華作為收錢的，我是記帳的。後來變成我是收錢的，另一個人是記帳的，我稱之為超華和梁二結構，這是五月十七日傍晚。超華退下以後，晚上陸明霞進入紀念碑的第三層。這個時候紀念碑的第三層已經被逐漸的封鎖起來，形成一個封閉的、比較安全的地方。陸明霞進入之後，我就開始和她這個實際的高聯財務部長進行合作。但【以上第242頁】她自稱是高聯常委，不願對這些實際的事物進行管理。我當時很氣憤，曾經跟她發生過爭執。我逼迫她參與高聯財務部的組建，她記帳，我收錢，我就數鈔票，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象點鈔票的能力要比她強一點兒。在深夜的時候我接到天津一個市民的捐款，當時邵江也在我身邊，我就感覺到人手相當少。這時紀念碑三層人數逐漸增多，產生混亂。我心裏有一種潛隱的害怕，我雖然要求承擔了財務的責任，但我實際上很怕財務上出一點毛病，給我名譽上造成很大的損失。這種自私的觀點完全是自衛的方式、反應。

4.7.2 財務與後勤工作

十七日下午收到五千塊錢之後我們就開始收錢，在廣場上奠定了北高聯的財政基礎。有了錢之後相對來說就好辦事了。當時我們就建立了一個財務部，超華和我最初一個是當會計，一個是當點票的。我記得是每一次不管是誰占領廣場上的指揮部或廣播臺都要宣佈一下財務部長梁二，這是一個好處。我記得每一次都有我，我也不知道誰是我的領導。總而言之，財務部長梁二一直沒有換，凡是有錢的事就找梁二審批。當時梁二擺了一下官架子，導致柴玲對我的一些不好的印象，我應該道歉。

食品站的建立問題。五月十六日上午，張明還有陸明霞都跟我談，北大和清華向外校和外地來的同學和市民散發一些食物，而且是在廣場上散發，師大是在校內散發。我當時有一個構想，就是我們給清華錢，讓清華把他們的食品供應站擴大成廣場上的食品供應站。後來我發現有個缺陷，清華祇能供應靠近毛澤東紀念堂的那片區域，但是在靠近天安門城樓這邊就作得比較少。這樣就有一些同學自發地組織起來建立了食品供應站。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北京工藝美術學院的女孩子向我提出申請，說她與北京一個食品加工廠有聯繫，希望從北高

聯撥出一些錢給他們建立一個食品供應站。我記得這個供應站從我手上批的錢超過十萬塊以上。因為當時人相當多，大約是百萬人以上

有些學校的同學是從外地來的，他們的住地在廣場更邊遠的地方。他們就向我提出申請，要求解決一下吃住，因為是剛來北京。我說住就在廣場上露天席地，吃可以在我這申請點錢。按照每個人配給五塊錢，大約是解決兩天。兩天以後自謀生路，比如找市民募捐。後來【以上第 243 頁】我發現，不僅存在絕食團、高聯兩個財務部，而且還存在很多比如市民的募捐箱，外高聯的募捐箱。總之接收捐款的組織和個人是層出不窮。有人說，捐款有一百萬。我確實是沒有收到這一百萬塊錢。

有些學校的同學是從外地來的，他們的住地在廣場更邊遠的地方。他們就向我提出申請，要求解決一下吃住，因為是剛來北京。我說住就在廣場上露天席地，吃可以在我這申請點錢。按照每個人配給五塊錢，大約是解決兩天。兩天以後自謀生路，比如找市民募捐。後來【以上第 243 頁】我發現，不僅存在絕食團、高聯兩個財務部，而且還存在很多比如市民的募捐箱，外高聯的募捐箱。總之接收捐款的組織和個人是層出不窮。有人說，捐款有一百萬。我確實是沒有收到這一百萬塊錢。

有很多糾察隊員，他們一站就站上幾天幾夜，吃飯很成問題。我們當時提出了流動食品供應站。有的同學就組織起來帶著食品或現金到各個地方。我記得當時有人曾在我這申請了三百塊以上的現金。

我剛才講了給糾察隊員提供飲食的問題。這個實際上不是什麼流動食物供應站，是同學自發地組織起來的。有的學生說，我的哥們兒已經在那站了一天一夜了，沒吃沒喝。他們就跟我要錢，要食物，或到食品站領取一些物資。特別是在後期，有一次下雨了，有很多同學到我這要錢買帽子、雨傘。

我覺得，北高聯的物資和財務部在我領導下能使一百多萬人在廣場上呆上個兩三天，還是比較成功的一件事。那個時候我記得每天的開支經費都是在將近二十萬元左右，供應量是非常大的。準確地說最高時是二十萬，我記得是在二十一日吧，就是堵了軍車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開支相當大。第二天向我申請的就比較少了。

糾察隊的秩序和組織方面，就是張迎新他們換防的問題。我記得我當時自己都去做糾察拉了一下手。這裏秩序包括生命線的維持。我曾經在給沈陽、大連來的比較小的學校同學發生活費，就是第一天每人五塊錢的同時，也給他們分配一個任務，就是你們有吃、有穿、有住的時候就到糾察隊或生命線邊上站一下。有些同學一直做得比較好，特別是紀念碑第三層上的糾察隊員都是很積極、很主動的，他們就一直保護少江、梁二。

後來有一個物資供應部就設在紀念碑的第三層上，就是財物部的對面，接收

一些捐來的物資。我記得當時不僅有人捐錢，還有人捐物資，包括電視機。當時廣場上沒有電線，我就只好讓徐兆良帶回法大了，是一臺彩色電視機。

還有一個秩序維持問題，就是從四月十五日就有一些市民嚴重地衝擊了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要地，人民大會堂的東門。有些人就找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人民大會堂如果一衝開的話，裏面的軍隊一下就會衝出來。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嚴重，而且也不希望因為市民這種無秩序的行動造成不必要的破壞。我當時跟一個工人一塊到人民大會堂東邊去，說服市民盡量不要衝擊人民大會堂。當時那個門已經被推【以上第 244 頁】鬆了，所以我們去的時候還來得及。還有就是衝擊新華門，在新華門同學絕食和絕水的地方建立防護圈。當時我是布置了這個任務。這是秩序和生命線的維持。

還有一個秩序維持問題，就是從四月十五日就有一些市民嚴重地衝擊了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要地，人民大會堂的東門。有些人就找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人民大會堂如果一衝開的話，裏面的軍隊一下就會衝出來。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嚴重，而且也不希望因為市民這種無秩序的行動造成不必要的破壞。我當時跟一個工人一塊到人民大會堂東邊去，說服市民盡量不要衝擊人民大會堂。當時那個門已經被推【以上第 244 頁】鬆了，所以我們去的時候還來得及。還有就是衝擊新華門，在新華門同學絕食和絕水的地方建立防護圈。當時我是布置了這個任務。這是秩序和生命線的維持。

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軍車已經開進了。當時我跟程真、香港專上學聯主席林耀強都覺得快完了，我們幾個人就親自跑到長安街上去。但是聽說軍隊已經被堵住了，我就只好回去重新數鈔票。這時有一些同學說，在二十日堵車的時候沒有基本的生活條件，一個是飲水，一個是食物，這兩個問題很難解決。有的同學為了防暑還申請一些草帽。這時有一些政法大學的同學提出，堵軍車一定要有組織，否則就會造成市民和軍隊的摩擦，繼而擴大造成大規模的屠殺。總而言之，第一一定要避免這種混亂局面，第二就是這個組織的一定要保持它的持久性，第三就是基本的飲食條件一定要保證。

【王超華：你提到物資站和財務處的情況。我印象當中徐兆良負責物資站。你們的分工是怎麼樣的？

梁二：物資戰不是徐兆良，他與我一塊搞財務，後來高聯也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委任我們為財務部的督察委員。當時有一個姓張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來的，後來我發現他的學生身份并不是很明確，當時發現他把物資部的一些東西拉走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實際上我們也是接受了一個既成事實。因為我們在廣場紀念碑第三層祇是在東南角上，有些同學在出口就把東西收下了，我們并不知道。他們在收集到相當大的程度時，那個姓張的哥們就自己委任為物

資部部長，把這些東西接管下來了不交給我們，他手下有一幫同學。物資部部長並不是高聯的人出任的，而且幾個分散的部長也不是由高聯的人出任的，都是各校的或根本不是學生，是市民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買了一些東西拿發票來找我們報帳，我們就給他們錢。

王超華：你覺得當時在分配物資上和他們配合還好嗎？

梁二：我覺得最初幾天很有效，最初大家都顯得比較單純，僅是服務而已。但後來有一些毛病，我發現有些人貪污。】

【常勁：你說設的那些物資分站有人負責。你能不能說一下，這些【以上第 245 頁】物資分站的負責人是誰？地點在哪？

【常勁：你說設的那些物資分站有人負責。你能不能說一下，這些【以上第 245 頁】物資分站的負責人是誰？地點在哪？

梁二：我一下無法記清楚，但是其中有四個主要的物資站的採購員，我認為他們就是負責人。他們在我這領的錢，凡是超過一萬元的，我都把他們的學生證放在一邊，裏面夾著條子。當時我就跟徐兆良說，把這些條子保管好，因為他們還沒有回來報帳，等他們回來報帳。但是後來徐兆良沒有把條子給我。

第二，最初設立的一個物資站不是我們設立的，是清華的物資站，但是我們給了他們錢，這是五月十七日，他們就成了高聯的一個物資分發點。在這之前清華已經開始了人道主義的援助。】

4.7.3 五大財務問題

第一，老封提到工會捐款十萬元，這事與高聯及高聯在紀念碑第三層的財務部沒有一點關係。我們當時在追查這個事件時有一個同學給我的答復是，他們把這筆錢捐獻到紅十字會去了，而且是直接捐去的，根本與學生沒有一點關係。

【沈彤：我覺得全總十萬是真捐了。當時（五月底）負責財務的徐兆良，要把這十萬給《新聞導報》，他說要三家共同簽名：北京紅十字會，郵局，學聯。我覺得北京紅十字會有陰謀。郵局和學聯始終找不到紅十字會簽字的人。所以這十萬快前就卡在那裏。全總是捐出來了。

封從德：據稱，全總是捐給紅十字會的。

白夢：當時有一條子，在我們廣播站播過。

梁二：我們財務部也播過。】

第二，深圳同學的捐款問題。五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之間一個女老師帶著一個男生和一個女孩子到紀念碑第三層找到我，要求我接納五萬四千人民幣和港幣。我就用紙箱包裝起來了，包好以後我讓陸明霞保管好，我就開小差去堵軍車了。

第三，香港學聯捐錢的事，我在同溪小英簽了字以後我自己沒見到一分錢。但是我還是背上了這個黑鍋，就是說我把這筆錢拿去了。【以上第 246 頁】但實

際上我沒有領。我們當時計劃把錢直接交給黎洪和潘義，當時還沒有香港物資供

應部。潘義覺得有必要把這筆錢接管過來，而且他對我的態度很不友好。這時倪虹願意充當一種與我合作，作與高校之間的聯絡人的角色。他希望我們合作在各校收集一個需求的名單，要買什麼物資、器材先報一個名單，交給潘義再批錢。我記得師大心理系八六級的孩子和陳長寶合作從北京飯店提走了二萬人民幣還是港幣，這都沒有向我匯報。也就是說我接到這筆錢，但是沒有人讓我在使用這筆錢的決策過程中起任何一點作用。

第三，香港學聯捐錢的事，我在同溪小英簽了字以後我自己沒見到一分錢。但是我還是背上了這個黑鍋，就是說我把這筆錢拿去了。【以上第 246 頁】

但實際上我沒有領。我們當時計劃把錢直接交給黎洪和潘義，當時還沒有香港物資供應部。潘義覺得有必要把這筆錢接管過來，而且他對我的態度很不友好。這時倪虹願意充當一種與我合作，作與高校之間的聯絡人的角色。他希望我們合作在各校收集一個需求的名單，要買什麼物資、器材先報一個名單，交給潘義再批錢。我記得師大心理系八六級的孩子和陳長寶合作從北京飯店提走了二萬人民幣還是港幣，這都沒有向我匯報。也就是說我接到這筆錢，但是沒有人讓我在使用這筆錢的決策過程中起任何一點作用。

第四，中央電視臺實際上收到很多各地以支票、匯款單形式寄來的錢。中央電視臺找到我們，要把這筆錢移交給我們。但是這筆錢一直沒到我們手上，因為提款需要有一個人作為擔保去負責，我自己忙得抽不出身來，我自己對這件事也并不是很上心，因為廣場上的現金已經很多；另外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陰謀，我很懷疑他們的誠意。他們給我了一個復印件，說明是哪來的錢，但是我一直沒去拿。

第五，蛇口捐款事件是最大的事件。這個人姓龍，他找到我，讓我親自簽名，而且當時一個姓林的記者也在。他們當時要我把這筆錢收下來，但是他們要求王丹或吾爾開希其中一人與我共同簽名。我曾經在劉蘇裏的帳篷中與王丹交談了一下，把那個姓龍的會計介紹給王丹。我在中國銀行泡了半天沒有提出一分錢，當時覺得很窩囊，就不願意再管這件事了。這些名片我還保存著。

【張倫：我的印象是五月十九日晚上，我在廣場西北角的地方碰到了從蛇口開車直接過來聲援的幾個人，帶著十萬塊的捐款。我是廣場上最早碰見他們的，我問有沒有這個事情？

梁二：我不知道是否是開車來的。他告訴我他有十萬塊錢，但是是通過電匯過來的。這筆錢我一直沒取到，那個人的名片還在我手上。】

五月二十一日運鈔事件，以及後來造成了我與廣場總指揮部，比如與封從德之間的衝突。那天已經有直升飛機了，並且有散放瓦斯彈的可能性，陸明霞找到我，說，“情況非常危急，需要把財務部的安全問題重新加以審查和考慮。”我

們就先把百元五十元以上的鈔票點在旁邊，集中裝箱。這個計劃我們早就有。這時陸明霞就要求轉移錢，【以上第 247 頁】徐兆良還把四臺彩色電視機運回法大。當時是陸明霞、徐兆良找的車，把四臺電視和四箱錢運回了，我不知道他們運回了哪。總而言之，我覺得陸明霞作為財政部長她有自己的考慮、主張。但我是希望他們運回人大或清華，避開師大，因為都謠傳我是廣場的財務部長，搜查的時候一定是先查師大，因為師大是我的老巢。這樣我就避諱了一下，避免我是運鈔的助手這種嫌疑。我也不願意交給北大，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和北大自治會建立一種信任的聯系。李紅宇和陸明霞在運鈔的時候我告訴他們一點，就是把錢和帳目本一定要分開保管。這是最基本的財務制度。但實際上陸明霞後來跟我解釋是，她不敢分開保管，因為李紅宇這人個性太強，而且太凶。我知道李紅宇這個人性格強，但我覺得很奇怪，李紅宇應該還是以陸明霞為主。後來聽廣播說，從陸明霞的枕頭下邊找出幾千元。我想是由於陸明霞這個人自己的迂腐、軟弱帶來很多財務上的失誤。這樣二十一日以後大錢都運走之後，廣場上就只剩下零鈔。那時我就覺得我在財政部幹的意義不大了。

五月二十一日運鈔事件，以及後來造成了我與廣場總指揮部，比如與封從德之間的衝突。那天已經有直升飛機了，並且有散放瓦斯彈的可能性，陸明霞找到我說，“情況非常危急，需要把財務部的安全問題重新加以審查和考慮。”我們就先把百元五十元以上的鈔票點在旁邊，集中裝箱。這個計劃我們早就有。這時陸明霞就要求轉移錢，【以上第 247 頁】徐兆良還把四臺彩色電視機運回法大。

當時是陸明霞、徐兆良找的車，把四臺電視和四箱錢運回了，我不知道他們運回了哪。總而言之，我覺得陸明霞作為財政部長她有自己的考慮、主張。但我是希望他們運回人大或清華，避開師大，因為都謠傳我是廣場的財務部長，搜查的時候一定是先查師大，因為師大是我的老巢。這樣我就避諱了一下，避免我是運鈔的助手這種嫌疑。我也不願意交給北大，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和北大自治會建立一種信任的聯系。李紅宇和陸明霞在運鈔的時候我告訴他們一點，就是把錢和帳目本一定要分開保管。這是最基本的財務制度。但實際上陸明霞後來跟我解

釋是，她不敢分開保管，因為李紅宇這人個性太強，而且太凶。我知道李紅宇這個人性格強，但我覺得很奇怪，李紅宇應該是以陸明霞為主。後來聽廣播說，從陸明霞的枕頭下邊找出幾千元。我想是由於陸明霞這個人自己的迂腐、軟弱帶來很多財務上的失誤。這樣二十一日以後大錢都運走之後，廣場上就只剩下零鈔。那時我就覺得我在財政部幹的意義不大了。

4.7.4 高聯的財務

我與封從德的衝突。我們二十八日晚上都到北大去開常委會，他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沒讓我說一句話。當時我覺得相當的委屈，第一是外界對我的誤解，我記得在廣場我碰到任何一個人，他們都知道我是財務部長，都找我要錢，比如老木、張倫；第二是因為學生認為我有貪污的嫌疑，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我曾經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去，被一個同學揪住我的臉說，“梁二，你是不是把錢藏起來了，自己貪污了？”他就準備打我。後來我就慢慢跟他解釋，直到他信服。後來他說，“梁二，哥們，我相信你。”但是這件事對我的人身侮辱和心靈上的傷害是相當大的。我當時就有很消極的感覺，學運失敗了，我自己作為正直人的形象也倒下了。我向來是一種清高自傲的臭知識分子的傳統習慣生活，我也一直在超越現實之外的理想世界中生活。在這個時候就對我在人格方面產生了相當大的人格傷害

與老封的衝突是他找我要十萬塊錢，記得高聯已經同意了，不是我同意了，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當時已經有基本健全的財務制度了。他找我要十萬塊錢，而且立刻交出來，廣場上的幾十萬張嘴都在那嗷嗷待哺。他就以很憤怒的語氣跟我說，“梁二，你會成為罪人。”【以上第 248 頁】我就怕當罪人，我就企圖跟他辯解，但沒辯解清楚，最後到高聯會上加以闡述。

與老封的衝突是他找我要十萬塊錢，記得高聯已經同意了，不是我同意了，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當時已經有基本健全的財務制度了。他找我要十萬塊錢，而且立刻交出來，廣場上的幾十萬張嘴都在那嗷嗷待哺。他就以很憤怒的語氣跟我說，“梁二，你會成為罪人。”【以上第 248 頁】我就怕當罪人，我就企圖跟他辯解，但沒辯解清楚，最後到高聯會上加以闡述。

實際上當時是提不出來錢，在高聯財務部沒有那麼多錢。陸明霞告訴我，她祇帶走了幾萬塊錢，剩下的錢和帳目都讓李紅宇帶走了。李紅宇到這個時候就到高聯來交帳，他告訴我，“你們這些人政治性都太強，出風頭過高，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她希望以普通學生和非政治的色彩把這筆錢接管下來，在鎮壓以後，選擇一個適當的機會捐獻給一些真正能代表中國人民心聲的政治組織，給他們作為活動經費，作為下一次運動發起的基礎。當時我覺得她言之有理，就與陸明

霞稍微商量了一下，提交到高聯常委會去被迫承認這個事實。因為若把李紅宇惹惱了，她一個字也不承認怎麼辦？當時我也覺得很窩囊。這個時候李紅宇給我一個帳目表，我在檢查這個帳目的時候，發現有一天的帳目遺漏了，我不知道那一頁是哪一天的。陸明霞告訴我，這些錢和帳目表都是交給李紅宇帶到清華去的。我很憤怒，當時大罵了一頓陸明霞。她軟弱可憐地跟我解釋，她確實沒有這個能力去架馭李紅宇，讓她把錢交出來。我說“當時是你自己找的車，你自己是財物部長，你為什麼不把錢抓在自己手中？而且我曾經提醒過你，不要把帳和錢交給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相互指責對方，說對方把錢和帳目拿走了，這樣就出現了財務部自身內部的爭吵。我把這些情況報告給高聯常委會，當時高聯常委會覺得情況比較嚴重，就提議由邵江、我和徐兆良等組成一個督察小組，進行查對。那個人大八八級的女孩子在高聯會議上哭著作證，說她相信梁二，對陸明霞有懷疑。

財務當時在廣場上確實沒有任何制度。原因第一是時間太倉促，第二沒有任何人願意跟我們商量一起建立起一種制度。我和超華曾建立了審批支出的制度。但是後來不斷人找到我要求我給他審批財物的權力。當時至少有五人參與財產的審批，有梁二、邵江、陸明霞、徐兆良、王超華、鄭旭光，祇有這幾個人和後來的張明有審批支出的權力。我自己與陸明霞有一個協議，飲食方面的審批優先，步話機和通訊器材優先。我記得封從德跟我申請的是買步話機和通訊器材，找我要錢，我給了他一紙箱祇有七百塊錢，很對不起他。因為我們的審批條件是基本生存條件的滿足優先，當時廣場第三層上已經沒多少錢了。第三，外地同學和在北京沒有任何定居點的同學優先。我當時審批過很多外地來京要求支援的款項，他們剛到北京需要飲食、睡覺的地【以上第 249 頁】方。我按照人頭分給他們每天五塊錢，開始幾天給我當糾察隊員，維持生命線。我利用這點錢也做了一點組織性的工作。財務交接的手續。當時會計和出納基本上是分開的，這個基本制度是建立起來了，而且我和超華的這種會計和出納的構成一直保持到最後。最後，我成為祇是批錢的或是點鈔票的執行者，並沒有作出納和記帳的事情。交接程序問題是靠學生證和借條同時押在財務部，然後拿發票回來領取學生證。我們當時是為了對每一分錢負責，但實際上有很多銅鏰掉在地上都沒揀。

財務當時在廣場上確實沒有任何制度。原因第一是時間太倉促，第二沒有任何人願意跟我們商量一起建立起一種制度。我和超華曾建立了審批支出的制度。但是後來不斷人找到我要求我給他審批財物的權力。當時至少有五人參與財產的審批，有梁二、邵江、陸明霞、徐兆良、王超華、鄭旭光，祇有這幾個

人和後來的張明有審批支出的權力。我自己與陸明霞有一個協議，飲食方面的審批優先，步話機和通訊器材優先。我記得封從德跟我申請的是買步話機和通訊器材，找我借錢，我給了他一紙箱祇有七百塊錢，很對不起他。因為我們的審批條件是基本生存條件的滿足優先，當時廣場第三層上已經沒多少錢了。第三，外地同學和在北京沒有任何定居點的同學優先。我當時審批過很多外地來京要求支援的款項，他們剛到北京需要飲食、睡覺的地【以上第 249 頁】方。我按照人頭分給他們每天五塊錢，開始幾天給我當糾察隊員，維持生命線。我利用這點錢也做了一點組織性的工作。財務交接的手續。當時會計和出納基本上是分開的，這個基本制度是建立起來了，而且我和超華的這種會計和出納的構成一直保持到最後。最後，我成為祇是批錢的或是點鈔票的執行者，並沒有作出納和記帳的事情。交接程序問題是靠學生證和借條同時押在財務部，然後拿發票回來領取學生證。我們當時是為了對每一分錢負責，但實際上有很多鋼蹦掉在地上都沒揀。

【常勁：最後請你簡單地說一下高聯財務部當時在廣場上的進帳和入帳的情況。

梁二：我記得，最初因為五一七大游行的影響，當時大約收到五萬塊錢左右。後來又有一筆進帳是深圳的同學或老師直接捐來的，其中有一些是港幣和外匯券，是由陸明霞保管的，我記得是五萬四千塊錢。後來幾天如果沒有大的進帳，一般平均每天是幾萬塊錢。後來有一個蛇口的市民捐款，據說有一百萬的捐款，讓我親自去領。但實際上我跑到銀行去的時候一直沒領取到。這個聯系人的名片還在我包裹面，姓龍。如果有人有機會回國的話，我希望能去查證。當時說這筆錢相當大，必須到中國銀行去領取。為這件事我跑了一天多，這筆帳我一直沒取到。我想在銀行或郵電局是應該查得著這個字據的。

常勁：我聽王有才的一個說法，說高聯有二百萬的捐款。你能不能證實這個說法？

梁二：這不是害我嗎？錢陸續陸續地來，我也數不清楚。我會準備一個提綱，以後再說。

李錄：我想問超華兩個問題。第一個，建立廣場高聯的財務部是不是你的想法？當時你和哪些人商量過，最後怎么決定的？是不是還沒征求到梁二的同意就在廣播上通知了？

王超華：我自己都不知道紀念碑三層怎么就清理出來了。沈彤告訴我，他領人清理出來的。我前面提到過，高聯剛到的時候在絕食團【以上第 250 頁】旁邊小樹叢的廣播站立過一個牌子，後來就遷到靠近歷史博物館那邊。紀念碑三層清理出來之後，就有人來找我，讓我到那邊去，糾察已經把那兒控制住。接著就

有人拿著紙盒子跟著我們過去來捐錢，既然我們收了就得給收條。記得有人就說，我們不要收條了。當時，是我和梁二兩個人，說不行了，我們得趕緊點錢。就在那兒點了一下。後來我就說，我們不能總在這兒幹這事。我說：“梁二，你負責這件事吧。”由於不斷有人來捐錢，我們不得不在那一點點點錢，不得不建立一個財務部。梁二就說：“好，我作這事。你下去吧！”我就去做別的事去了。】

王超華：我自己都不知道紀念碑三層怎麼就清理出來了。沈彤告訴我，他領人清理出來的。我前面提到過，高聯剛到的時候在絕食團【以上第250頁】旁邊小樹叢的廣播站立過一個牌子，後來就遷到靠近歷史博物館那邊。紀念碑三層清理出來之後，就有人來找我，讓我到那邊去，糾察已經把那兒控制住了。接著就有人拿著紙盒子跟著我們過去來捐錢，既然我們收了就得給收條。記得有人就說，我們不要收條了。當時，是我和梁二兩個人，說不行了，我們得趕緊點錢。就在那兒點了一下。後來我就說，我們不能總在這兒幹這事。我說：“梁二，你負責這件事吧。”由於不斷有人來捐錢，我們不得不在那一點點點錢，不得不建立一個財務部。梁二就說：“好，我作這事。你下去吧！”我就去做別的事去了。】

4.7.5 高聯與廣場指揮部的財務交接

從二十三日上午到二十四日上午因為聯席會議和北高聯的常委會以及師大自身的組織問題、結構的危機問題，我自己就脫身了。在這個脫身的時候，就由徐兆良管理。在徐兆良統一管理的過程中，我盯著兩個問題，一是我們盡量不要跟所謂的廣場指揮部和絕食團的財務發生任何接觸；第二如果被迫出現這種情況的話，應該把大的鈔票轉移回北大的財務部，避免被他們強行搶奪。因為有好幾次風言風語，象接管廣播站那樣的情況不斷地發生，我很擔心廣場上也出現接管財務的現象。如果強行接管發生，很可能造成財務上的遺露和差錯。

在二十四日我回到廣場的時候見到徐兆良，他提著一個密碼箱。他沒通過我的批准買了兩個密碼箱，一個給陸明霞帶回北大，一個他自己保存。他把一萬塊人民幣，是他接管財物部那幾天收集起來的捐款的大票放在密碼箱裏了，把小的鈔票都給了封從德。徐兆良沒有按照我的建議執行整個交接，把學生證給你們了，但把單子都拿出來了。最後我發現他帶回去的帳目表也不是很齊全。有一筆帳是六萬五千塊錢，都是一百元組成的錢，這是陸明霞在五月二十一日轉移過程當中遺留下的一筆錢。我後來發現她把這些錢裝在一個廢紙箱裏，我當時就覺得相當惱怒。然後我拿一個電影制片廠送來的鐵箱把它裝起來，帶回了師大，

交給了師大財務部，由糾察隊的兩個同學保管。我當時跟陸明霞說了，我要把這筆錢帶回師大。我還給她寫了條子，陸明霞和邵江都在條子上簽了字。當時我就說，我一定會交回來的。可是，六月二日晚上在一個決議中讓我第二天把這筆錢帶回北大財務部。【以上第 251 頁】第二天就發生撞死人的事件、全市大示威和軍隊進城事件，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和時機把這筆錢帶回去，而且當時北京市也相當混亂。我自己要拿這筆錢出來也需要手續，因為我吩咐了兩個人，一個是財務部的監督人員、一個是糾察隊的值得信任的人保管。我當時沒把這筆錢帶回北大；但是這筆錢在高聯財務部的帳目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一個數字。如果王有才在，他把整個秘書處工作的報告找出來的話，可以發現這筆錢。這筆錢包括，一個整數五萬塊錢，另一個是熊焯帶給我的一萬五千。這樣我就把這筆錢拿到師大。

在二十四日我回到廣場的時候見到徐兆良，他提着一個密碼箱。他沒通過我的批准買了兩個密碼箱，一個給陸明霞帶回北大，一個他自己保存。他把一萬塊人民幣，是他接管財務部那幾天收集起來的捐款的大票放在密碼箱裏了，把小的鈔票都給了封從德。徐兆良沒有按照我的建議執行整個交接，把學生證給你們了，但把單子都拿出來了。最後我發現他帶回去的帳目表也不是很齊全。有一筆帳是六萬五千塊錢，都是一百元組成的錢，這是陸明霞在五月二十一日轉移過程當中遺留下的一筆錢。我後來發現她把這些錢裝在一個廢紙箱裏，我當時就覺得相當惱怒。然後我拿一個電影制片廠送來的鐵箱把它裝起來，帶回了師大，交給了師大財務部，由糾察隊的兩個同學保管。我當時跟陸明霞說了，我要把這筆錢帶回師大。我還給她寫了條子，陸明霞和邵江都在條子上簽了字。當時我就說，我一定會交回來的。可是，六月二日晚上在一個決議中讓我第二天把這筆錢帶回北大財務部。【以上第 251 頁】第二天就發生撞死人的事件、全市大示威和軍隊進城事件，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和時機把這筆錢帶回去，而且當時

北京市也相當混亂。我自己要拿這筆錢出來也需要手續，因為我吩咐了兩個人，一個是財務部的監督人員、一個是糾察隊的值得信任的人保管。我當時沒把這筆錢帶回北大；但是這筆錢在高聯財物部的帳目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一個數字。如果王有才在，他把整個秘書處工作的報告找出來的話，可以發現這筆錢。這筆錢包括，一個整數五萬塊錢，另一個是熊煒帶給我的一萬五千。這樣我就把這筆錢拿到師大。

【梁二：高聯財務部最後情況：六月二日開始，陸明霞正式出任財務部長，由幾個中央財經學院的同學組成一個財務部，這時，財務制度已相當明確。】

六四回來之後馬少方曾經找我申請錢，因為他知道我這兒有這筆錢。實際上這筆錢已經在高聯決議上分配給師大一萬塊，我當時就轉交了。當時因為各校自治會需要經費，向高聯申請，高聯常委會通過了決議，是按人頭分配，一人一塊錢，按各校的人數來分配，所以我就分配了一萬塊錢轉到師大帳戶上去了，所以我那祇有五萬多塊錢。因為高聯財務部已經建立了很嚴格的制度了，五個常委以上才可以批一千元以上的支出。我覺得責任重大，打了一通電話，其他常委都不在，所以我就沒有批。我和他說，我可以從師大財物部批給你，因為我在師大財務部有批錢的權，沒有支錢的權，所以我就給他批了一千塊錢。其它的錢在我和另一個同學保管之下帶走了。我非常對不起馬少方，我祇給了他一千塊錢，以至於他在白雲飯店走投無路被迫自首。在國內我自己留了一筆錢，大概是兩萬多塊錢。我那兒還有五萬多塊錢，自己帶了兩萬多塊錢和一些外匯。這些外匯在北大的帳目上也有。我在福建一個小鎮買了一點美元港幣，帶出來之後交給了超華。我一到洛杉磯之後就找到超華、開希、程真、鄭明遠這四個我值得信任的人，而且他們代表不同的勢力，我寫了委托書，非他們四人同意，不能隨意支出這筆錢。這筆錢大概是一萬左右的人民幣，一萬多港幣，一千三百多美金。

【封從德：你提到馬少方曾經向你申請錢，這大概是什麼時候？這【以上第 252 頁】個錢需要五人常委的批准，是不是？

【封從德：你提到馬少方曾經向你申請錢，這大概是什麼時候？這【以上第 252 頁】個錢需要五人常委的批准，是不是？

梁二：馬少方申請了兩次錢。第一次是他要去天津之前，實際上是師大和開希批的錢，不是我；第二次是在六月四日下午我打了一通電話沒找到任何一個聯絡人，我就跟馬少方說，“這筆錢我確實提不出來。”因為那時高聯已經建立了財務制度，半數以上的常委通過才能給五百塊以上的款項，而且常委不能在和秘書處或財物部商量之前批錢。我為了維護這個原則，就跟少方說，“你先拿師大財物部的這一千塊錢，然後你再回來。如果我們還找不到人我們就一塊逃跑。”

封從德：這個原則是什麼時候定出來的？是由誰來定的？

王超華：我們回去整頓的時候香港同學已經來了，而且我們以前就有香港學聯的章程，特別強調，因為政府如果要抓的話，很可能要抓貪污的問題。而且陸明霞轉移的錢我們常委一問都不清楚，到人大抓她幾回讓她到會上來作證，

她最後好象也沒來，是另外一個同學來的。我們覺得非常嚴重，一直到六月二日的中午，那邊都要鎮壓了，我們在這兒還通過財物章程。是在五月二十三日整頓之後定的批錢的數目和五人以上的人數。你二十七日找梁二的時候，我和楊濤一起到處給你湊人數。

梁二：當時高聯常委會通過了五人以上，並不是特定的五個人。二十七日當時的常委楊濤、王超華、梁二、周鋒鎖都在場，我認為所有的同學都到了。

封從德：我的疑問就在這裏。據我的理解，當時高聯這些常委的流動性非常大，到處跑。剛才梁二也講到打電話找不著人，那麼你們考慮到這種流動性了沒有？

梁二：我們定了這個規章制度之後曾經有一個財務部的決議，王有才已經印出來了。封從德聽到我說打電話找不著人，說明常委流動性非常大，實際上不是這樣。在這以前常委有個規定，每天都要通一次會，碰一次頭，是在北大。【以上第 253 頁】

王超華：開始幾天是晚上十二點，後來大概五月二十八日起改在每天下午二點。

封從德：我記得我到北大去取錢，因為梁二答應了十萬塊錢可以轉給廣場，就是在二十七日晚上，當時到了北大，就是因為你們的常委湊不齊人，所以才沒辦法給我錢。我當時非常生氣，我以為這是借口。最後楊濤作了一個折中方案，北大先墊三萬吧。王超華：你去的時候常委會剛剛散，我還說，“你看，他們騎車剛走。”

白夢：當時的許多捐款也都捐到廣播站去了，我本人就接受了許多捐款。有一天我的全身口袋裏全都裝滿了現金。

梁二：我要補充關於聯席會議對我的財務的處理問題。當時那個聯席會議都認為我這個財務部相當有錢，而且我自己有相當大的財權。早期確實是這樣，但後期高聯剝奪了我的這個權力。我記得整個聯席會議他們自己有一筆錢，可能是所裏的錢，但不是私款。第二個我想補充的是，象白夢這樣口袋裏裝滿錢的情況是相當少的。

劉燕：梁二說的六月二日在北京飯店那個房間，是北高聯常委六四之前最後一次開會，重新制訂了財務制度。當時郭海峰和王文都在，而且香港學聯的人也在，程真也在。那盤錄音帶也是那天王文晚上帶去的。六四下午我到師大的時候，少方和梁二都在。梁二在傳達室打電話找常委，就在梁二跟少方說不能給錢這個時候，師大運來了一車兵，說要把槍交給師大的學生。梁二馬上放下少方說，“我要到師大門口去把那車兵和槍趕出去。”】

【王超華：就你所知，和臨時指揮部的財務交接怎樣？

梁二：實際上，我知道的并不多，因為是徐兆良和他們進行交接的。這之前我知道的一點就是我跟徐兆良說過，廣場指揮部自己有個財務部，他們可能會來交接。我還對他說，“你把所有的帳目和所有留下的學生證都收起來。”所有到我們這拿錢的同學都把學生證押在我們這兒並寫上字據，然後拿發票回來報帳。但徐兆良犯了一個錯誤，他把學生證交給了廣場指揮部，而把條子都從學生證裏拿出來了。【以上第 254 頁】

封從德：這不是錯誤，是我們要求的。

梁二：後來我去找學生證的時候，發現學生證裏沒有一張條子。這樣我就無法查帳。這是比較大的困難。第二，徐兆良當時是收到了兩萬塊錢，但在交接的時候他祇交了幾千塊錢給廣場指揮部。

王超華：那怎麼會轉到北大財務部的？你知道嗎？

梁二：轉到北大是陸明霞直接轉入的。她本身是財務部部長，我一直不敢督促她，就是因為這一點。她和李紅宇兩個人把錢一直往師大、人大運。我不知道是陸明霞授權李紅宇讓她把錢帶回師大還是清華的，因為李紅宇的男朋友是清華的。後來就出現了李紅宇和陸明霞的爭吵，不知道是誰把錢拿走了，相互之間都不知道對方拿了多少。但是從我這拿走的錢我是知道的。】

【封從德：廣場指揮部的財務延續性，照理應當從絕食團繼承下來，但現實上已不可能。絕食團的錢，二十一日解散時，已經分成遣散費了；

李錄：一共就五千塊錢。

封從德：加上從北高聯領的一千。另外，即使是賬目，也轉到北大去了，所以根本不存在繼承問題。實際上，絕食團指揮部的財務好象是北大籌委會一班人馬代管的，我一點兒沒我插手。可能有很多錢都轉到北大或在北大的北高聯去了。可惜王樹東不能來開這個會。】

4.7.6 廣場後期的財務（封從德）

【我祇能講廣場五月二十四日以後的財務，因為我這之前沒有接觸過任何財務問題。我知道的所有涉及到錢的事，五月二十四日以前的是有這麼一些：四月十七日三角地悼念胡耀邦募捐；四月二十三日北大生物系、法律系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進行了募捐，北大籌委會建立起財務班子和財務制度，當時大概有三千捐款；四月二十三日柴玲給過我三百塊私房錢；五月十一日北大一個教授捐給我四百人民幣，後來拿去買廣播器材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我接管廣場

財務是和廣場【以上第 255 頁】臨時指揮部有關係。在二十二日十點鐘到二十三日下午五點鐘，我不在廣場，所以臨時指揮部不太清楚的發生過程。等二十三日下午回來以後，柴玲很高興地告訴我這個情況。當時，給我一個印象也是各界聯席會議任命了這麼一個廣場指揮部，而且讓北高聯撤離廣場進行整頓。對於這一階段的權力來源我一直搞不清楚，而且在心裏一直納悶。五月二十四日接管廣場財務是由廣場指揮部授命的，這個授命基本上是我自薦的。我當時認為廣場上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說，共產黨想把學生運動搞垮，最大的兩個可能，也是我們最可能受到攻擊的，其中之一就是財務。我的印象是當時廣場的財務已經混亂，問題在財務制度。既然是成立了廣場指揮部，我就認為我應該花精力去防止漏洞，我就這麼去作了，然後就這麼一直作下去。而且因為作廣場財務，

我基本上其它事情都沒法管，致使很多重大的方向上的問題，我都沒辦法去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我們在紀念碑東側三層接管北高聯的財務部。管帳的交給了我們兩大箱鈔票，結果一數祇有九千人民幣，因為都是毛票和鋼蹦兒。我們馬上統一入口和出口。當時外高聯也有財務部，天津大學也在廣場上募捐，很多路口也有許多私設的募捐箱，甚至聽說有的人就把這些錢吞了。所以入口和出口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當時祇給後勤部，每天要四萬人民幣，買面包等。當時廣場上的人還有十萬左右。在五月二十六日因為我們沒有錢買面包就賒帳一萬五，五月二十七日還沒還完，還欠長九千。我任命過三任的財務部長。我當時是自封為廣場指揮部的財務、後勤責任常委。我非常推薦採用責任常委制度：雖然我們有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共三人，但是共有七個常委，另外四個常委就不知道幹什麼，所以我建議用責任常委每人管一攤，（李錄：這在議會上通過了。）第一任財務部長幹了一天多、兩天就幹不下去了。第二任是兩個中學生，我非常信任。但因為他們是中學生，後來也引起很多非議，他們幹了三天也幹不下去了。

【我祇能講廣場五月二十四日以後的財務，因為我這之前沒有接觸過任何財務問題。我知道的所有涉及到錢的事，五月二十四日以前的是有這麼一些：四月十七日三角地悼念胡耀邦募捐；四月二十三日北大生物系、法律系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進行了募捐，北大籌委會建立起財務班子和財務制度，當時大概有三千捐款；四月二十三日柴玲給過我三百塊私房錢；五月十一日北大一個教授捐給我四百人民幣，後來拿去買廣播器材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我接管廣場財務是和廣場【以上第 255 頁】臨時指揮部有關係。在二十二日十點鐘到二十三日下午五點鐘，我不在廣場，所以臨時指揮部不太清楚的發生過程。等二十三日下午回來以後，柴玲很高興地告訴我這個情況。當時，給我一個印象也是各界聯席會議任命了這麼一個廣場指揮部，而且讓北高聯撤離廣場進行整頓。對於這

一階段的權力來源我一直搞不清楚，而且在心裏一直納悶。五月二十四日接管廣場財務是由廣場指揮部授命的，這個授命基本上是我自薦的。我當時認為廣場上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說，共產黨想把學生運動搞垮，最大的兩個可能，也是我們最可能受到攻擊的，其中之一就是財務。我的印象是當時廣場的財務已經混亂，問題在財務制度。既然是成立了廣場指揮部，我就認為我應該花精力去防止漏洞，我就這麼去作了，然後就這麼一直作下去。而且因為作廣場財務，我基本上其它事情都沒法管，致使很多重大的方向上的問題，我都沒辦法去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我們在紀念碑東側三層接管北高聯的財務部。管帳的交給了我們兩大箱鈔票，結果一數祇有九千人民幣，因為都是毛票和鋼蹦兒。我們馬上統一入口和出口。當時外高聯也有財務部，天津大學也在廣場上募捐，很多路口也有許多私設的募捐箱，甚至聽說有的人就把這些錢吞了。所以入口和出口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當時祇給後勤部，每天要四萬人民幣，買面包等。當時廣場上的人還有十萬左右。在五月二十六日因為我們沒有錢買面包就賒帳一萬五，五月二十七日還沒還完，還欠長九千。我任命過三任的財務部長。我當時是自封為廣場指揮部的財務、後勤責任常委。我非常推薦採用責任常委制度：雖然我們有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共三人，但是共有七個常委，另外四個常委就不知道幹什麼，所以我建議用責任常委每人管一攤，（李錄：這在議會上通過了。）第一任財務部長幹了一天多、兩天就幹不下去了。第二任是兩個中學生，我非常信任。但因為他們是中學生，後來也引起很多非議，他們幹了三天也幹不下去了。

二十八日晚成立的第三屆財務部，是我最得意的，這個財務部建立的形式，我認為值得推薦。在運動非常緊張的狀況下，採用自願報名來參加工作，這樣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用廣播召集了大概二十多個自願來的同學，多是財會金融方面的學生，請他們各自按興趣分成三個小組，各組成員都提出各自的工作設想，按能力選出組長，再由組長選出部長。部長是會計專業學生，出納來自於財金學院。【以上第 256 頁】當時，在召集這個財務部的時候，我還用了一個敏感的詞，說財務部是一個“摧殘人性”的地方，原因是兩、三天之前我已經知道，絕食團原來的財務部長王樹東已經精神分裂，原因就是 he 必須說服很多人不要那麼多錢，而去向又沒底。這是財務部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就成立了第三個小組，叫監察組，賦予最高的權限，可以督察任何人的錢的來源和去處，包括總指揮的；部長還有審批否決權。因為給他們的權力過大，後來給廣場上的批錢帶來一定的困難，這是我的責任，過後發現這個問題，就把這個權力作了一定的限制。在廣場上連勝德同我講，“聽開希說捐款已經有兩千萬人民幣。”我的印象是，梁二曾經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過有九十八萬五千人民幣的捐款。

五月二十九日整頓財務部，我們每天都公布我們財政的大帳，每天也向記者公布，後來得到了記者很大的信任。到了後期，我們的錢就不太緊張了，問題大的是貪污嫌疑。所以我希望來的捐款不是現金，而是來物資，這也省得我們去買的周折。有一筆澳門東亞大學捐的三十七萬五還是四十七萬五的港幣，我請他們全部送到香港的物資聯絡站潘義那裏。五月三十日港支聯的陳建勛也來和我們見了面，我們和他談了，在北京飯店。還有兩萬港幣的捐款我也帶到了廣場。五月三十一日香港教師聯合會捐了五十萬港幣給北京市紅十字會，沒給廣場。需要考證的錢有這些：全國總工會捐了十萬給市紅十字會；四通捐了五萬，不知道捐給誰；農工民主黨捐了一萬，不知道捐到哪；戲劇學院在廣場上打了一個標語，說他們捐了一萬，不知道捐到哪去了；鄭旭光聽說捐了四萬，還是五萬，不知道從哪來的；美國的錢弄到北大去是多少，是不是還給了師大等；紅十字會到底收了多少錢；郵局到底收了多少錢；這些都需要考證。然後是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大概是在五月三十日的時候寫了一個 Mr.Xin Yuzheng 這樣一個人，提到廣場的財務問題，這也是需要考證的。

二十八日晚成立的第三屆財務部，是我最得意的，這個財務部建立的形式，我認為值得推薦。在運動非常緊張的狀況下，採用自願報名來參加工作，這樣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用廣播召集了大概二十多個自願來的同學，多是財會金融方面的學生，請他們各自按興趣分成三個小組，各組成員都提出各自的工作設想，按能力選出組長，再由組長選出部長。部長是會計專業學生，出納來自於財金學院。【以上第 256 頁】當時，在召集這個財務部的時候，我還用了一個敏感的詞，說財務部是一個“摧殘人性”的地方，原因是兩、三天之前我已經知道，絕食團原來的財務部長王樹東已經精神分裂，原因就是 he 必須說服很多人不要要那麼多錢，而去向又沒底。這是財務部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就成立了第三個小組，叫監察組，賦予最高的權限，可以督察任何人的錢的來源和去處，

包括總指揮的；部長還有審批否決權。因為給他們的權力過大，後來給廣場上的批錢帶來一定的困難，這是我的責任，過後發現這個問題，就把這個權力作了一定的限制。在廣場上連勝德同我講，“聽開希說捐款已經有兩千萬人民幣。”我的印象是，梁二曾經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過有九十八萬五千人民幣的捐款。五月二十九日整頓財務部，我們每天都公布我們財政的大帳，每天也向記者公布，後來得到了記者很大的信任。到了後期，我們的錢就不太緊張了，問題大的是貪污嫌疑。所以我希望來的捐款不是現金，而是來物資，這也省得我們去買的周折。有一筆澳門東亞大學捐的三十七萬五還是四十七萬五的港幣，我請他們全部送到香港的物資聯絡站潘義那裏。五月三十日港支聯的陳建勛也來和我們見了面，我們和他談了，在北京飯店。還有兩萬港幣的捐款我也帶到了廣場。五月三十一日香港教師聯合會捐了五十萬港幣給北京市紅十字會，沒給廣場。需要考證的錢有這些：全國總工會捐了十萬給市紅十字會；四通捐了五萬，不知道捐給誰；農工民主黨捐了一萬，不知道捐到哪；戲劇學院在廣場上打了一個標語，說他們捐了一萬，不知道捐到哪去了；鄭旭光聽說捐了四萬，還是五萬，不知道從哪來的；美國的錢弄到北大去是多少，是不是還給了師大等；紅十字會到底收了多少錢；郵局到底收了多少錢；這些都需要考證。然後是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大概是在五月三十日的時候寫了一個 Mr. Xin Yuzheng 這樣一個人，提到廣場的財務問題，這也是需要考證的。

4.7.7 貪污嫌疑

當時在記者招待會上，我們公開地承認廣場有貪污的跡象，原因有幾點：第一，當時已經有很多財務不清的傳聞，包括六月一日早晨綁架的時候，王文向外說了逃亡費的問題。他們拿著當時綁架的錄音給了記者，說這是一種貪污行為。這些都有必要澄清；第二，在廣場【以上第 257 頁】上查帳查出有一個收的錢十萬多，移了一個小數點變成一萬多（插：他承認了）；第三，最大的貪污嫌疑，是郵局六月一日上午我們去查實的。郵局說約有五萬的捐款交給了廣場的秘書處一個秘書。當時我和監察部長先得到了情況，趕緊去追查這筆錢，回到廣場財務部一查，祇入帳三萬八。這筆錢後來我們查到張伯笠的頭上，他就承認他和趙世民有個合約，要把錢留下來辦民主大學。當時我估計這是因為我們把錢卡得太嚴，他們擔心批不下錢。這是我當時的印象。〈參：李錄 4.6.2 末〉

〈參：4.7.8 質詢與陳述〉

當時在記者招待會上，我們公開地承認廣場有貪污的跡象，原因有幾點：第一，當時已經有很多財務不清的傳聞，包括六月一日早晨綁架的時候，王文向外說了逃亡費的問題。他們拿著當時綁架的錄音給了記者，說這是一種貪污行為。這些都有必要澄清；第二，在廣場【以上第 257 頁】上查帳查出有一個收的錢十萬多，移了一個小數點變成一萬多（插：他承認了）；第三，最大的貪污嫌疑，是郵局六月一日上午我們去查實的。郵局說約有五萬的捐款交給了廣場的秘書處一個秘書。當時我和監察部長先得到了情況，趕緊去追查這筆錢，回到廣場財務部一查，祇入帳三萬八。這筆錢後來我們查到張伯笠的頭上，他就承認他和趙世民有個合約，要把錢留下來辦民主大學。當時我估計這是因為我們把錢卡得太嚴，他們擔心批不下錢。這是我當時的印象。〈參：李錄 4.6.2 末〉〈參：4.7.8 質詢與陳述〉

我們的第三任財政部成立後一數錢，發現有兩千塊錢的出入，這兩千塊錢實際上是我個人控制了，原因就是當時從北大帶了三萬塊錢到廣場的時候，途中遇到了張伯笠，他說他要去寫書，我就私下給了他兩千塊錢。但是為了安全考慮，我認為不能把這種事情記在帳裏面。我就說，我來承擔這個責任，給你兩千塊錢。所以這兩千塊錢就變成了一個黑帳。

六四疏散費。因為有六月一日綁架這種事情的發生，轉移時，我祇敢留下五千塊錢人民幣作為這麼多同學的疏散經費。這五千塊我的印象是李錄和辛苦等三人共要了六百塊，另外一個同學帶走一千塊，還有一個同學帶走一千塊。在我們手裏留下了兩千多。在最後時刻，在紀念碑我記得非常清楚，海南的一個人說，“我交給你一百塊作為捐款”。還有一筆捐款大概是一百二左右。我說，“我會用生命來保護這個錢的。”我和柴玲逃亡的時候，北大籌委會也給了我們一筆錢，是五千人民幣和一千外匯券。】

4.7.8 質詢與陳述

【李蘭菊：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財務。六月一日左右，臺灣聯合報記者打電話給我們，說他們房間裏有一個叫萬蘭的女孩子（梁二：四川大學的。），身邊帶了六萬人民幣（梁二：一萬。），是指揮部一個姓趙的幹部貪污的，想跟這個女孩子一塊走。後來這個外地女孩良心發現，覺得這錢決不能要，於是躲了起來，向臺灣記者求救。後來我與梁二將女孩接到北京飯店，記得很清楚：問他此事指揮部裏領袖有沒有人知道，有沒有人牽涉在內。她很清楚地跟我講：XXXXX 道，【以上第 258 頁】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但封從德和李錄是知道的。

【李蘭菊：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財務。六月一日左右，臺灣聯

合報記者打電話給我們，說他們房間裏有一個叫萬蘭的女孩子（梁二：四川大學的。），身攜帶了六萬人民幣（梁二：一萬。），是指揮部一個姓趙的幹部貪污的，想跟這個女孩子一塊走。後來這個外地女孩良心發現，覺得這錢決不能要，於是躲了起來，向臺灣記者求救。後來我與梁二將女孩接到北京飯店，記得很清楚：問他此事指揮部裏領袖有沒有人知道，有沒有人牽涉在內。她很清楚地跟我講：XXXXX道，【以上第258頁】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但封從德和李錄是知道的。

封從德：對，我知道。

李錄：是趙世民。

封從德：對。】

【老木：關於廣場的財務問題，就是趙世民的貪污問題。溫杰向我匯報，說他們抓到了趙世明的女朋友在王府飯店住，拿了幾萬塊錢。後來我找到趙世明，他說這是有指示的。後來我在民主大學的時候完全不理睬他。廣場上的財政是非常混亂，我記得宣傳部祇領過五百塊錢，維持所有開銷。是靠什麼關係維持到六月三日的呢？是靠我的關係到北大物資處抬東西。因為我認識北大同學。】

【張伯笠：關於趙世民的錢的問題。封從德問我，“趙世民手裏的錢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你最好問他。”我私下裏問趙世民，“你究竟有沒有錢？”他說，“有！”我說，“多少？”他說，“大概一萬多塊錢，我不交給他們。我希望離開指揮部秘書處，幫你籌辦民主大學。”我就說，“可以，這個錢你可以不交。”決不是我先知道這個錢。錢後來也沒有轉給我。在民主大學籌辦的過程中，香港批給我們一筆錢，數目不小，要搞一個大講臺，所以民主大學根本不缺錢。他那個錢根本不是為了留下辦民主大學。但是因為時間有限，那個糾察隊長叫什麼我不知道，年齡很大，當時跟李錄、柴玲關係配合很密切，這個人一直沒辦成講臺，到要成立那天也沒辦起來，但錢是支了。後來潘義告訴我，“你還可以支一萬塊錢為了籌備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後來這筆錢我沒去支，用了趙世民這筆錢，買了一個錄音機，二千八，還有其它設備，還有繩子、紅布。他說總共花了七千多，但據我想是四千多。〈參：李錄 4.6.2 末〉〈參：封從德 4.7.7 貪污嫌疑〉

關於封從德給我兩千塊錢的問題，這是屬實的。我當時說要整理資料，把資料提出來保管，想寫一部書。封從德當時非常支持，拿出兩千塊錢。這兩錢塊錢存在一個著名記者家，六月六日我到他家去取【以上第259頁】錢的時候，他說，“孫掌櫃，貨已提走。”孫掌櫃是我代號。我就沒有提到這筆錢。這筆錢我知道在誰那兒，用於革命肯定是沒問題了。

關於封從德給我兩千塊錢的問題，這是屬實的。我當時說要整理資料，把資料提出來保管，想寫一部書。封從德當時非常支持，拿出兩千塊錢。這兩錢塊錢存在一個著名記者家，六月六日我到他家去取【以上第 259 頁】錢的時候，他說，“孫掌櫃，貨已提走。”孫掌櫃是我代號。我就沒有提到這筆錢。這筆錢我知道在誰那兒，用於革命肯定是沒問題了。

關於逃命費問題，在大陸共產黨造謠是最多的，就是我們五個人，我、柴玲、封從德、李錄、郭海峰的逃命費。戒嚴以後學生領袖準備轉移、準備逃亡的時候有一筆路費，我當時是領了一千塊錢，沒有錯。

後來那個會議，就是關於王文搞的那個綁架的陰謀詭計的那個會議，當時我們談得非常清楚，柴玲的錢用於絕食團和糾察隊買東西，我的五百塊錢也是為糾察隊買盒飯，李錄、封從德沒有要那錢。當時是給了王文二百，他就覺得，他也是常委，為什麼比你們少八百，所以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郭海峰的十一萬塊錢問題。那天早晨綁架柴玲的時候，我參加那個會時，我問郭海峰，“聽說你有十三萬或者十一萬港幣，你入帳祇入了一萬一，究竟有沒有這種情況？”郭海峰說，“有，但是我已經把錢交了。”這是有原始錄音的。李錄：我同意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保命費，但是我一直沒取。因為那天晚上我結了婚之後就覺得離開廣場有犯罪感，所以我把他們都勸走了以後，我自己那天晚上就沒走，所以我就沒拿保命費。

梁二：王文綁架事件和廣場指揮部貪污事件的發生，我個人介入比較深。我記得與王文和郭海峰曾經在北京飯店談了半個小時，他說他有你們貪污的錄音證據。據說林耀強聽了，但沒找到一點嫌疑之處

封從德：香港的雜誌也說，陳建勛、林耀強聽過這個錄音，說：“沒有問題。”梁二：王文和郭海峰很明顯地對廣場指揮部產生抵觸情緒。當時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們盡量包涵，暗中調查。實際上由林耀強接管了。

【張伯笠：關於梁二的形象問題。我覺得梁二是非常誠實和坦誠的人，但是到了美國以後我在亞洲觀察作第一次講演的時候，亞洲觀察給了我一份資料，那裏就有說“中國共產黨四川公安局抓到一個女生，她是梁二的女朋友。她手裏有五萬八千美金，二十三萬人民幣。她坦白的時候說，這是梁二交給她的。”【以上第 260 頁】

梁二：我不敢讓李紅宇作我的女朋友，因為她有一個男朋友姓李。在清華。

沈彤：那個簡報我特地看過。當時所有逃亡的學生裏祇有張伯笠和梁二沒有消息。這個簡報是八九年十月國內報道的，外面轉載的。報紙上不是說是他的女朋友，而是有一個女生和她清華的男朋友受梁二委托轉了二十六萬，在四川被起出被捕。

梁二：我不知道有五萬多美金和二十六萬這個數字，李紅宇在高聯會議的時候向我們報的數字祇有二十二萬。

王超華：我作證是二十多萬，不超過二十五萬的人民幣。這些是高聯常委會同意他轉移的，是被迫接受的。

封從德：對這個的旁證是八九年九月的時候李紅宇被捉，BBC作了報道。

梁二：李紅宇跟我說，外匯券和港幣都由陸明霞帶走了。我當時曾經以高聯

師大財務部的審批特權提了一萬塊錢人民幣給了陳長實和一個中文系的一個學生，給他們買印刷機。這個開希知道，我當時也不願意對這事承擔責任，就讓開希簽了名。】

【張伯笠：我擔任絕食團副總指揮期間，四通公司來了一個人，說，“我們捐了十三萬。這十三萬不給你們現金，直接給紅十字會給你們買藥品。”】

【梁二：香港的財政方面問題。香港給我們的錢是最初的一萬港幣，後來十七萬沒交到我手裏，到潘義他們那去了。當時他們有一個財政方面的要求，保持全面性 散發。他們談到兩個最主要的，一個是對群眾的自發組織的支援，二是對廣場財務部給予一定的支援。給廣場財務部的支援已經做了，祇是因為錢一下提不出來。在 跟工自聯的聯系方面，他們跟我們要錢，實際上祇有師大給了他們錢批了條子，祇是我不知道師大的財務部是不是接到了這個條子，把錢給他們了。】【以上第 261 頁】

【封從德：你曾經提過廣場一天最高支出二十萬，這是那一天？

梁二：我記得應該是二十日前後。

梁二：我對剛才老封那個提問有一個補充，我說的二十多萬的消耗是那天我收到的學生證的檢查，可能是有包括前一天的。

李錄：你能不能夠有一個總體的數目，經你手的錢到底有多少？

梁二：我批出去的錢我自己記不住了。但我記得有一天消耗最多，那天學生證裏面壓著借條，超過二十萬。總數我自己有個數字是九十八萬，這點我在老封的提議下又回憶起來了。

李錄：經過你領導下的財政部你總共進出的錢是多少？

封從德：當時的印象是每天開始有兩三萬人民幣的捐款，這是進帳。另外一個就是從北大帶來的三萬，然後還有十五萬港幣，但一直沒有兌換。當時的餘帳，就是 廣場上還有五萬到十萬的同學，最初幾天還得一天花四萬。對這個四萬的數字我也存疑，但拉面包是真的。】【以上第 262 頁】

4 . 8 補充與質疑

4.8.1 吾爾開希為什麼喊撤？殘聯的周旋（劉燕，梁二，常勁）

【劉燕：我主要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二十一號晚上，開希很突然地在廣場上宣佈了一個請同學們撤到使館去的命令。

那天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候，當時因為軍隊已經進城了，廣場上的氣氛相對來說就比較緊張。我記得當時有鄧的人來，有胡啟立的人來，還有其他的人來，他們來找 開希和一些學生領袖，說有話要談。程真帶著鄧樸方殘聯的人來說鄧樸方要見，因為和鄧家一直沒有直接的接觸，當時就說好去。當時去的人有開希、梁二、少方、程真和我，當時因為找不到別的人，那天晚上王丹不在，據說他在北大，超華也不在。我們就這四個人去。

殘聯來的是一個姓韓的副主任，他剛開始說是鄧樸方要見我們，我們就去

了。在路上，他說你們以為北京城的地下是空的嗎？你們知道北京城地下交通是四通八達的，你們祇能攔住幾個別人能看到的地鐵口，還有更多看不到的口，根本就攔不住。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坦克平射，那麼平射的對象是什麼，那直接就是人那。當時路上的群眾已經把鐵桶、石礮兒擱到路中間當路障，他說，這種東西等坦克一來，不是一下就推沒了嘛。聽完這些話以後，我們幾個人都很緊張，他描寫出來的場景就是一場流血的場景。

我們四個人到了殘聯之後，他們又說鄧樸方不在，那等於就是他們以鄧樸方的名義把我們叫到殘聯。那個殘聯的辦公室副主任和另外一個人就跟我說，請你們在今天五點鐘之前一定要把同學帶出廣場。他說，後果不是你們能夠負擔的。這兩個人自稱是四五運動參加的人，他們說我們也是支持你們的，但是在形式上我們希望和你們能夠達成一種共識，不要傷害同學，也不要有更激烈的情形產生。我們四個人就覺得很緊張，離開了殘聯。然後，我們想怎麼辦？後來決定少方和程真兩個人馬上去中辦信訪局，核實一下軍隊在五點以前要進入廣場是不是真的。梁二回廣場找指揮部，整頓廣場的學生秩序，把學生的隊伍組織好。

【以上第 263 頁】我和開希到了廣場指揮部之後，找人都找不着。超華，你那天在不在指揮部？（王超華插：在啊，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熊煒也在。）之後，開希就把這幾個人叫到一起，大概地說了說情況。如果當時誰在殘聯聽了那些話，誰都會感到壓力很大，很大。當時我們回到廣場應該是十二點多、一點鐘了，就是開希宣佈撤之前的時候。因為誰都找不着，王丹不在，說是在北大，所以開希就說“在這種情況下，請同學們趕快撤到使館區去。”他這個人總相信他說話同學們都能信服。當時那個心情，不祇是他，梁二還有程真、少方，我們都很緊張，壓力確實很大。

我們四個人到了殘聯之後，他們又說鄧樸方不在，那等於就是他們以鄧樸方的名義把我們叫到殘聯。那個殘聯的辦公室副主任和另外一個人就跟我說，請你們在今天五點鐘之前一定要把同學帶出廣場。他說，後果不是你們能夠負擔的。這兩個人自稱是四五運動參加的人，他們說我們也是支持你們的，但是在形式上我們希望和你們能夠達成一種共識，不要傷害同學，也不要有更激烈的情形產生。我們四個人就覺得很緊張，離開了殘聯。然後，我們想怎麼辦？後來決定少方和程真兩個人馬上去中辦信訪局，核實一下軍隊在五點以前要進入廣

場是不是真的。梁二回廣場找指揮部，整頓廣場的學生秩序，把學生的隊伍組

織好。【以上第 263 頁】我和開希到了 廣場指揮部之後，找人都找不著。超華，你那天在不在指揮部？（王超華插：在啊，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熊煒也在。）之後，開希就把這幾個人叫到一起，大概地說 了說情況。如果當時誰在殘聯聽了那些話，誰都會感到壓力很大，很大。當時我們回到廣場應該是十二點多、一點鐘了，就是開希宣佈撤之前的時候。因為誰都找不 著，王丹不在，說是在北大，所以開希就說“在這種情況下，請同學們趕快撤到使館區去。”他這個人總相信他說話同學們都能信服。當時那個心情，不祇是他，梁 二還有程真、少方，我們都很緊張，壓力確實很大。

那天晚上，在中共高層有一個轉折點，但是我們都沒有抓到。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在來找的人中有一個穿蘭西裝、戴眼鏡的人，他說他是胡啟立的人，還有其 他的人來，還有鄧樸方，這等於是鄧家的人和我們直接的見面。這說明，那天晚上的氣候很緊張，中共高層已經作出了決定，如果學生再這樣下去就動手。六四所發 生的事情實際上在那天晚上已經醞釀好了，祇是沒有實現，到五點鐘他們沒有出兵而已，祇是一直延續到了六月三號的凌晨。因為在車上，那個人所描述的和六四所 發生的情景一模一樣，坦克平射、路障推平、北京的地下樞紐全部都是軍隊。

開希到了廣場之後，宣佈了那個命令，請同學撤，可同學們不撤，底下一下騷動起來。我忘記了是誰上來搶我的話筒，把話筒搶走了。在這種情況下，開希就離開廣場了。

我主要說鄧樸方這次見面使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六三的事情其實是早有預謀，祇是在一系列的特殊情況下，他們把它往後推到六三而已。】

【梁二：關於殘協，劉燕祇談到她自己的行動路線。在這個時候我需要對開希的態度的來源進行補充。

開希和我們在當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先見到的是殘協的一個副主任，第二見的是另外一個人，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們在那談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那個人給我 們的暗示就是說軍隊一定會鎮壓。而且開希從另外一個角度，他告訴我一個自稱為中央某某局的幹部找到他，跟他談話。我在當天上午也收到一個同樣的信息，就 跟開希一塊相信殘協的人有誠意邀請我們，並且到殘協去了。

就是在開希和我離【以上第 264 頁】開 殘協之後，少方、程真繼續留在那個地

方。我特別就這個事實與程真交流過，印證了一下。我們當時是分工合作，先他

們留在殘協那兒，後來又到鄭友梅那兒去了，也就是到信訪處去了。程真跟我

提到，留在那兒的印象和與信訪處主任鄭友梅的交談結果她有一個這樣的印象，

中央有意要分化學生領導，就是讓學生領導產生分歧。這點我覺得與閻明復的

態度有關係，說不定閻明復也有這種感覺。程真她自己是當時就想到這點，中央

一系列的與學生接觸的活動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是確實有一部分人是從中央分裂出來的，有意識地要與學生合作；第二個目的不外乎是中央並沒有分裂，或者說分裂出的那一小部分並沒有與學生接觸，而相反那一大部分繼續留在權力位置上面的那些頑固派他們是利用這種接觸，傳達錯誤的信息，時間上錯位的信息給你，從而給學生造成一種很混亂的印象，促成學生在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得出不同的判斷，而且在不同的判斷之間再產生一種情緒上的相互抵觸，造成學生內部的分化。這是程真自己的感覺。我記得當時開希也提到過這點。】

開希和我們在當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先見到的是殘協的一個副主任，第二見的是另外一個人，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們在那談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那個人給我們的暗示就是說軍隊一定會鎮壓。而且開希從另外一個角度，他告訴我說一個自稱為中央某某局的幹部找到他，跟他談話。我在當天上午也收到一個同樣的信息，就跟開希一塊相信殘協的人有誠意邀請我們，並且到殘協去了。就是在開希和我離【以上第264頁】開殘協之後，少方、程真繼續留在那個地方。我特別就這個事實與程真交流過，印證了一下。我們當時是分工合作，先他們留在殘協那兒，後來又到鄭友梅那兒去了，也就是到信訪處去了。程真跟我提到，留在那兒的印象和與信訪處主任鄭友梅的交談結果她有一個這樣的印象，中央有意要分化學生領導，就是讓學生領導產生分歧。這點我覺得與閻明復的態度有關係，說不定閻明復也有這種感覺。程真她自己是當時就想到這點，中央一系列的與學生接觸的活動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是確實有一部分人是從中央分裂出來的，有意識地要與學生合作；第二個目的不外乎是中央並沒有分裂，或者說分裂出的那一小部分並沒有與學生接觸，而相反那一大部分繼續留在權力位置上面的那些頑固派他們是利用這種接觸，傳達錯誤的信息，時間上錯位的信息給你，從而給學生造成一種很混亂的印象，促成學生在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得出不同的判斷，而且在不同的判斷之間再產生一種情緒上的相互抵觸，造成學生內部的分化。這是程真自己的感覺。我記得當時開希也提到過這點。】

【封從德：常勁，你曾經講到一次和鄧樸方的接觸，能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常勁：我記得是戒嚴以後，大概是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要么就是二十三日

鄧樸方有個秘書，殘聯的一個秘書跑到北大去找，說是你們如果有力量能夠幫助他們的話，鄧樸方願意勸鄧小平辭職，然後解除戒嚴，所有的學生從廣場上拉下來。

封從德：而且還說到要作進一步的聯絡，是和誰聯絡？你們見到鄧樸方沒有？

常勁：我們沒有跟他們作進一步聯絡，因為正好在這之前絕食的時候，北大住了兩個殘廢人，所以我們對鄧樸方的看法很差。當時我們沒有太重視這個意見，就把他打發走了。】【以上第 265 頁】

4.8.2 五二二會議詳情〈參：張伯笠 4.1.1 王超華 4.2.2〉〈參：李錄

4.3.1 柴玲 4.4.1〉

(1) 臨時指揮部和高聯的協議

【王超華：關於臨時指揮部和高聯的關係，我印象當中，協議當中還有一個基本的就是高聯整頓時它和臨時指揮部帶有一種隸屬關係，就是這種派出單位……

李錄：我不記得有這種說法。我記得是，三方共同組織一個臨時指揮部，因為北高聯領導不力，當時的詞啊，共同組織，所以才有了後來在常委中包括了超華、王丹、外高聯的連勝德等等，就是三方共同組織這麼一個東西。但是我當時確實有這麼一個印象，就是談到高聯的時候，希望它回去好好整頓，待高聯整頓結束之後，再討論四十八小時以後的授權問題。當時有人發言說，高聯幾天換了好幾百。當然他是有情緒化的發言了。

王超華：你們是否記得我回憶當中講到的是高聯負責外圍，包括堵軍車，你們就負責廣場。

李錄：我有這個印象。當時的情況是，不是一個決議，但是有這麼一個基本共識……

王超華：至少是我們幾個人口頭上都談過。

梁二：我在聽到的傳言當中，實際上不是傳言，我的印象當中一直有這個，就是高聯與絕食團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就是委托高聯，在剛才超華說的基礎上還有一點更明確，就是說高聯一旦回來，絕食團一定交回權力。

李錄：絕對沒有。】【以上第 266 頁】

(2) 王丹是否在場？

【梁二：剛才超華談到撤退的一個協議，我記得我曾經簽過這個名，也就是放棄高聯在廣場的權力。我想問一下我是否參加了？

王超華：當時祇有我和王志新。可能我拿著那東西到處去找人，我希望湊夠五個人的簽字，就不算是我個人的決定了。

張倫：王丹當時在吾爾開希宣佈撤離之後，是否在場？當時我就在紀念碑上

面，我和少江還交換過意見。我記得是王丹在場，我記得清清楚楚王丹講：“常委沒有作出這樣的決議，請同學們安靜。”

辛苦：我來證實一下。開希宣佈的時候就站在我的身邊，他被學運之聲廣播臺前面的糾察擋住了，一直沒有進去，一直到了那個工人叩頭進去。我當時就問，“王丹在哪裏？王丹是選出的總指揮。”王丹就跟我說：“我在這呢。”我說：“你怎么不進去？”他說：“人不讓我進去。”就是在他前面糾察線就是不讓他進去。這時我才把他拉進去的。

王超華：“高聯常委沒作出這樣的決議”這句話是我說的。在人家把喇叭奪走以後，高聯的人再想說話，就祇允許我一個人拿那個喇叭說。那幾個廣播站的人到後來就祇信任我一個人。

梁二：第一王丹不在場，至少我沒見到。第二，超華剛才說錯了一句話，在開希宣佈之前，他給我們說過這樣的事，然後才宣佈撤退。但他沒征得我們的同意。】

(3) 白夢的印象

【白夢：我由於一直在廣播站，沒參加過任何會議。但是五月二十二日晚上提議成立臨時總指揮部的會議我參加了，因為這是我唯一參加的會議，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王志新通知的，絕食團指揮部去了四個人，張伯笠、柴玲、李錄和我。王志新說，“你們絕食團指揮部祇能派一個代表參加。”他的意思是北高聯是權威的，絕食團和其它學校是平等地位，祇能出一個代表。我就充當了北大的代表。會議之前李錄對這次會不報什麼希望。因為類似的會很多也沒有作出任何的決議。

會是王志新主持的，主持得非常混亂。他的主要意見就是表決是【以上第267頁】否撤離的問題。主持到一半的時候，外地高校學生對王志新的資格提出了質疑，說你有什么權力召開這樣的會議。這時張伯笠就衝到前面，把話筒搶過來，說：“我提議，會議必須有紀律，誰發言必須先舉手，每一個人發言的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這時王志新就祇能坐在底下了，由張伯笠繼續主持會議。

到第四個是我發言，第一我提議臨時總指揮部應該由學生、知識分子、工人代表、市民代表加入共同組成指揮部，第二運動發展到現在絕食團指揮部在學生中的威望最高，所以我個人建議由絕食團指揮部暫時代理臨時總指揮部。天安門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的成立需要三天時間，我們在這三天裏作好籌備工作。會後表決同意了這幾點。

會是王志新主持的，主持得非常混亂。他的主要意見就是表決是【以上第

267 頁】否 撤離的問題。主持到一半的時候，外地高校學生對王志新的資格提出了質疑，說你有什么權力召開這樣的會議。這時張伯笠就衝到前面，把話筒搶過來，說：“我提議，會議必須有紀律，誰發言必須先舉手，每一個人發言的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這時王志新就祇能坐在底下了，由張伯笠繼續主持會議。到第四個是我發言，第一我提議臨時總指揮部應該由學生、知識分子、工人代表、市民代表加入共同組成指揮部，第二運動發展到現在絕食團指揮部在學生中的威望最高，所以我個人建議由絕食團指揮部暫時代理臨時總指揮部。天安門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的成立需要三天時間，我們在這三天裏作好籌備工作。會後表決同意了這幾點。

張伯笠委托我收集各方面的意見，準備成立由各方面人員參加的臨時總指揮部。我當時的確是作了一天多的籌備工作，問了各方面的情況，搜集各種意見的條子有一疊。我請王丹去找了嚴家其，但王丹告訴我，嚴家其不幹。我不明白的就是後來五月二十四日的聯席會議宣佈臨時總指揮部宣誓就職，我發現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進來。因為我自始至終是非常支持絕食團指揮部的，到這個時候，我就有了一些個人想法。

李錄：我沒印象你在會上講過這事。我也沒印象你發言提議以絕食團為基礎成立臨時指揮部。張伯笠：我記得白夢肯定是發言了。講的什麼我不記得了。這都有錄音。是我歸納的這幾點，就是絕食團代替臨時指揮部四十八小時。然後我委托白夢說成立長期指揮部要和高聯協商，要和知識分子協商。但我覺得臨時指揮部祇是過渡的。

柴玲：當時大家希望這次會議弄出一個在廣場統一的比較有權威的指揮部來。

封從德：白夢提到五月二十二日晚上那個會，你是充當北大的代表。那麼你的原因和你的代表資格受到過審查沒有？有沒有這個審查機制。

白夢：沒有，因為我們去了四個人，當時不讓我們進去。我在發言過程中有一個天津同學質問我，你代表那個學校？我說我代表北大【以上第 268 頁】。我的代表資格沒有受到審查。

白夢：沒有，因為我們去了四個人，當時不讓我們進去。我在發言過程中有一個天津同學質問我，你代表那個學校？我說我代表北大【以上第 268 頁】。我的代表資格沒有受到審查。

封從德：你是怎麼進去的？

白夢：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有好幾個人都參加過這個會，他們都知道。

李錄：第一我不記得不讓人進，至少沒有不讓我進，也沒有不讓柴玲進。第二我當時是對這個會抱有很大希望的。第三我不記得提到吸收知識分子和工人作為一個決議。因為我記得很清楚，我作了一個發言，把當時提到的所有議題作了總結，由張伯笠主持作表決。第四我不記得你發言了。

梁二：我希望有人告訴我召開這個會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白夢：是在紀念碑北側、天安門城樓前面的那片廣場。

梁二：超華說她祇找了王志新和超華兩個常委去。實際上我少江一直在紀念碑的第三層上，但為什麼沒有我？

王超華：我承認記憶錯誤。那次會議我根本不知道這是王志新召開的，我祇知道廣播找高聯常委去開會，然後我就去了。第二天，鄭旭光質問我為什麼交權？我曾經說過，廣播了一串名單，大家都要去，你不去怪誰。

張伯笠：這個會議是在北大物資站，王志新在喇叭裏喊開會。我去的時候，王志新拿著喇叭在那兒，楊濤在報到。我到了，王志新說，太好了，咱們開會。

梁二：我的財政部長是否在指揮部中得到承認？實際上我後來是知道會議的決議的。但我記得，我也曾經到過廣場指揮部，但多次遭到拒絕。

李錄：當時在那兒沒有確定財政部長，所以根本不涉及到是否任命的問題。當時是要求老封找你要錢，就知道你有錢，就知道北高聯設了一個收款站，梁二手裏有一大筆錢。既然北高聯已經和絕食團指揮部合并，大家是一家人了，就是希望你交錢，沒別的。

柴玲：當時的結論是，既然合并為統一的指揮部，高聯的錢和絕食團的錢就要合并。當時就是一個接管的問題，沒有任何任命的問題【以上第 269 頁】

王超華：當時會上根本沒有牽涉接收財物的問題。會散了以後，張伯笠在廣播裏叫我，讓我去辦移交手續，我是帶著翟偉民去的，也沒有提到財物是否移交。確實張伯笠說過，是四十八小時整頓，所以可以不移交。會上根本沒有說要封從德和梁二辦移交。

張伯笠：第一，超華認為四十八小時不必交接，當時我也沒有堅持。其它都可以交，就是財物沒有堅持。第二，我們指揮部確實確定了封從德為管財務的副總指揮。

封從德：當時祇有後勤部長，沒有財務部長。】

(4) 王超華為什麼退出臨時指揮部？

李錄：五月二十二日晚上開會的第二天你宣佈退出。我和柴玲都勸你，希望你不要退。你昨天談到了使你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想請你解釋一下這主要指的是什麼？

王超華：其實，當天晚上我覺得高聯回去整頓已經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了，因為我的後方有問題了。當時廣場上這種類型的代表會我是不大承認的，我覺得什麼一百多個學校，我根本就沒法確認。我祇認北京的四十多個高校，說實在的，北京市後來是五十二個高校，也不止是四十七個。這是我收集到的代表名單。凡是我不 能確認的，我不能認可他的代表性。但是既然是那麼多學校，我也祇好接受，我感覺有一點被迫的。為什麼鄭旭光他們提意見我不接受呢？我說“他們的廣播是讓所有的高聯常委都去開會，為什麼你不去？”他們想罷我，說“你一個人就說要交權給臨時指揮部。”這使我感覺四處受夾攻。第二天，忽然張伯笠跟我說交接的時候，完全是一些手續的交接。雖然我是常委，但沒有開任何會。我還不知道這個臨時指揮部到底是什麼，對形勢有什麼分析，就要開記者招待會，而且已經開始了宣傳。原來我對絕食團的宣傳就有很多的想法，可是我都沒有機會表達意見。我覺得我等於是陪著在這裏作一個高聯代表，去服從

人家的東西，而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我辭職的原因。【以上第 270 頁】

4.8.3 聯席會議與五二七會議〈參：張倫，老木 4.5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參：李錄 4.6.2 柴玲 4.4.1〉

(1) 人民發言人（封從德）

【我對五月二十七日的會作點補充。剛才老木提了一個大概的情形。那天的上午十點左右，有人來廣場叫指揮部去開這個會，我和柴玲就去了。會議討論《十點聲明》。我當時認識的人有開希，王丹、包遵信、劉曉波、老木、梁二、張倫。王軍濤、陳子明、劉剛也在會上，但我不認識。這個會從上午十一點一直開到下午五點鐘，我對這種開會的方式非常不安，因為廣場上那麼嚴峻的形勢，用這種老爺方式開會，而且要把廣場上的指揮機構都搬來開會。

劉曉波提名開希作“人民發言人”，我當時提了兩點：要作人民發言人至少要有兩個條件：一，這個人要有基本的政治、社會常識與經驗；二，要有遵守某種約束的習慣，要能有民主制約。

關於撤與不撤。撤是我用策略性的方式提出的，以當時廣場上沒有錢為理由，那是二十七日，是我接管廣場財務的第三天，廣場上沒有錢，我認為堅持不到六月二十日。我記得經過協調，梁二代表北高聯答應再堅持三天。我說，堅持一天是五萬，三天就是十五萬，梁二答應轉給十萬元。

梁二：老木談的他們各界聯席會議派出四君子絕食我表示異議。實際上在這之前曉波就一直認為，祇有投入才能作為其中的一分子。投入的方式一個是以知識分子大無畏的氣概，比如絕食來表示；二是以知識分子自身的社會經驗和智慧來幫助，比如象樹立吾爾開希為社會民間力量的制衡領導。剛才封從德提到的我當時同意了十萬塊錢，我記得我是要回去匯報，我當時沒有權力同意。我當時就跟你們說了，我不是財務部長，當時說的就很明確。

封從德：我不這麼記得。】【以上第 271 頁】

(2) “我們”和“你們”

封從德：老木提到過，劉曉波絕食是聯席會議定的，梁二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

梁二：聯席會議並沒決定。

老木：曉波他們提出絕食的想法，在會上我印象是開希介紹的，他們請求聯席會議批准，但聯席會議沒有批准。後來他們好幾次都是強烈地提出，在五月底的時候他們就決定是六月一日，因為別的原因他們推遲了一天，到六月二日，這個推遲都是由聯席會議決定的。張倫：在決定的時候我當時在場，開始是不同意，包括軍濤也是不同意。在聽到曉波提出“我們都要反省”等口號之後，全體同意。

封從德：聯席會議你認為它的權力來源和它的代表性怎樣？

老木：這個聯席會議是由各界代表組成的。它確實任命了廣場指揮部。它與廣場指揮部的關係就是這樣。

封從德：各界代表都是哪些？你能明確地說嗎？

老木：包括工自聯，是周勇軍和劉剛在那組織的，市民聯合會，知識分子的幾個部分，北高聯的代表，王丹、吾爾開希是作為個人，廣場指揮部的代表。

張倫：這個事我已經提到，我們現在很難完全確定它的徹底的代表性，但是在運動當中所有當時出現的組織的代表都參加了。

封從德：你多次在發言中提到“我們”和“你們”，你說，“我們不想操縱你們。”這是指什麼？

老木：我想就是當時跟廣場指揮部的關係。我糾正一下，我說的我們是指聯席會議。因為我覺得學生對知識分子的參與是比較敏感的問題，那么就希望達成比較融洽的情況，互相地介入，你們到聯席會議來，你和柴玲、李錄、張伯笠，還有我們參加到指揮部裏面去工作，這樣達到一種工作上的來往產生互相信任和理解，形成一種共識。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之間很難達成共識。這是我們在聯席會議上一些人的一個想法。

封從德：也就是說，“我們”是指聯席會議，“你們”是指廣場指揮部。【以上第 272 頁】

老木：臨時指揮部。

封從德：你是認為你是聯席會議任命的宣傳部長呢，還是指揮部任命的？

老木：這個事情當時是發生了一個錯誤。後來我很吃驚，有許多報道說我是民運的宣傳部長。我在臺灣就問過一個記者，我去查了原始資料，確實是在廣場東北角，那裏掛了一個橫幅，叫“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聯絡部”。部長就是劉蘇裏，他是光杆司令，參謀部是劉剛，但是從來沒設過辦公室在那辦過公，祇有後勤部是廣場原有的，還有宣傳部是原有的。我是去接管宣傳部，糾察總部張倫是原來有的。我不知道這個關係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可以查證。

封從德：你認為你是誰任命的？

老木：我認為是聯席會議任命的。你可以查一下有一個當時新聞界招待會。

封從德：你提到一次政變，說是由北大來光榮抬走誰。這個綁架是誰決定的？

老木：沒有決定，是有人在聯席會議上提議，但是被否決了。沒有說綁架，因為北大有這個決議，歡迎絕食同學回去，廣場上有一部分人希望撤退，所謂政變的方式就是光榮大凱旋，用擔架把你們這些領袖都抬回去就完了。

封從德：什麼時間？

老木：我也不記得了，反正是五月二十八、九日。北大、高聯也同意這個東西。王超華：我們討論過，特別指責過北大，因為楊濤說，別的學校都能吸收絕食同學，為什麼北大不能。後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高聯回來以後，楊濤他們還特別表示過困難，因為柴玲這幾個人他們都叫不回來。

封從德：你曾經提到這個聯席會議實際的主持人應該是軍濤和包遵信，那麼王丹起的是什麼作用？

老木：王丹召集人。有名單任命的。

李錄：老木你在提“我們”的時候代表誰的意見？就是跟你意見比較一致的有哪些？【以上第 273 頁】

老木：我想在聯席會議上的時候，尤其是在五月二十七日建議撤退被否決之後，聯席會議和廣場指揮部已經形成了脫節的現象。我想你們也是承認這個事實的。所以說，聯席會議對廣場指揮部有過很多討論，包括六二絕食，這事情也和廣場指揮部的那種關係進行了討論的。所以“我們”還是指的這個。

李錄：我不是在問這個。你在提“我們”的時候，你在表達所有看法的時候都是用“我們”。會議中哪些人和你的看法比較接近、比較一致？我的印象是聯席會議並沒有每次形成一條、兩條的決議。我想弄清楚的是，你個人的意見都代表哪些人？

老木：我想由於一些比較復雜的原因我不大願意講，形成決議不是形成文字，那時有記錄，但是每作一件事情，象絕食的事情那肯定是有舉手通過的，那麼這種事情還是形成決議的。我不記得李錄參加過幾次會，可能一次。聯席會議，我在前期的時候負責新聞快訊，所以我對會議的進程跟張倫差不多，張倫是累得要睡覺，我忙著報紙的校對和印刷，所以我對前期也不知道，之後就非常清楚。我有點報歉，用了代表這個詞，有點不妥。但是我對聯席會議講一個大致的印象，也許當時對指揮部有另外的意見……

【張倫：對老木說的關於聯席會議有沒有決議性的東西，我的印象聯席會議並不是每次會都有決議，但有許多會是有決議的。剛才梁二說他見過成文決議，我的印象當中，多數是口頭決議，表決的，這是我的印象。第二老木剛才講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任命不任命這個關係，我現在不敢說。但是在這之前，我去另外一個屋開會，布置跟那幾個副總指揮布置北京的堵軍車的問題的時候之前。我記得當場已經確定了幾個重要的負責人。我回來之後，討論明天誓師大會。這是當時的過程，我就把這個過程說一下就完了。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

李錄：我要求補充這一點，因為當天柴玲一回來就跟我敘述了當天開會的情況。當時她跟我說，她在會議上介紹了一下廣場的狀況，同時也介紹了在廣場中已經形成的協議，由一百多個高校投票形成的這個決議和臨時指揮部的的權限以及時間。根據這個協議，王軍濤告訴她，說“我們這個會議祇是一個聯絡後勤、幫大家出主意，給大家提供物資的一個機構。我們希望承認你們這個指揮部，把它進一步地【以上第 274 頁】制度化。”當時我聽了很高興。

李錄：我要求補充這一點，因為當天柴玲一回來就跟我敘述了當天開會的情況。當時她跟我說，她在會議上介紹了一下廣場的狀況，同時也介紹了在廣場中已經形成的協議，由一百多個高校投票形成的這個決議和臨時指揮部的的權限以及時間。根據這個協議，王軍濤告訴她，說“我們這個會議祇是一個聯絡後勤、幫大家出主意，給大家提供物資的一個機構。我們希望承認你們這個指揮部，把它進一步地【以上第 274 頁】制度化。”當時我聽了很高興。

老木：我覺得這個問題得說清楚。為什麼呢，我的印象就是如此，你說的基本沒有錯誤，是柴玲告訴你的。但是我跟你講，你看看所有的部長都是聯席會的成員。李錄：什麼，所有的部長啊！我們有十個部長啊！

老木：不對，不對。

王超華：參加聯席會議的人記得不記得，聯席會知道不知道有四十八小時這件事？

老木：我們不知道。

李錄：什麼叫“你們”呀？

張倫：反對老木再用這個詞。

老木：我不知道。】

(3) 聯席會議任命了廣場指揮部嗎？

李錄：你認為當時聯席會議任命了廣場指揮部，你的根據是什麼？

老木：我想這個很多都可以證明，第一次開會，第二次開會，你可以查這個原始資料，這裏包括二十四日的記者招待會。

李錄：開記者招待會的意思就是任命廣場指揮部？

老木：因為經過開會討論的決議，我想提名不是在那裏提的。

李錄：我們在二十四日下午一、兩點鐘宣誓以後，同時在宣誓完了之後就開始念了指揮部的各個執行部門和成員。當時有一張單子，在上面你是宣傳部長，之後又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當時是一共四五個人的記者招待會。你認為這樣一個記者招待會就表明了是各界聯席會議授權決定成立廣場指揮部？

老木：那次上午在社科院的會你沒去，是我們在社科院開完會出來才作的這個決定，成立廣場指揮部，立刻宣佈。要不然不會有這個記者招待會的。

(4) 老木主要作了哪些工作？

李錄：那個時候你作為廣場指揮部一個最重要的執行部門的首長，我們需要跟每個部門每天至少開一次碰頭會，至少了解他們的工作【以上第 275 頁】

情況。但是問題就是老也找不到你，我每次見到你都要提出這方面的批評。我想現在請你回答一下，你當時主要作了那些工作？

李錄：那個時候你作為廣場指揮部一個最重要的執行部門的首長，我們需要跟每個部門每天至少開一次碰頭會，至少了解他們的工作【以上第 275 頁】情況。但是問題就是老也找不到你，我每次見到你都要提出這方面的批評。我想現在請你回答一下，你當時主要作了那些工作？

老木：我已經在講話的時候說了我每天的日程。二十七日以前，我每天晚上都是睡在廣場，我直接匯報的對象是張伯笠，我沒有向你作。但是開部長會議

的事從來沒得到過通知，因為我跟劉蘇裏一直是在一起的，如果他得到通知，我也肯定得到通知，我們兩人是在一個帳篷裏睡了四、五夜，所以我對你們這個部長工作會議根本沒有印象。我相反覺得你們是非常獨裁的，根本不讓別人插手。

李錄：你沒回答我的那一半問題，你當時主要作了那些工作？

老木：我不是已經講了嗎，首先二十四日接手，然後是整頓，比如我任命廣播站，把連順德趕出去的事情，我就清理這個廣播站，清理印刷處，建立了編輯部，建立了一個記者站，這都有名單的，這個名單因為有些人還沒被捕我不願意透露，包括建立了一個秘書處，建立了幾個演講團在廣場四周貼傳單，這是我的一個日常的工作。我因為同時還是聯席會議的成員，負責新聞快訊，所以我總體來講是把聯席會議的形成的決議和文件和重要的精神讓宣傳部的同學起草稿子宣傳，送到廣播站。

李錄：你知道不知道你在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已經被解除職務了？

老木：這個事情張伯笠說過撤我的職務，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吵架問題，後來就和解了，所以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

李錄：你不知道在營地聯席會議上已經通過了吧？我很奇怪就在這兒，因為你去了職之後也沒什麼反應，而所有的部門都照常運行。而且我也找不到你的辦公地，後來我每次見到你都問，你這個宣傳部長到哪去了？廣播站又出事了，根本找不到人。你說的秘書處的影子都沒有，你可能回到廣場去睡覺。每天晚上十二點鐘都開會，開了十幾天，就是找不到你。

老木：我跟你講，你肯定有印象錯誤。我跟張伯笠有聯系，你不是負責宣傳的。我對老封也沒什麼印象，他是管財政的。我祇跟他要過一兩次錢，他批過五百給宣傳部。我該出現的地方就是我的宣傳部

梁二：我覺得關於任命，剛才在老木的談話當中有一個邏輯性的錯誤，第一是說聯席會議沒作出任何成文決議，第二又一再聲稱任命是決議，這就有一個是口頭上的決議，還是成文的決議的問題。

老木：我記得……

沈彤：老木你聽我說，在這的很多人都去過聯席會議，知道聯席【以上第276頁】會議那種形式。

沈彤：老木你聽我說，在這的很多人都去過聯席會議，知道聯席【以上第276頁】會議那種形式。

(5) 與北高聯的關係

【王超華：關於首都聯席會議和北高聯的關係。首都聯席會議，北高聯始終是有一些人去參加的，但是我們在二十三日開始整頓以後每天開的例會中，首都聯席會議的事情始終沒有在高聯中占主導的地位，一直是高聯工作的次要部分。原因是即使首聯有農民、市民、工人自治聯合會，但是就象知識分子和工人自治會碰到事情都來找學生，希望各校出來幹什麼幹什麼，所以我們認為他們祇屬於幕僚，軍師性質的，並不是有真正群眾基礎的，我們沒有受他們領導的必

要。包括我們派出的代表，事實上回來以後和在那開會的時候都不能改變我們獨立作出的決定，加上印證廣場指揮部對首聯的態度，我不認為首聯實際起了什麼作用。除了幾個特定的事情。】

【梁二：至於我在聯席會議上的表現，最初我是跟張倫和少江一起去的。我認為我在這個會上不起一個領導的作用，去祇是感受到另一種信息、接受更多的信息。再就是我肚子餓著，要到那裏面去吃午飯，第三那裏大家寬容的氣氛要比廣場上那種急劇的鬥爭氣氛和疲憊的、轟炸式的講話方式要輕鬆得多。我在那個地方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以至於回去之後還更有精力開展工作。】

4.8.4 糾察與“政變”

(1) 糾察問題（張倫）

五月十七日廣場人數達到一百多萬，我在西北角看到很多人被擠倒。覺得非常危險，我就趕到紀念碑上想找人講一講。北大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在北大演講過認識我，就讓我上去。上去以後碰到邵江，我對他講，“你要趕快派人把廣場上的人群疏散，免得發生危險事件。”邵江就說“那你趕快辦。”我就變成了疏導總指揮。從那以後就下不來了，就在廣場開始負責這些事情。但是我沒有完全管這個事情，當時祇是看到梁二，王志新、邵江太累，我就幫他們處理一些問題。【以上第 277 頁】許多人老紀念碑上面跑，他們覺得紀念碑上邊肯定有負責的，到處都是“找總部，找總部”，其實我也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十八日下大雨那天邵江累得實在不行了，他就說，“實在不行你就來負責一下吧！”我就在廣場北面去開辟第二條生命線，派救護車什麼的這些事情。下大雨的時候，我帶著話筒號稱代表總部，沿途慰問在大雨中堅持的學生。在整個糾察過程當中正式任命的廣場上的糾察總長可能祇有本人這麼一次。實際上糾察這事情是必不可少，但是效果最差，是最累人，但是最無效的事情。因為人員流動太大。我覺得實際上當時在廣場上各學校都在負責。我親身的經歷告訴我，實際上這場運動的糾察工作完全靠同學們自覺地維持，否則任何人沒有辦法。二十三日決定我是糾察總長之後，下午回來就開始建立總部。晚上開始我到各處去巡查，到堵

軍車的黃莊、豐臺等地方去轉，那裏已經發生衝突。毛主席像被污的時候我正好不在，重新挂上的時候我在場。當時長安街上一個糾察隊員也沒有，我當時就急了，當時正好是五點多鐘，下班的人一堵就是不得了的。我叫所有的學生緊急拉起封鎖線。我因為忙活這些事救了我，因為我從來沒上過鏡頭、報紙。這個時候，一個路過的汽車上有一個香港記者，他看見我在那忙活。後來我在香港再看到他，他就核實了這件事。

五月十七日廣場人數達到一百多萬，我在西北角看到很多人被擠倒。覺得非常危險，我就趕到紀念碑上想找人講一講。北大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在北大演講過認識我，就讓我上去。上去以後碰到邵江，我對他講，“你要趕快派人把廣場上的人群疏散，免得發生危險事件。”邵江就說“那你趕快辦。”我就變成了疏導總指揮。從那以後就下不來了，就在廣場開始負責這些事情。但是我沒有完全管這個事情，當時只是看到梁二，王志新、邵江太累，我就幫他們處理一些問題。

【以上第 277 頁】許多人老紀念碑上面跑，他們覺得紀念碑上邊肯定有負責的，到處都是“找總部，找總部”，其實我也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十八日下大雨那天邵江累得實在不行了，他就說，“實在不行你就來負責一下吧！”我就在廣場北面去開辟第二條生命線，派救護車什么的這些事情。下大雨的時候，我帶著話筒號稱代表總部，沿途慰問在大雨中堅持的學生。在整個糾察過程當中正式任命的廣場上的糾察總長可能只有本人這麼一次。實際上糾察這事情是必不可少，但是效果最差，是最累人，但是最無效的事情。因為人員流動太大。我覺得實際上當時在廣場上各學校都在負責。我親身的經歷告訴我，實際上這場運動的糾察工作完全靠同學們自覺地維持，否則任何人沒有辦法。二十三日決定我是糾察總長之後，下午回來就開始建立總部。晚上開始我到各處去巡查，到堵軍車的黃莊、豐臺等地方去轉，那裏已經發生衝突。毛主席像被污的時候我正好不在，重新挂上的時候我在場。當時長安街上一個糾察隊員也沒有，我當時就急了，當時正好是五點多鐘，下班的人一堵就是不得了的。我叫所有的學生緊急拉起封鎖線。我因為忙活這些事救了我，因為我從來沒上過鏡頭、報紙。這個時候，一個路過的汽車上有一個香港記者，他看見我在那忙活。後來我在香港再看到他，他就核實了這件事。

【梁二：關於糾察隊、生命線。生命線換防的過程，在五月十七日之後都是我和少江在紀念碑最高一層來直接調動的，換防的同學，比如大連海運學院、

南大、天大他們那些小學校的還有沈陽經濟學院的，名字可能不是特別準確，這些小學校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當時還有一位叫張新的，是師大教育系的，他自稱糾察隊長，也起到了一個調動作用，但主要的換防是少江在執行。】

封從德：你提到五月十七日的“疏導總指揮”。這個總指揮是怎麼來的？擔任了多長時間？

張倫：有一天多吧，然後開始升格，因為張新已經不行了，我就具體地負責起來。當時我跑到廣場上高聯指揮部要求糾察工作。

封從德：你擔任過糾察總長，多長時間？你後來是辭職了，離開廣場什麼原因？

張倫：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宣誓就職。我當時開始發出第一號令，【以上第 278 頁】統一廣場的通行證和糾察線，我還寫了各校在廣場上的位置。二十九日我去參加會議時已經知道我要休息一下。當時跟那幾個副總指揮講過。我暈倒那天晚上，我讓一個學生給柴玲送過一個東西。廣場政變發生過多次，我每次出外巡查回來都發現廣場老有政變，就老要鎮壓。……我這麼多天沒有在廣場睡過一次覺，除了在聯席會上睡，所以聯席會的具體討論我都記得不太清楚。祇記得聯席會議的十點聲明是甘陽起草的，舉手通過的時候我就舉了一下手。

張倫：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宣誓就職。我當時開始發出第一號令，【以上第 278 頁】統一廣場的通行證和糾察線，我還寫了各校在廣場上的位置。二十九日我去參加會議時已經知道我要休息一下。當時跟那幾個副總指揮講過。我暈倒那天晚上，我讓一個學生給柴玲送過一個東西。廣場政變發生過多次，我每次出外巡查回來都發現廣場老有政變，就老要鎮壓。……我這麼多天沒有在廣場睡過一次覺，除了在聯席會上睡，所以聯席會的具體討論我都記得不太清楚。祇記得聯席會議的十點聲明是甘陽起草的，舉手通過的時候我就舉了一下手。

我從廣場上撤下來的日期是二十四日晚上，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次覺，是在北京醫院，打了一夜點滴，打得胳膊都腫了，我的身體已經基本處於半垮掉的狀態。二十九日我去廣場開聯席會，我的一個同學架著我走。我到現在為止也不知道總部在什麼地方，我祇知道紀念碑上面柴玲他們有一個大棚子。我說“我想下去休息一下”，可就是找不著。後來軍濤就說，“你下去休息。”把我硬送到北京昌平縣去休息，這是三十日。

（2）奪權與“政變”

柴玲：聽說侯曉天承認，王文綁架事件是王軍濤策劃的。你知道不知道？

張倫：我根本不知道。我當時被送到昌平休息去了。就我個人的看法，我不相信這個事情。

梁二：我知道整個過程。海峰和王文拿著一盤錄音帶找到我，說他們曾經綁架過柴玲，是不成功的事變。我有一個朋友看到香港報紙就告訴我，說這件事之後還有更大的陰謀，可能是中共造的陰謀。但是王文他們自己說是內部不合造成的。

白夢：關於“政變”的問題，我覺得當時在廣場上非常混亂。這樣的情況下，好幾個學生組織之間最頭疼的是多種的權力關係，互相爭來爭去造成了一種情況，就是很難作出決策。實際上當時的主流就是堅守廣場，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個人、各個組織爭權的情況非常嚴重。我就想問一下你所知道的政變情況。

張倫：學生政變我個人鎮壓的就不下四次。我一回來就有人說，警戒線和廣播站已經被外高聯占領了。但是就象常勁講的，我在學生【以上第 279 頁】當中的威信，就是我累的那個樣子和包括年紀大一點。每次都是我過去跟他們講“你們這樣不行”，他們就撤了。有兩次比較重要的就是市民去政變。他們占領廣播站馬上就要接管了，我上去說“不行”。還有一次，隊伍組織得非常好，在紀念碑下，坐得方方正正的。後來我對他們講，“你們必須拉回去！”後來他們就撤走了。這些事我都沒和柴玲講，怕增加她的負擔。學生政變比較大的、成形的一次是外高聯搞的。這一次是五月二十五日吧！還有一些是小學校搞的政變。

張倫：學生政變我個人鎮壓的就不下四次。我一回來就有人說，警戒線和廣播站已經被外高聯占領了。但是就象常勁講的，我在學生【以上第 279 頁】當中的威信，就是我累的那個樣子和包括年紀大一點。每次都是我過去跟他們講“你們這樣不行”，他們就撤了。有兩次比較重要的就是市民去政變。他們占領廣播站馬上就要接管了，我上去說“不行”。還有一次，隊伍組織得非常好，在紀念碑下，坐得方方正正的。後來我對他們講，“你們必須拉回去！”後來他們就撤走了。這些事我都沒和柴玲講，怕增加她的負擔。學生政變比較大的、成形的一次是外高聯搞的。這一次是五月二十五日吧！還有一些是小學校搞的政變。

梁二：我想問一個問題，我記得鄭旭光曾經好幾次在廣場上奪權。我想問超華這個具體時候和過程。

王超華：對不起，我從來不知道關於他奪權的事。我記得在會上是誰講過鄭旭光的事。他來找我的時候，也沒有說過把誰罷了。我的印象，祇要我在我就堅

持原來的常委，因為沒有經過改選。

梁二：鄭旭光還曾經自封過高聯主席。

王超華：我不知道這回事。他到我那兒也沒有說過這話。

張伯笠：第一次奪權是在絕食團結束絕食的五月二十日這天，他帶領了邵江，好象是他們兩個人去的，在趙紫陽去講話之前開始奪權。權已經奪過去了，很成功。那天參加會議的有郭海峰、我、王丹、鄭旭光。確實他說自己是高聯的主席，說現在要形成一個指揮部全權管理廣場。然後大家就選舉，選上了鄭旭光、王丹、郭海峰、我，還有王文、柴玲。選完之後要鄭旭光發表施政綱領。就在這個時候，說趙紫陽總書記要來。鄭旭光就說“剛才這個選舉算無效。我宣佈辭職。”就要走。王丹說這算是什么玩意兒，怎麼辦呀，都走了，誰管呀，今天晚上這事兒。郭海峰說“這樣吧，我也辭職。”都跑了。我當時就火了，我說這樣不行，必須得有一個人管。鄭旭光說，“張伯笠你就帶領管吧。”他扔給我這句話後揚長而去。聽說趙紫陽來了，我們幾個人就到趙紫陽的車那兒去，又通知李錄。到那兒時趙紫陽已經走了。這是一次奪權。

梁二：鄭旭光不僅是在這次主動選舉，還有他曾經帶著糾察隊去衝擊學運之聲廣播站。

王超華：我知道他曾經管過廣播站。可是我一直掌握絕食以前的名單，所以以前各校自治會的代表和我一直有私人聯繫。他怎麼奪權【以上第 280 頁】老把我弄不下去？所以我從來不知道你們說的奪權這些事。

王超華：我知道他曾經管過廣播站。可是我一直掌握絕食以前的名單，所以以前各校自治會的代表和我一直有私人聯繫。他怎麼奪權【以上第 280 頁】老把我弄不下去？所以我從來不知道你們說的奪權這些事。

李錄：據我所知，鄭旭光奪權有七八次之多。我還都知道，這不是傳說。第一次是在十五日、十六日，在絕食中間。當時高聯在廣場上的代表主要是王超華、鄭旭光。梁二給我的感覺就是活動能力很強，東跑西跑。王超華和鄭旭光都是韌性十足，坐地泡。邵江也經常在。當時他就說了，要參加到領導工作，總指揮或副總指揮，作實際工作不行。當時對這個人沒有印象，不太認識，當然就回絕了。後來就是十八日的奪權。這也談不上什麼奪權，就你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然後表決。我當時是出去布置什麼工作，一個小時回來之後，他就坐在那兒告訴我說，“你不要回來了”。當時那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他怎麼就說“你不要回來了”。我說：“你怎麼還坐在這兒？要不要我請大家把你請走呀？”他說，我待會兒走，你用不著。等到趙紫陽來的時候，其實已經停下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是在二十和二十一日。當時廣場上曾出現一度的權力真空。我和伯笠三次上學運之聲，試圖商量建立聯合指揮部。當時接待的人主要就是鄭旭光，他已經是高聯主席了。是不是選舉的，我就知道了。我的印象是王超華不是副主席，就是同時也是主席，你們有兩個主席。管理廣播站的是周鋒鎖和張明。鄭旭光說，如果聯合的話，立刻你就交權。因為絕食已經結束，新聞廣播站是中心。到了二十二日晚上，就是大會決定成立臨時指揮部之後，我的印象是超華能夠代表北高聯。我和柴玲力勸超華一定要留在這個裏面，具體什麼職務都沒問

題。原來我的印象是你們總在一起合謀，這時我發現，超華和鄭旭光並不是一個想法。實際上老在挑動政變的是鄭旭光在作後臺。他動不動就帶著糾察隊前護後擁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又要接管了。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有兩三次。後來幾次我不能證實是他幹的。祇要是北高聯方面來接管都跟他有關。最後一次，是陳建勛他們告訴我的，六月二日他帶著上千人的糾察隊全面接管。

【梁二：李錄被綁架的時間和地點是什麼？】

李錄：五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

柴玲：我問王超華一些問題。這涉及當時大家對王超華的一些基【以上第 281 頁】本誤會。趙少若在六月一、二日左右曾和我說過一件事：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三日之間廣場非常混亂，當時王超華一個人沒有辦法整頓廣場，曾經招標招了一個北京美術學院的學生，任命為廣場整理總指揮。他在一天之內把廣場整理得條條有序。這時超華看到他這麼有魄力，可能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或動搖。當天晚上，當別人事事都問他的時候，超華就作了一個宣佈，說高聯既沒有承認他是總指揮，又根本不了解這個人。少若聽了以後非常難過，就說：“超華，你知道嗎？他現在因為勞累過度已經被送進醫院了。”第二件事，超華對趙少若親口講，說以後跟上層有什麼聯繫，請不要告訴柴玲。

柴玲：我問王超華一些問題。這涉及當時大家對王超華的一些基【以上第 281 頁】本誤會。趙少若在六月一、二日左右曾和我說過一件事：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三日之間廣場非常混亂，當時王超華一個人沒有辦法整頓廣場，曾經招標招了一個北京美術學院的學生，任命為廣場整理總指揮。他在一天之內把廣場整理得條條有序。這時超華看到他這麼有魄力，可能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或動搖。當天晚上，當別人事事都問他的時候，超華就作了一個宣佈，說高聯既沒有承認他是總指揮，又根本不了解這個人。少若聽了以後非常難過，就說：“超華，你知道嗎？他現在因為勞累過度已經被送進醫院了。”第二件事，超華對趙少若親口講，說以後跟上層有什麼聯繫，請不要告訴柴玲。

王超華：先說第二個事。有這個可能，因為我覺得柴玲簡直就是沒有辦法說服的，所以有這種可能有這樣的事。我當時是想，無論有什麼樣的撤出計劃都別想說服柴玲。我不記得是否對趙少若這樣說過，但這是可能的。

柴玲：可是你知不知道在接替廣場指揮以後我是當時廣場的核心，如果把這樣的信息切斷以後，會對廣場上的策略產生什麼影響？

王超華：五月二十三日以後我們是知道你們是廣場的核心的。可是我不能確認我對他是在什麼時間說的。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現在不能準確記憶，在二十日

戒嚴以後二十三日高聯撤走以前廣場曾經有過整理得井井有條的一天。

梁二：當時是有一個少若認為相當有能力的人，我記得我和超華商量過讓他作特派員。因為當時廣場上確實高聯沒有多少人，我們也沒有組織的力量，我們需要組織廣場，而不是接管廣場。趙少若就曾經提出，進入不了絕食團、廣播團就不進去。剛才提的不要告訴柴玲，不要告訴絕食團指揮部，這是我們不能告訴。我一直想與他們接觸，但都沒有能夠進入到廣場指揮部或者絕食團。唯一的一次進入絕食團是六月三日晚上，李錄坐在那兒，柴玲正在哭。

廣場上的權力真空問題。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深圳大學的男孩子，八七級法律系的。我當時就和少江兩人被迫承認他是高聯主席。

王超華：我知道深圳大學有一個萬 X X，他從三層下來說，是王【以上第 282 頁】志新任命他為總指揮。我堅決否認掉了他是總指揮。我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王超華：我知道深圳大學有一個萬 X X，他從三層下來說，是王【以上第 282 頁】志新任命他為總指揮。我堅決否認掉了他是總指揮。我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辛苦：二十日中午在紀念碑三層有一個在廣場上的各校學生代表大會，在這個大會上選出王丹作廣場總指揮。你知道不知道這回事？

王超華：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王丹主持的那個會。開始說王丹是總指揮，底下意見特別多。後來就變成王丹是名義總指揮，執行總指揮是一個青島來的學生。

辛苦：當時我是蘭州大學代表。王丹是總指揮，這個是大家公認的。】

(3) 廣場廣播站 (3) : 後期的變故 (白夢, 楊濤*) <參: 廣場廣播站 (1) 3.3、(2) 3.6.5>

白夢：兩個廣播站的合并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開的成立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的會議做的決議。五月二十三日成立臨時總指揮部，廣場移交權力的時候，我當時就覺得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整個廣場就可以統一了，尤其是廣場的廣播也可以統一了。我就把絕食團廣播站和學運之聲廣播站合并到一起，我當時帶了一班人馬到了“學運之聲”去接管廣播站。我過去接管廣播站的時候，和張銳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和對峙。我當時是氣勢洶洶的。因為我覺得我是絕食團的，絕食團成了臨時總指揮部了，那麼，我很自然地有權力全權接管，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張銳就很不同意，說“我們要合并，至少主要的人要留下來。”我當時不太同意“學運之聲”的一班人留下來，我希望用我自己的一班人，所以當時我就強行要他們離開。張銳非常生氣，說“我要發表聲明。”我說現在不允許你發表聲明。張銳後來還是寫了一個英文的聲明，這對我印象很深，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寫了一個用英文打字的聲明，就是我不懂。他知道我不懂英文，看不懂。他說，“你看吧（大家笑），你審查吧。”我當時覺得有點影響我的自尊，我假裝拿起來看了看，（大家笑）我就指了其中一行字，問了旁

邊一個人，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然後，我說你去找一個英文翻譯來。他就去找了一個英文翻譯來給我翻譯這篇文章。翻譯之後，我認為這個聲明絕對不能夠發。因為這個聲明很顯然地說【以上第 283 頁】廣場的分裂情況，學生組織的分裂情況。我不希望這個情況由廣播站最早公布，對整個全世界公布，造成不良影響。他堅持要發，一把就把話筒奪過來。我說，你要奪話筒，我可以命令把你強行架出去。後來，張銳就把廣播線掐了，把三個喇叭掐了。這是我非常生氣的一件事。

白夢：兩個廣播站的合并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開的成立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的會議做的決議。五月二十三日成立臨時總指揮部，廣場移交權力的時候，我當時就覺得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整個廣場就可以統一了，尤其是廣場的廣播也可以統一了。我就把絕食團廣播站和學運之聲廣播站合并到一起，我當時帶了一班人馬到了“學運之聲”去接管廣播站。我過去接管廣播站的時候，和張銳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和對峙。我當時是氣勢洶洶的。因為我覺得我是絕食團的，絕食團成了臨時總指揮部了，那麼，我很自然地有權力全權接管，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張銳就很不同意，說“我們要合并，至少主要的人要留下來。”我當時不太同意“學運之聲”的一班人留下來，我希望用我自己的一班人，所以當時我就強行要他們離開。張銳非常生氣，說“我要發表聲明。”我說現在不允許你發表聲明。張銳後來還是寫了一個英文的聲明，這對我印象很深，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寫了一個用英文打字的聲明，就是我看不懂。他知道我不懂英文，看不懂。他說，“你看吧（大家笑），你審查吧。”我當時覺得有點影響我的自尊，我假裝拿起來看了看，（大家笑）我就指了其中一行字，問了旁邊一個人，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然後，我說你去找一個英文翻譯來。他就去找了一個英文翻譯來給我翻譯這篇文章。翻譯之後，我認為這個聲明絕對不能

夠發。因為這個聲明很顯然地說【以上第 283 頁】廣場的分裂情況，學生組織的分裂情況。我不希望這個情況由廣播站最早公布，對整個全世界公布，造成不良影響。他堅持要發，一把就把話筒奪過來。我說，你要奪話筒，我可以命令把你強行架出去。後來，張銳就把廣播線掐了，把三個喇叭掐了。這是我非常生氣的一件事。

【李錄：你當時是怎么判斷張銳是“學運之聲”廣播站站長？

白夢：他自己說是負責人。

【封從德：請具體解釋。

白夢：關於張銳的站長，我沒有提到過他是站長。因為我去的時候他們中幾個主要的負責人我對不上號，我祇記得一個女同學，說是清華大學的，叫孫勇紅。這是那天我問王超華，她告訴我的。第二點關於張銳，我當時去找的時候我印象他說他在管事，而且他在那兒指手劃腳的。五月二十三日早上當我接管了他之後他跟我鬧來鬧去，要發表聲明什么的。所以我可能誤以為他是站長。】

【李錄：在兩個廣播站統一之後，你當時主要是在哪邊呢？

白夢：在紀念碑下面的那個，就是所謂的學運之聲，就是總指揮部廣播臺。絕食團那邊是停了，我把那邊的人都撤過來了，祇留下我的一個同學，她一直在那堅守。

李錄：當時你和王童的權限是怎么分配的？他是不是聽你的指揮呢？

白夢：這個有詳細的名單，王童在我任職之後和合并之後都沒當過站長。我們兩個關係處理得是比較好。我跟他發過兩次火以後，跟他談過一次。他一直是作為我的主要播音員和主要主持者。沒有我劃圈的稿子我不允許他播，在我之前和辭職之後他是什么職務我就不清楚了。】

這個廣播站一直堅持到五月二十八日我辭職。五月二十八日我向柴玲辭職。我辭職之後，柴玲派張伯笠來接管廣播站。伯笠當時對我非常有意見，包括柴玲、李錄都對我非常有意見。張伯笠很生氣，一來就發火。我當時等待著跟他移交。我辭職是我身體不好，因為身體原因。但是，下面同學不願意，他們跟我已經有很深的感情了，他們【以上第 284 頁】不同意，說“你要辭職，我們集體辭職。

”我不同意，一再說服他們。結果正好在這關鍵，張伯笠來了，發了一通火。結果管技術的那個同學把發電機關了。

這個廣播站一直堅持到五月二十八日我辭職。五月二十八日我向柴玲辭職。我辭職之後，柴玲派張伯笠來接管廣播站。伯笠當時對我非常有意見，包括柴玲、李錄都對我非常有意見。張伯笠很生氣，一來就發火。我當時等待著跟他移交。我辭職是我身體不好，因為身體原因。但是，下面同學不願意，他們跟我已經有很深的感情了，他們【以上第 284 頁】不同意，說“你要辭職，我們集

體辭職。“我不同意，一再說服他們。結果正好在這關鍵，張伯笠來了，發了一通火。結果管技術的那個同學把發電機關了。

張伯笠可能是對我個人的意見，他說，“白夢，你在這個時候辭職太不應該。”他說作為我的老同學，他對我非常生氣。但我覺得我沒辦法，因為柴玲不給我留臺階了，所以我就辭職。當時還有我們班的幾個同學也在場，他們是聽說我辭職了，來廣場來接我回北大。這時伯笠就和下面的幾個同學發生了爭吵。那位同學把發電機關了。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是他一個人專人負責，別人都搞不轉。他跟張伯笠吵起來了，吵了一架，他說，誰也動不了，誰來發號施令也沒用，我們集體辭職。這個原始文件我也帶來了。當時我接管之後，我自任臺長兼總編，叫“民主之聲”廣播臺，實際上是總指揮部廣播臺。但是，我說明的一點，就是在原則立場上，我是堅決站在絕食團指揮部，（張伯笠插：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臨時總指揮部，或者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這一邊。但是，為了給外界造成印象，我們在宣佈的宗旨裏邊，聲明是獨立的。

我辭職的事昨天柴玲說是因為我當時害怕，當然柴玲可以這麼認為。五月二十七日白天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已經比較少了，我認為當時北京的許多學生已經走散了，回校了，外地的學生當時也到北京的一些同學家裏到學校去了。我當時有兩天出去看了一下，有兩天的人數估計在兩千人左右，這個數字可能不準。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時候有好幾個人連續衝擊廣播臺，一會要包圍，一會要包圍。我就想，人都這麼少還要奪權這麼厲害。我當時就提出要撤離廣場。我當時怕的並不是軍隊進來，軍隊要進來的話你堵是堵不了的，我當時認為就是政府在拖，如果人在都走散的情況下，我們這場運動就是流產了。我認為這是最慘的。所以當時我跟柴玲談過要求撤，也談過人少的情況。當時柴玲說，“我不同意。”我說，你不同意我就辭職。後來她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在紀念碑二層又找到她，我又說了同樣的理由，寫了一個辭職書，拿著去了。柴玲說，“你個人可以辭職，但是我不能宣佈撤，我要對歷史負責。”這是柴玲的原話。柴玲看都沒看就在我的辭職書上簽了字，我當時非常痛心，因為我並不想辭職。後來我挨了好多罵，張伯笠、李錄都罵，這是後話。【以上第 285 頁】李錄：你講的時候提到當時很多人都對你有意見，這成為你辭職的一個原因，你也談到了我，我在什麼時候對你發表過意見？

我辭職的事昨天柴玲說是因為我當時害怕，當然柴玲可以這麼認為。五月二十七日白天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已經比較少了，我認為當時北京的許多學生已經走散了，回校了，外地的學生當時也到北京的一些同學家裏到學校去了。我當時有兩天出去看了一下，有兩天的人數估計在兩千人左右，這個數字可能不準。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時候有好幾個人連續衝擊廣播臺，一會要包圍，一會要包圍。我就想，人都這麼少還要奪權這麼厲害。我當時就提出要撤離廣場。我當時怕的

并不是軍隊進來，軍隊要進來的話你堵是堵不了的，我當時認為就是政府在拖，如果人在都走散的情況下，我們這場運動就是流產了。我認為這是最慘的。所以當時我跟柴玲談過要求撤，也談過人少的情況。當時柴玲說，“我不同意。”我說，你不同意我就辭職。後來她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在紀念碑二層又找到她，我又說了同樣的理由，寫了一個辭職書，拿著去了。柴玲說，“你個人可以辭職，但是我不能宣佈撤，我要對歷史負責。”這是柴玲的原話。柴玲看都沒看就在我的辭職書上簽了字，我當時非常痛心，因為我並不想辭職。後來我挨了好多罵，張伯笠、李錄都罵，這是後話。【以上第 285 頁】李錄：你講的時候提到當時很多人都對你有意見，這成為你辭職的一個原因，你也談到了我，我在什麼時候對你發表過意見？

白夢：我談的意見是就我辭職這件事你當時非常生氣，張伯笠還跟我發火，柴玲也對我非常生氣，柴玲說我是叛徒。

梁二：在你辭職之後你到了哪裏？六三晚上你在哪兒？

白夢：我辭職之後，我並沒有離開廣場。但是我當時的處境非常尷尬，我不能留在指揮部裏，所以我就在那裏走了走。後來跟柴玲的一個秘書要了五百塊錢，與我一起辭職的外地的同學，一人給他們發了一些路費，我把他們送走。然後五月二十九日，我回到北六。六月一日我又去了廣場。六月二日我跟一批作家和科技日報等北京一批知識分子，他們要我起草代表十個組織的致首都新聞界的公開信，他們想搞成新聞第二次開放。六月三日下午五點鐘我再一次到廣場，當時在西長安街木樨地已經打起來了。但是我沒到那裏去，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我離開了北京。

辛苦：你是那一天辭職離開學運之聲廣播站的？

白夢：我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跟柴玲談，談完之後，我就說我辭職了。但是鑒於其他同學集體辭職，所以我就沒有馬上辭，又留了一個晚上。那天晚上張伯笠來的時候和一個搞技術的同學發生了爭執，我也和張伯笠發生了爭執，正因為這個情況我又沒有走。到五月二十八日的早晨，我又一次找柴玲，那時我寫了辭職書。我希望柴玲能夠挽留我一下，但是柴玲就簽了字……

辛苦：我當時一直是在廣播站的。張伯笠負責廣播站我很清楚，我記得是下過一場雨之後，在廣播站就再也找不到白夢的位置了。而且實際情況是這樣，誰在那兒拿喇叭，誰就是廣播站長。

【封從德：你提到一個叫民主之聲廣播臺的，還發了聲明宣佈獨立。這是怎麼回事？

白夢：在我負責絕食團廣播站的時候，很顯然就叫絕食團廣播站，和絕食團指揮部是連為一體的，辦公地點都是一起的。後來搞了廣播車之後才分開。到了兩個廣播站合并成一個的時候，當時因為我在絕食團的時候有許多人有意見，

包括王超華提出的不給北高聯廣播，我個人當時認為廣播的原則是我們這個廣播站要控制廣場的情緒，在絕食同學非常激動的時候，我們不能再去播一些非常刺激他們的言論【以上第 286 頁】。對情緒的把握是我當時強調的幾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有好多人有意見，那麼當兩個廣播站合并成一個的時候，為了使輿論的這樣一種東西能盡可能對外作得客觀、公正，當時在我接管之後發表的一個聲明中說，我們是中立的，我們是獨立於指揮部之外的。但事實上還是指揮部的廣播站。為了和聲明相符，所以我當時就把名字改成民主之聲。

白夢：在我負責絕食團廣播站的時候，很顯然就叫絕食團廣播站，和絕食團指揮部是連為一體的，辦公地點都是一起的。後來搞了廣播車之後才分開。到了兩個廣播站合并成一個的時候，當時因為我在絕食團的時候有許多人有意見，包括王超華提出的不給北高聯廣播，我個人當時認為廣播的原則是我們這個廣播站要控制廣場的情緒，在絕食同學非常激動的時候，我們不能再去播一些非常刺激他們的言論【以上第 286 頁】。對情緒的把握是我當時強調的幾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有好多人有意見，那麼當兩個廣播站合并成一個的時候，為了使輿論的這樣一種東西能盡可能對外作得客觀、公正，當時在我接管之後發表的一個聲明中說，我們是中立的，我們是獨立於指揮部之外的。但事實上還是指揮部的廣播站。為了和聲明相符，所以我當時就把名字改成民主之聲。

封從德：你在職期間記不記得有很多錄音和保存了很多資料？你是不是記得這些資料保存起來了？保存到哪？是否收留起來了？

白夢：我在絕食團廣播站負責的時候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資料都在我個人的一個牛仔包裏，這些資料目前在國內。我在指揮部廣播臺期間，所有的資料、在我簽發的所有稿件和原始資料我個人劃了圈。我們有兩個專門的資料整理員，我劃了圈的資料都歸成檔案，完全整理出來了。

李錄：你當時主要是在絕食團那個地方是嗎？就是絕食團以前的那個帳棚那兒？當時轉移到指揮車上的時候你在哪兒？

白夢：轉移到指揮車那期間我還在那兒。

李錄：所以在那個時候轉移走的八十盤磁帶你是不知道的？

白夢：那八十盤磁帶我知道。我後來問一個女同學，她告訴我被轉移了，但是轉移到哪兒我不清楚。】

五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之後，連順德在五月二十六日對我有一次綁架。當時

他指責我跟柴玲預謀好在那次會議上提出讓絕食團指揮部作廣場臨時指揮部。這是一種預謀好的叛變行為。當時他帶了特糾隊員把整個廣播臺團團圍住，之後三個體院的把我反綁著。我非常憤怒，但是無能為力。我說：“你有什么事你就講。”連順德就說“我現在沒有別的，你就在廣播臺宣佈，解除柴玲、李錄、張伯笠的一切職務，重新在這裏宣佈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是連順德，副總指揮是你。”我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你真要綁我可以綁我，”我認為這樣一下就亂了，我希望他能顧全大局。後來他提出要和我談一個小時，當時談了半個小時，之後我又和連順德作過三次談話，他的確掌握著很多的材料。這點也是我後來提醒廣場總指揮部重視連勝德的一些意見的【以上第 287 頁】一個重要依據。

五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之後，連順德在五月二十六日對我有一次綁架。

當時他指責我跟柴玲預謀好在那次會議上提出讓絕食團指揮部作廣場臨時指揮部。這是一種預謀好的叛變行為。當時他帶了特糾隊員把整個廣播臺團團圍住，之後三個體院的把我反綁著。我非常憤怒，但是無能為力。我說：“你有什么事你就講。”連順德就說“我現在沒有別的，你就在廣播臺宣佈，解除柴玲、李錄、張伯笠的一切職務，重新在這裏宣佈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是連順德，副總指揮是你。”我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你真要綁我可以綁我，”我認為這樣一下就亂了，我希望他能顧全大局。後來他提出要和我談一個小時，當時談了半個小時，之後我又和連順德作過三次談話，他的確掌握著很多的材料。這點也是我後來提醒廣場總指揮部重視連勝德的一些意見的【以上第 287 頁】一個重要依據。

【老木：連勝德有一次把廣播站占領了，白夢在裏面被綁架了，我去了以後就把廣播站給清出來了，把連勝德他們給趕走了，然後布置了一個糾察線。白夢已經累得不行了，然後跟我申請辭職。我說你再頂兩天。】

楊濤*：我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後經歷的情況，第一個是和王童的矛盾。我在廣播站的所有經歷都是和王童作鬥爭的經歷。我是五月二十六日前在廣播站工作，我是五月十四到的北京，我在廣播站任編輯的時候，王童是編輯和播音員，後來我和張銳對他產生非常大的不信任，因為他把持著話筒，不向學生讓權，張銳決定撤免他，我們設計了一個方案，當時我們起草了一個廣播站的職位分配，把王童分為播音員，激怒了王童，王童離開了廣播站，到了絕食團廣播站。但是我們後來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王童被李錄認命為絕食團廣播臺臺長，這個矛盾就產生了，因為這種矛盾，絕食團廣播站和學運之聲廣播站展開了第二

次空中大戰，這是二十六日之後。

五月二十七日，有個安徽的大學的老師在威脅、勸服，想驅趕他們離開廣場回安徽，這個大學的帳篷有兩個女生到我們廣播站來，希望我們廣播站馬上播出這個消息，使其他同學來增援。當時我們決定播這個消息，但是我們的廣播設備壞了，我就到絕食團廣播站請求王童播出，但是王童認為這時不可靠的，結果使這個學校的整個帳篷裏的學生都被學校的幹部給驅趕了。這使我對王童主持的絕食團廣播站產生了對立的情緒。我們開始跟王童作對。王童經常播出一些他自己寫的稿子，而這些稿子跟學生毫無關係，所以當王童在播他自己寫的稿子的時候，我就讓廣播站的播音員播《國際歌》以對抗。這是不太理智。

五月二十九日，我對廣播站的工作已經比較了解，我寫了一份建議書，叫《指揮部對宣傳工作的重大失誤》，我當時交給了李錄，我想李錄大概對我有一定的印象，李錄交給了柴玲看，對這個建議表示同意，就讓我負責廣播站的工作。

後來我涉及到王文、陳來、陳偉的政變案，我對指揮部提出的證據有點疑問，張健被灌醉事件有疑問，因為那天晚上張健睡在我們廣【以上第 283 頁】播站，指揮部認定張健在那天晚上被灌醉，其實張健喝酒是六月一日前一天的中午，但是沒喝醉，即使中午喝醉了，他晚上也是清醒的，因為他在晚上和我們一起談話很久，然後他睡覺。這是張健自己跟我說的，指揮部關於他被灌醉的消息不對。指揮部認定陳來、陳偉是中共派來的人，說如果他們操縱了廣場會堅決要求學生撤離，這個我堅決置疑，因為這兩個人我很熟悉，他們都是絕食以來最堅定、激進的學生。

後來我涉及到王文、陳來、陳偉的政變案，我對指揮部提出的證據有點疑問，張健被灌醉事件有疑問，因為那天晚上張健睡在我們廣【以上第 288 頁】播站，指揮部認定張健在那天晚上被灌醉，其實張健喝酒是六月一日前一天的中午，但是沒喝醉，即使中午喝醉了，他晚上也是清醒的，因為他在晚上和我們一起談話很久，然後他睡覺。這是張健自己跟我說的，指揮部關於他被灌醉的消息不對。指揮部認定陳來、陳偉是中共派來的人，說如果他們操縱了廣場會堅決要求學生撤離，這個我堅決置疑，因為這兩個人我很熟悉，他們都是絕食以來最堅定、激進的學生。

在廣播站我碰到了各種政變事件，因為“學運之聲”廣播站被其他學生認定是不太受指揮部操縱，指揮部操縱的就是絕食團，所以很多政變者找到我們。我舉一個例子，涉及到柴玲。有一天陳偉找到我，對我說，現在你是主編，你應該明確學運的方向，現在柴玲是極少數，跟李鵬政府一樣，所以你應該看清方向，站在我們一邊。我說，如果你們選出來誰當總指揮，如果有民眾的基礎，我肯

定跟誰。這時候柴玲正好睡在我們廣播站內，我讓陳偉輕一點，陳偉馬上說，我親自跟柴玲說。他 就把柴玲吵醒，對柴玲說了同樣的話，“你現在已經站在少數的地位，你最明智的決定就是把權力交出來。”柴玲說，“我不想把持權力，如果你們有民主基礎的選 舉我下臺，我肯定交權。”柴玲就往外走。這時陳偉再次想拉住柴玲，我就上去跟柴玲說，“我不知道現在廣播站怎麼辦，因為陳偉說大部分學生聯名支持他們的行 動。”柴玲跟我說得比較幹脆，她說“這是放屁。”後來恐怕是柴玲被第二次綁架。兩小時之後，指揮部的人都來到我們廣播站處理政變案件。後來陳偉也來，我問 他，他說沒辦成。我明確了一條原則，就是有很多政變在廣播站，如果說柴玲的指揮部沒有根本的民眾基礎，那麼這些政變者就更沒有民眾基礎。所以他們代替不了 指揮部，我從此就是跟著指揮部。

我講一下張銳的罷免案。張銳從二十六日之後一直任站長，他說是柴玲任命的。後來有一天柴玲到我們帳篷，我就一個人在，柴玲問我，“你要說真話，我問你一 件事。”我說，“我肯定說真話。”她說，“張銳昨晚是不是跟一個女播音員睡在這個廣播站裏？”我是看到了，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說這個話，我就說“不知道”。柴玲說“你一定要說真話。”我說“我看到了。”柴玲說，“張銳這個人有財務問題，又有不負責問題，現在又有桃色問題，所以他不適合當站長，把他撤了。那你 試著負責吧。”這時候我覺得我很內疚，因為當天晚【以上第 289 頁】上我幹了同樣的事情，在那個角落裏。但是柴玲不知道，而且因為這個事件任命我負責廣播站，我覺得有一種竊喜，但又很內疚。最後一天張銳就沒來負責廣播站。】

我講一下張銳的罷免案。張銳從二十六日之後一直任站長，他說是柴玲任命的。後來有一天柴玲到我們帳篷，我就一個人在，柴玲問我，“你要說真話，我問你一 件事。”我說，“我肯定說 真話。”她說，“張銳昨晚是不是跟一個女播音員睡在這個廣播站裏？”我是看到了，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說這個話，我就說“不知道”。柴玲說“你一定要說真 話。”我說“我看到了。”柴玲說，“張銳這個人有財務問題，又有不負責問題，現在又有桃色問題，所以他不適合當站長，把他撤了。那你試著負責吧。”這時候 我覺得我很內疚，因為當天晚【以上第 289 頁】上我幹了同樣的事情，在那個角落裏。但是柴玲不知道，而且因為這個事件任命我負責廣播站，我覺得有一種竊喜，但又很內疚。最後一天張銳就沒來負責廣播站。】

【柴玲：當時廣場指揮部已經決定放棄這個廣播站，楊濤*上任的二十四小時是關機的。】

【楊濤*：有全國人大代表在六月二日曾經聯系過我們學運之聲廣播臺，有兩個代表進我們的廣播臺問，“誰是審稿的編輯？”我說，“我是審稿的編輯。”然後他讓我跟他們走，到長安街附近的一個飯店，請我一頓，說，“能不能在你們的稿子中加上我們的一個建議？”我說，“第一，如果你們有建議可以寫出東西，第二點你們可以直接和指揮部的領袖談判。”他們不同意。他的意見是“學生在六月二十六日結束靜坐這個決定是非常荒唐的，實際上不可行的，這之前政府會完全解決廣場的問題。建議學生宣佈馬上撤離廣場，人大開會的問題我們已經聯系好，很多人大代表能夠在學生撤離之後開緊急大會處理這個問題。”我把這個稿子交給柴玲了。我不知道稿子的下落。】

4.8.5 非廣場活動

(1) 北大後期工作（常勁）

非廣場活動主要指的是廣場外的各個學校的活動，我當然主要談北大的活動。工作重心的轉移是從絕食開始。因為北大全力支持絕食，北大籌委會就不做其它工作了。到十八日左右，我們發現北大籌委會完全成了聲援機構。我們就把王有才、蔡劍等一些北大籌委會絕食骨幹分子都召回學校開始討論長遠計劃。我們對廣場的形勢達成了基本的共識，第一是廣場上權力的爭鬥，第二是管理的混亂。我們作過努力去維持廣場秩序，但不能成功，所以就不介入、不參與。長遠的計劃我們考慮到戒嚴的問題，所以就開始搞了一些組織的策劃，就是各個梯隊的建立和秘密活動的設計，還有就是加強對全國的宣傳。

二十日戒嚴以後接到各個地方來的電話，各處的群眾已經開始堵軍車，而且要求北大增援。北大就由糾察部組織堵軍車。在二十一日【以上第 290 頁】就開始確定各個軍隊的位置，我們得到了一張圖，知道了軍隊的確切位置就安排堵截軍車。北大還重新整理組織，把宣傳部、秘書處、聯絡部、糾察部、財務後勤都重新整理了一遍。當時為了加強宣傳，專門成立了宣傳班子，有專門的一套人馬每天寫傳單，同時派出宣傳部在北京市的各個角落進行堵截軍車、反對戒嚴的宣傳。

二十日戒嚴以後接到各個地方來的電話，各處的群眾已經開始堵軍車，而且要求北大增援。北大就由糾察部組織堵軍車。在二十一日【以上第 290 頁】就開始確定各個軍隊的位置，我們得到了一張圖，知道了軍隊的確切位置就安

排堵截軍車。北大還重新整理組織，把宣傳部、秘書處、聯絡部、糾察部、財物後勤都重新整理了一遍。當時為了加強宣傳，專門成立了宣傳班子，有專門的一套人馬每天寫傳單，同時派出宣傳部在北京市的各個角落進行堵截軍車、反對戒嚴的宣傳。

北大在工作重心轉移的同時還在考慮一件事，就是完成北大的一個心願，幫助高聯重整旗鼓。吸取以前的教訓，楊濤、王有才進入高聯，幫助高聯整頓秩序，而且強烈要求把高聯搬回北大。北大對形勢分析之後有一個強烈的要求，一直貫穿北大的後來的策略之中，就是要求全體同學撤離廣場。對此組織了當時絕食同學全部撤回北大，據匯報當時是全部撤回北大了，我們還組織了盛大的歡迎儀式。我們希望其它學校都能象北大一樣撤回本校，但是努力不成功。二十三日北大又提了另一個議案，針對外地高校不能撤回的情況，北大騰出一半的學生宿舍給外地高校，然後發給他們資金回各校。這個意見當時也沒有得到實行。但是北大一直都是堅持撤離，而且提出了很多的具體方案。

二十一日開始，因為戒嚴，絕食同學撤回以後，北大提出一個空校運動，希望絕食同學回各地去休養，另外加強各地的宣傳。但是這個空校運動考慮得不够成熟，所以造成了北京市一半的學生開始返回家鄉，可我們沒有很好地組織他們到底回去幹些什麼，造成這個計劃把自己的力量削弱了。從此以後北大能夠指揮動的校園裏的力量就比較有限了，每天頂多能派出的糾察也就是一兩千人而已。

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我因為出去修整就沒有在京。這段北大及高聯的活動情況我就不大清楚了。五月中旬以後，大量的外地學生進京沒有住的，吃的地方，所以北大騰出很多宿舍來接待他們。我們還勸這些同學回外地去，讓他們能回去的盡量回去，當時我們還是勸回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當時北大的宣傳、聯絡、糾察我認為是比較健全了，聯絡部不僅和各校取得了聯繫，而且已經打入了我們一直沒能打入的保衛廣場指揮部，跟李錄他們取得聯繫。還有楊濤從北大召集了糾察隊參加整頓廣場。在空校運動期間，因為有一部分學生還在學校，而且堵軍車也比較勞累，我們也搞了一些校園的娛樂活動。

【封從德：五月二十六日晚，楊濤到廣場提出“空校運動”計劃，想以“情緒化”的方式帶領“情緒化”的同學們離開廣場，回到各【以上第 291 頁】地發動全國總罷課。當時廣場指揮部差一點通過。】

【封從德：五月二十六日晚，楊濤到廣場提出“空校運動”計劃，想以“情緒化”的方式帶領“情緒化”的同學們離開廣場，回到各【以上第 291 頁】地發動全國總罷課。當時廣場指揮部差一點通過。】

我到了外地，發現外地的氣溫和北京的氣溫相差很大，而且人們的訴求跟北京的差得也非常大。五月二十九日我回京以後，當時在我分析來看，失敗的結局已經是定了，所以我們就決定拚死一搏，設置了組織部，組織宣傳隊，加強宣傳工作。首先是在北京市內進行進一步廣泛的宣傳，然後企圖在各個工廠裏造成罷工的趨勢。另外我們也在考慮組織北京各高校的宣傳軍。當時北農大也提

出這個建議，給他們一個統一的稱號，進行培訓，然後把他們送到外地。這樣一方面減少在北京的學生人數，減少將來可能的損失，另一方面希望通過這種辦法在外地煽動起來其它的學運中心，減少對北京的壓力。但是當時時間非常緊，祇是持續到六月三日就停止了。

五月戒嚴以後，我們還跟鄧樸方的人接觸了一次。他們跟我們提出，現在人們反對戒嚴的呼聲很大。鄧樸方有一個主意說，他能夠勸鄧小平退下來，我們不再提戒嚴和給學運平反。但是，因為北大籌委會對他們不信任，就沒有跟他們進行進一步的聯絡。當時，企業界，象四通、企業界聯盟的各種活動當然也邀請了北大籌委會加入，但是因為我們考慮到更長遠的問題，也沒有盡心地做什麼工作。在六四之前，因為很多學生出去阻擋軍車，又有很多的學生回到各地，北大籌委會也出現了人才短缺的問題。所以我們在中旬組織的第二梯隊、第三梯隊也祇好出場幫助北大做工作，同時也幫助高聯。所以高聯當時的很多骨幹分子，都是北大所謂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的成員拉出來的。

【常勁：五月二十一日王丹帶著北大絕食同學回學校，誰能補充一下這個情況？

王超華：我知道一點，但不確實。這個和二十日、二十一日的各校代表會是相關的。我們提出了各校自治會要消化吸收本校的絕食團同學，王丹提過他帶北大的絕食同學回校。之後發現人大是最成功的，其它學校象經濟學院這些常委院校，還有一些小學校也有成功的。但王丹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帶不動他們呀！”

常勁：當時北大確實是帶了幾百個人回去，大部分絕食同學都回校了。

梁二：當時師大也有這麼一個計劃，張軍和趙鋼都撤回去了。

老木：我記得，北大組織了歡迎絕食同學回校。【以上第 292 頁】

常勁：我要說明這點，當時留在廣場的北大同學除了糾察隊已經是非常有限了，祇有二三十個絕食的同學留在那裏。】

(2) 師大、開希、劉曉波（梁二）

師大內部產生過好幾種意見分歧。首先是對整個學運態度的分歧，包括絕食的態度。其中一部分同學認為在絕食過程當中一定要保持絕食的原則問題，就是堅持絕食發起最初的那兩條原則，這是師大中文系的一部分同學；另外一部分同學說，可以折中並且服從理智、理性的指導原則，這在教育系同學當中成為師大後期宣傳中的主要力量。還有一部分同學從開始就反對絕食，象地理系的一個姓趙的同學就強烈地反對絕食和復食以後繼續留在廣場。第二是人事上的分歧；一是否認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威性，二是否認高聯指揮部的權威性，三是否認開希和我們在師大自治會的領導作用的權威性，總而言之他們都否認，覺得有必要重新改選。後來師大在廣場上有一個獨立的絕食通訊宣傳部，那種很強烈的獨立性和排斥性，除了要錢以外，就明顯地表現出來這種特征。

而且在師大內部也出現第一次篡黨奪權的鬥爭，這是由陳長實發起，實際上我聽張軍跟我說，陳長實早有此心，一直因為開希和我、張軍三人一直在師大沒給他機會。所以他利用我們去廣場絕食或表示聲援的機會他就發起了一次重新改選的運動，五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左右就明顯地成功了，當時就有改選結果。

實際上我記得第一次回高聯的整頓會議我沒有參加，高聯常委不是我，是師大中文系一個姓李的帶著陳長寶和另一個同學參加的，這就明顯地表現出來對我們這些歷史性人物的否定。剛好我就趕上改選師大自治會的時機。我當時就進去了，發表了一大通的演說，為我在廣場上起的作用和在整個學運中起的作用、為什麼還有堅持到底這點作了一種動機上的說明和施政方針的闡述。總而言之他們最後還是信服我，就推選我作副主席，而且是執行副主席。主席是師大中文系的起草五四宣言的姓張的研究生，他祇是名譽上的職務。我這個副主席是副的，但是抓有實權的。他們依然推舉我代表其他同學繼續回到高聯任常委，這個決議曾經發到高聯去了。開希在會議快結束，決議已經印刷出來的時候，又重新回

【以上第 293 頁】到了師大。我們就考慮開希這個問題怎麼處理。開希說，“這樣好不好，是不是能再加一個名譽主席？”我當時就反對，名譽主席祇能有一個。然後開希就說，“那麼，這樣好了，我希望我當名譽主席，希望那個姓張的當第一副主席，梁二當執行第二副主席。”所以我又被排擠到第三位去了。這個後來通過了，我就是執行副主席。開希在後期在這點上他的權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傷，特別是在廣場上的影響，由於不斷地喊激退的勢力得到削弱之後。而且新聞輿論掀起的罷免吾爾開希高潮出現之後，師大的人就漸漸地不喜歡他了，或者說對他產生了不太強烈的信任感。在這個時候開希回到師大以後就完全是一種傷感的情緒。但是我們覺得無論是好名還是臭名，都是與開希無法匹敵。所以就接受了這個意見。

而且在師大內部也出現第一次篡黨奪權的鬥爭，這是由陳長寶發起，實際上我聽張軍跟我說，陳長寶早有此心，一直因為開希和我、張軍三人一直在師大沒給他機會。所以他利用我們去廣場絕食或表示聲援的機會他就發起了一次重新改選的運動，五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左右就明顯地成功了，當時就有改選結果。實際上我記得第一次回高聯的整頓會議我沒有參加，高聯常委不是我，是師大中文系一個姓李的帶著陳長寶和另一個同學參加的，這就明顯地表現出來對我們這些歷史性人物的否定。剛好我就趕上改選師大自治會的時機。我當時就進去了，發表了一大通的演說，為我在廣場上起的作用和在整個學運中起的作

用、為什麼還有堅持到底這點作了一種動機上的說明和施政方針的闡述。總而言之他們最後還是信服我，就推選我作副主席，而且是執行副主席。主席是師大中文系的起草五四宣言的姓張的研究生，他只是名譽上的職務。我這個副主席是副的，但是抓有實權的。他們依然推舉我代表其他同學繼續回到高聯任常委，這個決議曾經發到高聯去了。開希在會議快結束，決議已經印刷出來的時候，

又重新回【以上第 293 頁】到了師大。我們就考慮開希這個問題怎麼處理。開希說，“這樣好不好，是不是能再加一個民譽主席？”我當時就反對，民譽主席祇能有一個。然後開希就說，“那麼，這樣好了，我希望我當名譽主席，希望那個姓張的當第一副主席，梁二當執行第二副主席。”所以我又被排擠到第三位去了。這個後來通過了，我就是執行副主席。開希在後期在這點上他的權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傷，特別是他在廣場上的影響，由於不斷地喊撤退的勢力得到削弱之後。而且新聞輿論掀起的罷免吾爾開希高潮出現之後，師大的人就漸漸地不喜歡他了，或者說對他產生了不太強烈的信任感。在這個時候開希回到師大以後就完全是一種傷感的情緒。但是我們覺得無論是好名還是臭名，都是與開希無法匹敵。所以就接受了這個意見。

開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高來高去、脫離群眾基礎的現象呢？這實際是曉波給他造成的虛假現象。曉波一直提倡所謂民間制衡力量的英雄，英雄凝聚力的作用。曉波當時對開希講，“開希，你現在應該樹立你自己的形象。”所以開希就一直到處找名聲，到廣場是要總指揮，到師大要主席，到高聯自己充當主席，總而言之我想是他受到曉波的勸說。開希第一信奉精英主義，第二希望自己成為瓦文薩。我覺得曉波這一點對他產生了很強的誤導，以至於開希對師大失去控制，在廣場上失去同學的信任，這都是有大的影響的。在這裏對曉波提出一些批評。開希一直也比較信奉這個，實際上在當了民譽主席之後，他也就完全“民譽化”了，一直跑聯席會議，一直再沒有回到師大處理實際事務。我記得唯一一次是六月三日我們從北大回來，封從德看到我之後，開希回到師大，與我一塊號召全師大的同學到廣場聲援。

封從德曾經看到我跟林耀強騎車玩，看到開希當場撤銷我高聯常委的情況。實際上是我當時和開希有一個協議，就是開希已經是名譽主席了，實際上曉波對我也有同樣的影響，就是那種瓦文薩形象的樹立。我為什麼會產生同樣的意見呢？主要是來源於我當時對整個權力鬥爭的厭惡，交替來交替去的廣場上的權力鬥爭的厭惡，第二我覺得祇有權威性在這個時候才能起到作用，而且這個權威性來自於新聞輿論界的支持，我當時就比較同意這點。我和開希一直、實際上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協議，最初當然來源於師大內部的組織分工原則，後來就完全是個人的感情，超華對我這點進行了批評，最後又回到這種個【以上第 294 頁】人感情上來了，從自己當時的知識和理解程度而言，我認為開希還是有必

要在他想回到高聯的時候跟我說一下，然後我馬上同意自動放棄我高聯常委的職

務。我不知道 封從德還記不記得我當時并沒表示出任何異議，我不僅是沉默，而且表示贊同。開希當時為了顯示他的權威性，我也盡量隱瞞他在師大內部權力失勢這樣一個事實。我一直希望那樣做，當然開希是這樣做了。

封從德曾經看到我跟林 耀強騎車玩，看到開希當場撤銷我高聯常委的情況。實際上是我當時和開希有一個協議，就是開希已經是名譽主席了，實際上曉波對我也有同樣的影響，就是那種瓦 文薩形象的樹立。我為什麼會產生同樣的意見呢？主要是來源於我當時對整個權力鬥爭的厭惡，交替來交替去的廣場上的權力鬥爭的厭惡，第二我覺得祇有權威性在這個時候才能起到作用，而且這個權威性來自於新聞輿論界的支持，我當時就比較同意這點。我和開希一直、實際上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協議，最初當然來源於師大內部的組織分工原則，後來就完全是個人的感情，超華對我這點進行了批評，最後又回到這種個【以上第 294 頁】人感情上來了，從自己當時的知識和理解程度而言，我認為開希還是有必要在他想回到高聯的時候跟我說一下，然後我馬上同意自動放棄我高聯常委的職務。我不知道封從德還記不記得我當時并沒表示出任何異議，我不僅是沉默，而且表示贊同。開希當時為了顯示他的權威性，我也盡量隱瞞他在師大內部權力失勢這樣一個事實。我一直希望那樣做，當然開希是這樣做了。

【封從德：那你認為他當時有沒有權力撤換你？

梁二：我認為他沒有權力撤換，但是我不認為他這是在撤換，祇是我們兩人的協議，在他自己的行動裏的策略而已，祇是表現出來給你看的。

王超華：我補充一點，在整頓的第二天，梁二自己來了，說師大代表仍然是開希。我們說，我們沒法和他合作，要求換。他說，我們師大就認定開希。這是二十四或二十五日晚上。這個之後開希仍然不到高聯來開會。

封從德：這是兩個問題，兩回事。因為開希跟我講，雖然現在梁二是高聯的常委，但是師大的規矩是主席負責，我現在是主席，所以我就把梁二給撤換了，我來作這個代表。這是六月三號，我代表廣場指揮部去北大，請北高聯派兩名常委去廣場作副總指揮。】

師大的青年老師。我記得在我剛參加學運時，到師大自治會就職這種過程是受到師大的青年老師非常大的影響。我記得當時一個師大哲學系的年輕教師，一個師大心理系的年輕教師，還有其它系的，比如經濟系的老師，他們都跟我們有相當廣泛的接觸。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與高新對話，曉波也有第一次的對話。

許多年輕老師 和知識分子，他們給我的印象祇有兩個選擇，第一種選擇是走向完全的民主化進程這樣一種運動方式；另外一種是完全撤回來，在校內復課靜待時機，靜待中央內部 權力鬥爭的結局。當然，在聯席會議之前我一直希望盡量不要過多和這些人接觸，並且產生合作的關係。曉波的絕食在早期就提出了，就是學生絕食那天他就提出，所有的知識分子祇有參與到學生中去才能起到真正影響和領導的作用。曉波在這時就有一個知識分子絕食的提議，但是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這是五月十三日下午。【以上第 295 頁】

(3) 吾爾開希的職務

李錄：當時我聽到關於開希的職務各種傳說很多。你能不能大概地總結一個線兒？

梁二：四月二十日回來，我們三個人都各自在師大的各個部分進行活動。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一個臨時辦公室，開始三個人的同時辦公，都是一致對外。二十一日 晚上他由於聲音洪亮拿了一個喇叭，成為那次師大的游行隊伍中的總指揮，而且成為所有游行隊伍的總指揮之一。在二十三日正式成立組織的時候，開希當選為主席，後來全校性的投票選舉，祇對主席投票表決，承不承認以開希為主席領導下的自治會。這是他自己認為他是師大主席負責制當中的最高頭目的來源之一。他認為 這時祇有他這個主席的職務得到承認。在這之後開希進入高聯，在二十八日周勇軍辭職之後他擔任主席。二十九日晚上他告訴我，他受到了監視，自從他一受到監視，我就開始從師大副秘書長直接越過張軍這個秘書長，代替開希出席高聯會議。隔了兩天才開始改選，當時開希還跟我提到在改選的時候千萬不要把他的主席職務 弄掉。我說你都不在那兒，怎么可能呢？而且其中有一次違反規矩的是我和開希同時參加常委會。其後五月十三日前夕，我們有個私下協議，就是開希退出高聯，我 加入高聯。開希加入絕食團，對絕食團同學起控制作用，希望他成為絕食團的組織者之一。

李錄：那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三日之間誰是高聯主席？

梁二：那個時候高聯主席剛辭職，副主席也不管事了，常委負責制。

王超華：五月六日，在師大物理樓北面的草地上有一次會，當時，因為封從德辭職，重新確認開希是主席。這時對我副主席的能力也表示置疑，可能是鄭旭光當了副主席。所以這階段實際上開希是主席。

梁二：五月十三日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決議，就是開希作為絕食團的主持者，而且是學生代表，特別是以發起人的身份對絕食團進行控制，我作為高聯常委。五月 十四日有一個臨時性的高聯常委的碰頭會，要求我不要再跟開希這樣反復來反復去，希望我自己拋棄自己的【以上第 296 頁】懦弱性，直接取代開希

成為永久常委。這是第一次提議罷免開希。五月十七日那天就正式罷免開希，所

有常委拒絕與開希合作。這主要是由於開希當晚撤退的那種決定。在五月二十四

日整個師大的改選和篡黨奪權得到了控制。

梁二：五月十三日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決議，就是開希作為絕食團的主持者，而且是學生代表，特別是以發起人的身份對絕食團進行控制，我作為高聯常委。五月十四日有一個臨時性的高聯常委的碰頭會，要求我不要跟開希這樣反復來反復去，希望我自己拋棄自己的【以上第 296 頁】懦弱性，直接取代開希成為永久常委。這是第一次提議罷免開希。五月十七日那天就正式罷免開希，所有常委拒絕與開希合作。這主要是由於開希當晚撤退的那種決定。在五月二十四日整個師大的改選和篡黨奪權得到了控制。

李錄：那么，五月二十二日對開希罷免都罷免了他什么？

梁二：實際上他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他在師大的權鄭旭光沒有權力罷免，當時開希還不是高聯常委，我還沒提出讓開希回到高聯在這中間呢。有一段時間開希什麼職務都不是，既不是高聯常委，也不是主席，大概有一天時間。第二天就是開希作為民運主席這個事出現了。同一天我給高聯提了一個建議，開希到場我就退，我還是恢復以前的那種關係。我不願意跟開希爭鬥或者是權力交易，給人家造成誤會。所以我當時為了維持這種局面就說，祇要開希到場，我作為高聯常委的那種職務自動取消，我祇是作為一個學生秘書。我當時是這樣跟超華提議的。超華剛才有個誤解是，我正式提出開希是高聯常委。實際上不是這樣。而其後我一直擔任高聯常委，因為開希缺席不到會，所以我一直擔任高聯常委，擔任到六月三日為止。這個時候開希已經脫離高聯，脫離師大整個運作的組織結構。在這個時候他與曉波在一塊，希望自己成為瓦文薩。

王超華：五月六日我是高聯的副主席，因為晚上記者招待會我參加了。

梁二：還有最後一段時間在六月三日晚上，開希幾個小時之內又恢復高聯常委職務。高聯曾經派開希為代表與王丹一塊到廣場接管與柴玲合作。這個事開希不是以常委的名義進行的，是以所謂的瓦文薩的形象出現的。

4.8.6 北京工自聯

張倫：和市民的關係。工人自治會改選的時候，韓東方派人來跟我講，劉煥文已經不是常委，他們派了劉強跟著我，說是協助工作。

北京工自聯最早成立的日期，我的印象根本不是五月二十二日，是在戒嚴之前的五月十八日。我當時親自讓人用長布給他們寫的“北【以上第 297 頁】京工自聯”。

北京工自聯最早成立的日期，我的印象根本不是五月二十二日，是在戒嚴之前的五月十八日。我當時親自讓人用長布給他們寫的“北【以上第 297 頁】

京工自聯”。

封從德：五月十九日早晨九點半，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署名“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的“首都工人宣言”。

張伯笠：我說過，除了廣場上的會任何其它會議我從來沒參加過，但是那次我去了。

梁二：五月十四日早晨有人找到我們說想成立工自聯，要求我們學生幫助。我想知道五月十八日是否有人找到你，要求你批錢，是否在我這兒拿的錢？

張倫：從你那拿的錢不是為工自聯拿的，是為了宣傳隊買話筒。我自己最起碼就訓練了十個宣傳隊。五月十九日上午工自聯他們來了之後，他們祇要求一件事，就是要宣傳打牌子的東西沒有要求批錢。我就給了一大塊布，後來拿到觀禮臺的西北角打出來了。

【梁二：第二次聯席會上有一個香港的人提到，我們一定要和工自聯保持聯系，一定要給他們一些捐助。當時我請師大的同學跟他們聯系。但是批錢的時候，我沒找到對象批給誰。這件事到底是怎么作出決定的？

張倫：所有當時在廣場露頭的組織，秘密的不管，具體聯系是劉剛進行的，他們全部在場。劉煥文肯定在場。你說的那個香港人是邱延亮。】【以上第 298 頁】

五。六四前夕

5 . 1 民主大學（張伯笠）

5.1.1 籌辦〈參：李錄 4.3.3 廣場後期工作〉

成立民主大學的背景是這樣，因為外地高校的不斷涌入，我曾經跟外高聯談過多少次，而且我在會上曾經講，外地的學生應該回到本地區去。我的意思就是，你外地的高校學生應該回到本地去搞一個天安門廣場，比在這兒好。現在這樣就造成有點文化大革命的那個樣子。有很多人不懂民主。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個運動向更理性發展，因為當時已經決定是不撤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已經成立。指揮部成立那天，我在聯席會議的時候，跟鄭義簡單商量了一下，能不能把它搞的高一點，搞什麼形式。我當時提出一個比民主沙龍要大，那麼就是要辦一個天安門大學。鄭義表示支持，他說，“這個想法非常好，但要具體設想怎麼幹？”這個框架就當時產生了，兩天以後我見到了潘義，李錄就跟我說，“潘義，這是張伯笠。張伯笠有一個設想，要辦一個大學。他們也有這個想法，你們能不能合著辦？”當時我想從資金方面，包括從教員方面香港會提供很大的幫助，於是我就非常贊成和他們合辦。後來就是什麼“北京的學生和香港的某大學”，中央威脅就是這樣威脅的。但是後來因為香港這個大學不同意加入人員，

說可以提供資金，但是不加入人員，可以幫助你們。

當時設計有一個聯絡圖，把這個民主大學放在民主女神下面，就是中心。李錄也講了，如果民主大學辦成以後，整個的組織，包括指揮部就都設在民主大學那裏，把運動往一個理性的方面發展，本身是個象征嘛。初期準備工作我就招收人員，廣播裏喊了多少次，大概有六十多人報名，經過嚴格審查收了四十名，因為有的沒學生證。要求必須是學生和知識分子才能作工作人員，而且固定，你不能再走，不能象廣場指揮部那樣，今天來了，明天就走了，這個不行，要作長期打算。在二十六日中共的電臺就警告了，“現在廣場有一些人和香港某大學在搞一個什麼民主大學。這個大學沒有經過國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組織者要完全承擔法律責任。”對這個警告我們同學有的【以上第 299 頁】就害怕了，

四十個人就退出了八個。我就開會跟他們講，責任由我負，他警告的是組織者，而你們是工作人員，不是組織者，大家不要害怕，我就跟他們說，毛主席說了，解放軍是一所大學，他經過那個教委批准了？他們是培養軍事人才，我們是培養民主人才。我們既不發畢業證，又不收學費，祇要來天安門廣場的就是學生，天安門廣場就是我們的課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就是我們的校園，要你什麼批准？我這樣一講，大家的精神就又振奮了，振奮以後就辦。基本什麼都辦成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聯系教授，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當時設計有一個聯絡圖，把這個民主大學放在民主女神下面，就是中心。李錄也講了，如果民主大學辦成以後，整個的組織，包括指揮部就都設在民主大學那裏，把運動往一個理性的方面發展，本身是個象征嘛。初期準備工作我就招收人員，廣播裏喊了多少次，大概有六十多人報名，經過嚴格審查收了四十名，因為有的沒學生證。要求必須是學生和知識分子才能作工作人員，而且固定，你不能再走，不能象廣場指揮部那樣，今天來了，明天就走了，這個不行，要作長期打算。在二十六日中共的電臺就警告了，“現在廣場有一些人和香港某大學在搞一個什麼民主大學。這個大學沒有經過國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組織者要完全承擔法律責任。”對這個警告我們同學有的【以上第 299 頁】就害怕了，四十個人就退出了八個。我就開會跟他們講，責任由我負，他警告的是組織

者，而你們是工作人員，不是組織者，大家不要害怕，我就跟他們說，毛主席說了，解放軍是一所大學校，他經過那個教委批准了？他們是培養軍事人才，我們是培養民主人才。我們既不發畢業證，又不收學費，祇要來天安門廣場的就是學生，天安門廣場就是我們的課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就是我們的校園，要你什麼批准？我這樣一講，大家的精神就又振奮了，振奮以後就辦。基本什麼都辦成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聯系教授，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這個時候是五月二十八日了，我就向柴玲提出辭職，一個是我要提很多資料，要保護一個作家去寫書，同時也跟封從德要一筆經費。我回到北大見到了三個教授，其中有一個是嚴家其，有一個是陳鼓應。當時定的是陳鼓應講第一課，嚴家其呢，我跟他說，你能不能當我們的名譽校長，因為當時方勵之是“懷抱琵琶半掩面，千喚萬喚不出來”，劉賓雁在美國愛莫能助，遠水解不了近渴，我覺得知識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嚴家其。我跟嚴家其第一次談的時候是在他的家，第二次談是在廣場，就是劉曉波絕食的時候，當時嚴家其問我，“你這個民主大學宗旨是什麼？”其實我們當時還沒討論這個問題，但突然就冒出了八個字，可以用這八個字作辦學方針和宗旨，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權”。嚴家其說，“這八個字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改一個字，法制的制要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區別很大。”我說，“這很好，我可能想的時候是那個制。”所以把宗旨也就定了。定了以後他說，“我接受你的聘請，我作名譽校長。”我說“好，我們現在就籌備開幕式。”我們定的是五月三十日開幕式，就是開學典禮。

當時撤和不撤的問題爭論非常大。後來我聽到一個消息，柴玲、封從德、李錄跟我講，說三十日要撤退。我一想三十日要撤退，那三十日成立民主大學就不可能了。我就想把它拿到北京大學去成立，我跟我們班的同學商量，我說大家都要當工作人員，我們就把它辦在北大。祇要我們這樣辦民主大學，北大學生就起來了，我們又掀起一個大高潮。就在這個時候，潘義說不行，這是六月一日，潘義說，“我們現在不能撤了，因為現在已經作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要堅持到二十日人大常委會的召開。要是在二十日之前你辦起來，你起碼可以講半個月的課。這半個月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然後撤退以後回到學校再辦。

“我接受他的這個建議，這個建議非常好。當時就想【以上第 300 頁】要辦，繼

續籌備就讓人去做舞臺。可這個舞臺讓我等了兩天，我已經失去希望了。第一天他說給我辦了，第二天又說人家很為難，第三天說聯系不到汽車，因為舞臺相當大。當時我想沒問題，因為民主女神都能拉來，大舞臺當然能拉來。這時候因為這個就沒有辦成。

當時撤和不撤的問題爭論非常大。後來我聽到一個消息，柴玲、封從德、李錄跟我講，說三十日要撤退。我一想三十日要撤退，那三十日成立民主大學就不可能了。我就想把它拿到北京大學去成立，我跟我們班的同學商量，我說大

家都要當工作人員，我們就把它辦在北大。祇要我們這樣辦民主大學，北大學生就起來了，我們又掀起一個大高潮。就在這個時候，潘義說不行，這是六月一日，潘義說，“我們現在不能撤了，因為現在已經作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要堅持到二十日人大常委會的召開。要是在二十日之前你辦起來，你起碼可以講半個月的課。這半個月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然後撤退以後回到學校再辦。

“我接受他的這個建議，這個建議非常好。當時就想【以上第300頁】要辦，繼續籌備就讓人去做舞臺。可這個舞臺讓我等了兩天，我已經失去希望了。第一天他說給我辦了，第二天又說人家很為難，第三天說聯不到汽車，因為舞臺相當大。當時我想沒問題，因為民主女神都能拉來，大舞臺當然能拉來。這時候因為這個就沒有辦成。

【封從德：在設計民主大學的時候是否受到邱延亮的影響？

張伯笠：不是邱延亮，是潘義。我跟邱延亮沒談過民主大學，但是潘義跟我說，這是邱延亮的想法。

封從德：在成立民主大學的時候，請教授為什麼沒有包遵信？

張伯笠：有包遵信。還有柴玲、王丹、吾爾開希、超華、李錄等等……

王超華：我在六月一日的時候就看到過一個圖，是關於民主大學布置的圖。

張伯笠：我們五月二十八日就把這個圖畫好了。我解釋一下，其中有一些國內的教授不是我親自同他談的，比如劉再復說，“誰誰誰，這個著名教授我可以替他擔保。”他實際上沒有接到我的聘請。

李錄：邱延亮在香港請了十幾位教授。】

5.1.2 開學典禮

到了六月三日的時候，當時我不知道鎮壓，我說，今天一定要辦起來了，不要他那個舞臺了。拿著聯絡圖按照位置是在這個民主女神像前面，因為那都是外地的學生，外地學生就很憤怒，“我們的帳棚你們給我們挪了是不行的。”那時候是無政府主義，誰說也不行，管你是張伯笠，是副總指揮。那怎麼辦呢，就挪到了民主女神像的東側。我當時首先告訴他們搭帳篷，我們搭了八、九個紅色的帳棚，整個形式都非常好，還搭了個大帳篷放廣播臺。那麼這個舞臺怎麼解決呢？因為要講臺呀。於是我就找法大的同學聯系，他們有一些桌子。我說，“你們能不能把桌子借給我。”他說，“借桌子可以，可是你們廣場上這些人不給我飯吃，不給我面包，我還能給你桌子？”我說，“這個不是我負責，你可以找後勤部，找王鋼。我搞宣傳，我祇能給你傳單，不能給你面包。”後來他說，“你把學生證押我這兒，我就給你。”我說，“我這個學生證不能給你。”但是我這兒有個牌兒，上面寫著副總指揮，他說，“那你得把這個給我。你必須把桌子還

給【以上第 301 頁】我，才能取這個。”我想，這也行，這東西不是很重要，就給了他。要不然這個桌子還是借不來。大概是弄了七個桌子，就搭上了一個簡單的講臺。

到了六月三日的時候，當時我不知道鎮壓，我說，今天一定要辦起來了，不要他那個舞臺了。拿著聯絡圖按照位置是在這個民主女神像前面，因為那都是外地的學生，外地學生就很憤怒，“我們的帳棚你們給我們挪了是不行的。”那時候是無政府主義，誰說也不行，管你是張伯笠，是副總指揮。那怎麼辦呢，就挪到了民主女神像的東側。我當時首先告訴他們搭帳篷，我們搭了八、九個紅色的帳棚，整個形式都非常好，還搭了個大帳篷放廣播臺。那麼這個舞臺怎麼解決呢？因為要講臺呀。於是我就找法大的同學聯系，他們有一些桌子。我說，“你們能不能把桌子借給我。”他說，“借桌子可以，可是你們廣場上這些人不給我飯吃，不給我面包，我還能給你桌子？”我說，“這個不是我負責，你可以找後勤部，找王綱。我搞宣傳，我祇能給你傳單，不能給你面包。”後來他說，“你把學生證押我這兒，我就給你。”我說，“我這個學生證不能給你。”但是我這兒有個牌兒，上面寫着副總指揮，他說，“那你得把這個給我。你必須把桌子還給【以上第 301 頁】我，才能取這個。”我想，這也行，這東西不是很重要，就給了他。要不然這個桌子還是借不來。大概是弄了七個桌子，就搭上了一個簡單的講臺。

師大的項俊當時作教務長，趙世民是副校長。我就安排程序，起草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的致詞。這個致詞大概是一千兩百多字，改了多少稿，是很精煉了。當時設計的就是首先剪彩，然後是各方代表講話，我致開學典禮致詞，第一課陳鼓應。可是陳鼓應在醫院，他心臟病復發，那天他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不能赴約了。我想可能他知道要鎮壓了。那麼這第一課就忙了，我說必須嚴家其來講，他來上第一課。派了三個人打電話找嚴家其，找了三次找不來，我一看已經九點了，我說現在就開。可那邊呢？就已經接到了開槍的消息。王燕就在廣播裏喊，說：“現在，”她喊得有點蒙了，其實是“民主大學要開學，希望大家到民主大學參加開學典禮。”她說成了，“現在民主大學號召大家都離開廣場去堵軍車。”

我當時氣憤得不行，而且她還喊“校長張伯笠號召大家都去堵軍車。”應該是封從德號召大家去堵軍車，而不是我。我說，“大家不要去堵軍車，大家要堅守廣場，應該到民主大學這兒來坐好。我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繼續開學。”後來推遲到十點鐘，才正式開始。這時嚴家其還沒有到，但是我非常高興的是柴玲來了。我說，好啊，嚴家其沒到，咱們哥兒剪彩吧。當時非常正式，買了幾百米的紅綢子，花了很多錢，這麼大大的花。用新剪子剪開以後，我們倆就舉了起來，然後就掌聲雷動，民主大學就正式揭開了開學典禮。當時有一萬人左右吧。當時用麻繩拉了屋子這麼大地方，不讓人進來。當時的人非常遵守秩序，那個地方是給記者留的，沒有一個人進來，全坐的是記者，但是很多不是記者拿照相機的也可以坐進來。

然後我就宣佈了開學，中共喇叭再次打開，就是“民主大學現在又宣告成立。我們現在再次警告你，你們要負法律責任，因為沒有經過國家教委批准。”後來我就上去了，我就講了那一番話，地下就哄堂大笑，很高興，給我熱烈鼓掌。柴玲代表指揮部致賀詞，馬少方代表大學生致賀詞。我在美國華盛頓聽說他的重要的罪證就是給民主大學致賀詞，對他宣判三年。老木代表知識界聯席會議致賀詞，趙瑜代表了作家致賀詞。嚴家其這時候和高舉到了。我非常高興，我就說，“下面請我們的名譽校長給我們上第一課。”嚴家其講了大概有四十【以上第 302 頁】五分鐘，他主要講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含意和他對今後局勢的看法。他講完以後就是民主論壇。民主論壇剛一結束，我重新上臺宣佈“民主大學開幕式結束”的時候，軍隊就已經進了廣場。一排一排的，我當時就是一種悲哀的感覺，我們人民沒有想到他們會開槍，是人民的愚昧、悲哀。當然民主大學就這樣結束了。結束的時候是十二點五十分。最後大概剩了有五千人。

然後我就宣佈了開學，中共喇叭再次打開，就是“民主大學現在又宣告成立。我們現在再次警告你，你們要負法律責任，因為沒有經過國家教委批准。”後來我就上去了，我就講了那一番話，地下就哄堂大笑，很高興，給我熱烈鼓掌。柴玲代表指揮部致賀詞，馬少方代表大學生致賀詞。我在美國華盛頓聽說他的重要的罪證就是給民主大學致賀詞，對他宣判三年。老木代表知識界聯席會議致賀詞，趙瑜代表了作家致賀詞。嚴家其這時候和高舉到了。我非常高興，我就說，“下面請我們的名譽校長給我們上第一課。”嚴家其講了大概有四十【以上第 302 頁】五分鐘，他主要講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含意和他對今後局勢

的看法。他講完以後 就是民主論壇。民主論壇剛一結束，我重新上臺宣佈“民主大學開幕式結束”的時候，軍隊就已經進了廣場。一排一排的，我當時就是一種悲哀的感覺，我們人民沒有想到他們會開槍，是人民的愚昧、悲哀。當然民主大學就這樣結束了。結束的時候是十二點五十分。最後大概剩了有五千人。

5 . 2 撤與不撤（李錄）

5.2.1 撤與不撤的爭論

第一個內容就是撤與不撤的爭論，這成為每一次廣場議會的最重要的議題，有的時候是第一個議題，有的時候是最後一個議題，每一次占的討論時間都最多。我總結一下當時兩派討論基本的理由。

主張撤的人理由是：第一，當時軍隊已經調入廣場之後，這個運動基本上就失敗了。失敗後要保存實力，要想把運動長期地開展下去祇能撤離廣場，祇有撤離廣場之後才能保持學運火種，避免犧牲；第二，如果我們堅守廣場，可為的事情不多，對下一步學運缺乏明確的目標；第三，當時廣場的秩序成為當時大家議論的中心，也是很多人同意撤離的原因。

不同意的原因如下：第一，當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全國學運一個旗幟，這個觀點主要是由外地學生提出來的。如果在這邊撤離，將使得各地的學運自生自滅，隨後的秋後算帳必然會到來，這對學運在各地的火種是一個打擊而不是保護。而各地的情況，無論是群眾基礎還是政府基礎都遠差於北京；第二，因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已經齊聚到了廣場，他們在電視機前 事實上是對於全體學生最好的保護。當時認為在全世界輿論的關注下，中國政府還不至於做得太過分；第三，按照中共以往的經驗，既然他已經動了真格的了，既然已經二十萬軍隊調集到廣場，當時不斷地有各種各樣不斷升級的傳聞，有一天傳說是導彈，而且有人照了照片來，後來發現那是毒瓦斯，認為鎮壓已經勢在必行，不可避免。如果我們撤離廣場，之間的區別是這個鎮壓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當時認為秘密的屠殺比鎮壓可能會更嚴【以上第 303 頁】重。當然這裏還有沒有說出來的原因，我想可以歸納成兩個：一是對屠殺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缺乏估計，當時認為最嚴重的可能是用刺刀、槍托，死人當然是會死，學生領袖看來一個都活不成，但是對於大規模的用坦克、機槍的屠殺完全沒有估計；第二是有可能外地學生強烈地感覺到，出來之後都已經回不去了，在當地本校都已經上了黑名

單，回去就沒有好果子吃。這是隱含的一個意義，沒有講出來的。

不同意的原因如下：第一，當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全國學運一個旗幟，這個觀點主要是由外地學生提出來的。如果在這邊撤離，將使得各地的學運自生自滅，隨後的秋後算帳必然會到來，這對學運在各地的火種是一個打擊而不是保護。而各地的情況，無論是群眾基礎還是政府基礎都遠差於北京；第二，因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已經齊聚到了廣場，他們在電視機前事實上是對於全體學生最好的保護。當時認為在全世界輿論的關注下，中國政府還不至於做得太過分；第三，按照中共以往的經驗，既然他已經動了真格的了，既然已經二十萬軍隊調集到廣場，當時不斷地有各種各樣不斷升級的傳聞，有一天傳說是導彈，而且有人照了照片來，後來發現那是毒瓦斯，認為鎮壓已經勢在必行，不可避免。如果我們撤離廣場，之間的區別是這個鎮壓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當時認為秘密的屠殺比鎮壓可能會更嚴【以上第303頁】重。當然這裏還有沒有說出來的原因，我想可以歸納成兩個：一是對屠殺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缺乏估計，當時認為最嚴重的可能是用刺刀、槍托，死人當然是會死，學生領袖看來一個都活不成，但是對於大規模的用坦克、機槍的屠殺完全沒有估計；第二是有可能外地學生強烈地感覺到，出來之後都已經回不去了，在當地本校都已經上了黑名單，回去就沒有好果子吃。這是隱含的一個意義，沒有講出來的。

【張倫：我問王超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有過一個會，這是當時在廣場廣播的，好多人都去了。我想問的具體時間？這個會是怎么回事？因為我的記憶裏，在這個會上第一次討論廣場撤退的問題。

王超華：我不能確認這個會的具體時間。我祇記得，先開個會到各個學校去調查，群眾情緒都是希望撤。這應該是中午或上午的事。下午我們接著召集第一次代表會，要求代表回校收集反應。第二次代表會，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張倫：高聯最後作出決議撤出廣場是什麼時候？

王超華：高聯沒作出過決議要撤出廣場。祇是建議各校代表回校去收集反應，結果發現這個決議根本作不出來。】

【王超華：五月二十三日之後退回北大，我們曾經幾次到廣場，包括我曾經在歷史博物館旁邊見到封從德、李錄他們去洗臉，其中提到高聯負責外圍，指揮部就負責廣場，而且封從德講過，“我們現在很簡單，我們就是等著他們來拖。”

死豬不怕開水燙

封從德：以靜制動。】

5.2.2 指揮部的情報與對策

六月一日晚上出現了第一次所謂的秘密情報。這裏我補充一下辛苦這個人，他最重要的活動是在廣場以後。在辛苦之前情報收集制度已經建立，但是由於這個工作本身的秘密性確實一直沒有列在公開公布的各種指揮部運行的工作人員名單上，都是由我個人私下任命的情報收集員，包括後來幫助指揮部和政府之間達成的幾次見面，其實不【以上第 304 頁】是談判了，這些都是秘密的情報收集員作的工作。我們至少有三次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會談，但是開始的聯絡都是我當時任命的情報收集員作的。辛苦最初成為情報收集員的時間，我不太清楚。他說是由柴玲先任命的，但後來我發現這個同學工作勤勤懇懇，而且特別可靠。當時情報收集員的主要特征就是可靠，因為當時不需要你到外面去收集，事實上所有的人都找你，當然找的人也很多，最多的時候可以一天好幾百個人，各種各樣的情報也比較多，需要有一些人把這些都整理出來。那麼辛苦開始他自己首先做，每天晚上在我開聯席會議之前，他總是給我有時候是兩頁紙，有時候是四、五頁紙的一個報告，就是他當天收集到的各種各樣的情報的總結，同時畫圖，按照當天情報定出來的軍隊的圖等等。我就任命他作秘書部下面的情報處處長。當然他後來作了其它的更多的工作，都是秘密工作，我就不再多說，他自己也提到了。由他本人給了我一個十八省市的名單，將近四十多個人，包括他們的聯絡代號等等。當然還有兩三個同學作同樣的工作，我就沒跟辛苦談。總之當時已經有想法準備轉移地下，這個工作就顯得重要起來。

六月一日晚上出現了第一次所謂的秘密情報。這裏我補充一下辛苦這個人，他最重要的活動是在廣場以後。在辛苦之前情報收集制度已經建立，但是由於這個工作本身的秘密性確實一直沒有列在公開公布的各種指揮部運行的工

作人員名單上，都是由我個人私下任命的情報收集員，包括後來幫助指揮部和政府之間達成的幾次見面，其實不【以上第 304 頁】是談判了，這些都是秘密的情報收集員作的工作。我們至少有三次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會談，但是開始的聯絡都是我當時任命的情報收集員作的。辛苦最初成為情報收集員的時間，我不太清楚。他說是由柴玲先任命的，但後來我發現這個同學工作勤勤懇懇，而且特別可靠。當時情報收集員的主要特征就是可靠，因為當時不需要你到外面去收集，事實上所有的人都找你，當然找的人也很多，最多的時候可以一天好幾百個人，各種各樣的情報也比較多，需要有一些人把這些都整理出來。那么辛苦開始他自己首先做，每天晚上在我開聯席會議之前，他總是給我有時候是兩頁紙，有時候是四、五頁紙的一個報告，就是他當天收集到的各種各樣的情報的總結，同時畫圖，按照當天情報定出來的軍隊的圖等等。我就任命他作秘書部下面的情報處處長。當然他後來作了其它的更多的工作，都是秘密工作，我就不再多說，他自己也提到了。由他本人給了我一個十八省市的名單，將近四十多個人，包括他們的聯絡代號等等。當然還有兩三個同學作同樣的工作，我就沒跟辛苦談。總之當時已經有想法準備轉移地下，這個工作就顯得重要起來。

到了六月一日兩三個信息同時傳到，按照我當時的判斷，好象都還可靠，軍隊已經準備好要進城，當然對於進城之後的可能採取的措施並沒有一個很一致的報道，但很顯然已經比前幾天得到的消息突然地程度嚴重起來，包括說是軍隊已經密集和外界隔斷聯系，已經開到路口的軍車已經騰空，已經沒有軍人在裏面，軍人自己整頓起來，這些消息都已經被核實。所以六月一日晚上我全天沒離開，本來每天還有兩三個小時可以睡覺。尤其是那天早晨剛剛經歷了柴玲的綁架事件，當時指揮部對這個事件反應非常激烈，也是由於氣候突然轉變造成的。我們當時確實有根據證明至少萬朝暉這個人是和政府有關係的，這個消息是我們見到一個中共高級官員在談話中無意提出的，恰好就在那次見面證實萬朝暉在這個旅館中同時有自己的一個套房。到了六月二日情況確實變得非常嚴重了，那天整個晚上我從大概八九點鐘開始就每幾分鐘就收到新的進展，我有兩個人專門坐在旁邊繪制一張圖，每過幾分鐘圖上就有些變化，當時陪這我整個一晚上的是潘義。

當時主要作出的反應就是把帳篷裏的人集中起來，這時候帳篷已經開始建起來了，至少一半的人已經轉入了新的聚居地，而新的聚居地已經考慮了對付軍隊進城的辦法，所以這部分人是很容易集中起來【以上第 305 頁】。每個帳篷設置了一個棚長，這個棚長迅速待命，當時政策推行部已經建立，這些命令能迅速地傳達到當時的每一個人，那幾天晚上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沒有睡好覺，都在等待發生意外。同時那天晚上和北高聯開始有很好的合作，至少開希、楊濤等人從那天晚上從師大和北大調進來將近一兩萬人。

當時主要作出的反應就是把帳篷裏的人集中起來，這時候帳篷已經開始建

起來了，至少一半的人已經轉入了新的聚居地，而新的聚居地已經考慮了對付軍隊進城的辦法，所以這部分人是很容易集中起來【以上第 305 頁】。每個帳篷設置了一個棚長，這個棚長迅速待命，當時政策推行部已經建立，這些命令能迅速地傳達到當時的每一個人，那幾天晚上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沒有睡好覺，都在等待發生意外。同時那天晚上和北高聯開始有很好的合作，至少開希、楊濤等人從那天晚上從師大和北大調進來將近一兩萬人。

第二天上午大量處理的是大量被捕的軍人。當時被捕的軍人很多，還繳了很多械。但是這個情況已經引起了我們嚴重的關注，認為這是一場大行動的先兆。首先我們派出了政策推行部的幾乎全部人馬去到各個被軟禁的軍人，說服同學把他們放走，同時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這時有兩位中校主動向我們說明背後的意圖，還有一名將軍。按照這次談話的結果我已經在腦子裏形成了一個看法，這是一次預演，這是一次故意的疲憊戰。氣氛開始被弄得越來越激烈，好象有一觸即發之感。這時就有了武器收繳，把所有的東西都收繳到指揮部。我印象裏戰利品還真不少，破槍破炮子彈一大堆，大部分是鎊盔之類的，請專家看了看沒有一樣開得動，刀子也生鏽，槍也沒槍栓。總之，這個情況已經變得非常明顯，這是一場故意的陰謀。根據當時這些判斷，立刻把這些東西送到了公安局，從公安局裏拿到了收條，召開了三次記者招待會，向各位記者不斷地展示收條，同時請政策推行部的人到各個帳棚去請棚長和每個同學說明這一兩天發生的緊急情況，請大家做好意外時刻的準備。當時的準備也并不很多，建立的基本原則是五月十九日晚上到二十日晚上建立的所謂的原則，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男同學保護女同學，互相并肩和平撤退，同時圍成一個圓圈，這是接受了一個空軍少校的建議，叫中心開花，中心突破，學習了很多軍事術語，最後形成了這一套方案。這套方案在絕食最初的幾天，每天都向大家傳述，同時和醫藥站的人緊急商量弄了幾千個口罩和毛巾，為防瓦斯。後來這都發下去了，在撤退過程中我發現每個人至少有一個毛巾或者有一個口罩。這是當時作出的一些反應。

到了六月二日晚上再次傳出軍隊要強行進軍的消息，整個晚上又是不眠之夜。這時我對柴玲和封從德特別有意見，因為我在這時看不到他們，那個時候張伯笠全力以赴已經把這個指揮部弄到別處去了，那時我感覺最欣慰的是潘義總陪著我在那兒，多少有一點溫暖。剛結婚的妻子早已經跑了。【以上第 306 頁】

【柴玲：綁架事件發生後，我的糾察們就把我保護起來，連李錄也找不到我們。】

5.2.3 屠殺就要到來

真正到了關頭的時候是六月三日，這時所有的人到位了，所有的人都相信一場屠殺就要到來了，除了張伯笠，張伯笠那個時候一心要成立民主大學。到六月二日半夜後我們全都在一起，誰都沒有睡覺，反復地商量。因為當天下午，跟北京市公安局的交涉，六月一日的時候沈銀漢的事已經是最初的信號了。

那個時候整整一夜討論意外事件出現怎麼辦，這是六月二日晚上。那時軍事物品還是不斷地往這邊帶，還不斷地有人帶軍人進來。我記得那時辛苦已經是象猴子一樣上竄下跳，一會兒就報告回來情況，我對他的情報已經完全不信任了，他那個情報真是瞎說八道，那個時候已經不很平穩了。但是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已經不平穩了。情況變得越來越危急，我的身體也覺得越來越疲憊，但是沒有辦法，大家坐在那，大家吵架的時候我祇能坐在中間。

到了六月三日上午的時候，情況突然變得火藥味十足，主要是三個事件。一個是六月二日晚上這個交通案，主要是柴玲和她的一大堆十幾個助手在處理。但是中午的時候就出現了所謂六部口事件，下午的情況我已經開始坐不住了，所以我就到各處去視察，主要是在六部口地區視察。當時我的感覺是整個北京市的氣氛已經很不正常，所有的市民變得異常的暴躁、激動、憤怒，當時在六部口附近圍繞了至少幾萬人，整個長安街全部堵滿人，我花了很大的勁兒才擠進去，那個時候六部口事件已經結束，但是瀰漫著瓦斯、硝煙。回來之後向柴玲報告，我說情況基本結束，好象不會再出問題，因為那時每天都出問題，六部口一出問題我們就覺得又要出問題了。我說至少在我看來，軍隊在白天進入的可性不大。但是情況變得很危急，接著就出現了人民大會堂西門事件。到了晚上五六點鐘的時候，又傳出小女孩被砸死事件，開始有人帶著血就回來指揮部。晚上六點鐘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基本上確定一場大規模的、有預謀的、有組織的，可能會很殘酷的鎮壓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我對殘酷性還沒有充分地估計。

我和柴玲決定舉行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同時我們有一個協議，【以上第 307 頁】號召所有的記者都留在天安門廣場作這樣一次大規模鎮壓的見證人，告訴整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我的印象裏當時柴玲找了一大批人去找記者，找到的外國記者很少，中國記者還是不少，最後，大概有三十多個人。那是在紀念碑的南側，由我主持了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

我和柴玲決定舉行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同時我們有一個協議，【以上第 307 頁】號召所有的記者都留在天安門廣場作這樣一次大規模鎮壓的見證人，告訴整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我的印象裏當時柴玲找了一大批人去找記者，找到的外國記者很少，中國記者還是不少，最後，大概有三十多個人。那是在紀念碑的南側，由我主持了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

在這中間又有一個插曲，就是開希突然又開始精神抖擻到指揮部來向柴玲要求他要代理總指揮，記者招待會他也去了。在那個會上我開始起草了指揮部最後一份通告，我當時作了很多口頭的以指揮部的名義作的宣言，我自己特別懶，不願意寫東西，所以什麼也沒有留下，其實那些都是我口頭講的，後來不知道是誰記錄下來了，總之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提出“打倒李鵬偽政權”，向大家出示了關於交通事件的報告，關於六部口的報告，關於大會堂的報告，公安局送槍的報告，證據，收條。開希也來要求講話，我們出於不是對他的尊重，主要是怕他搗亂，所以每次開希來他想說，我都讓他說。他就在那兒發表了一番演講，但當

時我對他那個發表的演講印象極好，那是我為數極少的對開希印象極好的次數之一，他那天講得很好。因為他當時也號召所有的人和學生站在一起，尤其是記者作歷史的見證人，這點我覺得特別合我的心意。當時在記者會上作證的還有兩位在六部口和人民大會堂受傷的工人，其中有一位是那個著名的拿著鋼盔的，他的照片到處都是的那個人，他也到那兒去作證。還有一個人我記得是推著平板車，受傷去作證，總之，這個招待會開了有兩個小時。

到八點鐘結束我們回到廣場指揮部時候，我們把我口頭起草的議案又重新講了一遍，開了最後一次各校棚長會議，作出了“緊急待命，不許睡覺，準備好毛巾，同時向中心聚集”等等。

5.2.4 六三這一夜

到了晚上九點有了第一個報道，在木樨地打死人了。在這個過程中，開希在記者招待會結束後就隨著我們到了指揮部，這個時候正式要求六小時指揮權。當時柴玲和我都分別問了他，“你作總指揮有什麼打算？”他說，“我也不知道。”這時出現了第一例關於死亡的報道，還說是個女孩，然後吾爾開希很激動拿起話筒來要講，講到這個女孩死的時候，講得很激動突然暈倒。我記得王童一笑，拿著廣播說，“救護車，救護車，吾爾開希又暈倒了。”那個“又”拖了有一分【以上第 308 頁】鐘，旁邊的糾察隊員聽說之後連捧帶架就把開希帶出去了，以後再也沒見到他，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我的印象他每到這個時候一定要暈倒，所以也沒有出我們的意料，反而指揮部安靜了很多。

到了晚上九點有了第一個報道，在木樨地打死人了。在這個過程中，開希在記者招待會結束後就隨著我們到了指揮部，這個時候正式要求六小時指揮權。當時柴玲和我都分別問了他，“你作總指揮有什麼打算？”他說，“我也不知道。”這時出現了第一例關於死亡的報道，還說是個女孩，然後吾爾開希很激動拿起話筒來要講，講到這個女孩死的時候，講得很激動突然暈倒。我記得王童一笑，拿著廣播說，“救護車，救護車，吾爾開希又暈倒了。”那個“又”拖了有一分【以上第 308 頁】鐘，旁邊的糾察隊員聽說之後連捧帶架就把開希帶出去了，以後再也沒見到他，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我的印象他每到這個時候一定要暈倒，所以也沒有出我們的意料，反而指揮部安靜了很多。

安靜的時間持續得很短，就開始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消息。這時就作出了

一個決議，所有的人員立刻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手挽手肩并肩，帳棚裏不允許留任何人。同時我派出一些人，請所有的人都回來，不要再去堵軍車，因為在這個時候關於屠殺的報道已經越來越多。這個時候張伯笠讓我去演講，我不去，結果柴玲去了。

柴玲回來的時候情況已經變得非常危急，那個時候至少圍了有幾十個人，有拿刺刀的，有拿槍的。有人拿著槍對著柴玲說，“如果你敢在這個時候撤，我先斃了你。這麼多人已經為你們學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斃了你，宣佈我當總指揮。”柴玲還沒表示任何說法，那邊已經把刀捅到了後腰上，不僅是楊朝輝，楊祇是其中之一，說“這麼多人已經都死在那兒了，你要是還讓人死在這兒，你就要作歷史的罪人。我要為這些人的生命負責，如果你還不下令撤退，我先宰了你，然後我下令。”

總之情況就已經變得這麼危急。而且這個時候傷員多得不得了，每個人都血糊啦噠的。想通知開會什麼人也找不著，各種表決也不清楚，而且情報部長也找不著了，總之已經不再履行職責。誰也不知道軍隊已經到了什麼地方，什麼消息也沒有了，祇知道軍隊在三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進軍，而且在途中遇人就殺，遇人就砍，也不知道還需要多長時間就到了廣場。對於各種各樣的判斷已經沒有辦法作出，如果撤的話，撤到哪條街道上？哪條街道是生路，因為當時的感覺就象在電影裏看到的日本鬼子進村以後，把村子包圍了一樣，哪條道路都出不去，出去就殺，反而呆在家裏還有一線希望。所以我當時的基本想法，就是在那時力圖保持一個鎮定的狀態，當時我的基本想法是以靜待動，我先把廣場成為最和平、最安詳的一塊地方，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要死大家就死在一起，要沒有死的話還有可能保留一個生的機會。

在這個時候，封從德就說了，“我們撤到紀念碑上去，我去那邊安一個廣播站，”這時候封從德就轉移到了紀念碑三層。從紀念碑三層到撤離這個情況，封從德最清楚。我最後祇證明一下，從那個時候起，封從德就一直作了最後的主持，那個時候我和柴玲在下面的指揮【以上第 309 頁】部鉗制大部分的人，因為他們來就是瞎搗亂，我們在那坐著，至少可以鉗制這批人，給封從德一個機會，在那邊重新建立一個指揮部。後來就是這個指揮部保留了最後五千人的生命，最後把他們帶出廣場。

在這個時候，封從德就說了，“我們撤到紀念碑上去，我去那邊安一個廣播站，”這時候封從德就轉移到了紀念碑三層。從紀念碑三層到撤離這個情況，封從德最清楚。我最後祇證明一下，從那個時候起，封從德就一直作了最後的主持，那個時候我和柴玲在下面的指揮【以上第 309 頁】部鉗制大部分的人，因為他們來就是瞎搗亂，我們在那坐著，至少可以鉗制這批人，給封從德一個機會，在那邊重新建立一個指揮部。後來就是這個指揮部保留了最後五千人的生命，最後把他們帶出廣場。

我最後再說一句話，關於這一段的報道實在太少。唯一有一次報道是楊濤*寫了一篇非常生動的文章（《民主中國》第二期，1990.4），但是我對於楊濤*是否到場表示極大懷疑。尤其是中間對於柴玲、我、封從德的描述我覺得實在與事實相差太遠，在這裏作一說明。

5 . 3 屠城見證（李蘭菊）

【我就講從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到六月四日下午四點鐘這段時間我所經歷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我跟香港學聯三個代表，就是我、林耀強、陳清華，打算到天安門去看一看，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已經殺人了。我們一下北京飯店的大廳，一些香港記者就馬上擋住我們的去路，說：你們不許出去，因為外面已經傳出來殺人了，你們一定要回去。我們沒有說話，就回到我們自己的房間裏。然後就跟“香港學聯”通了一次電話，“香港學聯”給我們的答復，也給我們一個命令就是——不許出去。後來我們四個人想了一想，每一個人看了對方一眼就知道，都在笑，都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想要出去，不能不出去。所以我們最後就由林耀強起草一封信傳真給“香港學聯”。這一天晚上我們不代表香港學聯，祇代表我們自己。然後就說：以後的就不用“香港學聯”給我們負責，對不起要違抗你們的決議。簽了名就傳真回香港。以後我們再給家人打了個電話，大概是十點半，我們就出去。因為那個時候記者已經不在了，我們就很順利地離開了北京飯店。

我們本來是要先到廣場去看一看，然後就找一些糾察隊。因為我們知道一些糾察隊已經出去擋軍隊了，我們就找到廣場去。那個時候我們發覺廣場上的人很少，平常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有很多人在，可是那天晚上人不多，祇有幾萬人，還有一些外地的學生在那裏坐著。那個時候情況也不是太亂。後來我們覺得當時在廣場沒有用，同學都出去擋軍隊了，我們就覺得要跟著他們去。到了廣場以後，很多我們認識的朋友都不見了。林耀強就說：我們到郊區去，他們一定在那裏。【以上第 310 頁】

我們覺得既然要去參加糾察隊擋軍隊那個工作，可能回不來了，所以我們就去指揮部先見幾個朋友。好不容易我們進了指揮部，看見了柴玲、封從德跟李錄。然後就是見到馬少方，最後是開希、程真。後來程真還跟我們在一起，整個晚上都跟我們在一起。最後見到開希，見了開希我們還覺得沒什麼，還在拍照。那張照剛拍完，廣播臺就有一個同學在哭泣說：我們的同學都被警察開槍了，我身上都是血什麼的。開希就很激動，就進廣播站去說話。

我們就離開指揮部，打算去追糾察隊。那個時候大概是十二點多鐘吧。（劉燕插

：不到十二點鐘，十一點。程真跟你們一起走的。)對。大概我們走到長安街的時候，一輛裝甲車就衝過來，衝進長安街。很多市民，還有學生就要去擋它，有的是追它，有的是用石頭打那個裝甲車，可是它就是亂衝亂撞的。我們當時也不知怎麼辦，因為很多同學已經武裝起來了。所謂武裝起來就是有一些人拿著瓶子，有一些人拿著木棍、木條，還有鐵條什么的。我們覺得這事好象已經失去了和平請願的那個方式，我們幾個人就商量要不然我們就四個人坐在長安街，號召人群用人牆擋那裝甲車。我們那個時候仍然很天真地覺得用人牆可以頂住那些裝甲車進廣場。可是我們看看旁邊有很多人都坐在那裏，在討論局勢。林耀強就說：你現在坐下來人家也可能當你在討論什麼事情，沒有用。我們還是去追糾察隊吧。

我們本來是要先到廣場去看一看，然後就找一些糾察隊。因為我們知道一些糾察隊已經出去擋軍隊了，我們就找到廣場去。那個時候我們發覺廣場上的人很少，平常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有很多人在，可是那天晚上人不多，只有幾萬人，還有一些外地的學生在那裏坐著。那個時候情況也不是太亂。後來我們覺得當時在廣場沒有用，同學都出去擋軍隊了，我們就覺得要跟著他們去。到了廣場以後，很多我們認識的朋友都不見了。林耀強就說：我們到郊區去，他們一定

在那裏。【以上第310頁】我們覺得既然要去參加糾察隊擋軍隊那個工作，可能回不來了，所以我們就去指揮部先見幾個朋友。好不容易我們進了指揮部，看見了柴玲、封從德跟李錄。然後就是見到馬少方，最後是開希、程真。後來程真還跟我們在一起，整個晚上都跟我們在一起。最後見到開希，見了開希我們還覺得沒什麼，還在拍照。那張照剛拍完，廣播臺就有一個同學在哭泣說：我們的同學都被警察開槍了，我身上都是血什么的。開希就很激動，就進廣播站去說話。我們就離開指揮部，打算去追糾察隊。那個時候大概是十二點多鐘吧。(劉燕插：不到十二點鐘，十一點。程真跟你們一起走的。)對。大概我們走到長安街的時候，一輛裝甲車就衝過來，衝進長安街。很多市民，還有學生就要去擋它，有的是追它，有的是用石頭打那個裝甲車，可是它就是亂衝亂撞的。我們當時也不知怎麼辦，因為很多同學已經武裝起來了。所謂武裝起來就是有一些人拿著

瓶子，有一些人拿著木棍、木條，還有鐵條什么的。我們覺得這事好象已經失去了和平請願的那個方式，我們幾個人就商量要不然我們就四個人坐在長安街，號召人群用人牆擋那裝甲車。我們那個時候仍然很天真地覺得用人牆可以頂住那些裝甲車進廣場。可是我們看看旁邊有很多人都坐在那裏，在討論局勢。林耀強就說：你現在坐下來人家也可能當你在討論什么事情，沒有用。我們還是去追糾察隊吧。

然後大概是凌晨十二點多吧，我們在長安街上跟著那些市民，也幫他們的忙，拉旁邊那些欄杆來擋著那些車子進城。大概是一點鐘經過歷史博物館的時候，突然之間我們看見很多軍人拿著很長的棍子出來，大概是一千多人。我們嚇了一跳，軍隊真的進了城，他們都是從地下上來的。我們在歷史博物館附近，人不多大概也不夠三十個人，我們就馬上組成人牆，就坐在地上。那些軍人有的拿著槍，有的沒有，可是他們都很平靜，前面的坐在臺階上，後面二排的是站著的，再後面也是站著的。在歷史博物館前面，那個人牆跟軍人的距離大概是半個足球場，很遠，真的很遠。那時候程真帶著我們唱歌，喊口號。當時我記得旁邊有一個小孩，十多歲吧，還在看小說。我說：你還在看小說，你還有心情看嗎？他說：軍隊不會殺人，不怕。一些工人還在維持秩序，還有一些工人看見一些學生或者是學生看見工人拿著武器，他們都大聲叫：聽指揮部的話，和平請願，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大概是一點多，信號彈就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放起來了。我記得大【以上第311頁】概是十五分鐘以後，歷史博物館後面就有槍聲，最初的時候是比較慢的，比較疏的。後來大概是再過十分鐘就是很強。這些槍聲響了大概也是十多分鐘吧，我們就開始看見一些學生抬著市民重傷的一些，或者是市民抬着重傷的學生，就是抬著一些死傷者從博物館的後面走到我們旁邊，他們就抬著那屍體呀，受傷的人到我們旁邊的一個救生站。有的就是把一些重傷的人用自行車、木頭車或者是汽車送到醫院去，有的就放在那個救生站裏邊。那個時候我估計，包括抬著走的，還有送到車上的，或者是在那個救傷站裏面的，我相信死掉的起碼有五個，受傷的、重傷的超過十五個。我還記得有一個抬著到救生站去的一個學生，我肯定他是學生，他在後面不知是給槍開了還是給棍子打了，看不清，全部都是血，都破了，他整個下身都不能動，就是頭在搖。他說："你們看見啦，你們看見啦，你們都看見了嗎？"這時他就哭了。然後就說："要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不可以放棄。"我也真的記不清楚那個時間，大概就在一點鐘到三點多

鐘的時候。突然之間就是一些軍人，很多人都喊起來了。我們回頭一看，原來有很多市民在追一些軍人在打。那個軍官還是很平靜，就是不讓他的軍隊動。然後就是一些學生去救那些軍人。給打的軍人大概是有四、五個，當他們看見學生去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停止了叫喊。軍隊也有因為一些軍人沒有脫離市民的包圍而繼續叫喊，他們坐在臺階上，他們的軍官不許他們動，他們的情緒也很激動，就是喊，叫。他們見到一些軍人給市民追著打，他們就很激動。後來看見那些學生去救那些軍人，他們就坐下來，就不喊了。這樣的情況出現了四、五次。

大概是一點多，信號彈就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放起來了。我記得大【以上第 311 頁】概是十五分鐘以後，歷史博物館後面就有槍聲，最初的時候是比較慢的，比較疏的。後來大概是再過十分鐘就是很強。這些槍聲響了大概也是十多分鐘吧，我們就開始看見一些學生抬著市民重傷的一些，或者是市民抬著重傷的學生，就是抬著一些死傷者從博物館的後面走到我們旁邊，他們就抬著那尸體呀，受傷的人到我們旁邊的一個救生站。有的就是把一些重傷的人用自行車、木頭車或者是汽車送到醫院去，有的就放在那個救生站裏邊。那個時候我估計，包括抬著走的，還有送到車上的，或者是在那個救傷站裏面的，我相信死掉的起碼有五個，受傷的、重傷的超過十五個。我還記得有一個抬著到救生站去的一個學生，我肯定他是學生，他在後面不知是給槍開了還是給棍子打了，看不清，全部都是血，都破了，他整個下身都不能動，就是頭在搖。他說：“你們看見啦，你們看見啦，你們都看見了嗎？”這時他就哭了。然後就說：“要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不可以放棄。”我也真的記不清楚那個時間，大概就在一點鐘到三點多鐘的時候。突然之間就是一些軍人，很多人都喊起來了。我們回頭一看，原來有很多市民在追一些軍人在打。那個軍官還是很平靜，就是不讓他的軍隊動。然後就是一些學生去救那些軍人。給打的軍人大概是有四、五個，當他們看見學生去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停止了叫喊。軍隊也有因為一些軍人沒有脫離市民的包圍而繼續叫喊，他們坐在臺階上，他們的軍官不許他們動，他們的情緒也很激動，就是喊，叫。他們見到一些軍人給市民追著打，他們就很激動。後來看見那些學生去救那些軍人，他們就坐下來，就不喊了。這樣的情況出現了四、五次。

後來，我們三十多個人繼續坐在博物館的前面。突然之間有一個小孩，我看他不超過十歲，也是從那方面走過來，我剛才講的歷史博物館的後面走過來。他一邊走就一邊叫，看見那些軍人在歷史博物館前面，他就要衝過去。我就把他抱著，把他拉著不許他動。他就大叫起來，和瘋了一樣。他說：“我哥哥給他

們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我要跟他們拚了！”他哭得很厲害，我就拚死命地拉住他，然後幾個人來幫我的忙。他就老是在喊：“我的哥哥給他們打死了！”後來他掙脫了我，跟著一輛離開廣場的救傷車後面，一邊跑，一邊喊。這個時候我很激動，不知道怎麼樣好，因為我已經親眼看見有一些人真的死掉了，軍隊真的向一些學生們，向一些市民開槍。這個時候我看見有兩個好象是青年女工，總覺得她們不是學生，她們越過我們的人【以上第 312 頁】牆，走到那些軍人去，她們要拉那個軍官出來談話，可是給那些士兵擋住，他們就亂起來。我就趁這個亂的時間衝過去，拉著那個軍官的手，就跟他講話，（那個時候我其實也沒有理智），我就告訴他們：“你不能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槍。我是香港的學生，我一直都知道他們是和平請願的。你一定不可以向他們開槍。”我記得我說了很多的話，後來我哭了。我看見那個軍官也哭了，他的眼淚掉下來了。我看見他哭，我就哭得更厲害，就跪在地上。後來林耀強他們把我抬回去，我們本來是坐在歷史博物館的前面。我一個同學陳清華說：那邊可能有事情發生了。他就要去看一看。大概是十分鐘以後他回來了，他的照相機不見了，人也好象給軍人打過一樣。他說他看見一些市民在燒坦克，他就拍照，拍照的時候就給一些軍人打了，照相機也打碎了。這個時候林耀強跟程真也去看，他們不許我動，就要我等他們回來。大概是兩點鐘，就剩下我跟陳清華兩個人在歷史博物館前面的那個人牆。到兩點鐘三十分左右，槍聲越來越密，就是越來越近了。旁邊很多的學生，很多工人已經拿起了武器，有幾個老工人一邊在哭，一邊在喊：“聽學生的話，聽指揮部的話，放下你們的武器，我們是和平請願。聽學生的話。”就在叫，因為有很多工人已經拿起武器來了。後來他們看見受傷的人越來越多，幾個老工人也在喃喃說話，就是喃喃自語的，已經不在看，就在馬路邊上哭。

後來，我們三十多個人繼續坐在博物館的前面。突然之間有一個小孩，我看他不超過十歲，也是從那方面走過來，我剛才講的歷史博物館的後面走過來。他一边走就一邊叫，看見那些軍人在歷史博物館前面，他就要衝過去。我就把

他抱著，把他拉著不許他動。他就大叫起來，和瘋了一樣。他說：“我哥哥給他們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我要跟他們拚了！”他哭得很厲害，我就拚死命地拉住他，然後幾個人來幫我的忙。他就老是在喊：“我的哥哥給他們打死了！”後來他掙脫了我，跟著一輛離開廣場的救傷車後面，一邊跑，一邊喊。這個時候我很激動，不知道怎麼樣好，因為我已經親眼看見有一些人真的死掉了，軍隊真的向一些學生們，向一些市民開槍。這個時候我看見有兩個好象是青年女工，總覺得她們不是學生，她們越過我們的人【以上第312頁】牆，走到那些軍人去，她們要拉那個軍官出來談話，可是給那些士兵擋住，他們就亂起來。我就趁這個亂的時間衝過去，拉著那個軍官的手，就跟他講話，（那個時候我其實也沒有理智），我就告訴他們：“你不能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槍。我是香港的學生，我一直都知道他們是和平請願的。你一定不可以向他們開槍。”我記得我說了很多的話，後來我哭了。我看見那個軍官也哭了，他的眼淚掉下來了。我看見他哭，我就哭得更厲害，就跪在地上。後來林耀強他們把我抬回去，我們本來是坐在歷史博物館的前面。我一個同學陳清華說：那邊可能有事情發生了。他就要去看一看。大概是十分鐘以後他回來了，他的照相機不見了，人也好象給軍人打過一樣。他說他看見一些市民在燒坦克。他就拍照，拍照的時候就給一些軍人打了，照相機也打碎了。這個時候林耀強跟程真也去看，他們不許我動，就要我等他們回來。大概是兩點鐘，就剩下我跟陳清華兩個人在歷史博物館前面的那個人牆。到兩點鐘三十分左右，槍聲越來越密，就是越來越近了。旁邊很多的學生，很多工人已經拿起了武器，有幾個老工人一邊在哭，一邊在喊：“聽學生的話，聽指揮部的話，放下你們的武器，我們是和平請願。聽學生的話。”就在叫，因為有很多工人已經拿起武器來了。後來他們看見受傷的人越來越多，幾個老工人也在喃喃說話，就是喃喃自語的，已經不在看，就在馬路邊上哭。

這個時候我感覺很不舒服，好象要暈過去一樣。那些同學看見我這樣就把我送到旁邊的救生站去。救生站裏邊我看見很多受傷的市民和學生，那個時候在救生站裏面大概有七八個，被同學扶到救生站去的受傷軍人大概有三、四個。七八個是受傷的，死掉的我不知道。因為那個救傷站不停地有救生車來送傷員去醫院，所以人數不多。可是他們一直都沒有送軍人。我起初以為他們不願意送軍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這些軍人的安全才不送這些軍人到醫院去。後來槍聲越來越近。這時來了一輛救生車，那些醫生，還有旁邊的一些市民知道我們兩個是香港學聯的，雖然我們都沒有受傷，可是救生車一來，他們就說：香港學聯的上車，上車。我跟陳清華拒絕上車，說：“我們沒事，不用去醫院。”受傷的同學很多，我覺得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占用救生車的位子。後來來了兩輛救生車，我們都拒絕了。到第三部來的時候，一個女醫生拉著我的手，她用英文跟我講：“My child, you must get on the ambulance, we need you go back to

【以上第 313 頁】HongKong and tell the world what had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 our government had done to us.”她講完就哭了。我就跟陳清華一起到車上去了。大概半個小時才到醫院，因為途中有很多市民，還有學生來擋我們的車。我們一邊走，救生車裏的同學一邊用喇叭喊：“是學生的車，不是軍人的。我們不會救軍人的。”原來他們沿途在堵這些救生車，他們不許學生救軍人。其中有很多都是女的，還有一些老太太。我要強調的是年輕工人、學生不多，堵這些救生車的都是些老人家和女的。

這個時候我感覺很不舒服，好象要暈過去一樣。那些同學看見我這樣就把我送到旁邊的救生站去。救生站裏邊我看見很多受傷的市民和學生，那個時候在救生站裏面大概有七八個，被同學扶到救生站去的受傷軍人大概有三、四個。七八個是受傷的，死掉的我不知道。因為那個救傷站不停地有救生車來送傷員去醫院，所以人數不多。可是他們一直都沒有送軍人。我起初以為他們不願意送軍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這些軍人的安全才不送這些軍人到醫院去。後來槍聲越來越近。這時來了一輛救生車，那些醫生，還有旁邊的一些市民知道我們兩個是香港學聯的，雖然我們都沒有受傷，可是救生車一來，他們就說：香港學聯的上車，上車。我跟陳清華拒絕上車，說：“我們沒事，不用去醫院。”受傷的同學很多，我覺得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占用救生車的位子。後來來了兩輛救生車，我們都拒絕了。到第三部來的時候，一個女醫生拉著我的手，她用英文跟我講：“My child, you must get on the ambulance, we need you go back to 【以上第 313 頁】HongKong and tell the world what had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 our government had done to us.”她講完就哭了。我就跟陳清華一起到車上去了。大概半個小時才到醫院，因為途中有很多市民，還有學生來擋我們的車。我們一邊走，救生車裏的同學一邊用喇叭喊：“是學生的車，不是軍人的。我們不會救軍人的。”原來他們沿途在堵這些救生車，他們不許學生救軍人。其中有

很多都是女的，還有一些老太太。我要強調的是年輕工人、學生不多，堵這些救生車的都是些老人家和女的。

後來我們到北京醫院。救生車門一開，就看見醫院根本就象屠場一樣，到處都是血，來接我們的醫生、護士身上都是血，就是來推我的那輛車，也都是血。到了醫院，有些醫生聽說我們是香港學聯的，馬上就來看我們。那個醫生是個年紀很大的，我覺得他是比較高級的醫生，他就馬上來看我，我說“我沒有事，我真的沒有事。你去救其他的人。”他跟我講，“你沒有事就好。你好好記住今天發生的事情，你趕快回去香港。”因為醫院裏這些人都很忙，我就沒有到處去看，就在一層樓的走廊裏面。祇是一層樓的走廊裏面，起碼有二十個受了重傷的人，有學生，有很年輕的，也有中年的，是學生還是市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受重傷的人。其中有一個剛送進來，是另外一輛車送進來的，他送進來的時候，滿身都是血，一個護士上去把他衣服剪開，一剪開的時候，護士自己也後退了二步。那個護士給嚇怕了，原來那個人的胸口有一個飯碗一般大的洞，這個人不能救了。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政權是用了達姆彈來殺市民的，來打那些沒有武器的人。那天晚上，我被安排在醫院地下室的其中一個房間裏，他們不許我們亂跑，就讓我們在一個房間裏休息。其實我們很慚愧，因為地上全是受傷者，他們沒有一個好好的休息的地方，有的躺在椅子上，或者在地上。可是他們堅持要我們這樣，一個護士說：“你們不要再給我們帶來麻煩，好好地在這裏坐著。”所以整個晚上，我們都不敢出去。到了凌晨的時候，我們實在受不了了，要出去看看。在我休息的房間旁邊，也有一個小的房間，那個房間裏睡著三個很重傷的人。其中有一個我看他剛醒過來，他的面容好象很痛苦一樣，我就跟他說話。他很年輕，好象才十五、六歲，個子很小，我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小陶。”我沒問清楚他全名叫什麼，他祇告訴我他叫小陶，我也不知道是哪個“陶”。他說：“我是跟著北大的人去擋【以上第 314 頁】軍隊。”我問他，要不要我帶個口信給你爸爸、媽媽。他就說：“千萬不要。因為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的爸爸、媽媽祇有我一個孩子，他們受不了的。請你千萬不要給他們帶這個口信。”然後我問他：你怎麼樣？因為我看見他整條腿都斷了，包著紗布，身上也是包著紗布。我問他你怎麼了，他很辛苦地說：“也沒什麼，腿斷了，胸口吃了二顆子彈。醫生說我沒問題，可是我知道，我真的活不了多少天”。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祇管哭，他反而安慰我，“你別哭。”他因為看見我的香港學聯的卡片，他說：“你是從香港來的嗎？回去香港……”對不起，我一定要把他□

後來我們到北京醫院。救生車門一開，就看見醫院根本就象屠場一樣，

到處都是血，來接我們的醫生、護士身上都是血，就是來推我的那輛車，也都是血。到了醫院，有些醫生聽說我們是香港學聯的，馬上就來看我們。那個醫生是個年紀很大的，我覺得他是比較高級的醫生，他就馬上來看我，我說“我沒有事，我真的沒有事。你去救其他的人。”他跟我講，“你沒有事就好。你好好記住今天發生的事情，你趕快回去香港。”因為醫院裏這些人都很忙，我就沒有到處去看，就在一層樓的走廊裏面。只是一層樓的走廊裏面，起碼有二十個受了重傷的人，有學生，有很年輕的，也有中年的，是學生還是市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受重傷的人。其中有一個剛送進來，是另外一輛車送進來的，他送進來的時候，滿身都是血，一個護士上去把他衣服剪開，一剪開的時候，護士自己也後退了二步。那個護士給嚇怕了，原來那個人的胸口有一個飯碗一般大的洞，這個人不能救了。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政權是用子彈來殺市民的，來打那些沒有武器的人。那天晚上，我被安排在醫院地下室的其中一個房間裏，他們不許我們亂跑，就讓我們在一個房間裏休息。其實我們很慚愧，因為地上全是受傷者，他們沒有一個好好的休息的地方，有的躺在椅子上，或者在地上。可是他們堅持要我們這樣，一個護士說：“你們不要再給我們帶來麻煩，好好地在這裏坐著。”所以整個晚上，我們都不敢出去。到了凌晨的時候，我們實在受不了了，要出去看看。在我休息的房間旁邊，也有一個小的房間，那個房間裏睡著三個很重傷的人。其中有一個我看他剛醒過來，他的面容好象很痛苦一樣，我就跟他說話。他很年輕，好象才十五、六歲，個子很小，我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小陶。”我沒問清楚他全名叫什麼，他祇告訴我他叫小陶，我也不知道是哪個“陶”。他說：“我是跟著北大的人去擋【以上第314頁】軍隊。”我問他，要不要我帶個口信給你爸爸、媽媽。他就說：“千萬不要。因為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的爸爸、媽媽祇有我一個孩子，他們受不了的。請你千萬不要給他們帶這個口信。”

“然後我問他：你怎麼樣？因為我看見他整條腿都斷了，包著紗布，身上也是包著紗布。我問他你怎麼了，他很辛苦地說：“也沒什麼，腿斷了，胸口吃了二顆子彈。醫生說我沒問題，可是我知道，我真的活不了多少天”。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祇管哭，他反而安慰我，“你別哭。”他因為看見我的香港學聯的卡片，他說：“你是從香港來的嗎？回去香港……”對不起，我一定要把他 □

我剛離開那個小房間不多久，有一個很年輕的醫生進來。我們逗留的那個地方，是醫生和護士休息的地方，有幾個護士在那裏坐著休息。一個年輕的醫生進來就哭，他哭著說：“他們瘋了，瘋了，他們全都瘋了。”那些護士問他怎麼了，他說派出去的幾個人都給他們殺了，沒有血怎麼救人。那個年輕的醫生就坐在那裏跟護士們哭著發脾氣。後來有一個老太太，也是一個比較高級的醫生，她就下來命令我們所有的學生說，“你們要馬上走。”那個時候已經是黎明快要天亮了，那個老太太進來就說，“所有的學生可以走的就馬上要走。因為我們接到的消息，軍隊就要進來抓人了。”就要我們走。

我們跟陳清華就打電話給英國領事館。英國領事館說：“對不起，我們管不了。你們就留在你們現在的地方。”我們問可不可以給我們一輛車，他們回答：“沒有可以用的車。你們就留在你們現在的地方。”我們知道我們不能靠他，我們祇能想辦法，看能不能跟我們的同學聯系。

這個時候，我們想在走之前應該做什麼，我們恐怕我們也會被那些軍隊抓去。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名片上，寫了“香港學生李蘭菊、陳慶華被抓了。請馬上通知海外記者。”這句話，大約寫了十多張。我們原定是如果被抓就偷偷掉在地上，讓人們發現。後來我們回到香港以後，西安電視臺播送新聞說：“香港學生陳清華、李蘭菊到處造謠撒謊，攻擊誹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另外，我的包裹面有梁二交給我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件，就是他【以上第315頁】臨走之前，他說他恐怕有危險，就把包裹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一些學生的名單、地址，很多很多你們開會的議程都在裏面。我就跟另外一個同學商量該怎麼辦，我們就怕我們被逮捕以後，這些文件可以拿來作為證物去起訴或去抓一些同學。我們想了半天，決定把這些文件燒掉。可是那些人不讓我們出去，我們就求他們讓我們出去，因為在地下室沒有地方可以銷掉文件。後來有一個護士帶我們到廚房裏面去，我們就告訴那些廚師，告訴他們這些事情。他們就說，都拿來，都燒掉，看他們還憑什麼抓人。這樣把那些文件都銷掉了，梁二知道後一定會很生我的氣。

另外，我的包裹面有梁二交給我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件，就是他【以上第

315 頁】臨走之前，他說他恐怕有危險，就把包裹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一些學生的名單、地址，很多很多你們開會的議程都在裏面。我就跟另外一個同學商量該怎麼辦，我們就怕我們被逮捕以後，這些文件可以拿來作為證物去起訴或去抓一些同學。我們想了半天，決定把這些文件燒掉。可是那些人不讓我們出去，我們就求他們讓我們出去，因為在地下室沒有地方可以銷掉文件。後來有一個護士帶我們到廚房裏面去，我們就告訴那些廚師，告訴他們這些事情。他們就說，都拿來，都燒掉，看他們還憑什麼抓人。這樣把那些文件都銷掉了，梁二知道後一定會很生我的氣。

六月四日中午時分，我們已經通過電話聯絡到李卓仁。李卓仁說他來接我們。因為他比較了解外面的情況，他勸我們不要冒險，他來接我們。我們知道可以走了，我和陳清華每人身上大概有二千元人民幣，我們就把這些錢分給醫院裏面所有那些可以走得動的工人、學生，都分給他們。因為我們走動的範圍不多，我們不能把錢都分了，所以就把剩下一千多人民幣交給醫院一個年輕的醫生，請他看見那些要逃亡的學生或工人就把錢給他們。然後就在下午四點鐘離開醫院，離開醫院以後，回到旅館。六月五日下午，我們跟香港學聯，還有十多個香港的學生和記者就回香港去了。

離開醫院之前，我去那個小房間再看小陶一面，他已經死掉了。這是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死了多久。

注：李蘭菊的見證之後，鑒於與會者情緒波動，大會決定不再在會議期間作屠城見證，建議大家各自寫回憶文章。】

【封從德：六四屠殺過後，你們在復興門醫院知道有二百四十具屍體，是怎么得到這個消息的？

常勁：當時有一個高聯副秘書長，我現在不願意提他的名字，我們當時派一個記者到各個醫院，總共是四十多家北京市的醫院去調查，因為當時有些我們學生是市紅十字會的聯絡成員，就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們曾經給這四十多家醫院打過電話，請求他們緊急動員去救學生。調查以後，當時有很多數據拿上來，我沒有仔細地看數據，我祇看了一下復興門醫院，因為是我們系的同學去調查的，說是二百四十多具屍體。】【以上第 316 頁】

【楊濤*：我補充在六三晚上我看到的學生死亡情況。在廣場西北角有一個帳棚，是紅十字會醫院的帳棚，在這個帳棚因為我有個老鄉他在木樨地中彈。我陪他到這個帳篷裏治療的時候，我看到了在北長安街跟廣場邊緣地方軍隊一開始進來的時候跟學生衝突，糾察隊員向軍隊扔燃燒瓶，軍隊向糾察隊員射擊。我看到許多傷員、中彈的學生被醫護人員救理到，我看到一個學生他所有的內臟都翻出來了，把他放在下面的時候醫生就圍著他，過了五分鐘醫生全部走開，一個醫生從他的褲兜裏掏出學生證放在他的腦袋上，然後就不管他，去看其他輕傷的同學。我覺得很奇怪，我走近他，但是我不敢接觸他。我問醫生有沒有希望，他說，“你看有沒有希望？”然後我就走了。】

5 . 4 撤離廣場（封從德）

5.4.1 口頭表決

六月三日下午兩點鐘，新華門前催淚彈炸響時，我正好在長安街要到林耀強住的北京飯店去。然後他帶著我去北大，去的原因就是香港同學建議由北高聯再派兩個副總指揮到廣場上來，這個事情我和柴玲、李錄都原則上同意，那麼我們就想去請他們。到了北大看見開希、梁二、程真，當時有個戲劇性的印象：梁二騎著車，程真在前面，大林在後面，搭著車在那兒玩兒，我覺得氣氛和廣場不一樣。當時我的印象梁二是北高聯的常委，所以如果師大要出副總指揮的話，我祇能請梁二來作副總指揮，這時開希就說，“我們師大是主席負責制，我現在就宣佈撤銷梁二的常委，我來作。”這樣開希就跟著我們到了廣場。到廣場的時間是六、七點鐘。當時我去北大還有一個原因，是要組織一個新的糾察隊。我當時已經買了三百件北大的T恤——必須要有一套“制服”，有一種威懾力的隊伍才能鎮得住廣場的秩序。（刪三段。）晚上十二點到兩點是轉移財務部，最後我祇領了五千塊錢留給廣場指揮部。廣播站的轉移也是我來作的，直到凌晨兩點鐘。紀念碑當時的混亂情形剛才李錄已經很生動的描述了。然後是四君子來勸退，我們開始都不太信服，認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又犯了，後來發現他們講得還是比較有道理，而且感動了很多同學。這個時【以上第317頁】候就

收槍，當時辛苦繳了一挺重機槍就給砸了，收汽油瓶、收石頭、收木棍，當時有一句話，就是“你要是扔一塊出去，全場同學都要跟著你全死掉”。這是當時非暴力的氣氛。

六月三日下午兩點鐘，新華門前催淚彈炸響時，我正好在長安街要到林耀強住的北京飯店去。然後他帶著我去北大，去的原因就是香港同學建議由北高聯再派兩個副總指揮到廣場上來，這個事情我和柴玲、李錄都原則上同意，那麼我們就想去請他們。到了北大看見開希、梁二、程真，當時有個戲劇性的印象：梁二騎著車，程真在前面，大林在後面，搭著車在那兒玩兒，我覺得氣氛和廣場不一樣。當時我的印象梁二是北高聯的常委，所以如果師大要出副總指揮的話，我祇能請梁二來作副總指揮，這時開希就說，“我們師大是主席負責制，我現在就宣佈撤銷梁二的常委，我來作。”這樣開希就跟著我們到了廣場。到廣場的時間是六、七點鐘。當時我去北大還有一個原因，是要組織一個新的糾察隊。我

當時已經買了三百件北大的T恤——必須要有一套“制服”，有一種威懾力的隊伍才能鎮得住廣場的秩序。（刪三段。）晚上十二點到兩點是轉移財務部，最後我祇領了五千塊錢留給廣場指揮部。廣播站的轉移也是我來作的，直到凌晨兩點鐘。紀念碑當時的混亂情形剛才李錄已經很生動的描述了。然後是四君子來勸退，我們開始都不太信服，認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又犯了，後來發現他們講得還是比較有道理，而且感動了很多同學。這個時【以上第 317 頁】候就收槍，當時辛苦繳了一挺重機槍就給砸了，收汽油瓶、收石頭、收木棍，當時有一句話，就是“你要是扔一塊出去，全場同學都要跟著你全死掉”。這是當時非暴力的氣氛。

侯德建去談判，這裏我再次要強調一點就是，他去談判之前來征求過指揮部的意見，當時至少我親口對他講，“你祇能代表第三方，不能代表指揮部。而且指揮部也沒有作撤的決定的權力，權力在所有的同學。”所以李錄說，“這是最後的營地聯席會議。”這不是代表大會，而是直接大會。最後就變成了口頭表決。我再分析一下作這個口頭表決時的心理狀態。我當時是真的不知道廣場已經被軍人給封鎖了；對當時屠殺的情形我知情；但是沒有很深的感覺。當時為什麼要表決，我是認為經過四君子的勸說，人心已經動搖，那麼鑒於以前我的經歷，擔心同學逃散，在散的時候自己人踩死自己人，讓中共拍下錄像來，看笑話，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口頭表決的結果，我的印象是喊撤和喊留的聲音一樣大。既然已經有一半的人想撤，我就擔心這那種奔散的情況；而且，我還有一種心理判斷，認為喊撤的人不如喊留的人理直氣壯，所以我相信想走的人更多。所以就這樣宣佈了撤。最後指揮部的人和同學一塊走的時候，我們離穿著迷彩服的軍人，不到五米。

【誰砸機槍？（辛苦）】

在海外聽到許多民運人士因為對一些細節的談話來證實自己的身份，這樣就可以進行一些誇張。比如說象絕食四君子的行為，高新出來之後談到一些情況，然後就對學生領袖進行批評。有些批評是中肯的，但是實際上也是一種誤會，彼此之間的不理解。我最後就想講一件事實，就是劉曉波最後砸機槍，借此來證實他們理性和平的爭取，這純粹是胡扯八道。這個機槍是我自己作的處理，我非常明白。那天晚上我已經累的，因為三天沒有睡覺，最後大概睡了三十分鐘被我的保鏢踢起來了，因為實在是叫不醒。我起來之後發覺我的頭下面硬硬的，我問是什麼，他們說是機槍。我一聽，開始還挺高興，盡管我在晚上的時候收繳了第三批武器交給公安局。這個機槍我一檢查沒有槍拴，我說這玩意兒留著我們都活不了命，又不敢抬下去，因為下面已經站滿了軍人。這個時候我就用我們那個小帳篷，是我跟李錄的那個小帳篷裏面的一個小被子把那個機槍裹起

來，李錄的保鏢，我的保鏢和【以上第 318 頁】我自己抬著到紀念碑南面下去直到毛主席紀念堂前，喊一二三，扔到花木叢裏面。因為旁邊兩邊已經站了軍警，我們害怕起誤解活不了。具體時間是在三點四十分左右。】

在海外聽到許多民運人士因為對一些細節的談話來證實自己的身份，這樣就可以進行一些誇張。比如說象絕食四君子的行為，高新出來之後談到一些情況，然後就對學生領袖進行批評。有些批評是中肯的，但是實際上也是一種誤會，彼此之間的不理解。我最後就想講一件事實，就是劉曉波最後砸機槍，借此來證實他們理性和平的爭取，這純粹是胡扯八道。這個機槍是我自己作的處理，我非常明白。那天晚上我已經累的，因為三天沒有睡覺，最後大概睡了三十分鐘被我的保鏢踢起來了，因為實在是叫不醒。我起來之後發覺我的頭下面硬硬的，我問是什麼，他們說是機槍。我一聽，開始還挺高興，儘管我在晚上的時候收繳了第三批武器交給公安局。這個機槍我一檢查沒有槍栓，我說這玩意兒留著我們都活不了命，又不敢抬下去，因為下面已經站滿了軍人。這個時候我就用我們那個小帳篷，是我跟李錄的那個小帳篷裏面的一個小被子把那個機槍裹起來，李錄的保鏢，我的保鏢和【以上第 318 頁】我自己抬著到紀念碑南面下去直到毛主席紀念堂前，喊一二三，扔到花木叢裏面。因為旁邊兩邊已經站了軍警，我們害怕起誤解活不了。具體時間是在三點四十分左右。】

【紀念碑上（梁二）

六四前夕我和馬少方從北京飯店出來，臺灣電視上在當晚有一個臺灣學生跟大陸學生聯歡的活動，馬少方代表大陸學生致了詞。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回到廣場，然後我就看到廣場上秩序很混亂，我見到了李錄和辛苦，當時我不認得辛苦，我記得是有一個收槍的人，所謂的糾察隊長，有一大幫人在那兒。我當時要求進指揮部的時候受到很大的阻礙，但是李錄見到了我們說，讓馬少方和梁二進來，我就進去了。當時李錄是盤腿靜坐，柴玲在哭泣。我當時問他，“你是否有所決定？”李錄說，“現在還沒有任何決定。”我就說現在當務之急是撤與不撤的問題，我和馬少方就是希望有組織地撤。有一個同學進來談到工自聯的

問題，在旁邊插話，我當時就想，工自聯在外圍。李錄說，“我們需要先進入到紀念碑周圍。”第二次進入之後，我又去追問的時候，李錄給我的答復是，“我們有必要把同學聚集到紀念碑周圍，再來考慮撤與不撤，先有組織地集體靜坐在紀念碑周圍。”我覺得他的建議相當好，所以我馬上就同意了。馬上涉及到一個問題，如果這樣一撤下來，工自聯就成為一個孤島，我和馬少方當時就想到這個問題，我們相互交談之後，我記得當時有潘義和李蘭菊，我們一塊到了工自聯。我們與他們交涉的結果是，一個絡腮胡子的人答應，必要的時刻撤退下來。後來我得到一個工自聯來的朋友給我的信息說，他們確實是撤下來了。柴玲的錄音當中我對她進行否認，就是工自聯的人並不是全軍覆沒在那廣場的西北角上。我要證明這點。這個時候我實在找不到封從德，而且也找不到開希、少江，找不著其他的高聯常委，所以我就到紀念碑的第三層去了。

在紀念碑第三層，我與馬少方就遇到了程真。我就發現指揮部已經搬到第三層了，當時是封從德和李蘭菊、李錄，他們都在紀念碑第三層上面，林耀強也在那兒。林耀強是跟我們一塊走的。到底撤與不撤還是沒有定性的回答，在這個時候我和馬少方提議我們作為高聯常委會代表，作為一度的學生組織者必須到廣場的最前沿，我就跟馬少【以上第 319 頁】方坐在最前沿。

在紀念碑第三層，我與馬少方就遇到了程真。我就發現指揮部已經搬到第三層了，當時是封從德和李蘭菊、李錄，他們都在紀念碑第三層上面，林耀強也在那兒。林耀強是跟我們一塊走的。到底撤與不撤還是沒有定性的回答，在這個時候我和馬少方提議我們作為高聯常委會代表，作為一度的學生組織者必須到廣場的最前沿，我就跟馬少【以上第 319 頁】方坐在最前沿。

撤退的時候我們走在最後面，從我們的角度沒看見任何在廣場上的流血事件。在中間的時候我們命令一部分師大的同學獨自撤退，是我給他們探的路，帶頭的人是師大地理系的同學和師大的一位老師，從廣場的東北口出去的，當時我在那個地方探路時軍隊殺死人的現象大約數目應該是三到六個之間。我和朝暉、馬少方走在最後，出去之後，少方就獨自跑了。朝暉在這個時候被人踩住了，我把他拉出來，之後再找少方，他已經不見了。這個時候我就與少江、高新在一塊了，這時碰到林耀強、程真，我們組織隊伍撤退了。這裏我要對高新的一篇文章澄清一個事實，我是在六月四日上午十點才離開前門那個地區的。】

5.4.2 撤離之後

封從德：凌晨七點，到了白塔寺，有四具屍體躺在十字路口，當中一具還在抽搐，我想去救，因為我在前面開路，這時市民就衝過來要揍我，說這些人

是軍人，邊上的護士都不救他，說他們在那個地方殺了四十個人。西單的櫥窗上寫著：“這不是墨，是人血”。（刪八十字。）

沿途，同學們燒了很多挂起來的橫幅什么的，特別是在西苑飯店，上面寫著“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領導”。

然後到了中關村，最後到了北大籌委會，我們在二十八樓，就是沈彤那個屋子裏邊開會，解散我們這個指揮部。分發那五千遣散費時，記得李錄和辛苦各自祇要了二百元。我當時在廣播站向回來的四五百個外地同學宣佈，他們的去向由北大籌委會接待，北大師生已經給大家準備了休息、隱藏的地方。後來見到X，他最後一句話跟柴玲說，“柴玲，你現在的名氣很大；你看著，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之前他建議我們去另外一個學校，說“我們在那裏準備了幾十本護照，有很多知識分子，”我當時非常生氣，一句話也沒有說。（刪八十字。）

我和柴玲發誓：一定要活下去！然後就是北大籌委會給我們五千塊錢和一千外匯券，我們從此開始十個月的逃亡。這十個月的逃亡，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組織來幫助，完全是幫助我們的這些人自己成立了組織。沒有任何海外的一分錢任何一個組織，唯一跟海外接觸就是給【以上第320頁】李錄寫了一封秘密的聯絡信，但是一直沒有回音。

我和柴玲發誓：一定要活下去！然後就是北大籌委會給我們五千塊錢和一千外匯券，我們從此開始十個月的逃亡。這十個月的逃亡，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組織來幫助，完全是幫助我們的這些人自己成立了組織。沒有任何海外的一分錢任何一個組織，唯一跟海外接觸就是給【以上第320頁】李錄寫了一封秘密的聯絡信，但是一直沒有回音。

【常勁：屠城以後北大做的主要工作是疏散的工作。當時廣場上的學生有一部分退到北大，全國各地的學生主要是集中在北大。北大同時還有很多自治機構的重要辦公點，我們就能發錢的發錢，能疏散的疏散。北大籌委會設想是轉入地下，一個是我們分散到各地，一個是重新進入合法的學生組織，進行掩護。在絕食後期我們就開始積累這方面資金，當時北大積攢了相當可觀的一筆活動經費，我們希望轉入地下以後能繼續保持北大籌委會的活動能力。

北大籌委會從六月五日起就不再公開地作各種的反對和追悼活動，我們移權給治喪委員會。治喪委員會是同學自發成立的，彭嶸糾集一幫人自發成立的組織。我們希望他能在校園裏的活動擔當起來，北大籌委會主要是做疏散和內部的轉移工作，當時就是這樣的結局。六月四日北大籌委會每個幹部都有疏散費，有一千塊錢的疏散費，柴玲和封從德到了北大以後，我們同樣給了他們疏散費。

六月四日以後北高聯常委全部失蹤，祇剩下王有才、邵江。北大籌委會在

沒有征得高聯同意的情況下以高聯的名義發布了許多消息，發了許多傳單和公告。六月四日上午在北大二十九樓前面設了一個高聯的接待站，接待那些跟高聯有聯系的需要疏散的人。北大在屠城以後做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關於屠城事件的調查，當時北大聯絡了四十多個醫院，派了二百多個記者，到各個學校、各個醫院去調查死亡人數。當時我確實知道的北大的死亡人數，北大校方給我私下談的是十四個。我自己因為當時負責很多的工作，沒仔細地看，調查結果，復興門醫院一個醫院裏就有二百四十具屍體，其它醫院我就知道了，總共有四十多個醫院。梁二：就剛才常勁提的，從廣場下來的高聯常委的失蹤。

六月四日中午十一點半我到達師大。這之前我曾經送楊朝暉從廣場上撤下來，在十點時進入紅十字會的一個急救站。回到師大之後，遇到一個接待的同學，我就源源本本地談了我在廣場上的所見所聞。之後，遇到馬少方正好來找我。我對馬少方說，我剛才打了很多電話到各校籌委會，都沒找到人。據說主要的領導都撤了。剛好有一個從波士頓打來的電話，說他們在其它學校問了一些人，但都不是自治會的領導。我告訴他，我是剛從廣場撤下來的。講了一下我的身份和在【以上第 321 頁】師大和北高聯的職務。當時我覺得很氣憤的是每一個人都走了，而把我和少方留下。那天晚上，實際上我還騎車到過師大，發現人大和師大的廣播站在那天晚上都還開過，因為有一輛瓦斯車開到師大，要對師大的同學進行鎮壓的時候廣播才撤掉。在這之後我發現，六月三日晚上一些很重要的領導者都已經退離廣場。而且當時的決策者好象還是抱著一種彷徨躊躇的態度，不敢作定論，表明撤與不撤。

六月四日中午十一點半我到達師大。這之前我曾經送楊朝暉從廣場上撤下來，在十點時進入紅十字會的一個急救站。回到師大之後，遇到一個接待的同學，我就源源本本地談了我在廣場上的所見所聞。之後，遇到馬少方正好來找我。我對馬少方說，我剛才打了很多電話到各校籌委會，都沒找到人。據說主要的領導都撤了。剛好有一個從波士頓打來的電話，說他們在其它學校問了一些人，但都不是自治會的領導。我告訴他，我是剛從廣場撤下來的。講了一下我的身份和在【以上第 321 頁】師大和北高聯的職務。當時我覺得很氣憤的是每一個人都走了，而把我和少方留下。那天晚上，實際上我還騎車到過師大，發現人大和師大的廣播站在那天晚上都還開過，因為有一輛瓦斯車開到師大，要對師大的同學進行鎮壓的時候廣播才撤掉。在這之後我發現，六月三日晚上一些很

主要的領導者都已經退離廣場。而且當時的決策者好象還是抱著一種彷徨躊躇的態度，不敢作定論，表明撤與不撤。

李錄：我退到北大的時候，當時看到王有才、常勁也在，這個我能證實。我下午二三點離開的時候，他們還都在。六月六、七、八日的時候，我到北大去的時候就沒人了。最後一次見到的祇有張志勇一個人，王有才已經不見了。他告訴過我，說他一定要堅守在北大的自治會，代表高聯發動全市人民抗暴鬥爭，要堅持到被捕為止。】

【楊濤*：六四之後，我先在北大，後來辛苦找到我，把我帶到李錄的住處，我們住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家裏。後來李錄成立地下指揮部，李錄起草了《廣場指揮部對時局的最後聲明》，我幫助記錄。李錄在出逃前任命我為南下總特派員發展江浙學運，李錄口口聲聲對我說，他到南方取經費，我就等他的經費，結果我等了十多天沒有經費。李錄的通緝名單出來以後，那個知識分子就勸我，“你也別等了，你逃吧。”我的家鄉浙江省政府貼出了一些到京參加學運的名單，到公安局報到，我是第二位，我就決定出逃。】

【李錄：剛才楊濤*提了一下，我任命他作江浙的地下運動的總聯絡人，當時我任命的人可不祇他一個，我任命了好多。很遺憾，這些人都在等我經費。問題是封從德沒有給我經費。】【以上第 322 頁】

六。外地學運

6.1 香港學聯的支持與協調（李蘭菊）

香港學聯開始參加八九民運，是在四二〇慘案後派出的第一個六人赴京調差團。組團有四個動機：一、了解學運性質，是否與八六年學運一樣是無組織、短暫的運動；二、學運的動機是否涉及政治鬥爭；三、找出有代表性的領袖與組織，作為以後支持和捐助的對象；四、了解官方對學運的態度和立場。四月二十日下午到北京，趕及參加四二二悼念胡耀邦。當時，我是隨團秘書，大家非常興奮，有一種中國人血濃於水的感覺。四月二十二日去了北大和北師大，印象中見過常勁等北大同學，可是見不到王丹。北師大見過吾爾開希和梁二等（梁二：還有張軍）。兩個自治會已成立，我們並從同學中了解到，自治會是有代表性的，財務也有一定的監督，有相當的民主基礎。四月二十三日，見了港澳辦和北京宣傳部兩個官員。他們對學生的良好願望表示“理解與同情”，其餘時間都是在打官腔。因為行程緊張，（二十七日必須回香港匯報），我就對見這些官員表示異議，認為更重要的是聯絡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好回香港發動學生與市民支持學運。團長周永恒與學聯秘書長陶君行的回應是：我個人也希望這麼做，可是這不符合學聯交給我們的任務；而且也要考慮北京學生的安全：一旦外部力量加入的話，北京政府就有了借口鎮壓，說學運不是自發的，而是受利用的。——這是根據一九八六年學運的經驗：當時，我們也派人到上海支持，最後總結經驗時，認為是幫了倒忙。所以從一開始，學聯的態度比較審慎。四月二十四日，代表們去見全國學聯，我去北大和北師大。我在北師大見了梁二，拿了他們

的章程和一些選舉資料。會港後，我們就是靠這寫資料初步 認定北京學生是有組織、傾向於民主程序地進行運動的。四二六社論之後，我們有兩個方案：一是馬上返港組織學生與市民支持；二是在廣場拉起橫幅，靜坐絕食，抗議中國政府把學運打成“動亂”。後來在四月二十六日早上，陶君行在北高聯會議上，向北高聯各位代表作了講話：一、希望北高聯盡快發展成有嚴謹架構和紀律 的組織，作為以後民運的基礎。二、問在場的代表：香港同學應作何配合，如物質與其它支援？三、我們正【以上第 323 頁】在考慮延遲離京，——一旦中國政府鎮壓

(逮捕和驅散)，我們馬上會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後來學聯來指示：馬上返港，發動聲援。四月二十七日早晨，我們透過 電臺呼吁到新華社門前示威抗議。兩百多同學參加，已十分矚目，因為大家還要上學，而平時對中國的事又很冷淡。四二七的勝利，震動了整個香港。

香港學聯開始參加八九 民運，是在四二〇慘案後派出的第一個六人赴京調差團。組團有四個動機：一、了解學運性質，是否與八六年學運一樣是無組織、短暫的運動；二、學運的動機是否 涉及政治鬥爭三、找出有代表性的領袖與組織，作為以後支持和捐助的對象；四、了解官方對學運的態度和立場。四月二十日下午到北京，趕及參加四二二悼念胡耀 邦。當時，我是隨團秘書，大家非常興奮，有一種中國人血濃於水的感覺。四月二十二日去了北大和北師大，印象中見過常勁等北大同學，可是見不到王丹。北師大 見過吾爾開希和梁二等(梁二：還有張軍)。兩個自治會已成立，我們並從同學中了解到，自治會是有代表性的，財務也有一定的監督，有相當的民主基礎。四月二十三日，見了港澳辦和北京宣傳部兩個官員。他們對學生的良好願望表示“理解與同情”，其餘時間都是在打官腔。因為行程緊張，(二十七日必須回香港匯報)，我就對見這些官員表示異議，認為更重要的是聯絡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好回香港發動學生與市民支持學運。團長周永恆與學聯秘書長陶君行的回應是：我個人也 希望這麼做，可是這不符合學聯交給我們的任務；而且也要考慮北京學生的安全：一旦外部

力量加入的話，北京政府就有了借口鎮壓，說學運不是自發的，而是受利用的。

——這是根據一九八六年學運的經驗：當時，我們也派人到上海支持，最後總結經驗時，認為是幫了倒忙。所以從一開始，學聯的態度比較審慎。四月二十四日，代表們去見全國學聯，我去北大和北師大。我在北師大見了梁二，拿了他們的章程和一些選舉資料。會港後，我們就是靠這寫資料初步認定北京學生是有組織、傾向於民主程序地進行運動的。四二六社論之後，我們有兩個方案：一是馬上返港組織學生與市民支持；二是在廣場拉起橫幅，靜坐絕食，抗議中國政府把學運打成“動亂”。後來在四月二十六日早上，陶君行在北高聯會議上，向北高聯各位代表作了講話：一、希望北高聯盡快發展成有嚴謹架構和紀律的組織，作為以後民運的基礎。二、問在場的代表：香港同學應作何配合，如物質與其它支援？三、我們正【以上第323頁】在考慮延遲離京，——一旦中國政府鎮壓（逮捕和驅散），我們馬上會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後來學聯來指示：馬上返港，發動聲援。四月二十七日早晨，我們透過電臺呼吁到新華社門前示威抗議。兩百多同學參加，已十分矚目，因為大家還要上學，而平時對中國的事又很冷淡。四二七的勝利，震動了整個香港。

後來在五四，我們發動另一次游行集會。這次有五千同學參加，這是史無前例的。自從七十年代保釣運動後，輿論都說香港的學運已死，而五四的集會令香港的學運“復生”，這是北京學運對香港學運的影響。這以後，香港學聯的工作就主動很多，主要集中在募捐、街頭宣傳北京學運、向國內FAX學運消息、在機場請旅客向國內帶報紙。很多同學主動來學聯參加工作。五月十五日，北京同學絕食第三天，香港同學也在新華社門前發動絕食。另外，十四日，派出林耀強與陳清華組成第二個代表團到北京送錢，記得是四十萬港幣，後來因為與上戒嚴，北京同學怕被捕後錢被充公，所以沒收。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宣佈戒嚴，香港學聯馬上宣佈停止絕食，在電臺呼吁同學去新華社門前集會抗議。呼吁播出不久，香港計程車工會宣佈，郊區的計程車願意免費送同學去新華社抗議。兩千多同學就在三號風球之下，大雨之中，高呼“學生愛國無罪”，“反對鎮壓”，直到兩點多，沒有力氣再喊為止。就在這個晚上，港支聯也初步成立，是全港性質的組織，當時左中右三派，包括臺灣和左派工會的力量都集合在一起。當時學聯也是組織之一，幫助發動了五月二十日八號風球的情況下，兩萬人游行的活動。五月二十一日，香港支聯會有發動另一次游行，就是著名的“百萬人游行”。香港人口為六百萬。五月十八日開始，香港學聯開始派人到國內重要城市串聯，主要是上海和廣州。我也去了廣州，香港學聯和廣州的同學發動了“省港澳大游

行”，在二十二日，約五十萬廣州學生與市民參加。當時，我也是負責人之一，那天越境參加游行的香港同學約兩百多，人數較少是因為要求參加者同意：如果被拒入境，我們就在海關靜坐絕食，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學聯派第三個代表團去北京，我是正式代表。有三個任務：一、送捐款、帳篷和睡袋；二、協調北京學運的派別鬥爭和分裂（這是最困難的）；三、幫助整治廣場混亂的情況。捐款二十萬給廣場物資部，十七萬給北高聯，作為北高聯組織發展、以後領導民運，也包括地下工作的基金。後來程序是這樣：交給物資部的【以上第 324 頁】香港學生黎洪保管，北高聯方面

由梁二按各院校的需要分配。後來因為鎮壓就沒給。其實梁二簽了字，但錢未拿。我不是管財務的，詳細資料在香港學聯都有記錄。為什麼不把錢直接交給指揮部？香港學聯有三個考慮：一、香港學聯討論認為，指揮部沒有基本合規格的民主程序產生；二、香港學聯不承認指揮部是一個有代表性、有嚴謹架構和有監督能力的一個組織，因為它的民眾基礎是流動的，就是說，今天在廣場上的同學，未必就是昨天選出指揮部的選舉人；三、一旦鎮壓，指揮部就會解散，廣場工作人員就沒有一個組織來約束與監督。要強調一點：我們雖然不承認它的合法領導地位，可是我們承認指揮部在廣場上的貢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以後繼續支持物資部（封從德：即香港聲援北京學運物資聯絡站）的原因。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學聯派第三個代表團去北京，我是正式代表。有三個任務：一、送捐款、帳篷和睡袋；二、協調北京學運的派別鬥爭和分裂（這是最困難的）；三、幫助整治廣場混亂的情況。捐款二十萬給廣場物資部，十七萬給北高聯，作為北高聯組織發展、以後領導民運，也包括地下工作的基金。

後來程序是這樣：交給物資部的【以上第 324 頁】香港學生黎洪保管，北高聯方面由梁二按各院校的需要分配。後來因為鎮壓就沒給。其實梁二簽了字，但錢未拿。我不是管財務的，詳細資料在香港學聯都有記錄。為什麼不把錢直接交給指揮部？香港學聯有三個考慮：一、香港學聯討論認為，指揮部沒有基本合規格的民主程序產生；二、香港學聯不承認指揮部是一個有代表性、有嚴謹架構和有監督能力的一個組織，因為它的民眾基礎是流動的，就是說，今天在廣場上的同學，未必就是昨天選出指揮部的選舉人；三、一旦鎮壓，指揮部就會解散，廣場工作人員就沒有一個組織來約束與監督。要強調一點：我們雖然不承認它的

合法領導地位，可是我們承認指揮部在廣場上的貢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以後繼續支持物資部（封從德：即香港聲援北京學運物資聯絡站）的原因。

五月二十五日一到北京，我們就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主要對香港記者。除了解釋我們這次工作以外，也私下對記者要求，在沒有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沒有證據時，不要輕易報道有關貪污的新聞。這在香港是很大的忌諱：幹預新聞自由，懷疑記者對事實的判斷能力。可是，我們考慮到當時不少記者已經有點感情用事，他們對廣場的凌亂場面及學生領袖的態度已非常不滿，而他們的負面報道已引起香港市民懷疑學運的初衷、行為、能力以及整個民運的意義，尤其北京學運內部分裂使輿論批評學生在進行權力鬥爭，學運已經不是那麼單純了。香港學聯與港支聯就因此擔憂學運會因此失敗，這就是為什麼香港學聯與港支聯合力協調學生之間矛盾的原因。記者會上，林耀強的話還沒講完，記者立即反彈，說：你們還把捐款交給學生？有的很激動地說：學生還不撤退的話，祇有死路一條。你們支持他們在廣場逗留下去，等於把這次民主運動推向絕路！記者會後，我們向香港學聯報告這個情況，答復是：先把部分捐款交給北高聯，因為我們一直承認北高聯的領導地位；對廣場的支持，要等討論結果。第二天有答復：按一貫原則，不參加、不過問、不影響北京學生有關撤與不撤等策略性的決定。這是香港學聯參加北京學運的一貫原則。祇是站在人道立場，我們繼續支持廣場工作，於是將捐款交給物資部。後來在廣場做了一個簡單統計：訪問三十位同學，全是外地來的，“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會留在廣場”；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絕回答”；十六人“將堅持留下”。之後就是協調工作，周旋在超華、梁二、柴玲、封從德、李錄幾個人之間。希望你們補充。

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以上第 325 頁】京飯店見了北高聯成員，包括吾爾開希、馬少方、鄭旭光、王丹、楊濤、熊姦、梁二等，後來林耀強請吾爾開希、馬少方吃了一頓飯，這就是“吾爾開希大吃大喝”的新聞來源。這次會後，我們初步了解了北高聯與廣場指揮部之間的矛盾。五月二十九日，我們四代表和岑建勛見了柴玲、李錄、封從德，並嘗試說服他們與北高聯共同管理廣場。五月三十日晚，北高聯王超華、梁二等與指揮部三人，在王府飯店見面。當時有了初步共識。可是，北高聯說，他們還需要回去開常委會通過。六月一日，北高聯常委會否決與指揮部合作，我們非常失望。六月二日晚上，消息傳出，鄭旭光準備帶一隊糾察隊強行接收廣場。我們非常著急，準備去廣場阻止鄭旭光的行動。這個行動如果發生，相信香港的捐款支持可能馬上中斷。正好少年兵進城，我們就沒去□

五月二十五日一到北京，我們就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主要對香港記者。除了解釋我們這次工作以外，也私下對記者要求，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尤其是沒有證據時，不要輕易報道有關貪污的新聞。這在香港是很大的忌諱：干預新聞自由，懷疑記者對事實的判斷能力。可是，我們考慮到當時不少記者已經有點感情用事，他們對廣場的凌亂場面及學生領袖的態度已非常不滿，而他們的負面報道已引起香港市民懷疑學運的初衷、行為、能力以及整個民運的意義，尤其北京學運內部分裂使輿論批評學生在進行權力鬥爭，學運已經不是那麼單純了。香港學聯與港支聯就因此擔憂學運會因此失敗，這就是為什麼香港學聯與港支聯合力協調學生之間矛盾的原因。記者會上，林耀強的話還沒講完，記者立即反彈，說：你們還把捐款交給學生？有的很激動地說：學生還不撤退的話，祇有死路一條。你們支持他們在廣場逗留下去，等於把這次民主運動推向絕路！記者會後，我們向香港學聯報告這個情況，答復是：先把部分捐款交給北高聯，因為我們一直承認北高聯的領導地位；對廣場的支持，要等討論結果。第二天有答復：按一貫原則，不參加、不過問、不影響北京學生有關撤與不撤等策略性的決定。這是香港學聯參加北京學運的一貫原則。祇是站在人道立場，我們繼續支持廣場工作，於是將捐款交給物資部。後來在廣場做了一個簡單統計：訪問三十位同學，全是外地來的，"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會留在廣場"；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絕回答"；十六人"將堅持留下"。之後就是協調工作，周旋在超華、梁二、柴玲、封從德、李錄幾個人之間。希望你們補充。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以上第325頁】京飯店見了北高聯成員，包括吾爾開希、馬少方、鄭旭光、王丹、楊濤、熊焱、梁二等，後來林耀強請吾爾開希、馬少方吃了一頓飯，這就是"吾爾開希大吃大喝"的新聞來源。這次會後，我們初步了解了北高聯與廣場指揮部之間的矛盾。五月二十九日，我們四代表和岑建勳見了柴玲、李錄、封從德，並嘗試說服他們與北高聯共同管理廣場。五月三十日晚，

北高聯王超華、梁二等與指揮部三人，在王府飯店見面。當時有了初步共識。可是，北高聯說，他們還需要回去開常委會通過。六月一日，北高聯常委會否決與指揮部合作，我們非常失望。六月二日晚上，消息傳出，鄭旭光準備帶一隊糾察隊強行接收廣場。我們非常著急，準備去廣場阻止鄭旭光的行動。這個行動如果發生，相信香港的捐款支持可能馬上中斷。正好少年兵進城，我們就沒去□

6.1.1 補充與質疑：

梁二：香港除了學聯以外，還有中文大學與北師大有聯系。四月二十八日到到有俞國濤和潘毅，參加過師大自治會的全會和常委會，不是很滿意。他們參加了五四游行，捐了一萬港幣給北高聯財務部，這樣北高聯有了第一筆海外來款，第一筆正式資金。

常勁：四月二十四、五日陶君行又到了北大，說與統戰部談過了，希望北大籌委會幹部做一個簡短錄音講話。當時我找到郭海峰，他對此事非常不積極，結果只好由我以個人名義作了個錄音。從此，香港學聯與北大再也沒有正式接觸。

辛苦：當時香港學聯都給過哪些組織、多少捐款？給學生領袖個人的錢？

李蘭菊：財務問題我不打算回答。因為不是我管錢。據我了解，香港學聯從來沒有把捐款給個人，都是給他們所代表的組織。給組織祇有兩個：北高聯和物資站。【以上第 326 頁】

張倫：岑建勛是否給過電話號碼以便營救？

李蘭菊：岑建勛的工作我不了解。但我們盡量與同學交換地址電話，準備日後聯絡或鎮壓後提供幫助。

王超華：五月三十日晚，北高聯四人與指揮部四人王府飯店會後，北高聯是否否決了？因為王府飯店會議的一個決議是第二天合開記者會。（封從德：對，而且開成了。）鄭旭光也去了，是我們第二天北高聯常委會上動員大家一塊去的，梁二作了很多說服工作，說香港同學很不容易，一定要給指揮部再一天時間。所以李蘭菊是否記錯了？因為，如果鄭旭光有奪權計劃的話，也是下一天，跟我去公安局有關。我觀察到廣場上糾察隊已經被市民取代等等，然後是六月二日夜裏在北京飯店另一次會，不光學聯，還有潘毅和市民，沒有正副總指揮，但有指揮部秘書處的人。

封從德：六月一日北高聯否決合作案，你的記憶清楚嗎？

李蘭菊：是的。六月一日那天，我們跟岑建勛進了北大，他們開會。梁二過來告訴我們：否決了。

梁二：沒有。我記得六月一日下午，我在師大，超華回來……

李蘭菊：是在北大。

梁二：那天下午我沒去北大。

王超華：那是六月二日。

李蘭菊：我確實是清楚記憶的。

封從德：鄭旭光帶糾察隊準備強行接收廣場是怎么回事？

李蘭菊：當時是梁二來通知我們，說鄭旭光要接管廣場。

柴玲：你們不準備支持指揮部有三個原因。當時其他組織不也是同樣嗎？

李蘭菊：我們沒有對對話團的合法性進行討論，因認為該組織不涉及領導工作；北高聯是我們代表第一、二次赴京所觀察的結論。簡單地說，他們有群眾基礎，是不流動的，有一定基礎上的民主程序。強調一下，這些觀察都是基於北高聯給我們的資料和他們的談話。他們的產生過程是這樣的：由各校經過選舉產生的自治會或學生團體選出代表加入北高聯常委會，再由常委會選出主席。我們認為這是初步成熟的民主程序。【以上第 327 頁】

6 . 2 武漢的學運（蔡崇國）

武漢學運的發起和八六年底的那一次不同，八六年的那一次運動是安徽到上海，然後到北京，接著聽過《美國之音》之後激發起武漢的學生運動。而這次不同的是它是同時開始，四月十六日在武大的研究生院出現第一批挽聯和標語，到十七日標語和大字報就已經比較激烈了。四月十六日也有了第一個花圈，這個花圈是以武大哲學系全體博士生和研究生的名義搞起來的，最早發難的就是武大哲學系博士生和研究生中的共產黨員。（封從德插：是你領頭？）不是我領頭，也不是李海濤，是我們不知道的幾個人。李海濤一開始不知名，後來才出來。第二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八六年是以一、二年級為主，這次一開始就是高年級的學生一齊出來。

我四月十五日以後聽到廣播以後就知道要出事，就到了武大。他們一開始的行動我都沒有介入，十七日就有了游行，開始在校園裏面游行，我參加了，我開著摩托車跟在後面。他們拿著錄音機廣播，特別是我們哲學系的幾個研究生，有一個參加過八六年運動的，大家走到校園門口，整個學校的領導都來勸說大家不要出去，不勸說恐怕大家還不會出去，一勸說大家就一下子出去了。出去以後一路走，一邊商量往哪兒走，抬著三個花圈。最後就到了武昌南站，希望大家把消息帶到全國，武大覺得自己是全國第一批上街游行的，這就是四月十七日到了南站。回去的時候，他們就要去省委，這個時候團委派了幾個人把三個花圈裏面的兩個拿過去，他們來抬，一到了那個地方，他們就到另外一條路點火燒了花圈。我恰恰是開摩托車想要抄近路，親眼看到他們燒花圈。非常卑鄙，是團委學生燒的，大家非常氣憤，以至於把學生中團委代表的家給砸了，因為是他燒的花圈。十七日有一次游行，二十二日有一次游行。

我這個身份比較特殊，我始終是最理性的，但是從來沒有被拋棄掉，因為我是《青年論壇》的創始人之一，很多文章大家也看過。鄧力群特別把我的文章抓住不放，我辦過企業，《光明日報》也刊登過。所以大家認為我是老革命，而且受過迫害，成份好，盡管有理性，也不會是叛徒。這個很重要。其他跟我一起辦過《青年論壇》的知識分子都害怕了，因為他們一旦參與了就是黑手。我是一個老黨員，我【以上第 328 頁】覺得不管我理性不理性，他們都認為我是黑手，

這是沒辦法的。再加上我家裏比較特殊，有一個電話，學生就給我打電話：“我們很害怕，我們知道你很危險，我們只希望你跟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就安全了。

他媽的！你不能拒絕啊！”我當時實際上是很猶豫的。

我這個身份比較特殊，我始終是最理性的，但是從來沒有被拋棄掉，因為我是《青年論壇》的創始人之一，很多文章大家也看過。鄧力群特別把我的文章抓住不放，我辦過企業，《光明日報》也刊登過。所以大家認為我是老革命，而且受過迫害，成份好，盡管有理性，也不會是叛徒。這個很重要。其他跟我一起辦過《青年論壇》的知識分子都害怕了，因為他們一旦參與了就是黑手。我是一個老黨員，我【以上第 328 頁】覺得不管我理性不理性，他們都認為我是黑手，這是沒辦法的。再加上我家裏比較特殊，有一個電話，學生就給我打電話：“我們很害怕，我們知道你很危險，我們祇希望你跟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就安全了。他媽的！你不能拒絕啊！”我當時實際上是很猶豫的。

這之前三月份有個研究生會大會，那個大會我沒有參加競選，但是大家還是把我選成研究生會副主席和博士生會主席。這也很重要，就是我是官方的研究生會的頭。

到了二十二日的游行，我就覺得必須要介入進去。整個武漢市最先動起來的就是武大，整個武漢就看著武大，武大則是看著我們哲學系。我就開始同哲學系的哥兒們開會，講下一步怎麼辦。這樣就避開了官方學生會和獨立學生會之間的衝突。武大在這段時間的組織特點就是這樣。這是二十二日以前。

到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游行的消息傳過來，對武漢的鼓勵非常大。因為我的朋友在北京的很多，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該收手了。因此武漢的學生運動也有些變化，武大我們基本上能夠控制，但是我們疲憊，準備收手的時候，其他小院校剛剛突破團委和黨政機關的封鎖上街，正在勢頭上。因此武大收手，他們形成一個高潮，這又是一個特點。

我們商量，要把學生引導向理性。一個比較重要的活動就是五月三日我們開了一個演講會，由我和李海濤主講，主要是我論證為什麼我們不是動亂，我們的要求是什麼，我們要理性。而且我講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我提出的口號是“誠心與黨和政府合作，解決祖國面臨的危機”，當時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當時全國各大報刊駐武漢記者都在那裏。因此我們就決定五月四日不游行，我們不要再走過頭了。武大學生基本上同意了，少數本科生上街，其他院校的學生上街，武大學生沒有動，武大學生上街基本上是走在馬路邊，不阻礙交通的，也是比較有理性的。

這是一個階段，然後有一段平息。到了五月十四日，北京的最大影響就是戴晴等十二個知識分子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廣播播了。當時我在家不知道，一個電話告訴我，學生統統衝到了省委門口。我就著急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得非常早，去了那裏。一看學生已經坐了一個通宵了，但是沒有多少人。我一種直覺就是下午就會成收拾不了的局面。所以我就和官方學生會和自發學生會的頭一起拿著研究生會的章【以上第 329 頁】子要進省委，希望他們和我們對話。這是

最早開始的對話要求，但是怎么也遞不去。門衛說他祇管看門，不管遞請願書。我說我們不是遞請願書，我們是官方學生會的，跟你們來通報情況。你祇要一出來我們就會跟你們講，他硬是不接。後來我們打了一個電話，信訪局的人來了。我大發脾氣，我說你們的責任心在哪裏？我說你們這樣處理事情，下午你們收拾不了局面。他們非常惱火，說：“你是什么態度？”等。後來他們一聲不吭，記著我們的講話，說下午給答復。我們等啊等，等到下午，沒有東西。全市聞風而動，全部來聲援，覺得武大的學生太偉大了，有上萬學生，全部在市委門口。然後還是等不到他們的答復，學生非常氣憤，就要衝省委，這是五月十五日。我和李海濤，我們全部在那。李海濤這時就演講，最活躍了。我們就阻止學生衝省委。學生就說：“他媽的，我們在這裏沒吃沒喝的，他們在裏面喝茶。”我們說：“學習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啊！他們絕食堅持那么長時間，還在那裏保持理性，你們就耐不住了？”但是學生還是不聽：“那我們堵大橋。”我們還是阻止，阻止不住，他們隊尾變成隊首，轉身上了大橋。

這是一個階段，然後有一段平息。到了五月十四日，北京的最大影響就是戴晴等十二個知識分子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廣播播了。當時我在家不知道，一個電話告訴我，學生統統衝到了省委門口。我就著急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得非常早，去了那裏。一看學生已經坐了一個通宵了，但是沒有多少人。我一種直覺就是下午就會成收拾不了的局面。所以我就和官方學生會和自發學生會的頭一起拿著研究生會的章【以上第329頁】子要進省委，希望他們和我們對話。這是

最早開始的對話要求，但是怎么也遞不去。門衛說他祇管看門，不管遞請願書。我說我們不是遞請願書，我們是官方學生會的，跟你們來通報情況。你祇要一出來我們就會跟你們講，他硬是不接。後來我們打了一個電話，信訪局的人來了。我大發脾氣，我說你們的責任心在哪裏？我說你們這樣處理事情，下午你們收拾不了局面。他們非常惱火，說：“你是什么態度？”等。後來他們一聲不吭，記著我們的講話，說下午給答復。我們等啊等，等到下午，沒有東西。全市聞風而

動，全部來聲援，覺得武大的學生太偉大了，有上萬學生，全部在市委門口。然後還是等不到他們的答復，學生非常氣憤，就要衝省委，這是五月十五日。我和李海濤，我們全部在那。李海濤這時就演講，最活躍了。我們就阻止學生衝省委。學生就說：“他媽的，我們在這裏沒吃沒喝的，他們在裏面喝茶。”我們說：“學習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啊！他們絕食堅持那麼長時間，還在那裏保持理性，你們就耐不住了？”但是學生還是不聽：“那我們堵大橋。”我們還是阻止，阻止不住，他們隊尾變成隊首，轉身上大橋。

這麼一搞，省委的答復馬上下來了。我們提出三條要求。五月十五日外地學生運動的關鍵，在十五日以前，外地學生有自己的訴求，十五日以後，外地的學生，特別是武漢，全部變成了聲援北京的一部分。政府怎麼答應外地學生的條件，學生也不會撤。十五日絕食已經三天了。就是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有自己獨立的訴求。我們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個是對話，第二對話要直播。省委派人來跟我們聯絡，說答應對話，我們就馬上派人去把各個學校的人找來，找了二十幾個人。我們就到省委對面的省教育局去，他們是一群公安幹部圍著三個省委秘書長，有一個很老練，有一個很煩。我說我們先派代表的代表，我和李海濤，就作為這二十幾個學校的代表的代表，先和他們開預備會議。他們就說：“你們必須要撤，撤出大橋，我們才可以對話。”另外一個秘書長不吭聲，他在那兒想。我說：“是不是要撤出大橋才能對話？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現實。”他們還是堅持這一條。最後一個折中方案，馬上開始對話，同時我們去撤出大橋。我提出就是我們派出最精幹的人去撤出大橋，就是我、李海濤，還有其他的幾個人。李海濤當時聲音很啞了，那時候他表現出他的全部激情，他要么不動，要么如猛虎下山。但是他老是說我太理性了，但是我們非常【以上第 330 頁】好，他也不會撤我。其實很多決定是一種感情，再說我的革命歷史比他長了。他在此之前一直作學問，我都沒有想到一直作學問的人那次以後有這種熱情。

這麼一搞，省委的答復馬上下來了。我們提出三條要求。五月十五日是外地學生運動的關鍵，在十五日以前，外地學生有自己的訴求，十五日以後，外地的學生，特別是武漢，全部變成了聲援北京的一部分。政府怎麼答應外地學生的條件，學生也不會撤。十五日絕食已經三天了。就是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有自己獨立的訴求。我們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個是對話，第二對話要直播。省委派人來跟我們聯絡，說答應對話，我們就馬上派人去把各個學校的人找來，找了二十幾個人。我們就到省委對面的省教育局去，他們是一群公安幹部圍著三個省委秘書長，有一個很老練，有一個很煩。我說我們先派代表的代表，我和

李海濤，就作為這二十幾個學校的代表的代表，先和他們開預備會議。他們就說：“你們必須要撤，撤出大橋，我們才可以對話。”另外一個秘書長不吭聲，他在那兒想。我說：“是不是要撤出大橋才能對話？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現實。”他們還是堅持這一條。最後一個折中方案，馬上開始對話，同時我們去撤出大橋。我提出就是我們派出最精幹的人去撤出大橋，就是我、李海濤，還有其他的幾個人。李海濤當時聲音很啞了，那時候他表現出他的全部激情，他要么不動，要么如猛虎下山。但是他老是說我太理性了，但是我們非常【以上第 330 頁】好，他也不會撤我。其實很多決定是一種感情，再說我的革命歷史比他長了。他在此之前一直作學問，我都沒有想到一直作學問的人那次以後有這種熱情。

政府答應了對話、直播，我們就去疏導學生。他們說“我們答應了以後，你保證要撤出學生。”我說，“我告訴你們，這就是你們反對學生組織跨校際的惡果。我可以動員武大學生下來，但我沒有能力動員其他學生下來。因為我們沒有統一的組織，我沒有合法性，因為你們禁止成立這樣的組織。這是你們反對成立獨立的跨校際學生組織的惡果。”當然，這是理論說明，我還是動員去了。他們派了兩輛車，先讓我進警車，我說我進警車去勸學生，學生一看從警車上下來不是便衣警察嗎？我就不答應，進了後面的小轎車。我要警車與我保持非常遠的距離，不要使學生發生懷疑。然後我們過了大橋，過了大橋到了漢口我們才聽說，這邊有人堵了鐵道。我就非常著急，馬上下午李鵬就作了反應，把這作為造成混亂的根據。但是我們完全控制不了，我們祇能控制武大的。我去疏導了很多學生，讓他們撤，我說他們答應了什麼條件，說了一遍，都同意了。大家比較服武大的學生，也有把我圍起來，要揍我，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不象大學生，後來我把學生證給他們看，他們就聽了。實際上大橋好了兩天，又重新堵了，要聲援絕食。那個時候就沒有獨立的訴求，政府答應了一切條件他們還是要堵大橋。

那幾天北京不斷給我打電話，要我去，另一個是我的一本書《從五七年到毛澤東》這本書要出，因為我同戴晴、李銳等出一本叢書，要我去寫前言，然後交付印刷，於是十九日戒嚴的那天我就住進了北大勺園。

在我臨走之前比較有特點的幾件事，第一個是十七、十八、十九日，武漢三鎮沒有一個軍警，一片空城，隨時會有人搶劫而沒有人管。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陰謀，我就逼著武大研究生會的頭頭，他跟官方省學聯有聯系，跟他們講怎么開一個會，要求省政府給我們調汽車、摩托車，配司機，然後我們馬上組織起糾察隊接管城市三天。但是後來我要走了，就參加了省學聯的一個會，是官方學聯的，他們發了一個要求鄧小平辭職的通電到北京。在這之前很多官方的、團委的、學生會的人都勸我要珍惜精英的安全。昨天在勸我，到了十八、十九日，便成了游行的發起者了。所以外地的游行是一開始到四月二十二日【以上第 331

頁】游行的時候人數非常少，很害怕，但到了十五、十七日在北京的精神感染下，誰不游行誰不時髦，變成這樣的一種氣氛。

在我臨走之前比較有特點的幾件事，第一個是十七、十八、十九日，武漢三鎮沒有一個軍警，一片空城，隨時會有人搶劫而沒有人管。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陰謀，我就逼著武大研究生會的頭頭，他跟官方省學聯有聯繫，跟他們講怎麼開一個會，要求省政府給我們調汽車、摩托車，配司機，然後我們馬上組織起糾察隊接管城市三天。但是後來我要走了，就參加了省學聯的一個會，是官方學聯的，他們發了一個要求鄧小平辭職的通電到北京。在這之前很多官方的、團委的、學生會的人都勸我要珍惜精英的安全。昨天在勸我，到了十八、十九日，便成了游行的發起者了。所以外地的游行是一開始到四月二十二日【以上第

331頁】游行的時候人數非常少，很害怕，但到了十五、十七日在北京的精神感染下，誰不游行誰不時髦，變成這樣的一種氣氛。

到了六四的晚上我有了飛機票，本來我準備三日回來，但祇有小飛機，我坐小飛機不行，我祇好乘四日的飛機，三日差點死在長安街上。四日下午坐飛機到武漢，晚上到武大，一到武大他們全把我抓住不放，李海濤抓著我的衣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嘩嘩地掉，祇是說：“你怎麼才回來，回來就好！”然後說整個太亂了，你就回來把大家組織起來。一看學生全瘋了，這是你們很難理解的，就是當時以為沒有被抓、沒死的外地的學生全部死掉了，有飛機在上面飛，北大被炸平了，謠言滿天飛，那些學生完全瘋了。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派人偵察武漢周圍有無軍警，其分布情況。我當時非常簡單，我覺得什麼鬼民主、自由、勝利，都是見鬼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死人了。第二是要與官方建立聯繫，讓他們不要派秘密偵探下來，派秘密偵探下來會全部被殺掉，殺掉以後軍警和學生之間的矛盾就會激化起來，因為當時警察就認為武大的學生夠哥們，我們抓了他們一個秘密警察，就把他送回去，沒有打他。其實在北京、在武漢都是這樣的結束，各自的肉體的結束，激發起相互的仇恨，導致一個政府和學生誰都無法預見、誰都不願意看到的後果。第三個就是把學生穩住，讓大家把心裏的東西渲泄出來，然後我要告訴大家任何請願、犧牲都不會有效果的，北京的學生已經幫我們做了，你再死就象死一條狗一樣。所以海濤他們首先提出開一個追悼會，希望我講一下在北京的見聞，我答應了。

在我離開北京之前，我給北京中央一個副委員長的兒子打了一個電話，他是我同學，我們關係非常好。我就說：“你們他媽的怎麼搞的，你們可以用高壓水龍頭，催淚瓦斯嘛，你怎麼用坦克壓死人。”他說“你親眼看見的？”我說：“

我親眼看見的。“我以前做過他們的黨支部書記，我不會撒謊的，他也相信了。我說：“你們怎么能壓死那麼多人？”他第一個反應是：“我告訴你，你看見的，你千萬不要說，你說了就完了。”第二句話就說：“北京沒有高壓水龍頭啊！”所以我回來就跟他們講。我們開了一個追悼會，真是非常感人，成千上萬的人，一開始講“血債要用血來還”那些東西，李海濤有一個講話，我也有一個講話。我就講北京坦克壓死人這些事情，我把最殘酷的情景給大家一抖，“我看你們還死不死”，把最殘酷的事情一說，大家覺得再死就沒有意義了。然後我就說我比你們年紀大，我就跪【以上第 332 頁】在臺上去了，我說你們一定不要。然後再有人喊“血債要用血來還”，基本上沒人響應。這種活動持續到了六月十一日。武漢學運我就只能講這些。

在我離開北京之前，我給北京中央一個副委員長的兒子打了一個電話，他是我同學，我們關係非常好。我就說：“你們他媽的怎麼搞的，你們可以用高壓水龍頭，催淚瓦斯嘛，你怎麼用坦克壓死人。”他說“你親眼看見的？”我說：“我親眼看見的。”“我以前做過他們的黨支部書記，我不會撒謊的，他也相信了。我說：“你們怎么能壓死那麼多人？”他第一個反應是：“我告訴你，你看見的，你千萬不要說，你說了就完了。”第二句話就說：“北京沒有高壓水龍頭啊！”所以我回來就跟他們講。我們開了一個追悼會，真是非常感人，成千上萬的人，一開始講“血債要用血來還”那些東西，李海濤有一個講話，我也有一個講話。我就講北京坦克壓死人這些事情，我把最殘酷的情景給大家一抖，“我看你們還死不死”，把最殘酷的事情一說，大家覺得再死就沒有意義了。然後我就說我比你們年紀大，我就跪【以上第 332 頁】在臺上去了，我說你們一定不要。然後再有人喊“血債要用血來還”，基本上沒人響應。這種活動持續到了六月十一日。武漢學運我就只能講這些。

6 . 3 湖南學運（劉衛）

(1) 學運前的氣氛

湖南師範大學是一個比較有鬧事傳統的學院。八零年與胡平等入搞校園民主的同一時期，師大也有類似的行動。有六十多人參加絕食，最後以餓癱，被軍警強制抬走而結束。當年參加的兩個領導人一個叫梁恒，現在在美國。另一個被判了四年徒刑，後來出來了，在學運中我還碰到這個人。這以後師大留下了這種傳統。學運骨幹以學生社團的形式一直在搞活動，一直延續至今。再就是中南工業大學的民主學生會。在八七年的時候，團中央有一陣子搞校園民主建設，湖南就在中南工業大學搞試點，搞民主選舉學生會，而民主學生會真就是這麼選出來了。學運中，曾經有一件在全國影響比較大的事。四月二十五日全國學運開始以後，中南工業大學的學生會於四月二十九日召開會議參加學運，七個系的學生會主席和研究生會主席參加會議，院學生會主席主持會議，討論是否參加學運。院學生會主席叫範忠，後來是湖南高聯的頭之一。研究生會主席盧志清是我們核心人物之一，也是頭。整個湖南的各個大學在中南工業大學的之後，在八八年幾乎各院都開始了民主選舉學生會。所以在學運中，湖南高自聯的頭頭幾乎全是學生會的原班人馬，而且各校自治會，也就是學生會，這樣的組織基礎使學運運行較有條理。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岳陽發生過一件事，湖南省撤銷了岳陽市一個民選的副市長，市民不接受，就上街游行。這件事擴散得比較小，後來新華社記者和湖南省的記者發了一個號外，但是他們沒有力量將之散發到社會上，但在學生中間得以流傳，開始了對這件事的討論。最後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寫了一個長篇報告文學，但已經印好的刊物被禁止發行。在學運前，這本刊物到了我們手中。

還有楊匯泉的事情。楊匯泉是湖南省副省長，這個人貪污很厲害。他去廣州吃飯，一頓飯吃了四千多塊錢。而這個單據讓新華社的一【以上第 333 頁】個記者拿到了，並傳到了學生手中。這些事件正好發生在兩會到學運前的這段時間，為學運醞釀了氣氛。

還有楊匯泉的事情。楊匯泉是湖南省副省長，這個人貪污很厲害。他去廣州吃飯，一頓飯吃了四千多塊錢。而這個單據讓新華社的一【以上第 333 頁】個記者拿到了，並傳到了學生手中。這些事件正好發生在兩會到學運前的這段時間，為學運醞釀了氣氛。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死的當天，幾乎與北京同時，湖南師範大學就開始貼出大小字報了。第二天一早，師大學生會那邊打電話過來說，你們得趕緊行動。我說，工院很困難。學運之初，湖南的工科院校是落後的。

(2) 湖南學運的成長和湖南特色

學運的成長主要是以文科為頭。從四月十五日貼大字報到四二二游行砸了一條街。四月二十六日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湖南就開始游行，大約四千多人，以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為主，這時各校學運骨幹開始進行串聯并集會，提出湖南學運要有湖南特色，就是民主學生會。搞清一二二四事件，就是湖南岳陽的事情，還有楊匯泉的事情。但是我們還是學著北京同學的樣子要求與省政府對話，省政府，省委也在四月二十七日與學生代表進行了一次對話。

四月二十五日中南工業大學七個系學生會主席會議之後，我們又在岳麓山上開了第一次麓山會議，公安局叫清石坡會議。會上就有人提出政治特區理論，就是要配合北京的學運，也考慮湖南的情況，我們不能跟著北京走得太遠。因為北京的同學素質比較高，湖南同學相對差得多，所以讓北京當頭擔風險，而我們在後面給自己修堡壘。所以就提出先把湖南的大學變成政治特區。

五月四日北京復課，我們就很失望。因為北京如果不復課的話，湖南政府就有一種來自北京學運的壓力，他就必須給我們的活動空間再作出一些讓步的範圍。雖然我們並不主張罷課，但是北京逐漸開始復課，就沒有給我們擋風的牆和先鋒了。我們就更加回到特區理論上去，就是還是在學生會裏搞，不出去。還制定了一個方針，就是參加學生會的人，最好不要全暴露。尤其是象工科院校的，本來群眾基礎就不好，就不要太露面。將來反復的時候，也好由我們來接替。因為將來湖南的學聯還會由我們中間產生。

五月十三日北京開始絕食，我們就感覺到氣氛不對了，就是一定要與北京保持某種配合。這時出現兩種意見，清石坡會議上就開始吵得很厲害。有人提出一定要與北京一起幹；另外一方提出來，我們還【以上第 334 頁】應該堅持我們的東西。

五月十三日北京開始絕食，我們就感覺到氣氛不對了，就是一定要與北京保持某種配合。這時出現兩種意見，清石坡會議上就開始吵得很厲害。有人提出一定要與北京一起幹；另外一方提出來，我們還【以上第 334 頁】應該堅持我們的東西。

五月四日，我們就和黃泥街上的印書販子進行過接觸，唐伯橋負責這一接觸，由我們提供政治性的文章，他們印刷，出賣，掙得的錢對分。因為印書販子很看好政治市場，認為一定能夠掙錢。文章我們已經組好了，出版也聯系好了。所以我不太同意與北京一起幹，與同學接觸後改變了這一觀點，認為不幹也得幹，如果你不幹你就被人全拋棄了。因為五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中間，學校裏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砸瓶子、燒床單，扯著嗓子喊。後來在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骨幹一對一地談話，最後集合觀點得到一個結論：幹吧！為了考驗工科的實力，決定在五月十五日晚上由工科院校先組織一次游行。結果這次游行勉強湊成，出來一千多人。為什麼在晚上呢？因為學生都怕老師，怕校方。晚上呢，看不清，鬧也鬧了。這是工科院校的第一次獨立行動。

五月十五日游行成功了，十六日就開始了全高聯的行動。在這之前討論了怎樣成立湖南高聯的事情。但是不成立組織，祇列出章程。把章程用傳單的形式向全市各校散發。有章程無組織，在學運中產生學生領袖，這是我們當時的方針。

五月十六日中午宣佈高聯成立。但誰是高聯呢？沒有，大家回去選吧！最後高聯還是落在我們身上，因為會議是我們組織的，同學就選了我們。從五月十六日到六月四日，省政府辦公樓讓我們占領了，高聯就在省政府裏辦公。

五月十六日游行時提出了一個橫幅，叫做“邦柱，不見不散！”邦柱是湖南省民選的省長，剛選出來的。湖南省人大剛開完，選了陳邦柱，罷免了楊惠泉。這是在學運中的事情。當時我們以為他不回來的，結果五月十七日早晨陳邦柱來了，不光他來了，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人大主席劉復生也來了。來了說，對話吧！這是早晨兩點多鐘的時候，他們到省政府來了，因為學生把省政府占了。結果大家就說，趕緊湊人去。後來廣播裏叫我，為什麼叫我呢？因為在十六日游行時局勢非常難控制，是我把會場控制住了。我到會場對話正在進行。講是對話，可事實上卻什麼都沒準備。叫了幾聲口號，省長就說，“你們在胡鬧。”我們就說，“你們沒誠意，不轉播。”我們就跑出來了。省長說把門關住，不讓他們出去。我們還是跑出來了。實在是我們沒準備。

十九日凌晨，我們收到北京高聯的兩份電報，說是北京停止絕食【以上第335頁】了。一份電報說同學們回校上課，一份說堅持戰鬥，即不回校，堅持靜坐。當時省辦公廳的副主任那邊給我們通知說，同學們，你們勝利了！回去吧，北京同學停止絕食了。同學就走了一半。我們就拿起話筒來說，堅持鬥爭，別走。我們收到電報說不是那麼回事。這時湖南警備區的通知來了，晚上兩點清場。

十九日凌晨，我們收到北京高聯的兩份電報，說是北京停止絕食【以上第335頁】了。一份電報說同學們回校上課，一份說堅持戰鬥，即不回校，堅持靜坐。當時省辦公廳的副主任那邊給我們通知說，同學們，你們勝利了！回去吧，北京同學停止絕食了。同學就走了一半。我們就拿起話筒來說，堅持鬥爭，別走。我們收到電報說不是那麼回事。這時湖南警備區的通知來了，晚上兩點清場。

我記得很清楚，在火車站廣場剩了十九個人，在省政府剩了三百來個人。這些人說，“我們不走，準備為革命犧牲了。看你們把我們抓起來。”就在那兒唱《國際歌》。結果警車來了，轉了兩圈，沒抓我們。到五月二十三日早上，留下來的三百個人和火車站廣場上的十九個人就成了英雄了，以後高聯的骨幹就是這些人。

(3) 北京來的四個通知

五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二十八日，我們曾經收到了四個通知。第一個是五月二十二日從北京傳過來說是在搞勝利撤退。我們說，就和北京一樣勝利撤退吧。可第二天得到通知，要堅持鬥爭，我們已經把勝利撤退的事情布置下去了，結果又要堅持鬥爭。那只好堅持鬥爭吧。這通知搞得我們很慘。五月二十八日又接到一份通知，也是撤退。當時我們并不知道北高聯和廣場指揮部是什麼關係，在我們的印象中，北高聯是最高的領導，廣場指揮部是北高聯設在廣場上的指揮部。所以這些矛盾的通知搞得我們很莫名其妙。我們每天派一個人去北京，一個人回來，每人祇呆一天，是高聯出錢派去的，任務是傳遞消息。當時我們手上的捐款最多的時候有十二萬。不過，學運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得到的捐款都送到北京去了。五月二十八日又接到一份通知，說撤退。

過以後，借五月二十八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遊行中拉出兩條大橫幅，一條橫幅是“感謝長沙市人民，我們打擾你們了。”第二條是“勝利大撤退”。發了一份宣言，是知識分子給我們起草的，有一句話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船已經出發，前面的路正長。我們年青人繼續向前吧！”到了晚上又接到北京通知，又要堅持鬥爭，而且要動員工人們罷工，當然又是開會爭論。到了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得出結論，還是撤吧。撤的理由是我們不能再聽北京的了。當時還有一個爭論：我們要不要介入黨派之爭？我開始是堅持和改革派聯合的，到後來我說，“別聯合了，你看北京和改革派也配合不起來。”我【以上第 336 頁】提出學運和黨派

之爭劃清界線，我們作我們該作和能作的事情。後來我們這方的觀點占了上風。湖南省電視臺採訪我們，問我們為什麼撤退。我的回答是，中國學運現在已經導入一個不好的方向，就是學運被黨派之爭誤導。所以我們決定在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回校繼續堅持我們的鬥爭。這樣就開始撤退。

過以後，借五月二十八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遊行中拉出兩條大橫幅，一條橫幅是“感謝長沙市人民，我們打擾你們了。”第二條是“勝利大撤退”。發了一份宣言，是知識分子給我們起草的，有一句話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船已經出發，前面的路正長。我們年青人繼續向前吧！”到了晚上又接到北京通知，又要堅持鬥爭，而且要動員工人們罷工，當然又是開會爭論。到了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得出結論，還是撤吧。撤的理由是我們不能再聽北京的了。當時還有一個爭論：我們要不要介入黨派之爭？我開始是堅持和改革派聯合的，到後來我說，“別聯合了，你看北京和改革派也配合不起來。”我【以上第 336 頁】提出學運和黨派之爭劃清界線，我們作我們該作和能作的事情。後來我們這方的觀點占了

上風。湖南省電視臺採訪我們，問我們為什麼撤退，我的回答是，中國學運現在已經導入一個不好的方向，就是學運 被黨派之爭誤導。所以我們決定在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回校繼續堅持我們的鬥爭。這樣就開始撤退。

因為我們五月二十八日的游行氣氛造得不錯，另外湖南學生為聲援北京同學，也有人絕食，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四百多人，絕食結束以後，我們採取換班靜坐制，由大學校各校出一百，小學校每校出四十，保持在省政府廣場上有五百學生。五月二十九日我們不派出接班的人，這樣廣場的人就減少，在由高聯的頭頭出面挨個的勸。當時廣場上只剩二百來人，我們十幾個頭頭挨個地勸，就都給勸回去了。不過，撤退的過程中還是出了事。

五月二十九早晨的時候，湖南中醫學院的學生在火車站廣場自焚，他說，你們都撤了，但我是最革命的，我自焚。他弄了一桶油，他找到一輛汽車要油，那個車是 柴油車，那個司機還挺支持他的，也不知道他要油幹什麼，就給了他一桶柴油。結果他弄了一些紙堆在一起，把柴油倒上去點著自己蹦進去了。一蹦進去，身上就著了。周圍的同學就把他搶出來，因為是柴油，燒得不旺，把他救了下來。

六月四日北京發生屠殺，同學象瘋了一樣，不知幹些什麼好，就把鐵路給斷了，其實鐵路在此之前已經中斷過兩次，鐵道學院的學生把鐵路扒了，扒得特快，兩分鐘就把鐵路扒開了。然後把全市的交通堵了，堵了三天卻沒人來鎮壓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敵人是誰，就開始討論誰是我們的敵人，討論來討論去找不到敵人是誰。

六月七日晚上北京南下特行隊提出來，北京以及全國的形勢已經不行了，我們要轉入地下。在學運中我們發現，全國學運不配合，如果配合的話，形勢會好一些。北京的同學就提出來搞一個全國高聯。我們當時就附議，為什麼呢，因為六月八日的時候，湖南高聯還打著牌子存在，從全國各地來了很多學生，都自報是各地學生 領袖，好象組織全國高聯的基礎也存在，所以我們就同意了。怎麼樣宣佈全國高聯的成立呢？一定要有一次公開的集會。這次集會就是六月八日長沙火車站廣場上的 追悼會，我在會上致悼詞，我看到廣場上都是人，而且全國各地來往的遊客，因為火車斷了，全集中在那裏，大概不下二十萬人。會上我們宣佈成立全國高聯。宣佈 以後，當天晚上中央電視【以上第 337 頁】臺廣

播北高聯是反革命組織，我們一想我們也就是反革命了。擋風牆沒有了，大家全罵了，溜吧。

六月七日晚上北京南下 特行隊提出來，北京以及全國的形勢已經不行了，我們要轉入地下。在學運中我們發現，全國學運不配合，如果配合的話，形勢會好一些。北京的同學就提出來搞一個全國高聯。我們當時就附議，為什麼呢，因為六月八日的時候，湖南高聯還打著牌子存在，從全國各地來了很多學生，都

自報是各地學生領袖，好象組織全國高聯的基礎也存在，所以我們就同意了。

怎麼樣宣佈全國高聯的成立呢？一定要有一次公開的集會。這次集會就是六月八日長沙火車站廣場上的追悼會，我在會上致悼詞，我看到廣場上都是人，而且全國各地來往的遊客，因為火車斷了，全集中在那裏，大概不下二十萬人。會上我們宣佈成立全國高聯。宣佈以後，當天晚上中央電視【以上第337頁】臺廣播北高聯是反革命組織，我們一想我們也就是反革命了。擋風牆沒有了，大家全焉了，溜吧。

6 . 4 西安、蘭州兩地的學運（辛苦）

我主要講西安、蘭州兩地的學運情況。運動的發生絕不僅僅是悼念胡耀邦，我是八五級的，我入校之後，幾乎每個學期都有一次運動，每次“一二九”前後，蘭州大學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情緒的發泄或是有運動的趨勢，苦於沒有很好的誘因，所以一直都是小規模的小打小鬧。

胡耀邦死後，開始大家對胡耀邦的去世並不是特別的關心，當然大家對他在七九年作的反正工作和他的廉樸作風也有印象，就參加了悼胡行動。我們學校在此之前已經有過游行，四月二十一日舉行了胡耀邦追悼大會，是由校方舉辦的。但是晚上十二點之後，各個宿舍的學生突然開始了騷動，最後發出各種吼聲。學校領導趕到 研究生樓前進行勸解，說你們不要鬧事，歷次鬧事都沒有好結果。一解說更激起了同學的憤恨，這時“嗷嗷”聲更高了。女生宿舍十一點半後關門，很多人就都到女生宿舍前呼喚女同胞出來。二十分鐘之後，看門的不得不把大門打開。這時大家都聚集在二號研究生樓前，就有人在上面散放白紙片，撿起來一看是白紙，實際上沒有人敢做任何事情。後來學生們對學校領導的勸說更加惱火，他們就出發游行到省政府門前去。每次運動都有便衣跟著，那次集會過程中曾經有十幾個便衣，他們穿著清一色的青黑色的制服，帶著同樣的墨鏡。在學生游行到廣場去之後，大概有五百多人。學生說，我們應該開始建立一個組織，能夠保證在每次運動之後學生受到 迫害進行自我保護。就由各系派出代表，每個系有兩個代表，組成了一個五十多人的初步的自治會，後期自治會進行了完善，這就形成了蘭大自治會。因為“四二六 社論”涉及到西安和長沙的學生運動，我想在這裏我有義務和責任對四月二十二日所謂的“打砸搶”事件進行明了。四月二十二日前，西安交大、西北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都進行過多次的游行。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多西北大學和西安交大從西安的西南角出發到新城廣場，就是省政府所在地，進行游行。

新城廣場案純粹是由軍方引起，所謂打砸搶實際上是由軍警引起的。所謂燒車事件是由兩個小孩，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以上第338頁】五歲，他們燒的。

(封從德插：這是你經歷的嗎？不是親身經歷的不要講。)這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但是我的同學的家長就是進行審判的法官。當時是兩個小孩引的火，之後有三十八人被抓，其中沒有一個是學生。四二六社論提到這個事件，大肆喧嚷，造成對學生運動的污染，西安各校的學生都分別進行過抗議，他們貼出大量大字報，要求《人民日報》進行是非的爭辯，同時要求廣播電臺進行如實的報導。當時我在西北大學和西安交大，這些大字報我都看到了。

新城廣場案純粹是由軍方引起，所謂打砸搶實際上是軍警引起的。所謂燒車事件是由兩個小孩，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以上第 338 頁】五歲，他們燒的。(封從德插：這是你經歷的嗎？不是親身經歷的不要講。)這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但是我的同學的家長就是進行審判的法官。當時是兩個小孩引的火，之後有三十八人被抓，其中沒有一個是學生。四二六社論提到這個事件，大肆喧嚷，造成對學生運動的污染，西安各校的學生都分別進行過抗議，他們貼出大量大字報，要求《人民日報》進行是非的爭辯，同時要求廣播電臺進行如實的報導。當時我在西北大學和西安交大，這些大字報我都看到了。

五月一日出於對“四二六社論”對“四二二事件”歪曲報導的抗議，以及對“四二九對話”缺乏誠意的抗議，西安的學生提出罷課。我對此非常清楚。是有西工大八八級的學生發起，當時周封鎖和一些北京來的同學也都在，幫助西安同學組建了西安學生團結聯合會。據我所知，在此期間存在好幾個學生團體，包括學生團結會、新學生會、五四學生會。我去參加了一個會，是新學生會向原來校方的學生會挑戰，要求進行普選，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五四西安游行的情況，游行秩序非常好，當時有上萬多軍警包圍了新城廣場，在廣場內看不到，他們在廣場外拉起了四道防線，當時必須憑學生證才能進入。在學生中我感到很安逸，中間我曾經出來，給我們學校打了一個電話，在要進去的時候，我就感到非常危險，學生完全被軍警同群眾隔離開來了。學生游行到新城廣場後，向市政府遞交了抗議信，同時還有請願書和要求對話的七項條件，這個和北京的七項條件大同小異。

五月九日蘭州大學的一千三百多名學生游行到省政府前，要求當地政府與學生組織進行對話。蘭州大學在歷次學生運動中都搞得非常轟轟烈烈，他們從四月十九日到五月九日已經進行了七次游行，在五月十一日他們終於與甘肅省達成了一次對話。對話由甘肅省副省長還有當地人代會的委員在蘭州大學的禮堂裏進行的，我當時對對話的內容本身不感興趣，但對對話的情況很感興趣。他們達成了一項協議，以後繼續進行深入的對話。就在學校裏建立了對話組織，是有學生自治會代為建立的。

絕食之後，五月十六日在蘭州東方紅廣場有十萬人舉行了誓師大會。在此之前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實際上十五日報名參加到北京的絕食，聲援

北京學生 的絕食。當時我們學校有二百多人報名，篩選出十名帶團到北京絕食，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天的游行中我開【以上第 339 頁】始 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影響，當時我的情緒非常悲哀，我覺得絕食本身是用生命來換取一種東西，而這種東西是沒有價值的，是沒有物質代價的，我在演講中說，“市民們，同胞們，我們今天所作的一切是為了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能有一點希望，我們到北京去絕食是為了看看這個民族還有沒有一點希望，想想七十年前五四 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至少還能排在十幾名的前列吧，可是今天我們已經排到一百多名。我知道我們今天作的這些是沒有希望可能成功的，因為多次的學生運動 沒有取得成功的，但是我們希望五十年後、七十年後我們能夠有一點影響。。五月十六日誓師大會後我和新聞系的一個學生，帶領了一個六十九人的絕食代表團，我和另一個學生各帶三千餘捐款分赴北京進行絕食。到達北京後，曾經向北大的募捐站捐出來兩千，剩下的是留著備作絕食學生的急需。

絕食之後，五月十六日在蘭州東方紅廣場有十萬人舉行了誓師大會。在此之前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多人，實際上十五日是報名參加到北京的絕食，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當時我們學校有二百多人報名，篩選出十名帶團到北京絕食，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天的游行中我開【以上第 339 頁】始 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影響，當時我的情緒非常悲哀，我覺得絕食本身是用生命來換取一種東西，而這種東西是沒有價值的，是沒有物質代價的，我在演講中說，“市民們，同胞們，我們今天所作的一切是為了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能有一點希望，我們到北京去絕食是為了看看這個民族還有沒有一點希望，想想七十年前五四 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至少還能排在十幾名的前列吧，可是今天我們已經排到一百多名。我知道我們今天作的這些是沒有希望可能成功的，因為多次的學生運動 沒有取得成功的，但是我們希望五十年後、七十年後我們能夠有一點影響。。五月十六日誓師大會後我和新聞系的一個學生，帶領了一個六十九人的絕食代表團，我和另一個學生各帶三千餘捐款分赴北京進行絕食。到達北京後，曾經向北大的募捐站捐出來兩千，剩下的是留著備作絕食學生的急需。

五月十七日，西安有二百五十人在新城廣場省政府樓前絕食，同時在鐘鼓樓前有一百多人絕食，蘭州有三百多人在省政府門前絕食。

天安門廣場上各校的情況。僅蘭州大學就有一千四百多名，原來的我們帶領的甘肅十三所大學已經不可能進行大的聯合管理工作，我就祇能對我們學校進行管理。我們自己在廣場上設立了供給、聯絡、宣傳和糾察系統，後來成立的西北狼糾察隊中蘭大的學生占了主流，還有甘肅工業大學、甘農大的同學。我們在廣場上的學生完全是一種自治的情況，我們的代表是由在場的學生選出來，我們每天和我們本校的自治會有熱線電話聯繫。我們學校有四個電話線，一個是七號樓，是八五級學生樓前的一部電話，兩部研究生樓前的電話，一部女生樓下的電話。七號樓的電話專和北京聯繫，研究生一號樓的電話專和北大籌委會熱線聯繫，這是從四月二十五日就已經建立起來，我們對北京的消息非常靈通，研究生二號樓前的電話是和西安的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有熱線聯繫。我們每天向學校報告當天在廣場上發生的情況和我們自己的情況，請示學校自治會對我們決策的意見。在營地聯系會議上學校的代表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證明，我們蘭州大學的學生代表完全是有代表性的。【以上第 340 頁】

七。回顧與反思

7 . 1 總體補充：動機與局限 < 參：7.2 公開討論

>

王超華：我認為我實際上不可能把所有有意義的事情都講出來，所以我就改變議題，和我這個提綱沒有關係。

在我整個的回憶中，聽說有人說我沒有講清大綱什么的，經常局限在細節上，這和我開會以前在籌備這個會的時候我的基本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我在和封從德多次通電話的時候我就說過，我祇提供細節，我祇希望核對事實和細節，任何總結性質的我都不願意參與。這個會包括一開始的預備會議，一旦提到總結，一旦提到歸納，我就準備不參加，我不批評其他人這種態度。所以我認為，如果我給出一個北高聯的脈絡，這本身就是我在為北高聯作總結，我承擔不起這個責任。一般來說，我祇對我認為必要的幾個事件，包括我覺得可能祇有我知道的事件，即使是這樣的事件我也祇能給出一個粗略的敘述。這是我的敘述態度。

柴玲講到她參加運動的動機，她昨天晚上對我特別地表示了一下，不是對我個人有意見，而且希望我也講一下我的動機。我本人祇是提供事實，我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我也祇能是被別人研究的對象，不管我是經歷了這件事還是沒經歷。在以前我個人也是覺得輪到我要作這種表白自己的時候，我會有一種非常不好意思的感覺，我個人性格上不習慣作這樣的事。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也有必要說一下，我祇能說是就著他們談到的一些相關的來對比著講。

四月二十日在我們學校學術討論會上我還否認學運對歷史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已經跑去當我們學校代表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四月二十一日晚上看到學生糾察隊這麼有秩序，我就想到這次學生運動可能會取

得一些實際效果。所謂的實際效果，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可能出國。雖然我參加我們學校英語中心學過一年，祇要具體想到的話，我就覺得我這個人沒有這個可能。可是三十多年的歷史，我親眼看著一代人、一代人因為肯定自己的熱情和動機而【以上第 341 頁】帶來根本沒法預測的後果，多少年的青春過去，你想再重新學習什麼都是不可能了，我就想著，不管是什麼動機，哪怕是取得一點成果也是好的。我在四月二十一日晚上第一個念頭已經想到了請徐四民辦報這種事，因為這一年，《東方記事》的出版跟戴晴他們發表儲安平的文章和林培瑞講方勵之赴布什宮的文章都是有關係的。我就想到象這樣我們臨時出了一個雜誌，趕緊發兩篇文章就被共產黨封了。我們有一個民族與文化的研討班，上了一年就都在討論這些事情。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就是思想自由，我們最感覺不好的就是思想不自由。我們希望哪怕學生運動給我們擴展一點點生存空間，我們在中國活得稍微好一點，能夠有可能說出我們想說的話，實際上這些啟蒙運動才有可能持續下去。我在運動自始至終一直講我們有可能得到什麼？我們有可能鞏固什麼？是不是能給我們的社會一點進步？這是從五月六日開始我接觸新聞工作者就開始非常驚訝的，因為他們情緒非常樂觀。這是我極力要加入到學生組織中，希望鞏固學生組織的一個原因。祇有介入才能幫助它，祇有參與才能使它鞏固。絕食開始之後我是非常絕望、悲觀的態度，我和趙瑜曾經爭論過，這也是和許多知識分子一個最大的差別。從那個時候我碰到重要人介紹情況總是忍不住流眼淚，我覺得沒有辦法了。

四月二十日在我們學校學術討論會上我還否認學運對歷史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已經跑去當我們學校代表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在四月二十一日晚上看到學生糾察隊這麼有秩序，我就想到這次學生運動可能會取得一些實際效果。所謂的實際效果，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可能出國。雖然我參加我們學校英語中心學過一年，祇要具體想到的話，我就覺得我這個人沒有

這個可能。可是三十多年的歷史，我親眼看著一代人、一代人因為肯定自己的熱情和動機而【以上第 341 頁】帶來 根本沒法預測的後果，多少年的青春過去，你想再重新學習什麼都是不可能了，我就想著，不管是什麼動機，哪怕是取得一點成果也是好的。我在四月二十一日晚上 第一個念頭已經想到了請徐四民辦報這種事，因為這一年，《東方記事》的出版跟戴晴他們發表儲安平的文章和林培瑞講方勵之赴布什宴的文章都是有關係的。我就 想到象這樣我們臨時出了一個雜誌，趕緊發兩篇文章就被共產黨封了。我們有一個民族與文化的研討班，上了一年就都在討論這些事情。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就是思想自由，我們最感覺不好的就是思想不自由。我們希望哪怕學生運動給我們擴展一點點生存空間，我們在中國活得稍微好一點，能夠有可能說出我們想說的話，實際上這些啟蒙運動才有可能持續下去。我在運動自始至終一直講我們有可能得到什麼？我們有可能鞏固什麼？是不是能給我們的社會一點進步？這是從五月六日開始我 接觸新聞工作者就開始非常驚訝的，因為他們情緒非常樂觀。這是我極力要加入到學生組織中，希望鞏固學生組織的一個原因。祇有介入才能幫助它，祇有參與才能使它鞏固。絕食開始之後我是非常絕望、悲觀的態度，我和趙瑜曾經爭論過，這也是和許多知識分子一個最大的差別。從那個時候我碰到重要人介紹情況總是忍不住 流眼淚，我覺得沒有辦法了。

封從德：我講三個問題，這個會發起的動機和現在的效果，二是講當時廣場上和學運當中最重要問題，就是學生之間互相不信任的問題，三是我對民主，對這場 運動的看法。這次會發起的動機是想記載歷史，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意見，開始還想反思，還想總結整個民運。現在的效果我覺得基本上達到了我們的初衷，但是很多 歷史的細節並沒有總結出來，祇是理了一個綱。我們最後要編輯出一本書的時候，必須強調即使在海外還有多少多少同學的意見沒有收集到，即使在會上有多少多少 地方我們都還沒有回顧到。這一定要搞清楚，必須強調它的局限性。

當時廣場上學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互相之間不信任，我認為和運動的倉促性有關，太倉促大家之間沒有時間溝通和交流，不信任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交流。關於民主，我們一搞民主就搞成泛民主，然後祇想要權力，不知道有責任。另外，因為中國人在人性上被壓抑得太久，所以對他自己的尊嚴搞不清楚。實際上這場運動是每 個人都想去爭【以上第 342 頁】取自己的尊嚴的一個運動。每個人到了廣場，感覺到廣場上的氣氛，“跪了四十年，現在該起來活動活動了”。我認為這是這個運動最根本的地方。

當時廣場上學運中最大 的問題就是互相之間不信任，我認為和運動的倉促性有關，太倉促大家之間沒有時間溝通和交流，不信任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交流。關於民主，我們一搞民主就搞成泛 民主，然後祇想要權力，不知道有責任。

另外，因為中國人在人性上被壓抑得太久，所以對他自己的尊嚴搞不清楚。實際上這場運動是每個人都想去爭【以上第 342 頁】取自己的尊嚴的一個運動。每個人到了廣場，感覺到廣場上的氣氛，“跪了四十年，現在該起來活動活動了”。我認為這是這個運動最根本的地方。

學生搞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想法，和市民的想法，和其它階層的想法有點不一樣。一些知識分子想的，就是讓趙紫陽上臺，李鵬下臺，目標很現實，新權威主義、體制內體制外之類。市民想的主要是打倒官倒和貪污。政府幹部和個體戶有他們自己的追求，祇有學生第一他還沒有分配到社會上去，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所以社會的總體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利益才是最長遠、最公正的利益，所以，他們要民主啟蒙，推動一個新啟蒙運動。這是我的看法。

劉衛：我們外地同學去北京的觀點是，我們不同意去，自己在家裏搞不好，去北京沒骨氣；第二是去北京的同學許多動機都是湊熱鬧，他自己在學校不敢跟頭頭作對，跑到北京去老師看不見。還有我最討厭工自聯湖南成立的工自聯，就是一群混混跑到廣場上去。他們找我們說什么事情，我跟他們說，“你們到工廠去鬧，別在這兒鬧，工自聯應該到工廠裏去。”還有四二二事件他們是打砸搶，他們是把街砸了。

我對學運的看法，我們該撤什么的，都是無所謂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技術性的問題什么事情如果下面已經去幹了，沒幹好就是沒幹好。我現在還是堅持這個觀點，和黨內改革派，和誰配合，配合個屁。鬼知道改革派想什么了，反正都在中南海大院裏，我不知道他們幹什么呢。

常勁：北大籌委會的活動在運動中是非主流的，大家一直把北大籌委會當作運動中的後方來看。北大籌委會一開始就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在我看來，第一是北大對這個運動的看法，一個是封從德所說的啟蒙運動的看法，另外一個就是團結工會這根線，是受波蘭團結工會的影響，在中國、在無黨派的情況下建立其它的自治力量，首先就是從學生開始，從校園民主開始。第二個想法就是實踐民主。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兩根大線一直往下活動的。所以我希望強調北大籌委會最後的活動，我認為北大籌委會的活動、組織活動到後來是比較完善的，而且我覺得是將來值得吸取經驗的一個部分。【以上第 343 頁】

李錄：第一我覺得這個會議我還沒有講清楚的問題是我對這個運動本身的參與，主要包括三大段。第一段是南京學運，第二是五月十三日我在北京的一些活動，第三段是從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四日從絕食團一直到廣場指揮部、到最後撤離，一直到我最後離京。這三段內容我南京學運根本沒講，北京的一段活動也沒有談，從絕食團指揮部到廣場指揮部我談了一個綱要，但是主要重要的細節我都沒有講，唯一講得比較細一點的是六月一日、二日、三日。但是由於這個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當時作出決策本身所牽扯的面，這個還是綱要。所以我很遺憾就是我講的所有的東西都是綱要，我希望有一些具體的事件可以進一步核證。

第二我談一下對這個會議本身的看法。第一個看法是，在會議中我開始了解到了很多我開始不熟悉的情況。第二個，會議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認識了很多其他的人，比如我以前認為沈彤沒幹什么事，後來發現幹得也不少。我以前對

王超華、對梁二都有很多誤解，後來發現是我的問題，也可能是其他人的問題。總之我通過這個會了解了許多情況，我覺得這個會基本上是貫徹了寬容、以史實為基礎的基本精神。第三是我對這個會有一點遺憾，我認為這場運動是一場學生運動，是一場全民的民主運動，同時也是一場人文主義運動。我們在學生運動這一塊本身講的時間就不夠，時間很少；第二個在全民運動層次上又沒有涉及到；第三個層次上我們講了一些，但講得確實是太少，而且被會議一個強烈的情緒來反抗，我認為這很不正常，事實上這一塊才真正代表運動的核心，也就是這樣一種核心才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

【李錄：因為我們這個會的參加人員有限，同時預定題目是討論北京民運，所以我們肯定會省略其它很重要的資料。就昨天我聽到的北京情況，我相信在其它主要的大城市，象南京，西安，上海等等，情況比較相似。在此之前我也曾經串聯過十幾所大院校，情況都相似。我個人在南大也參加一些社團，也是南京學運的發起人。本人比較同意蔡崇國的說法，這次運動基本是自發的，在全國同時被大家所認可。在南京最早也是在十六日、十七日，到二十六日之前，有三次大規模游行，這三次都與我有關。到了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一出，因為我在南京的一些活動，比較危險，所以我祇能去了北京。到了北京後我去了各個學校，凡是有自治組織的學校我都去，凡是有廣播站的地【以上第 344 頁】方我基本

上都去演講。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識了一些活躍分子，可以說朋友吧。也因為這個原因，後來在學運中我也有進一步的參與。我們一直在談具體的事件，我覺得要想完整地回顧這場運動，作為歷史忠實地記錄下來，一個重要的側面是研究運動中大家的精神、情緒和感情。這個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至少在四二七之後，特別是絕食開始以後，更大的是一場精神上的運動，所以在精神層面上的了解，是研究這場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神領袖的出現也使這場運動變得更加複雜了，就沒有辦法從勢力上來研究。

【李錄：因為我們這個會的參加人員有限，同時預定題目是討論北京民運，所以我們肯定會省略其它很重要的資料。就昨天我聽到的北京情況，我相信在其它主要的大城市，象南京，西安，上海等等，情況比較相似。在此之前我也曾經串聯過十幾所大院校，情況都相似。我個人在南大也參加一些社團，也是南京學運的發起人。本人比較同意蔡崇國的說法，這次運動基本是自發的，在全國同時被大家所認可。在南京最早也是在十六日、十七日，到二十六日之前，

有三次大規模游行，這三次都與我有關。到了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一出，因為我在南京的一些活動，比較危險，所以我祇能去了北京。到了北京後我去了各個學校，凡是有自治組織的學校我都去，凡是有廣播站的地【以上第 344 頁】方我基本上都去演講。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識了一些活躍分子，可以說朋友吧。也因為這個原因，後來在學運中我也有了進一步的參與。我們一直在談具體的事件，我覺得要想完整地回顧這場運動，作為歷史忠實地記錄下來，一個重要的側面是研究運動中大家的精神、情緒和感情。這個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至少在四二七之後，特別是絕食開始以後，更大的是一場精神上的運動，所以在精神層面上的了解，是研究這場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神領袖的出現也使這場運動變得更加複雜了，就沒有辦法從勢力上來研究。

我來分析我個人的一些想法。我認為在早期我聽王丹的，後來我也一直承認王丹，是因為聽了他的幾次演講，沒有承認開希也是因為聽了他的幾次演講，承認柴玲也是因為她歷次的演講。實際上柴玲在指揮部裏並不具體負責事務，但她每次演講都能喚起大家的激情。反正我還能記得很清楚吧，每次演講之後大家的反應實在太熱烈了，包括我個人都感動得不得了。這是她的特殊地位。還有幾個人都具有這樣的地位。如果我們能找到那天晚上我們送出去的八十幾盤磁帶，可能會對回顧歷史有所幫助。這是我要談的關於精神領袖的一個地位問題，就是他們怎麼來影響這場運動的。這場運動是一場學生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同時也是一場人性解放運動。我想他們可能在最後一個層面上對運動的影響要多一些。這我相信他們會自己來談的。我個人祇能談一些在操作上的事情。】

張伯笠：參加運動的動機我想大家都有相似之處。我在參加運動之前就是一個動機，我就覺得今年是要發生事，我們是在北大，我們整個作家班的想法就是學生現在說話了，他們將來成功了，最先得利的就是我們這批人。所以我們就是這種思想，我們不能旁觀，就這樣參加了。

關於這個會議我覺得有很多大事紀我們沒有弄清楚，談自己確實談得太多，沒什麼必要，因為大家都寫自傳寫了很多。比如說幾次大游行，它的產生、效果、怎麼產生的、哪些人組織的，這種重大的事情都沒有弄清。因為這個會雖然不具備權威性，但是它有一定的權威性，你必須承認這點，到海外的就這些人，在監獄的人他們以後將來出來要很長時間以後才能做。我覺得大會大家這種合作精神非常好，【以上第 345 頁】兩年以後我覺得大家好象比廣場冷靜了好多。因為我剛剛出來，還沒冷靜，所以我在會上有些做法不太好，請大家原諒。

關於這個會議我覺得有很多大事紀我們沒有弄清楚，談自己確實談得太多，沒什麼必要，因為大家都寫自傳寫了很多。比如說幾次大游行，它的產生、效果、怎麼產生的、哪些人組織的，這種重大的事情都沒有弄清。因為這個會

雖然不具備權威性，但是它有一定的權威性，你必須承認這點，到海外的就這些人，在監獄的人他們以後將來出來要很長時間以後才能做。我覺得大會大家這種合作精神非常好，【以上第 345 頁】兩年以後我覺得大家好象比廣場冷靜了好多。因為我剛剛出來，還沒冷靜，所以我在會上有些做法不太好，請大家原諒。

況且我在大陸出來剛剛出來跟你們的想法還完全不一樣，但是我盡量跟你們取得共識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們這些人今後要作什麼？當然有很多人說，“你不要提這個問題。”當時我的初步設想會議應該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不解決我們也應該有個定位問題，民主之家之類的。因為我們監獄裏還有那么多哥們，他媽的還死了那么多哥們，我們如果不為他們作一點事，我們是對不起他們的。這是最強烈的感覺。對這個運動的評價應該由歷史來作，它既然發展到這個程度，發展到這個樣子，就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大家能不能在這裏面找到我們自身的錯誤和缺點，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今後中國還會搞這樣的民主運動，甚至比這個要好。所以我覺得，首先這場運動應該是以大學生為先導，從自發到自覺的民主運動，是全民的，不僅僅是大學生，而是以大學生為先導。

柴玲：我對這個會議的要求有兩點，一點就是我希望大家在這兒心平氣和地把當時的一些彼此不知道的情況互相溝通一下；第二點通過這樣一種合作我是非常希望達到一種效果，就是了解每個人參加運動的基本的思想、主導意識以及他之所以在運動中採取那種策略這樣一些原因。我始終想了解的為什麼運動中會形成那么大的分歧，我們以後在下次運動中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現在我們基本的共識就是，我們當時的分歧確實在時機上、效果上，以及在最後屠殺造成的巨大損失上都產生一些損害和影響。我想這個大會就象剛才李錄和伯笠講的對每個人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而且從中產生深厚的信任和尊重。謝謝大會的主持者。

借用李錄剛才對整個運動分析的三段，我的強烈的感受就是，首先我們這個書出去以後畢竟成為一個權威，實際上我們並不是非常地權威，（封：是有限權威。）這是在基本的民運的層次上。第二是在全民運動的層次上基本同意李錄的話“沒有涉及到”，尤其是我們談的具體的焦點都是技術性問題和細節問題，所以當時在廣場、在北京、在全國感染大家的那種心情、感受、在那個特殊情況下表達這四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眾的心情講涉及得非常非常少。我在試圖講這部分的時候覺得非常地困難，因為我們發現到海外以後我們內在【以上第 346 頁】自我都在發生變化，這是一個衝突，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解決，祇是提出來留給大家討論吧。

借用李錄剛才對整個運動分析的三段，我的強烈的感受就是，首先我們這個書出去以後畢竟成為一個權威，實際上我們並不是非常地權威，（封：是有限權威。）這是在基本的民運的層次上。第二是在全民運動的層次上基本同意

李錄的話“沒有涉及到”，尤其是我們談的具體的焦點都是技術性問題和細節問題，所以當時在廣場、在北京、在全國感染大家的那種心情、感受、在那個特殊情況下表達這四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眾的心情講涉及得非常非常少。我在試圖講這部分的時候覺得非常地困難，因為我們發現到海外以後我們內在

【以上第 346 頁】自我都在發生變化，這是一個衝突，我不知道應該怎么解決，祇是提出來留給大家討論吧。

老木：關於指揮部逃亡經費的問題我覺得沒有講清楚，據我所聽到的，還有沒有說清楚的。第二關於逃亡的電話號碼，因為我到了海外在香港有人問我這事，就是為什麼王丹沒有電話號碼？這是兩個重要的內容。

對這個會議我覺得還不錯，但是我強烈抗議有的人發言的時候對王丹這些人心理的猜測和評價，包括對聯席會議。西苑聯席會議說老實話我認為還是有它失誤的地方，我覺得我們在這裏是回憶這段歷史，我不主張反思。如果要反思的話，我認為我們都犯了錯誤，尤其是聯席會議我們犯了失誤的錯誤。但是我們的主體性我是贊成的，因此就形成對指揮部的一些意見。

王超華：我來念一下。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決定在巴黎期間我將不接受任何採訪和新聞照相，不參加任何公開信或者任何簽名活動，我來巴黎之前祇許諾參加整理史料的會議部分，未作更多的許諾，我現在不準備擴充我的許諾。非常感謝會議主持者和本地新聞工作者對我的信任，並希望大家對我的個人決定理解。

第二，在會議期間我為會議提供了一些此前未曾見諸報端的有關八九民運的材料，特別是有關五月北高聯的活動，北高聯當時對絕食的態度處理，北高聯在絕食初期和政府的接觸。但是由於會議日程過度緊張，我事實上無法將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一說完。有關這些事，我目前所講的還很粗，我會在自己的文章回憶裏給出重要的補充。我將注意是否有其他與會者提前引用這些，提前不具名地引用這些不完全的事實。

第三，由於巴黎會議的日程緊張、參加人員不齊，一些重要事件在會中祇有我本人，作為當事人，我在會上卻沒有機會作發言，有些重要事件在本次會議上祇有我本人和另一個人作為當事人，我在會上卻沒有機會作補充、質疑。我認為這種情況帶來的重要後果是本次會議所收集的某些重要原始資料缺乏對證，因此嚴重缺乏權威性。這裏我所指的有關的事實是北高聯五月十三日以前的活動，特別是四月二【以上第 347 頁】十七日大游行之後的情況，四月二十九日

到五月一日的高聯會議，五月一日到五月三日北高聯和官方的關係和交涉活動，

《新五四宣言》的起草，五月八日到五月十三日絕食前後學運和新聞界與知識

界的接觸，對話團的情況及其與北高聯的活動及各校活動的關係，這是我認為我

沒作補充的。絕食期間我作新聞發言人的情況，我們和工人和工自聯的聯系，五月二十三日以後北高聯整頓的具體情況，我這主要是相對於目前會議對廣場情況記載的詳細程度和北高聯在北京及全國影響的重要性而提的。北高聯與廣場指揮部的協調與分工，北高聯對聯席會議的實際態度和具體關係，北高聯和指揮部秘書處的聯系與合作，與臺灣愛心會的接觸，特別是最後香港的協調。

第三，由於巴黎會議的日程緊張、參加人員不齊，一些重要事件在會中祇有我本人，作為當事人，我在會上卻沒有機會作發言，有些重要事件在本次會議上祇有我本人和另一個人作為當事人，我在會上卻沒有機會作補充、質疑。我認為這種情況帶來的重要後果是本次會議所收集的某些重要原始資料缺乏對證，因此嚴重缺乏權威性。這裏我所指的有關的事實是北高聯五月十三日以前的活動，特別是四月二【以上第347頁】十七日大游行之後的情況，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一日的高聯會議，五月一日到五月三日北高聯和官方的關係和交涉活動，《新五四宣言》的起草，五月八日到五月十三日絕食前後學運和新聞界與知識界的接觸，對話團的情況及其與北高聯的活動及各校活動的關係，這是我認為我沒作補充的。絕食期間我作新聞發言人的情況，我們和工人和工自聯的聯系，五月二十三日以後北高聯整頓的具體情況，我這主要是相對於目前會議對廣場情況記載的詳細程度和北高聯在北京及全國影響的重要性而提的。北高聯與廣場指揮部的協調與分工，北高聯對聯席會議的實際態度和具體關係，北高聯和指揮部秘書處的聯系與合作，與臺灣愛心會的接觸，特別是最後香港的協調。

梁二：我要談談我遺漏的重要事實。第一我要談的是四月二十七日前後大示威游行的發起和其後造成的影響，這個我沒講。第二在殘聯，就是劉燕曾經提到的那件事，但是我認為還有一個不同版本，是我代表程真的一些發言內容還是沒得到講述。第三開希在一些與官方的私自接觸當中的一些具體的細節我沒來得及講，但是這個我是知道的，因為這都是記錄在師大秘書處的文件當中的。第四關於師大的一些早期的作用，我也沒來得及講。

【梁二：對我自己的動機我想稍微解釋一下。我自己的動機，我在這之前完全是以一種書呆子、一天讀書十四小時以上的生活方式來生活，不與任何人交談。我自己覺得有必要改變我自己的生活道路。第二個動機是源於我對人生的看法，我當時是有點悲哀。第三是我從小長大的一種理想，對社會有所貢獻，對歷史有一定的作用，否則這一輩子活著就沒有意義。第四是來源於知識分子對

我的啟發，祇有以冷靜的理智參與學運當中才能真正起到一定的組織性的作用，避免學運因為混亂而造成的一些損失。當時曉波和一個姓金的老師都明確地給我提出這些問題。我當時覺得這是有必要的，而且在各個學校我都是以組織者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以領導者的身份出現。我完成了他們交給我的任務。】

張倫：第一我要說的是我的動機。我是搞社會學出身的，本身對八九民運從最初參與就在內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告訴我，這個運動成不了。因為我對整個中國問題的把握根本不是在這個層面上，這是我【以上第 348 頁】為什麼蹲在屋裏搞我的市政研究，讀中國古籍的原因，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在養病，八八年底到四月上旬運動初我還在吃中藥，學校還把我當作重要病號來對待，不給我安排課。所以我的參與完全是良心和道義上的促使。那麼運動期間我有一個問題，現在海外提出確實是各界和當時學生當中的矛盾和內耗，這不僅僅使我們許多參與者身心疲倦，我覺得也使我們這場運動後來失敗，不能說是主要原因，但至少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是我提出來的。我覺得今天我們能有這個會，大家能坐在一起來檢討我們的過去、回顧歷史的史實、增加彼此之間的信任和理解，這至少哪怕對其它的問題沒有直接的影響，至少我們是開了一個先例，為中國將來的民主政治、為將來的民主運動建立了很好的基礎。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我是抱著參加八九民運一樣的虔誠來參加這個會，而且也是要對得起組織者，對得起死難的朋友的意思來參加這個會。這是我到海外最真誠的參加的一次會。

張倫：第一我要說的是我的動機。我是搞社會學出身的，本身對八九民運從最初參與就在內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告訴我，這個運動成不了。因為我對整個中國問題的把握根本不是在這個層面上，這是我【以上第 348 頁】為什麼蹲在屋裏搞我的市政研究，讀中國古籍的原因，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在養病，八八年底到四月上旬運動初我還在吃中藥，學校還把我當作重要病號來對待，不給我安排課。所以我的參與完全是良心和道義上的促使。那麼運動期間我有一個問題，現在海外提出確實是各界和當時學生當中的矛盾和內耗，這不僅僅使我們許多參與者身心疲倦，我覺得也使我們這場運動後來失敗，不能說是主要原因，

但至少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是我提出來的。我覺得今天我們能有這個會，大家能坐在一起來檢討我們的過去、回顧歷史的史實、增加彼此之間的信任和理解，這至少哪怕對其它的問題沒有直接的影響，至少我們是開了一個先例，為中國將來的民主政治、為將來的民主運動建立了很好的基礎。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我是抱著參加八九民運一樣的虔誠來參加這個會，而且也是要對得起組織者，對得起死難的朋友的意思來參加這個會。這是我到海外最真誠的參加的一次會。

關於知識分子的問題我談一個我的觀點，我覺得封從德的認識是他的觀點，我個人認為，知識分子同樣對中華民族抱有他們的獻身精神和他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考慮，祇是他們站的角度不同，可能考慮的是另一種方式，這一點我就僅僅講王軍濤、陳子明這些朋友，我覺得他們的犧牲精神並不亞於我們在坐的每一位。

關於軍濤。二十九日撤離廣場之後，我實在是疲倦之極，被送到昌平，遠離北京，祇有一個朋友當時開車過去的。本來是讓我睡覺馬上再回來的，這個事情我為什麼又提一下，就是海外有人傳聞包括尼克福蘭克林的文章說王軍濤知道事先要開槍，這個事情就以王軍濤六月三日下午還準備把我從昌平調回來的事來證明王軍濤確實是不知道開槍，而且丁建也可以作證。

我出來之後，內心深處一直有一個非常謙疚感，覺得當時對不起柴玲和小封他們。我記得五月二十日我們在那宣誓，我一直抱著一種很欠疚的感覺。在最危險的時候，儘管我確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最危險的時候，本來我是覺得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晚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你們沒出來之前我覺得對不起你們，對不起在廣場上的那些學生和在一起戰鬥的市民。你們出來之後我現在覺得我對不起少江，對不起那些朋友。因為在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我把少江的身體看得太虛，我勸他走，但是他說，“我不走，最危險的時候我不離開這個地方。”當時我知道在廣場如果軍隊進來，我親自接到的消息，就是包括派【以上第 349 頁】刑事犯來打，我是一定要在這個裏邊的，但是我當時是希望少江走，因為他當時絕食身體很虛。我覺得我很對不起少江。

我出來之後，內心深處一直有一個非常謙疚感，覺得當時對不起柴玲和小封他們。我記得五月二十日我們在那宣誓，我一直抱著一種很欠疚的感覺。在最危險的時候，儘管我確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最危險的時候，本來我是覺得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晚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你們沒出來之前我覺得對不起你們，對不起在廣場上的那些學生和在一起戰鬥的市民。你們出來之後我現在覺得我對不起少江，對不起那些朋友。因為在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我把少江的身體看得太虛，我勸他走，但是他說，“我不走，最危險的時候我不離開這個地方。”當

時我知道在廣場如果軍隊進來，我親自接到的消息，就是包括派【以上第 349

頁】刑事犯來打，我是一定要在這個裏邊的，但是我當時是希望少江走，因為他當時絕食身體很虛。我覺得我很對不起少江。

我提醒原來出來的這些朋友，關於營救我的問題，曾經有一個先出來的同學講過，我張倫卷了巨款從廣場逃跑。這是港自聯常委親自跟我講的，後來為什麼拖遲營救我的時間。這個事情我留待以後查證究竟是誰。老木可以作證一件事，從北京走的時候，我祇有五十塊錢。後來一個朋友給了我二百塊錢，老木後來給了我三百塊錢。

白夢：第一我基本上不同意八九民運失敗的說法。我認為作為一場民主運動區別於暴力革命的根本界限在於，民主運動不是以是否奪取政權為它的最終目的。在這個層次上，儘管八九民運的結局非常之悲慘，我們死了很多人，我們流了很多血，坦克和機槍把人群都衝散了，但是在這樣一個中國，在這樣一個沒有民主傳統和自由思想的土地上深深地埋下了民主的理想和種子。我覺得，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跨階段性的。所以我基本上不同意八九民運失敗的說法，我反對把革命和民主運動混為一談的界定方式。出於我個人對於出這次會議的一種自覺，我覺得我應該談什麼，所以我個人要的時間非常少，但這並不等於我沒有東西可談。我相信我有許多東西沒有談，我總共談了二十五分鐘的時間，許多材料我沒有談，我個人保留。

7 . 2 公開討論

白夏先生：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曉町發了一次言，他說，不要讓這個運動完全是一個純粹的學生的運動，應該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你們怎麼分析這個看法？看來你們這幾天的會還是沒有吸取這個教訓，這個好象是個純粹的學生研討會。有的人在分析八九民運失敗的過程中，就覺得是因為學生沒有很好地跟社會各個階層聯繫起來，你們怎麼看？

封從德：這次會的籌備比較倉促，這是我的責任。所以討論範圍無法擴大。為了考慮同學們假期的安排，就選了這個時間。所以整個會祇有兩個月的籌備時間，安排不了很多的人和很大的討論範圍。這【以上第 350 頁】幾天的討論也

證明，當時學生組織的內部問題就非常複雜。我們這幾天每天都是增加一、兩個小時進行討論，討論了一個星期，這麼長，時間還顯得不夠。所以我覺得沒有

辦法增加、擴充討論範圍，我們這次基本上就祇限於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至於八九民運該怎麼討論，我覺得如果這方面的現實條件和呼聲高的話，那麼我們考慮

倡議其它階層和我們合作，一塊發起另外一次八九民運的討論會。那就不是這次

會的討論範圍了。

封從德：這次會的籌備比較倉促，這是我的責任。所以討論範圍無法擴大。為了考慮同學們假期的安排，就選了這個時間。所以整個會只有兩個月的籌備時間，安排不了很多的人和很大的討論範圍。這【以上第 350 頁】幾天的討論也證明，當時學生組織的內部問題就非常複雜。我們這幾天每天都是增加一、兩個小時進行討論，討論了一個星期，這麼長，時間還顯得不夠。所以我覺得沒有辦法增加、擴充討論範圍，我們這次基本上就祇限於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至於八九民運該怎麼討論，我覺得如果這方面的現實條件和呼聲高的話，那麼我們考慮倡議其它階層和我們合作，一塊發起另外一次八九民運的討論會。那就不是這次會的討論範圍了。

王超華：就我的了解和我參加會議的情況，我們這些學生流亡出來以後是在不同的國家，而且個人根據自己不同的情況參加了一些不同的組織，或者個人以不同的方式參加民運。這次會之所以能夠聚集在一起，我認為是大家基於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和總結需要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這些當事人有責任對證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實，然後才有可能讓世界上、社會上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參加討論。我們之所以把這個會限制在學生當中，這也是當初會議組織者邀請我時我提出的一個條件。我說，如果會議僅僅限制在回顧、整理史實的基礎上，我就來，如果要擴大到反思總結上我可能就不來。我這個要求曾經給他們造成一些困惑。我很高興大家最後還是同意了我的意見，當然我可能有點自私。我覺得這樣的結果是使我們確實把一些眾說紛紜的事實弄清了，雖然這個會議至今我還不認為它是真正的最具有權威性的，因為很重要的事實部分還有我們沒有涉及到的。但是我們覺得這僅僅是一個很好的開頭，我們本著對當時的歷史負責的精神來給世人一個在某種基礎上進行評價和反思的機會。

常勁：在八九民運初期的時候我們學生為什麼沒有和其它的各階層人士合作，我自己提出我自己的一點想法。

我們最初搞學生運動，我當時的理解，我認定的是我們這個做法第一個是啟蒙運動，我們覺得中國的民主素質還比較差，從五四到現在經過七十年以後，共產黨的教育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對民主的認識。另外我們當時對中國政治局勢的估計，就是認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缺乏其它的制衡力量、政治制衡力量，而各其它民主黨派人士不可能起到這個作用，祇有建立民間的自治力量才能夠達到這一點。

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借鑒八六年民運的情況、經驗。從八一年【以上第 351 頁】大學生競選的經驗，我們就考慮，首先是通過大學生校園的民主力量。

自治力量的產生，當時就有一個技術問題，我們必須首先達到第一步，在大學裏

建立這種比較正常的由民間產生的政治制衡力量、自治力量，就是後來的團結

學生會和學生自治會的出現。那麼如果在當時要要求各階層的人士加入是個不現實的問題。因為大家對當時學生的想法並不理解，第二缺乏信任感，當時社會上搞民主的人士和學生的接觸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廣泛，我想這也是受到社會原因的影響。象任畹町，魏京生他們當時被判刑的時候我才上中學，我聽說過他們的事情，但是當我上大學的時候對他們的事情已經沒有認識了。我們和他們這些所謂的社會民主力量的結合我想存在著很大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問題。退一步說，這些社會上的人也照著學生的想法建立他們的自治力量，在當時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全社會都開始自治運動，那麼對共產黨的刺激肯定是很強烈的，那麼達到的結果就不是我們所預期的。在後來，我們還是跟各個階層開放性地進行了接觸和合作，象工自聯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它完全是由學生在幕後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的。象跟知識分子的接觸，我們早在四月底的時候就已經跟知識分子有了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合作。最後的情況在於，當時群眾運動已經發展成一個社會性的運動，誰能夠起主導作用呢？當時這個責任被迫地、很可悲在中國、落在了學生的身上。當時所出現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他們都沒有辦法接替這個領導權，所以造成這個運動最後失去了它的主導方向，沒有誰能參與這個領導。

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借鑒八六年民運的情況、經驗。從八一年【以上第351頁】大學生競選的經驗，我們就考慮，首先是通過大學生校園的民主力量。

自治力量的產生，當時就有一個技術問題，我們必須首先達到第一步，在大學裏建立這種比較正常的由民間產生的政治制衡力量、自治力量，就是後來的團結學生會和學生自治會的出現。那麼如果在當時要要求各階層的人士加入是個不現實的問題。因為大家對當時學生的想法並不理解，第二缺乏信任感，當時社會上搞民主的人士和學生的接觸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廣泛，我想這也是受到社會原因的影響。象任畹町，魏京生他們當時被判刑的時候我才上中學，我聽說過他們的事情，但是當我上大學的時候對他們的事情已經沒有認識了。我們和他們這些所謂的社會民主力量的結合我想存在著很大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問題。退

一步說，這些社會上的人也照著學生的想法建立他們的自治力量，在當時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全社會都開始自治運動，那麼對共產黨的刺激肯定是很強烈的，那麼達到的結果就不是我們所預期的。在後來，我們還是跟各個階層開放性地進行了接觸和合作，象工自聯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它完全是由學生在幕後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的。象跟知識分子的接觸，我們早在四月底的時候就已經跟知識分子有了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合作。最後的情況在於，當時群眾運動已經發展成一個社會性的運動，誰能夠起主導作用呢？當時這個責任被迫地、很可悲在中國、落在了學生的身上。當時所出現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他們都沒有辦法接替這個領導權，所以造成這個運動最後失去了它的主導方向，沒有誰能參與這個領導。

李錄：我原則上同意剛才常勁所講述的基本看法。我個人認為八九民運本身非常複雜，但是有三條非常清晰的線索，從頭到尾一直在貫穿始終：它始終都是一場學生運動，學生追求民主，要求自治，要求建立民間力量的一場運動；它也是一場全民的民主運動，要求政治參與，提出全民的政治訴求和經濟訴求的民主運動；第三 它之所以從無到有、迅速地吸引了成千上萬乃至於全國、全世界的人們，其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力量又是一個更大的特色，我叫它人性解放運動，或者按照封從德的說法是人民啟蒙運動，在精神層次上也異常清晰地表現出來。

從有組織的力量方面看，學生色彩比較濃厚。從對運動的準備到運動的發起到運動迅速地推向高潮背後的組織力量主要來源於學生，【以上第 352 頁】而知識分子在初期被迫地由學生拉入這場運動中。當然這其中包括那些真正從事民主運動多年，象剛才向夏先生提到的任曉明、王軍濤、陳子明等等這些人，他們在中國并不被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所認可，也不被已經吸入到改革派內、為改革派充當智囊的知識分子所承認，而是中國社會中相對獨立的一批已經建立起基礎的民間政治力量，可惜這個基礎非常薄弱。由於中共在過去四十年中一直在篡改他們的歷史，所以使得這一階層與廣大民眾力量的聯系比學生階層與廣大民眾的聯系還要薄弱得多。如果站在第三個層次上來評價這場運動就會很清晰地看到祇有在發生了八九年的運動之後，祇有在中共用坦克和機槍在世界人民面前屠殺了無數無辜的人民之後才可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所有的人們都認識到他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為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權利而奮鬥。在此之前這並沒有成為一個事實，而且基本上由於知識、政治制度各種各樣的限制不可能有這樣

的人和想法，即使有也不能得到廣大的民眾的認可。這就是為什麼在四月二十七日任畹町提出來的聲音本身很微弱，又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更看重這樣一次會議，因為這個會議是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來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且是真實的歷史。

從有組織的力量方面看，學生色彩比較濃厚。從對運動的準備到運動的

發起到運動迅速地推向高潮背後的組織力量主要來源於學生，【以上第 352 頁】

而知識分子在初期被迫地由學生拉入這場運動中。當然這其中包括那些真正從事民主運動多年，象剛才白夏先生提到的任畹町、王軍濤、陳子明等等這些人，他們在中國并不被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所認可，也不被已經吸入到改革派內、為改革派充當智囊的知識分子所承認，而是中國社會中相對獨立的一批已經建立起基礎的民間政治力量，可惜這個基礎非常薄弱。由於中共在過去四十年中一直在篡改著他們的歷史，所以使得這一階層與廣大民眾力量的聯系比學生階層與廣大民眾的聯系還要薄弱得多。如果站在第三個層次上來評價這場運動就會很清晰地看到祇有在發生了八九年的運動之後，祇有在中共用坦克和機槍在世界人民面前屠殺了無數無辜的人民之後才可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所有的人們都認識到他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為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權利而奮鬥。在此之前這並沒有成為一個事實，而且基本上由於知識、政治制度各種各樣的限制不可能有這樣的人和想法，即使有也不能得到廣大的民眾的認可。這就是為什麼在四月二十七日任畹町提出來的聲音本身很微弱，又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更看重這樣一次會議，因為這個會議是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來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且是真實的歷史。

在逃離中國之後按照我個人對八九民運的總結，我認為，對於中共歷史的不了解是這次運動後來發展成一場中國近代史上罕見的大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悲劇的責任并不在學生，也不在於廣大的民眾，而在於這個政府。但是在這個政府統治下生活的人民、學生不了解這個政府的本質，不了解這個政黨的歷史，這個責任是由我們來自己負。在我逃離中國之後，我組建了一個寫作班子，叫中國檔案寫作計劃，英文名字叫 Personal File of China Documentation，我們目的就是想把過去的四十年歷史好好地總結一下。我想總結還在以後，第一步先記錄下來，比如象您剛才談到的任畹町、王軍濤，甚至於魏京生，我想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不知道他們做過什么事情的。在他們的印象中，魏京生一直是一個為法國政府提供軍事情報的間諜，多國間諜，這就使得他們的聲音一直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我們今天在這裏第一次來書寫比較真實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儘管象封從德已經解釋的那樣，由於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還沒有辦法把參加運動的各個層面的人都請來作一個綜合的歷史的回顧、反思、檢討等等，但是我想我們作了【以上第 353 頁】非常可喜的第一步。我在這裏也呼吁參加這場運動的知識分子、工人、其

它各方的代表也由他們自己首先來作這樣一項工作，然後在條件成熟之後，由參加運動的各個層次的代表人物再在一起重新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修訂。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到反思，才有可能談到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才有可能對未來起到有益的作用。

在逃離中國之後按照我個人對八九民運的總結，我認為，對於中共歷史的不了解是這次運動後來發展成一場中國近代史上罕見的大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悲劇的責任並不在學生，也不在於廣大的民眾，而在於這個政府。但是在這個政府統治下生活的人民、學生不了解這個政府的本質，不了解這個政黨的歷史，這個責任是由我們來自己負。在我逃離中國之後，我組建了一個寫作班子，叫中國檔案寫作計劃，英文名字叫 Personal File of China Documentation，我們目的就是想把過去的四十年歷史好好地總結一下。我想總結還在以後，第一步先記錄下來，比如象您剛才談到的任曉明、王軍濤，甚至於魏京生，我想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不知道他們做過什麼事情的。在他們的印象中，魏京生一直是一個為法國政府提供軍事情報的間諜，多國間諜，這就使得他們的聲音一直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我們今天在這裏第一次來書寫比較真實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儘管象封從德已經解釋的那樣，由於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還沒有辦法把參加運動的各個層面的人都請來作一個綜合的歷史的回顧、反思、檢討等等，但是我想我們作了【以上第353頁】非常可喜的第一步。我在這裏也呼吁參加這場運動的知識分子、工人、其它各方的代表也由他們自己首先來作這樣一項工作，然後在條件成熟之後，由參加運動的各個層次的代表人物再在一起重新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修訂。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到反思，才有可能談到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才有可能對未來起到有益的作用。

白夏：我補充一下，在廣場的時候，象進入紀念碑應該有許可證，也必須有

一個學生證。

封從德：關於八九年學生運動的封閉性，實際上這是當時學生組織、學生骨幹層的一個困境。就學生發起這場運動的初衷而言，基本上是想發起一場思想性的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運動。學生最初的兩個訴求就是要求中共能夠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雖然實際上也有一種社會操作性，但主要來說，想作到這一點是想通過一種思想啟蒙的方式。但是後來學生運動為了爭取更大的聲音和更強的支持，就走到了社會上去，上街游行，到了最後絕食就變成了一場非常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從此學生就再沒有力量控制這個社會運動，因為學生的力量祇是在於影響，而不在於控制。變成社會運動過後，整個社會的訴求就複雜得多，包括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目標，包括體制內體制外各自希望的，比如說改革派上臺的這種訴求，包括民眾要求打倒官倒、清除貪污、平穩物價這種訴求。這些都已經被泛化了，在目標泛化過程當中學生是無能為力的，學生祇能一直強調學生自己的訴求，就是思想啟蒙運動。所以學生才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包括體制內、外的黨派，包括社會民眾的這些，學生都不代表，學生祇代表自己的聲音。我相信學生在不參與黨派之爭，最後演化成堅持非暴力的運動，在目標上是一貫的、一致的。張倫：對白夏先生關於通行證的問題，這一點我們要在搞清史實的基礎上再去總結，因為這個事情本身不代表學生的封閉性，當時有許多具體的實際情況，這一點是事後作為其他朋友來說可能並不能感受到的東西，比如說為了保持當時生命線的暢通，必須控制廣場的秩序，包括其它等情況，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白夏：八九年年初你們每一個人的經驗是什麼，比方說，當時你【以上第354頁】們聽說過沒有方勵之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你們是不是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民主沙龍，關於運動的思想準備，你們接觸到那個程度？你們有沒有跟非官方形式的活動接觸？

白夏：八九年年初你們每一個人的經驗是什麼，比方說，當時你【以上第354頁】們聽說過沒有方勵之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你們是不是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民主沙龍，關於運動的思想準備，你們接觸到那個程度？你們有沒有跟非官方形式的活動接觸？

白夢：這個問題牽扯到整個八九民運的思想基礎和思想準備。我想在八九民運發生以前的八七年的下半年，以至八八年，最早在知識界召開過各種各樣的討論會。《世界經濟導報》搞的關於球籍問題的討論，這個討論將近進行了一年之久，在這個討論中許多著名的一批知識分子，比如於浩成、嚴家其對中國的現實、改革以及中國的制度問題已經提出了比較充分的考慮。我昨天跟劉再復、範曾先生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認為一些知識分子現在逃亡出來兩年之後談論的有些問題還沒有超過他們在八七年、八八年所達到的深度。這是整個八九民運能夠發生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

八九年春天方勵之、北島他們發起的釋放政治犯的簽名信在校園裏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最早的民主沙龍以及各種座談會為八九民運提供了許多方面的靈感。

我總體上認為整個八九民運發生的思想背景和思想根源是來自於這一部分比較先進的知識分子。

梁二：關於白夏先生的問題我想是一個學生運動與整個社會各階層的接觸的問題，就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問題，準確說學生運動，在早期的一些學生的民主沙龍以及與方勵之私人的聯繫和其它思想家的接觸都是這樣一種整體與部分的關係，當時的學生。特別是我們這樣年輕的學生生活在一個由知識分子倡導起來的大量引進西方信息與先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這樣的時代當中，我自己曾經受到過這樣的熏陶，在這種信息的背景之下，我們獲得很多的對社會、對中國的一些實際情況的新的了解和認識。因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思想根源之一

第二我想談到白夏先生這個問題也是形式上的一種分裂，不是完全的一種分裂。對方勵之事件實際上當時在師大自治會，因為我當時是師大自治會的一個負責人，當時師大曾經對大批方勵之赴宴風波和包遵信等幾十個著名知識分子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公開信等在學生中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並且成為學生運動發起高潮的一些組織力量之一。所以我認為在形式上並沒有完全割裂，而且它本身一直與整個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保持一種聯系性；第二我想說

在本【以上第 355 頁】質上也確實有很多更深的聯系，比如象我們自己最初的

每一個組織者都有知識分子給他們出謀劃策，我是接觸了這樣的一些人，所以

我自己覺得在本質上、也就是在這種表面現象的掩蓋之下還有更深的一些聯系。

我認為白夏先生的提法，封從德這個提法也不是特別正確，也就是說封閉性本身不成立。

第二我想談到白夏先生這個問題也是形式上的一種分裂，不是完全的一種分裂。對方勵之事件實際上當時在師大自治會，因為我當時是師大自治會的一

個負責人，當時師大曾經對大批方勵之赴宴風波和包遵信等幾十個著名知識分

子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公開信等在學生中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並且成

為學生運動發起高潮的一些組織力量之一。所以我認為在形式上並沒有完全割

裂，而且它本身一直與整個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保持一種聯系性；第二我

想說在本【以上第 355 頁】質上也確實有很多更深的聯系，比如象我們自己最

初的每一個組織者都有知識分子給他們出謀劃策，我是接觸了這樣的一些人，所以我自己覺得在本質上、也就是在這種表面現象的掩蓋之下還有更深的一些聯系。我認為白夏先生的提法，封從德這個提法也不是特別正確，也就是說封閉性本身不成立。

封從德：剛才白夏先生的問題主要是根據我們每個人的經歷。我覺得我個人的經歷，可以給大家提供點線索，說明象我這樣的同學，是怎樣參加進這個運動的。先說我八九年初在幹什麼。我是八二年到了北京大學，八六年上研究生，那麼到八九年六月我就應該做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我當時正在忙那個論文。另一個非常忙的就是準備出國，和柴玲一塊準備了半年，八九年的一月十四日考托福，二月四日考GRE。二月五日之後有十二天時間回家，因為柴玲家在山東，我在四川，在這十二天之內我們轉了半圈的中國，這麼一轉我對中國就更加地失望。當時的心情確實是對中國的失望：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想離開中國；就算是地位應當比較高的科研人員，在社會上也沒有政治前途和經濟地位。導致我參加學運最重要的一個客觀原因，就是我的計算機沒辦法用，壞了，我的論文也沒辦法作了。因為當時要作這麼大的兩件大事情，一個論文，一個出國，如果沒有計算機壞了這個原因我是不可能有時間看大字報，不看大字報也就不可能卷進去。當時，所謂民主思潮實際上基本上沒有波及到我。在二月份的時候，布什邀請方勵之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聽到布什在電視當中的一個演講，因為我當時想練練英文，所以就聽聽他的演講，如此而已。方勵之二月份在北大有一個大字報，叫《中國的失望與希望》，我看了確實也很激動，激動過後還是回去作論文。三月八日，李淑賢又在北大寫了一個她作為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工作報告，講她一年幹了什麼。我發現她對她的選民非常負責，我看了很感動，這個時候我才感到在北大在中國還有這麼一批人，希望中國有希望。

參加運動之前，四月十八日這天，我非常矛盾。當時我的外語成績是完全沒有問題，托福六百三，要到美國去是沒有問題，我五月在廣場上的時候就收到了波士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年是兩萬二的獎學金，所以要參加這個運動是要下非常大的決心的。那天，我還沒有明確意識到這點，只是在感情上，覺得中國沒有希望才要離開中國【以上第 356 頁】的，但是突然在這個時候，發現中國又有那麼一點希望了。所以三月八日的時候我給李淑賢寫了一封信，是以一種非常痛苦的心情給她寫的。我說，我要出國實際上是想要永遠離開中國。那個時候我內心裏覺得，中國人在幾十年這種人性的壓抑當中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中國太窮。出了國的人等於就是二等公民，但是即使是二等公民好象還是比在中國有點前途。四月十八日的時候，我非常矛盾的就是這個問題：到底要留還是要走，因為這個時候中國的希望已經開始了，四月十五日胡耀邦一死，我就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希望。因為八六年和八七年的學運我也參加過，而且被抓過，八八年的北大學運也參加過，只要中國有一點希望我就要加入進去。

參加運動之前，四月十八日這天，我非常矛盾。當時我的外語成績是完全沒有問題，托福六百三，要到美國去是沒有問題，我五月在廣場上的時候就收到了波士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年是兩萬二的獎學金，所以要參加這個運動是要下非常大的決心的。那天，我還沒有明確意識到這點，只是在感情上，覺得中國沒有希望才要離開中國【以上第 356 頁】的，但是突然在這個時候，發現中國又有那麼一點希望了。所以三月八日的時候我給李淑賢寫了一封信，是以一種非常痛苦的心情給她寫的。我說，我要出國實際上是想要永遠離開中國。那個時候我內心裏覺得，中國人在幾十年這種人性的壓抑當中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中國太窮。出了國的人等於就是二等公民，但是即使是二等公民好象還是比在中國有點前途。四月十八日的時候，我非常矛盾的就是這個問題：到底要留還是要走，因為這個時候中國的希望已經開始了，四月十五日胡耀邦一死，我就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希望。因為八六年和八七年的學運我也參加過，而且被抓過，八八年的北大學運也參加過，只要中國有一點希望我就要加入進去。

當時在北大有好幾類，我知道的有兩派，一個叫麻派，一個叫托派，打麻將和考托福，根本就不學習，學習的都是想出國的，我就是屬於這一派。其它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知道。當時，見到所有的北大籌委會來的“知名人士”，我都講，“對不起，我對中國的名人都不知道。”比如說魏京生，我的印象，祇是他偷了什麼東西還是出賣了什麼情報。後來任曉町到我們的廣播站來，我自己個人的態度也非常地回避他，因為他到廣播站來祇要情緒一達到某種程度，就要喊“打倒共產黨！”這個口號是不能為當時的學生所接受的。後來到了廣場他還寫了一篇文章給我看，我也是採取回避的態度對待他，這是值得檢討的。我們學生是不了解中國的歷史的。

常勁：我說得簡單一點，因為封從德跟我要說的想法差不多。當時我覺得在我們北大學生裏整個比較消沉，對中國前途很悲觀的看法比較多。因為我們對中國的問題平時都作了一些分析，那麼當我們接觸到很多的外部信息以後，對中國的前途就很悲觀。而且當時中國商風流行社會，整個對知識分子不太重視，作為大學生我們對前途也很悲觀。我們出去以後工資也就是七十多塊錢，連自己都養不活。

我當時在北大搞《北京大學教育學社》，但我覺得我自己是個少數派，就是還想著為國家出點力氣。這也是我為什麼後來積極參加學運的原因，就是通過學運我看到一種希望，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少數派了，我覺得很多同學都把這種火種藏在心裏，在運動爆發時，這種火種也爆發出來了，使我看到了希望，所以我後來也是非常積極地參與了學運。【以上第 357 頁】

王超華：我可能和他們的情況不太一樣，我先講一下我的簡單情況。我原來學建築結構，在一個設計院畫了六年多的圖。後來因為喜愛文科，而且加上招聘考試到《光明日報》當編輯。當了兩年之後，覺得更想專業一點，所以就考了研究生。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的工資是越來越少，我在當編輯的時候回到我

原來的設計院拉私活，畫一張圖可以得到二百到二百八十塊錢。但是我還是願意這樣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認識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我覺得收入少一點，但我得到了更多的思想空間，我還是挺願意的。

八九年初第一我知道方勵之他們要求釋放魏京生的那封信，北大有六個人簽名，六個人都是我們家的朋友，基本上都和中文系有關。北大中文系領導後來找吳祖湘先生說，“你不要緊張，我們不追究。”吳先生說，“我緊張什麼，我都八十多歲了，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就是覺得如果有關文化革命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可以放出來，魏京生關了十年為什麼不能放？”我們在家裏聊天，他到我們家來，我們都覺得很振奮的。第二我知道方勵之去布什的宴會沒有進去的事。我當時看了新改編的《東方紀事》，當時第一期上就有這個報道。還有戴晴的關於儲安平的長篇報告文學，再有戴晴在那年人大開會之前出了一個關於三峽論爭集的《長江，長江》。我在《光明日報》工作的時候和戴晴的辦公室是斜對門，我在那是作一個雜誌的編輯。這個《長江，長江》這本書出得是非常緊張，是很多學者自己湊錢出的，而且就是希望人大、政協會能討論，趕緊趕在這之前舉行發行儀式。發行儀式的橫幅是我原來的一個好朋友，編輯部的美術編輯幫她畫的。我父親是全國政協委員，在前幾年的政協會上自由氣氛是相當活躍的，他就經常把政協的文件帶回來，而且講一些文件上不登，但會議上反應非常強烈的東西。比如，徐四民先生兩次說，“既然在起草新聞法，如果允許私人辦報，我第一個回國來辦私營報紙。”這是在八九學運中要把這個加進學生要求中的一個主要動機。但是客觀地說，一直沒有真正得到學運的重視，成為學生的要求。到了八九年我仍然對政協、人大兩會抱有希望的時候，我父親回來說，“今年不允許民主人士個人發言了，我們民盟祇讓出一個代表。”丁石孫因為關於教育情況的三個調查報告和李鐵映發生激烈爭執，是費孝通去調解的。【以上第 358 頁】

劉衛：我直接回答白夏的提問。我在參加學運以前參加過一點社團的活動，討論的問題大多是討論社會的狀況。我當時參加的活動更多的還是院方學生會的活動，當時八九民運當中湖南的領袖幾乎全都是院方學生會，他們就以院方學生會的名義進入到學運當中來。

在湖南的學運過程當中，高自聯的幾個領袖全都是原官方的頭頭。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中南工業大學每個系的學生會主席和院學生會主席曾經開會討論支持北京學運的問題。這是官方的學生會開會辦這些事情。而其它各校學生會也都是這樣。

魏京生我知道的跟封從德知道的一樣，好象他是個小偷。方勵之的這件事是通過北京廣播電臺知道的，但并不詳細。但是從感情上在方勵之的這一面，因為方勵之不是官，這很簡單。

辛苦：白夏先生問到學生運動的起因和動機，作為一個在外地普通的學生，我不在北京，政治氣氛不是那麼濃，在文化啟蒙這個過程中，就失去了許多機會去了解這些，象魏京生、任畹町等。

我生長在西安，在蘭州大學上的大學，氣氛不是那麼濃，那麼參加這個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由一件件事，象您剛才提到的方勵之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的事情，還有方勵之赴宴事件、三十三人簽名事件、回族抗議宗教迫害活動。我參加了一個學生的探索學社，在這裏我們也請了一些經濟方面的社會學方面的人，象史實我們就不清楚，受共產黨的教育就是對歷史是歪曲的了解。那麼這些學生的組織，象學社、民主沙龍都是政治色彩稍強點就沒有人去參加，而政治色彩

不那么強烈、娛樂性的相反很多人參加。所以說在運動初期有組織地進行學生運動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一次一次的來自外來的不滿和對前途的無望，如物價的飛漲，這是更直接的原因。還有每一次學生事件之後，站出來說話的不管是學生，還是同情學生的知識分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這樣在運動中大家有一種恐懼感，如果運動失敗，運動的參加者會受到迫害。大家就感覺到我們有必要組織起來，能夠有組織地進行一種政治上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走向了自覺的民主，然後發展向社會。

劉燕：白夏想知道大家參加學運的初衷是什麼，我就想說一下我的初衷是什麼。【以上第 359 頁】

我自己是學新聞的，對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有一些了解，但祇是在我學生的局限性之內的了解。學運前期我並沒有參加什麼，因為我在四月二十二日去游行，因為游行而被四二六社論定為了一小撮人，使我的一種情緒激發，我是因為一個好的願望去游行，他們為什麼說我是反革命或一小撮人，那樣才真正地參加這場運動。

在學運之前，這中間當然還有很多情緒的蘊釀，象八六、八七學運，學生中都有一種不滿，但是真正能夠說，我願意參加這種民主運動或者說對這種運動真正有很多思考的人並不是很多，而是在運動當中逐漸有了一種民主的意識，有了一種民主的訴求。

張伯笠：我是剛從大陸逃亡出來的。我想剛才白夏先生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是我們每個人是怎麼想參加這場運動的？通過這個大家可以知道對這場運動的各個層次的人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我本人呢，我想跟大家都不一樣，二十一個通緝的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中我跟超華是屬於年齡比較大的。我當年當過知青，大學畢業以後我作新聞記者，然後我又做報告文學作家，後來到了北京大學作家班。我對於中國這場民主運動是有預測的，就是說我有我的思想準備。我對中國是非常清楚的，我經常在農村、工廠這些地方採訪，和人經常接觸，寫一些他們的黑暗面，就是共產黨的黑暗面。對共產黨本身也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在這二十一個被通緝的人中，我又很特殊，是一個共產黨員。那麼我作為共產黨員為什麼參加這場民主運動，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場運動我認為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有機聯合在一起的。中國就比方是一個大氣球，它憋得非常緊，四十年來的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意識與對人性的壓抑，它把你憋在一個氣球中，你偶然有一個針捅一個眼兒，它就會大爆發。八九民運就是因為胡耀邦的這個針眼兒捅出去了，所以它就爆發了。

我在北大作家班的時候經常參加沈彤、王丹他們那個民主沙龍的活動。我就覺得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意識，我們祇有依附於這個政權，依附於獨裁者，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那麼中國知識分子怎麼辦？學生運動就給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契機，就是知識分子要不要參與？怎麼參與？我想一開始在學生自發的這種運動中，這個設計就是一個屬於這種理性的、非暴力的，或叫封從德先生講的那種訴諸於民主。剛才白夏先生提到為什麼排斥工人參加呢？雖然我本【以上第 360 頁】人參加了，但是我還是排斥工人。因為我們所要求的

東西不是推翻政權。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都是用暴力奪取的政權。那麼你

用暴力奪取的政權你必然用暴力去保衛它，而中國人從來沒有學會什麼叫民主。

這種惡性循環已經是幾千年了，我們這一代如果再這樣循環下去，我認為中國就沒有什麼希望了。所以我們這個民主運動從一開始就本著要在民主中學會民主，用和平演變的方式進行這場運動。

我在北大作家班的時候經常參加沈彤、王丹他們那個民主沙龍的活動。我就覺得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意識，我們只有依附於這個政權，依附於獨裁者，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那麼中國知識分子怎麼辦？學生運動就給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契機，就是知識分子要不要參與？怎麼參與？我想一開始在學生自發的這種運動中，這個設計就是一個屬於這種理性的、非暴力的，或叫封從德先生講的那種訴諸於民主。剛才白夏先生提到為什麼排斥工人參加呢？

雖然我本【以上第 360 頁】人參加了，但是我還是排斥工人。因為我們所要求的東西不是推翻政權。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都是用暴力奪取的政權。那麼你用暴力奪取的政權你必然用暴力去保衛它，而中國人從來沒有學會什麼叫民主。這種惡性循環已經是幾千年了，我們這一代如果再這樣循環下去，我認為中國就沒有什麼希望了。所以我們這個民主運動從一開始就本著要在民主中學會民主，用和平演變的方式進行這場運動。

胡耀邦去世以後，我們這裏有很多同學對胡耀邦沒有什麼感情，但是我有感覺，因為胡耀邦在我工作期間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我們叫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比較開明的人士，那麼他的逝世使我們產生對共產黨本身它這個體制的思考。有一個最大的思考就是非程序權力繼承問題。胡耀邦的死導致了共產黨內的一些鬥爭的激化，當時共產黨幾個顧問委員會的人，幾個政治局的人就罷掉了，沒有開黨的會議嘛，不僅僅是民主程序，就是共產黨內的組織程序都是不允許的，所以當時很多共產黨員參加這場民主運動，我想跟胡耀邦是有一定關係的。

我認為這場民主運動是非常偉大的，我個人認為，跟五四運動比要偉大。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外、對帝國主義，它有反對二十一條，它還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而這場運動我認為是人民對本民族意識的覺醒。我當時就在民主大學主持開學典禮，當我站在那宣佈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結束的時候，軍隊已經進入了天安門廣場。當時我就是有兩種感覺，不是對軍隊的憤恨，而是悲哀。一個是對共產黨的悲哀，我認為共產黨它終於撕下了自己的面目，我作為共產黨員我跟他徹底決裂了。第二我對人民的悲哀，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從來沒有意識到共產黨會用坦克、機槍鎮壓我們，這個悲哀就是我們的民主運動是多麼的重要，它要讓人們知道我們要有自己。所以我想這場民主運動是偉大的。

沈彤：我作為主席也回答一下白夏先生的問題，直接回答。剛才我問李錄，“你在運動以前在南京也有很多活動。你要不要講一講？”他說，“不要講了，”我們兩個人都寫了書了，在書裏都有了仔細的描述。我從兩個比較大的方面講一下。一個是說北大的活動，因為北大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是說別的學校沒有起作用，但北大在近幾年都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有一定的延續性，一些學生組織者或者叫學生領袖絕大部分都是參加過以前的學生運動的，八六年、八【以上第 361 頁】八年和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八九年初的時候從北大來講當時幾個大的活動，象方勵之赴布什的宴會是一個，還有剛才辛若提出的，外地也有類似情況，《性風俗》這個書出來之後宗教問題提出來了，還有八八年底的時候十二月十日西藏的開槍，就是拉薩宣佈戒嚴，那是一個比較大的事情。其它的象三月份的時候理論界有一個很大的討論會，討論時局，就是以北京為主的前衛知識界，對當時的情況憂心忡忡，尤其當時經濟政策緊縮以及全國基本建設下馬之後造成了直接的四千萬的民工的血流，給城市造成很大壓力。其次在這種背景之上有一些具體的跟校園有聯繫的事件，一個是在北京開了《中國大赦》組織，之後發生了兩次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信和方勵之個人致鄧小平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的信，這在校園都有影響，老木先生就是當時的發起者之一。還有就是蘇紹智先生在年初的時候有個改革開放十年研討會上的發言，當時受到壓制，這也是很大的事情。這些事情不勝枚舉，對校園直接影響很大。比如說大家都談到的一些校園社團方面的活動就跟這些前衛的知識分子，社會上的這些活躍分子直接就有個人聯繫。其次這種大的環境使一些學運的活躍分子認識到八九年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這個機會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全民的不滿，各種政治、社會危機的因素造成的一種機會。另外是消極地去看，如果八九年沒有什麼大的舉動的話，那麼至少民主運動就要推遲三至五年，就是說最早，當時估計可能下一個機會是在九二年，在經濟上國際社會壓力比較大，就是還債高峰開始的時候才有可能有下面一個機會。同時緊縮政策好象是開始發生作用，分析我就不

具體講了。

沈彤：我作為主席也回答一下白夏先生的問題，直接回答。剛才我問李錄，“你在運動以前在南京也有很多活動。你要不要講一講？”他說，“不要講了，”我們兩個人都寫了書了，在書裏都有了仔細的描述。我從兩個比較大的方面講一下。一個是說北大的活動，因為北大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是說別的學校沒有起作用，但北大在近幾年都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有一定的延續性，一些學生組織者或者叫學生領袖絕大部分都是參加過以前的學生運動的，八六年、八【以上第 361 頁】八年和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八九年初的時候從北大來講當時幾個大的活動，象方勵之赴布什的宴會是一個，還有剛才辛苦提出的，外地也有類似情況，《性風俗》這個書出來之後宗教問題提出來了，還有八八年底的時候十二月十日西藏的開槍，就是拉薩宣佈戒嚴，那是一個比較大的事情。其它的象三月份的時候理論界有一個很大的討論會，討論時局，就是以北京為主的前衛知識界，對當時的情況憂心忡忡，尤其當時經濟政策緊縮以及全國基本建設下馬之後造成了直接的四千萬的民工的盲流，給城市造成很大壓力。其次在這種背景之上有一些具體的跟校園有聯繫的事件，一個是在北京開了《中國大赦》組織，之後發生了兩次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信和方勵之個人致鄧小平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的信，這在校園都有影響，老木先生就是當時的發起者之一。還有就是蘇紹智先生在年初的時候有個改革開放十年研討會上的發言，當時受到壓制，這也是很大的事情。這些事情不勝枚舉，對校園直接影響很大。比如說大家都談到的一些校園社團方面的活動就跟這些前衛的知識分子，社會上的這些活躍分子直接就有個人聯繫。其次這種大的環境使一些學運的活躍分子認識到八九年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這個機會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全民的不滿，各種政治、社會危機的因素造成的一種機會。另外是消極地去看，如果八九年沒有什麼大的舉動的話，那麼至少民主運動就要推遲三至五年，就是說最早，當時估計可能下一個機會是在九二年，在經濟上國際社會壓力比較大，就是還債高峰開始的時候才有可能有下面一個機會。同時緊縮政策好象是開始發生作用，分析我就不具體講了。

同時還有一些聯繫，比如說想王軍濤、陳子明這樣的人在各地也有了，就是說從七八年以來積累下來的這些社會活躍分子跟校園的聯繫，跟學生也有聯繫。第二方面我想強調，實際上這類的聯繫在校園裏這類學生是占極少數的，比如說民主沙龍的核心成員祇有五個人，奧林匹亞科學院祇有八個人，在外圍組織也不過幾十人，總共加起來超不過二、三百人的。北大的學生人數是一萬兩千，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比例是非常小的。那麼其他的人呢，象剛才封從德提到的就是所謂五派了，托派、麻派、玄派、商派、戀愛派，沒有一個是讀書的。但是這個反映了一個問題，一個很積極的因素在裏邊，就是說自我意識，自我覺

醒意識，開始拋開原來國家已經有的這種給所謂天之嬌子大學生已經建立的這個程序。不管從工作分配上，在校園本身大家都開始拋棄舊的價值觀念【以上第362頁】，開始有自我覺醒意識。最著名的幾個事件我想大家都聽說過，學生脫光了衣服站在樓頂上喊“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崔健當時在校園裏的轟動和影響，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基本上就是這樣，所以這種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情緒實際上是最大的政治覺醒意識的進步。在這個基礎之上，少數的學生活躍分子站出來，利用胡耀邦去世的這個機會，象伯笠說的胡耀邦的這個針眼就很自然地在幾天之內發展成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之後發展成全民運動。

同時還有一些聯系，比如說想王軍濤、陳子明這樣的人在各地也有了，就是說從七八年以來積累下來的這些社會活躍分子跟校園的聯系，跟學生也有聯系。第二方面我想強調，實際上這類的聯系在校園裏這類學生是占極少數的，比如說民主沙龍的核心成員只有五個人，奧林匹亞科學院只有八個人，在外圍組織也不過幾十人，總共加起來超不過二、三百人的。北大的學生人數是一萬兩千，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比例是非常小的。那麼其他的人呢，象剛才封從德提到的就是所謂五派了，托派、麻派、玄派、商派、戀愛派，沒有一個是讀書的。但是這個反映了一個問題，一個很積極的因素在裏邊，就是說自我意識，自我覺醒意識，開始拋開原來國家已經有的這種給所謂天之嬌子大學生已經建立的這個程序。不管從工作分配上，在校園本身大家都開始拋棄舊的價值觀念【以上第362頁】，開始有自我覺醒意識。最著名的幾個事件我想大家都聽說過，學生脫光了衣服站在樓頂上喊“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崔健當時在校園裏的轟動和影響，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基本上就是這樣，所以這種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情緒實際上是最大的政治覺醒意識的進步。在這個基礎之上，少數的學生活躍分子站出來，利用胡耀邦去世的這個機會，象伯笠說的胡耀邦的這個針眼就很自然地在幾天之內發展成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之後發展成全民運動。

施舟人教授對張伯笠提問：你剛才說中國幾千年沒有什麼民主，你是根據什麼資料、根據什麼研究、根據什麼歷史事實？

張伯笠：我說中國幾千年來政權的接替完全不是民主程序的，我認為從古代看中國的農民起義，每一次起義後必然會被一些人篡奪了領導權。而農民起義帶來的祇 焚燒、屠殺，而它產生的新的政權還是獨裁的，還是封建的。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上臺都是用暴力奪取的，這種用暴力奪取的政權必然要用暴力來保護。

施舟人：你一點也沒有回答，我問你根據什麼資料、你自己的研究來確定的？你說的是非常籠統的，一些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對中國歷史發展、各個運動的看法。但是這個看法是不是正確？你自己說你在農民社會呆了一段時間，你對農民社會有一定認識，你提到農民起義。但是有沒有中國的農民起義這很難說。有這麼一個看法，這個看法是從馬克思對歷史的看法來的。但是馬克思是德國人，他對德國社會有一點認識。我的意思是有些話你是差不多說反了，雖然有這麼一個思想的基礎，但是不一定是正確的。可能中國從前沒有什麼農民起義。

張伯笠：李自成。

施舟人：這個是農民嗎？

張伯笠：李自成不是農民嗎？

施舟人：不是農民呀，當然它是一個宗教活動。

張伯笠：那麼中國共產黨的運動你不認為是農民運動嗎？

施舟人：當然不是。太平天國也不是。

張伯笠：可是我的看法和你的不一樣，我認為他們都是農民運動。【以上第 363 頁】

施舟人：我們現在一下討論不完。我希望我們下一次有一個學術討論會，我們能一起來研究研究。（鼓掌！）

張倫：在開會之前本人再三強調，如果討論觀點的會議本人就不參加，祇有陳述事實的這部分本人參加。我們在解釋歷史的時候必然要有一個理論框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八九民運究竟怎麼看，我們不可能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爭論，也不可能一下達到共識，所以我們這個會才搞的是史實。

關於剛才白夏先生的問題。本人和老木在與會者當中可能有點特殊，祇有我們兩個是沒有學生身份、但是最後參加到學生運動當中，作了一些組織工作的。我個人參加這場運動的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良心促使。由於本人是研究社會學的，這幾年搞了許多大量的市政社會研究，中國十年以來重要的文化熱討論，政改，經改本人都是直接參與者，重要的幾個改革的大方案本人都是直接參與者，因此對中國的問題我有比較深刻的從體驗到理論上的認識。我對運動方式總是不太抱有贊同的，但是由於本人在學校當中曾經被請去作過一些關於民主、關於社會發展問題的演講，那麼當學生，包括我還有一些在校的朋友他們上了街走向廣場的時候，我覺得理性的判斷和一個人的良知，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人類生活就永遠有矛盾，在這一點上我的良知壓倒了我的理性，我覺得必須站到第一線去跟學生在一起，躬身踐行自己的信念。這就是我為什麼參與這場運動的一個整個的過程。運動前期的一些事情，據我的了解由於美國之音種種報道和其它社會傳聞很多，關於方勵之的事情，包括徐四民和長江三峽等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學生對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很廣，是因為這些傳聞和外電的報道。

老木：我也是參加學生組織不是學生身份。我是北大畢業的，畢業以後在北大搞社團活動，搞文學社，一直和北大的學生有緊密的聯繫，新進校的學生也

有認識的，包括王丹。在友誼賓館那個會的時候，就是方勵之和陳軍發表要建立知識分子壓力團體的會上，王丹也去參加了。我在搞北島、陳軍的簽名信的時候跟王丹也有一些接觸，我知道民主沙龍的事情。胡耀邦逝世之後，在十八日香港記者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說學生已經上天安門廣場游行了，問我的看法。我說，我對這個運動是悲觀的，我說肯定要失敗，希望學生非常理性的發動【以上第 364 頁】這個運動。我想這個採訪的記錄可能在當時的英文《虎報》上。我一開始對這個運動是非常悲觀的，對運動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那麼我又為什麼最後參加這個運動呢？我覺得我是要盡我自己的一份責任和一份良心。這也就是我和一些學生的想法不太一樣的一個因素。

老木：我也是參加學生組織不是學生身份。我是北大畢業的，畢業以後在北大搞社團活動，搞文學社，一直和北大的學生有緊密的聯繫，新進校的學生也有認識的，包括王丹。在友誼賓館那個會的時候，就是方勵之和陳軍發表要建立知識分子壓力團體的會上，王丹也去參加了。我在搞北島、陳軍的簽名信的時候跟王丹也有一些接觸，我知道民主沙龍的事情。胡耀邦逝世之後，在十八日香港記者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說學生已經上天安門廣場游行了，問我的看法。我說，我對這個運動是悲觀的，我說肯定要失敗，希望學生非常理性的發動【以上第 364 頁】這個運動。我想這個採訪的記錄可能在當時的英文《虎報》上。我一開始對這個運動是非常悲觀的，對運動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那麼我又為什麼最後參加這個運動呢？我覺得我是要盡我自己的一份責任和一份良心。這也就是我和一些學生的想法不太一樣的一個因素。

旁聽者：我想提一個問題，當時的《河殤》對中國社會各階層造成的這個影響很大，我覺得這對民主運動有絕對的啟蒙的作用。

張倫：您認為在什麼層面？在心理層面呢？還是在理論層面？我的看法是不贊成在理論層面對民主運動有太多的指導意義，我祇認為在當時的社會心理上、情緒上有很大的影響。

張伯笠：這個《河殤》當時出來的時候是什麼背景呢？最初是拍了一個《黃河》，這個《黃河》拍出來以後中央電視臺賠了錢，沒有人看，就找了幾個比較有思想性的作家，蘇曉康、遠志明、王魯湘、謝選駿，他們就先寫了本子，從原來那個《黃河》裏邊剪了很多鏡頭，拍了這個《河殤》。我在北大參加過幾次《河殤》討論會，關於理論問題《河殤》所談的一些理論在很多理論家和思想家他們已經作了綜述。《河殤》舉了一個黃土文化，主要指的黃河文化，它完全

是一個反傳統的東 西。它說長城的象征并不是民族的驕傲，而是防御，自從中國修了長城以後再沒有前進過，再沒有發展過。我覺得《河殤》重要的就象張倫說的，它在民眾中產生情緒。因為中國人不知道我們國家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的民族為什麼會這樣，它想找個理論根據，它希望西方的所謂的蔚藍色的文化和黃土文化能夠有機地融合。它通過蔚藍色的文化學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先進的思想。這個《河殤》出來以後在群眾中我認為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對我們這場運動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常勁：我覺得《河殤》對我和我的同學來說從感情上影響是非常大的，一個是它挑動我們的愛國心，那種關心。另外是挑動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感、思考，所以我們對中國的問題作了很多新的思考。因為《河殤》它本身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它從理論上來說確實使我們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產生了許多的思考，當時確實是震撼了我的心。我覺得它對學運的產生也有一定的影響。【以上第 365 頁】

封從德：關於《河殤》我的印象是在八八年九月、十月，在電視裏看了，就好象幾個同學說的，感性的成份比理性的成份激發起來的多得多。實際上在中國，有一個很時髦的詞，叫憂患意識。但是六四過後，我和柴玲逃了十個月，遇到了民間社會，工人、農民，才讀了一些孔孟老莊，發現跟著知識分子反傳統，好象反錯了，傳統裏邊的精華實際上很多。《河殤》給人的情緒就象魯迅說的，大家最好不要讀古書。但是我讀了一點古書，發現古書裏還是有很多好東西。跑出來我第一想學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東西，研究研究歷史。

白夢：蘇曉康出來之後，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許多人提出來說《河殤》是不是煽動了八九民運。他不止一次地直接回答過，沒有。我個人認為《河殤》首先是情緒化的。《河殤》主要是一種焦慮，對中國未來的焦慮，對現實的焦慮對歷史的焦慮，這個焦慮可能對人們的這種心理衝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河殤》的基本基調儘管它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儘管王震說他是反動的，但它完全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東西。

老木：我到現在為止沒有看過《河殤》這部電視片。但是我和曉康和其他作者很熟，我看過電視解說詞，所以我想我對《河殤》的掌握還是準確的。我認為《河殤》是十年改革開始，從一九七九年到八八年的十年改革所有的對新的、對西方理論的探索和研究的普通化，把它變成一個普遍的、常識性的一個嘗試。這個嘗試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使人感受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在情感上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對八九民運有煽動作用，可能一個普通老百姓和一個知識分子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因為知識分子中間對《河殤》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但是我對《河殤》這個作品對於當時十年改革理論成果把它化成一種常識、一種普通的大眾宣傳效果效果，我認為它是一個成功的嘗試。

劉衛：我覺得《河殤》是煽情的。

沈彤：我發現各位有一點沒有明確，就是因為知識界和民眾之間【以上第 366 頁】對《河殤》確實是有褒有貶，但是感情都是比較激烈，所以這是好的社會作品的一個證明。唯一可以大家有一個共識的是，當時它是建國以後第一次

通過電視傳播一種文化思想，不管它的思想正確與否，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

至於它談到的一些文化問題，包括什麼海洋文化、河流文化、圖騰、反傳統等，

其實都很值得討論的。但是它的社會效應在於它本身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它裏面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一些之外，還有象什麼國家主義、英雄主義一些情愫，實際上是反民主的。

沈彤：我發現各位有一點沒有明確，就是因為知識界和民眾之間【以上第 366 頁】對《河殤》確實是有褒有貶，但是感情都是比較激烈，所以這是好的社會作品的一個證明。唯一可以大家有一個共識的是，當時它是建國以後第一次通過電視傳播一種文化思想，不管它的思想正確與否，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至於它談到的一些文化問題，包括什麼海洋文化、河流文化、圖騰、反傳統等，其實都很值得討論的。但是它的社會效應在於它本身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它裏面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一些之外，還有象什麼國家主義、英雄主義一些情愫，實際上是反民主的。

女士：我覺得八九的學運和民運為什麼能產生，它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執政四十多年來，在民間對人民積怨甚多，使廣泛的、各階層的人民深感不滿。首先學運對學生來講是對前途和命運的憂慮，為什麼？是因為我們政府的腐敗，我們國家沒有民主，一黨專政。在這種情況之下產生了初期的學生運動。

學生起來了以後，緊接著民眾也起來了，為什麼？因為民眾也有不滿，他看到共產黨拿這個學生運動也是束手無策，所以他也覺得法不責眾，所以也加入進去。所以學生運動突然能夠成為幾百萬人上街的民眾運動，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有不滿而懼怕消失的時候才能起到這個作用。

學生在這麼好的條件之下為什麼不能象當年的五四運動，象共產黨一樣把群眾組織起來？光是學生鬧根本對共產黨沒有威脅，文革的時候高校曾經停課停了七八年，對共產黨又有什麼威脅呢？但是從歷史來講，從國民經濟的情況來看，工人罷工，店員罷市，交通癱瘓的話，幾個禮拜局勢就會完全不一樣。學生總是自己是自己，非常害怕和民眾結合起來。我當時覺得很失望，覺得這必然導致整個學運的失敗。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一方面我覺得是他發動了群眾，依靠了群眾，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民主當時對國民黨的腐敗不滿。在這個情況下，它組織民眾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共產黨政權，實際上當時是代表了很多人的心願，對國民黨的不滿，希望有個新的政權。學生運動開始並沒有意識到在民間共產黨四十年來所積下的那么多的民憤，他們自己講是啟蒙運動，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民眾發動起來了、發展起來了的情況之下，仍然是我管我，你們最好不要參加，好象不然的話將來的罪孽就更大了。我覺得這是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以上第 367 頁】

我有時候甚至都覺得，當時的時候如果有槍，民眾拿起槍來，並不一定會被鎮壓下去。衛國戰爭的時候，蘇聯都是把槍發給民眾。當然那時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戰爭，蘇聯人和德國人分得很清楚。那麼法國攻打巴士底獄時也是民眾拿起槍，那是國內的。學生運動對外面的人來講既希望於學生，又覺得學生好象把自己封為一種精神貴族。所以我覺得如歷史能夠返回的話，我們有現在這樣的思想基礎的話，如果我們有重新選擇該走怎樣的路的話，當時從四月十五

日胡耀邦逝世，一直到戈爾巴喬夫訪華，民眾起來，到絕食的時候，所有的民眾都去聲援的時候，如果那個時候……我也不太理解，

作為學生運動，它應該廣泛地與以前的知識分子或廣泛和民眾能夠結合的話。我覺得如果現在民運剛剛開始，重新有選擇，重新開始的話，八九的民運可能就不會是象八九的結局。

張倫：關於歷史事件的實際運作和理念的差距，我想作過歷史研究的人都理解。我覺得在八九民運當中也是同樣如此。我就剛才這位女士講的問題提出一個矛盾，就是你說學生沒有注意到群眾中間積著那么多的怨恨，反過來又說學生。這個我不作評價，我現在就是說我知道的事實。學生當中不是沒有去組織工人，而且就在戒嚴令快下來和下來之後，在運動工人罷工這件事情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中共黨內有人要使出這種殺手都有人在做。但是最後為什麼工人沒有罷工？我覺得這要放在當時的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條件中去看這個問題。我個人觀點，我不同意簡單地認為這個責任應該由學生來負。另外一點，學生在運動中所具有的權威性，我覺得是由於四十年中國的體制所造成的全權主義的社會，使得中國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夠獨立於共產黨之外在社會上進行這種大規模的運作。而在這個運動當中學生最早地成立組織。不管現在大家說學生偏激也好，激進也好，保守也好，這是另外的問題，但是為什麼學生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個人觀點就是因為學生有組織。這個組織有它的影響，它在學生本身當中的權威性也要有個過程，那么在社會當中就更要有個過程。因此我覺得讓學生扮演這個角色在現有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張伯笠：我想剛才這位女士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以上第368頁】場運動究竟是一場革命還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不是一場革命。你舉了很多例子，包括巴士底獄。我認為，巴士底獄以後還是暴政。關於這個問題，很多人有這種觀點，說你們學生為什麼排斥我們工人呢？而且我們工人死得比你多，為了保護你們，判刑也比你們重呀。我們說了一句話就判了十年呀，你們王丹說了那么多話才判了四年。而且他們說了你們罷一百天課不如罷一天工呀，罷一天工它就感到害怕呀。所以我們應該拿起武器奪取。我就問他一個問題，"你奪取了政權以後你交給誰？你怎麼去領導？你有沒有一個反對黨？"沒有。我認為我們中國幾千年就是這種惡性循環的暴政，在我們這代應該學習結束這個暴政，結束用暴力奪取政權再用暴力統治人民。羅馬尼亞可以提供一個借鑒，巴士底獄法國他們最後怎麼贏的，他們對法國大革命是有反思的。國內象你說的那種情緒是非常大的，包括我本人。我們大家對共產黨的體制本身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個共產黨必須推翻，可是它有個階段，這個階段你需要用什麼手段

？我們這場運動雖然被他們鎮壓了，但是我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而且我們有一個組織基礎，在五四運動出現了一個共產黨，那我想這場運動出現了民陣和其它組織。今後必須有這樣的政黨在共產黨對面，它有它的政治力量才能形成象你說的那種變革。

張伯笠：我想剛才這位女士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以上第 368 頁】場運動究竟是一場革命還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不是一場革命。你舉了很多例子，包括巴士底獄。我認為，巴士底獄以後還是暴政。關於這個問題，很多人有這種觀點，說你們學生為什麼排斥我們工人呢？而且我們工人死得比你們要多啊，為了保護你們，判刑也比你們重呀。我們說了一句話就判了十年呀，你們王丹說了那麼多話才判了四年。而且他們說了你們罷一百天課不如罷一天工呀，罷一天工它就感到害怕呀。所以我們應該拿起武器奪取。我就問他一個問題，“你奪取了政權以後你交給誰？你怎么去領導？你有沒有一個反對黨？”沒有。我認為我們中國幾千年就是這種惡性循環的暴政，在我們這代應該學習結束這個暴政，結束用暴力奪取政權再用暴力統治人民。羅馬尼亞可以提供一個借鑒，巴士底獄法國他們最後怎麼贏的，他們對法國大革命是有反思的。國內象你說的那種情緒是非常大的，包括我本人。我們大家對共產黨的體制本身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個共產黨必須推翻，可是它有個階段，這個階段你需要用什麼手段？我們這場運動雖然被他們鎮壓了，但是我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而且我們有一個組織基礎，在五四運動出現了一個共產黨，那我想這場運動出現了民陣和其它組織。今後必須有這樣的政黨在共產黨對面，它有它的政治力量才能形成象你說的那種變革。

楊濤*：我原則上同意剛才那位女士的說法。她說的那種現象正好反映在學生指揮部所制訂的原則上。我聽到每次柴玲對外發言都強調了純潔學生運動的原則，就是學生運動是一個很純潔的學生的運動，這樣就排斥了其它階層包括黨內階層的參與。很多沒有和外界合作的現象在學生自己制訂的原則上反映出來了。還有一點，學生宣佈需要和各界合作，這是事實，但是角色的配合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們學生需要的第一是捐款，是金錢援助，第二當學生游行的時候需要市民給予精神援助，第三當學生被鎮壓的時候，學生首先提出一條就是要求工人起來罷工，市民起來保護學生。所以學生把市民的參與、支持祇限於這三個階層，金錢方面、精神方面，肉體保護方面，沒有真正地做到在基本上、工作上的合作，組織上的合作，學生沒有這種訴求。所以這個原則導致學生根本不在組織上和工作上排斥了各階層市民的參與。我想這是個根本的原因，這是在學生政策之內的。所以我想學生本來可以有更正確的方向，使各界能夠跟學生在民運這件統一【以上第 369 頁】的事情上有更徹底的配合。

楊濤*：我原則上同意剛才那位女士的說法。她說的那種現象正好反

映在學生指揮部所制訂的原則上。我聽到每次柴玲對外發言都強調了純潔學生運動的原則，就是學生運動是一個很純潔的學生的運動，這樣就排斥了其它階層包括黨內階層的參與。很多沒有和外界合作的現象在學生自己制訂的原則上反映出來了。還有一點，學生宣佈需要和各界合作，這是事實，但是角色的配合上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我們學生需要的第一是捐款，是金錢援助，第二當學生游行的時候需要市民給予精神援助，第三當學生被鎮壓的時候，學生首先提出一條就是要求工人起來罷工，市民起來保護學生。所以學生把市民的參與、支持祇限於這三個階層，金錢方面、精神方面，肉體保護方面，沒有真正地做到在基本上、工作上的合作，組織上的合作，學生沒有這種訴求。所以這個原則導致學生根本在組織上和工作上排斥了各階層市民的參與。我想這是個根本的原因，這是在學生政策之內的。所以我想學生本來可以有更正確的方向，使各界能夠跟學生在民運這件統一【以上第 369 頁】的事情上有更徹底的配合。

李錄：我覺得楊濤*的說法實在太個人化，我想可能跟他當時在廣播站工作兢兢業業，不太了解其它工作有關。到海外之後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就不一一辯駁，因為這事情牽扯到對史實的基本的整理。那麼我祇舉一兩條例子。第一，他說工人對學生的支持主要是金錢上，物質保護，再加上精神上的道義支持。我覺得這可能總結得不太確切。因為第一，從組織上、從金錢上，事實上工人糾察隊、市民糾察隊、市民敢死隊，還有特別是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和最後組織建設，包括他們的廣播器材、廣播員，都是由學生指揮部提供的。而且當時我們每天因為都在一起辦公，離得不太遠，所以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發動罷工是學生和自治聯合會的人們一塊來做的這件事情，當然最後沒有做成，我待會可以稍微的分析一下。最後保護學生，事實上是全體人們由於對李鵬政府用這麼殘酷的手段鎮壓一場民主運動激起的憤恨，所以上百萬的人出來去堵截軍車，一直到六月三日、四日去勇敢地面對坦克，這是出於人們的義憤和良知。並沒有出現學生跑到每家每戶，去敲門請他們出來保護，沒有這回事。而且柴玲每次談到純潔學生運動的時候，主要指的是學生內部開始出現的分歧和腐化。這和你剛才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我當時作為廣場指揮部主要政策的負責人我是比較清楚這一點的。

我想對剛才那位女士的發言表示我個人的同意，我非常欣賞和同意您的大部分的觀點。我想我個人由於我家裏特別的關係，這個民主運動和受迫害的歷史在我個人已經持續到了第三代，從我的祖父、祖母到我的父母一直到我個人，

我特別的能夠理解您關於不同代的人，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暴政。這也是我逃出來以後一直在考慮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民主運動一直被共產黨成功地分割成不同的階段、分割成不同的階層？為什麼從來在中國就沒有出現過一場真正的追求民主、推翻暴政的一場持續性的人民運動？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的人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那麼這個問題的思考就讓人們情不自禁地有一種感嘆，如果歷史重演，我們將會怎麼樣。問題是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歷史可以被人們自覺地記錄下來，這就是我一再強調的要記錄原始事實的最重大的原因。如果我們今天不把我們所想過的、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記錄下來，下一次當運動再開始的時候我們會犯【以上第 370 頁】樣的問題。所以我期望這位女士和我們所有的人們都來重視這樣一場運動，在中國掀起一場對真實歷史追求的運動，中國檔案運動，希望大家都來參加這個計劃。

我想對剛才那位女士的發言表示我個人的同意，我非常欣賞和同意您的大部分觀點。我想我個人由於我家裏特別的關係，這個民主運動和受迫害的歷史在我個人已經持續到了第三代，從我的祖父、祖母到我的父母一直到我個人，我特別的能夠理解您關於不同代的人，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暴政。這也是我逃出來以後一直在考慮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民主運動一直被共產黨成功地分割成不同的階段、分割成不同的階層？為什麼從來在中國就沒有出現過一場真正的追求民主、推翻暴政的一場持續性的人民運動？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的人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那麼這個問題的思考就讓人們情不自禁地有一種感嘆，如果歷史重演，我們將會怎麼樣。問題是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歷史可以被人們自覺地記錄下來，這就是我一再強調的要記錄原始事實的最重大的原因。如果我們今天不把我們所想過的、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記錄下來，下一次當運動再開始的時候我們會犯【以上第 370 頁】樣的問題。所以我期望這位女士和我們所有的人們都來重視這樣一場運動，在中國掀起一場對真實歷史追求的運動，中國檔案運動，希望大家都來參加這個計劃。

常勁：我基本上支持李錄的觀點，我和李錄一樣強調大家對史實的看法。我支持李錄的觀點，還有其它兩個見證。我是自始至終參加運動的，是最早的參與者。最早學生提出兩點要求，一個是新聞自由，一個是結社自由。當時學生

打著橫幅出去的時候，沒有市民參加到學生隊伍中。我們當時希望市民來支持我們，但是大家都 是圍觀者。到最後北京市民為什麼站出來？是因為我們加上了打倒官倒，加上了平抑物價。另外我們非常有組織、有秩序地游行、組織活動感動了北京市民。這兩點 是我想強調的。另外一點，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工自聯找到北大，希望組織人力幫他們組織全市的罷工，因為我是同時負責宣傳，所以我們當時組織了一個組織部 專門組織宣傳隊。為了加強罷工這方面的宣傳，特地組織了我們系一個跟我很熟的同學組織了一批人到首鋼，首都鋼鐵公司那個工廠裏去對工廠進行宣傳。他回來告 訴我，他們去工廠後受到警衛的阻攔，說不準進去，他們就在路上等到工人放工以後，站在外面對工人宣傳。他們一直連續宣傳到六月三日的晚上。到了三日發生瓦 斯彈事件，他們把這些消息帶給工人，工人都流著淚，他們不敢在工廠裏聽，在外面流著淚對他們說：“我們很理解你們。但是出於我們自己個人的原因，我們都托 家帶口的。這個運動將來明顯地怎麼樣的結果，大家都能預料。但是如果我們參與了，將來我們的生活怎麼辦？”他們是流著淚這麼說的，這個同學回來告訴我。我 就舉這個例子。【以上第 371 頁】

UnRegistered